GUANGXI TONGSHI

广西通史

（第三卷）

钟文典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通史

（第三卷）

主　编

钟文典

本卷著者

谭肇毅　伍文浩　何龙群

唐仁郭　曹光哲

本卷统稿

谭肇毅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李庭华　曹光哲　马丕环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内文版式设计　鲍　翰
内文图片设计　马丕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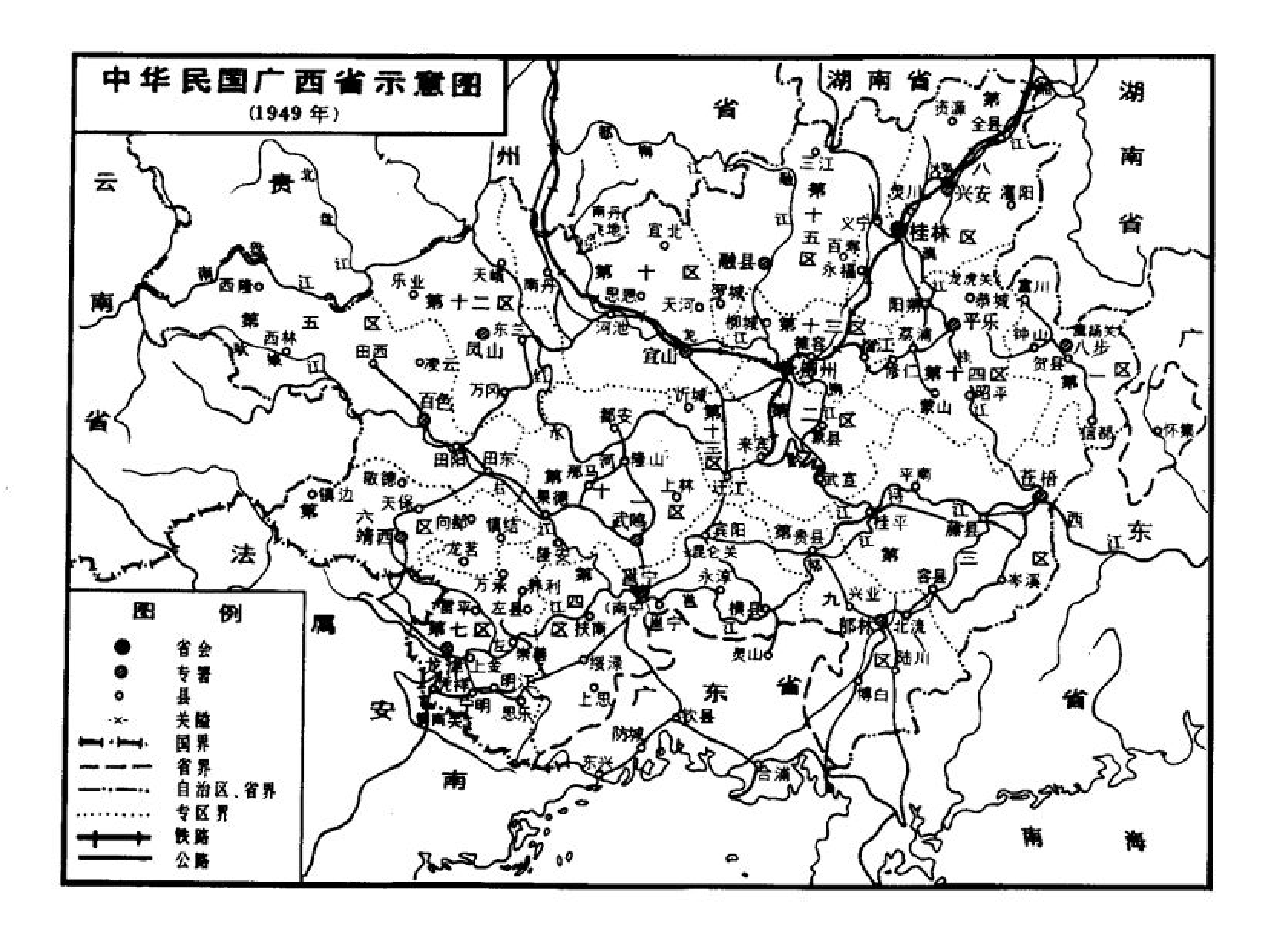
广西通史

（第三卷）

钟文典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2.625 印张　567 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3716-3/K·812　定价:130.00 元（全三卷）


中华民国广西省示意图
(1949年)
图例
省会
专署
县
关隘
国界
省界
自治区、省界
专区界
铁路
公路
云南省
贵州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安南
法属
南海
桂林
柳州
宜山
百色
田西
凌云
凤山
东兰
万冈
乐业
天峨
南丹
西隆
西林
宜北
思恩
天河
罗城
融县
三江
义宁
兴安
全县
灌阳
资源
百寿
永福
阳朔
平乐
钟山
富川
贺县
八步
修仁
荔浦
蒙山
昭平
信都
怀集
苍梧
藤县
平南
桂平
武宣
象县
来宾
迁江
上林
宾阳
武鸣
邕宁
(南宁)
横县
永淳
贵县
兴业
郁林
北流
陆川
博白
容县
岑溪
灵山
钦县
合浦
防城
东兴
上思
绥渌
扶南
同正
隆安
果德
那马
隆山
都安
忻城
田阳
田东
天保
敬德
镇边
靖西
向都
镇结
龙茗
万承
养利
左县
雷平
龙津
上金
凭祥
宁明
明江
思乐
镇南关
第一区
第二区
第三区
第四区
第五区
第六区
第七区
第八区
第十区
第十一区
第十二区
第十三区
第十四区
第十五区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运动在广西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广西的梧州、桂林、南宁、柳州和一部分城镇相继起而响应，声援北京的爱国斗争，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罢课、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成立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开展抵制日货、拒绝巴黎和约、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等斗争，八桂大地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热潮。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步在广西传播开来。一些在省外求学或工作的广西籍先进青年首先向家乡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省内的先进青年以各种形式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期间，广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开创了广西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一、广西各地响应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北京政府的卖国妥协政策，北京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爆发后，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和声援。具有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斗争传统的广西人民，也纷纷起而响应，反帝爱国斗争迅速席卷八桂大地。

广西最早起来响应五四运动的是梧州各学校的学生。当英、法、美等国在“巴黎和会”签订对德和约，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交给日本接管，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发起抗争活动的消息传到梧州后，省立一师、省立二中、苍梧道立师范、苍梧县立女子师范、培正学校和城厢小学等学校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宣布罢课和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27日，在各校已建立学生救国团的基础上，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宣告成立。学联团以“联络学界，抵制劣货，援助外交，实行学生份内救国之事”为宗旨，[①] 发动和组织各校同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介绍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同时，成立“抵制劣货检查队”，号召各界群众积极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一时间，“日货在梧州几乎绝迹”，日本人在梧州开设的药房、店铺“也完全陷于停顿”。[②] 而且，学联团还抓紧联络各地的学生爱国组织，磋商有关组织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事宜，推动全省学生运动的发展。

6月3日起，北京政府在北京连续逮捕爱国学生，激起全国各界民众的更大愤怒。为抗议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梧州学生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这时，就连梧州教会学校和建道圣经学校的学生也冲破校方的阻拦，加入爱国学生的斗争行列。迫于示威学生的压力，梧州海关监督兼交涉公使在其公署门前当众接收了示威学生的请愿书，答应把学生的正义要求转送北京政府。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梧州工人和其他各界爱国群众也行动起来了。“六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1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② 《梧州史志》，1986（4），68页。

三”后，梧州批发经纪、洋杂零售等行业的工人为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斗争，举行了罢工，并大力协助学生们清查日货。全市的航运工人宣布停止运载日货，码头工人声明不搬运日货。在爱国学生和店员工人的催促之下，梧州总商会也宣布实行罢市。全市很快便形成了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高潮。

紧接着梧州之后，桂林、柳州、南宁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采取行动，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桂林，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以前，进步学生为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已筹组了桂林学生爱国会的组织。北京学生“五四”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桂林后，全城各大中小学校立即奋起响应。在学生爱国会的领导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分头深入各街道开展宣传演讲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义举。学生们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承认巴黎和约”、“立即释放被拘捕的爱国学生”、“打倒北京卖国政府”等口号。各校学生还组织文艺团体，到剧院和各种公众场所演出。其中以桂林法政专门学校演出的《朝鲜亡国痛史》和省立三中演出的《刺伊藤博文》等话剧节目，最受群众欢迎。

6月中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云集上海，组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以统一领导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省立三中学生粟丰受桂林学生爱国会委派，赴沪参加了这一活动。此后，以桂林法政专门学校、省立三中、省立二师等校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桂林学生爱国会便依照全国学联的章程，改



1919年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各地代表合影，第三排右起第六人为广西籍代表黄日葵

组并易名为桂林学生联合会，桂林的学生运动从此纳入全国学生运动的轨道。

随着爱国运动的逐步深入，桂林的学生运动也很快发展成为一场抵制日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当时，日本产的商品在广西被贬称为“劣货”，为了在桂林禁止进口和销售“劣货”，桂林学联与桂林商会联合组成检查队伍，号召各商店和民众不要买卖“劣货”。同时，各检查组认真清查进入桂林的各类货物及各商店、摊点的存货，把被鉴定为“劣货”的物品，统统集中到王城广场当众烧毁。个别商店，如五洲药房和马永顺布匹店，因抗拒检查，被勒令停业和登报道歉。

桂林各行业的工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工人们不仅积极协助学生纠察队认真清查日货，而且配合检查组同抗拒检查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资本家转变了态度。为帮助学联赶印会刊和宣传品，印刷工人不辞辛劳，日夜加班加点工作。邮政工人则加紧进行整理和投送工作，把外地寄来的进步书刊等及时送到学生们的手中。工人群众的积极态度，有力地推动了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柳州，先是以柳州中学堂、柳江道师范学校和柳江道女子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经梧州学联团派员指导，发起成立了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马邑两等小学、河南小学、进化小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加入了学联会。6月下旬，柳江道学联会在文庙举行成立大会，疾呼爱国民主，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接着，1000多名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签约，抵制日货”等口号，高唱着“同胞，同胞，掀起偌大的风潮，君不见章、陆、曹贼签押，私把青岛售了；同胞，同胞，以何事相邀，大家来，抵制日货誓死不饶”的歌曲，涌向街头，举行振奋人心的示威游行。

随后，在柳江道学联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柳州各校学生陆续成立了宣传队和日货检查团，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和搜缴日货活动。在工人、店员和爱国商人的响应与支持下，学生们走街串巷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罪行和北京政府的卖国妥协行径，号召抵制日货，唤起民族自尊。日货检查团则

在工人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下，昼夜在各码头、市场、商店清查日货，并且同对抗爱国行动的奸商进行斗争，将搜缴的日货当众烧毁。

在南宁，北京发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来后，省立三师、省立一中和邕宁县立高小等学校的学生立即振臂而起，发起了有各界爱国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在游行过程中，各界群众高举着书写“抵制日货”、“振兴国货”、“勿忘国耻”等内容的旗帜，将搜集到的东洋磁漱盂、茶盅、餐碟、面盆及各种仪器，汇集到新商埠大马路的旷地上焚毁。随后，又派人劝告各洋货店把所悬挂的“仁丹”、“日月水”、“大学眼药”等日货招牌除掉，嘱咐各店以后永远不买卖日货。

南宁学生爱国运动的开展，得到了各行业工人的支持。运动兴起时，便有店员、工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1日，南宁学联主办的《爱国报》创刊，印刷行业的工人更是鼎力相助，积极承担印刷装订工作。运动期间，桂系政府要员投资开设的南宁先施公司偷运日货，码头工人和学生查知情况后，立即举行示威活动，迫使该公司关门停业。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南宁商会也迅速作出抵制日货的决议。此外，受学生运动的影响，驻扎在武鸣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不仅将自己购买的日本仁丹及其他物品焚毁，还表示要劝告同辈军人不使用日货，并且打算联络在邕的军人，设立一个军人爱国分会。①

6月30日，南宁的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是日，全市召开国民大会，各界群众3万多人到会，讨论救国方法。会间，群情激愤，万众悲呼，并有人断指血书，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最后，大会一致表决，向全国发出通电。在通电中愤怒谴责北京政府“秘密卖国”、“倒行逆施”、“内则拘禁学生，外则主签苛约”的罪行；提出“和约不签字”、“取消中日密约”、“声讨卖国贼”、“提倡国货”、“维持教育”、“发起组织全国国民大会”等六项严正要求。② 会

---

① 《时报》，1919年6月1日。

② 《申报》，1919年7月16日。

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时，南宁海关税务司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洋行的老板被吓得紧闭大门，胆颤心惊。



1919 年 7 月 11 日，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出版的《救国旬报》创刊号

由于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从6月起就积极同省内各地的学生组织联系，筹备建立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7月5日，京、沪两地的学生代表和国民外交后援会的代表到达梧州，与梧州学联团共同磋商组织广西全省学联的问题。7日，由省学联筹备处草拟的《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简章》交与京、沪代表带往柳、邕各地。接着，省学联筹备处在《救国旬报》第二期刊登致全省各地学校的公开函，邀请各地学校派遣代表来梧讨论成立省学联。是月20日，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在梧州召开，到会的有南宁、柳州、桂林、桂平以及梧州等地的学生代表，会议宣布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接着，省学联和梧州学联共同创办了《救国晨报》和“国货劝销场”，积极领导全省的学生爱国运动。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在密切省内外学运的联系，推动全省爱国运动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在广西的农村城镇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贵县（今贵港市），贵县中学的学生谭寿林等得到北京学联发出的通电后，立即联络县城各校同学，成立了贵县学生救国联合会，发动和组织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组织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宣传对日经济绝交，号召民众起来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贵县的工人群众也采取行动，大力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举动。当时，贵县的印刷工人为学生救国会日夜赶印传单；码头工人和航运工人积极帮助学生清查日货，不顾当地商团武装的威胁，协助学生们查获和烧毁了启昌杂货店偷运进口的500箱日

制红磷火柴。在陆川，由陆川中学的青年学生发起，成立了陆川全县学生救国联合会，推选宁培瑛为会长。在宁培瑛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各校学生经常深入各街道开展宣传讲演活动，痛斥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民众起来推翻旧势力。在平乐，县城各校的教师和学生联合行动，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活动，并在县境内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在灵山，青年学生们自发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释学生、诛曹章"，同时表示"愿投笔从戎，杀国贼，申义愤"。① 在全县（今全州县），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县的中小学生热烈响应，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是月，该县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争回青岛"、"反对日货"、"拒绝签订和约"等口号响彻全城。全县中学学生文立奎以投河自杀的方式抗议北京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② 此外，容县、玉林、贺县、东兰、百色、龙州等县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都纷纷举行集会或游行示威，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抵制日货斗争，要求惩办卖国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号召同胞奋起救国。全省的工人、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汇成了一股反帝爱国的强大洪流。

在开展爱国运动中，各地学生爱国团体相继创办发行了一批进步报刊。主要有：梧州学联的《救国旬报》、广西全省学联的《救国晨报》、南宁学联的《爱国报》、桂林学联的《三日刊》和《周报》、贵县学联的《晨报》、玉林中等学校抚康学联（后改称抚康留玉学会）的《抚康》杂志、容县学联的《绣江杂志》等等。这些报刊及时地报道全国爱国运动的情况，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并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一些新思想、新文化，在教育青年、唤醒民众，促进爱国运动在广西的广泛深入开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西人民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是广西近现代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和各界民众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次斗争，

---

①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日。

②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桂林地区党史大事记》，2页，1988。

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促进了广西人民思想的觉醒和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桂系军阀集团在广西的统治，标志着广西革命运动开始迈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开展，各种新思想在广西开始流传。但当时对各种新思想的介绍还大都是零星和片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革命理论自然也还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五四运动在广西的深入开展，促进了广西人民的新觉醒，先进青年对新的理想社会和新的思想学说的求知渴望尤为迫切，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随着“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随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终于通过种种途径真正在广西传播起来了。

自觉承担历史重任，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起着重要桥梁作用的，是一批在省外求学或工作的广西籍先进青年。当时的广西，不仅政治上腐败，经济和文化也十分落后，所以，到省外求学或工作的青年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接触了解工人群众，逐步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科学理论，而要拯救灾难深重的国家与民族，改变腐败黑暗的社会状况，只有“像俄国的前辈一样”,① 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走十月革命的成功道路。因此，他们不仅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地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之中，还自觉地担当起向家乡

①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演进中的北京》，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在他们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黄日葵、谭寿林、宁培瑛等。

黄日葵，桂平县桂平镇人。1917年冬，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求学。1918年5月，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扩张，愤然罢学归国。同年秋，考人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后转学英文系本科。10月，参加各校学生在北京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并担任《国民》杂志的第一届特别编辑委员和第二届编辑干事。1919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深人工农民众中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此后，又加人少年中国学会，成为该学会的骨干成员。五四运动期间，是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1920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从1919年初到1921年春，他用“一葵”、“野葵”等笔名先后在《国民》、《少年中国》、《晨报》副刊、《少年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诗歌、译作达20多篇，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的思想武器，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与此同时，他开始将《社会主义浅说》等进步书籍寄回家乡，给亲友们传阅。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锤炼，黄日葵终于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西籍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他一方面参加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一方面加紧联络谭寿林等在京的广西籍学生，开展向家乡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谭寿林，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五四运动期间，在贵县中学读书的谭寿林是贵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1年9月，考人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英文一班。在校期间，受黄日葵和陈居玺（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平南县人）等人的影响，参加反宗教大同盟和民权运动等进步活动，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二批成员。当时，他还参与了黄日葵等人创办的北京第二平民学校的活动。次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秋，升人北大国文系。这年暑假，他回家乡筹集学费，应贵县中学校长陈勉恕的邀请，分别在其母

校贵县中学和县城的圩心街演讲，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这次演讲，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返校后，他又与黄日葵等人一道联络北大的广西籍学生，在北京銮庆胡同的粤西会馆成立了新广西期成会，是年7月创办《桂光》半月刊，积极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桂光》半月刊的编辑主任由谭寿林担任，黄日葵、党庆华、胡伟然、苏康甲为编辑股成员。该刊以呼吁救国和改造社会为宗旨，公开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同时，辟有“时事述评”专栏，刊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广西政局的长篇政论文章，抨击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该刊的社论等重要文章，大多由黄日葵和谭寿林执笔撰写。《桂光》每期印行约2000份，主要是寄回广西发行，在全省的主要城市和许多县城设有分售处。由于刊物内容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浓厚的时代气息，故深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

在省外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宁培瑛同样表现了十分积极和热情的态度。宁培瑛，陆川县人，又名宁楚珍，还曾使用过林平生、凌秋珍等化名，也是一位早期的广西籍中共党员。五四运动时，他是陆川县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此后，到广东高等师范法科求学。在校期间，他是《新青年》、《向导》等刊物的忠实读者。平时，他不仅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还经常去聆听恽代英、萧楚女等中共早期骨干成员的演讲，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他还不断地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邮回其母校陆川中学和县里的一些高等小学，为在家乡传播马列主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24年，宁培瑛被广西留穗学会第十五届常会推选为《群言》杂志的编辑。在这份进步刊物上，他先后发表了10多篇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政论性文章。其中，刊登在《群言》第4卷第1号上的《现代的社会病》可称得上是他当时的代表作。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及其产生的原因，明确提出治疗现代资本主义病态的有

效办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群言》杂志主要也是运回广西各地发行，在全省各地共设有26个分售处，拥有众多的读者，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省内各地工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直接在学校和民众中介绍、宣传马列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高孤雁、朱锡昂、韦拔群等人，便是这些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的代表。

高孤雁（高炳南），是龙州县的一位壮族青年。1923年，他在该县下冻乡赤光小学任教时，就经常订阅《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创造》、《少年先锋》等进步刊物，在校内积极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学习文化，掌握革命理论，他专门举办了一个免费的特别班，吸收失学或贫穷的农家子弟入学。在这个班里，除了开设文化课之外，高孤雁还从《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中，精心选取了不少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和诗歌作为教材，亲自指导学生学习。结果，该班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不少学生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以及龙州起义中成为革命骨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创建时期，在玉林一带从事革命开拓工作的朱锡昂（博白县人，中共党员），更是“竭尽全力宣传马克思主义”。[①] 1925年，他在省立九中（后改为省立玉林高中）任校长时，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公开悬挂在学校的大礼堂内，把恽代英邮寄给他的革命书刊介绍给学生，发动学生阅读革命书刊。每周的星期一，他都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演讲，内容大都是马列主义学说。而且，他还将每周的星期六定为学校的工农运动日，组织和安排师生下乡宣传马克思主义，演讲革命道理。

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做出特殊贡献的，是广西现代农民运动的先

① 博白县党史办公室：《拼头颅，挽乾坤——朱锡昂烈士传记》，载《博白史志》，1987（3），6页。

驱者、壮族人民的杰出代表韦拔群。青少年时期，在宜山庆远中学和桂林法政专门学校求学的韦拔群，就已表现出十分强烈的革命倾向。1914年，他偕友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考察活动，此行更增强了他救国救民的信念和决心。1916年，护国军兴，他在家乡东兰县带领100多名有志青年，投奔贵州护国军熊克诚旄下，参加讨袁战争。之后，他到贵州讲武堂学习，结业后分到驻重庆的黔军部队当参谋。五四运动兴起时，身处封建军阀部队的韦拔群经常和一些进步军官研讨时政，传阅《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关注当时的新动向和新思想，并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① 他以“愤不平”为笔名，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传单，抨击社会上和军队中的反动腐朽现象，并在军中秘密散发这些文章和传单。同时，他购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的印章，寄给家乡东兰县高等小学和好友陈儒珍等人，使偏僻的广西壮族山乡群众开始接触到新的革命信息和新的思想学说。事泄后，韦拔群已难于在旧军队中容身，便弃职离开了重庆。1920年10月，到了广州，参加了孙中山支持的、由广西籍国民党人建立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在会中担任政治副组长职务，开展反对桂系军阀集团的活动。次年9月，返回家乡东兰，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开始从事农民革命运动。1922年，韦拔群三次组织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封建势力。1925年1月，他和好友陈伯民离开东兰，奔赴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较为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久，因工作需要，韦拔群受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委派，以广西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提前结业返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回到广西后，他在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同时，公开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仿效广州农讲所的做法，先后在东兰武篆举办了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过程中，他亲自给学员讲课，指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了解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组织学员参加社会调查和当地的阶级斗争实践。经农

① 谢扶民：《韦拔群》，11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59。

讲所培训的数百名农运骨干返回各地后，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农运工作，使当地的农运逐步由自发阶段上升到自觉阶段，使马列主义在右江地区得到了传播。总之，韦拔群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农运的做法，使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超越了原来主要在知识分子范围内的局限，与广西的农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

此外，雷经天、陈勉恕、陈培仁、黄士韬等，也都积极向家乡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兴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①

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广西的闭塞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大量的新文化书刊涌入广西，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1922年起，在广西有条件的地方，已能够比较自由地订阅或购买到全国各地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2日出版）上"本报代派处一览"栏目中，就有"梧州第一师范学校陈公佩"的记载。不少进步书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通过邮政部门或书店等渠道传入广西的。其中介绍、宣传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刊，如《每周评论》、《共产党》、《向导》、《中国青年》等，都是各地民众感兴趣，尤其是青年学生喜爱的读物。



五四运动前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广西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向导》、《中国青年》等

当时，在广西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还有全国学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等组织。五四运动期间，广西全省学联建立后，和上海、北京等地的学联组织加强了联系。此后，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总会定期给广西学联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87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邮寄《新青年》等刊物，同时在广西各地设立了代派处。1924年为纪念十月革命7周年，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均增设了特刊，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广西的影响，青年团广东区委会报经团中央同意，把《向导》(自87期起)、《中国青年》（自51期起）分期寄赠梧州、桂林、容县等地的报社和学校。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为广西人民提供了改造社会和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章　旧桂系统治的崩溃

1916年旧桂系统治广东以后，贪婪残暴，大肆搜刮，腐败黑暗，并勾结直系军阀破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旧桂系的种种劣迹，激起广东民众的愤恨。1920年，孙中山命令驻闽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由于旧桂系腐败和内部矛盾，桂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退回广西。陆荣廷不甘心失败，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图谋攻粤，重占广东。1921年孙中山发动“援桂讨陆”战争，进兵广西，桂军纷纷溃败，陆荣廷被迫下野，旧桂系统治宣告崩溃。同年，孙中山任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主持桂政。广西平定后，孙中山出巡广西，督师整军，准备经桂林入湘北伐。但孙中山的计划遭到陈炯明的反对，北伐夭折，孙中山被迫离桂返粤。马君武主桂后，曾策划整理省政，振兴广西，但受到驻桂陈炯明粤军的掣肘和旧桂系残余的威胁而无所作为。

一、旧桂系在广东的失败

护国运动期间，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集团利用护国讨袁的机会向东扩

张，夺取了广东地盘，完全控制了两广地区。

旧桂系占据广东后，出于封建军阀的本性，“视粤如外府”，[①] 大肆搜刮，大借外债，任人唯亲，纵兵作恶，实行残暴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旧桂系的贪婪和暴政，引起了广东民众的普遍愤恨，“视桂匪之在粤，比虎疫蝮蛇之近在盘匜枕席间尤甚”。[②] 而且，在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期间，旧桂系又勾结直系、滇系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进行，逼走了孙中山。旧桂系的为非作歹和黑暗统治，终于导致了“西南各省同志皆欲去之”[③] 的后果。

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决定先剿灭“桂贼”，“统一南方”。[④] 1920年6月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声讨旧桂系“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⑤] 的罪行，进行讨伐旧桂系的准备工作。孙中山把“扑灭桂贼”的希望寄托在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陈炯明粤军之上。6月29日，派朱执信、廖仲恺前往漳州催促当时以援闽名义驻扎闽南的陈炯明率军返粤讨桂。此外，孙中山又利用旧桂系与滇、黔、湘等省军阀的矛盾，迭电唐继尧、刘显世、谭延闿等，希望他们共同出师讨伐旧桂系。孙中山为免除粤军回师广东的后顾之忧，还利用直皖矛盾，接近皖系，争取皖系闽督李厚基支持粤军的行动。

正当孙中山加紧进行粤军回师广东的准备工作之时，旧桂系也在策划消灭驻闽粤军的行动。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旧桂系看准这一机会，响应直系讨皖，迅速调集兵力于粤闽边，准备进攻闽南粤军。7月11日，旧桂系正式下达进攻闽南的命令。

---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337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339页，上海，民智书局，1930。

③ 孙中山：《致许崇智电》，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④ 《孙中山年谱》，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2辑，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⑤ 《民国日报》，1920年6月4日。

驻闽粤军的处境顿时危急起来，如不回师夺取广东，将无以自存。于是，原来仍怯于作战、欲与旧桂系调和，又与北洋政府暗中勾结的陈炯明，才不得已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同意率部回师广东讨桂。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以"粤人治粤"、"广东人不打广东人"为号召，分兵三路向粤边挺进。在孙中山的发动下，一场驱逐旧桂系据粤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了。

粤军入粤后，势如破竹，接连攻取潮安、梅县等地，至9月初，已进抵河源、惠阳一线，威胁广州。与此同时，孙中山派遣朱执信等由上海返回广东联络国民党旧部和广东民军，响应讨桂的军事行动。结果，依附旧桂系的原粤军旧部纷纷宣布独立或倒戈相向，策应粤军回师广东。广东人民对作恶多端的旧桂系早已恨之入骨，战争爆发后，便纷起响应。粤汉路广韶段、广九段铁路工人先后罢工，拒绝为桂军运载兵员和军需品。各地民军则直接参战，帮助粤军打击桂军。广州学生为把旧桂系逐出广东，纷纷宣布罢课。各地农民和香港工人也群起支援讨伐旧桂系。此外，湖南的谭延闿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也派兵参战，袭击粤北桂军。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粤桂两军的力量对比，使据粤桂军迅速陷入困境之中。

桂军各部为图自保，相率撤出战斗，分头向西江和粤北退却。粤军乘胜追击，沿东江两岸向广州进逼。这时，旧桂系首领陆荣廷为挽回败局，致电陈炯明，诡称"愿速弭兵修好"，①以麻痹粤军。同时，不断派遣留守广西的部队东下增援，准备配合在粤桂军进行反攻。陆还电令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说"宁可失桂，不可失粤"，②要莫坚持到底。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加上骄横轻敌和策略失当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据粤桂军的失败已成定局。10月22日，粤军攻克惠州，逼近广州。陆荣廷等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被迫于24日由岑春煊领衔通电，解除军政府政务总裁职务，取消西南独立，声明"南北统一"。26日，桂系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莫荣新在勒索200万元开拔费（分八期付清）后，率部退出广州。莫在行前发表通电，声明"率

①② 《民国日报》，1920年9月15日、10月12日。

同将士宣布取消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①。

10月29日，粤军进取广州。31日，孙中山在上海与唐绍仪等联名通电，声明军政府依然存在，否认所谓的南北统一。11月底，据粤桂军全部撤离粤境，败回广西。至此，旧桂系对广东长达四年多的统治宣告结束。

旧桂系在广东的失败，是这一封建军事政治集团从全盛时期走向衰败的开始。

二、“援桂讨陆”战争和陆荣廷下野

对桂军在广东的失败，陆荣廷并不甘心。为了恢复旧桂系在广东的统治，陆荣廷不惜宣布取消自主，接受北京政府委任的粤桂边防军务督办职务。他以收复失地，保境安民为号召，于1921年2月任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设署于梧州，作为图粤军事的指挥机构。随后，调兵遣将，准备攻粤。陆声言分五路进攻，先入粤者，即任粤督。②

当时，直系军阀徐世昌把持下的北京政府出于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目的，也大力支持和接济旧桂系，怂恿陆荣廷出兵扰粤，并电令浙、闽、赣等省督军准备策应旧桂系的攻粤行动。

根据这种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先以“援桂”名义出兵讨伐陆荣廷，肃清旧桂系军阀势力，而后兴师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1921年2月中旬，广州革命政府正式作出“援桂讨陆”决定，并以陈炯明督师，加紧进行“援桂”部署。5月28日，孙中山命令粤军和响应讨陆的赣、滇、黔各军做好讨陆准备，并约湘军同时攻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军阀史大事记》，13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147页。

桂。

但是，陆荣廷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先动了手。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命令。桂军分三路出动，由陈炳焜率韦荣昌、刘震寰等部出梧州攻郁南、罗定；由接替广西边防军第一路总司令林虎职务的黄业兴率所部袭击高雷、钦廉；由广西边防军第二路总司令沈鸿英率部向四会北江进攻；陆荣廷、谭浩明（时为广西督军）与马济的边防军第三路驻玉林一带，遥为指挥。与此同时，原桂系广东省长、政学系的杨永泰在高雷、钦廉一带策动被粤军改编的原桂军残部倒戈起事，配合攻粤行动。由于桂军先发制人，所以进展颇为顺利。左翼沈鸿英由怀集进入粤境，很快便占领连山、阳山。右翼黄业兴自玉林出发后，也迅速占领了钦县、廉州，继而又攻占化县、高州。

陆荣廷抢先发动攻粤，促使醉心于"地方自治"的陈炯明暂时在讨陆问题上和孙中山趋于一致，接受孙中山任命的援桂军总司令职务，并出发肇庆，部署粤军反击桂军，进军广西。粤军分三路进攻：由叶举任中路总指挥，沿西江南岸向据守梧州的桂军正面进攻；以许崇智为右翼总指挥，出四会、广宁，除策应梧州正面作战外，以攻击桂林为目标；以黄大伟为左翼总指挥，迎击进袭高雷的桂军。这时，响应讨陆的赣、滇、黔各军也分别集结桂东北和桂西北，准备攻击桂林、柳州。6月18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要求各军"荡平群盗，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全自治"。[①]"援桂讨陆"战争全面展开。

从6月20日起，中路粤军开始反击攻粤桂军，逼使中路桂军退守梧州。粤军跟踪追击，于22日在内河舰队和飞机队协助下，对梧州取包围之势。接着，粤军派人说服了桂军守将刘震寰允作内应，又用港币10万元收买了另一守将韦荣昌。25日，正当两军在梧州近郊激战时，刘震寰在阵前倒戈，率所部配合粤军攻梧。韦荣昌则率部属撤离梧州，沿西江向浔州（今桂平）方向退走，韦到浔州后即通电脱离桂系。桂军中路指挥陈炳焜见势不妙，衾夜向

---

① 《民国日报》，1921年7月6日。

抚河败退。26日上午，粤军进占梧州，中路桂军完全失败。与此同时，桂军左翼沈鸿英被粤军击败于阳山。沈败退贺县后，于7月10日宣布“自治”，所部改称“救桂军”，并声明“脱离陆氏关系”，“与广东一致行动”，[①] 8月3日又改称“广西陆军第二军”，后进据桂林一带。右翼黄业兴部被粤军打败后，从化州退返玉林，再转往钦县，后倒戈附粤。此外，桂军统领秦步衢则在桂林驱逐走桂林镇守使李祥禄和败退桂林的陈炳焜，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并宣布“独立”。柳州守将贲克昭也宣布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自任“柳庆救桂军总司令”。桂军已全线崩溃。

中路粤军占领梧州，打开广西门户后，继续溯江西上。从7月13日至20日，连续攻占北流、平南、浔州、贵县等地，突破桂军的第二道防线。左翼粤军分由高雷、钦廉突入桂境，相继占领玉林、横县、永淳等地，尔后会同中路粤军进逼南宁。另外，滇、黔、赣联军也颇有进展，已分头向桂林、柳州挺进。

面对粤军的步步紧逼和众叛亲离的形势，陆荣廷仍打算抵抗到底。7月12日，陆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坚守南宁，号召部属发扬侠义传统，赶筑工事，坚城固守。但旧桂系内部宁明派与武鸣派的矛盾却在此时激化起来了，督军署里的宁明派甘朗廷、甘若之等10余人以陆荣廷在二次革命时杀害宁明人农实达等人为由，酝酿倒陆风潮。陆荣廷恐招激变，于己更为不利，最终决定退出南宁。7月16日，先是陈炳焜在南宁通电解除广西护军使职务，并匆匆离邕赴柳携家眷经湖南逃亡天津。接着，陆荣廷于19日在南宁通电下野，然后偕谭浩明、李静诚（时为广西省长）等人逃往龙州。8月4日，桂军叛将韦荣昌等人迎接粤军进入南宁。旧桂系政权至此被推翻。

这时，诈称自治的沈鸿英也在桂东北被北路粤军和赣、滇、黔联军击溃，沈率余部逃往全县（今全州）。赣军紧追不舍，沈被迫率部离桂入湘，投靠赵恒惕湘军。后又脱离赵，转而投靠吴佩孚，在湘、赣边界流窜。8月13日，

---

① 《申报》，1921年7月21日。

粤军占领桂林。柳州桂军则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粤军改编。

粤军进占南宁后，为彻底消灭旧桂系势力，以绝后患，一面分兵向武鸣、都安、河池方向追击溃逃的桂军，一面又发起追歼陆荣廷的龙州战役。9月24日，陈炯明发布进攻龙州命令。粤军分由上思、扶绥、武鸣三路向龙州进攻，并在宁明、亭亮、响水等地击破桂军防线，于30日攻占龙州。陆荣廷、谭浩明等逃离龙州，经越南转往上海。桂军余部大都避往边关，或落草为寇，讨陆战争基本结束。

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推翻了旧桂系集团在广西的统治，粉碎了北洋军阀利用陆荣廷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企图，达到了为兴师北伐扫除障碍的目的。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可以说，这场战争及此前粤军回师广东的战争，都是孙中山反对封建军阀专制，争取民主政治斗争的继续，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但是这场“援桂讨陆”战争，也给广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当时，由梧州沿河直到龙州、百色，除了几个较大的城市之外，几乎所有的市镇和乡村，都受到了入桂粤军的恣意骚扰和屠劫。“至于遇到抵抗的村庄，则玉石俱焚，化为焦土”，“例如贵县街墟尾的焚烧屠杀，武宣、武鸣、龙州的焚烧屠杀，是最突出的”。① 总之，陈炯明粤军入桂后，“也同过去桂军在粤一样，奸淫掳掠，无所不为”。② 显然，粤军在讨陆战争中烧杀掳掠、残害民众的暴行，完全是陈炯明拒不执行孙中山关于不扰民的指示，实行野蛮的报复政策的结果。入桂粤军的暴行，是对这场革命和正义的战争的极大亵渎，它不仅败坏了粤军的声誉和功业，还造成了广西民众对孙中山扶持的广西新政权的

① 李墨馨：《孙中山讨伐陆荣廷和誓师北伐及陈炯明的叛变》，载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辛亥革命资料》，250页，1960。

②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第6辑，9页，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4。

误解和反对，使广西此后出现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动乱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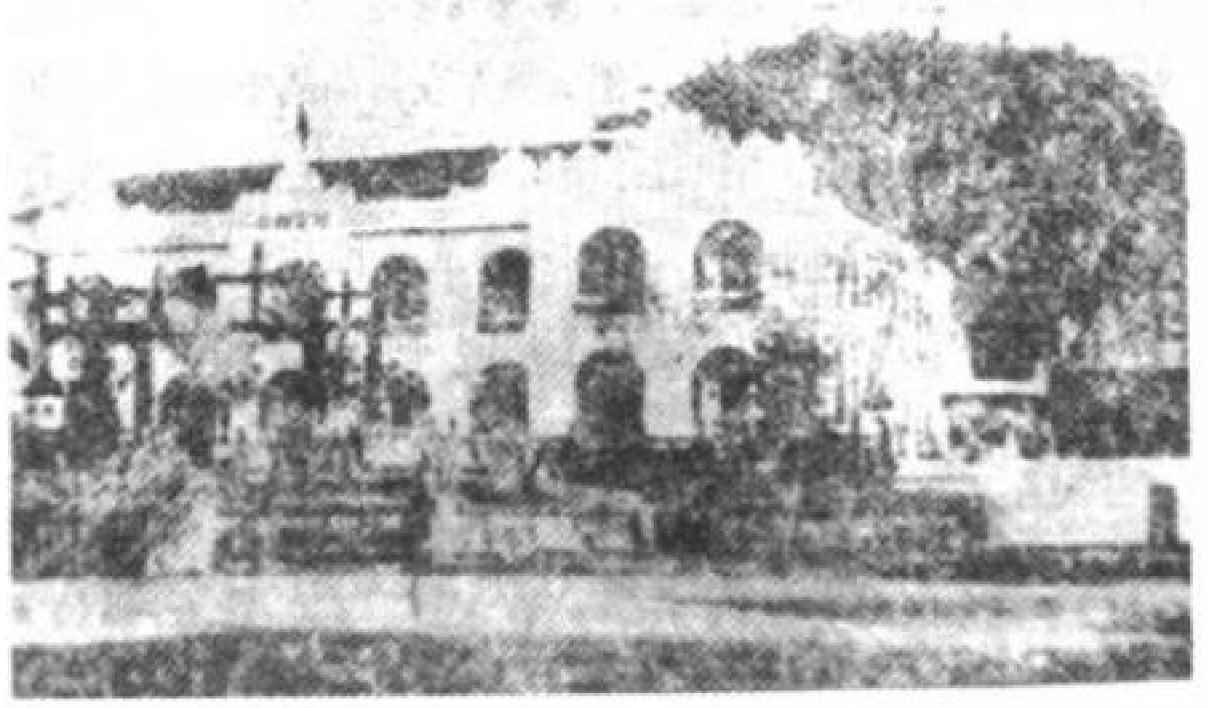
三、孙中山巡桂整军北伐

随着广西的基本平定，孙中山决定乘胜出师北伐。

1921年10月8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案，作出了出师北伐、统一中国的决议。15日，孙中山乘坐宝璧号军舰离开广州，出巡广西。由粤、赣、滇、黔各军组成的北伐军3万人，也于是日开拔，准备以桂林为前进基地，于次年春取道湖南，大举北伐。

17日，孙中山到达梧州，即电召驻邕的陈炯明来梧会商北伐问题。但是，陈炯明为巩固个人的权力和地盘，正暗中与滇、湘等省军阀勾结，借口"保境息民"，大谈"联省自治"，反对组织革命政府，反对兴师北伐，因而托词拒召。孙中山不得已于25日亲赴南宁晤陈，对陈反复说明北伐的迫切性，要求陈抽调所部40个营参加北伐，并由广东负责供应北伐军所需饷械。但陈炯明始终不作明白表示。孙中山只得离邕返梧，同时决定仍按原计划北上桂林整军。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后，在原靖江王府内设立北伐大本营，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名义，宣布行使战时最高统帅的职责，着手



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的行辕（在今广西师范大学内）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视察中国国民党桂林支部时与支部成员合影

整军北伐的工作。其措施主要是：(一)健全大本营及其所属机构。1922年1月间，孙中山公布大本营条例，规定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和大本营文官部长，各承大元帅之命，分司其事。于大本营内分设幕僚、兵站、军务、军法、参军、政务、建设、度支、宣传9处及军事委员会，在大元帅或各总长、文官部长领导下处理具体事务。(二)整编北伐军。当时，集中桂林一带的粤、赣、滇、黔各军约有10个混成旅又20余营，计4万人以上。大本营将其分组为7个军，督导训练，计划分三期陆续出师北伐。(三)建立和整顿军需物资供给机构。从桂林流向梧州的抚河，是北伐军的军供运输干线，孙中山驻节桂林后，针对抚河沿线不少巡缉所和护商团征发民船经商牟利，甚至贩运烟土的情况，下令撤销沿河县镇的护商团，成立抚河船务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对抚河所有船只登记发照，派兵保护运输。并规定"被征发之船，无论何项军队，非得大本营命令，不得请求使用"。①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军队强征民船贩私营利的弊端。同时，由大本营设立供给局，在兵站沿线采办军需民用物品，运往前线供军民购用，然后收购沿途物产，运回后方经销，以杜绝奸商串通军队走私贩私的现象。还在大本营金库设立"代理省立广东银行汇兑处"，设法解决旧桂系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并且，要求各地建立和健全兵站供给制度，通令各军政长官、大本营

① 《民国日报》，1922年1月5日。


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同游桂林叠彩山留影

兵站负责北伐饷械物品供应和征发夫役事宜，各地官绅要协同妥办，“勿许再向民间搜求，致兹纷扰”。[①]（四）整训军队。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思想素质，孙中山要求北伐军不应照搬欧洲的战术战法，而应继承当年黑旗军打败法国侵略者时采用的“游勇战术”，希望各部队在训练时掌握住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等五种技能，并树立“为国家效死，死重于泰山”的革命英雄气概。[②] 孙中山还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培养军队的革命意志。他不仅经常向军人们灌输“三民主义”和“以俄为师”的思想，还专门为驻桂林各军的官佐们作了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说，认定“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指出这次北伐是件非常的革命事业，目的是“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而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民国”。孙中山很欣赏苏俄红军的品质，认为苏俄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勉励北伐将士以苏俄军人为榜样，并相信“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

① 《民国日报》，1922年3月22日。

②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辑，163、164页，桂林，政协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

目的、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上”。[1]

在桂林整军期间，孙中山还加强了同苏俄的联系。1921年6月，列宁委派共产国际正式代表马林来华，援助中国革命运动。12月23日，马林经中共党员李大钊介绍，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孙中山在军次亲切会见马林，并与之进行数次长谈。双方畅谈了有关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情况，讨论了中俄联盟的可能性。之后，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2] 孙中山十分赞同并采纳这两项建议。当时，孙中山还邀请马林向北伐军的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并让青年军官们回去向士兵作政治宣传。这次会见，促进了桂林整军工作的开展。

1922年2月3日，随着北伐军基本编制完毕，孙中山颁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是月中旬，北伐军前锋部队已进入湘境。但是，北伐军的经费仍难以接济，孙中山便命令粤军参谋长邓铿加紧在粤筹集经费。可是，邓铿从香港到广州时，却在广州车站被陈炯明的部属暗杀，致使北伐军的整个入湘计划严重受阻。孙中山被迫改变北伐计划和路线，并决定将大本营从桂林迁往韶州（韶关）。4月8日，大本营由桂迁粤。16日，孙中山到达梧州，随后返回广州。

孙中山出巡广西，整军北伐，历时四个多月。除了在桂林整军、督师北伐之外，孙中山还先后到过梧州、桂平、横县、昭平、平乐、阳朔等地。所到之处，孙中山都和民众见面，并先后作了《广西善后方针》、《党员须研究革命主义》、《广西应开辟道路》、《开发阳朔富源之方法》、《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知难行易》、《军人精神教育》、《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等多次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孙中山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

---

①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辑，142、134、169页。

② 《孙中山年谱》，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3辑，194页，中华书局，1976。

的罪恶，宣传了三民主义，阐述了实行三民主义的必要性，并申明了兴师北伐统一全国的意义。同时，还就改造广西、建设广西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方略和新主张，号召人们开发和建设广西。出巡期间，孙中山受到了广西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抵达桂林时，“欢迎的群众，包括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各界人士、城市居民不下3万人，分列在大路两旁，从将军桥一直排列到南门城内大街上。那时桂林不过是八万多人口的城市”。[①] 这与援桂讨陆战争时，入桂的陈炯明粤军遭到广西民众的憎恨与反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孙中山这次出巡广西，整军北伐，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使广西人民对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学说，有了较过去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四、马君武主政广西

随着援桂讨陆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陆荣廷的下野，孙中山本着“扶植广西人民，使得完全自治”，[②] 以及“勿许再有第二次强盗治桂出现”[③] 的原则，于1921年7月28日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长，组建新的广西省政府。

马君武，初名道凝，号厚山，后改名同，号君武，游学日本时，又改名和，但以后以号行，只用“君武”。祖籍湖北蒲圻，其曾祖父马丽文在清朝为官，后于光绪年间被谪为广西思恩府（治所在今武鸣县境内）知府，病故任上。其祖父马光昊因无力扶柩回原籍，在桂林择地葬父后便定居桂林。其父马衡臣曾先后在恭城、平南、马平（今柳州）等县任县幕职（文牍）。1881年

---

① 李任仁：《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在桂林》，载《桂林文史资料》第1辑，第187页。

② 《民国日报》，1921年7月6日。

③ 孙中山：《广西善后方针》（1921年10月26日），载《孙中山先生十讲》，35页，上海，民智书局，1923。

7月17日，马君武出生在其父任幕职的恭城县署内。幼时，马君武随父去平南，启蒙于一私塾里。他九岁时丧父，家贫，全靠其母诸淑贞在桂林打工维持生活，其一弟二妹因生病无钱医治而陆续死去。少年时，马君武主要是在其母的督促下，在亲戚陈允庵家习读，旧学极有根底。1897年，考入桂林体用学堂，专攻英文和数学。康有为到桂林讲学时，在桂设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宣传变法维新，马君武常去听讲，接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深，用马同的笔名，在康创办的《广仁报》上发表文章。1900年，在亲友资助下，到广州入丕崇学院习法文。同年7月，他专程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为，请教救国之计，并接受康委派回桂参加重整维新活动。1901年，到上海入震旦学院学法文。同年冬，考取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到日本横滨后结识梁启超，并成为梁主办的《新民丛报》的撰稿人。1902年，与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借纪念明永历帝遇难，反对清朝统治。1903年，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学工艺化学，成为广西第一个自费出洋留学的学生。同年9月，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和经河内到横滨的孙中山认识，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极表赞同。从此，和康、梁分道扬镳，追随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这一年，他发表了《唯心派巨子黑智儿之学说》等一系列文章，将黑格尔等人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1905年，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和黄兴、陈天华等人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并担任同盟会的秘书长。他在同盟会创办的《民报》上先后发表了《甘必大传》、《帝民说》等文章，反对专制政体，倡导民主共和。同时，还在同盟会的留日学生中传授爆破技术，为狙击清廷的权贵做准备。同年冬，为抗议日本政府限制留日学生的反清活动，马君武和一批留日学生愤然离日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总教习兼理化教授。1907年，因受清朝地方政府迫害，离沪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学冶金专业。1911年毕业并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留德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离德归国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并相继宣布独立，酝酿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被广西革命党人推举为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筹组活动，参与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起草工作。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又参与了《临时约法》的起草工作，并出任实业部次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转而主持全国铁路公司时，马君武担任该公司的秘书长职务。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任参议院议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马君武离开北京，再次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农科大学学习，并兼任德国波鸿化学工场工程师。这一期间，他编译了《德华字典》、《动物学》、《植物学》等著作。1916年，结束学业回国，以参议员身份参加政治活动。1917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出任军政府交通部长。1918年，孙中山受旧桂系军阀排斥，离穗赴沪，马君武跟随同行。之后，与广西同乡王乃昌、梁烈亚、周公谋等人在上海组织改造广西同志会，在旅沪广西籍人士中开展推翻陆荣廷统治，改造广西的革命活动。1920年，又随孙中山南下恢复广州军政府。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定在广州组府。5月，孙中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又称非常大总统），马君武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8月，受命主持桂政（兼摄军务），成为广州革命政府委任的第一位广西省长。


广西省省长马君武

8月11日，马君武在南宁正式视事。他废除了旧桂系时期的督军和总司令制，以改造广西同志会为基础，组建省长公署，委任杨愿公为政务厅厅长，吕一夔为财政厅厅长，林伯桀为军政处处长。其他部门，如司法、实业、教育等暂设科室办理公务。随后，又陆续向各县委派新的县长。11月，重新划分全省的行政区，把全省划为邕宁一区、横州二区、浔州三区、柳州四区、百色五区、龙州六区。苍梧、桂林两区因大军云集，暂缓划定。

马君武上任后，精心策划，全力以赴，整理省政。他大力倡导民众开矿、造林、垦荒，提出整顿金融、发展实业、发展道路交通、兴办教育、建立新军、禁赌禁烟以及在梧州试行市政等一系列方针和计划，力图实现其刷新省

政、改造广西的愿望。当时在桂林整军北伐的孙中山对广西的治理工作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专门就此问题电令马君武，要马注意整顿吏治，绥抚地方，“务令闾阎获享安宁之福，民治得有发展之机”。①

秉承孙中山关于在广西发展道路交通的意旨，马君武首先着手筹建邕柳公路的工作。尽管既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制定出筑路的详细计划，经费更是没有筹集起来，但马君武还是在到任的当月便委派邕宁县知事梁烈亚动用粮赋，征调民工，在南宁至五塘一段匆匆破土动工。

接着，马君武又针对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着重进行金融货币市场和军队的整顿。在金融货币市场整顿方面，由于旧桂系政权垮台时，陆荣廷等人已将原省财政储备席卷一空，此后，以“独立”或“自治”名义散处各地的桂军旧部又随意大量地印刷各种纸币投入流通，所以，新的省政权建立之初，便面临着财政收支异常困难，金融货币市场极其复杂混乱的严重问题。当时，曾有人建议马君武采取赌饷，即开赌征税的办法，以济燃眉之急，但马君武对此嗤之以鼻。马君武经与吕一夔磋商后，决定采用“建银行，发钞票”的办法，② 准备成立广西新银行或广西省立银行，派员赴日本订印钞票。可是，因印钞费过高，东渡日本印钞的计划终成画饼。马君武又派员赴沪，向商务印书馆接洽领取旧桂系广西银行订印的纸币，但被陆荣廷得知消息后通过北京政府出面制止了。最后，马君武被迫决定在南宁自印“广西军用券”(面值为一元)，投入市场使用。同时，马君武还发布命令，规定旧桂系时期发行的纸币，一律按原票面值的五成折算使用，以维持市面交易和照顾民间免遭重大损失。而且，要求省署和各地方政府一律按规定严格控制财政支出，严禁低价操纵，尽力稳定金融货币市场，解决财政困难。

在军队整顿方面，马君武名义上兼摄军务，但实际上却不能行使职权。他当时能节制的部队，除了身边的一个卫队营，仅仅还有驻扎在田南道的马

①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860页，台北，1963。

②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201、20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晓军部。为此，他以省府所属军队名目繁杂等为由，统编省府所属军队，并重新划定各部队的防区，下令从1922年4月1日起，除已受孙中山正式任命的刘震寰广西陆军第一师外，其余各部（包括宣布归附的原桂军旧部）一律改编为警备军，共分为八路。其编制和防区是：第一路，司令黄绍荣（驻梧州），副司令贲克昭（驻武宣）；第二路（驻浔州），司令陈景虞；第三路（驻武鸣），司令吕春琯；第四路（驻百色），司令莫昌藩；第五路（驻玉林），司令李宗仁；第六路（驻柳州），司令刘玉山；第七路（驻泗城），司令马晓军；第八路（驻桂林），司令许宗武。然而，马君武的这项命令，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各路警备军大都是表面上接受统编，事实上仍留驻原防地拥兵自重。

同年5月，就在马君武努力实施其治桂计划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时，孙中山因北伐行动受阻，变更了北伐计划，决定把北伐大本营迁离桂林，北伐军也随同回师返粤。居心叵测的陈炯明为阻止北伐军回师广州，急调驻桂的所部人马迅速回粤。北伐军和陈炯明粤军陆续离桂后，陆荣廷旧部立即重新纠合起来闹事，并组织力量向南宁进逼。马君武不仅已无法行使政令，就连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带领省署的部分要员和家眷于12日离邕东下，几经波折之后，22日抵达梧州。马君武抵梧后，即致电广州政府辞去省长职务，由政务厅长杨愿公在梧组织省长行署，并代行省长职权。随后，马君武离梧赴沪，结束主政广西的使命。

马君武主持省政近10个月，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了，但成效却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并非马君武自身的能力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马君武政权过于孱弱，缺乏群众基础和可以依靠的力量。从表面上看，马君武是在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的扶持下执掌省政，但他当时所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改造广西同志会里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军政人员，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仰仗”于“留驻桂省，以资镇摄”的陈炯明粤军。[①] 然而，陈炯

①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粤军史实纪要》，3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明等人“只是把马君武的省政府当做傀儡和点缀，不给一点实权”。[1] 所以，马君武正式视事之后，不仅政令出不了省府南宁，“就是在南宁范围内也都受着各种的掣肘”。[2] 例如，在马君武向各县委派的新县长（知事）中，有一部分没有经过驻桂粤军推荐或同意，结果大都遭到他们的拒绝，不能赴任接事。对于马君武发布的划分行政区的政令，他们更是束之高阁，不予理会。同时，驻桂的陈炯明粤军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引起了广西民众的普遍痛恨，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对马君武政权的误解和敌视，使之失去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马君武主政失败的一个原因。此外，溃散于全省各地的陆荣廷旧部和土匪、豪绅势力，利用当时的民心民意，以反对入桂粤军和马君武政权为号召，进行颠覆活动，扰乱社会治安，也给马君武主政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威胁。结果，马君武主持省政期间，除了完成南宁至四塘一段路基，以及在金融货币市场整顿方面稍有举动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是一无所成。

1922年底，原桂军沈鸿英部抵达梧州后，省长行署也无形解散了，广西从此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之中。

---

①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1辑，3页，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1978。

② 李墨馨：《马君武主桂政、长西大的二、三事》，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14、115页，1961。

第三章　新桂系统治的建立

1922年5月，陈炯明令驻桂粤军撤回广东。粤军离桂后，马君武政府随之倒台，溃散各地的旧桂系各部纷纷揭竿而起，打着“自治军”的旗帜，占地割据，称王称霸。“自治军”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广西人民饱受兵匪作乱之苦。这时，曾为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悄然崛起，形成一股新兴军事力量。李、黄、白审时度势，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在广东革命阵营的支持下得以日益壮大发展，与重返广西图谋东山再起的陆荣廷和从旧桂系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沈鸿英，形成三雄并立之势。李、黄、白借助广东革命阵营的力量，运用联沈讨陆、先陆后沈的策略，先后肃清陆荣廷的残部，消灭沈鸿英的势力，驱逐侵桂图粤的滇军唐继尧部，于1925年统一广西，建立了新桂系的统治。广西统一后，新桂系应广东国民政府之请，出兵截击企图危害广东的川军熊克武部，参加南征讨伐邓本殷、申葆藩军阀势力，支援了广东统一。经过国民政府的争取，新桂系与国民政府达成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归属国民政府领导，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桂系正式参加国民革命。

一、“自治军”蜂起和广西动乱

孙中山发动的“援桂讨陆”战争瓦解了旧桂系陆荣廷的政权，但却没有能够彻底肃清旧桂系的军事力量。旧桂系的军事力量在那场战争中，除少量被歼或投附粤方之外，其大部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或化整为零藏匿民间，或分散逃避黔桂、湘桂边界和中越边境地区，待机而动。原桂军林俊廷、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等人，抓住孙中山在桂林整军北伐，陈炯明粤军主力相对集中桂南地区的机会，各自收集旧部，以“自治”的名义据地称雄。各地的豪强势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纷纷建立“帮口”或“自治军”，称霸一方。不少早就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绿林土匪和散兵游勇也不甘寂寞，同样揭篥而出，肆无忌惮地骚扰四方民众。一时间，各色各样的“自治军”犹如蜂起蚁聚般出现在全省各地。这种现象，到陈炯明粤军和孙中山北伐军离桂后就更为普遍了。

各色各样的“自治军”，人枪较多的，便自称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也自封为司令、统领或帮统。各种称谓和头衔应有尽有，均随各自视本身实力和喜好而定。“司令满街走，统领多过狗”，“村村见白旗，处处闻枪声”，① 这就是广西进入所谓“自治军”时期后的形象写照。

“自治军”初起时，势力较大的主要有：先在黔桂边界地区活动，后移据怀远（今属三江）、庆远（今属宜州）一带，自称“广西自治军总司令”的林俊廷；占据右江一带，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的刘日福；活动于宾阳、上林、都安等地，自称“广西自治军混成旅旅长”（另一说为“广西陆

①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1辑，4页，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1978。

军第一师师长"[1]）的陆云高；在武鸣、那马（今属马山）等地活动，自称“广西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的陆福祥；在横县、隆山（今属马山）、忻城等地活动，自称“广西边防军司令”的蒙仁潜等。此后，又有占据玉林、陆川、兴业、北流、博白等地，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的李宗仁；盘踞龙州等边关地区，自称“广西边防自治军司令”的李绍英；乘乱率桂林附近“民军”进占桂林等地，自称“公民自治军临时总司令”的梁华堂；进驻柳州、庆远、武宣等地的韩彩凤、刘玉山、刘达庆等部。

1922年5月22日，陈炯明粤军主力离邕后，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等“自治军”联合行动，赶跑附粤的原桂军刘震寰等部，占领南宁。27日，刘日福等在南宁举行会议，商讨桂局善后事宜。玉林方面的李宗仁，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各路“自治军”决定成立“广西自治军临时军务处”，并推举林俊廷为“广西全省自治军总司令”。随后，蒙仁潜宣布兼任广西省省长职，陆云高宣布兼任省财政厅厅长职。8月，林俊廷抵邕就任“广西全省自治军总司令”职（以后又以此名义宣布兼任广西省长职），并将其势力范围转移到南宁及左右江地区的部分县。这是以原桂军旧部为主体的“自治军”，以“重设省政府，统一广西军政"[2] 为名上演的一出闹剧。他们建立的“临时军务处”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约束力的“自治军”联合体。“自治军”据地称雄、各行其是的混乱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丝毫的变化。

“自治军”的出现，使刚刚脱离战乱蹂躏的广西，又陷入一个新的灾难与痛苦的深渊。

首先，蜂拥而出的“自治军”不仅“各自称霸称王，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闹得一团乌烟瘴气”，而且凭借军事实力，在各自割据的地盘内“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3] 使广西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四分五裂局面，全省政局因此而动乱不已。据统计，从1922年“自治军”的联合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7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73页。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71、172页。

体出现起，至1925年李宗仁等重新统一广西前，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省政府就更迭了五次，省长职务也几易其主。整个“自治军”时期，全省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其次，各地的“自治军”大都是“假自治之名，行盗贼之实”，[①] 干尽打家劫舍，拉生勒赎，奸淫烧杀的罪恶勾当，使广大民众饱受兵匪作恶之苦。据民国《昭平县志》卷八记载，1922年春，“自治军旅长”杨麻子纠集同伙啸聚于该县境内黄洞时，“掳掠男女人黄洞者不下数千人，有钱者生，无钱者死。洞中尸骸枕藉，目不忍睹，为百年来未有之惨劫”。同年夏，“自治军司令”冯广隆、冯广泰等进据修仁（今属荔浦）、荔浦后，“修、荔两县县城和郊区的居民均被该股匪劫掠一空，并被拉去青年妇女二千余人”。[②]“自治军”对那些反抗旧桂系统治的革命党人尤为仇视，不仅到处追杀那些被他们称为“反骨仔”的革命党人，就连其亲友也不放过。发生在邕宁县杨美村的“四九”惨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杨美村有不少“竭力反抗陆荣廷匪帮统治之革命党人”，因此，“自治军”对杨美村极为仇恨。“自治军”控制南宁等地之后，“自治军司令”梁聘卿等联合土劣武装，于1922年农历四月九日闯入杨美村，大肆烧杀掳掠。全村“死伤男子三百余人，掳去青年妇女九十余人，毁坏房屋三百余栋”。[③]

再次，“自治军”为维持军需并供其私欲挥霍，除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征收正常的钱粮税捐之外，还随心所欲地设置许多新的捐税，向民众进行残酷的勒索。在左右江地区，1921年反动政府、各路“自治军”、土匪、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团局巧立名目，强加在农民头上的各类捐税就达30多项。其中“有土地税（地主转嫁给农民）、富力税（富人转嫁给穷人）、契约税、换

① 《申报》，1922年9月15日。

② 虞世熙：《桂东地区自治军活动状况及地方纷乱情形》，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65页，1962。

③ 梁烈亚：《改造广西同志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1页，1964。

契税、财产税、人头税、屠宰税、圩场税、牛马税、牌照税、烟酒税、营业税、油榨税、牧林税、茶油税、自治捐、房屋捐、户口捐、猪捐、牛捐、羊捐、市场摊位捐、祠堂建筑捐、军队开拔费、收容费、军队收缩费、维持费、茶水费、草鞋费……”① 又据《东兰县志》（1960年油印本）的记载，在“自治军”时期，当地的各种捐税项目数不胜数，其中“自治捐为数最大，一等户捐细钱九千文，二等户六千文，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户也得交三千文”（当时每斤猪肉二百文）。

还有，在“自治军”时期里，各派军事力量还通过滥发纸币或“通用券”、“军用票”，强迫民众使用，把民众仅有的财力，肆意掠为己有。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至1923年间，粤军、桂军、民军发出的不兑现纸币，总计在3000万元以上。按当时全省总人口平均，每人摊派将近四元”。②

“自治军”的蜂起和作乱，造成广西政局的大动荡，兵匪横行，生产破坏，经济凋零，民不聊生，严重地阻碍了广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备受战乱兵灾之苦的广西人民渴望结束战争和分裂，消除动乱。

二、新桂系的崛起

旧桂系陆荣廷政权垮台后，在“自治军”蜂起作恶、全省混乱的时期里，在桂东南悄然地兴起了一股新的军事政治势力，这就是日后被人们称为新桂系或国民党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集团。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两江乡椒头村人，1891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少时家境贫寒，以半耕半读方式求学，到桂林省立公费纺织习艺

---

①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1辑，7页。

② 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9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李宗仁

厂当过学徒。1908年，考进桂林的广西陆军小学，成为该校第三期学员。1910年，在陆小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由陆小（已改称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中尉等职。1915年，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任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并在县立桂山中学兼过课。次年重返军界，在护国军李烈钧部任中尉排长。后转入桂军林虎部，由排长升连长而营长，先后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0年，随部退驻玉林，因林虎离队，该部改由黄业兴指挥。1921年，孙中山发动"援桂讨陆"战争，李宗仁随部队同粤军作战，先后提升为帮统、统领。桂军兵败后，黄业兴率部向钦廉退却。李宗仁以休整为由率所部共1000余人，避入粤桂边的六万大山。不久，接受粤方改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军，驻北流一带。1922年4、5月间，粤军离桂，"自治军"兴。四分五裂的动乱局势，为李宗仁的崛起造成良机，他迅速集中兵力抢占了玉林，并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逐步在玉林、陆川、兴业、博白、北流、容县一带形成割据局面。1923年11月，陆荣廷重返南宁，就任北京政府所委之广西全省善后总办职，"督理广西军务善后事宜"。[①] 陆随后取消全省的"自治军"名目，重新颁发桂军各部番号，李宗仁部改称广西陆军第五旅。李宗仁表面上服从陆的节制，实际上仍继续保持着"自治"的状态。这一期间，李宗仁紧紧地把握住时机，充分利用玉林五属物产资源丰富和交通运输便利等优越条件，以"和缓各方，安民自保，积集力量，待机而动"[②] 为宗旨，

① 《广西大事记要》（1912～1930），32页，南宁，广西档案馆翻印，1961。
② 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20页，1978。

结纳地方豪绅，积极延揽人才，修明吏治，整军经武，维持旧有捐税，安定金融市场，励精图治，势力日渐强盛起来。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山咀村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09年随其兄黄绍竦离家到桂林求学。次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四期。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随广西北伐部队赴武昌参战。南北议和停战后,编入南京陆军入伍生队接受训练,之后又转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后被派回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不久,调到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为马晓军)任副连长。1920年粤桂战争期间，随部在广东作战。桂军兵败退回广西后调驻百色。孙中山“援桂讨陆”时，马晓军率部投附，被马君武委为田南警备司令，黄绍竑升任营长。不久，部队遭退避百色的原桂军刘日福等部袭击，黄被俘，马晓军逃往南宁。因为当地烟帮头子刘宇臣的营救，黄绍竑得以脱险。后又在百色当地豪绅的帮助下，重新组建了武装。1922年初，刘日福等“自治军”被粤军击溃，马晓军返回百色重整部队。稍后，马晓军改任广西警备军第七路司令职，黄绍竑升任统领。同年4月，陈炯明粤军离桂，“自治军”蜂起，马君武急调马晓军等部防守南宁。因马晓军已先期赴邕，部队交由黄绍竑指挥。黄率队冲破“自治军”的层层阻击，进抵南宁附近时，南宁已陷入“自治军”的重围之中，黄只好和马晓军一道带领部队向钦廉方向撤退。途中，马晓军离队经北海去了香港，部队完全交给黄绍竑统率。黄率部行至廉江城附近时，接到玉林方面李宗仁的邀请。黄率部于7月抵达陆川，投附了李宗仁，所部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移驻容县、岑溪两地。李、黄合作，由此


黄绍竑

开始。但是，黄绍竑并不满足于偈促一隅的现状，他意识到，欲图谋大的发展，“必须有光明的前途，崭新的作风”，而且，“广东方面，也总比自治军好些”。[①] 于是，他产生了出梧州、靠广东，打开新局面的意向。经与李宗仁协商后，决定伪投当时已控制梧州的沈鸿英，待机图梧。同时，派其亲信参谋陈雄密赴广州，和在那里治伤的白崇禧一道，尽快寻找“投靠孙中山参加革命”的途径。[②]


白崇禧

白崇禧，字健生，回族，广西临桂县南乡（今会仙乡）山尾村人，1893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07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但入学不及三月便因患恶性疟疾而退学。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桂林初级师范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随军北上武昌。随后和黄绍竑等人一起编入陆军入伍生队到南京受训半年，又转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再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1916年毕业时，自愿要求去新疆服役，但因时局动荡、交通梗阻，未能遂愿，改回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1917年被派到广西陆军模范营任副连长，后逐级升迁至统领。1922年同“自治军”作战时，在贵州安龙县左腿受伤，离队赴广州治疗。1923年初，白崇禧在广州与陈雄会合，共商和广东方面接触的办法。后来，他们通过当时在驻粤滇军司令部任职的广西老乡廖百芳（容县人），认识了广东省省长、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同广东革命政府建立了联系。

这时，旧桂系部将沈鸿英，接受孙中山的檄调，参加讨伐陈炯明的行动

① 《黄绍竑回忆录》，6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陈雄、尹承纲、赖慧鹏：《新桂系的崛起》，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0页，1961。

之后，又暗中勾结北洋直系的吴佩孚，在广州发动暴乱事件，图谋消灭国民党在粤势力。孙中山迅速组织力量平乱，并令沈鸿英部移驻肇庆、梧州一带，要求沈嗣后非奉命不得擅自移动。但沈阳奉阴违，又于是年4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的督理广东军务职，同时派人在广西四处收编原桂军旧部，然后发动了叛乱，分兵直扑广州。孙中山下令褫夺沈鸿英的桂军总司令职，着令广东革命政府各将领督饬所部分头兜剿沈军。在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部的反击下，沈军全线崩溃，分头退回广西。黄绍竑看准这一机会，征得李宗仁同意，通过自己一位族兄黄绍憲在沈鸿英幕下当秘书的关系，接受沈鸿英的收编，就任沈委任的“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职，率部离开容县，开赴梧州附近的戎圩（今苍梧县城），寻机夺取梧州。同时，秘密通知在穗的白崇禧尽快设法取得广东方面的支持。

不久，白崇禧和陈雄在朱培德的安排下，到石龙火车站行营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对黄绍竑等人参加革命十分赞许，表示支持他们出师梧州的计划，“并答应以‘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名义给黄绍竑”。[①] 白、陈返桂后，黄绍竑立即召集会议，制定攻沈据梧的具体行动计划。随后，白崇禧受遣去玉林与李宗仁会晤，商讨李、黄两部合作事宜。李宗仁对黄、白的计划给予大力的支持，双方还在将来的“分进合击、打成一片”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②]

6月，当讨沈粤军逼近梧州时，黄绍竑在戎圩宣布起义讨沈，树起了“广西讨贼军”的旗帜，包围由粤败退到戎圩的沈军黄炳勋部，将其全部缴了械。同时，截断了沈军回平乐方向的去路。7月18日，黄绍竑“讨贼军”与粤军李济深（第一师师长）、郑润琦（第三师师长）等部协同动作，合击梧州守敌。结果，守城沈军冯葆初旅输诚，邓瑞征师退回贺县八步，“讨贼军”和粤军顺利进入梧州。19日，孙中山发布命令，特派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职，加强扶助黄绍竑部的工作。下旬，李济深为帮助黄绍竑控制梧州局

① 陈雄、尹承纲、赖慧鹏：《新桂系的崛起》，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1页。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9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势，派所部第三团团长邓演达等协助黄绍竑，设计擒拿了心怀二意的原沈军旅长冯葆初，缴了冯旅的械。梧州局势初定后，李济深逐步将驻梧粤军撤回广东境内，把梧州的军、政、财权移交给黄绍竑。在此基础上，黄绍竑在梧州正式组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黄玉培任秘书长，胡宗铎任总参议。部队编为三个团，由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各团团长。同时，征得广东方面同意，委派陈雄为驻广州代表，负责与广东革命政府的联络工作。接着，孙中山于8月16日正式任命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① 就这样，黄绍竑通过戎圩起义和李济深的鼎力相助，实现了立足梧州的计划，并且和广东革命政府建立起直接的隶属关系。

此后，黄绍竑、白崇禧一方面继续加强与广东方面的联系，争取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他们接受陈雄的建议，于9月间由黄绍竑偕陈雄和胡宗铎赴穗，经廖仲恺安排到士敏土厂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赞许黄绍竑投靠革命阵营的行动，并指示廖仲恺克服财政困难拨给黄2万元经费和2万发子弹。另一方面，黄、白利用梧州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采取了整肃军纪、改良官兵关系、发展小型兵工生产、剿办散军土匪、培训干部、公开财政、整顿税收、投标经商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整军经武和安抚地方，巩固已取得的地盘。

同时，黄绍竑、白崇禧按照早先和李宗仁商定的发展策略，以广东革命政府为后盾，展开肃清外围、充裕饷源，“与玉林李德邻方面打成一片”② 的军事行动。8月底，黄绍竑、白崇禧先发制人，在粤海军浅水舰队的配合下攻占藤县，击毙守城“自治军”旅长卢得洋，逼降另一“自治军”司令黄超武。9月，黄绍竑与李宗仁互相配合，夹击盘踞西江沿岸的“自治军”陆云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1923～1924.4)，4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② 《黄绍竑回忆录》，7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高部，这是双方分而复合的第一次联合行动。这时，李宗仁部已改番号为“定桂军”。10月，黄绍竑“讨贼军”攻占平南，再克江口。李宗仁“定桂军”先取贵县，继占桂平。陆云高腹背受敌，率余部逃向蒙山、武宣，自鹏化退入瑶山，往桂林方向依附沈鸿英。次年3月，黄绍竑部与粤军李济深等部联合作战，在都城全歼企图回桂争权的驻粤桂军陈天泰师。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经营和扩展，李宗仁“定桂军”和黄绍竑、白崇禧“讨贼军”这两股从旧桂系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军事力量，终于引人注目地崛起于西江上游沿岸地区。在兵力上，李宗仁“定桂军”从原有的10多个连2000余人，发展为6个纵队约7000人；黄绍竑、白崇禧“讨贼军”也从移兵戎圩时的3个营约3000余人，发展为5个纵队、8路游击队共约6000余人。在地盘上，“定桂军”控制着玉林、陆川、兴业、北流、博白以及贵县、桂平、武宣、迁江（今属来宾县）共9个县；“讨贼军”则据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今属贺县）等6个县。也就是说，当时广西最富庶的玉林、浔州、梧州3个府州，都已为李、黄所控制。尤为重要的是，李、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还获得了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这一切，都为他们日后统一广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统一广西

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两股势力的崛起，以及旧桂系陆荣廷和沈鸿英的重新活动，使广西的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原来的“自治军”蜂起作乱演变为“三雄”并立。

“三雄”中，势力最大的是企图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荣廷于1922年9月从上海经香港、海防回到龙州之后，便积极开展“复职”活动。他在政治上继续投靠北京政府，收容了旧部2.5万人，并逐步占据了省会南宁和龙州、百色、柳州、庆远等地区。他打算凭藉这些条件和昔日的声威，重登“广西

王”的宝座。其次是在粤作乱后败退回桂的沈鸿英，经过一番整治后，已逐渐恢复元气，仍拥有部众近2万人，据有桂林、平乐、贺县和湘粤边地区的临城、宜章、连山等地区，在政治上又重新依附了北京政府。所以，他虽在新败之余，但也随时都在觊觎着广西“霸主”的位置。“三雄”中，势力较弱的是形式上仍自立门户，但实际上已“互为表里”① 的李、黄、白，共1万余人。他们自视为新兴的革命势力，准备以广东革命政府为后盾，实现“经营八桂”② 的愿望。总之，“三雄”各有所持，又各怀“雄心”，在重新统一广西的问题上各使心计。于是，一场围绕着争夺广西统治权的混战也就无法避免地发生了。

首先发难的是陆荣廷。陆荣廷无法容忍“三雄”鼎足并立格局的存在，他决定先分化李、黄、白势力，夺取梧州，进而控制整个西江上游地区。但是，拉拢李宗仁失败，使陆的计划没有得逞。于是，陆又把矛头转向桂东北的沈鸿英。1924年初，陆以“出巡”为名，率部离邕北上，强占了平乐、桂林、全县等地。

沈、陆矛盾迅速激化起来。沈鸿英决定和陆进行决战，夺回被占的地盘。为此，沈以“请降”方式骗取了孙中山对他“讨陆”的支持，同时致电黄绍竑，请黄与他一起“靖桂难”，③ 目的是想利用黄绍竑等人来牵制陆荣廷在南宁一带的兵力。

愈演愈烈的陆、沈矛盾，给李、黄、白造成了大展鸿图的良机。李、黄、白决定联合行动，制定了联沈倒陆，先陆后沈，各个击破，统一广西的策略方针。同年3月，黄绍竑派代表向沈鸿英表示了合作倒陆的态度，尔后待机行动。

4月，沈军合围陆荣廷于桂林，同时抄袭柳州。陆方南宁、柳州等地守军分兵驰援桂林。李宗仁和黄绍竑抓住战机，发动倒陆战争。5月23、24日，

---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19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 《黄绍竑回忆录》，6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大公报》（长沙），1924年4月24日。

李宗仁、黄绍竑分别以广西定桂军总指挥和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出“漾”电和“梗”电，促陆荣廷下野。随后，“定桂”、“讨贼”两军集中于桂平、贵县。由李宗仁率李石愚、伍廷飏、夏威等部溯江而上，直趋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率何武、钟祖培、俞作柏等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转向武鸣，同李宗仁会攻南宁。南宁城防空虚，6月25日，李、白攻占省会南宁。7月上旬，“定桂”军和“讨贼”军在南宁正式合并，称“广西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黄绍竑分任正、副总指挥，白崇禧任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两军原有建制仍维持不变。李、黄、白商定，两军统一后，实行军民分治，推举原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任广西省长。北京政府于“自治军”时期委任的广西省长张其锽自动去职，离邕返京。

是月下旬，“定桂讨贼联军”分兵三路出击，继续倒陆。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由夏威、伍廷飏、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组成的右路军，与沈军联络，向柳州、桂林进发；以俞作柏指挥所部和蔡振云部为中路，向武鸣进发，负责肃清那马、都安一带的陆方蒙仁潜、陆福祥等部；由胡宗铎指挥，以吕焕炎、刘权中等部为左路，溯左江西上，直捣龙州，肃清陆方李绍英、谭浩清、谭浩澄等部。黄绍竑留驻南宁，策应各路兵马行动。梧州等地防务交由粤军李济深师负责。

由于联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优于陆荣廷所属各部，加以李、白及各路将领指挥得当，所以，各路战事进展都比较顺利。右路：7月底，李、白进占柳城。8月11日，占领柳州。接着，在古化、中渡击败反攻柳州的韩彩凤部。中旬，白崇禧指挥部队在上雷、大埔、沙埔一带，同韩彩凤部和增援韩部的谭浩明部展开激战。后白崇禧诱使沈军杨子德部从雒容、东泉前来参战，分散了韩、谭的兵力，最终击败了韩、谭两敌。白崇禧率部乘胜追击，于9月7日攻取庆远。与此同时，沈鸿英调集主力加紧围攻陆荣廷，陆被迫退出桂林，往全县（今全州）方向退却。是月中旬，陆荣廷残部和败退而来的韩彩凤等部，在全县和兴安之间与沈军主力邓佑文等部遭遇，激战几昼夜，陆荣廷残部受重创，向湖南永州溃逃。10月9日，经“湘南善后督办”唐生

智和李宗仁的先后劝促，陆荣廷在永州通电下野，后偕谭浩明经长沙转赴上海、苏州，完全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中路：在俞作柏的指挥下，联军于8月中旬在那马、都安击败陆方的陆福祥、蒙仁潜等部，并乘胜进逼右江沿岸，驻百色的刘日福见大势已去，遂宣布脱离陆荣廷，向李宗仁的定桂军输诚。9月，重新归附陆荣廷的原“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在钦县通电拥护孙中山。吕春荣等陆荣廷旧部也向孙中山输诚。左路：胡宗铎指挥的联军按部署出发后，除在崇善（今属崇左）稍遇抵抗外，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至8月中旬便顺利地占领龙州，陆荣廷的龙州守将谭浩清和谭浩澄匆匆逃往越南，左江地区战事亦告终结。这样，李、黄联军自会师攻占南宁以来，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肃清了柳州、庆远一带和左、右江地区的陆荣廷势力，占领了桂中、桂西、桂南的广大地区，实现了“联沈倒陆”的战略计划。

陆荣廷势力覆灭之后，“三雄”并立变成了李、黄、白同沈鸿英的“两雄”对峙。从表面上看，双方都在倒陆结束之后高唱和平调子。双方于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还在浔州（桂平）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随后，联军方面又作出让步，把柳州地盘让给了沈方。但双方很快就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之中，并为最后争夺广西的统治权而紧张地进行着战争的准备。

在“两雄”明争暗斗的时候，发生了刘震寰企图返桂争权的事件。当时在粤担任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刘震寰，欲乘陆荣廷彻底垮台，沈鸿英与李、黄、白势不两立，八桂无主之机，回桂主政。因而多次向孙中山提出回桂请求。即将离粤北上的孙中山出于稳定桂局的目的，同意了刘的请求，并特任刘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回桂稳定局势。刘于是积极准备返桂，一面派所部师长严兆平等人先期回桂疏通各方关系，一面与打算取道广西回云南的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达成协议：刘助范回滇，范助刘返桂。

刘震寰欲返桂主政的举动，遭到了李、黄、白的极力抵制。为阻止刘震寰强行回桂，李、黄、白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在军事方面，他们将所部主力调集梧州一带布防，同时商请李济深、郑润琦将驻梧州附近的粤军移驻肇庆、封川一带，以隔断刘、范两军西上的通道。在政治方面，为与刘震寰

抗衡，黄绍竑利用其于11月下旬赴穗向大本营汇报的机会，经廖仲恺和许崇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一番活动之后，在孙中山北上期间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会办。下令改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为广西全省绥靖处公署，改“定桂军”和“讨贼军”为广西陆军第一、第二军，由李宗仁和黄绍竑分别兼任军长。另外，还任命白崇禧为绥靖处公署参谋长。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李、黄、白基本上扭转了在拒刘回桂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刘震寰发现其回桂主政的行动受阻后，也改变了策略，转而与沈鸿英合作，极力怂恿沈进攻李、黄联军，并和范石生一道与沈鸿英达成了“范、刘助沈扑灭黄绍竑、李宗仁，成功后沈予范借道回滇，及刘回桂任省长”的协议。[①] 为保证回桂计划的实现，刘震寰还不惜派其弟为代表赴滇，求助于云南军阀唐继尧，以“拥唐为西南霸主”为条件，乞求唐继尧“助其回桂”。[②] 可是，刘欲回桂的举动又遭到了粤军方面的反对。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李济深等将领均明确表示，以全部兵力为李、黄、白作后盾，并下令封锁了刘、范两军西上的主要通道。刘震寰无以为计，被迫停止了回桂主政的活动。

沈鸿英见刘、范两部迟迟没有西上，也派遣代表前往云南，请求唐继尧出兵相助。久有称霸大西南野心的唐继尧自然不会轻易错过刘、沈相继前来求助的良机，很快便答应了沈的请求，然后连续派员到桂游说李宗仁，企图诱李、黄等人投附。在遭到李宗仁的拒绝后，唐继尧即以堵截范石生部回滇为由，调遣大批兵力集结滇桂边界，准备用兵广西、东下图粤，并于11月遣先头部队千余人进入广西的镇边（今那坡）和百色附近。

沈鸿英在获得唐继尧“允与扰乱邕、龙，使李、黄首尾不能相顾”[③] 的支持后，即于12月1日在柳州宣布就任他在孙中山北上前骗取的“广西建国桂军总司令”职，同时着手进行攻打李黄联军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动员。接着，

---

① 《申报》，1925年1月10日。

② 《申报》，1925年1月31日。

③ 《申报》，1925年2月21日。

又通电各方，列举黄绍竑等人的罪状，指责李宗仁破坏和阻止他“派队出巡”、“收束军队”、“问民疾苦”。[①] 还致电广州大本营，要求划清他与李、黄之间的权限，要求在梧州设立“广西建国桂军总司令行营”，并且威胁李、黄、白“如不警悟，当即声讨”。[②] 在大造了一番舆论之后，自以为有恃无恐的沈鸿英便于1925年1月初坐镇平乐，指挥早已部署完毕的4个师兵力，分从昭平、信都、贺县和蒙山、柳州等三个方向进攻李、黄联军。

李、黄、白面对要与沈鸿英、唐继尧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24年12月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南宁宣布就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会办、参谋长。接着，宣布取消定桂讨贼联军番号，将部队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一、第二军。下旬，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李、黄、白决定，首先“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必要时，放弃左右江地区和南宁。[③] 随后，将李宗仁的第一军在桂西的部队悉数东调，李宗仁也移驻桂平坐镇指挥。李、黄并电请粤军李济深给予支援，李济深即派所部陈济棠旅赴梧，协同黄绍竑部堵截沈军东下。战前，李宗仁、黄绍竑和李济深联名，以桂粤联军的名义在梧州发布布告，历数沈鸿英的罪状，宣布讨沈。

沈鸿英先发制人，于1925年1月29日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桂平、江口和蒙江为首要目标，分三路向联军防地发动进攻。联军察觉沈军的战略意图后，迅速重新调整部署，分三路迎击沈军：以粤军第一师陈济棠旅和粤军郑润琦第三师之一部，以及黄绍竑第二军夏威纵队为右路，自梧州、怀集（今属广东）向昭平、信都、贺县进发，迎击沈军左路；以黄绍竑军俞作柏纵队及黄超武部为中路，进击蒙山、荔浦的沈军中路，然后与右路会攻桂林；以李宗仁军吕焕炎、钟祖培等部为左路，由李宗仁、白崇禧亲自指挥，自桂

① 《沈鸿英报告李宗仁等截击出巡军队情形电》，“广州大本营档案（一）5617”。

② 《大公报》（长沙），1925年2月26日。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23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平、江口攻击前进，然后会合迁江方面的李宗仁军李石愚部进攻柳州；黄绍竑和李济深留驻梧州，策应各路的行动。

1月30日，联军与沈军的决战正式开始。最先打响的是黔江方面，这是双方主力的主攻战场。当日上午，白崇禧率领的联军左路先头部队在武宣与沈军右路主力邓佑文部相遇，白兵寡，被困武宣。次日，李宗仁率联军左路主力至，与白夹击围城沈军。随后，双方在二塘、石龙等地展开激战。邓兵败，退往柳州。2月3日，联军占领石龙、象县。与此同时，联军李石愚部在迁江击败来援助邓佑文的沈军邓瑞征部，并于7日占领柳州，二邓退往桂林。李、白在鹿寨击败二邓残部后，进军桂林。中路蒙江战场，从2月1日起，由俞作柏指挥的联军中路军，分别在太平圩、江口及均常等地击败来犯的沈军陆云高和张希栻等部，沈军分向昭平、蒙山溃逃。联军于4日攻占蒙山，次日占领荔浦。接着，俞作柏部由荔浦攻平乐，适遇沈鸿英率部由平乐反攻荔浦，双方在栗木激战了两昼夜，彼此伤亡均十分惨重，最后沈军被迫撤出战斗，沈鸿英率余部退往富川、钟山。11日，俞作柏人据平乐，后又率中路军北上，与李、白会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沈军邓瑞征通电辞师长职，将所部交邓佑文指挥。14日，在联军的强大攻势下，邓佑文通电脱离沈鸿英，联军李、白和俞等率部进驻桂林。18日，联军占领全县，沈军残部逃窜湘粤边境。右路梧州方面，2月3日开始，联军的粤军陈济棠旅向沙头圩进击，夏威纵队沿抚河北上攻击前进。接着，陈济棠部在龙窝渡大败沈军沈健飞、邓竹林部，于7日占沙头，9日占官潭。夏威部也于8日攻取昭平，随后与陈部合攻贺县，15日克贺县。至此，沈军主力大部被歼。2月16日，沈鸿英率残部退出富川、钟山、八步，往广东连山逃窜。次日，沈鸿英在连山通电下野。联军与沈军的决战基本结束。

李黄联军讨沈战争开始后不久，云南军阀唐继尧按照原先与沈鸿英、刘震寰达成的协约，调遣滇军分兵两路人侵广西。其中，一路由其第五军总司令龙云任总指挥，率所部和胡若愚第二军共3万余人，从云南的广南、富州进人广西的百色，会合早已人桂的滇军先头部队，沿右江东下，直趋南宁。

另一路由唐继尧亲自担任总指挥，从贵州榕江和湖南洪江、靖州进入广西的三江、融县（今融水、融安），而后沿融江直下柳州，其先头部队为该路前敌指挥官、云南悍匪吴学显所部，后继部队为唐继虞第一军和张汝翼第十军，共约3.8万人。2月初，龙云第五军先期从阿迷（今开远）入桂，25日乘虚袭取南宁。

滇军大举侵桂，严重地影响了李、黄、白已取得的成果和今后的发展，也对广东方面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和保证"经营八桂"目标的最终实现，2月下旬，李、黄、白在讨沈战事基本结束后，抓住滇军尚未全部合拢的时机，除了由白崇禧率部分兵力留在桂北追剿沈军残余之外，迅速将主力大部调至桂平、贺县一带，准备迎击占邕滇军。同时致电广州，请求广东革命政府出兵援桂。此外，李宗仁还与当时的省长张一气联名，于3月7日发出通电，号召全省民众"助拒滇唐"。[①] 通电发出后，得到了省内各社团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响应。鉴于滇军侵桂直接影响到广东的安危和国民革命的前途，广东革命政府也决定大力支持李、黄、白，不仅同意李济深、郑润琦两部粤军继续留驻梧州一带助防，还决定派遣已改变对立立场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协同桂军阻唐东下。

3月初，李济深和黄绍竑在梧州联衔发布讨唐布告。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60次会议决议声讨唐继尧。下旬，李、黄、白桂军和范石生"定滇军"组成联军，并在桂平誓师。28日，联军总指挥部下达"讨唐"总攻击令。随后，联军分两路向南宁进发。左路由范部参谋长杨蓁任总指挥，率"定滇军"由贵县、横县、永淳（今分属横县、宾阳）进击南宁；右路由黄绍竑任总指挥，率领桂军由贵县经宾阳进攻南宁。

28日，右路桂军旗开得胜，在宾阳高田圩勇挫滇军陈铎、周文人两部之后，又于4月初在八塘、二塘两处歼敌千余人。与此同时，左路"定滇军"也在永淳大败依附唐继尧的陆荣廷旧属林俊廷部。滇军龙云被迫将南宁城外

① 《申报》，1925年3月14日。

部队撤入城内，固守待援。黄绍竑、范石生指挥联军兵临城下。4月中旬，滇军胡若愚部抵武鸣，与联军范石生部激战后向南宁突进。固守南宁的龙云部出城接应胡部，在城郊与联军激战，双方伤亡均达千人以上，后联军不支，退五塘、蒲庙。5月中旬，联军自贵县、桂平等处增兵西上，李、黄、范共同指挥，再度攻城，但仍未奏效。这时，滇军唐继虞等部已取道湖南入桂，其先头部队吴学显部占领融县后，联合陆荣廷旧属韩彩凤部攻打柳城、柳州，联军守将李石愚阵亡。与此同时，流窜湘桂粤边的沈鸿英残部邓瑞征、邓佑文、陆云高、沈荣光等乘机反扑，并重占了平乐、桂林。形势对联军十分不利。

为扭转战局，联军决定将围邕桂军主力北调，由黄绍竑指挥援柳；李宗仁率部分桂军和范石生“定滇军”继续围困南宁；白崇禧加紧清剿桂北沈军残余，并请湖南赵恒惕帮助堵截沈军残部入湘。根据新的部署，5月底，黄绍竑赶赴北线，指挥援柳桂军突袭占柳滇军，吴学显部滇军猝不及防，弃城退据沙浦。这时，白崇禧基本完成桂北清剿任务后，也率部赶来参战。6月4日至8日，桂军与滇军激战于沙浦，滇军大败，所部被歼过半，唐继虞等率残部退回滇境。北线战事结束之后，联军再度集中兵力围攻据邕滇军。困守南宁的龙云、胡若愚得知柳州方面滇军失败，又悉与唐继尧勾结的刘震寰等人在穗发动叛乱也告失败，东下计划已成泡影，无心继续恋战，遂决定弃邕返滇。7月7日，龙、胡率队自动撤离南宁，沿左江折向靖西、镇边退回云南。至此，李、黄、白借助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下，通过联沈倒陆、平沈、驱唐等三场战争，终于夺得了统一广西的最后胜利。

广西全境平定后，李、黄、白即着手建立新的省政机构。经过协商，决定取消原来的省署，暂时设立广西省民政公署作为全省的最高行政机关，并推举黄绍竑出任民政长，主持全省的政务。9月5日，黄绍竑在南宁宣布就任广西民政公署民政长。民政公署内设政务会议，下设内务、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分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任各厅厅长。另以朱朝森为

政务会议秘书长。广西民政公署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和新桂系统治的建立。从此,广西进入以李、黄、白为核心的新桂系统治时期。

李、黄、白统一广西，结束了自20年代初以来的分裂、战争、动乱，这是历史的进步。它对广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四、新桂系支援广东和两广统一

广西统一时，广东尚未统一，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还受到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和割据南路的邓本殷等军阀势力的威胁。四川军阀熊克武与陈、邓相呼应，企图危害广东。新桂系接受国民政府的檄调，先后两次派兵入粤，协助国民政府驱逐川军熊克武部和南征邓本殷、申葆藩军阀势力的作战。

1925年8月，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势力行刺殒命。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时任建国粤军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为了扩充势力，利用"廖案"，与汪精卫（时为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合谋，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政敌。胡汉民、许崇智等一批国民党老右派，不是潜逃，就是被缉拿，或被迫逃离广州，广东政局一时受到较大影响，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不稳定的状态。在第一次东征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军阀陈炯明，乘机反扑，勾结南路邓本殷、申葆藩，准备联合进攻广州。在四川政争失败，被刘湘、杨森等川军将领逐出四川的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也在此时率部经广西入驻粤北连州、阳山一带，并与东江陈炯明秘密联络，打算配合陈、邓夹攻广州的行动。这样，广州国民政府面临着三面夹击的危险。

"为统一广东，完成人民日夕要求的廉洁政府"，"扫除陈炯明间接以推倒帝国主义，完成孙大元帅为求国家独立平等之遗言"，[1] 1925年9月，国民党

---

① 张其雄编:《东征时期之政治工作概略》,载《军事政治月刊》,1926(2)。

中央特别委员会决议进行第二次东征，讨伐重新盘踞东江地区的陈炯明，同时解决人驻连州后，“阳与政府合作，阴与陈逆勾通，危害政府”① 的川军熊克武部。10月3日，蒋介石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在广州扣留了熊克武，并命令谭延闿第二军、朱培德第三军出发北江，解决熊克武所部。同时，国民政府致电广西李宗仁等，调桂军入粤，配合国民革命军夹击熊部川军。

熊部川军经广西东下时，新桂系就已密切注视着其动向，并派纵队司令俞作柏赴穗，向国民政府报告了熊部经过广西的情况。所以，李、黄、白接到国民政府电令后，即以白崇禧为总指挥，率蔡振云、钟祖培、夏威、郭凤岗、陶钧等纵队约1万人，分三路人粤参战。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带领郭凤岗、陶钧两个警卫团由全县出马头，以切断川军熊部北窜之路。②

11月，桂军行动时，谭、朱两军已与川军熊部交战。熊部发现腹背受敌，恐遭围歼，分向湘桂边境逃窜。其第一军余际塘部退向湘南，后为湘军师长、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部缴械收编。第二军汤子模部沿广西全县向西逃窜，桂军进行拦截，在全县境内的八十山大败其后卫罗觐光部。结果，罗觐光被击毙，其所部两个旅长一死一伤。熊部第二军沿龙胜向贵州撤退，桂军胜利结束拦截战斗。

驱逐川军熊部的战斗和第二次东征尚未结束，国民政府又发动了南征邓本殷、申葆藩的作战。

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势力，是由原陈炯明粤军邓本殷和旧桂系林俊廷旧属申葆藩部组成，后来又广泛网罗南路和琼、崖各地的土豪劣绅、民团土匪，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军阀集团，号称广东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邓本殷自任总指挥，申葆藩任副总指挥，部众3万余人，霸占的地盘东至两阳（阳春、阳江），西达钦廉，南及琼崖全岛，北抵信宜，面积几乎占广东全省

① 何赤：《解决熊部大事记》，载《军事政治月刊》，1926（1）。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25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一半，指挥中心在高州一带。邓、申不仅与陈炯明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残害百姓，反对孙中山和广州国民政府，祸粤多年，还与北洋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充当他们的帮凶，甚至不惜以出卖琼崖地区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以及公路修筑权，换取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

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进展迅速，陈支持不住，急派专使到南路，要求邓、申出兵进攻广州，以策应其在东江方面的反扑。10月下旬，邓、申将所部改称“定粤军”，邓亲自从海口赴高州坐镇，调遣大批兵力，由阳江向四邑进攻，然后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南征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先期出征。

10月26日，邓本殷部万余人向开平县单水口进攻，陈铭枢率3个团奋勇抵抗，双方激战了三昼夜。由于敌众我寡，国民政府急调朱培德第三军、谭延闿第二军一部（5个团、一个独立营和一个工兵营）增援陈铭枢。同时，电请广西李宗仁火速派兵支援。李、黄、白等得电后，迅即令吕焕炎纵队经肇庆、江门赴单水口增援，堵截敌军。28日，陈铭枢部在桂军的有力支援下，将敌击退。随后，桂军又参加了南征军的大反攻，取得了单水口战役的胜利。

是月3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动南讨邓、申战争，任命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邓、申军。桂军增派俞作柏纵队入粤参战，俞部被编为南征军第四路军，由俞任指挥，自陆川向广东廉江、化州进攻。

11月3日，南征战事全面展开，进展顺利。至7日，南征军已连克恩平、台山、新兴、阳江等地。同日，桂军俞作柏部在茂名迎击自电白进犯之敌苏廷有部，歼敌过半，给敌以致命打击，苏残部溃逃钦县。8日，俞作柏率部乘胜前进，攻占化州。接着，又于19日参加南征军进袭高州的战役，由化州攻高州之南。20日，邓本殷在南征军四路大军的进逼下，率残部突围而逃，俞作柏部和陈铭枢部先后进入高州。随后，俞作柏率部与第一路陈铭枢部协同作战，于30日收复廉州。

这时，东征战事已胜利结束，李济深奉命率第四军参加南征。12月4日，

李济深宣告就任东征南路军总指挥一职，统一指挥两广军队的行动。李宗仁增派龙州镇南善后处长胡宗铎和黄旭初纵队参战，分由上思、横县进攻钦县，直捣申葆藩的老巢。

是月2日，黄旭初部攻取灵山。4日，黄部会同胡宗铎部进攻钦县，在钦县附近的涧利与申葆藩部接战数小时后，申部不支，向钦县溃退。6日，胡宗铎部乘胜发起攻击，占领钦县。申葆藩弃部逃往越南，其残部投诚后被改编为广西陆军第十、第十四旅。胡宗铎部随后又攻占了防城。这时，邓本殷部大部分也已被南征军歼灭。南路大部地区收复。25日，南征军继续扩大战果，陈铭枢第一路由安铺攻雷州，桂军俞作柏部自化州会攻。雷州守敌抵挡不住，由海道逃琼崖。南征军乘胜追击，至次年2月，全部肃清琼崖邓军。至此，国民政府南征胜利告终，广东全省统一。

在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战争中，新桂系积极出兵参战，夹击川军熊部，尤其是在讨伐南路邓本殷、申葆藩部的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为肃清广东境内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

广东全境统一之后，实现两广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成了国民革命急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这时新桂系与广东国民政府、广西军队与国民革命军之间，还仅是一种合作关系。新桂系除了曾接受过孙中山委任的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以及国民政府委任的广西全省绥靖督、会办的名义外，其他的一切基本上"都是自搞一套"。①新桂系虽然投靠了国民政府，但广西实际上还保持着独立，甚至是割据状态的省份。而且，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湘、黔等省的地方军阀势力相继派代表来桂联络，谋求与新桂系建立关系，搞"联省自治"。更令国民政府担忧的是，新桂系首脑李宗仁过去的老上司林虎，当时已投靠陈炯明，并成为陈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林、李私交甚笃。国民政府因此一直

①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67页。

对李宗仁放心不下。显然，不解决好国民革命阵营与新桂系之间在党、政、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明确国民政府与广西之间的隶属关系，国民革命根据地就得不到真正的巩固，出师北伐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为了把新桂系完全纳入国民革命阵营，置广西于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以壮大革命阵营的力量，免除兴师北伐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加紧了促进两广统一的活动。

早在1925年8月6日，新桂系初定广西时，国民政府即下令将广西的省长、总司令之类的头衔裁撤，同时决定在筹备改组以前，所有广西全省军政、民政、财政，由李宗仁、黄绍竑暂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署理。并且，委派李济深等人前往南宁，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就两广统一、建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以及桂军出征广东南路等问题，作了初步协商。后因发生廖仲恺被刺事件，李济深等人匆匆返回广州，双方未能达成具体的协议。不过，李、黄、白已诚恳地表示了拥护国民政府的态度。[①] 10月，汪精卫在谭延闿等陪同下来到梧州，会晤李宗仁、黄绍竑，进一步讨论了两广统一的问题。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李宗仁、黄绍竑为广西省党部特派员。新桂系对国民党中央的决定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于1926年1月1日，由李宗仁、黄绍竑以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召开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两广统一初步实现。

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和南征的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以促进两广统一的完全实现。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期间，国民党中央为表示对广西的重视，不仅特别邀请新桂系驻穗办事处代表陈雄和粟威参加大会，而且推选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也相应作出决定，推选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另外，国民政

①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68页。

府为争取两广统一的尽快完成，“使两省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一致的应付中国大局”，[①] 再次由汪精卫率国民政府要员谭延闿、甘乃光等，于1月26日至29日以“劳军”名义到梧州。在梧期间，汪精卫等和李宗仁、黄绍竑以及叶琪（作为湖南省代表）、安健（贵州省代表）、范石生（云南省代表），商谈了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实现党治、准备北伐以及与冯玉祥合作等问题。经过国民政府的不懈努力，新桂系终于同意“毫无保留地统一”，[②] 并派白崇禧为全权代表赴穗，与国民政府谈判有关两广统一的具体事项。

从2月18日起，两广统一进入具体谈判阶段。国民政府根据汪精卫的提议，成立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的具体问题。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李济深、蒋介石、宋子文、白崇禧。3月上旬，双方拟订了一个初步的统一方案，由白崇禧寄回广西征求李宗仁、黄绍竑的意见。李、黄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并于13日向国民政府发出“元电”，表示接受方案。在李、黄表态之前，国民政府鉴于两广统一关系重大，为慎重起见，在白寄出方案后，又电召李、黄赴穗，就统一问题作深入的协商。于是，黄绍竑在13日，即与李宗仁发出“元电”同日，偕俞作柏等由梧州赶赴广州，分别会晤了汪精卫、谭延闿、李济深等人，就统一方案认真交换意见，并基本达成了共识。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此基础上通过《两广统一案》。主要内容是：（一）广西省政府处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应编地方军与否及其数量呈军事委员会决定，及由改组委员会拟具办法呈军事委员会决定；（三）凡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导监督。[③]

---

① 《汪精卫报告到梧州的经过》，载《政治周报》，1926（8），38页。

②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72页。

③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史馆档案》（一）5177，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两广统一案》公布后，广西很快遵照实行。5月初，按《两广统一案》规定，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全军辖9个旅，计3.7万余人。5日，李宗仁在南宁宣布就任军长职。同时，李宗仁等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于31日宣布撤消广西民政公署。6月1日，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省务会议主席兼财政厅长，粟威任民政厅长，甘浩泽任教育厅长，盘珠祁任建设厅长，朱朝森任省政府秘书长。财政方面，国民政府不同意广西提出的两广财政完全统一的主张，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广西财政只是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指导监督，实际上仍维持原来的自收自支状态。

两广统一的实现，广西加入国民政府，增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加快了国民政府兴师北伐的进程。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西

1925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在梧州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随后，南宁、桂林、柳州、桂平、玉林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中共支部，组建了中共梧州地委和南宁地委。共青团广西地方组织也建立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指导下，中国国民党广西地方组织加紧整顿和发展，筹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1926年1月，在南宁召开中国国民党广西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中国国民党广西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在广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形成，推动了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后，出师北伐，参加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广西革命运动的高涨，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和广西工人运动的发展，随着两广统一和

新桂系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斗争等有利于革命斗争发展的形势的出现，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广西革命运动的领导，建立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就成为了一种客观的趋势。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的地方组织是在梧州首先建立的。梧州位于广西的东部，处于桂江、浔江、西江的汇合口，是珠江流域中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港口城市。1897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这里既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广西的据点，也是广西现代产业工人首先产生和密集的地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加上这里靠近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得风气之先，工人革命斗争发展较快。1914年，梧州工人就开始组织工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机器总工会广西机器工会，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工会。1920年和1921年又先后成立轮渡船务工会、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工会。此后，又陆续成立了革履、五行、旅业、民船、盐业、理发等行业工会和广西联合总工会。

梧州工人一经组织起来，就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和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相呼应，又影响和带动了广西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1922年1月，梧州500多名海员工人和100多名洋务工人，举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声援香港海员工人斗争的大罢工，使梧州至香港的交通全部中断，帝国主义受到沉重的打击。1925年春，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已达4000~5000人。当“五卅”惨案和省港大罢工消息传来，饱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和欺侮的梧州人民反响尤为强烈，他们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各种方式支援上海和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6月6日，梧州各界组织“对外委员会”，专主对外工作。8日，举行各界示威大巡行，一致援助上海反帝斗争，“工学联合救国会”在声援斗争中诞生。12日，2000多名群众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他们向梧州当局请愿，要求与英日两国领事交涉，厚恤伤亡者，惩戒肇事者，并发通电和派代表赴上海慰问被害同胞。25日，各界群众举行响应全国总示威大游行，宣布成立“梧州各界对外协会”，筹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学生和工人联合检查英日劣货，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斗争持续半年之久，使洋货进口大为减少，在梧

的帝国主义者恐慌异常，狼狈逃出梧州。[①] 南宁、桂林、柳州、龙州、玉林、百色等地的工人群众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上海、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广西工人阶级的迅速成长壮大和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阶级基础。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后传入广西的马克思主义也进一步与广西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共广东区委在促进这一结合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直接领导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筹备和建立工作。中共广东区委1923年成立于广州，主要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及南洋地区的建党工作和革命运动。他们十分重视广西的建党工作。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革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直接通向工农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机会。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五卅”运动在广西梧州等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广州学生联合会，先后派中共党员龙启炎、共青团员周济等到梧州开展组建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活动。



梧州《民国日报》编辑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龙启炎（曾任广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梧州支部书记），左二为谭寿林（当时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后排左一为罗少彦

龙启炎、周济到梧州后，利用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和编辑之便，团结报社其他同志，恢复出版了《梧州民国日报》，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同时，开办劳工夜校，在工人、青年和妇女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发

① 《梧州市党史资料通讯》，19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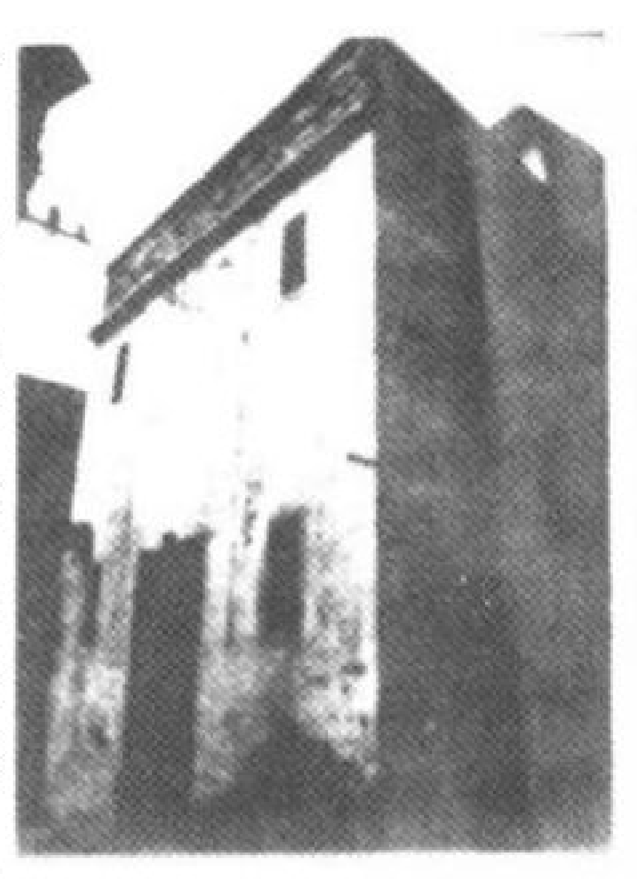
动群众积极参加声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并注意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如黄荣坤、吴瑞初、姚祝卿、胡奕卿等就是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思想进步、斗争坚决、办事公道的工人运动先进人物，他们大多被选为工会负责人。对于共青团组织的筹建也积极地进行。9月，共青团梧州支部建立，有团员4人，由龙启炎任支部书记，直属团广东区委。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梧州分社也于9月初在苍梧中学成立，由龙启炎、周济、钟山等组成执行委员会。省立二中、苍梧中学、县立女子师范、女子高小、省立宣传员养成所等成立了分社的支部，以引导和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封的斗争。工人运动骨干的形成和青年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梧州建立地方支部准备了干部和组织条件。

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公开身份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秘密到梧州了解广西情况和指导建党工作。他在大同酒店召集龙启炎、周济、钟山等党团员开会，听取关于广西军队、广西建团和工运、青运、妇运及新桂系等情况的汇报，指示今后要抓紧发展共青团组织和建立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继续深入开展工农青妇运动。同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广西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梧州革命发展的情况，决定在梧州建立党的组织。龙启炎到广州办理了周济、钟山、李省群等由团转党手续，回梧后又发展了李血泪、李天和入党，正式成立梧州支部，代号为“伍竹枝”。由龙启炎任书记兼管组织，李血泪负责宣传，周济负责工运及学运，支部设在马王街义路码头《梧州民国日报》社内。



大同酒店旧址。1925年秋，周恩来到梧州指导广西革命工作，曾在此住宿和召开会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中共梧州地委和广西特委旧址（位于梧州市兴仁巷）

为了加强梧州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派共产党员粟丰、甘立申到梧州工作。12月，又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第四、第五届广州农讲所毕业的广西籍中共党员林培斌、黄启滔、罗瑞成、谢铁民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梧州郊区开展农运工作，并在农会会员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到1925年底，梧州的中共党员已达20多人，发展成立了三个党支部：中共梧州工人支部，书记周济；国民党梧州市党部中共支部，书记甘立申；梧州民国日报社中共支部，书记龙启炎。这就具备了建立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条件。12月，中共梧州地委成立，代号“梧祝迪”，委员谭寿林、龙启炎、周济，谭寿林任书记。机关设在梧州兴仁巷4号，负责领导梧州、桂林、桂平等处支部的工作，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

为了适应广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梧州地委先后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南宁、桂林、柳州、桂平、怀集等地开展工农运动和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党在广西的地方组织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当时广西省会南宁，积极进行建党活动的是共产党员陈勉恕、罗如川等人。1926年春，他们在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南宁支部，陈勉恕任书记。同年夏，南宁支部改为南宁地委，书记陈勉恕（后黄日葵、罗少彦相继接任）。南宁地委下辖南宁和左右江的党组织，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其“兼摄省委”，[1] 并上报中央批准。中央未及批准，广西政局就发生了变

① 《李其实等八人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2月7日，载《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2～1929.3）第1卷，6页。

化，因此，广西党务仍由广东区委领导。

中国共产党除在梧州、南宁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外，还在广西各地陆续建立了党的支部。1926年至1927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建支部20多个，党员200多人。主要有：中共玉林支部，书记朱锡昂；中共苍梧县十二区支部，书记林培斌；中共北海支部，书记江刺横；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陈岳秀；中共恩（隆）奉（议）特别支部，书记余少杰；中共桂林县支部，书记李征凤；中共南宁军校支部，书记李仁及；中共怀集县支部，负责人李爱；中共东兰县支部，书记陈洪涛；中共桂平县支部，书记黄一平；中共容县支部，书记林培斌；中共平南县支部，书记吴延亮；中共武宣县支部，书记翁尧年；中共梧州店员工会支部，书记陈漫远；中共防城县支部，书记钟竹筠；中共贵县城区支部，书记陈培仁；中共贵县桥圩支部，书记杨威汉；中共宾阳县支部，书记周杰。

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是近代广西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广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与国内其他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它虽然比上海、北京、湖北、广东、山东（以上均是1920年建党）、湖南（1921年）的建党时间要迟，但比福建（1926年2月）、云南（1926年）、贵州（1927年）等省建党的时间要早。从环境上看，具有比1920年和1921年建立的中共组织更有利的活动条件。早期建立的中共组织一开始就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被北洋政府斥为“过激党人”，视为“洪水猛兽”，而“严加防范，以遏乱萌”，[①] 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环境极端残酷。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成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之中，又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范围之内，建立初期就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地从事革命活动，环境相对有利。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①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6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广西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但在广西的实际环境中也有其自身发展的曲折经历。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使广西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有了直接的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广西的革命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二七”惨案血的教训，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同时强调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会后，中共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孙中山为了救活“正在堕落中死亡”① 的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宏愿，也急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产党员有20多人参加。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会议还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依靠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各省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在这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一些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对下层的群众工作并不熟

① 《宋庆龄选集》，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悉，而这方面的工作是共产党员所注重并且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的。当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许多处在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通过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联系，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也就实现了国共在地方上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在广西与新桂系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合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

1925年上半年，广西统一后，由于李宗仁、黄绍竑表示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广西成为广东国民政府辖下的第二个省份。按照广东国民政府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省应先建立国民党省党部，然后由省党部指导组织省政府。因此，1925年8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后几次派员到广西筹办省党部。筹办党务的人选，新桂系提出由曾经出席国民党一大的省议员覃超负责，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同意。但新桂系对外来办党务的人很不放心。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谭平山（中共党员）就采取内外人员结合的办法，趁机派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到广西工作。9月，在南宁成立了省党部筹办处，筹办委员18人，其中有中共党员陈勉恕，进步人士梁六度、陈立亚、黄家植、周锡桓，筹办处主任覃超。李宗仁、黄绍竑担任中央特派的筹办广西省党部党务专员。

筹办处成立后，全省各地国民党党部开始改组或建立起来。首先是改组了国民党梧州市党部。10月，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中共党员粟丰、甘立申，国民党左派李贻荪任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改组委员会成员，并指定粟丰为主任。原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济深、黄绍竑于11月1日将该会移交改组委员会接收。改组委员会随即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动员梧州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全部加入国民党，同时还发动革命群众参加国民党，使左派力量在梧州市党部中占优势。12月，市党部改组委员会推举市党部候选执行委员21人，候选监察委员9人，以三分之一的差额进行选举。结果，当选的7名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了5名，分别担任宣传、组织、青年、工人、妇女各部部长。改组后的国民党市党部，

实现了国共合作，成为梧州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构。接着，全省12个区都开展了党务工作，至1925年底，仅几个月内，在全省共发展国民党党员9.2万余人，建立市县党部50余个。这就为成立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广西省党部，实现全省的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

1926年1月1日至15日，在国民党中央的推动和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代表名额112人，出席会议97人，包括雷沛涛、陈勉恕、李省群、宁培瑛等一批共产党员。李宗仁、黄绍竑、覃超分别向大会作了军事、政治、党务报告。

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表示拥护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和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宣布，“继今以往，广西将划立国民革命之新时代，永远为中国国民党势力所依之地”。今后的行动纲领是：提挈全省民众向国民革命方面工作；努力于训政时期之革命建设，以树民治之基础；执行严格之纪律以巩固国民党之组织。

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案。其中农民运动决议案强调，农运的目的在使农民了解国民党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变成有系统组织的群众”，指出了农民中存在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农村教育落后等问题，表示今后要“取缔高利贷与种种不平等条件之束缚”，“办农民银行及购买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在撤销各级议会决议案中要求，“应请政府迅将省议会及各级自治会通令撤销，以除障碍”。

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选举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5人：李宗仁、黄士谦、黄植溪、周锡桓、雷沛涛；候补监察委员3人：陈锡珖、黄启藩、夏威；执行委员9人：黄绍竑、覃超、覃时宜、麦焕章、白崇禧、陈立亚、黄家植、梁六度、刘百揆；候补执行委员5人：李济深、裴邦焘、甘浩泽、刘名世、俞作柏。在以上22名监、执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员1人（雷沛涛），国民党左派人士6人（周锡桓、黄家植、陈立亚、梁六度、裴邦焘、俞作柏）。省党部下设七个部，其中组织部和宣传部部长由黄绍竑兼，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妇女部长李省群（中共党）、工人部长黄家植、

农民部长陈协五、商民部长陈立亚，后三人均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另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宁培瑛、张胆、刘曼舒、陆巩沉、黄若珊、关育梧等，分别在农、工、青、妇各部担任秘书或干事职务。

国民党广西省"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广西正式形成。

三、广西革命运动的高涨

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对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西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于声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风暴中，它本身形成的过程就是一次反帝反封建宣传的过程，是动员、组织革命队伍的过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建立，不仅使广西各阶层群众受到一次较普遍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而且从组织上对旧势力进行了一次清理，为大革命在广西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广西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共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共合作的政策，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个部门把干部继续派到广西来，加强中共对广西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在全省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这样，全省革命运动很快高涨起来。

工人运动

广西的工人运动，主要是共产党人通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工人部来领导的。1925年12月至1926年，在南宁举办了两期工人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所长覃哲民，第二期所长黄家植，两期学员共150多人。中共南宁地委领导人黄日葵、陈勉恕、罗少彦曾亲自给学员讲课。学习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史略、

现代工人运动、现代经济组织、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等，培训了一批工运骨干，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尤以梧州、南宁、桂林、柳州、桂平大湟江口等处发展较快。

在梧州，1925年10月成立了梧州工会联合会，下辖21个行业工会，会员近万人。1926年2月17日，中共梧州地委以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名义，在梧州举行有工人及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援助省港罢工周年市民大会”，会上通过了三项提案：一是罢工工友应负起国民革命先锋队之使命，强固组织，奋斗到底；二是全国革命民众应一致拥护复工条件，及予以充分之援助；三是国民政府对于省港罢工工友，应善为爱护。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5月30日，梧州工人及各界群众在东学塘举行五卅运动周年纪念大会。当天，由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的国民党苍梧县党部，为了分裂梧州工农群众的反帝斗争，采用金钱引诱和强制的办法，也召开了一个只有少数群众参加的集会。会后，双方进行示威游行，但没有发生冲突，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在梧州各界群众中的影响力。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1926年6月7日至21日，梧州市举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93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9650人。大会通过了有关组织、纪律、经济斗争、肃清工贼、工农联合、失业、征求会员、政治斗争、宣传教育等九项决议案，并改组梧州工会联合会为梧州工会代表联合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行委员24人，其中共产党员有龙启炎、周济、钟山、苏文灿、胡奕卿、姚祝卿、陈素虚、林泉衡等8人；候补执行委员9人，其中共产党员有黄荣坤、吴瑞初2人。28日，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选举钟山任委员长兼常务委员会主席，苏文灿、龙启炎、蔡美利、郭华俊、林泉衡、陈素虚6人为第一届常务委员，其中4人为中共党员。这样，梧州工会代表联合会就完全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保证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梧州工人运动也成为了广西工运的重心。

在南宁，工人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1926年南宁建立工会代表联合会时，已有30多个行业工会，会员8000余人。1926年5月，

南宁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市总工会发动工人捐款，在中山公园兴建“五卅”纪念红亭、红桥和红湖。6月，南宁总工会筹捐款7000元，汇给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派出4位代表赴穗慰问省港罢工委员会。6月23日，英国军舰3艘无理封锁梧州港口达10小时之久，并企图乘着水涨直驶上横县到达邕江进行威胁。英国军舰对内河航线不熟，以港币1万元雇用邕梧航线的引航工人，南宁、梧州的轮船工会发动海员工人拒绝接受英舰雇用，不为其引航，迫使英舰退出梧州。除此外，南宁工人在1925～1926年，还多次进行了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斗争中，加强了工人的团结，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

在桂林，1926年6月2日在王城召开群众反帝斗争大会。当时，在桂林李子园的美国教会浸信会逼死一名建筑华工，桂林总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包围了李子园，工人群众向园内扔石头，并冲进园内降下美国国旗，升上中国国旗，显示了桂林工人阶级的威力。

桂平大湟江口的工会组织和工人与农会配合，进行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1926年初，桂平北区农会成立不过三个月，即与豪绅发生冲突。大湟江口工人得讯后，即派代表参加农民集会，支援农会的斗争，结果农会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这期间，广西各地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都得到了较大发展。除上述工会组织外，柳州、全县（今全州）、兴安、灌阳、平乐、贺县、平南、桂平、藤县、容县、怀集（今属广东）、苍梧、贵县、陆川、玉林、博白、永淳（今属横县）、隆安、横县、武鸣、宜山、融县（今分为融安、融水两县）、三江、思乐（今属宁明）、同正（今属扶绥）、龙州、百色、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属田东）以及当时属广东省的北海、合浦、防城等县市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全省参加各种工会组织的会员达4万余人。

广西工运的发展，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西梧州、桂林、桂平等地工会的骨干钟山、李炎荣、黎占元（均为中共党员）、郭华俊、蔡美利、邓誉声等人作为代

表参加。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梧州分会委员长郭华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梧州工会联合会主席钟山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这是对广西工人阶级的极大支持和鼓舞。

农民运动

广西的农民运动，最先在东兰县兴起。早在1922年，韦拔群已开始在东兰县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5年5月，韦拔群、陈伯民从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根据从广州带回来的农民协会章程来指导东兰农民革命斗争，使东兰农运迅速发展，先后建立70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员2万余人。在此基础上，于同年8月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县农民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至1926年12月，县农民协会管辖下的区农会已有11个，乡农会134个，男会员75660人，女会员2685人，农民自卫军500多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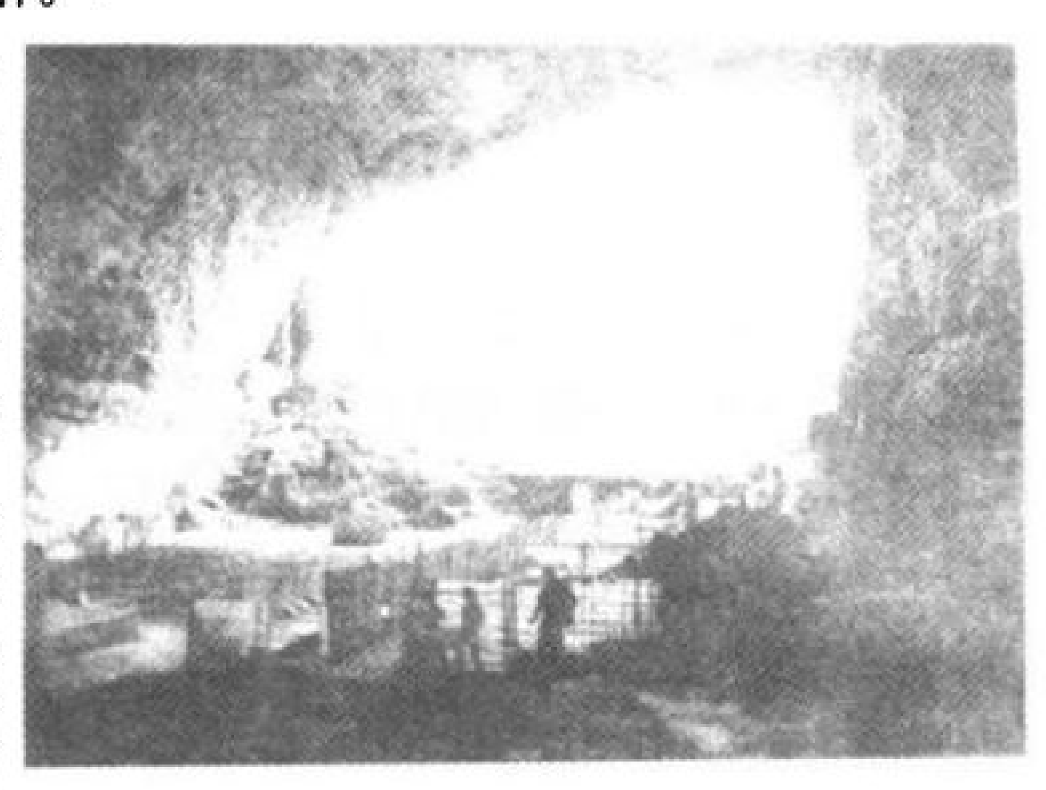
右江农民运动领袖
韦拔群

在党的指示下，韦拔群还以东兰为中心，带动右江各县农运的发展。从1925年9月至1927年6月，先后在东兰武篆的北帝岩和育才小学举办了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今属田阳）、恩隆、思林（两县今属田东）、果德（今属平果）、都安、河池、南丹等县。农讲所设政治经济学概要、社会发展史、俄国革命史、农民运动章程、军事知识等课程。三届农讲所共培训各族农运骨干近600人，其中妇女40多人。到1926年底，右江各县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东兰、凤山、奉议、恩隆、都安、河池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等县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大约有农会会员10万人，农民武装2000余人。① 东兰县农民运动，成为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作为东兰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的韦拔群，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极高评价，在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中央局报告（10、11月份)》中指出："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②

1926年3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在南宁成立，首任部长为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协五（9月由俞作柏继任），中共党员张胆、宁培瑛分别任秘书和干事。中共党组织通过这一机构去领导广西全省的农民运动。省农民部成立后，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编辑出版了《农民运动丛刊》。3月至12月先后在南宁举办两届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农运骨干300多名。



列宁岩（原名北帝岩）——韦拔群在此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了有效地指导各县农民运动的进行，分别在容县、龙州和恩隆成立了省农民部苍梧道、镇南道、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由共产党员林培斌、陈霁、陆玑彰（陆炳堂）担任各办事处主任，并把在农讲所结业的部分学员作为省农民部特派员派赴各县指导农民运动，全省形成了省农民部——道农运办事处——县农会的农运组织网络。同时，撤销了阻碍农民运动的原省、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和各县农民运动名誉委员；派员查处东兰等地农民受迫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139页。

害事件。这些，对推动广西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非常重视和支持广西的农民运动。在广西省党部农民部成立之前，是通过广东省农民协会来指导广西农运。1926年2月，广东省农协全体执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广西农运报告决议案》，规定了广西农运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提出了发展广西农运的八项具体任务，为发展广西农运规定了方向。1926年3月30日，在中央农民部农运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广西农运问题，决定派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学员为农民部特派员回桂工作（后因故未回），还就广西平南、怀集两县农民运动受压制问题作了“质问广西省党部”的决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和广西省党部负责从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及各县选送40名“决心作农民运动之青年同志”到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5月3日，由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开学，招生300余人，广西40名学员入学。他们在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基本理论，接受军事训练，还到广东海丰县进行实习。9月11日学习结束，有30多名广西学员回桂从事农民运动，这就大大加强了广西农运的力量。

广西农民运动是在同国民党右派阻挠破坏农运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26年2月，国民党右派勾结东兰县知事，派军队“进剿”东兰农军，制造了镇压屠杀农民的“东兰农民惨案”。共杀害农民140人，农民被勒索款项83683元，损失牛马2467头（匹），被焚掠勒索614家，被掳掠勒索5804家。[①] 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发动各地群众坚决支持东兰农民运动，要求广西省政府惩办肇事者。同年9月，中共南宁地委组织了南宁各界援助东兰农友委员会，并召开群众大会通电声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以黄绍竑为首的广西省政府被迫派省党部农民部长陈协五到东兰调查，陈协五写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广州《农民运动》杂志

---

① 陈协五：《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1926．9），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上。国民党右派马上对陈协五进行恶毒攻击，陈被迫辞职。10月，广西省政府又派陈勉恕（中共党员）等7人到东兰调查，组成了“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并任命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陈勉恕等在东兰各地作了近50天的实地调查，写成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东兰农运“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一个先锋队”，认为“对于这先锋队，当然要拼命去扶植及拥护”。① 经过斗争，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1月28日发出“俭电”，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地位，处理了制造惨案的肇事者，并准予豁免东兰农民粮赋一年。

由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积极配合和努力，广西农运得到了健康发展。至1927年春，农会组织遍及广西60余县及市郊（包括南宁、梧州城郊和当时属广东省辖的合浦、防城、北海），其中25个县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或县农会办事处，3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会筹备处，全省农会会员达20余万人。② 在各级农会领导下，广大农民热情支持北伐战争和城市的工人、学生运动，在农村开展了二五减租、限制高利贷剥削、反对田主无故抽佃的斗争，向农村的封建统治基础进行了冲击。有了组织的农民一旦行动起来，就能推动农村的变动。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广西的农运虽不如湘鄂赣农运那么声势浩大，但农民已开始发动起来，它推动着广西农村的变动，成为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青年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广西的青年运动在大革命时期非常活跃。

在青年学生中建立组织是发动和领导青年运动的重要条件。五卅惨案发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1927年3月《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工作报告》统计说是15万。此据《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2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和共青团广州地委就先后派龙启炎、周济、邓世光等到梧州开展建团、建党活动，于1925年9月初建立了广西的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梧州支部，龙启炎任书记，隶属团广东区委领导。到12月，已有团员28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如不满三个支部三十团员之处，得设立特别支部"，于是便成立了共青团梧州特别支部，下设两个支部。1926年4月，成立了共青团梧州地委，辖广西全省，共10个支部，即团梧州支部、梧州省立二中支部、梧州妇女支部、苍梧县立女师支部、南宁省立一中支部、桂林县支部、贵县支部、桂平县支部、容县支部和团柳州地方组织。随着团组织的发展壮大，团广东区委又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3月建立了团南宁地委和团桂林地委，以适应广西全省团的组织领导工作，邕、梧、桂三个地委均隶属团广东区委。各地团组织和共青团员成为广西青年运动的骨干。与此同时，一些团的外围组织和学生组织也建立起来。1925年9月，龙启炎、周济根据广州组织新学生社的经验，积极在梧州各学校发展新学生社社员，在苍梧中学成立新学生社梧州分社，分别在省立二中、苍梧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小等学校建立新学生社支部，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他们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平民教育"、"反对教会教育"等口号，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1925年11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特派员粟丰到梧州指导梧州学联改组，将理事、评议分权制改为统一的权力机构，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1926年7月，广西省学生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在梧州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学联执委会，杨剑秋为省学联执委会召集人，钟山为宣传委员，易泽苍为组织委员。并决定出版《广西学生日报》。省学联改组后，开始置于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市县大、中、小学均设有学生联合会，形成了对全省学运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另外，国民党左派青年组织了广西革命青年社，属广西省党部青年部领导。当时许多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也参加了这个团体，以这个团体的名义公开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坚强领导，有了各级学联和革命青年社对青年、学生的直接组织，广西青年运动有了进步和提高。

首先，努力宣传革命理论，介绍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广西省学联的《广西学生日报》，广西革命青年社的《广西青年》，梧州学联的《救国晨报》，南宁学联的《爱国报》，桂林学联的《周报》、《三日刊》等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形势和青年运动的方针，报道和交流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促进省内青年运动的发展。同时，各级党团组织创办书社、书店，发行各种革命书刊和进步书籍，《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少年先锋》、《列宁文选》、《历史唯物论》以及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等通过不同渠道在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中流传。党团组织还利用集会、演讲会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宣传。1926 年 1 月 21 日，在列宁逝世两周年之际，梧州、南宁、桂林都举行了纪念集会活动。中共梧州地委还在省立二中理化教室举办长达一星期的各界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演讲会。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和党员龙启炎、毛简青、粟丰、罗如川相继到会演讲，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梧州民国日报》连载了谭寿林《苏联革命成功的要点》演讲全文。这是一次系统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其次，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支持工农革命运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青年学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革命先锋作用，他们与工农一道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集会示威游行，还通过组织募捐、上街演讲、编演新戏、开办夜校等多种形式，唤醒同胞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6 年 3 月，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各地学生都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梧州各校学生会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梧州学工联合会，并组织学工纠察队检查进港船只的货物，参加梧州各界援助罢工周的活动，到工人中帮助组织工会，创办各种工人夜校和支援市郊农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斗争。玉林高中在朱锡昂校长主持下，1926 年曾把星期六定为工农运动日，发动学生下乡宣传。在各种活动中，许多青

年学生与工农群众共同战斗，看到了工农的伟大力量，从感情上与工农接近起来，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再次，学生们为争取民主自由，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学潮斗争。他们驱逐和要求政府罢免那些压制学生运动、侵吞公款、办事专横的教育界头面人物。较典型的是1926年5、6月间的梧州学潮。5月，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员发起了驱逐以高压手段对付学生的所长杨文炤的学潮，得到梧州学联全力支持，中共机关报《向导》发表了《梧州学潮》的报道，在各地的原该所学员也来电声援，在强大的压力下，杨文炤被免职。6月，梧州省立二中又掀起了驱逐校长崔赞漠的学潮。崔侵吞公款，安插私人，不顾学生学业。师生们通过罢课，多次电告省政府，要求将崔撤职，他们顶住了崔的压力，坚决斗争，当局不得不罢免崔的职务，同时也开除了一批学生。此外，还有苍梧中学学生与校长黎植松的斗争、贵县学潮等。在学潮中体现了学生们团结战斗的精神，培养锻炼了一批青年运动的骨干。

妇女运动

"五卅"以后工农运动的风暴促进了广西妇女的新觉醒。在共产党人、共青团员的发动和组织下，广西妇女得以组织起来，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5年10月3日，广西妇女联合会在梧州成立，会员118人。李省群（共青团员）等11人被选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济、钟山、李血泪（当时均为共青团员）被聘为顾问，出版《妇女之光》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妇女联合会积极在女教师、女学生和女工、郊区农妇中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革命道理，开办妇女工读学校，发展会员。1926年初国共合作在广西实现后，广西妇女运动在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的指导下得到了加强。当时担任省党部妇女部长的是中共党员李省群，担任妇女部秘书和干事的分别是共产党员谢雪琴和共青团员黄若珊。她们利用合法的身份，积极指导和发展广西妇女运动，编辑出版了《革命妇女》杂志，创办妇女工读学校和妇女运动讲习所，

并帮助各地组织妇女团体以指导农工妇女工作。在南宁,原有的广西省女权运动会和南宁市女权运动会通过李省群做工作,消除矛盾,联合组成了南宁各界妇女联合会;在梧州,广西妇女联合会和梧州女权同盟会合并为梧州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与此同时,桂林、柳州也成立了各界妇女联合会。

各界妇女联合会的职责，主要是对当地妇女运动进行组织、发动和指导，团结妇女力量，共谋本身利益。在政治上，要求女子有参政权，各行政机关应容纳女子担任职务；在教育上，须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在经济上，谋求女子经济独立，职业自由，工资分配上与男子同等；在法律上，要求男女绝对平等，女子有财产权继承权；在人格上，打破宗法旧礼教和重男轻女的恶习，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禁止一切损害女性的行为。除了注意解决妇女的特殊问题外，妇女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始终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为妇女只有争取民族的解放，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1926年3月8日，广西妇女联合会召集梧州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决议一致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并发出通电反对奉直军阀联合镇压国民革命，提出“中国妇女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表达了各界妇女坚决反对封建统治的决心。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广西妇女联合会还把“打破吃人——尤其是妇女的礼教”作为行动纲领之一。1926年春，不堪封建压迫的童养媳覃超容冲破封建牢笼，从桂平奔赴梧州，要求参加妇联工作。妇联支持覃超容的革命行动，于第二天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梧州各界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要求社会各团体给予声援。梧州各报社、工联会、学联会大力支持，发起了“打倒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

在农村,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全省大部分县都成立了妇女团体,尤其是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妇女运动最为活跃。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轫之地东兰县,有妇女团体东兰县妇女解放协会,会员有3685人。[1]

---

① 《广西省妇女部第十次会议记录》，1926年12月8日。

这些女会员和男会员一样，日间去耕作，夜间到补习学校，毫无倦态。东兰不仅设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设有妇女运动讲习所。妇女们表现出极大的斗争热情和决心，风气痼闭的东兰，女子剪发者居然有千余人之多，不仅是青年妇女，即使四五十岁者亦有剪发。[①] 备受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统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旦看到翻身解放的希望，就踊跃参加反土豪劣绅、反苛捐杂税、反旧礼教旧习惯的反封建斗争，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成为农民革命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锻炼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也引起了掌握广西大权的新桂系集团的恐慌和不满，他们不时制造一些事端，压制和破坏群众运动。这就表明，革命形势虽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四、桂军出师北伐

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也是工农运动的推动和各方面力量共同促进的结果。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及其军队，对于参加北伐，虽然含有向外扩张地盘和实力的动机，但客观上说，他们对于北伐战争的发动和胜利进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新桂系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1926年3月中旬，广东国民政府通过并颁布两广统一案，广西方面积极予以实施。5月5日，按规定改编广西军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辖9旅21团，共37500余人。6月1日，广

---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西民政公署改为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为广西省务会议主席。两广统一的实现，为北伐创造了必要的有利条件。同时，新桂系还积极策动湖南唐生智归附广东革命政府，驱逐反对和阻挠北伐的湖南军阀赵恒惕，反对吴佩孚，使湖南出现对北伐极为有利的形势，增强了革命阵营的力量。当唐生智受到吴佩孚军队的进攻，陷入危机之时，新桂系又派遣驻守桂林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为广西北伐先遣队，1926年4月底从桂林出发，积极援助唐生智，参加了当时战争的主战场西线的作战。他们和1926年5月援湘的广东方面的叶挺独立团一起，使“援湘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1926年5、6月间，李宗仁在广州不断陈述其北伐主张，力主迅速出师援湘和北伐，这对北伐的促成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当时，北伐条件也日趋成熟，表现在：第一，全国人民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早日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民心的向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第二，北洋军阀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主要分为三支势力：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五省联帅”孙传芳；控制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三支势力互相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第三，国民革命军人数虽少，只有10万人左右，但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民心士气极盛，只要战略正确，北伐是能取胜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新桂系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的有15000人左右，包括原先入湘援助唐生智的广西北伐先遣队钟祖培第八旅，还有夏威第一旅，李明瑞第二旅，胡宗铎第七旅。其中第一、第二两旅组成第一路，由夏威兼任指挥官；第七、第八两旅组成第二路，由胡宗铎兼任指挥官。另有独立营、炮兵营、工兵营各一个，还有机关枪大队、通讯大队和卫生大队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率领以上部队北伐。第七军

其余部队两万余人由军党代表、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指挥，留守广西，防止滇系军阀唐继尧再度进兵两广，破坏北伐后方。

在北伐战场上，桂军“颇以能战著名”,[①] 是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根据革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部署，北伐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

第七军（桂军）在第一阶段两湖战场中，与第四、第八军担任攻占长沙、武汉的主攻任务，除汀泗桥战役第七军主力未直接参战外，其余各大战役均参与。7月11日，第七军与第四、第八军会合后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进入湖北。8月30日攻占贺胜桥，然后与友军会攻武昌。第七军作战英勇，战功显著。9月10日，第七军奉令撤离武昌，转赴江西作战。像在两湖战场一样，第七军在江西战场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入赣半个月，即取得了箬溪、德安、王家铺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所击败的都是孙传芳的精锐部队，有力地粉碎了孙传芳切断武长路、解救武昌吴军、扼杀革命的西进战略，迫使西进湘鄂的孙军不得不回头守卫江西，从而收到了“围魏救赵”的效果，保证了武昌围城战的胜利。接着，第七军作为进攻南浔铁路的主力军，会同第四军、独立第二师，迅速攻占了南浔铁路各要点，掌握了孙军的生命线，使南昌孙军陷于孤立，从而保证了其他北伐军第三次攻击南昌的胜利。1927年初，第七军奉令向安徽挺进，促进安徽孙军投诚，并进迫津浦铁路南段，威胁南京、上海一带的孙军和直鲁军的后路，迫使敌人后撤，有力地策应了友军在长江下游的作战。

自北伐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七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屡挫强敌，为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

第五章 新桂系背叛国民革命

新桂系是代表乡村豪绅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利益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虽然参加了国民革命，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他们同革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害怕和敌视革命的情绪迅速增长。在统一战线中，他们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和破坏不断发展的工农运动，甚至公然屠杀工农群众，一步一步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927年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在广西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背叛了革命。

在新桂系“清党”反共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但广西的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在各地先后发动起义，领导人民武装反抗新桂系的屠杀政策。这些起义虽然遭到新桂系军队的镇压而失败，但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不屈不挠地坚持和发展广西的革命斗争。

一、反对和破坏农民革命运动

以李、黄、白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是在国民革命勃兴的历史条件下，从

旧桂系阵营中分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他们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等重大斗争中，做出过积极和重要的贡献。但新桂系是一个以乡村豪绅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投靠革命阵营，参加国民革命，主要是为了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并求得日后更大的发展。这决定了新桂系同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因此，他们借助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战胜旧桂系势力，取得了广西的统治权之后，便不愿意看到工农群众的不断觉醒和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动。当工农群众不断觉醒，工农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给乡村豪绅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予有力打击时，新桂系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迅速增长，害怕革命损害他们的统治利益，便很快加入反对和破坏工农运动的反革命行列。

1926年，在国共合作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全省出现了以原田南道和苍梧道各县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各地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或影响下，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实行二五减租，取消苛捐杂税，限制高利贷盘剥，反对无故抽耕退田，同豪绅地主势力进行斗争。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新桂系极为反感和不安。但慑于当时的形势，开始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和破坏，而以“温和”的方式，借建立各级农协筹备委员会的名义，采取“由上层以及于下层”① 的办法，指派一批官僚、豪绅在各地担任农民运动名誉委员，拼凑假农会组织，把农民运动控制和利用起来。结果，使农运工作一度受到严重的影响，“无若何之进步可言”。②同时，他们还指使和纵容各地的反动势力，迫害和摧残各地真正的革命农协组织，以阻止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当时，在桂平、平南、苍梧、怀集（今属广东）、岑溪、玉林、容县、邕宁、龙州等县，都发生过反动势力摧残农运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加强合作，同新桂系当局进行

---

①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统一战线组织撤销了原来的省、县农协筹备委员会和农运名誉委员，委任一批农运特派员到各县指导工作。同时，派员到各地查处迫害农运事件。当时，由共产党人林伯渠等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也对新桂系当局限制和破坏广西农运的行为进行了干预。

可是，新桂系依然坚持反对农运的立场，不仅继续与土豪劣绅势力相勾结，攻击和阻挠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公然用武力，在农民革命斗争最深入的东兰县首先大开了杀戒。

1926年2月，早就视东兰农运为心腹隐患的新桂系，应东兰县反动知事黄守先等人的请求，以“韦拔群等以农军、党军名义，召集群众，组织变乱”[①]为借口，派遣百色驻军龚寿仪团开赴东兰，伙同当地土豪劣绅武装，向东兰农民自卫军发动疯狂的“进剿”。因敌众我寡，韦拔群率农军退入西山坚持斗争。龚寿仪团随后在武篆、兰泗、同前、长江、东院等区大肆烧杀掳掠，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东兰农民惨案”（时称“兰农惨案”或“兰案”）。据事后统计，在惨案中遭反动武装焚掠勒索的农户有614家，被掳掠勒索的有5804家，损失牛马2467头（匹），被勒索款项83683元，被杀害的农民群众140人。[②]

惨案发生后，韦拔群以东兰县农民协会的名义，向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西军、政、党首脑以及社会各团体、报馆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互相勾结，镇压东兰农运的罪行，要求惩办残杀农民、烧掳村庄的元凶。同时，派陈伯民等人赴邕，向省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报告“兰案”的真相。联席会议里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运，主张立即将龚寿仪团调离东兰，并派员赴东兰调查。新桂系首脑黄绍竑不得不接受这一严正要求，于6月中旬将龚寿仪团调回百色，

① 《广西大事记要》（1912～1930），38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翻印，1961。

② 陈协五：《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1926年9月），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并由省党部农民部部长陈协五率调查团到东兰对“兰案”进行调查。

7月下旬，陈协五结束调查返邕，写了《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揭露了“兰案”的事实真相，肯定东兰农运的正义性。然而，国民党右派势力拒绝发表陈协五的调查报告，还诬陷陈协五“庇匪”，胁迫陈协五辞去农民部长职务。与此同时，东兰县的反动势力又不断制造新的事端，向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军进行挑衅。9月，韦拔群为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率农军进行反击，攻打东兰县城，赶跑了继任的反动知事黄祖瑜等人。然后，再派代表到南宁，向社会各界申诉实情，但仍遭到新桂系当局的压制。

为支持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迅速组织和发动各界群众，反对东兰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以及国民党右派势力对东兰农运的诬陷和攻击。在中共南宁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组织下，南宁各界群众成立了援助东兰农友委员会，并召开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明确支持东兰农民的正义行动，强烈要求省当局再次派员赴东兰调查。10月，在社会各界的督促下，新桂系当局被迫作出决定，由中共党员、省党部青年部部长陈勉恕组织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赴东兰调查，并委陈勉恕代理东兰县知事。

是月下旬，陈勉恕等到东兰，作了近50天的实地调查，写了一份题为《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全面地叙述了“兰农之政治经济背景”、“韦拔群等领导兰农从事斗争之经过”、“东兰农会之现状”、“劣绅土豪方面之情况”等问题，以充分的事实驳斥了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攻击陷害东兰农运的狂言，指出东兰县“现有之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高度评价了东兰农运，赞誉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运“最少也是广西农运的一个先锋队”。[①] 11月，中共南宁地委通过南宁各界援助东兰农友委员会，在南宁举行群众大会，请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委员关学参向大会报告这次调查的经过。大会向省当局提出了不准

---

① 陈勉恕：《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1926年12月4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派兵去东兰、援助兰农等10多项要求。

与此同时，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中的右派势力也在黄绍竑的支持下，另外搞了一份歪曲事实的调查报告，继续攻击和诬陷东兰农运，企图掩盖“兰案”的事实真相。而且，省党部还作了两份调查报告同时在南宁《民国日报》上发表的决定。但在付印时，印刷所的工人将右派势力的调查报告抽掉，换上了支援兰农的通电内容。黄绍竑等立即下令追查，将当班的印刷工人及随后前往交涉的工人代表逮捕入狱。

新桂系压制农运反对革命的行径，激起了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南宁各界援助东兰农友委员会再度召集群众大会，大力声援东兰农友的革命斗争，抗议省当局逮捕印刷工人。梧州、桂林、桂平等地的工会、农会纷纷通电支援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留俄的中山大学广西学生会也发表宣言，表示坚决援助东兰农民。留俄的广西籍学生廖梦樵、谢生桦、胡炳琼等人还以个人名义撰文，愤怒谴责反动势力制造“兰案”，屠杀农友的罪行。广东省农会也给东兰受害农友发来了慰问电。广东省农会负责人阮啸仙在该省农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东兰农运。由共产党人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名义主办的“农民运动”丛刊，分期全文发表了陈协五和陈勉恕分别撰写的调查报告，将“兰案”的事实真相和东兰农运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世。

新桂系当局在国共合作形势的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于11月28日发布“俭电”，被迫承认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表示要将原东兰县知事黄守先“送交法庭讯办”；通缉参与制造“兰案”的劣绅陈儒珍、杜琨选、龙显云、韦钟璜、韦志，并查明抄没其财产，发交该县农民协会，分别赈恤；对东兰农民“准豁免十五年度粮赋一年”；同时，“请第七军司令部查核办理”“兰案”的制造者龚寿仪。①

---

① 《广西省政府对东兰农案处理之经过》（1926年11月28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357页。

历时近一年，围绕着“兰案”展开的一场斗争，终于以东兰农民的胜利宣告结束。但是，新桂系并没有就此改变其压制、打击农民革命斗争的立场和态度，他们变换手法，等待时机，准备更大的反扑。

二、屠杀工人，制造血案

新桂系对广西的工农革命运动“有一个根本观念，即要看民众运动是否为他用？他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要是他的，否则不满意”。[①] 新桂系集团正是以这一“观念”为准绳，于“东兰农民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又在梧州制造了无理杀害工人群众的血案。

梧州是国民革命时期广西工人运动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梧州工运不仅在全省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着先锋和骨干的作用，还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国特别是粤港地区的革命斗争。但当时的梧州同时又是新桂系集团的“发祥地”之一，处于新桂系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新桂系对“梧州是另一派人工作”[②]的状况十分不满，更无法接受梧州工运持续深入发展的现实，随时都在寻找机会压制梧州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6年8月，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分会会员、省港罢工回梧工人李才、凌二妹、吴循，给梧州“仁生号”商行搬运货物时，因工资待遇问题和商行经理李庸钧发生争执。李庸钧将此事报告驻梧桂军第六旅司令部，请求派兵前来弹压。第六旅旅长韦云淞闻报后，立即派出军警赶至商行，将李、凌、吴3人拘捕入狱。随后，韦云淞一面授意梧州总商会及有关商号呈文诬陷李、凌、吴，一面给李、凌、吴定了一个“纠聚无赖，扰乱治安”的罪名，

①② 黄日葵：《广西政局之分析》（1926年12月），载《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2～1929.3），2页，中央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编，1982。

电呈南宁第七军司令部请予枪决。9月2日，黄绍竑的亲信参谋黄健民以第七军司令部名义复电梧州当局，下令处决李、凌、吴，制造了“三工友血案”。

“三工友血案”发生后，全市工人大感不平和愤怒。各行业工会纷纷致电省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澄清事实，严惩凶手，以慰死者。梧州工会代表联合会还派冯德予和郭华俊为代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投诉，呈请全总要求广西省当局严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切实保障工人群众的生命安全。

梧州市工人为三工友鸣冤伸雪的行动，很快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梧州三工友被害向全国发出通电，催促广西省当局严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及保证以后不再残杀工人。10月16日，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为此向全总机关刊物《工人之路》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梧州工人的行动，并警告新桂系当局：“在此星期内广西省政府未有完满之答复，梧州与广州工人必取相当之应付，假使不幸而至举行罢工，此为工人之最终要求，那时广西省政府及第七军第六旅应负其全责。”① 10月25日，中共梧州地委通过梧州市的25个行业工会，组织万余名群众集会，要求为三工友申冤，严惩凶手，抚恤三工友家属。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将请愿书及有关提案交付梧州军方代转广西省政府，限其一星期内办理。广西各地工会以及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集会，抗议新桂系当局的暴行，声援梧州工人的斗争。

同年底，在梧州工人的坚决抗争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之下，广西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被迫作出让步，接受了梧州各工会提出的处罚“三工友血案”的肇事者、抚恤死者家属以及通令军队今后不得再有摧残工友事件发生的要求。

“三工友血案”的发生，再次暴露了新桂系集团仇视工农群众、反对革命的反动面目。

---

① 《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10月17日。

三、排斥革命势力，破坏国共合作

新桂系为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极力排斥革命势力，打击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力量，阻挠和破坏广西的国共合作。

1925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国民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推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广西的建立，派遣中共党员陈勉恕等人到南宁开展活动，参加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的筹建工作。同年10月，又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委派中共党员粟丰、甘立申和国民党左派李贻荪等3人为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并指定粟丰为主任，到梧州改组已遭反动势力破坏的梧州市党部，建立统一战线组织。11月初，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济深、黄绍竑将该会移交给以粟丰为主任的改组委员会。此后，改组委员会开展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动员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等工作。同时，还发动革命群众参加国民党。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左派力量在梧州市党部中占据了优势。翌年1月，改组梧州市党部的工作全部结束。在新的梧州市党部中，当选执行、监察委员的9名成员里，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了5名，还有两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市党部宣传、组织、青年、工人、妇女各部部长，均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改组后的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实现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基层组织，并在当时梧州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但是，新桂系对国共合作在梧州的实现却很反感，对于“由广州派来梧州办党的青年娃娃则更看不在眼，也看不顺眼”。[①] 他们认为，“广西的江山

①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86～87页。

是我们自己打得来的"，[1]"底下你不能插手进来"。[2]所以，他们不仅力拒任何政治势力插足广西，还抱着抵制国共合作的态度，另外成立了一个苍梧县党部，与梧州市党部分庭抗礼，专干破坏统一战线的勾当。之后，又在梧州开办了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企图通过这个养成所培养其党务人员，以抵制广州方面派来的党务干部。

当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实现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时，新桂系排斥革命力量的倾向也愈来愈明显起来。1926年1月，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在选举省党部执行、监察委员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会拟定并经报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的候选人名单上，有中共党员陈勉恕、雷沛涛、朱锡昂、粟丰、李天和（后叛变）、张铮、李省群等人。但操纵会议的新桂系首脑为了"布置他们自己的党务势力"，[3]无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决定，在选举过程中极力排斥中共党员。结果，候选人名单上的6名中共党员，仅雷沛涛一人当选候补监察委员，其余5人均被排除在外。

为进一步排斥统一战线领导机关中的左派力量，是年9月，新桂系又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为依据，委任了一批"党务整理"特派员，在全省各地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攻击和清除各级机构和政治团体中的左派力量。其间，在新桂系集团的逼迫下，国民党左派陈协五和中共党员陈勉恕、李省群先后辞去了所担任的省党部农民部长和青年部长、妇女部长等职务。省党部商民部长、国民党左派陈立亚等人，也受到无端的指责与攻击。

此后，新桂系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打击进一步升级，公然围攻中

①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前后我的亲身经历的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4页。

②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86～87页。

③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88页。

共基层组织机关，拘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人。同年11月，由新桂系直接控制的苍梧县党部在梧州强行征收“冥镪炮竹捐”，遭到梧州商民的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废除苛捐杂税的市民运动。中共梧州地委因势利导，积极发动各界群众支持这个运动，掀起更大规模的废捐风潮。新桂系异常恼怒，下令梧州当局予以镇压。12月19日，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出动大批军警，袭击正在梧州东学塘举行的群众废捐集会，并包围了驻梧州兴仁巷四号的中共梧州地委机关和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梧州民国日报社、梧州工联会、梧州学联会、梧州妇联会等，逮捕了中共梧州地委书记、梧州民国日报社主任谭寿林和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梧州工会代表联合会委员长钟山、中华内河轮船总工会桂省第二分会委员长胡奕卿、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执委兼民船工会负责人蔡美利等5人。中共梧州地委等革命领导机关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废捐运动被迫中止。事件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迅速采取措施，恢复了梧州地委机关的工作，同时派周济和甘立申前往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控告新桂系的暴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对此十分重视，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召开中央党部执委会议，听取了周济的汇报，并作出责令广西省政府释放谭寿林等5人的决定。翌年3月，谭寿林等5人被送到广州释放。

新桂系为削弱中共在广西的领导和骨干力量，抵制中共力量在广西的发展，还于1927年春节后，以“慰问北伐军”的名义，将第七军后方政治部中的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20多人，组成北伐慰问队，由留在后方的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人黄日葵带领，赴武汉、芜湖等地劳军。待黄日葵率慰劳队抵达芜湖后，即被率第七军主力参加北伐的新桂系首脑李宗仁借故解散。

紧接着，新桂系又利用召开国民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对省党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洗”。这次大会从1926年底开始筹备，1927年3月15日在南宁正式召开。据当年的《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记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7人，其中仅有数名工、农运动的骨干。大会的主要目的

是“检讨过去党务工作，并选举第二届执监委员”。[1] 在新桂系首脑黄绍竑的亲自操纵下，大会通过了“将全省的田赋附加一倍，作为教育经费”、“彻底的整理党务，将所有跨党分子，并那些投机分子土豪劣绅一并清除出去”、“彻底实行本党的二五减租政策”等三项重要的决议案。[2]同时，选举黄绍竑、黄旭初、伍廷飏、盘珠祁、黄华表、叶光亹、俞作柏、李岱年、黄同仇、曾象贤、冯冠伦等11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苏民、刘嘉彤、叶怀青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黄蓟、朱朝森、陈锡珖、蒙民伟、黄琨山等5人为监察委员。省党部执行委员会除第一届所设各部之外，加设了党员训练部，由黄绍竑亲自兼任部长。其余各部人事也作了重大调整，由黄旭初兼任工人部长、盘珠祁兼任青年部长、黄华表兼任宣传部长、俞作柏兼任农民部长（不久辞职，以伍廷飏继任）、冯冠伦兼任商民部长、苏民兼任组织部长、刘嘉彤兼任妇女部长。改组后的省党部，19名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以及各部部长，几乎是清一色的新桂系骨干成员，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除俞作柏一人之外，全部被“清洗”掉。随后，省政府方面“亦因党的问题而局部改组”，[3]农工厅厅长俞作柏、教育厅厅长雷沛鸿等人相继辞职，“出洋考察”，农工厅被撤销。被黄绍竑称为国民党“清党的先声”[4]的这次“整理党务”行动，使“全省的党员，减少了一半，大约不到两万人”，[5]基本上排斥了全省各级党部中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改变了广西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阶级联盟性质，破坏了广西的国共合作。

四、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等地之后，日益走向反动的蒋介石

①②③④⑤ 《黄绍竑回忆录》，183、18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集团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他们一面不择手段地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封建势力，一面加紧纠集反革命同伙，尤其是拉拢已颇具军事实力的新桂系集团，准备联合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

新桂系在反共反革命的问题上，和蒋介石有着一致的立场与态度，并早有“自己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① 大干一场的企图。但当时新桂系还不具备单独举旗行事的能力和条件。新桂系当时的势力所及仅限于广西一省，也只有第七军的数万兵力，且分处于广西和北伐前线两地。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新桂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实力都还极为有限，在反革命同伙中还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号召力。总之，当时的新桂系欲公开反共反革命，“图谋大举”，光靠其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当新桂系的首脑们接到蒋介石采取反共重大行动的邀约时，立即积极响应，竭尽全力投人到蒋介石“清党”反共的策划与发动中去。

3月28日，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应蒋介石的邀约，从安庆赶到上海，先与一直在沪协助蒋介石从事阴谋活动的白崇禧相见，嗣后即往见蒋介石，向蒋提出“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的建议，并共同商议了“初期清党的部署”等问题。② 4月初，李、白和应蒋介石电邀从广西赶至上海的黄绍竑，一同参加由蒋召集的一系列秘密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以暴力手段“清党”反共，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大政方针和计划。

为保证“清党”反共行动的顺利进行，李宗仁抵沪晤蒋时，即电令第七军主力自芜湖迅速开赴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③白崇禧则协助蒋介石把不完全受他们控制的第二、第六军等部队调离，改由受他们节制的部队担任沪、宁一带的防务。同时，将卫戍南京倾向革命的部队缴了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捣毁了杭州市总工会等革命组织。接着，白崇禧以“不向总司令部报到，且

① 黄绍竑：《“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4页。

②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456、45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有反革命举动"[1] 的理由，派兵查封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驻上海的机构。又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名义，在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公开登载反共口号。8日，白崇禧出任"清党"反共行动的指挥中心"淞沪戒严司令部"司令，副司令为原北洋集团将领周凤岐。同日，在蒋介石的指派下，以蒋氏集团骨干成员吴稚晖、蔡元培、陈果夫等为首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按蒋的规定，该委员会具有决定上海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及指导当地党务的权力，白崇禧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黄绍竑和邓泽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护党救国"通电（青电），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号召各地反共分子"披发缨冠，共图匡济"，为"清党"效力。这实际是蒋、桂联合发出的反革命政变动员令。之后，黄绍竑等随同蒋介石离沪赴宁，准备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当时仍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一切基本就绪后，蒋介石于11日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正式发出发动反革命政变令。12日凌晨，在白崇禧等人的指挥下，大批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武装流氓和反动军队，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继而，又对上海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各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15日，上海工人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

新桂系不仅在上海参与策划和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同时在广西布置和持续展开大规模的"清党"反共行动。4月初，上海的"清党"秘密会议结束后，黄绍竑即给留守广西的黄旭初（时任后方七军参谋长兼第四旅旅长）等人发来急电，告以"清党"决策，授权黄旭初等布置广西的"清党"行动，并命令驻百色的刘日福部进攻东兰县农军。黄旭初等接

① 半粟编著：《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增订本），601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

电后，立即在南宁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由黄旭初、朱朝森（省政府秘书长)、黄华表（省党部委员、代理宣传部长)、黄剑鸣（后方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伍廷飏（后方七军第五旅旅长)、吕竞存（后方七军军部副官长)、蓝呈琪（后方七军军法处处长）等9人组成的广西“临时清党委员会”,① 并决定于4月12日，以南宁为中心，在全省分区实行“清党”。同时，推定龚杰元、黄华表、伍廷飏、黄同仇分别为梧州区、南宁区、柳州区、桂林区的“清党”负责人。随后，相继发出《李宗仁黄绍竑电令通缉共产党》、《广西省政府电告清党运动之目的》、《广西省政府训令各县暨各警察局对于反动秘密机关及职员应格外注意侦查拿办文》、《广西省政府训令民政司法军事农工四厅并饬所属切实严查共产党机关悉数解散并分别逮捕共产党分子文》、《广西省政府训令各厅转饬所属严密查缉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之共派学生文》等一系列文电，密令各地“以非常手段”，“将所有共产分子严拿看管”，“次第肃清”。② 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以蓝呈琪为庭长，李天和、王飞、何隽源为审判员的“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专门“审判”和“处置”被捕的革命者。

12日凌晨，与上海方面反革命政变同时，新桂系突然在南宁动手，开始了全省范围的“清党”反共行动。南宁区“清党委员会”主任黄华表按照部署，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广西省党部、广西农讲所、《革命之花》编辑部、南宁军校、南宁市党部、南宁市总工会、省立一中、省立三师和南宁印刷厂等处，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4月18日、5月4日、8月31日，搜捕逐步扩大到全市范围。据不完全统计，新桂系反动当局在南宁持续进行的“清党”搜捕行动中，共逮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革命者12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雷沛涛、罗如川、邓哲、张胆等22人，共青团员邓匡、阮锦、刘汉武、林汉泉等20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雷天壮、梁六度、陈立亚、高孤雁等10多人。并且通缉国民党左派人士

① 1927年7月改称广西清党委员会，改以黄绍竑、黄华表、伍廷飏、黄旭初、蒙民伟、陈锡珖等为委员。

② 《清党丛书》，50页，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传部，1927。

黄家植、陈协五等10多人。9月初，又逮捕了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罗少彦。9、10月间，新桂系大开杀戒，在南宁先后三次屠杀被捕的革命志士。中共党员雷沛涛、罗如川、邓哲、张胆、莫大、李仁及、何福谦、张铮、周飞宇、周国杰、冯荫西，共青团员邓匡、阮锦、刘汉武、林汉泉，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进步人士高孤雁、雷天壮、周锡桓、梁六度、陈立亚、梁西园、梁砥、秦霭云、卢宝贤等20多人相继遇害。另外，有4人在狱中被折磨致死。罗少彦以及莫万（即莫文骅）、吴有良（即吴西）等数十人被判徒刑。南宁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市工人纠察队、省港罢工后援会等革命组织被解散或查封。

梧州是新桂系“清党”的重点地区之一。4月17日，在以龚杰元为首的梧州“清党委员会”的指挥下，梧州驻军第六旅和苍梧县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在梧州海员工会等行业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苍梧书社和省立二中等处大肆搜捕革命者。中共党员钟山、陈万源（即陈漫远）和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共25人被捕。9月7日，龚杰元侦悉重建的中共广西地委准备在梧州、平南、桂平等地举行“中秋起义”的计划后，出动军警突然袭击广西地委和梧州市总工会等机关，并在全市范围继续搜捕革命者。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长黄士韬（化名韩略）和梧州市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以及革命群众共100多人被逮捕。10、12月，经第七军司令部和省“清党委员会”批准，梧州反动当局分两批枪杀了40多位被捕的革命者，其中有中共党员廖梦樵、黄士韬、林培斌、王卓卿、梁二、陈六、黄荣坤、覃超荣、容完成、肖国祥、钟山、吕善修、戴锡禄、覃霭如，共青团员李素秋、陈丽卿、胡宝凤、刘柏奎等。共青团员、梧州工读学校学生胡宝凤牺牲时，年仅15岁。另外，陈漫远、全永翘、苏小芬等被判徒刑。谭寿林、甘立申、周济、龙启炎、李省群、陈素虚等约200人被通缉。

4月中旬，以黄同仇为主任的桂林区“清党委员会”成立，“清党”行动随即在桂林展开。下旬，黄同仇以开会为名，在桂林城防军团部诱捕中共桂林县支部干事会书记李征风、宣传干事苏鸿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省党部青

年部长、省立二师校长裴邦焘。7月至10月，桂林反动当局又分别在桂林民国日报社、教育日报社、省立二师以及平乐、恭城等地逮捕了谢铁民、汤显达、李芬华、廖骏、赵世杰、赵世恪、黎秀英、罗瑞成等中共党员，廖骥、李淑芬、汤景莹、何杰龙、于魁、滕钟年、陈致信、莫家贤、王骏、徐树绩、高桂涵等共青团员，以及革命群众数十人。10月14日，黄同仇根据第七军司令部法字278号令，在桂林丽泽门外刑场枪杀李征凤、苏鸿基、谢铁民、赵世杰、汤显达、李芬华、廖骏、赵世恪和裴邦焘等18位革命志士。另有何杰龙、于魁、滕钟年等15人被判徒刑，36人被留候“查办”。

7月，柳庆区“清党委员会”在柳州成立，主任伍廷飏，副主任谢康。9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伍廷飏等宣布柳州全城戒严，出动大批军警，到北关外雷王庙的农运训练班等处搜捕革命者。中共党员关育梧、共青团员覃禧章、邓毅、卢种德和农训班的学员共30多人被捕。10月，转移到宜山等地的中共柳州支部成员谭均任、熊秀民和共青团员陈秉森等也先后被捕，并被押送到柳州监禁。同月中旬，熊秀民被杀害，同时就义的还有国民党柳城县党部的左派人士徐耿新。谭均任、关育梧和陈秉森、覃禧章等7人被判徒刑。此外，当时的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书记陈岳秀于同年6月被捕，后被伍廷飏“礼送”回原籍岑溪县。[①]“清党”后，柳州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全部遭受破坏。

同年4月下旬，驻扎百色一带的第三旅旅长刘日福接到“清党”密令后，当即调遣兵力经凌云、凤山进攻东兰，但遭到韦拔群农军的英勇反击。5月，刘日福突然出动军队包围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的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逮捕办事处主任陆巩彰，后将陆押解百色处决。8月，升任师长和田南“清乡”督办的刘日福又奉命再度进攻东兰农军，在东兰各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共杀害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100多人，烧毁农民房屋200余间，掳掠牛马180余头（匹），劫掠财物难以计数。[②]

① 1929年陈岳秀在广东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

② 覃联魁：《“四·一二”事变前后东兰两次遭受摧残见闻》，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66、77页。

地处边陲的龙州，也成立了以冯冠伦为主任、区文俊为副主任的“清党委员会”，并于5、6月间展开大搜捕活动。6月3日，镇南道农运办事处主任陈霁、指导员易挽澜（均为中共党员）在龙州被捕。不久，农运骨干黄怡芬、黄志忠、蒙天启等人也遭逮捕。9月14日，陈霁等5人被杀害。许多农运干部为躲避国民党的疯狂捕杀而出走，左江地区农运遭到严重摧残。

新桂系在分区“清党”，捕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同时，还颁布了“清乡”条例，在全省实行分区“清剿”和“清乡点甲”，即“将全省划分区域，并由省政府任命清乡总办，或由各师长司令派遣军队，会同各县团局分途围剿”。[①] 新桂系企图通过“清党”和“清乡”，一举清除广西的革命力量。于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捕杀行动，很快便从各主要市、县扩展到全省的农村城镇。当时，平南、桂平、平乐、邕宁、凌云、凤山等地，都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清乡”拘捕或洗劫的事件。

同年10月，随着“清党”、“清乡”的逐步深人，新桂系在省党部和各地党部内设置“党务整理委员会”，指派了一批党务整理特派员，并分置18个组，赴各地重新整理党务，限定6个月左右完成任务，以严密和健全反共反革命的组织机构。新桂系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在全省范围的大规模“清党”、“清乡”表明，新桂系集团已完全背叛国民革命，投人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怀抱，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新军阀。

五、广西人民武装反抗新桂系屠杀政策的斗争

武（宣）平（南）桂（平）暴动

新桂系“清党”反共、背叛革命后，全省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中共广

① 黄绍竑：《全省政治概况》，载《新广西》，1929（3），第10号。

西各级组织和各种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八桂大地阴云笼罩，一片腥风血雨。

面对新桂系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广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对新桂系反动派进行英勇的反击。在反对新桂系反动派屠杀的斗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的原苍梧道和田南道[1]的农民武装斗争。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桂平、平南、武宣三县的农民武装。1927年4月下旬，平南、桂平两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已开始酝酿整顿革命武装，发动群众，反抗新桂系反动派的“清党”、“清乡”。5月，在中共广西地委负责人邓拔奇、宁培瑛等人的领导下，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特派员、中共党员苏其礼和中共桂平县支部成员古天民及邓誉声等人，在桂平县宜二里盘龙村成立了“广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部署三县农军的联合行动。

5月8日，桂平宜二里、姜里农军1000多人开始行动，围攻桂平南木反动土豪陆宝珊、黄秋甫的团局武装，拉开了武、平、桂农军暴动的序幕。农军首战告捷，毙敌数人，没收谷子一万余斤，并把陆、黄的巢穴付之一炬。次日，农军乘胜攻击姜里劣绅李桐崖团局。中旬，苏其礼、古天民、邓誉声等调集武、平、桂三县农军3000多人，分三路向桂平三江大坪进发，攻打桂平最大的土豪刘瑾堂。双方交火五昼夜，正当农军准备挖地道爆破刘宅时，驻扎桂平县城的新桂系军队奉命前来弹压。新桂系军队以赔偿农军损失为条件，诱使农军撤出战斗，并在途中逮捕了农军代表邓誉声，后将邓押至县城处决，使农军的这次行动受挫。

为保存力量，农军主动转入平南鹏化山区活动。同时成立“武平桂七区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作为联络和指挥三县农军的领导机构。5月下旬至6

① 广西于1926年撤销道制，但当时人们仍习惯使用原来的道制区域称谓。

月上旬，苏其礼等又率武、平、桂七区[1]的瑶壮汉农军数千人，在平南的大同、马练等地开展打击反动团局的斗争，先后两次击溃前往“进剿”的新桂系军队。不久，中共桂平县支部负责人古天民等在桂平金田附近的浔排村开会时，遭新桂系军队袭击，钟德庆等4名农军骨干牺牲，6人被捕（后有两人后来被杀害）。

7月下旬，浔州四属农军领导人黄一平与苏其礼、胡奕卿、余济卿等计划再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暴动，并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俞作柏的支持。但是，当农军到北流接运俞作柏支援的枪支弹药时，在桂平被新桂系军队密探侦悉，接运弹药的44名农军战士全部被捕遇害，农军被迫放弃再度组织暴动的计划。

武、平、桂暴动是广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新桂系屠杀政策的先声。暴动在强敌围攻下虽然失败了，但它表明广西的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不屈服于反动派屠杀的斗争精神，打击了新桂系的反动统治，鼓舞了人民，揭开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平南“劳五暴动”

1927年8月至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斗争总方针，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平南“劳五暴动”，就是这一系列武装起义中的一次。

1927年9月，为牵制新桂系军队入粤，并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回师广东，中共广西地委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准备在梧州、平南、桂平等地举行“中秋起义”。但起义前夕，计划为梧州反动当局侦悉，中共广西地委机关和梧州市总工会等遭到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等被捕遇难，“中秋起义”行动夭折。

同年10月底，中共广西地委委员邓拔奇转移到平南、桂平农村，会合宁

[1] 指武宣的东乡、通挽，桂平的宜一、宜二、姜里，平南的大同、鹏化。

培瑛等人，在桂平县白额、烂垙两村重建了广西地委，由邓拔奇继任书记，宁培瑛、苏其礼、黄一平等为委员。广西地委重建后，即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以土地革命和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为斗争口号，发动广西的农村武装暴动”① 的指示，制定了“冬暴”计划。随后，地委成员们便在浔江一带组织力量，开展以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活动。同时，组织桂平、平南、武宣等县农军，建立农民自救团，并开办骨干培训班，为“冬暴”做准备。

12月，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广西地委，要求广西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以响应广州暴动，并派遣军事干部陈平来广西协助工作。广西地委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在平南、容县交界的劳五区（亦称平南县劳五里新隆区）实施“冬暴”计划，并指派宁培瑛前往组织领导。宁培瑛和桂平、容县的部分党员干部先后来到劳五区后，一面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宣传工作，一面抓紧发动群众，整顿训练农军武装，准备暴动。

是月下旬，暴动开始。在宁培瑛的指挥下，劳五农军小分队突然袭击平山团局，击毙局董、局丁5人，击伤2人，并缴获其枪械。农军在暴动中，响亮地喊出了“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联合起来，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广西”等一系列革命口号。②

“劳五暴动”使新桂系反动当局十分震惊，当即令平南等地驻军前往镇压。1928年1月中旬，驻平南的桂军营长兼平南县县长马翼汉纠集部众及容县、藤县、平南等县的反动武装共1200余人，进攻劳五区农会和暴动农军的驻地新隆。当时，新隆仅有宁培瑛等农军领导人和数十名农军战士留守驻地，农军的大部分已被派往各区活动，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宁培瑛、李修其、陈平、陈孟武等农军领导人沉着应战，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指挥留守驻地的农军战士抗击敌军，与敌军激战了三天两夜，打死打伤敌军30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33、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我们的口号》第19条，原件现存广西博物馆。

多人。到第三天，敌军用大炮轰击农军指挥部参赞庙炮楼，农军力不能支，李修其等20多人阵亡，宁培瑛、陈平、陈孟武等10多人被俘牺牲。

劳五暴动由于领导者缺乏斗争经验，寡不敌众，最后失败了。但是，这次暴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为响应广州起义而举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同时也是广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一次反击新桂系屠杀政策的英勇斗争。特别是这次暴动把建立广西苏维埃政权作为斗争的目的，公开使用了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斗争口号，为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广西革命斗争指出了新的方向，拉开了广西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序幕。

左右江各县的武装起义

原田南道所辖的右江沿岸各县，是新桂系反动派“清党”、“清乡”的重点地区之一。但右江沿岸各族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屠杀的淫威所吓倒，他们在中共恩奉特支的领导下，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同反动派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为了确定对策，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中共恩奉特支书记余少杰和严敏等人召集东兰、凤山、恩隆（今属田东县）、奉议（今属田阳县）、果德（今属平果县）、思林（今属田东县）等县的农运骨干，在恩隆县七里山区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以武装暴动反抗新桂系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同时决定，在没有和上级党组织恢复联系之前，成立以恩奉特支为领导核心的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又称“三南总部”），以统一领导田南、镇南、南宁三道的革命斗争。为号召群众，会议推选国民党左派人士俞作柏为该委员会的名誉主席，选举余少杰、严敏、韦拔群、陈守和、梁鹤如（后叛变）等5人为常务委员。随后，余少杰等又到奉议县花茶屯召开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会议，作出了统编各县农军为右江农民自卫军的决定。并决定由韦拔群任右江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领导东兰、凤山、凌云、百色等县农军；黄治峰任第二路农军总指挥，领导恩隆、奉议等县农军；余少杰、黄书祥分任第三路农军正、副总指挥，领导思林、果德等县农军。

此后，“三南总部”领导的武装反抗新桂系反动派的斗争，以“仑墟暴动”（又称“二都暴动”）为起点，在右江沿岸各县相继开展起来。

“仑墟暴动”是在驱赶“清党宣传工作团”事件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新桂系实行“清党”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其背叛革命、屠杀革命者的罪行，成立了“清党宣传工作团”，下辖数十个工作队，分派到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的地区进行反共宣传。是年7月下旬，“清党宣传工作团”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独立队奉命到奉议县的仑墟活动。奉议县农协领导人黄治峰等得到消息后，事先做了驱赶“清党”宣传队的布置。27日，“清党”宣传队到达仑墟，进行以“清党运动之意义”为内容的反动宣传时，遭到当地群众的反对和驱赶，最后在当地团局武装的保护下，狼狈地窜回田州镇。事件发生后，“三南总部”负责人余少杰等决定趁热打铁，在此基础上举行武装暴动。

8月9日，暴动开始。右江第二路农军200余人，在余少杰、黄治峰的指挥下勇猛出击，生擒第四区团总黄锦升等人，消灭部分团局武装。随后，召开有仑墟、甫墟两乡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了作恶多端的黄锦升。接着，农军又袭击韦宁村黄曹山团局武装，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驱赶“清党”宣传队和仑墟暴动，震惊了反动当局。是月27日，新桂系军队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在县长曾伯龙率领的警团武装配合下，进攻农军驻地花茶屯。余少杰、黄治峰率领农军迎击，与敌人激战两昼夜。因敌众我寡，农军最终失利，被迫转移到平桃、朔乐、甫墟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仑墟暴动失利后，“三南总部”没有退却，又在果德、镇结（今属天等县)、思林、那马（今属马山县)、向都（今属天等县）等县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

同年七八月间，右江第三路农军副总指挥黄书祥参加花茶屯会议回到果德后，得知县长黄尧封正在策划破坏县农会的阴谋活动，立即带领农会干部转移雅隆乡下朗屯，并根据花茶屯会议精神，决定以攻打县城为目标，发动武装暴动。8月21日，黄书祥率领右江第三路农军约1000人，分3路攻打果德县城。数千名群众闻讯后，也纷纷赶来助战。守城县警不堪农军重击，县

长黄尧封弃城逃往隆安，农军占领县城，并释放被关押的农友和农军战士，开仓济贫。22日，国民党果化驻军奉命反攻果德。为保存力量，黄书祥率农军主动撤出县城，转移至感墟、新墟一带活动。

9月5日，思林县农军指挥黄永达根据“三南总部”的指示，率右江第三路农军200余人袭击镇结县城，营救被捕的镇结县农会领导人张太愚。农军攻占县城后，发现敌人已将张太愚转押至思林县城。7日，余少杰亲自参加行动，与黄永达率农军300余人转攻思林县城，并智破县署，俘县长黄懋森及县党部、县团务总局的头目，缴获枪械20余枝。但张太愚早已被敌人押走，营救未果。8日，国民党平马镇驻军反扑思林，农军主动转移果德县感墟、新墟一带。

右江农军相继暴动并连克数县城，使新桂系极为惊恐，黄绍竑急令各地驻军加紧“清剿”。10月至11月，刘日福所部两次进攻新墟、感墟农军驻地。余少杰、黄书祥等调集农军主力迎击，大败来犯之敌。12月，因广州起义爆发，黄绍竑将果德等地驻军调回南宁戒备。余少杰等乘右江守备空虚，迅速指挥农军出击，再度攻占果德县城。次年1月，国民党军开始反扑，以4个营的兵力，在果德、思林两县警团的配合下，进攻果德。由于敌强我弱，农军化整为零撤出果德，分散到那马、向都、思林、果德等县的山区，坚持游击战。

黄书祥转移到那马定罗区活动后，于1928年6月以定罗区农军为主体，又在那马县揭竿起义。次年7月，黄书祥率那马、果德两县农军500多人攻占那马县城周鹿镇。随后，成立了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但不久，国民党那马县长纠集反动武装两次反扑县城。农军主动撤离县城，那马县临时革命工作委员会也随同转移到州墟乡坡马屯活动。

此外，“三南总部”陈洪涛和向都县农军领导人黄绍谦，也根据总部的部署，于1928年1月在向都县巴麻屯举行暴动。8日，陈洪涛、黄绍谦率农军数百人进攻向都县城。县长黄德珍弃城逃跑，农军进占县城，并缴获枪支数十枝，释放被关押的群众30多人。数日之后，国民党军反扑，农军主动撤回

巴麻。同年夏，国民党军“进剿”巴麻，农军被迫退往向都、思林交界的山区和滇桂边界地区。

1928年春夏间，中共恩奉特支和省特委恢复联系后，“三南总部”改变了过去“单纯军事运动之错误”，① 拟订了一个实行分区领导，在各地普遍组织革命农民联合会的斗争计划。经过努力，建立了恩（隆）奉（议）、思（林）果（德）、思（林）向（都）三个区革命农民联合会。区革农会下设宣传、组织、军事、财政、交通等五部，分别领导各县的革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其中，恩奉区的革农会曾发展到100余个村屯。不久，被选为中共广西特委委员的余少杰和潘宪甫（剑雄）、李正儒等赴梧州、香港，向省特委和广东省委报告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广东省委和省特委听取汇报后指示，在田南道的革命斗争中，要注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贫农斗争的领导，加紧宣传土地革命。9月间，余少杰等分途由港返回右江。余少杰途经南宁时，被叛徒梁鹤如侦悉告密，乘船行至隆安县时被国民党军拦截逮捕，后被押到南宁，于12月被杀害。潘、李避开敌军，携带上级党组织的文件回到右江。此后，中共恩奉特支和右江革命农民联合会的工作由严敏主持。

这一期间，在右江沿岸各县革命斗争的影响下，原镇南道属的左江沿岸部分地区也举行了武装反抗新桂系反动派的斗争。

1927年11月1日，为反对新桂系的屠杀政策，邕宁县吴墟、苏墟等区的农民自卫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整编各区乡农民自卫队。会后，成立了邕宁县农民自卫军大队，唐光天为大队长，文树芝为总指挥。5月，农军在苏墟区花鱼山建立了游击据点，并与左县（今属崇左县）、养利（今属大新县）等县的农民武装相呼应，不断袭击左县及附近的反动武装。次年1月，唐光天应养利县农军之请，率邕宁农军主力150多人，赴养利、左县参加反击桂军许生辉团“围剿”的斗争，歼敌一个连后，乘胜攻占了左县县城。

1928年3月，“三南总部”派陈丙天到龙茗县（今属天等县）开展活动。

---

① 《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38页。

陈丙天等到龙茗后，与当地农运骨干汤学礼等秘密组建农民革命武装，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随着农民武装的不断扩大，12月成立了龙茗县农民起义军大队。次年7月，农民起义军与养利、雷平（今属大新县）等县农军联合行动，曾攻克龙茗县城。

1928年4月中旬，养利县农军1000多人，在冯飞龙的带领下，举着镶有犁头图案的农民自卫军红旗，围攻养利县城，并隔断了城内的给养来源近10天。22日，反动当局调遣左县、龙茗、向都、镇结等县团局武装增援养利，农军寡不敌众，主动撤出战斗。5月，养利农军又组织力量攻打雷平县城，但未成功。

同年11月，原南宁军校学生、共青团员何焜等人，在万承县（今属大新县）九甲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不断袭击当地的土劣武装。此后，万承县农军还多次配合养利县农军，开展反“清乡”斗争。

东兰、凤山农军反“清剿”斗争

新桂系集团极为仇视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一直在设法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他们“清党”反共后，立即对“兰农惨案”重新定性，撤销原对“兰案”所作的处置决定。从1927年8月起，不断增派军队，对东兰、凤山地区发动“清剿”。

为反抗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韦拔群在新桂系实行“清党”、“清乡”后，即领导东兰、凤山地区的农民武装，开展打击反动团局武装的斗争。花茶屯等会议和“三南总部”成立后，韦拔群又按照总部的决定，将东兰、凤山、凌云等地的农民武装统编为右江第一路农军，加强了对东兰、凤山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领导。

8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犯，韦拔群在东兰县兰木乡召开农军紧急军事会议，宣布成立右江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部，韦拔群亲自担任总指挥，并将东兰、凤山、凌云和百色的农军编为三个团、一个独立大队，由牙苏民、黄大权、黄松坚（黄明春）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团指挥，黄太尤任独立大

队指挥。同时，决定在国民党军立足未稳、尚未对农军形成合围态势之前，集中农军主力（约2000多人）攻击已进占凤山县城的刘日福部黄明远营。

从8月15日至9月中旬，右江第一路农军各部协同行动，扫除了凤山县城外围之敌，将黄明远营围困在凤山县城内。但是，由于农军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持续战斗10多天而未能消灭城内之敌。10月初，正当农军加紧围攻凤山之时，国民党第五师副师长朱为珍按黄绍竑的部署，率所部龚寿仪团及第四师林廷华团等部，分从百色、田州、河池，向东兰、凤山地区进逼，增援被困凤山的黄明远营，并对东、凤地区实行重点“清剿”。农军被迫分兵阻敌，但接连受挫，损失较大。在前后受敌压迫的情况下，韦拔群下令农军各部分别撤出战斗，退入东兰的西山、中山、东山等山区，并将第一路农军总指挥部设在西山平峒，与敌军展开游击战。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对西山、中山、东山实行分区“清剿”，相继占领东兰县城和武篆等地。黄绍竑为配合东、凤地区的“清剿”，又从宾阳、武鸣一带的驻军抽调兵力，进攻都安县东区农军。东兰、凤山、凌云等县的反动团局武装也趁机“围剿”各地分散的农军武装，疯狂地捕杀各地的农会干部和农运骨干。为尽快消灭农军武装，朱为珍于11月22日在东兰县城召开“第一次东兰全属团务会议”，要求各地抓紧“搜剿”农军武装。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清剿”军，韦拔群冷静地分析当时的形势，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与策略，把农军编成精干的暗杀队，分散到东兰、凤山、凌云、百色及巴暮、扬州等地，开展游击，运用夜袭战、地雷战、伏击战等战术，不断歼灭小股敌军和地方反动团局武装，并逐步恢复和壮大农军的力量。

1927年底至1928年初，新桂系黄绍竑乘广东政局动乱，联合李济深攻粤，省内“清剿”因而有所松弛。韦拔群抓住战机，重新调整力量，主动出击。从1928年3月起，连续攻占东兰县城附近的朗团、尾谷、那尧等村，围歼了兰泗的反动团局武装，击毙团局头目韦钟璜。6月，韦拔群又趁龚寿仪团主力撤回百色之机，围困东兰县城。至此，新桂系对东兰、凤山地区的

“清剿”宣告失败。

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广西的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新桂系的屠杀政策，粉碎了反动派武力“剿灭”革命力量的企图。虽然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这些起义大都遭受挫折或失败，但相当一部分革命骨干和武装力量或分散活动，或转移山区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的火种。通过这些武装起义，广西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锻炼，逐步积累了斗争的经验，为后来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广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六章　新桂系统治初期的各项建设

新桂系在广西建立统治时，旧桂系留给他们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城乡破败，经济凋敝，百姓贫困，社会混乱。面对这种局面，新桂系一面改编军队参加北伐，一面整理省政，安定社会。省局稍定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金融、改革财政、修筑公路、建设交通、创办工厂、发展实业、设立农林机构、改良农林业、恢复文化教育等等。1927年新桂系虽然在政治上反动起来，但为了巩固其新生政权，发展实力，他们务实进取，锐意革新，积极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广西缺乏建设人才，新桂系设法延揽省外专家学者和在省外工作的广西籍人士来桂参加建设。一批专家学者先后到广西各建设部门或高等学校任职和工作。新桂系的各项建设，因财力和技术的限制成效并不很显著，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公路建设，初步沟通了邕、柳、桂、梧和重要城镇，建立了几家近代化工厂，各级各类教育得到较快的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新桂系的各项建设促进了这个时期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统一行政，整顿吏治

广西统一前，各地政务多为拥兵自重的军人所把持，政出多门，政务混乱。新桂系执政后，当务之急是整顿全省行政，统一政令，“严禁军人干政”。[①] 1925年9月，新桂系成立广西省民政公署，作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推举黄绍竑任民政长，主持全省行政。民政公署内设政务会议，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协助民政长分管全省政务。省民政公署制定了行政会议条例，防止事权过分集中或分散的漏弊，以保证全省民政的统一管理。

1926年3月两广统一后，新桂系正式归附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依照两广统一案，新桂系按广州国民政府颁发的省政府组织法，于6月1日撤销广西省民政公署，改为广西省政府，实行国民政府的政务管理制度。这是广州国民政府统治下最先成立的省政府。因李宗仁、白崇禧率第七军主力出征北伐，改组省府后，黄绍竑任省务会议主席兼财政厅长，粟威任民政厅长，甘浩泽任教育厅长，盘珠祁任建设厅长，朱朝森任省政府秘书长。同时决定，全省一切重大决策由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以统一政令和保证军政一致。1927年2月，新桂系又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调整省政府机构，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粟威、朱朝森、俞作柏、伍廷飏、雷沛鸿、黄蓟等9人担任省政府委员，黄绍竑兼军事厅长，粟威兼民政厅长，朱朝森兼司法厅长，雷沛鸿兼教育厅长，黄蓟兼财政厅长，俞作柏兼农工厅长，伍廷飏兼建设厅长。

新桂系还对全省的行政区域和县级行政作了调整。1917年以来，省以下实行道制，划分桂林、柳江、南宁、苍梧、镇南、田南六道。1926年，新桂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2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系废除道一级行政机构，将全省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但无政府机构，各县实际上是由省政府直接统辖，实行省、县两级行政管理制。1927年11月，广西省政府委员会议决公布《广西各区行政督察委员会暂行条例》，决定在镇南、田南、柳江、桂林等各旧边远道属设置行政督察委员会，直隶于省政府，督促及指导所辖区一切行政，考核其成绩。1928年先设柳江、镇南行政督察委员会。这是广西设置专署之始，但不久又于1929年先后裁撤。1928年，新桂系加强县政建设，颁布了《广西各县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规定每县设县长一名，机构酌量繁简，大县设财务、公安、建设、教育四局，小县设财务、教育两局。同时，新桂系针对当时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持土司制度的情况，继续推行辛亥革命以来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1927年11月，广西省政府委员会决议通过广西各土属一律改流方案。次年2月，全省各土属奉省政府令改流。忻城土县派流官主持县政，改名为忻城县；太平、安平、下雷三土司合并置县，称雷平县（今属大新县）；上龙和金龙两土司合并，置上金县（今属龙州县）。至此，广西的“改土归流”全部结束，全省统一了县政。

新桂系在整顿全省行政的同时，为适应其新政权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力进行吏治改革。首先将旧桂系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陈旧、迂腐无能和贪赃枉法的旧官吏逐步淘汰，提拔和任用了一批拥护新政权、作风新颖、精明强干，具有近代文化知识的中、青年官员。为了提高官吏的素质和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充任政府官员，1926年8月设立广西课吏馆，黄绍竑兼任馆长，黄华表任教育长，专事全省县知事、科长的考核与训练工作。同时，制定了县知事条例，“规定县知事人选，要回避本籍，非万不得已，不用本县人”。[①] 1927年3月，广西课吏馆改组为广西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仍由黄绍竑兼任所长，黄华表为教育长，招收县一级行政人员培训，以提高其行政管理水平。同年8月，广西按国民政府通令规定，改县知事为县长。10月，在

① 《黄绍竑回忆录》，13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南宁成立广西县长考试委员会，实行县长考试制度，按考试成绩优劣选取学员，进入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学习吏治知识，然后派往日本、菲律宾等国或分赴广西各地考察、实习，最后派充县长或其他行政职务。通过训练和考核选任官员的办法，是新桂系开明和进步的行政举措，当时在全国各省中能够这样做的是不多的。这一措施使当时广西各级官员的思想作风和行政管理水平大为改观，加强了新桂系的统治。

二、整顿金融和财政税收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经济落后，财政向来难以自给。20年代初以来连年战乱，金融财政混乱不堪。旧桂系垮台后，陆荣廷、沈鸿英等强行发行的既无抵押又无担保的数千万元纸币、军用券，已成废纸。一些投机分子趁机私铸各种成色低劣的银毫投放市场，商民难以辨认，纷纷拒用。新桂系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首先是金融财政问题。因此，在新桂系整理省政的各项措施中，重要的一项是整顿金融和财政税收。

在金融方面，针对金融市场极度混乱，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正常开展的问题，先从统一流通货币入手。1926年1月，新桂系当局在梧州成立广西造币厂，委田钟祥为厂长，铸造和发行统一形式与成色的广西嘉禾二毫银毫，取代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形式不一、成色低劣的各种银毫，使全省的币制逐渐统一。同年5月，在梧州成立广西银行总行，委黄维、廖乔松为正、副行长。之后，相继发行5元、1元、5角、2角、1角五种纸币，共1700万元，以此折兑收回市场上的杂色银毫。同时，新桂系政府还根据当时广西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广东的情况，通过广州国民政府，实行了统一两广货币的政策，进一步安定了全省的金融市场。经过一番治理和整顿，初步统一了全省的货币流通体制，使原来异常混乱的金融市场逐步得到稳定。新桂系以

成立广西银行为开端，逐渐控制全省金融，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桂系的官僚金融资本体系。

新桂系整顿金融稍有头绪之后，即着手整顿财政税收。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新桂系就已对财政税收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是统一全省的财政收支。1927年新桂系决定彻底整理全省财政税收。广西省政府成立了整理税务委员会，专门研究和制定税收的政策和办法。从1927年7月开始调整和改革税收制度。首先，省政府发出通令，规定缴纳国省两税，一律以征大洋为本位，如缴纳小洋（毫洋）者，加“二五伸算”（即每元加收2角5分）；各机关经费原定之预算，按小洋八三三折合大洋核发。其次，对百货统税实行改革。其内容主要有：第一，废除前清时代一直沿用下来的厘金税制，实行一次征收制（一次完税法），取消重征叠税率。规定凡过往之商品，向政府完纳一次税款后，即可通行全省交易。第二，废除包税商制，实行新税则，采取从价法，列为7等定税，即将商品分为7等，定税征收。第三，裁撤并档税局。将全省原有30个税局，裁并为16个，旧有的梧州矿税局和浔梧蚕丝税局也一同裁掉。另外，省内原有府关税厂15处，均全部裁撤。第四，废除比较额，实行实收实解，并随时派员密查。此外，开始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征收赌捐（赌馆、赌场营业税）、花捐和鸦片烟税（又称土膏税、土药税或新货税），并设有专局，明定章程，订出税则，正式列入省政府的财政预算。为了掩人耳目，新桂系将赌捐和鸦片烟税称“防务经费”和“禁烟罚金”。

新桂系对全省田赋也开始整顿。1928年8月，广西省政府成立清理田赋总局，以财政厅长黄蓟兼任局长，进行实地清丈田亩，整理地籍，计划3年内完成。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清理田赋工作中断。

新桂系整顿金融和财政税收，初步治理了连年战乱造成的金融财政混乱的状态，收拾了旧桂系遗留的烂摊子，促进了省内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安定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些整顿和改革，尤其是对鸦片烟税的整顿，新桂系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明显增加，缓解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经费匮乏的困难。据统计，1925年，即新桂系政权建立的当年，全省财政收入为600

万～700万元，1926年增加到1600多万元，[①] 1927年增至2200多万元。[②]

三、兴筑公路，建设邮电

新桂系的首脑们富有远见和进取的精神，他们在筹划各项建设中，“认定整理交通，为改进百政之基础”[③]，只有改变山川梗阻、道路崎岖的落后状况，才能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巩固政权。当时全省仅有旧桂系时期修筑的邕（宁）武（鸣）、龙（州）水（口）、龙（州）南（镇南关）三段公路，共长140公里，而且三路互不连接，交通极为不便。因此，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即视修筑公路为建设广西的当务之急，组织力量筹划全省的公路交通建设。

1925年秋，在黄绍竑的亲自主持下，省民政公署建设厅拟定了《全省修筑公路网》规划，提出修筑南宁经柳州、桂林至黄沙河，南宁至龙州，宾阳经玉林、容县至戎墟，玉林经陆川至盘龙，荔浦经平乐至贺县八步等五线的计划。

与此同时，一批官办路局和民办汽车路公司先后成立，并陆续拟订出柳州至石龙、八步至公会、桂林至荔浦、北流至玉林、玉林至陆川盘龙、贵县至玉林、宾阳至贵县、南宁至宾阳、容县至武林、北流至容县、荔浦至八步等11段公路的修筑计划。是年7月起，八步经沙田至公会、八步经望高至白沙、容县至武林、南宁至宾阳等路段相继开工兴筑。1926年后，其他路段亦开工兴筑。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民间团体参与兴修公路的热情也相当高。1924年10月，贵县经兴业至玉林的民办汽车路，以集资方式开始筹筑。1925年1月，

① 邝笑庵：《建设化的广西》（上），载《国闻周报》，1928（5），43期。
②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21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③ 广西道路局：《道路特刊》，第4编，1935。

贵兴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聘请工程师勘测设计贵兴玉公路。4月，玉（林）陆（川）民办汽车路公司也宣布成立，并派员测量修筑玉林至陆川民办公路。这些举措为当时全省首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许。

1926年6月，新桂系根据全省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上年拟定的修筑公路网规划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兴筑五大公路干线和一特别线的计划。其具体路线是：北横干线，由与云南省广南相接的田南道[①]边界，经西林、凌云、凤山、东兰、河池、宜山、马平（今属柳州）、雒容、榴江（今鹿寨县）、修仁（今属荔浦县）、荔浦、平乐、富川、钟山、贺县、信都（今属贺县）、怀集（今属广东省），出广东省英德，与粤汉铁路相接；南横干线，起自龙州，经那堪、宁明、明江（今属宁明）、思乐（今属宁明县）、绥禄（今属扶绥县）、邕宁、宾阳、贵县、兴业、玉林、北流、容县、岑溪，至梧州；西纵干线，起自与贵州连接的柳江道[②]边界，经南丹、河池、都安、隆山（今属马山县）、思恩（今环江县）、武鸣、邕宁，直达广东省钦县（今属广西），出北海（时属广东省）。另外，业已动工开筑的自宜山经大塘、迁江（今分属来宾县和宾阳县）、宾阳，至邕宁一段，也暂列入西纵干线；中纵干线，起自三江，经长安、马平、石龙、武宣、江口、容县、北流、玉林、陆川，拟与广东省廉江相连；东纵干线，起自与湖南省零陵（今永州）相接的桂林道[③]边界，经全县、兴安、灵川、桂林、阳朔、平乐、富川、钟山、贺县、信都（今属贺县），至梧州；特别线，起自与云南省富州相接的田南道边界，经百色、恩隆、平马、那马至思恩，接西纵干线，另自百色向北，至凌云，接北横干线。以上计划的6条路线，总长约3700公里，既纵贯全省，沟通邻省，又连接省内各主要水路，还考虑了出海通道的问题，布局是比较合理的。

为解决筑路所需资金问题，广西省政府采取了官办与集资民办、商办相

---

① 包括今百色地区的多数县。

② 包括今河池、柳州两地区的多数县。

③ 包括今桂林地区的多数县。

结合的方针。其中，官办公路的经费，采取多种渠道筹集，其来源主要有：一是粮赋附加，规定凡公路经过的县份，皆于原定之粮赋数额外附加筑路经费，附加数额为应征数的1~2倍，其年限初时有1~2年的，也有3年的，后来则一律附加3年。二是省库拨款，兴筑重要干线的，全部由省库拨支所需经费。兴建一般干线公路，省库酌情拨支少量的补助费。三是设立各种名目，强行征收筑路"捐税"。如对过往商品物资征收所谓"护商费"，又如强行摊派"力役捐"，实为强行征集民工筑路，等等。但当时广西经济基础薄弱，强收各种"捐税"，收入仍有限。四是向银行借贷，但借贷后须还本付息，故这项经费收入也不多。民办公路方面，其筑路经费主要靠股金筹措。募股办法分为地方团体认股、各姓氏宗祠认股、私人自由认股、按田亩粮额或商业资本额摊股、筑路收用土地抵股等。此外，也有向银行借贷解决的。



民工在修筑公路

从1926年起，全省掀起修筑公路的热潮。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公路。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时止，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省已建成公路24段，加上原有公路140公里，共计2165公里。已建成的路线，不仅贯通南宁、柳州、桂林三地，而且东北可抵富（川）、贺（县）、钟（山）矿区，西北通河池，北面可达湖南，南通广东廉江，东至苍梧戎墟，初步形成了广西公路网的框架。[①] 与同期的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广西的公路交通建设处于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广西公路史》第1册，61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领先地位。

随着公路的开通和各项建设的需要，邮政电信事业也发展起来。

广西邮政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912年在桂林设立广西邮政管理局。但邮件递送，除了有河道由轮船、民船运送外，多由邮差肩挑。1925年后随着公路开辟通车，邮件逐步改由汽车运送，邮路也逐年扩展，县、乡设立了邮政代办所和信柜。到1928年，全省邮路发展至1092公里。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两广合办电报，在梧州设立电报局，由广州架设线路到梧州，是广西有电报通信之始。后来，与广东分开办理，在桂林设广西电报总局，南宁、梧州等地设分局、报房等机构。1927年，广西省政府在南宁设立广西电政管理局，扩展有线电报线路和业务。当时除城市外，一些县城和边境重镇已通电报。1926年广西也开始有无线电报，广东无线电管理局在梧州设立一座无线电台，供与粤省通信。同年第七军从上海购运回3座无线电台设备，在南宁、柳州、梧州3处安装使用。1928年9月，在梧州成立广西无线电管理局，南宁、梧州无线电台先后竣工，可与太原、南京、上海、广州等地通报。省局还开办了无线电技术人员养成所，培养技术人员。另外，梧州警备司令部和南宁第十五军司令部各设短波电台一座，由省无线电管理局管理。

1919年两广巡阅使署在邕、龙间的电报杆木附挂电话线，广西开始有长途电话。1927年，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广西长途电话局，沿公路架设电话线，发展长途电话。南宁市内电话始于1912年，是全省最早装设使用市内电话的城市，次为梧州和柳州。初时是供军政机关通信，后来逐渐普及商店住户。1928年因市内电话与长途电话接通，南宁、柳州市内电话归并于省长途电话局。

四、创办工厂，发展实业

按照《两广统一案》的规定，广西除了在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方面接受

国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之外，财政实行“自收自支”。因此，新桂系为了振兴广西的地方经济，以满足其“兵工自给”的需要，[①] 在整顿金融税收和大力兴修公路的同时，积极发展广西地方工业。

新桂系一方面扶持原有的广西官书局（即广西印刷厂的前身）等工厂企业，一方面积极倡导和兴办新的近代化工厂。1927～1928年，在全省各地兴办了一批比较先进的省营工厂企业。主要有：1927年在贺县创办富贺钟三县平民工厂（又称富贺钟三县民生工厂），这是一所培训学习性质的工厂，产品为毛巾、布袜等针织品；同年在梧州创办广西硫酸厂，最初为黄绍竑第十五军军部拨款兴办，后改由桂粤两省投资合办，聘请马君武主持厂务，主要是生产硫酸，供化学工业、军事工业及炼油业使用；1928年在柳州创办广西机械厂，主要是修理汽车和电器零配件，也制造迫击炮、手榴弹和一些枪械及工具配件，曾仿制过单翼飞机；同年在柳州还创办广西酒精厂，产品大部分运销广东；同年创办南宁制革厂，产品有军用皮、黑珠皮、底皮和黄珠皮等。这些省营工厂虽然规模还不大，但资金较足，设备和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代表着当时广西最先进的生产力，对广西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西硫酸厂

此外，还筹办贝江纸厂、柳州电力厂、柳州士敏土厂、柳州矿厂、梧州自来水厂等，委有专人负责，并已建筑厂址或定购了机器设备，后均因蒋桂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26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战争爆发，政局动乱，被迫停建或缓建。

这一期间，由于新桂系的倡导和鼓励，火柴、烟草、锯木、织造、碾米、制面、印刷等行业的民营企业相继兴办起来。如梧州先后设立广西制枧厂、利成药皂厂、香港永发印务公司梧州工厂等。这些民营企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比旧桂系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有的民营工厂的工人数量还超过了省营工厂。另外，桐油、砂纸、制糖、瓷器、土布织造等传统行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作为公用事业的电力行业也有所发展。当时开办电力厂或电灯公司，主要是供城市照明使用。在此期间，全省的电力厂，除自备发电设备的工厂企业外，官办的有1927年开办的梧州电力厂和柳州电灯局，其余的均为商办(民营)。主要有：开办于1916~1919年间的宜山太平电灯公司、南宁电力公司、桂林电灯公司、百色日光电灯公司，以及1926~1929年间办的北流晋光电灯公司、恩阳那坡电力公司、龙州电灯公司等。

矿业方面。广西矿藏颇为丰富，有金、银、铜、铁、锡、锰、铅、锌、煤等。广西矿产开发历史悠久，到清末民初已有相当发展，但大都为民间开采，技术十分落后，全省矿业未形成规模。新桂系主持省政后，逐步认识到开发矿产对振兴广西经济的重要意义，开始筹划开发矿产工作。首先将全省的矿务行政划入建设厅集中管理，聘请李四光等专家学者到广西考察矿藏，指导开发。1928年，省政府购买一批新的机器设备，在贺县、钟山交界的水岩坝成立模范矿场，开采锡矿。这是广西机器开采矿藏的开始。由于财力有限，新桂系无力大规模开发矿产，全省矿业仍以民间小矿为主，20年代后期才有所发展。

20年代后期，新式工厂在广西崛起，结束了广西无公立近代工业的状况。虽然这类工厂仍然很稀少，而且以轻工业为主，大都集中在梧州、柳州、南宁等地，广大城镇仍是手工业。这些省营工厂产品质量还比较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但这些新式工厂的创办，开创了广西有公立近代工业的历史，客观上促进了广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五、兴办农林场，改良农林业

旧桂系统治时期，农林业得不到重视，生产技术仍然极其落后，加上战乱频仍，农村普遍十分贫困。新桂系执政后，在举办各种实业的同时，注意到农林业的重要性，在进行各项建设中也开始农林业的建设。

建立农林技术试验和研究机构。1926年后，建立了柳江农林试验场、柳州造林事务所、庆远造林事务所、南宁农林试验场、南宁农林讲习所、梧州实业研究院，并在南宁、龙州、百色等地开办林场，专门负责全省农林技术的改良事务。1927年，将梧州实业研究院和柳江农林试验场合并为广西实业院，设址于柳州羊角山，下辖柳州、庆远两个造林事务所，南宁、龙州、百色等地林场，以及南宁农林试验场。广西实业院内设有农务部，下设田艺、园艺、病虫害三课(科)，专门从事农林技术的实验和研究。① 1929年，广西实业院又改组为广西农务局，专门管理全省的农林行政和技术设施。同时，裁撤南宁农林试验场，设立南宁和镇南两个林垦区，将原来的造林事务所改为林场。

兴办省营林场。柳州林场，位于柳州狮子岩，原为柳州造林事务所，1926年成立，属广西实业院管理；宜山林场，位于宜山龙桥，原为庆远造林事务所，1927年成立，属广西实业院管理；柳城林场，位于柳州沙塘，原为沙塘林场，1928年拨归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管理；茅桥林场，位于南宁东北部，1928年在南宁造林事务所的基础上成立；西乡塘林场，位于南宁城郊，原为广西农业试验场，1928年改为南宁农林试验场，1929年改称此名；军山林场，位于南宁东部，离城百里，1929年6月成立；龙州林场，位于镇南关附近，1929年由镇南垦荒局改组而成；百色林场，位于百色西门外，由田南垦荒局改组而成。

---

① 当时主要是从事水稻天然杂交等试验和研究。

全省林场面积约50万亩，林木种类有松、杉、竹、桐、桉、枫、茶等10余种。此外，还有少量小型的私营林场和以私人名义领垦的林地数千亩。

提倡植桐，造经济林。油桐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林木，广西各地适宜种植油桐树。新桂系在发展林业中，重视种植油桐。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曾通令全省，要求每人每年种植桐树10株，并将此“列为县长的考成”。同时要求全省公务员身体力行做表率，强调“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而且，黄绍竑亲自带头垦地植桐，在省会南宁开辟了一块公务员桐场。① 1928年10月，黄又以省政府名义，通令每年每户农民须种植桐树300株。②

发放荒地，鼓励垦殖。1927年省政府设立柳庆垦荒局和田南垦荒局，专办荒地调查和发放垦殖事务。由于新桂系鼓励垦殖，不少官僚、地主，甚至华侨资本家纷纷前来承领荒地，投资垦殖。截至1927年，全省成立大小垦殖公司72家，投资金额达100多万元。③

新桂系在农林业方面虽然采取了一些建设措施，但仅仅是设立了一些农林机构，进行试验改良的初步工作，其他的还只是一般的号召，没有大的举措。因此，20年代新桂系在农林业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农业建设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农村落后贫困的状况毫无改观。

六、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

1925年以前，在旧桂系的统治下教育不受重视，教育经费很少，省教育经费最多的年份是1920年，为30万元，全省各类教育还十分落后。20年代初以来，战乱频仍，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1925年广西统一后，新桂系在

① 《黄绍竑回忆录》，1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广西大事记要》（1912～1930），51页，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③ 李炳东、弋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史稿》，77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整理省政中，重视教育，在发展政治、经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教育事业。1926年4月和1928年6月，先后两次召开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对发展广西教育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制定了《广西教育改进方案》，确定改进教育的原则，提出改进教育行政、学制、教育经费等方面的具体方案，公布了发展中小学、师范、职业学校的议案。1927年开办广西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养成所，培养各县教育行政干部，提高教育行政管理水平。加强地方教育法规和教育督导建设，制定了一批广西地方教育法令法规。增加教育经费，1929年省教育经费增至324万元，占当年省财政总收人14%左右，[①] 比旧桂系时期最高年份多近10倍。几年间，全省各类教育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初等教育

1924年，省长公署曾颁布《广西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筹施广西全省义务教育程序案》和《广西省推行义务教育标准》，提出推行义务教育的计划。但当时省内战乱，政局动荡，这些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新桂系执政伊始，“首以恢复各地学校为急务”。[②] 首先是整顿初等教育，继续执行1924年制定的义务教育计划。省教育厅派省视学分区视察，督促各县恢复公、私立学校。1926年5月，省政府根据第二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议案，通令全省所有附加粮赋二成为义务教育经费。1927年7月，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进一步提出整顿全省县市乡立小学的规划，发展乡村小学教育。由于新桂系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省小学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1925年全省小学4925所，学生185438人；1926年6192所，学生255436人；1927年6360所，学生325565人；1928年6952所，学生317560人；1929年8893所，学生392137人。几年间，全省小学生人数占全省人口由1.76%增至3.64%。[③] 此外，教会小

---

① 30年代前后广西每年省财政总收人2200万元左右，参见《教育论坛》，第2卷，第3、4期合刊，8页，广西教育厅编辑室，1932。

② 《革命之花》，第19、20期合刊，广西省政府革命之花周报社，1926。

③ 《广西通志·教育志》，13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学和私塾仍继续办理。教会小学主要分布在梧州、桂林、南宁等县以上城市以及汉族聚居的一些农村。1924年《广西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中明文规定改良私塾的办法，1925年后省当局又提出取缔私塾，有一些私塾逐步改为小学，但有些仍继续办理。1931年梧州还有30所私塾。私塾继续办理是由于当时经济还很落后，公立学校太少，当地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力的取缔措施。

学制、学生、教师。1924年秋季广西开始实行四、二学制，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学生入学年龄，教育部规定7~10岁的儿童入初等小学，但广西许多儿童是10岁以上才入学。公、私立小学教员实行聘任制，从社会上招聘知识青年。教员文化程度，有高等师范毕业、旧制师范毕业、高中师范科毕业、中学毕业或肄业、短期师范毕业等，学历参差不齐。

课程设置。全国自1923年起实行新学制课程标准，但广西延至1924年下学期才由省长公署决定施行。1928年，广西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标准课程，分三民主义、公民、国语、美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体育、童子军、图画、手工等。

20年代前期，广西还没有公立幼儿教育机构，只有外国教会在梧州、桂林、桂平等地办的几所幼稚园。1925年后，新桂系当局规定小学可附设幼稚园，幼儿教育逐步开办起来。1925年桂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一所。次年，梧州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一所。至1930年，全省幼稚园4所，教职员9人，在园幼儿321人。这个时期广西公立幼儿教育机构从无到有，是个进步。但幼稚园不但数量极少，而且设备很简陋，有的无固定园舍，幼儿教师多由小学女教师充任，未经幼儿教育专业训练，加上教具缺乏，只能教幼儿认字、唱歌、做游戏等。

中等教育

普通中学。1925年后全省普通中学得到较快的恢复，并逐步发展。1924年度全省有中学36所，其中省立中学16所，县立中学18所，私立中学2所。1927年，全省中学发展到45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6所，省立初中12所，县

立初中24所，私立初中3所。在恢复原有学校的同时，新桂系当局开始全面整顿中学教育。1928年，省政府先后公布《广西省立中学校组织大纲》、《广西省中等学校校长任免规程》和《广西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服务通则》等。这年6月，第三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议决在粮赋中附加三成，资助各县中学，后经省政府批准实施。此项教育附加费实施后，许多县采取措施，积极筹设中学。到1930年，全省中学发展到51所，其中省立完全中学8所，省立初中9所，县立初中31所，私立初中3所。中学生人数增加也相当明显，1924年全省中学生只有3025人，1930年增长为15873人，几年间增加4倍多。此外，外国教会还办有几所中学，如梧州培正中学、桂林培真女校、储才学校中学部。这个时期广西中学教育管理逐步正规化，从1928年起各校陆续建立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事务会议等制度。校长之下设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体育指导员等。学制，按教育部规定办理，高中、初中各三年。教学，执行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改学科制为学分制。1928年省教育厅重订学分标准，分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主要有国语、数学、自然、农科、社会、艺术、体育、公民、党政训练、军事训练等。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1927年，广西当局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各级学校除设"党义"课外，还将"党义精神""融会"到各科教学内容中去。

师范教育。广西师范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到20年代初，全省只有3所省立师范学校和一些县立师范讲习所。1925年后师范教育逐步发展，1926～1927年，先后在桂林、梧州、南宁、柳州设立4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省政府公布《广西省师范讲习所规程》，令各县设立师范讲习所，经费不足可数县联办，以造就初小师资。1928年公布《广西省立师范学校组织大纲》，提出改善和加强师范教育的办法，全省师范教育又有了一些发展，1928年底省立师范学校7所，县立师范学校、讲习所40余所。1929年，省当局对师范教育进行较大的改组和调整，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分别并入梧州、桂林、南宁高级中学，设男女兼收的高中师范科。梧州、桂林、南宁、柳州4所女

子师范分别改为省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女子中学，停办前期师范。此后，一直至抗战时期，广西没有单独设置省立师范学校。师范教育被削弱，小学师资缺乏，小学教育受到了影响。

职业教育。清末民初广西兴办职业教育，开办了一些职业学校。但在旧桂系统治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职业教育难以发展。20年代初，原有的职业学校先后停办。1925年后，新桂系提倡发展职业教育。邕宁、兴业、上林、玉林、北流、苍梧等县先后开办职业学校。1927年，基督教浸信会桂南分会在梧州思达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次年，在南宁开办省立第一妇女工读学校。1929年，广西省政府在龙州创办广西边务学校。该校的宗旨是培养边务人才，以整顿边务。入学条件是高中或程度相等学校肄业生，或取得省立初中毕业证书者。学生在校期间学膳、宿杂、书籍、制服等由省政府发给。毕业生见习期满考核合格，分派各对讯分署服务。该校招生两期，后以边务人才已敷应用而停办。20年代广西农、工、商业都还很落后，就业不容易，许多职业学校经费、师资、设备、实习等难以解决，因此多为昙花一现，到30年代初继续办理的寥寥无几。

高等教育

1925年后，广西还办有两所高等学校。一所是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该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称法政讲习所，校址设在桂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名为广西法政学堂，1912年改为广西法政学校，1913、1914年又先后改为广西法政专门学校和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招收预科和本科，本科分法律、政治、经济等科。预科一年，本科三年。1929年奉教育部令停止招生。另一所是广西交通专门学校，1921年创办于南宁凌铁村，时称工程讲习所。1924年改为广西省立工程专门学校，1927年又改为广西交通专门学校。1928年迁往柳州，继续招收预科和本科，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本科分电信、测绘、工程管理3科。1929年停办。

1927年冬，广西省政府决定筹办广西大学，成立筹备委员会，黄绍竑为

委员长，马君武、邓植仪、岑德彰、陈柱、雷沛鸿、盘珠祁、刘宝琛、苏民、黄华表等为委员。马君武兼任教务部主任，苏民兼任总务部主任，黄华表兼任建筑、设备两部主任，陈柱兼任国内特派员，雷沛鸿兼任南洋及欧洲特派员，盘珠祁、刘宝琛兼任美洲特派员。省政府拨款100万元为筹备费。校址设在梧州蝴蝶山。定于次年秋成立开学。



设在梧州的广西大学：①理学院　②科学馆　③工学院　④机器工厂　⑤铸工厂　⑥画图室

1928年10月10日，广西大学正式成立开学，马君武任校长，盘珠祁任副校长。广西当局创办广西大学的宗旨是提高省内文化水平，“以适用于实用科学为基础，养成本省建设事业各项必需人材”。[①] 原定开办文、理、农、工、矿五科，后以师范大学应独立设置文科，故不办文科，先设理、农、工、矿四科。因当时省内高中毕业生尚少，西大成立时只设预科，每年招生300人，三年后开设本科。当时办的虽然是高中性质的预科，但马君武校长从上海、广州等地聘请了一批著名教授来校任教。他们是马名海、黄叔培、蒋继伊、白鹏飞、陈荫仁、龙伯纯、张钦五、曾昭桓、黄方刚、周楚生等。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6月粤军入梧州，刚开办的广西大学被军队驻扎，员生四散，已落成的校舍被破坏，设备散失，学校被迫停课。

在20年代，广西当局为培养省内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奖励在省外各大

① 《新广西旬报》第3卷第6号，1929年1月。

学学习的广西籍学生，鼓励他们学成后回省服务。1925年省教育厅长甘浩泽委托在北京任法学院院长的白鹏飞，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慧商定并签订合约，由该校开办广西特别班，广西每年选送30名学生到校学习，5年为期，广西省政府拨款给该校增建学生宿舍及常年经费。省政府还决定在省内外就读的师范生，一律免交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所需费用由省政府支付。这些办法一直实行至30年代初。1931年度北平师范大学广西特别班有56人，每人每月得津贴国币8元。在省外各大学、专门学校学习的广西籍学生共295人获省政府的津贴。这项政策鼓励了不少广西籍学生毕业后回省参加各项建设。

1925年后，新桂系也比较重视出国留学工作，有计划地选派省费生出国深造。国共合作后，苏联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纪念孙中山，1925年10月开办莫斯科中山大学。广州国民政府选派优秀青年赴苏学习，报考资格是：中学毕业，年龄30岁以下，身体健康，中国国民党党员。录取后出国川资，个人自筹一部分，中央党部津贴一部分。抵苏后一切费用由中山大学供给。广州国民政府分配广西选送50名。同年11月，报考留苏考试分南宁、梧州、桂林三处举行。南宁考区录取15名，桂林录取5名，梧州录取25名，另招女生5名。1926年2月，广西留苏学生先到广东中山大学俄文班学习。同年8月，广西选送谢苍生等20人赴苏学习。其余仍留中山大学补习俄文，后因国共分裂未及出国而解散。此外，由广州国民政府考选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广西籍学生有杨华波等数人，由广西军政机关特别派送有王公度等10余人，由欧美各国转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黄士嘉等6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西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共42人。1929年春，广西留苏学生多数分批回国。

1928年，省政府颁布《广西省费留学国外学生暂行规程》。规程规定选派省费生每年举行一次，由省教育厅组织考选委员会办理。报考资格是：(1)国内大学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曾在省内外服务二年以上者；(2)曾任教育部认可的大学或专门学校教授或副教授或讲师二年以上者；(3)在党部服务三年以上有特殊劳绩者；(4)在本省行政机关服务任荐任以上职，或任中等

以上学校校长3年以上确有成绩者。有“反革命言论或行动者”、吸食鸦片烟者、劣迹显著者、身心不健全者，不得报考。规程公布省费留学生名额暂定36名，其中英国2名、法国5名、德国5名、欧洲其他各国3名、美国6名、日本15名。后省内战争迭起，时局动荡，选派留学工作中断。30年代初才逐步恢复。

社会教育

民国初年，广西的社会教育曾经比较活跃，各地开办通俗教育讲演所、简易识字学校、民众夜校、民众学校等。1912～1916年，全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177处，半日（夜）学校228所，简易识字学校224所，公众补习学校45所。后来省内政局动荡，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先后停办。

1925年后，新桂系提倡社会教育，省教育厅通令各县从速筹设通俗教育讲演所，停办的尽快恢复。1927年1月，省教育厅颁布《广西平民学校标准》，要求各县开办平民学校，开展识字运动，并令省导学“视察所至，严加督促”。[①] 1928年省政府教育厅在教育预备费项下增加预算5万元，分配各县作推广平民教育补助费。一些县相继开办了平民学校。是年，全省建立通俗教育讲演所70余所。1928年后各地兴办民众学校。民众学校招收失学成人入学识字，一般是附设于中小学校内，晚间上课，修业期限4～6个月，教师为中小学教员兼任，教材采用教育部颁《平民千字课本》。1930年全省有民众学校439所，其中公立304所，私立135所。从20年代初开始，广西近代工业比较集中的梧州，内河轮船工会桂省分会与市商会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抽收出口货脚加一捐作为劳工补习教育经费。工人补习学校设在中小学校内，晚间上课，招收贫苦工人及其子女，教以读书识字。后来梧州成立劳工教育委员会，专司劳工补习教育。此种劳工补习教育延至30年代初。

① 《新广西旬报》，1928年第11期。

七、发展文化事业

20年代中期后，新桂系当局提倡开展社会文化活动，并建立了一批社会文化设施。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广西各种文化事业逐步活跃起来，特别是进步的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1927年新桂系“清党”反共后，进步文化遭到破坏。但这个时期开办的文化设施、机构，许多继续使用和活动。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省内文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新闻出版。辛亥革命至20年代初，广西报业曾有一些发展，办有20多种报纸。后因战乱，大多停刊。1925年后，省会南宁和一些城市相继创办报纸。1925年7月，中共广东区委派龙启炎到广西工作，并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龙为《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恢复《梧州民国日报》。该报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发动群众声援省港大罢工。同年9年，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在南宁创办《南宁民国日报》，中共党员陈勉恕担任主笔。同时，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还在南宁创办《三民日报》，陈勉恕任编辑主任。两报以宣传国共合作为宗旨，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和支持国民革命，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1926年夏，国民党桂林县党部在桂林创办《桂林民国日报》，中共党员李征凤任社长兼总编辑。国民党左派在桂林还创办《教育日报》，以学校为宣传对象，面向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梧州学生组织创办《广西学生日报》。1925年后全省官办、商办、民办报纸共有30余种。这个时期期刊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不仅城市办刊物，而且一些县也办了杂志。在南宁办有《革命之花》、《火线月刊》、《现代妇女》、《革命军人》、《革命妇女》、《七军特别党部半月刊》、《广西革命军人半月刊》、《广西农民》、《广西青年》、《广西商民》、《农工周刊》、《新广西》、《广西教育公报》、《广西工人》、《广西教育》、《广西建设月刊》、《生路》、《岑潮》、《经济

特刊》、《反日周刊》、《道路》等。在梧州办有《广西学生》、《劳工月刊》、《妇女之光》、《槎光》、《刺刀特刊》、《卫生季刊》、《梧州市政公报》等。在桂林办有《爆声》、《建设丛刊》、《少年法政》等。在玉林办有《抚康杂志》、《雷鸣》、《古定先锋》等。柳州、容县、苍梧、融县等也办有期刊。20年代中期后,出版业也有一些发展。上海的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先后到梧州设立营业机构,并扩展到其他几个城市。进步书店开始在广西建立,1926年中共梧州地委创办苍梧书社,发行革命书刊。在南宁成立强华书社和人民书社。这些进步书社出售大批革命书刊,如《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等。"四一二"政变后,这些进步书社被新桂系当局查封。

体育。新桂系执政后对体育比较重视,把发展体育事业列入省政府施政计划,除加强学校体育教学外,提倡开展群众体育运动。1925年,梧州精武会成立,以教拳为主,兼习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游泳等。1926年春,省当局在南宁建立广西第一个公共体育场。场内有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室、木马、浪桥、滑板和投掷、跳跃等设施。1927年秋,在梧州建立第二个公共体育场,各种设施齐全。同年冬,在桂林建立第三个公共体育场,设有一座竹木结构的风雨球场,灯光照明,晚上可以进行球赛活动。梧、邕、桂、柳等城市还先后建立游泳场。1927年5月,在南宁举行广西统一后首届省运动会,会长黄绍竑,名誉会长李宗仁、白崇禧。参赛运动员500余人。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和网球等。1929年1月,在梧州举行第二届全省运动会,参赛运动员1000余人,除田径和各种球类竞赛外,还有国术和千人操、舞蹈等表演。同年,在梧州举行首届游泳比赛。从此,游泳被正式列入广西体育比赛项目。

卫生。1925年以前,广西还没有公立医疗机构,仅有少数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大部分地区"恒亘百数十里而无医药,真有所谓自生自灭之形势,人民医药知识,诚不足道"。[1] 1925年,第一所公立医院——梧州市立公医院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社会",15页,南宁,广西印刷厂,1936。

成立，曾留学德国学医的李达潮为梧州市卫生局长兼市立公医院院长，聘请一批医师到院工作。1925～1927年，在梧州举行两次中医考试，并成立国医学会，开展中医研究。

图书馆。20年代以前广西只有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即设在桂林的广西图书馆，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年），1919年并归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附属图书馆。20年代初战乱，藏书损失不少。1925年后省当局拨经费增添设备、图书。1928年从省立二师分出独立，更名为省立图书馆。20年代以前，各县几乎没有公立图书馆，20年代初一些县开始建立图书馆，1925年后逐步增多。新桂系当局先后建立容县、同正（今扶绥）、博白、南宁、苍梧、岑溪、北流、柳江、义宁（今临桂）、昭平、陆川、平南、兴安、贺县、平乐等县立图书馆和广西大学图书馆。

戏剧电影。辛亥革命后，广西一些城市开始出现白话剧，当时叫"文明剧"。五四运动期间，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学生团体以白话剧、活报剧演出，宣传和动员群众。国民革命兴起后，广西掀起白话剧热潮，配合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一些地方出现业余话剧团队，如梧州的乐和社、工人话剧团和梧州驻军的血社，灵川的血痕剧社，桂林二师的话剧队等。1928年初，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广西革命剧社。20年代，粤剧已风靡广西，尤其是在梧州、南宁等地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之一。一些城市开始放映无声电影，建立电影院。1928～1929年，国民党政府电化教育队在广西各地巡回放映纪录国葬孙中山的影片《奉安大典》等，电影为更多的人们所知。

第七章　蒋桂混战和广西政局变幻

北伐战争给了新桂系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北伐后新桂系实力迅速发展，从出师时的第七军壮大为拥有20多万人的第四集团军，成为国民党四大军事实力派之一。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成为最高统治者。他以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为职志，处心积虑地排斥异己。新桂系扩张势力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的矛盾，双方明争暗斗，最后爆发战争。1929~1930年，蒋桂连年征战，新桂系屡屡败北，蒋介石连连得胜。但是，蒋介石没有能够彻底消灭新桂系势力，新桂系利用军阀混战得以东山再起。蒋桂混战，造成广西政局动荡，政权不断更迭。附蒋反桂的俞作柏、李明瑞一度执掌省政，不久在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下仓促举兵反蒋，旋即失败。逃亡国外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乘机返回广西，重执权柄。1931年，新桂系联合广东陈济棠反蒋，重新统一省政。1936年，经过几年和平后，蒋桂矛盾再度激化，爆发武力对抗。由于当时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甚高，蒋桂为了各自的利益，被迫谋和。经过各方斡旋，双方终于和平妥协。1929年以来的蒋桂对峙宣告结束。

一、新桂系扩张势力和蒋桂矛盾

蒋、桂结怨时日已久，早在两广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新桂系就认为蒋介石用部队番号限制广西势力的发展。李宗仁和蒋介石初遇，就认定蒋是一个“共患难也不易”的人物。[①]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在军饷给养方面歧视桂军，引起新桂系不满，隙痕日深。但当时为了对付北洋军阀，他们的合作还是多于矛盾。为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蒋桂合谋“清党”，共同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纷争，导致一片混乱，蒋介石一度陷入困境。新桂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扩张势力。

逼蒋下野，把持特委会

“四一二”政变是蒋桂共同策划的“杰作”。事变后蒋介石感到新桂系能量不小，对他是个潜在威胁，于是密令其亲信何应钦执行除灭新桂系势力的计划。何应钦权衡当时利弊，不敢执行。新桂系得悉蒋的阴谋后，暗中加紧倒蒋活动。

武汉汪精卫“分共”之后，继续同南京对立，汪坚持只有蒋介石辞职，宁汉方可合流。汉方唐生智等将领与汪精卫紧密配合，发出讨蒋通电，表示将对宁方动武。当时蒋介石属下各军，除第一军和新桂系的第七军等部外，其余大多倾向于武汉政府，蒋的嫡系部队主力又远在徐州前线，作战频频失利。蒋介石对新桂系这时的意向还估摸不透。在这种情况下，蒋拒绝了李宗仁提出的缩短战线和放弃徐州的建议，以防止汉方东进为名，将其嫡系部队主力调回南京，留下何应钦部的王天培（第十军军长）固守徐州。蒋的这一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30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举动，是为了防止新桂系乘机夺权。结果徐州失守，北洋方面的直鲁联军乘胜南下直逼南京。蒋介石把徐州失守的责任推卸给何应钦，指责何指挥无能，并下令处决了王天培。蒋的专横跋扈和诿过于人，不仅使宁方各将领感到恐慌，也使宁方的反蒋情绪激烈起来。蒋介石陷入宁汉矛盾和王天培事件造成的不利境地之中。

新桂系抓住这一时机，联合何应钦及宁方各派力量，进行逼蒋下野活动。当时，新桂系首脑李宗仁表面上仍在为谋求宁汉妥协而四处奔忙，暗中却将周凤岐部调驻南京周围，以西征讨汉为借口把第七军移驻南京以西，控制了南京的外围地区。同时与汉方暗通款曲，和已东进抵达芜湖一带的汉方将领程潜相约互不对峙。当蒋介石要白崇禧部署兵力回击汉方东进时，白托辞予以拒绝。甚至连蒋在南京以总司令的身份召集军事会议时，竟出现不少将领不到场的情形。蒋不得已将眷属送至上海，以防不测。在新桂系的步步紧逼下，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暂避锋芒、以退为进的策略，8月12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上提出辞职。次日，悄然离宁赴沪，军事方面委托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负责。同时发表《告国人书》，宣布下野。新桂系逼蒋下野成功，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实权。

这时，北洋方面的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乘国民党内部混乱之机，联合部署对国民党军作战的计划，决定在北、中、南三方面采取行动，攻击国民党军。孙传芳迫不及待，指挥所部7万余人，在南京一带长江北岸地区集结，准备渡江进攻南京。这样，南京不仅面临着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内部危机，还同时受到来自武汉和北洋方面的军事威胁。

当南京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8月15日，在李宗仁等策划下，由李烈钧出面主持召开军委会和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决定每周举行中央执监各机关联席会，以决定大计；行政事务统归国民政府办理；军队的总司令职务由军委会代行，这时军委会已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把持，一切军令由3人签署发布；要求汪精卫下野；派员分赴奉化、上海，劝说蒋介石、胡汉民回南京主持工作。另外，为安定上海局势，争取上海买办势力的支持，以军委会

名义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白到上海后，以其参谋长张定璠出任上海市市长。并针对当时“上海人心惶惶，多数人家准备五色旗欢迎孙传芳”[1]的情况，对各界开展安抚活动，吁请商界帮助当局解决财政困难。经努力，白崇禧初步稳定了上海，还从上海银行团获得了60万元的借款。同时，李宗仁等决定将驻扎江北的军队南撤，组成三路军重新布防，以阻止孙传芳军南渡。

为共同对敌，李宗仁努力谋求同汉方妥协，主动电请汉方东征军停止东进。为表示妥协的诚意，李宗仁改变了要求汪精卫下野的主张，并派胡宗铎前往武汉，迎请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来南京“柄政”。李宗仁的主动让步，得到了汉方的积极回应，8月19日，汉方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2] 汪精卫于次日带领汉方要员到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晤后，即电请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前来会商。

22日，李宗仁等乘军舰抵九江，旋赴庐山与汪精卫等会谈。与会的还有冯玉祥方面派来的代表。经过激烈辩论和讨价还价，双方议定：谭延闿（时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偕李宗仁等先期赴宁，详商和布置迁移事项；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于9月3日前迁宁，武汉改设政治分会；武汉东征军暂时停止前进，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南段之敌。李宗仁庐山之行促成了宁汉合流。24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下山，返回南京。

正当李宗仁往返九江、南京之时，北洋方面的孙传芳军按照计划，成功地在浦口、扬州、江阴三处过了江，并在六合设立总部，向南京发起进攻。8月26日，孙军3个师兵力又乘夜雾由长江北岸的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和龙潭一带强渡成功，占领栖霞山、龙潭车站，截断

---

① 《白崇禧回忆录》，5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7年9月4日），载《国闻周报》卷4，第34期。

了宁沪之间的交通，情势十分危急。

李宗仁等迅速调集兵力，在汉方东下军的配合下迎敌。李率第七军会同何应钦第一军等部由南京、镇江夹击，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和陈绍宽等率海军在江面上截击渡江孙军。激战一昼夜，27日将占领栖霞山的孙军击溃缴械，夺回栖霞山及南北象山高地。但龙潭一带孙军仍据江岸抵抗，并有大量孙军继续渡江增援。这时，自沪返宁的白崇禧被阻于无锡和镇江之间，即就地指挥部队增援。29日，孙军约5万人再度聚集龙潭，向何应钦第一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分率第七、第十九军及第一军等部主力，向孙军反攻。30日，李宗仁夺回栖霞山后，指挥第七军第一、第三师和第十九军第一、第二师由栖霞山向东进攻，何应钦指挥第一军第二、第二十二和第十四师之一部自东阳镇出发，会攻龙潭。激战终日，至下午5时夺回龙潭。31日，白崇禧、何应钦亲抵龙潭督战，把反扑的孙军逼至江边，包围缴械。龙潭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孙军过江部队除少量随孙传芳北逃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被俘达3万余人。南京方面第一、第七、第十九军等部伤亡8000余人。孙传芳北遁后，连续放弃浦口、乌衣、扬州、泰兴、泰州等地，南京转危为安。

但是，南京刚趋稳定，宁、汉矛盾又复尖锐。汪精卫到南京后，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实施其吞并新桂系等实力派，控制南京政府的计划。李宗仁等毫不妥协地与汪对抗。一方面，于龙潭大捷后积极扩军，在第七军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为第二路军，下辖第七、第十九军，后又组建第十八军（何应钦的第一军扩编为第一路军），加强抗汪实力。另一方面，采用分化手法，削弱汉方力量。先是把与汪精卫有矛盾的谭延闿、孙科、程潜、朱培德等从汉方营垒中拉出来，暗中形成一个宁汉对抗汪精卫、唐生智的格局。接着，建议各派共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争”和重组国民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李宗仁又拉拢了一直独树一帜又素与汪精卫不和的沪方西山会议派，目的是孤立汪精卫。此外，李宗仁还与汪精卫、李烈钧等一起到上海，劝说在沪的蒋派势力和胡汉民等人共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便通过会议进一步削弱汪

派力量，但没有奏效。汪精卫为摆脱孤立，也在积极地进行活动，企图与蒋派势力和西山会议派达成妥协，联合起来对付新桂系，但遭到了西山会议派和蒋派势力的明确反对与拒绝。结果，汪精卫和新桂系都被迫作出了让步，决定暂缓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转至上海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9月11～13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共20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三天谈话会，会商党务和宁、汉两政府的合并及改组办法。会上，各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都企图以本派为核心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产生中央机构。西山会议派继续高唱反汪调子，提出汪应引咎辞职。李宗仁等积极配合西山会议派，鼓动宁方代表附和西山会议派，力主汪精卫下野，以平党内之愤。汪精卫甚感孤立，不断“检讨”和“引咎”，以讨好各方。经过几天吵闹之后，三方一致同意孙科提出的建议：由三方推出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谈话会议决了有关党务和政府等问题，“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全体职权外，应负统一地方之中国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迟十七年一月一日开会”。[①] 谈话会最后推选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李宗仁、李烈钧、何应钦等32人组成特委会。特委会不设主席。9月16日，三方组成的特委会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各派组成特委会，这场较量，使汪精卫失去了国民党“合法领袖”的地位，汪派吞并南京，控制国民党中央的企图完全落空。汪精卫自感形势对己不利，在谈话会结束后，即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②]为由，通电下野。汪派成员也退出了三方合流的活动。

特委会成立后，李宗仁继续与西山会议派勾结，操纵宁汉政府和军事委

① 《谢持等叙述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原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6辑，引自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49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7年9月18日），载《国闻周报》卷4，第36期。

员会的合并改组活动，完成了宁、汉、沪三方的“统一”。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都拒绝到南京参加特委会，南京中央的党务权力实际上落入西山会议派手中。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和他们密切合作的何应钦则通过控制军事委员会，支配着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原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只不过是被新桂系利用的工具，成了陪衬。

总之，国民革命失败后，新桂系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纷争，逼迫蒋介石下野，又利用汪、沪、蒋三方矛盾，特别是沪方、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之间难以调和的“党统”之争，排斥了汪精卫，把持了特委会。然而，由于政治分赃不均，特委会的成立也违反了国民党章程规定的组织程序，是一个以中央执监临时会议取代中央全会产生的“不合法”的领导机构，缺乏法律依据，这就给蒋、汪等派系反对特委会造成了口实。把持特委会的新桂系借机扩展势力，也引起各派不满。于是，特委会刚开张，新的矛盾与冲突便接踵而至。

西征讨唐，控制两湖

新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取消了一直以“正统”自居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定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的地位，这对权欲熏心的汪精卫是个沉重的打击。所以，特委会一成立，汪精卫便祭起维护“法统”的大旗，进行反对特委会的活动。

9月21日，汪精卫返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推唐生智等人为常务委员，统辖鄂、湘、皖三省，与南京特委会分庭抗礼。因此，唐生智积极扩军备战，声称讨伐南京。唐部第三十六军迅速东进，与新桂系第七军在芜湖东南发生了前哨战。刚形成的宁汉合流又迅速演化为新的宁汉对抗。

两湖是广西联系中原的重要通道，对新桂系势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新桂系对两湖十分关注。已掌握了特委会实权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在设法把两湖地区控制起来，以便沟通南京与广西的直接联系。唐生智以护党名义，

公开否认和对抗特委会，自然为李宗仁等人所不容。因此，唐生智发难后，李宗仁等立即以维护“统一”的名义，请原汉方的孙科、伍朝枢等人出面，以特委会代表的身份分别与汪精卫和唐生智会晤，协商召集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常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与特委会划分权限；限制唐生智扩军，统一管理汉阳兵工厂，改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各方军事首脑同时出兵北伐等问题。但汪精卫不敢代唐生智承诺上述条件，而唐生智则对限制其扩军和统一管理汉阳兵工厂，以及改组安徽省党政机构，表示坚决反对。

其实，李宗仁、白崇禧只是借谈判为武力西征制造理由，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而已。早在8月宁汉双方协商合流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已对唐生智坚持派兵东下极为不满和不安，并在庐山会谈后，分别和汉方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协商了反唐的问题。此后更是迎合谭、程等人的逐唐返湘心理和要求，互相结成了倒唐联盟。当唐生智明确反对特委会提出的全部条件后，李宗仁等人便名正言顺地以南京政府和军委会的名义，发动西征讨唐战争。

10月19日，南京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生智，并组织西征军，由李宗仁任总指挥，兵分三路进攻武汉：由李宗仁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率第七、第十九、第三十七军从江北向西推进；以程潜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第六、第十三、第四十四军沿江南西进；另委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第三军等部在湖口、九江一带活动，阻扼汉、皖交通，截击唐军，并以一部分兵力沿株萍路威胁长沙；何应钦、白崇禧则分率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线活动，防止北洋方面的奉鲁军乘虚南下，以掩护西征。此外，新桂系留守广西的黄绍竑，广东方面的李济深，河南方面的冯玉祥等，都积极支持讨唐，并分别派兵相机行动，配合西征。20日，南京政府发出通电，以“通敌背党”的罪名，着即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又以军委会名义正式下达讨唐令。24日，再以特委会名义，追认军委会的讨唐令，决定永远开除唐生智的党籍，并发布《告湘、鄂、皖民众书》，历数唐生智的罪行，表示讨唐的决心。

西征讨唐战事，以10月18日程潜部第六军攻击唐军驻宣城湾址的刘兴

第三十六军为开端。随后，李宗仁率第七军进入皖北，攻击唐生智的何键第三十五军。朱培德接受南京方面的委任和调遣，也按部署行动。在皖唐军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唐生智被迫下令刘、何两军退出芜湖、安庆，撤往武穴一带。这时，防守粤汉线的唐军张国威师，和驻守鄂西的鲁涤平第二军等部，已分别受程潜和谭延闿的策动，暗中与宁方联系或开始配合西征军的行动。西征军沿长江两岸迅速西进，所过无阻。此外，河南方面冯玉祥的樊钟秀等部，正沿着平汉线南下，威逼武汉。广东李济深的李福林第五军也在向北运动，协同方鼎英、范石生等部，准备入湘参战。从11月7日，唐军各部纷纷败退，武汉危急。唐生智见大势已去，以过度疲劳为由，决定下野。11日，唐生智下令处死暗中附宁的张国威，并将军队交给刘兴、李品仙、何键指挥，退守湖南。当晚，唐生智匆匆登上一艘日轮东下，逃往日本。15日，西征军占领武汉。此后，李宗仁等曾考虑以和平解决办法，改编退守湖南的唐军。但唐军在蒋介石暗中唆使下，坚持反对特委会，继续同西征军对抗。李宗仁决定以武力解决湘境唐军。

1928年1月5日，南京政府委白崇禧为西征军总指挥，入湘进攻唐军。西征军以长沙为目标，由白崇禧率第三路军的第七、第十九军从通城向平江进击；程潜率第四路军的第六、第四十四军沿武长路南下。15日，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克城陵矶。17日，程潜第六军占岳阳。21日，夏威第七军强渡汨罗江，突破唐军李品仙第八军及独立第一师在南岸的防线，并将唐军击溃于天岳山一带。胡宗铎第十九军也在汨罗江上与唐军相遇，经数小时激战，唐军不支，退往永安，第十九军跟踪追击，直逼长沙。但是，就在这一天，叶开鑫第四十四军在岳阳黄沙街倒戈，与唐军李品仙部偷袭程潜的第六军。旋经程潜、白崇禧调兵增援，将叶部包围解决。25日，白崇禧率部攻取长沙、浏阳等地。接着，以第七、第十九军为主力，向株洲、衡山追击唐军。2月7日，占衡山。8日，取衡阳。14日起，西征军调整部署，分四路进攻退据湘西的唐军，占领宝庆、新化等地。

2月中旬至3月上旬，在西征军剿抚并施之下，湖南唐军各部相继停战，

接受改编。至此，“三湘平悉”，西征讨唐战争宣告结束。战争的结果，武汉政治分会被取消，唐生智被通缉，代以设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程潜当了该委员会主席。新桂系的势力扩展到两湖及安徽，并直接掌握湖北与武汉。

联合李济深，两广结盟

新桂系发动西征讨唐战争后，在宁、沪不能立足的汉方汪派成员纷纷南下广东，准备在广州另立旗帜，与南京对峙。一直在粤拥兵自重的李济深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仅接纳了南下的汪派成员，还于1927年10月和原汉方将领张发奎在广州共同发起迎汪回粤大会，电请汪精卫回粤“主持党国大计”。

汪精卫抵穗后，于11月初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通过召开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树起了“国民党中央”的大旗，公开与南京特委会相对抗，形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随后，汪精卫、张发奎为了完全控制广东地盘，迫使李济深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将省、县两级政权转移到汪派势力手中。同时，秘密勾结李福林、薛岳、黄镇球等将领，企图排斥李济深和应李之邀在粤协防的新桂系部队。①

李济深当时既不反蒋，也不反桂，而且积极调停南京特委会与汪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想促成蒋、汪合作。他之所以迎汪来粤，本是为了扩大声势，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和利益，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他处处提防并设法牵制汪派势力的发展，还打算请新桂系黄绍竑出面，将汪派势力赶出广东。

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并积极谋求复职的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插手广东内部矛盾与冲突。蒋介石为扫除其东山再起的主要障碍，采取联汪反桂的策略，不仅电请汪精卫赴沪商谈“党政统一”问题，还派宋子文到达广州与汪精卫密商，企图将李济深和新桂系势力逐出广东，把广东变成蒋汪联合反对特委

① 南昌起义后，黄绍竑应李济深邀请率黄旭初、吕焕炎两师东下广东布防，协助阻止南昌起义军入粤。

会的一个基地。同时，与汪相约同时复职。汪精卫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立即与张发奎制定了驱逐李济深和新桂系的计划。

11月上旬，迫于蒋汪等方面的压力，南京特委会决定在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前暂停行使职权，同意汪派提出的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建议，并约请汪精卫、李济深等作为广东方面的代表与会。汪精卫和张发奎看准这一机会，决定在汪、李赴沪之后，由张发奎所部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发动兵变，驱逐驻粤桂军。

15日下午，汪、张按计划行动。汪精卫以赴沪参加四中全会为名，与李济深一同离穗经港赴沪。启程前，汪以其本人的名义（又一说假借李济深的名义）致电广西，称有种种问题需当时兼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的黄绍竑“到广州去面商”。[①] 16日，黄绍竑应约抵穗。当天深夜，黄琪翔即按汪、张的布置，会同第八路军第五军（粤系）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等人，指挥所部，以“护党救国”为号召，分别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广州临时军委会警卫团、第七军驻穗办事处和驻穗桂军，以及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驻省部队、省防军、黄埔军校工兵团、石井兵工厂和虎门要塞等处的守卫部队包围缴械。同时，包围李济深公馆和黄绍竑的住宅等处，搜捕黄绍竑。黄事前得到广东省原财政厅长冯祝万的紧急报信，得以脱逃香港。驻肇庆、韶关等地的桂军吕焕炎、黄旭初等部闻讯后，先后撤回广西。汪派势力悉数接管了广州的军政机关，控制了广东的一切权力。这就是汪派势力为抢夺广东地盘而发动的“广州张黄事变”。随后，张发奎等又拉拢原新桂系部将俞作伯，制定了一个对付黄绍竑西、北江军事及收编桂军的计划，集中黄琪翔、李福林等部沿西江推进，准备一举平定广西。

黄绍竑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梧州后，立即组织反击张、黄的进攻。11月26日，桂军在禄步、四会等地与粤军发生战斗。李宗仁等则在上海的四中全会预备会上，联合李济深及其他反汪派，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策动武装叛乱，

① 《黄绍竑回忆录》，19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并与吴稚晖等人联名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要求弹劾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汪精卫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只好求助于蒋介石。

正当“张黄事变”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斗之时，中国共产党则抓住有利时机，于12月11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张、黄急忙撤回攻桂兵力，转而围攻广州起义部队。李宗仁和其他反汪势力更是把握时机，向汪精卫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指责汪派联共发动叛变，危害两粤，强烈要求迅速查办汪精卫及其派系成员。结果，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张、黄的职务，改由缪培南充任第四军军长，查办汪精卫等人。并且，授权李济深重新整顿粤局。当时，白崇禧曾找了杜月笙和法国驻沪领事帮忙，打算秘密除掉汪精卫，因杜月笙和法国驻沪领事不愿在此事上与白合作，汪精卫才幸免于难。这时，蒋介石也翻脸不认账了，不仅把与汪精卫相约共同复职的诺言抛之脑后，还借机“劝告”汪精卫等人“出国远游”。在四面围攻声中，汪精卫被迫宣告引退，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偕同黄琪翔等赴法国远游去了。新桂系和李济深在与汪派势力的这场争斗中，完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12月初，李济深根据南京政府的决定，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任命由闽回粤讨伐张、黄的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节制钱大钧、陈济棠两部，会同西路的黄绍竑和南路的徐景唐等部，合击广州。16日，黄绍竑接受李济深的约请，在梧州通电誓师讨粤。随后，黄绍竑以西路总指挥的名义赴西江前线督师，率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3个师东下，展开攻粤行动。

由于张发奎、黄琪翔已先后宣布下野离粤，其部属军心不稳，无心恋战。所以，桂军进展极为顺利，12月20日，进占肇庆。25日攻入三水，并急速向广州进军。张、黄第四军的新军长缪培南和副军长薛岳等人为保存实力，把广州防务转交给李福林第五军，主动撤离广州，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计划开往惠州、紫金、河源一带，然后退入赣南。李福林在桂军抵达广州前也主动让防退出，并通电辞职，避往香港。29日，黄绍竑西路军没有经过战斗便顺利进入广州。紧接着，黄绍竑下令出发东江，准备会同陈铭枢东路军夹

击退往惠州、河源一带的缪培南第四军。

1928年1月11日，陈铭枢东路军首先与缪培南部接触。双方在五华与龙川之间的歧岭交火，结果东路军损失惨重，分向铁场、老隆方面退却。缪部又转向迎击从紫金方向逼进的黄绍竑西路军。14日，双方在紫金东北面的潭落墟相遇，旋即展开战斗。经过三昼夜激战，缪部不敌，原第四军著名将领许志锐阵亡，另一师长黄镇球受重伤，缪培南、薛岳等人被迫放弃袭取潮山的计划，率余部经老龙墟往赣南退却。是役，双方死伤达2万余人，损失均惨重。

黄绍竑穷追不舍，率所部与东路军分兵两路追击败退入赣的缪培南部。黄绍竑亲率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等部由兴宁入江西寻邬。至2月中旬，将缪部追至赣江边，并占领会昌地区。后因缪培南、薛岳接受蒋介石的保护，通电率队北伐，黄绍竑才停止追击，率部返回广东。是月底，黄绍竑发表通电，宣告西路军等部已从东江返回，终止其所代理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同时，桂军师长黄旭初接受李济深的"特委"，出任河源、龙川、紫金、兴宁、五华五属绥靖处处长，并移兵五华驻扎。

在新桂系黄绍竑的全力协助下，李济深从汪派势力手中夺回了失去的地盘和权力。黄绍竑通过这场"讨粤"战争报了一箭之仇。新桂系利用与李济深的特殊关系，将势力扩展至广东，形成实际上的两广联盟。

利用"二次北伐"，向华北扩张

蒋介石下野后，经过一番活动，争取了美国的支持，利用国民党各派纷争难以调和，施展纵横捭阖之策，使其成为各方争取的人物，终于复职又上台。蒋重新上台后，利用"继续北伐"这面旗帜，来缓和国民党内部矛盾。1928年2月，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实现了党内暂时的统一，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会后，蒋介石积极部署讨伐奉系张作霖的"二次北伐"。

在北伐奉张之前，新桂系为进一步扩张势力，加强了对两湖的控制。通

过西征讨唐，新桂系夺得两湖地盘，但对两湖的控制还不够巩固。当时湖南由程潜主政，因程在倒唐战争中充当先锋，新桂系不得不暂时容忍。程在湘是新桂系全面控制两湖的障碍，因此不能让他久据湖南。

讨唐战事结束后，白崇禧随同程潜入湘，目的主要是削弱和限制程潜的权力。程潜不肯俯就于新桂系，双方矛盾于是逐渐滋生。到“二次北伐”前，两湖军队扩编为第四集团军时，程潜对南京方面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双方矛盾激化起来，终于导致了新桂系“倒程”事件的发生。

李宗仁为了确保新桂系在两湖地区和第四集团军中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一再拖延南京中央下达的“赴武汉劳军，并收束军事，准备北伐”① 的命令，并不惜与蒋介石勾结，借助蒋的力量搞垮程潜。蒋介石对新桂系和程潜均无好感，但为了争取新桂系尽快出兵讨奉，同时又借新桂系之手排斥程潜这一异己分子，便顺水推舟，暗中助桂倒程。李宗仁在蒋介石暗中支持下，于5月21日通过武汉政治分会，以“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② 为罪名，扣押了程潜。蒋介石也给新桂系予积极的配合，于23日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1次会议，作出了程潜免职、听候查办，裁撤湘鄂政务会议，改组湖南省政府等决定，基本满足了新桂系“倒程”的要求。26日，李宗仁正式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设总部在汉口，由鲁涤平、李品仙、白崇禧分任下辖三个军团的总指挥职。同时，任命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所部参加北伐。

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明示第四集团军在“二次北伐”中的作战区域及作战任务，白崇禧在第四集团军总部成立之前，已先行北上，于19日到新乡与冯玉祥会晤，接洽第四集团军北伐联络方略。21日在郑州与蒋介石、冯玉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4辑，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1925年5月27日），载《国闻周报》，卷5，第20期。

祥会商进军京、津作战任务。这时，因日本军队在济南制造惨案，阻挠国民党军北上伐奉，蒋介石已决定绕道北上，并将指挥权交与冯玉祥。经郑州会商，重新明确了各集团军的进军路线和作战任务。第四集团军的进军路线是：沿京汉线北进，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攻保定、北京，和其他三个集团军会师北京。之后，白崇禧迅即返回武汉，调集兵力北上。

经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第四集团军北伐部队分两批出发。第一批为叶琪第十二军、周斓第十七军、魏益山第三十军、廖磊第三十六军及刘春荣独立第八师，向石家庄一带集中；第二批为前敌总指挥部，由第四十四军随白崇禧同行；第七、第十九两军为总预备队，暂不开动。

此时，因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冯军）和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晋军）没有协同行动，北洋奉军张学良等部抓住机会，对已转入京汉线保定一带作战的晋军实施包围，冯军非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将原驻在博野及安国一带的部队撤走，情势对晋军十分不利。白崇禧为顾全整个战局，除下令叶琪等部急驰正定、新乐增援之外，于23日赶抵石家庄晤阎，告知援军将至，帮助阎锡山安定军心。是月下旬，叶琪部率先赶至正定，击溃偷袭正定的奉军骑兵师。其他各部随后也按预定时间相继抵达前线。然后，在白崇禧的指挥下，投人晋军在保定西南发动的方顺桥会战。在第四集团军的配合下，晋军于28日发起总攻。次日，奉军动摇，放弃方顺桥北撤。第四集团军和晋军协同行动，向保定追击。31日，攻占保定。

随着战争局势的好转，国民党军从5月底起发起全线总攻击，沿津浦、京汉、京绥三路全面向京、津推进。奉系首脑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放弃京津，退守东北。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同日，张学良率奉军退出北京。11日，白崇禧与阎锡山联袂进人北京城，成为“率广西军队进人北京的第一人”。[①] 接着，第四集团军各部分别按白的指令接管石家庄和保定等地防务，前锋部队则进至南苑及北京近郊。

---

① 程思远：《黄绍竑回忆录》序，载《黄绍竑回忆录》，3页。

京、津平定后，蒋介石令白崇禧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所部及晋军、冯军各一部，扫荡退据冀东地区的张宗昌直鲁军余部。9月2日，白崇禧由北京抵天津，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和布置东征各军的作战任务。随后，东征直鲁军的战斗便渐次展开。至17日，东征军各部连克丰润、唐山、喜峰口、古冶、开平、乐亭、昌黎等地。白崇禧将其司令部移至唐山，继续指挥各部作战。这时，已退东北的奉军以直鲁军不服归降劝解，也在安山一带向直鲁军发动进攻。在国、奉两方的夹击下，张宗昌不得不放弃抵抗，于17日派代表往唐山谒白崇禧，表示投诚。23日，东征军事全部结束。是日，白崇禧下令将输诚的直鲁军余部2万余人分调往胥各庄、开平、古冶、滦州等地，缴械后等待改编。后直鲁军余部被改编为三个暂编师，暂归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节制。至此，京、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纳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白崇禧指挥的叶琪、廖磊、李品仙等第四集团军部队移驻平津至唐山一带。广西部队从两广、两湖打到山海关，声势极盛一时，为世人瞩目。白崇禧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太平天国时两广军曾一度进抵天津。至于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①

总之，北伐、国民党内纷争、"二次北伐"给新桂系造成了扩张势力的有利机会，其实力从一个军发展为8个军，20多万人，其势力范围从广西扩展到鄂、湘、粤、冀等省份，形成了由李宗仁坐镇武汉、统辖两湖，黄绍竑镇守广西、联结广东，白崇禧屯兵冀东、控制华北，南北遥相呼应，威震中原的态势。新桂系实力迅速膨胀和咄咄逼人的声势，使独裁专制、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如芒在背，恐惧不安。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中了。"② 蒋所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新桂系。他认为新桂系势力的扩张已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地位。蒋桂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

① 《国闻周报》卷5，第23期，1928年6月17日。

②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2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二、蒋桂战争和新桂系受挫

北伐奉张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巩固和维护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利用全国民众厌战思治的心理，提出了“裁兵建国”的口号，借编遣军队、裁减兵员之名，企图削弱各实力派的地盘和兵力。但蒋介石的做法遭到了各实力派的抵制和反对。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失败后，决定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铲除异己力量。蒋介石在谋划用武力除灭异己势力的计划中，把势力急剧发展、政治野心膨胀、与他结有“逼宫”之仇的新桂系作为首先打击的目标。

为了做好倒桂的准备，蒋介石不仅制定了对长江上游布置军事，以及撤销各地政治分会等计划，还从1929年1月起，停发了华北桂军的军饷。同时，与谭延闿勾结，以谭在湖南的亲信鲁涤平（时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清乡督办、第二军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牵制新桂系。同年2月，将大批军火经江西运送湖南，以装备鲁涤平的部队，打算一旦需要，即由鲁涤平把湖南控制起来，切断两湖与两粤的交通联络，收两面夹击之效。但这一情况被当时与新桂系关系密切的何键（时为湖南省清乡会办、第三十五军军长）得知，何即从长沙赶到武汉密报。

新桂系对蒋介石的倒桂阴谋活动早有察觉，因此暗中采取对策，不甘坐以待毙。先是在九江截取了蒋运送鲁涤平的军火，然后又决定在蒋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之前将鲁逐出湖南。2月13日，受李宗仁委派在武汉主政的新桂系鄂籍将领胡宗铎与叶琪一起，邀何键到岳阳，共同密商倒鲁的行动计划及湘省的政治安排。19日，在胡宗铎等人的策划下，武汉政治分会第49次会议作出决议，以鲁涤平把持财政，重征盐厘，“剿共”不力，有渎军纪等为理由，免去其湖南省政府主席职，以何键继任。同时，密令叶琪、夏威两部入湘，

解决鲁涤平、谭道源（第五十师师长）两部。鲁涤平猝不及防，匆忙逃离长沙，经九江转赴南京，其部属则经平江、浏阳转水路向江西万载退却。22日，桂军又向常德进攻谭道源部，谭率部向辰州上游退去。同日，桂军李明瑞、杨腾辉两部移株洲，继续追击鲁涤平部。桂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去掉了身边的隐患，使两湖成为新桂系的一统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湘案”。“湘案”发生后，在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宗仁恐遭蒋介石的暗算，借口治疗目疾离开南京赴上海。李认为“湘案”是蒋介石处心积虑灭桂所致，但他当时还不想因此而扩大与蒋的矛盾，乃主动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详陈“湘案”发生的原因，表示愿服从南京中央的处理。

蒋介石对“湘案”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以军队“编遣”期间，政治分会无权任免有关特定区域内官员为由，指责新桂系违反政治分会暂行条例和编遣会议的决议。随后，分别派监察院院长蔡元培、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查办“湘案”。但考虑到倒桂战争尚未准备就绪，蒋介石为麻痹新桂系，在处理“湘案”时，只免去了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三人的武汉政治分会委员职。同时，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作出了裁撤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北平各政治分会的决定。

随后，蒋介石采用外部孤立和内部分化瓦解的策略，加紧策划和进行灭桂的活动：派何成浚奔走于东北和山西等地，拉拢张学良和阎锡山，以牵制华北桂军，预防白崇禧率部南下；派邵力子等赴河南，离间冯玉祥与新桂系的关系；派杨杰到滇、黔两省，安抚西南地区的实力派，防止他们与新桂系结盟；将李济深诱骗到南京加以软禁，并策动陈济棠等粤系将领反桂拥蒋，拆散粤桂联盟。为了分化瓦解新桂系的兵力，截断新桂系的“南北呼应”阵势，蒋介石通过起用唐生智，策动华北桂军原唐部旧属“立唐驱白”，使新桂系屯驻华北的兵力土崩瓦解，白崇禧被迫于3月21日仓皇南逃。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还利用武汉桂军桂籍与鄂籍将领的矛盾，以事成之后出任广西省主席为条件，收买了蛰居香港的原桂军将领俞作柏，通过俞争取桂籍将领李明瑞、杨腾辉等人阵前倒戈，从内部分化武汉桂军。

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全部得逞之后，立即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撕毁了关于处理“湘案”的决议，3月26日宣布永远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免去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的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下令讨伐新桂系。此前，蒋介石已电令第一集团军各部向皖鄂边境开拔，准备对武汉桂军用兵。27日，蒋又拉拢冯玉祥出兵相助。28日，蒋再改订作战序列和任务，以驻江西各部为“讨逆军”第一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总指挥，西攻武长路，切断武汉的后路；刘峙第一军和朱绍良第二军合编为第二路军，刘峙任总指挥，沿江左西进攻武汉；以冯玉祥部将领韩复榘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由豫南进攻武汉。30日，蒋介石亲自坐镇江西督师，下达对武汉的总攻击令。

蒋介石对新桂系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时，李宗仁仍羁留上海。他除了与有关方面周旋，寻找与蒋介石妥协的办法外，还曾力劝李济深切勿赴宁参加“调停”。但他对蒋介石孤立、分化新桂系的力量，以及所部已发生动摇等情况，竟毫无察觉。直到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授予蒋介石全权处理武汉事变时，他始知蒋已做好对桂用兵的准备，并匆忙致电黄绍竑，谓“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伸正义”，“望兄等急速动员”。①3月21日，李济深被扣南京汤山后，李宗仁离沪南下，并于启程前急电汉口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等人，着委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在黄陂到武穴一线布防待敌。但何键此时已宣布拥蒋反桂，并接受蒋的委任，任“讨逆军”第四军军长。26日，张华辅遵令发表，并以李明瑞为第三路副司令。27日，由于夏威患扁桃腺炎不能到职，再令李明瑞代理司令全权。同时部署兵力迎敌，由第一路守湘东，第二路守武长路，第三路守黄陂、祁家湾一线，第四路守阳罗，第五路守三、四路的中间地带，摆出了一副与蒋军决战的态势。

另外，早在武汉桂军“倒鲁”时，远在华北的白崇禧曾多次电告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人，要他们放弃武汉和湖北，集中兵力于湖南，背靠广西后方

---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1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迎敌。但胡宗铎和陶钧不肯撤出武汉地盘，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对蒋介石策反李明瑞等部的活动也毫无察觉，最终才按李宗仁的电令布防迎敌。李宗仁离沪南下后，经香港到广州，曾打算赴武汉指挥御敌，因天气恶劣未能成行，被迫坐困广州。

3月27日起，蒋桂双方已正式开战。蒋军陆、海、空三军联合行动，凭藉其优势兵力全面向武汉推进。桂军在兵力上虽处劣势，仍按部署分路积极迎敌。但因兵力对比悬殊，蒋军在战场上基本占据着主动地位。至31日，通往武汉的各要道大都被蒋军占领。4月2日，正当各路桂军继续顽强抵抗蒋军进攻之时，被蒋介石收买了的俞作柏随蒋海军抵达前线，并与夏威部旅长、第三路副司令李明瑞取得了联系。当晚，李明瑞即按计划率部从团风撤至孝感、花园一带。叶琪部的杨腾辉旅、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黄权团也随后赶到，与李明瑞部会合。然后，四处贴出反对胡宗铎、陶钧、叶琪等人的标语。3日，李明瑞、杨腾辉联名发出通电，宣布反对李宗仁、白崇禧，至诚拥护南京中央。李、杨等人带领的倒戈部队约占第七军的三分之二，余下部分在尹承纲等人的带领下，撤向荆门。由于李、杨等人的阵前倒戈，打乱了武汉桂军的整个布防体系，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人在黄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调整部署，改守为攻。4日，当总攻击令下达后，又出现夏部属抗令的情况，胡、陶两部被迫放弃攻击，分途退却。同日，桂军的第一、二、三道防线均被蒋军冲破。胡、陶、夏等人决定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叶琪部则由武昌南撤，集结于武长路。5日，蒋军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夏斗寅等部未受任何抵抗，进占武汉，蒋介石也于是日抵达武汉。

胡、陶、夏率余部退至鄂西后，计划以沙市和宜昌为基础，联合四川方面的杨森等势力，等待时机反攻武汉。李宗仁、白崇禧则希望他们能转道湘西退回广西，以保存实力。但蒋介石却穷追不放，起用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以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分途向荆、沙追击桂军余部。同时，还派孔庚到荆、沙，对胡、陶、夏进行劝降活动。11日，桂军张义纯部在黄家

新场附近被迫接受蒋军朱绍良改编。同日，胡、陶、夏率部由荆、沙退潜江，遭蒋的陆、海、空军攻击，损失很重，失枪2000余枝。在蒋介石的穷追狠逼之下，胡、陶、夏三人于21日通电下野，桂军余部由程汝怀等带领，在沙市接受张发奎改编。由武昌南撤集结于武长路的叶琪部，也接受何键改编，叶琪辞职离去。至此，李宗仁、白宗禧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全部瓦解。

3月底4月初，在武汉桂军倾全力抵御蒋军的进攻时，李宗仁和白崇禧经过一番辗转，先后回到广西，李、黄、白重新聚首。4月1日，新桂系将领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当时面临的情况，决定全力救援武汉，将广西尚有的一个军（第十五军）改称“靖难军”，由粤、桂分别入湘北上，并推白崇禧为总指挥，黄旭初为前敌总指挥。随后，驻粤的黄旭初、吕焕炎两师由韶关北上，伍廷飏师也准备由桂林北上入湘，然后与黄、吕两师会合北进。但这时武汉方面的形势，已因李明瑞等部的阵前倒戈，发生了逆转。不久，湖南何键和广东陈济棠也相继反桂拥蒋。于是，已入湘至宜章一带的黄、吕两师被迫掉头返桂，救援武汉的行动夭折。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仍不罢休，接着部署“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滇、粤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新桂系势力。蒋的计划是：湖南何键派所部20个团以上的兵力，于4月底前集中湘桂边的永州、道县、新宁一带，5月5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云南龙云选派所部12个团以上，于5月20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5月30日前占领百色，然后分向龙州、南宁前进；广东陈济棠选派18个团以上，以及海军第四舰队全部，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5日前占领梧州，然后立即向桂平前进。

但是，当时两湖地区尚未完全平定，不宜马上对广西用兵。于是，蒋介石摆出一副和平解决广西的姿态，意在稳住黄绍竑，诱使其放松警惕。蒋介石先是电嘱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设法转告广西，让李宗仁和白崇禧出国考察。古转托尚在羁縻中的李济深致函黄绍竑，将蒋的意图转告广西。可是，5月1日黄绍竑又收到广东方面陈铭枢转来的蒋介石电令，内容为：“1. 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 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

部队。3. 广西境内的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4. 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1] 这是李、黄、白难以接受的，黄绍竑致电南京，斥责蒋介石“逼人太甚，来电所言四点，无法接受”。[2] 新桂系一表态，南京方面便于4日下令，免去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职。这时两湖局势已渐趋稳定，19日蒋介石再次下达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命令。

李、黄、白觉得已无退路，决定孤注一掷，同蒋介石拼搏到底。5月5日，李、黄、白在梧州宣布组成“护党救国军”。同日，李宗仁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随后，李宗仁离梧赴港，联络各方反蒋，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部抗蒋。

黄、白先发制人，分兵两路东下攻打拥蒋的陈济棠粤军，目的是通过占领广州来扭转局势。桂军的进攻路线是：以黄旭初第二师、石化龙独立团及韦造时独立营组成第一路，由黄绍竑指挥，从梧州沿西江向三水攻广州；以伍廷飏第一师、吕焕炎第三师为第二路，由白崇禧指挥，经怀集、广宁、四会、三水攻广州。

同月5日，桂军同粤军在怀集开始交火，两粤战争爆发。桂军第一路迅速向德庆、肇庆前进，8日迫近三水。13日向三水发起攻击时，遭粤军香翰屏、陈策等部阻截，被击沉军舰一艘，被俘两艘，官兵损失2000余人。黄绍竑率部转向芦苞一带，以会合第二路行动。白崇禧率第二路军东下后，8日到达清远、芦苞一带。这时，粤方的徐景唐部在广九路宣布反蒋，响应桂军，粤舰队副司令舒宗鎏亦率舰附桂，并分从东、南两面攻击广州，但很快被粤军的炮队和飞机击退。19日，桂军第二路在芦苞击败粤军香翰屏旅和张达教导团。次日，桂军再败粤军于大塘。芦苞、大塘两地粤军退向白泥布防。这时，因受阻未能渡过北江的桂军第一路已转到大塘，与第二路会攻白泥。20

---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1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② 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载《学术论坛》，1986（1），91页。

日，桂军同粤军香翰屏、余汉谋等部在花县白泥、赤泥展开激战。经两昼夜苦战，桂军终因劳师远征、军力疲惫，21日在白泥、国泰战败，向四会溃退，经广宁、怀集回到梧州。桂军的攻粤作战最后失败。

当黄、白挥军东下攻粤时，湖南何键乘广西后方空虚，令所部大举人桂，攻占桂林，南下袭击柳州。云南龙云也从贵州方向进入广西，并迅速东下，威胁桂军。这时，蒋介石下令俞作柏、李明瑞率领所部兼程从汉口经上海到达广东，在粤军的配合下于6月初溯西江而上，迫进梧州。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桂军决定由黄绍竑率一部据守南线，另一部由白崇禧带领，组成三个纵队，由徐启明、覃连芳、雷飚分任各纵队司令，以伍廷飏为前线指挥官，急速北上驱逐湘军。6月16日，北上桂军突破入桂湘军的联络线。17日，覃连芳纵队在柳城大败湘军陈光中部。19日，徐、雷两纵队在沙堆与湘军刘建绪、吴尚两部对峙，覃连芳纵队从柳城回师夹击，湘军大败北逃，桂军乘胜向桂林追击。24日，覃连芳纵队收复桂林。徐启明、雷飚也在荔浦、阳朔击溃蒋军毛炳文、朱绍良部。桂军暂时控制了北线的局势。

由于白崇禧分兵北线作战，梧州守备不足。李明瑞抓住时机，在粤军的支援下迅速西进，6月2日占领梧州。桂军向平南、桂平退却。10日，李明瑞分三路继续西上。12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并指定为主席；任命李明瑞为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同日，贵县桂军吕焕炎向李明瑞输诚，被委为广西编遣队第十五路总指挥。18日，李明瑞在粤海空军的配合下攻击桂平。在内缺粮弹、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桂军桂平守将韦云淞被迫将所部交由李明瑞收编后离去。之后，李明瑞率部向南宁挺进。

由于众寡悬殊，黄、白无心再战。为保存力量，待机再起，黄、白决定将桂军余部交徐启明、梁朝玑等人带领，将民政厅长粟威等人留在南宁，嘱咐他们设法与俞、李达成妥协，保存部队。21日，黄、白通电下野，离开南宁出走龙州。24日，从龙州潜往越南，后转赴香港暂避。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失败宣告结束。

25日，俞作柏以广西省政府主席身份自梧州赴穗。次日，晤陈济棠、陈

铭枢，商议广西的善后处理等问题。27日，李明瑞率部进入南宁。之后，俞、李开始组建新的广西省政府。至此，广西暂时归属于蒋介石的名下。

三、俞作柏、李明瑞主持桂政及其反蒋失败

1929年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宁正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以曾如柏为民政厅长、雷沛鸿为教育厅长、梁五凤为财政厅长，组成了新的广西省政府。李明瑞以广西编遣区特派员的身份，① 统辖全省军队，协助俞作柏主持省政。广西转入俞、李主政的短暂时期。

俞、李二人思想倾向进步，政治上反对新桂系，但也并非真正拥蒋。他们主持省政后，踌躇满志，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使广西“另成一新局面”。②但是，俞、李回桂后，“扶持”俞、李上台的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放心，随后就安插特务头目郑介民等一批党羽到广西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从人事、财政等方面监视和掣肘俞、李。而且，还严格限制广西军队的数额，反对俞、李收编桂军旧部。“蒋之用意未始不欲将自己的势力包围俞氏。”③ 被打下台的新桂系也不甘心失败，随时准备颠覆新政权。更严重的是，俞、李自身的实力很有限，其主要的依靠力量基本上都是新桂系的旧部，内部关系极为复杂。再加上群众基础又薄弱，新政权很不稳固。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俞、李欲大展鸿图，施展其政治抱负，确非易事。

---

① 同年8月30日，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的决议，改任编遣委员会直辖第四编遣分区办事处主任委员。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62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③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年8月29日），载中央档案馆、广西区档案馆编《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936.12），101页，1982。

俞、李针对自身的缺陷和所面临的形势，采取和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势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又仿效国民革命时期联共和扶助农工的做法，通过俞的胞弟、李的姑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等关系，主动请求中国共产党方面派干部到广西工作，帮助他们巩固政权，打开新的局面。同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俞、李的请求，先后从中央机关和广东省委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广西，安排到俞、李政权的军、政部门任职，会同广西地方党组织，一面帮助俞、李工作，一面开展党的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俞、李实行了不少进步的措施与政策，积极革新广西的政治。在俞、李的主持或同意下，解散了由新桂系势力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和机构，逮捕或镇压了一批劣迹昭彰的反动分子，释放了“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关押监禁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同时，开展工农运动，恢复各地的工会和农协组织，并选派“一部分青年为农运干部，拟实执到各县去工作，并以‘二五’减租为号召”；[①] 8月，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批武器装备。9月，根据中共方面的推荐，先后委派了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到左右江地区部分县任县长或农协干部。这一切，对当时广西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数年后，新桂系首脑李宗仁仍对此进行恶意的攻击，称俞、李“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②]

俞、李治桂的动向，很快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警觉。蒋先是决定派员到广西调查，但被俞拒绝。后又电促俞到南京去解释其治桂方针，仍遭到俞的拒绝。于是，蒋认定俞、李已有异志，决定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汪精卫的改组派也得知俞、李联共治桂的情况，十分着急，加紧游说俞、李的活动，敦促俞、李反蒋独立，诱迫他们既反蒋，也要反共。9月初，在蒋介石的威

---

①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9年8月29日），载《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4～1936.12），102页。

② 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军事概略》，载《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30页，第四集团军政训处，1935。

逼和改组派的极力煽动下，俞、李被迫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反蒋，和鄂西方面的张发奎联合攻粤。

中共方面获悉这一情况后，认为俞、李主持桂政不足半年，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失败。因此，真诚地向俞、李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力劝他们不要上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当，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这时，改组派以张发奎已在鄂西行动，逼俞、李表态。俞、李考虑再三，认为阎锡山、冯玉祥正在北方发动反蒋，蒋介石无暇南顾，加以广西地形复杂险要，如起事不成，仍可据守。结果，俞、李没有听从中共方面的劝阻，仍坚持和张发奎共同行动。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发出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响应张发奎“护党救国”，并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正、副总司令职。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立即下令出兵沿西江向附蒋的粤军陈济棠进攻。

可是，出于俞、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桂军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人经不起利诱，已被蒋介石以省政府主席等职务和200万块大洋收买了过去。李明瑞等刚率驻邕部队东下不久，吕焕炎即在梧州迎接粤军入境。接着，4日，李腾辉通电拥蒋，在柳州就任蒋介石所委之广西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兼广西省政府委员等职。5日，吕焕炎也宣布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黄权任第十五师师长。吕、杨、黄叛桂投蒋，完全打乱了俞、李的倒蒋计划，俞、李被迫率余部返回南宁。

与此同时，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奉蒋介石的命令，率领三个师的兵力溯西江而上，直捣南宁。吕焕炎等紧密配合粤军行动，派兵向南宁迫进。此外，蒋军朱绍良等部也奉命兼程南下，与粤军共同“讨逆”。

结果，俞、李出兵反蒋不到10天，便不战自败，俞、李主政不足三个月，终于以反蒋失败宣告垮台。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离开南宁转移龙州时，俞作柏、李明瑞也在特务营的护卫下一同前往。抵龙州后不久，俞作柏出越南去了香港。李明瑞经过中共方面的争取，留在龙州，以后与邓小平、俞作豫等一起发动龙州起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四、新桂系东山再起和桂张军攻粤

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广西陷入混乱状态。虽然蒋介石委任叛桂将领吕焕炎、杨腾辉柄政，可是，吕、杨二人资历较浅，声望难以服众。他们投蒋附粤，反复无常，更激起桂军上下的反感与鄙视。所以，俞、李垮台后，桂军官兵普遍希望李、黄、白尽快返桂，重整局面。在梁朝玑等将领的极力主张下，派人分赴香港和越南海防，迎请李、黄、白返桂。

这时，汪精卫国民党改组派因俞、李反蒋失败，转而拉拢新桂系，希望借助新桂系的力量继续反蒋。为此，改组派专门延请与新桂系关系较深的张定璠出面牵线，主动到香港与黄绍竑联系，商谈合作反蒋的问题。改组派希望李、黄、白重新出山，和已在鄂西反蒋的张发奎联合行动，以实现在广东组府的计划。黄绍竑也深感以往广西反蒋屡遭失败，与政治上缺乏依靠有很大关系，而汪精卫当时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号召力，觉得参加汪派组织的反蒋联盟，也是新桂系东山再起的一个好机会。于是，黄绍竑和改组派达成了返桂重整旧部，与张发奎合力攻粤的协定，并着手准备返桂。

同年10月，汪桂合作由张定璠居中促成后，汪精卫很快从法国返回香港，组织反蒋军事。是月下旬，张发奎率部突破蒋军的追击堵截，从鄂西经湘西进入桂北，并与桂军取得了联系。这时，因李宗仁、白崇禧已先期离港移居越南的西贡和海防，黄绍竑决定先行返桂，收集旧部。

11月上旬，黄绍竑秘密离港回桂，6日回到容县。18日，与旧部将领在宾阳密商行动计划，决定将各部兵力秘密东移，然后与入桂张发奎部联合发动攻粤。是月下旬，李宗仁、白崇禧在海防会合后，取道广州湾回到南宁，黄绍竑到邕会齐。李、黄、白经商议后，决定按与改组派达成的协定行事，在南宁组织“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传达所长、黄绍竑任

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桂军和张发奎部改编为“护党救国军”第三、第八路军，张发奎和李宗仁分任（兼）总司令。广西的军政大权，重新回到了李、黄、白的手中。随后，桂、张联军设大本营于梧州，发动“讨蒋靖粤”战争。

桂张军兵力共约4万人，分两路东下。12月初，张发奎第三路军进抵上岳，李宗仁第八路军也已按计划集中清远，摆出一副与拥蒋粤军决战的阵势。

蒋介石对桂张军攻粤早有准备，除令陈济棠粤军全力迎敌外，还派遣朱绍良部三个师南下援粤。又令湘军何键部入桂牵制桂张军的行动。委任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全面指挥对桂张军作战。

12月6日，桂张军开始攻粤。联军按照李宗仁的命令，分别从横石和洲心墟渡过北江，向广州攻击前进。张发奎第三路军攻势凌厉，连续破敌，仅3天时间便攻占花县、象山等地，追敌至石角、两龙墟。10日，李宗仁第八路军在军田与敌激战，因军队新编不久，战斗力不强，进展缓慢。12日，蒋军陆、空协同反攻。张发奎第三路军伤亡惨重，又与李宗仁第八路军联系不上，陷入困境。13日，黄绍竑率4个团渡河猛攻赤泥、炭步，拟乘粤军主力增援花县，冲破粤军防线，攻占广州。但粤军防御工事坚固，未能成功。次日，黄绍竑率部集中清远一带，会合张发奎第三路军从四会撤退。李宗仁等久攻军田不下，又知第三路军已退却，也脱离战斗撤回四会。随后，联军经广宁、怀集撤退回桂。但是，粤军已抢在联军之前，于19日占领梧州。联军被迫放弃退守梧州的计划，退平乐、荔浦一带休整，并撤销“护党救国军”番号，恢复原来的第四、第七、第十五军番号，仍以李宗仁为总司令。

桂张军撤退后，蒋军向平乐、荔浦追击。这时，桂军的吕焕炎再次叛桂投蒋，于下旬乘虚占领桂平、贵县、玉林、南宁，配合粤军反桂作战。联军前后受敌，情势极为危急。为了摆脱困境，1930年1月5日联军在平乐举行会议，议定由白崇禧指挥杨腾辉第七军、梁瀚嵩教导师、黄华表警卫团拒止粤军向平乐、荔浦发展；黄绍竑、张发奎率第四、第十五军南下，解决吕焕炎部，以固后方。

联军分头在桂南、桂北和桂东南三方面展开军事行动。桂南方面，1月13日，黄绍竑率第十五军从修仁南下，9日抵柳州。南宁的吕焕炎叛军派代表到柳州见黄绍竑，议定在邕举行兵变后归附。18日，南宁吕焕炎叛军兵变，黄绍竑等率部重占南宁。同日，驻宾阳的叛军两个团也移到黎塘宣布归附桂军。次日，在黄绍竑的指挥下，许宗武师袭占桂平，梁朝玑师攻占贵县，吕焕炎率残部退守玉林。至此，桂军平定了桂南。桂北方面，1月下旬，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指挥下，杨腾辉第七军、梁瀚嵩教导师，以及在宾阳归附后奉调北上的伍朝栋、韦恒心两团，采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栗木、龙窝、马岭、阳朔等地，与蒋军朱绍良部周旋，并连续击败蒋军。2月7日，蒋军逃过漓江，向八步退却。10日，桂军追到八步，蒋军败退信都、开建，后转往梧州与粤军会合。桂北战事以桂军大胜而告终。桂东南方面，黄绍竑第十五军平定桂南后，除以许宗武师攻打玉林之外，其余兵力继续沿西江东下，直逼梧州。同时，张发奎第四军从横县经邕钦公路远略广东南路。但是，许宗武师久攻玉林不下。粤军则趁桂张军分兵作战，抓住战机，以退集梧州的蒋军为后援，集中兵力沿容苍公路进援玉林，谋解吕焕炎之围，桂军有被敌夹击围歼之危，黄绍竑不得已率部退到北流，并急调第四军回师共同御敌。黄绍竑不听白崇禧急电劝阻，坚持孤军与敌决战，令第四、第十五两军同优势的粤军在北流北面决战。从13日起，桂张军同粤军余汉谋、蒋光鼐、香翰屏等部展开激战。16日，在主客异势、劳逸殊形的不利情况下，桂张军损失惨重，终于败北，溃退贵县。随后，桂军退守桂平、贵县，与进占玉林五属及大河下游的粤军隔江对峙，等待时局的变化。

五、新桂系参加反蒋大联盟和入湘作战

1930年春，正当新桂系与蒋粤混战，陷入困境之时，中原大地又燃起了

反蒋战火。蒋冯战争之后，已与蒋介石交恶的阎锡山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势力的轮番游说之下，主动与冯玉祥修好，决定组盟反蒋。处境维艰的新桂系视此为解困和重新发展的良机，很快应邀加入空前的反蒋大联盟。

为了促成各派反蒋大联盟，新桂系积极地开展反蒋串联活动。派胡宗铎在天津租界建立活动据点，以广泛联络反蒋各方。又派麦焕章、潘宜之和黄建平等为代表，专程赴晋晤阎，商谈联合反蒋的事宜。2月21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联名发出通电，敦促蒋介石下野，以谢国人，明确表示拥阎倒蒋。3月15日，黄绍竑又和鹿钟麟、商震等50多人联衔，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反蒋通电，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军权，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28日，阎锡山、冯玉祥电邀各方反蒋人士到太原开会，共商反蒋大计。新桂系派叶琪、胡宗铎、麦焕章到会。这次大会正式宣布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等为副总司令。至此，反蒋军事联盟正式形成。

经过多方串联和谋划，反蒋各方相约以阎、冯、桂三个派系为基础，联合其他地方反蒋实力派，组成中华民国军，计划编制八个方面军。同时，西山会议派和改组派等也放弃了昔日的“党统”争执，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李宗仁是这个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七委员之一。最后，反蒋各方大体上达成了由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的协议。这样，一个包括党政军各方的反蒋大联盟终于形成了。由于新桂系的实力已非昔日，在这个反蒋大联盟中只充当了一个配角的角色。但他们却极其希望此次反蒋能够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完全摆脱困境，峰回路转。

4月1日，李宗仁在桂平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桂张军随即按编制计划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李宗仁兼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兼第三路指挥官，白崇禧为参谋长兼第二路指挥官，张发奎为第一路指挥官。按反蒋联军的战略目标，桂张军的作战路线和任务主要是：沿粤汉线北上，与沿平汉线南下的冯军南北对进，夹击湖北蒋军，会师武汉，

控制长江中下游；进而配合沿津浦线南下的晋军、与沿陇海线东进之冯军及晋军之一部攻占济南，会师徐州，然后进兵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确保这次参战的顺利进行，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在南宁举行会议，① 决定放弃广西，全力入湘，进取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同时，电促尚在右江"进剿"红七军的黄绍竑将所部为后续部队，跟进北上。

5月中旬，李宗仁等率部摆脱蒋粤军的围攻，集中桂北，分三路入湘。因何键湘军有意避战，桂张军第一、第二路军未经认真作战，便顺利深入湘境。18日，入永州。28日，攻占衡阳、邵阳。6月3日，克醴陵。4日，占领长沙。8日，第二路军占岳阳，第一路进抵平江。何键率部退入湘西，蒋军朱绍良等部北逃，桂张军的前锋已进入鄂省境内，构成了直逼武汉之势。这时，北方战场进展也颇为顺利，晋军攻占了济南，冯军正由许昌向南追击。阎、冯、桂三军会师中原之态势已基本形成。

但是，南方战场的形势却由于黄绍竑贻误战机而发生逆转。按南宁会议决定，黄绍竑率梁瀚嵩和黄旭初两个教导师为后续部队，应在白崇禧第二路军进占长沙时开抵衡阳。可是，黄绍竑第三路军却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抵达衡阳，使全军的北进速度受到了影响。原误以为桂张军绕道北江攻粤的粤军，按蒋介石的指令，尾随桂张军第一、第二路之后占领了衡阳。蒋介石同时又调集军舰进入洞庭湖参战，协攻桂张军。何键湘军也趁机从湘西反攻长沙。结果，入湘桂张军被拦腰截为两段，陷入前有重兵拦阻，后有强敌尾随攻击的危境。另外，北面的冯军在许昌打败蒋军后，便移主力至陇海线战场作战，没有按原定的战略计划与桂张军第一、第二路协同行动，失去了南北夹击武汉的战机。

在突变的形势下，李宗仁等被迫作出回师会攻衡阳，然后再相机北进的选择。6月中旬，桂张军连续放弃岳阳、平江、长沙等地，19日，退至安仁、

① 另有一说会议是在贵县黄练墟举行。此处系采程思远说，见程思远《政坛回忆》，34页。

茶陵、耒阳一带。李宗仁在耒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全军渡过湘江西岸，据守宝庆、祁阳及永州等地，待秋凉后再图进展。在衡阳的粤军发现桂张军后撤，急忙向祁东洪桥出动，欲进守祁阳熊飞岭。李宗仁侦知粤军的意图后，认为反攻夺回衡阳较之消极退守更为有利。于是，自6月29日至7月1日，桂张军为夺回衡阳，与粤军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等部在衡阳西面回龙寺、弹子山一带激战。因溽暑远征、兵力疲惫，桂张军最后战败，损失严重，师长梁重熙阵亡，被迫分向祁阳、永州退却。粤、湘军联合行动，继续追击溃退的桂张军。4日，粤军占领祁阳、永州，桂张军退回广西全县。

入湘作战的失败，终使新桂系与阎、冯会师中原的计划成为泡影。

六、李宗仁、白崇禧坚持抗蒋，黄绍竑“息兵言和”

桂张军败退广西以后，蒋介石没有放弃以武力讨平新桂系的计划，继续调遣兵力围攻广西。湘、粤、滇各军也不敢丝毫松懈“讨逆”行动，纷纷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发兵进军广西，企图一举荡平桂张军。几番拼搏和失败之后，新桂系的地盘仅余南宁、柳州、桂林及庆远之间的狭窄地带。而且，南宁正受滇军围困，柳州与南宁之间的交通也被粤军切断，桂林一带一直是战火不息。桂张军四面楚歌，处境危殆。

更为严重的是，桂张军连续征战，几次受重创，不仅兵力疲备，军心涣散，就连那些统兵的将领们，如黄绍竑、张发奎等人，也都心灰意冷，情绪十分消沉。作为全军副帅的黄绍竑一直被在北流战役指挥失策和入湘作战贻误战机的阴影笼罩着，更是表现极端的消极，甚至“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1]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63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在内外交困、处境危险的情况下，李宗仁和白崇禧继续坚持反蒋立场，并采取了比较务实和稳妥的态度，从容地进行安定内部的工作。首先，冷静地处理了黄绍竑通电“息兵下野”的事件。8月21日，在桂林休养的黄绍竑发出“马”电，自动辞去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及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向蒋介石呼吁“息兵和谈”。这在桂张军内部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精明的李、白对此没有采取过激的态度和行动，苦劝黄绍竑放弃这一做法没有奏效，而黄又一时难以离桂赴港，于是由白崇禧平静地接替了黄的副总司令职务，并将黄接到柳州妥善安置，避免了因这一重大内部分裂事件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接着，李、白又根据张发奎部严重减员的情况，主动撤销桂军两个教导师的编制，将此两师兵员约6000人和装备，全部补充张部，以帮助其恢复战斗力。另外，为了继续保持和发展桂、张两军的合作关系，李、白还采纳了汪精卫通过张定璠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于9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由李、白、张三人共同担任这一组织的中央常务干事职。这对于巩固桂、张两军的合作，稳定军心，起了不小的作用。同时，李、白、张针对拥蒋军压境的情况，调整了全军的防御部署，仅以梁朝玑师坚守桂林，将主力移至柳州，确定“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① 的御敌方针。此外，还于8月中旬在柳州重新改编部队，继续保留第四、第七、第八、第十五4个军的番号，由张发奎、杨腾辉、颜仁毅、黄旭初分任各军军长。

部队整编后，按计划进行解除南宁之围的行动。9月28日，白崇禧率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等部从柳州出发南下，令李品仙部在宾阳一带发动佯攻，牵制粤军，阻止其越过昆仑关与困邕的滇军会合；另以一部兵力佯攻武鸣和高峰隘，以迷惑敌军；主力部队则由上林和宾阳之间的山区潜入邕宾公路的四塘，向南宁前进。10月13日，主力黄旭初部进入预定地点后，开始向围困南宁的滇军发起攻击。南宁守军韦云淞部同时配合行动。在桂军的内外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63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夹击下，滇军仓促应战。激战竟日，滇军不敌，向右江撤退，被困两月有余的南宁终于解围。23日，白崇禧率张发奎、杨腾辉两军追击退恩隆县平马镇的滇军。双方在平马激战5日，滇军不支，撤回云南。占据宾阳的粤军余汉谋部见滇军溃败，也自动撤离宾阳，退驻贵县。至此，邕柳公路复通，李宗仁将总司令部由柳州迁往南宁。桂北方面，因何键湘军分兵应付湘省红军，未能以全力配合粤军在桂北的行动，所以，桂林始终控制在桂军手中。这样，新桂系的地盘又恢复到入湘参战前的状态。

南宁解围后，黄绍竑随同李宗仁从柳州来到南宁，仍坚持与蒋息兵言和主张，与李、白等人在政治上的分歧难以消除。12月2日，黄绍竑在南宁向李、白等人表明其离桂意向之后，悄然离邕，取道龙州出越南，后转赴香港。新桂系的“李、黄、白”时代，至此宣告结束。1931年1月，黄绍竑应蒋介石邀请，离港偕伍廷飏等赴南京。黄到南京后，先后任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等职，但没有完全被蒋介石所利用。后来黄在蒋桂之间奔走斡旋，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

七、桂粤联合反蒋

1930年10月，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打败阎、冯、桂反蒋联盟，踌躇满志，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他当总统，建立其个人独裁统治。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要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反对制定约法和选举总统，由此爆发了蒋、胡的“约法之争”。蒋介石先是软化压服胡汉民，不成便恼羞成怒，1931年2月28日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扣押，囚禁于南京汤山。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事件，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胡的亲信、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跑回广州，策动陈济棠联络粤籍中央委员和反蒋各派联合反

蒋。于是，居留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胡派分子和反蒋派纷纷云集广州，酝酿一个新的政治局面。4月22日，陈济棠派马晓军、吴锡祺来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释嫌修好，团结反蒋。25日，李、白派王公度、吴奇伟偕吴锡祺前往广州，与陈济棠洽商两广合作。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委员、各院长、各部长等，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介石"违法叛党，逆迹昭著"，提请"严予处分，以张正义而肃纪纲"，呼吁"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氏罪状进行公决。[①] 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发表响应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孙科等也通电斥责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号召全党反蒋。

5月初，陈济棠为促使两广合作反蒋，将驻守广西桂平、梧州一带的粤军撤回广东。李、白派第四十三师黄鹤龄部前往接防。至此，粤军全部退出桂境，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

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陈济棠出兵广西，替蒋介石打桂系。几年间，两广兵戎相见，相互攻杀，新桂系接连损兵失地，已经山穷水尽，濒临绝境。蒋胡争斗使广西形势骤然转机，桂粤化干戈为玉帛，合作反蒋，新桂系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了新的局面。

桂粤言归于好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先后前往广州，同陈济棠和各反蒋派商讨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次反蒋各派组府办法，还是走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5月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集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被推选为常委，并发表《非常会议成立宣言》，声称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推翻蒋介石的独裁，完成国民革命。同日，非常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在广州成立与南京相抗衡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大

①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19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纲》，推选唐绍仪、汪精卫、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邓泽如、唐生智、蒋尊簋、邹鲁、李烈钧、陈友仁、熊克武等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28日，广州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许崇智、孙科5人为国民政府常委，轮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广州国府只设两部两处，陈友仁兼任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陈融为国民政府秘书长，李朗如为参军长。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使国民党又出现一次大分裂，形成宁、粤分庭抗礼的局面。

广州国民政府实际上只管辖粤桂两省，以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7月1日，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黄旭初宣誓就职。同时，粤桂两省军队进行整编，粤军称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陈济棠任总司令。桂军恢复武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称号，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叶琪任总参谋长，张发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任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任第八军军长，黄旭初兼第十五军军长。两广部队整编后，决定出师讨蒋，第一、第四集团军集结粤湘、桂湘边境，由白崇禧任联军总指挥，准备入湘北伐。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准备迎击两广军队。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正当宁粤双方严阵以待，内战危在旦夕之际，日本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舆论的压力下，宁粤双方不得不在"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口号下酝酿妥协。但双方为各自的利益讨价还价，南京方面要求粤方停止非常会议，取消广州政府；广州方面则提出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几经磋商，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解决纷争。

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双方继续争吵，使会议一度陷入僵局。经过7次会议，多方斡旋，最后达成协议：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并举行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国民政府；南京政府改组

后，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取消。① 这次会议的实质是宁粤双方进行政治分赃。会议对于蒋介石下野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会后又引起纠纷，粤方出现分裂。

根据上海“和平会议”的协议，11月12日蒋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11月18日粤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由于陈济棠等实力派的排挤，汪精卫派100余人跑到上海另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主持下，② 仍以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为宁粤统一的前提条件。蒋介石迫于形势，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蒋下野后，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决议结束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改设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作为西南最高党政机关。12月22日，宁、粤、沪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国民党重新“统一”，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

国民党四全大会后，蒋介石虽然已下野，但仍幕后操纵，整垮孙科政府，拉拢汪精卫，排挤胡汉民，进行东山再起活动。汪精卫因受陈济棠的排挤，也设法靠拢蒋介石。1932年1月，蒋、汪在杭州会晤勾结，达成权力分配协议。随后，蒋、汪相约入京，改组南京政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不久，汪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汪主政，蒋主军，建立蒋汪合作政权。蒋汪合流后，蒋介石对两广采取排挤态度，蓄意搞垮新桂系。蒋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部以“抗日”为名离桂投蒋，削弱新桂系的实力。因此，国民党四全大会后两广方面虽然取消了“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表面上统一于南京，但又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工具，拥胡汉民为领袖，以军事实力割据，与南京继续处于对抗的状态。新桂系则利用宁粤对峙局面，致力于整顿省政，积蓄力量，伺机打出广西，与蒋介石争夺天下。

---

①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19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② 1931年10月14日胡汉民获释，离开南京到上海，28日自沪赴香港。12月2日在广州主持国民党四全大会。

八、“六一事变”和蒋桂妥协

1932年以来，新桂系和陈济棠拥胡割据两广，与南京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暂时容忍。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两广失去重心人物，宁粤关系急剧变化。

胡汉民病逝后，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广问题时机已到，便利用派王宠惠、居正等赴粤吊胡之机，以“全国统一”，加强“精诚团结”为名，要求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结束与南京的半独立状态。并准备如两广不服从，即以武力解决。

蒋介石利用胡丧压迫两广取消半独立，激起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不满。尤其是陈济棠恐失“霸主”地位，十分恐慌和愤怒，急忙与李、白商讨办法，主张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揭橥反蒋。李、白以为外侮日亟，主张慎重，不宜鲁莽用兵。但陈济棠态度异常坚决，并表示如广西不合作广东将单独行动。李、白认为桂粤唇齿相依，不能各行其是，遂决定与陈济棠共同行动。用什么名义反蒋？李、白与陈济棠经过反复商议，认为“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揭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①] 这样，两广紧锣密鼓地酝酿一场以“抗日”为名义的反蒋事变。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第一、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同日，白崇禧在南宁省政府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抗日救国》演讲。6月2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出“冬”电，要求南京中央对日抗战，并呼吁全国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抗日。4日，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数十将领联名向国民党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66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电响应，表示拥护“冬”电，要求改颁军队番号，明令部属北上抗日。两广部队迅速进行改编，称“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陈济棠、李宗仁任正副总司令。6月9日，粤桂军动员，分三路入湘。粤军4个师由张达率领占郴州，桂军3个师由夏威率领开抵永州。

两广在出兵北上的同时，发动国民党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响应，争取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新桂系在全省大力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宣布废除中日一切屈辱协定!”“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①] 等等口号。各界群众一时不明真相，出于爱国热情，纷纷响应，组织各种抗日团体，集会请愿和游行示威，大中学校学生踊跃参加学生军，下乡宣传抗日。一时之间，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空前高涨起来。两广抗日运动得到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联合会发动万人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督促中央出兵抗日”等决议，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此次新桂系与陈济棠“抗日”反蒋，被称为“六一事变”或“两广事变”、“西南事变”。



南宁各界群众4.5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大会

两广以“抗日”之名发起反蒋运动，使蒋介石陷入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为稳住局势，一面派陈诚到长沙坐镇，并急调2个军南下控制衡阳，阻止粤桂军；一面对两广采取缓和措施，6月6日电邀白崇禧到南京共商国是。7日，分电陈济棠、李宗仁：“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事

① 《广西省政府公报》，第131期，广西省政府，1936。

先一未协商，而遂以出师为号召，是损伤整个国家之尊严与军人之立场，不啻以御侮之名义，而适与侮我者以快心。”① 希望两广勿轻率行动。蒋还部署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两广派员出席。但蒋介石又暗中使用收买的惯用手法，分化两广内部。7月4日，蒋用巨款收买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驾机48架北飞投蒋。接着，陈济棠部将余汉谋、李汉魂等通电反陈拥蒋。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7月18日宣布下野，离穗赴香港。陈济棠垮台后，事变中心转移到广西。

广东失败后，广西势单力薄，形势十分不利。蒋介石看到广东被迅速瓦解，遂决意彻底解决广西。蒋以调虎离山之计，7月25日以国民政府名义突然免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职，② 改任李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任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负责处理桂局善后。接着，蒋一而再，再而三地电促李、白速就新职。李、白知蒋新命意在削其兵权，电蒋严斥“墨渖未干，自毁信誉”，表示“殊难遵令”。③ 蒋介石见李宗仁、白崇禧不肯就范，于是调动几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三面进逼广西。蒋空军不断在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威胁扰乱，大有李、白不服从即荡平广西之势。李、白亦不甘示弱，一面声言坚持抗日立场，一面全省动员，集中民团组编军队。蔡廷锴在南宁号召原十九路军官兵来广西报到，恢复十九路军。桂军由原来14个团迅速扩编为44个团，准备与蒋军一决雌雄。与此同时，新桂系加紧联络各党各派和反蒋人士，李济深、彭泽湘、刘芦隐、章伯钧、邓初民等应邀到南宁，与李、白商讨成立反蒋政府。所谓“抗日救国”运动即将演变为大规模的内战。

当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蒋桂双方又都有所顾忌，感到内战爆发形势对自己并不利。这时，蒋介石正有事于华北和西北。日军向华北步步

---

① 陈锰波：《中华民国春秋》，672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

② 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上册，67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进逼，蒋忙于与其周旋。特别是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不稳，使他坐立不安。蒋急于解决广西问题，好腾出手来全力应付西北。如广西问题旷日持久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程潜、黄绍竑等向蒋进言，建议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新桂系方面，陈济棠垮台后广西势态孤立，特别是财政日见拮据。贵州王家烈被蒋介石武力降服后，蒋亲信吴忠信主持黔政，禁止云贵鸦片运进广西，改道湖南，新桂系每年烟税大减，严重影响全省财政收入。蒋介石还派人到香港，忽然将桂钞全部吸收过去，造成银根吃紧周转不灵；忽然又将桂钞全部抛出，使广西通货泛滥，物价高涨。新桂系的财政经济陷入混乱，临时扩编的几十万部队费用难以为继。面对这一形势，李、白无力支撑下去，因而认为对蒋应谋缓和为上策。因此，表面上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但又互留余地，暗中寻找转圜办法。

“六一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支持两广当局抗日，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6月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谈话，称赞两广抗日行动是“值得庆幸的壮举”。7月间，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先）从陕北经西安、天津、香港千里迢迢秘密来到南宁，会见李宗仁，对新桂系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云广英向李宗仁表明中共对“六一事变”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云广英还向李宗仁阐明了中共的“逼蒋抗日”方针，希望广西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①] 中共方面还通过救国会推动李、白和平解决事变。救国会派杨东莼为代表应李、白之请到南宁。杨东莼坚决反对开府反蒋，向李、白及各方人士阐述在民族危亡面前，应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不应轻率对

① 云广英：《特殊使命》，载《革命史资料》，第10期，5~6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内用兵，要设法说服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共同对外。① 杨东莼还通过白崇禧的亲信刘斐，力促白不要同蒋破裂。在中国共产党和救国会的积极推动下，李、白酝酿同蒋介石谋和。

8月10日，李、白派刘斐前往广州，进行和谈试探。广东方面也派唐星、邓世增等来南宁，探询广西的和平意向。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来往于粤港，与李、白代表会谈，调停蒋桂矛盾。刘斐在广州会见了蒋介石，就双方和谈问题进行磋商，初步达成和平方案。刘斐回到南宁后，李、白召集会议讨论具体办法。新桂系提出的“和平条款”的主要内容是：(1) 南京方面积极准备抗战，如日本再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参战；(2) 蒋介石收回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李、白通电服从中央；(3) 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② 8月下旬，刘斐携广西的“和平条款”再赴广州，与蒋介石会谈。

1936年，中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日本大举增兵华北，并在平津一带日夜进行军事演习，正向着吞并整个中国的目标前进，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民族危亡形势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救亡图存”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在这个形势的压力下，蒋桂双方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妥协方案，罢兵息战。9月2日，蒋介石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为代表到南宁，与李、白举行正式和谈，确认和平条款。9月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委，黄绍竑仍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广西维持现状。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称：“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此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

① 沙千里：《回忆救国会的七人案件》，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50页，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

②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25页，1960。

领导之下,相为一致之努力。"①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刘斐等赴广州，次日与蒋介石会晤。至此，延续3个多月的“六一事变”和平解决。1929年以来的蒋桂对峙宣告结束。



Receiving General Li Chung-jen, who came to Canton after the settlement of the Kwangsi situation.

李宗仁赴穗谒蒋介石时与蒋合影

“六一事变”是两广军事实力派同蒋介石矛盾的产物。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压迫，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事变中，两广当局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蒋桂经过和谈，达成妥协，避免了内战，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战的形成。蒋桂结束对抗，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合作抗日铺平了道路。

①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5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第八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艰苦斗争

新桂系“清党”反共后，广西革命运动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但广西的共产党人顽强不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努力重建党的组织，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1929年，中国共产党利用蒋桂战争后广西的特殊形势，积极开展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邓小平、张云逸等利用俞、李反蒋失败的有利时机，成功地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探索了新的经验。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命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红七军奉命北上后，邓小平等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放弃进攻中心城市，率领红七军向湘桂粤边转移，1931年7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北上后，国民党新桂系军队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围剿”，韦拔群等牺牲，革命根据地丧失。但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红军武装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个时期，领导南宁、玉林、贵县等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共郁江特委及其所属的党组织，也在新桂系残酷镇压下遭受严重破坏，郁江特委解体。但广西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战斗，继续设法恢复党的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从此，广西革命斗争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

一、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广西党组织的初步恢复

新桂系的“清党”反共，使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要坚持和继续领导广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恢复和发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就成为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及广西各地中共党员的重要任务。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1927年5月，中共广东区委（后改为广东省委）先后从广州、武汉抽调廖梦樵（平乐县人）、邓拔奇（怀集县人）、黄士韬（贺县人）、黄启滔（又名黄一平，贺县人）等中共党员来到梧州，组建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梦樵，委员有邓拔奇、黄士韬、黄启滔、宁培瑛等，属广东区委领导，8月后属中共南方局领导。

中共“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中共广西地委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计划在1927年中秋节（10月9日）在梧州、平南、桂平一带举行起义，但因计划被敌发觉，广西地委机关和梧州市总工会机关遭受国民党梧州军警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长黄士韬和梧州市总工会全体执委及革命群众100余人被捕。不久，廖梦樵、黄士韬等被杀害。10月底，地委委员邓拔奇转移到平南、桂平农村，会合宁培瑛等，于桂平县重建广西地委，书记邓拔奇，委员宁培瑛、苏其礼、黄启滔等，继续领导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

10月21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中共广西地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广西地委在县、市成立县委或市委，改变一县建一个支部的状况，要尽力吸收农民骨干入党，大力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以土地革命和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为斗争口号，发动广西的武装暴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广西地委一方面积极响应广州起义，在平南县劳五区组织农军武装暴动，袭击平山团局。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党员，建立县、市委。至1928年初，先后建立了桂平、平南、贵县、武宣、容县5个县委和梧州市委，下设9个区委和81个支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1928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南方局已撤销）传达中共中央命令，将中共广西地委改组为中共广西特委。24日，广西特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布第一号通告，通报改组结果：特委书记邓拔奇，常务委员邓拔奇、胡福田、苏其礼、余济卿、昌景霖。特委隶属广东省委，机关设在桂平农村。为加强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先后派参加广州起义后撤到香港的陈勉恕、朱锡昂、雷经天、俞作豫等回广西工作。他们到广西后，一边在同正（今属扶绥县）、南宁等地恢复或建立党、团组织，一边设法与特委书记邓拔奇取得联系，共同发展各地党组织。至1928年3月，全省共有党员825人，以桂平、平南两县为最多。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广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全省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制定今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工作方针，1928年6月1日，中共广西特委在贵县圩心街广东巷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和梧州、玉林、南宁、桂林等地党的负责人10多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代表恽代英到会指导。特委书记邓拔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和军事等三个决议案。会议决定接受广东省委关于组织夏收暴动的决议案，做出了准备举行夏收暴动的决定。会议改选了特委领导机构，选举委员15人，恽代英指定朱锡昂、董铨汉、邓拔奇、雷经天、黎赤夫、昌景霖、郭金水等7人为常委，朱锡昂任书记兼管宣传科，董铨汉为候补书记兼管组织科。会议决定特委机关从桂平迁到梧州。

会后，特委派巡视员分别到南宁、柳州、桂林、玉林、梧州等地进行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工作。至8月，全省共建立了桂平、武宣、贵县、容县、玉林、北流、同正、怀集、宾阳、苍梧等10个县委和梧州、南宁两个市委；同时根据广西实际情况和中央指示调整了工作部署，变组织夏收暴动为争取群众、发展组织，建立党的基础。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广西代表胡福田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期间，胡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广西党组织及农民运动、职工运动、士兵运动的情况，请求中央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7月，广西特委又向中央提出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要求。中央同意这一要求，于9月2日、3日分别通知广东省委和广西特委，决定将广西特委改组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直属中央领导，同时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并决定从广东调工人出身的王强亚到广西担任临委书记（未到职)。9月22日，广西特委在梧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和中央来信指示，正式宣布把中共广西特委改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但不久又遭挫折。10月至11月，因原广西特委常委吕景霖被捕叛变，设在梧州的中共广西省临委机关两次遭受破坏，临委委员谭景韶、李秀农、郭金水、陈启东、胡福田等相继被捕牺牲，临委机关被迫迁往玉林。12月17日，广东省委致函中共中央，说王强亚同志无法找到，省委决定改派文沛（香港邮政工人，香港东区区委书记）前往广西任临委书记。

1929年1月，中共中央巡视员贺昌在香港召开广西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将中共广西临委改组为中共广西省委的决定，指定文沛、朱锡昂、聂根、雷荣璞、胡福田（1928年12月已牺牲，中央未悉）等5人组成广西省委，文沛任书记。会后，文沛等由港到梧，因建立省委机关的铺保批租问题不能解决，便决定改在南宁建立省委机关，省委秘书处设在南宁郊区津头村。文沛担任省委书记，是中共“六大”后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事实上，文沛不了解广西各级党组织的情况，加上领导能力低，因而在广西的工作进展较缓慢，省委成立后两个多月，仅同南宁、贵县、宾

阳、玉林、北流等市、县党组织取得联系。3月4日，省委秘书处突遭国民党十五军军部派出的两个连军队的搜捕、破坏，朱锡昂、雷经天不能再在南宁继续活动，省委机关不能健全。

1929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致函中共广西省委，传达中央关于在军阀混战中党的工作方针和中央组织会议关于改组广西省委为广西特委的决定，并明确今后广西特委受广东省委领导，机关仍设南宁。广西省委接指示信后，即决定执行中央决议，将省委改为特委，原省委成员为特委委员。同月，文沛回香港汇报工作，广西党的工作由雷经天主持。至7月，广东省委派何晋达到南宁任广西特委书记。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终于在曲折中站稳了脚跟。

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军阀混战虽然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却给广西革命造成了有利形势。

4月，新桂系失败。6月，蒋介石委派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7月，俞、李到南宁主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俞、李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邓斌）、贺昌、张云逸、叶季壮、陈豪人、袁任远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分别在广西省政府和军队中任职，做兵运和统战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邓小平等到广西后，巧妙地对俞作柏、李明瑞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他们从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广西的政治形势出发，正确分析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及其从军阀混战中派生出来的广西新政权的特殊性，认为对俞、李进行争取、教育工作是必要和可能的。俞作柏、李明瑞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国民党员，大革命时期，受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而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就是共产党员。在“四一二”政变中，新桂系追随蒋介石“清党”

反共，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俞、李同情共产党和广大民众，对“清党”表示不满，谴责“以为民众可侮，而肆无忌惮”的罪行。他们主政广西后，踌躇满志，想干一番大事业，但又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蒋介石对他们不放心，派郑介民、卢奕农等一批亲信到俞、李政权和军队担任要职，暗中监视。新桂系的旧部势力也不甘失败，妄图从内部破坏和发难。当时，李明瑞从湖北带回广西的两个师，基本上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成分极为复杂。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也派人到广西插手活动。加上群众基础薄弱，财政面临极大困难，因而俞、李政权很不稳固。邓小平等正确地把俞作柏、李明瑞及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广西新政权与国民党右派区别开来，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以共同反对蒋介石和新桂系；同时，又坚持中共独立自主的方针，趁机发展革命力量，使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第一，不少共产党人在俞、李军政部门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如张云逸任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李谦任警备第四大队副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五大队队长，陈豪人担任省府机要秘书，龚鹤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徐冠英任广西编遣特派员办事处总务科长，等等。

第二，在中共的积极争取和推动下，俞、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措施。释放了在“清党”中被新桂系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如罗少彦、何建南、莫文骅、吴西等，并将其中的大部分人安排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解散了由黄绍竑亲信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劣迹昭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并委派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广西部分县的县长，这些人后来很多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第三，对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改造。利用对这三支部队的领导权，培养和发展进步势力。在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选送了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安插到教导总队的3个营9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到总队部任政治教官。对政治上反

动的旧教官，则采取“调虎离山”和“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当时，9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连队都秘密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通过他们，密切联系其他学员，宣传革命思想，使连队的革命气氛浓厚。这些学员训练后分配到各部队，成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为提高部队素质打下了基础。在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张云逸、俞作豫以合法的身份，有效地开展士兵民主运动和改造部队工作。在加强士兵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动广大士兵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等罪行，并抓住士兵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有利时机，迅速、果断地撤换了一批反动军官，另派党员干部充实到各营、连、排的领导岗位上；同时，大力发动和吸收工农和进步青年学生入伍，增加部队的工农成分，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这样，这两支军队不但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而且部队整体面貌也焕然一新。

第四，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经中共党组织的建议和活动，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选派一部分青年与农运干部到各县工作，以“二五”减租为号召，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8月，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雷经天、韦拔群分别当选为省农协筹备处正副主任委员。经党的活动和安排，俞作柏会见了韦拔群，同意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凤山地区农军一批武器装备。会后，党组织又推荐一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骨干，推动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中共广西省“一大”的召开

邓小平等到广西后，还担负领导广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省特委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逐步与各地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并开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出版了党内刊物《党的生活》，加强对党员的宣传教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1929年9月，建立县委和县特支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5个。南宁建立了轮船、汽车、机

关等10个支部，全省共有党员420人，团员130人。全省共有21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可以领导的农民35万，可以指挥的农民武装2000人。①

为了传达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过去广西党组织的斗争经验，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中共广西特委在邓小平和贺昌的指导下，于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9人，贺昌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作了政治报告，广西特委作了工作报告，各县代表对报告进行了讨论和补充。

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及组织、职工、宣传、农运、军事、土地革命、妇女、共青团等9个问题的草案大纲。《决议案》贯彻了中共“六大”精神，认真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广西的政治、经济状况，确定党的工作路线是“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去争取广大的群众，扩大党的和群众的组织，注意党的基础的创造，并使工农运动的平衡与配合”。② 这就把工作方针从原来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变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这是中共“六大”正确路线在地方组织工作中的体现。而积蓄力量的目的，是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大会的决议，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会选举出新的广西特委。何晳达、陈洪涛、聂根、雷经天、严敏、张第杰等为特委委员，何晳达、陈洪涛、聂根为常委，何晳达任书记。机关仍设在南宁，受广东省委领导。

这次大会也有缺点，主要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提出“党必须用十分之八的力量，去创造产业工人、交通工人、市政工人以及码头

---

①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10月20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8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②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10月20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80页。

工人的工作”,[①] 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二，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主要表现在对待俞作柏、李明瑞还存在“左”的倾向。这些缺点给当时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一定的困难。

二、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倒蒋失败，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在粤军陈济棠部入桂逼近南宁的情况下，一些反动分子于10月6日捣毁、破坏省农协机关；教导总队中的反动军官趁机煽动学员离开队伍去投蒋，李、黄、白新桂系也在准备卷土重来。

10月8日，中共中央来信指示广西特委，在当时军阀混战形势下，广西党组织必须加强对群众日常斗争和军队士兵运动的领导，“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要把“我们所能领导乃至所能解决的部队”，“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②] 这是正确的。但指示信中对广西工作也有不切实际之处，仍要广西特委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作。广西党组织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形势突变的关键时刻，决定把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左右江地区，重点放在与滇黔交界的群众基础较深厚的右江地区。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李明瑞在部队掩护下一同前往。到龙州后，俞作柏取道越南转往香港，李明瑞则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留在龙州参加了革命。10月15日，邓小

① 《中共广西特委给广东省委的信》（1929年10月20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80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②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64页。

平率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押运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向百色进发。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部分学员沿右江从陆路掩护前进。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队伍到达桂西重镇百色。为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立即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分析、研究当时的形势，制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和措施。决定凭借右江一带农民运动的基础，做好五件工作：(1) 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组织。(2) 改造第四大队，逐步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变部队成分增加大批农民成分。(3) 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消灭豪绅武装。(4) 歼灭反动武装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收缴其枪械。(5) 扩充部队，培养新的干部。同时电令左江第五大队迅速做好转变的准备工作。

根据这些决定，部队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利用集会和发行《右江日报》、《士兵之友》等刊物，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部队经常举行士兵会，上政治理论课或唱革命歌曲，并组织士兵到街道和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同时进一步从组织上整顿和改造部队，将那些经过教育尚不转变的旧军官撤换，或调教导队训练，或礼送出境，并吸收了1000多名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他们还坚持与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通过中共地方组织，发展工农武装，一到右江地区，便把从南宁运来的5000多枝步枪，分发给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民和百色工人赤卫队。中共党的组织也发展起来，除在每个连队和大队部的机关单位建立党支部以外，地方上建立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右江特委），恩隆、奉议、百色、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建立了县委，果德、向都等县成立了特支，地方党员数量达500～600人。部队党委还开办军事政治训练所，在对旧军官进行转化教育的同时，培训新军官和地方干部，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做干部准备。为扫清武装起义的障碍，部队积极协同农军打击或扑灭地方豪绅的反动武装，消

灭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右江地区整个局势已被革命力量所控制，百色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11月初，到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了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中共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并颁给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批准撤销中共广西军委，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左右江地区党和军事的指挥，指定邓小平任前委书记。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在百色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从左右江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武装起义。

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广西情况。邓小平、张云逸对在旧军队中有较高威望的李明瑞作了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工作，并以前委名义，请他在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后担任两军总指挥，进一步坚定其革命决心。12月初，邓小平奉命往上海汇报工作，前委工作由陈豪人负责。前委抓紧在部队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同时组织起草和印刷有关武装起义时的布告、标语、口号、实施政纲和其他宣传品，逐步完成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在前委领导下，在百色县城召开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和百色农民代表会议。三个会议分别讨论通过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当天，第四大队还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百色县公安局、禁烟局以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商团的武装全部缴械，从而保证了百色起义的顺利进行。

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在百色县城举行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各族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市民数千人。会上，陈豪人代表前委庄严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诞生，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任命，宣布了红七军的领导成员和编制：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下设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原警备第四大




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邓小平(左)、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右)

队两个营为基础扩编而成，约1000多人；第二纵队由原部分教导总队、原第四大队一个营和恩隆、奉议、思林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约1000多人；第三纵队由东兰、百色、凤山、凌云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组成，约1000多人。全军共4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各族工农子弟占三分之二左右，壮族约占半数以上。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队长。军部和前委设在百色粤东会馆，政治部设在清风楼。同一天，右江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城召开。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5个镇的工会代表和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凌云、向都、镇结、东兰、凤山11个县的农会代表及红七军士兵委员会的士兵代表80多人出席。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担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3人担任第一届执委会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前委提出的目前实施政纲，作出了发展右江苏维埃运动，扩大红七军，建立右江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



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百色粤东会馆

12月12日，在平马镇举行隆重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万人

群众大会。张云逸代表前委在大会上讲话，祝贺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号召红七军指战员和右江各族人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深人开展土地革命而奋斗。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百色起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在祖国南疆树起的一面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鲜艳旗帜。它吸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在中心城市先举义旗，而是直接把正规军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会合，先肃清根据地内主要反动势力，尔后从容不迫地宣布起义，这就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经验。百色起义的胜利给右江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后，也同右江地区一样，积极地进行武装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

龙州，是左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桂西南边陲重镇和战略要地。这里的情况比百色更为复杂。一方面，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传统，经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的人民便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进行抗法斗争；1907年，凭祥等县人民起而响应孙中山发动的镇南关起义；1922年，壮族进步青年高孤雁等人在龙州下冻地区宣传过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龙州镇开展过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中共党员陈霁、易挽澜曾以国民党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龙州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了“镇南道农民协会办事处”；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县的农民武装仍坚持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这里的反动基础也比较深厚。1885年中法战争后，龙州被辟为帝国主义的商埠；

旧桂系陆荣廷、谭浩明原来就发迹于此，在此设立过各种统治机构；旧桂系垮台后，新桂系又接着经营，派吕焕炎师在此驻扎。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以后，新桂系势力受到削弱，但基础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就使龙州起义较百色起义更为曲折和复杂。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和左江地区的实际，俞作豫、宛旦平等左江领导者先后用三个多月时间进行了如下准备工作。

第一，掌握对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的控制权。警备第五大队一进驻龙州县城，就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名义宣布俞作豫为广西全边对汛督办，接管督办公署事务，收编了督办公署直辖的13个武装巡缉队和原留守在龙州的新桂系吕焕炎师部教导队400人。同时，以对汛督办公署名义，先后委任了龙茗、万承、宁明、明江、养利等县县长，并在各县招募一批新兵，扩大武装。此外，对当地土匪武装采取剿抚并重的政策，收编了龙州的黄飞虎和养利的冯飞龙部，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路游击队，委任黄、冯为一、二路游击队司令。这为稳定和发展左江地区的革命形势打下了基础。

第二，深入农村、城镇，建立农民协会和工会，积极发展工农武装。何建南、苏文灿等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将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迁到龙州县城，指导成立了龙州总工会，组建了左江工农赤卫大队，有300余人枪，何建南任大队长。12月15日，中共龙州县委成立，由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王逸任书记，在左江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并把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改称为镇南全属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何建南，领导龙州、上金、凭祥、养利、崇善等13个县的农协组织，会员3万余人，农民赤卫军、自卫军武装约有5000~6000人。第五大队把从南宁运去的部分武器和没收吕焕炎在龙州军械仓库的武器弹药，分发给龙州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军，使他们成为龙州起义中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工农武装。

第三，加强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左江党组织创办了《群众报》（3日刊，起义前夕改为《工农兵报》，何建南任主编），还创办了理论刊物《左江红旗》，扩大革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激励和

动员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第四，平定蒙志仁叛乱和整顿改造部队。1929年11月中旬，俞作豫率第五大队第一营为先头部队乘船出发驮芦，准备联络右江第四大队会攻南宁，留守龙州的只有新编的第六营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被桂系收买的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趁机胁迫从陆路前进的二、四两营叛变回占龙州县城。这对龙州起义的准备和发动是很大的威胁。俞作豫闻讯后即率部南返龙州附近，在游击支队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配合下，包围龙州城。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毙叛军营长潘益和参谋长王国连等100多人，蒙军残部溃逃南宁，龙州光复。鉴于这次教训，邓小平指示第五大队借鉴第四大队经验，进行整顿改造部队工作。他们以第一营为基础，加进部分农民赤卫大队和边防巡缉队，合编为一个旅，番号仍沿用俞、李时代“讨蒋南路军”名称。李明瑞为总指挥，俞作豫为旅长，下设2个团6个营。中共红七军前委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担任部队要职，并成立中共左江军委，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接着进行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工作，成立士兵委员会，揭露和撤换反动军官，纯洁部队，团结教育广大官兵。但由于干部力量薄弱，对部队的整顿工作仍不彻底。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龙州起义条件成熟。

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当天上午，在龙州县城召开万人群众大会。何世昌在会上正式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任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任第一、第二纵队队长，全军共2000多人。



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左）、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右）

此外，起义前收编了冯飞龙、黄飞虎、黄廷儒、钟显章等部为四路游击队。左江革命委员会由王逸任主席、林礼任秘书长，设23名委员。在左江革命委员会控制范围内的龙州、凭祥、上金、养利、崇善、龙茗、左县、雷平、思乐、宁明、明江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军委会或委任了县革委会领导人，作为县一级的人民政权。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司令部旧址——龙州瑞丰祥金库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和地方的领导，起义当天，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中共红八军军事委员会（后改为红八军临时前委），何世昌任书记；并以龙州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广西左江特别委员会，由王逸任书记（后由涂振农接替），下辖3个特支9个支部。红八军军委和左江特委都直属中共红七军前委和广东省委领导。

龙州起义后，中共红八军军委和中共左江特委领导左江地区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

当时，左江地区是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法帝国主义对龙州起义极端恐慌和仇视，多次发出照会，诬蔑、指责龙州人民，扬言要“越南总督拨派武装卫队”进驻龙州，[①] 甚至派出飞机入侵左江地区，武装干涉我国内政。面对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2月12日，红八军政治部在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提出四项严

① 《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1930年2月），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20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正声明：

1. 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

2. 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彻底解除痛苦和压迫，必须实行自卫！并且要坚决的执行革命的外交：(1) 收回海关；(2) 没收法人基督教堂；(3) 取消赴越护照费；(4) 收回领馆，驱逐法领事出境；(5) 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

3. 如法越南政府真派兵进中国广西左江爆发战争，责任应由法越南政府负责。

4. 反对法越南政府勾结或买（通）中国反动政府压迫工农群众解放运动。①

2月19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反帝斗争大会。会上揭露了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及其蓄意破坏、干涉左江革命的阴谋，通过了立即没收法在龙州的领事馆、海关、教堂以及在龙州的一切企业和财产，驱逐法领事出境的决定。并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向世界发出通电。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涌过铁桥，包围法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其掠夺来的财产，搜缴了不少收藏在那里的枪械及通信器材等军用物资。法领事加伦等人被驱逐出境，海关税务司额格里等闻风逃窜。之后，法帝国主义派飞机入侵左江地区上空进行威吓，红军战士开枪射击，一架入侵法机慌乱中于宁明县境坠毁。

龙州起义中的反帝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最早同帝国主义直接接触的一次斗争。当时，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左江军民的反帝斗争。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声援广西的反帝斗争；3月22日，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第86期发表了《赤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

---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206～207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伟大的历史意义”。

左江军民在开展反帝斗争的同时，进行了打击地方封建势力，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八军成立后，分赴左江地区各地宣传发动群众，惩治平日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协助各县建立革命政权。第一纵队到左江北岸的崇善、雷平、靖西一带活动。在雷平，发动群众清算了太平州土司李绍和安平州土司李德普的罪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将李德普提交法庭审判予以处决，为民除害。第二纵队在龙州及左江南岸的凭祥、宁明、明江一带活动。在凭祥，协助县革命委员会枪决了民愤极大的前县长李可拔和大土豪陶巨勋，没收了恶霸郑惠康兄弟和下石大地主陆绍勋的财产，并把刘廷威反动武装赶出下石。在宁明，攻下了土匪占据的宁明县城；在明江，枪决了勾结土匪的明江县反动县长；在龙州，枪毙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龙州县“清党”委员会主任欧文俊、委员闭钰达。这一系列措施，打击了地方封建恶霸势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当时在左江地区，“有农会组织的，已有十一县，其中组织比较有基础的是龙州、上金、上思……人数约三万（以家为单位），武装有组织的有五、六千”。[①] 在红八军军政训练学校学员帮助下，龙州下冻区一带河渡、坡目、农据、那造、那城等村农协会相继丈量、登记土地，实行了土地共耕，后因敌人进犯，土地革命未能开展。

龙州工人也积极参加了建设、保卫根据地、反资方的斗争。“二七”罢工7周年纪念日，龙州总工会召开纪念大会，2000余工人和各界代表参加。2月8至10日，龙州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13个工会的150多名代表。会上，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代表们向大会报告了工会组织及工人生活状况。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赤色工会章程、斗争纲领和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关于增加工资标准和开除工人须经工会批准等议案，为进一步推

① 《左江特委报告》（1930年2月8日），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202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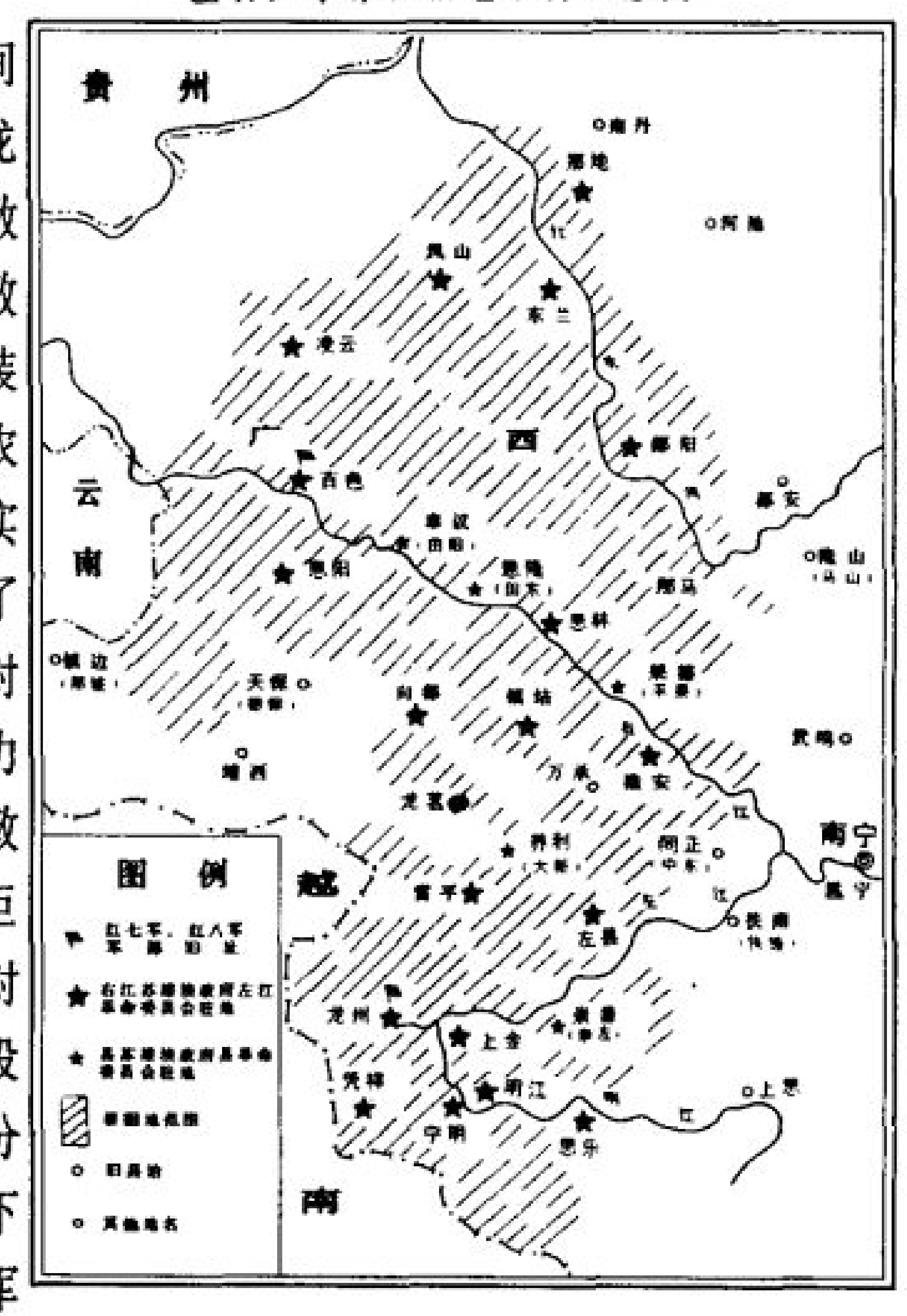
动龙州工运的开展做了准备。

龙州起义将反帝斗争与反封建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引起反动统治者极大的恐慌。新桂系企图趁红八军分赴各地游击，龙州城防薄弱之机，以重兵进犯龙州。邓小平得到这一情报，对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当时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红八军如不及时与右江红七军联络，将会遇到极大之困难，决定尽快攻下靖西，打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通道。邓小平在攻城开始后几天，在红八军一纵队第八连的护送下，离开靖西往右江与红七军联络。

1930年3月20日，新桂系派其驻南宁的第十五军第一师师长梁朝玑率两个团兵力，并勾结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多人，分东、西、北三路向龙州城发起突然袭击。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及赤卫队1000多人仓促应战。激战约3小时，城北门被敌攻破，俞作豫、何世昌率红军和赤卫队撤出龙州城，向凭祥、宁明、明江方向转移。转移途中，红八军参谋长、第二纵队纵队长宛旦平牺牲。俞作豫、何世昌率300多人于3月下旬到达离钦县不远的马鞍山。这时，刚被委任为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桂廷（刘定西）等人，与广东地方军阀黄明堂勾结，胁迫俞作豫、何世昌交出军权。俞、何逼于形势，决定自己带手枪队30余人往右江找红七军和上级党组织，暂时把部队交给刘桂廷带往十万大山休整。而刘桂廷带领部队到钦县大寺时，接受黄明堂的改编，背叛了革命。中共党员、政工人员被迫离开部队。至此，红八军第二纵队解体。俞作豫、何世昌等人往右江经邕宁马村时遭民团围攻，何世昌被俘，后被押到南宁杀害。俞作豫在廖光华、王敬轩陪同下去香港找党组织，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被捕，同年9月6日于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

红八军第一纵队得知龙州被犯后，放弃了攻靖西计划，回援龙州，但刚到雷平，便得到龙州失陷的消息。纵队党委决定按邓小平的指示，转移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部队沿中越、滇桂边境北上，行军至凌云县彩架村时遭敌人伏击，损失100多人，转入贵州蔗香圩休整。后经过半年艰苦转战，终于在1930年10下旬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与前来迎

接的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会师，后前往河池集中，300多人编入红七军第四纵队序列。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龙州起义虽然经历时间不长，从宣布起义到撤出龙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很快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在白色恐怖中高举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展反对法帝国主义和当地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创建了革命政权，这对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起义过程中对旧军队的改造不够彻底，没有把反动军官、投机异己分子及时清洗出去，以致留下隐患，内部叛变成为红八军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又由于对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抓得不紧，群众基础相对薄弱，革命的失败就难以避免了。龙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为中共领导武装斗争和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积累了经验。

四、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百色起义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创造了一块15个县连成一片，拥有

近百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抓住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集中精力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党政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

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与武装斗争是分不开的，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不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便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当时右江地区的土地大多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中，只有极少数在农民手里。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还要无偿地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并受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① 获得土地，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积极引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根据中共“六大”提出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的精神，先后通过、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文件，并印发了《土地革命》等宣传小册子，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从1930年5月至8月在右江地区掀起了分配土地高潮。

1930年3月下旬，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和红四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在东兰县进行试点工作，并于4月间在武篆区旧州屯开办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为土地革命在右江根据地的全面铺开培训人才。5月，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的原则方法以及有关方针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右江地区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吸收了《兴国土地法》的正确规定，提出“没收地主豪绅阶级之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

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30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农民使用”。分配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另一种是实行“共耕”。

《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颁布后，右江地区的东兰、凤山、凌云、恩隆、奉议、思林、果德等县的部分乡村先后进行了土地革命。大致过程为：在县、区苏维埃政府指导下，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普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收缴和烧毁土地契约；以乡为单位，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把没收来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好坏搭配；最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

经过土地革命，农民得到了利益。如东兰、凤山的农民“平均每人都分得了可供几个月米粮的土地，兼种些玉蜀黍、薯芋等杂粮就够一年的粮食。每家每年收获的谷米至少都已等于反动统治下的中农了。没有苛捐杂税的剥削、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种族地方性别的界限”；久受统治者“压迫欺凌的瑶民和住在石山洞场的最困苦的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都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得到同样肥美的土地”。[①] 因此，广大农民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自愿加入红军，革命积极性高涨。1930年8月统计，东兰、凤山两县农民加入红军的已有6000余人。[②]但土地革命在右江地区发展不平衡，除时间先后不一致外，有的地方的基层苏维埃政权被富农分子把持，他们用种种方法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③] 这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给后来的革命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军事建设

军事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七军前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红七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旧军队，由原来警备第四大队转变而来；一是农民。红七军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

---

①② 邓拔奇：《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42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③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37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手，加强对部队的教育训练。部队中的党组织，依次分为前委、纵队党委、营委、连支部四级，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党组织经常向士兵进行有关红军的任务、纪律等政治教育，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掌握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并在土地革命中对红军士兵同样分配土地，激发他们为工农利益而战的热情。同时，部队提倡政治民主，官兵平等。连以上都成立士兵委员会和士兵代表会议，让士兵参加部队军事作战决策和民主生活管理，根据士兵的意见搞好军队的建设。上自军长，下至士兵都同样发月饷20块银元。① 使士兵感觉到红军与旧军队是两个世界，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得到了解放，执行任务就更为自觉。

加强军队纪律也是红七军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红七军规定部队要严格执行纪律，红七军的《红军纪律歌》唱道："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缴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红军处处爱护群众，莫把群众利益害损，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留情；为要发扬红军的强威，一切行动要听指挥，上级的命令下级要服从，不论官兵不得违背；无论战争时平时与行军，爱护群众保护工农，力量真强大打得敌人怕，中国革命才得成功。"② 红七军还有不少宣传红军纪律的标语口号，如"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借端滋扰良民"、"不奸淫掳掠"、"公平交易"、"不强买强卖"等等。基本上具备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为红四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红七军实行这些纪律，建立起了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红七军还帮助各县整顿、训练赤卫军和工人赤卫队等地方武装。至1930年10月，整个右江地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近万人。红军每次作战，地方武装都积极配合，有的直接参战，有的组织向导队、侦探队、运输队、担

---

① 《红军第七军报告》，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298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② 《红军纪律歌》，载《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二），151～152页。

架队援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地方党政建设

党的领导有力量，是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以最大的努力来注意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29年12月，军前委发出第二号通告，对健全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和培训党的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提出要特别注意在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中发展党员，规定“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之指挥”，部队要负责健全地方党部的任务，“指定一部分同志专负地方党部工作”，并规定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健全支部生活。

在部队的帮助下，中共右江特委加强了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并注意在城镇工人和农村贫雇农中发展党员。据1930年8月统计，右江地区先后建立了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百色、向都7个县委和果德、凌云两个县特支，共有党员1500多人。[①] 在发展和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同时，注重思想建设。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和支部生活等形式，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1930年4月和7、8月间，前委先后在东兰武篆旧州屯和恩隆平马镇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250多人，邓小平、雷经天等党政领导亲自给训练班讲课。各地党组织也先后举办了短期的训练班。仅东兰县1930年就举办过6期，使党员干部的素质有较大提高。

为了长期进行斗争，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右江根据地以中央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榜样，建立和健全了各县、区、乡苏维埃政权。1929年12月间，先后有15个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如东兰县建立了7个区苏维埃政府，168个乡苏维埃政府，并及时制

---

① 《王玉树关于七、八军情形报告》，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330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定、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重视发挥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右江地区的实际，积极选拔和支持壮、汉、瑶等本地各族干部参加各级政权，发挥他们与各族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此外，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农协、青年团、儿童团、妇联会、赤色救济会等也逐步成立和开展活动，发动和组织各族群众参加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文化教育建设

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后，把提高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明确提出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是："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① "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②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各县苏维埃政府内设文化委员会，区、乡苏维埃政府设文化委员，专职管理文化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工作。地方干部教育主要是通过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的形式进行。社会教育是通过办农民文化夜校和平民学校的方式进行。凡建有苏维埃政权的乡村，都建有这类学校，仅恩隆、向都北区、奉议仓圩等地就有平民夜校160所。学校还根据当地实际，将学习内容编成群众喜爱的山歌。普通教育也开展得很好。根据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规定，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各县都办起了劳动小学。劳动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教师由县苏维埃政府派出，由政府供给伙食，不领薪金。教材一律使用右江苏维埃政府编印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东兰县劳动小学、瑶族初级劳动小学、西山弄京劳动小学都是当时较有名的学校。1929年12月，右江苏维埃政府还将百色省立第五中学改造为广西劳动第一中学，取消了国民党的党义课，增设革命理论课。

---

①②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05、26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红七军、红八军创办的报纸

根据地各种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红七军前委创办的《右江日报》在宣传党的主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革命歌谣在群众中传唱，如《红军纪律歌》、《建立苏维埃》、《努力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老板心最毒》、《端坐兰竹椅》等，鼓舞着人民投身于推翻旧统治、建立新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去。

五、红七军主力北上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1930年春，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重新爆发。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再一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10月2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在平马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精神和中央关于红七军东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地的指令。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对中央这个命令能否行得通表示须慎重研究。最后，前委经过讨论决定执行中央命令，

全军集结河池整编，并在河池召开红七军党代会，贯彻中央指示精神。

11月初，红七军全部抵达河池。11月7日，中共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主要议程为：一、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案和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二、红七军前委检查总结过去工作的策略方针；三、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四、选举前委。大会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和中央指令，确定红七军的任务是：迅速攻打柳州、桂林、广州，以保障以武汉为中心的南方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具体行动方案为：先取桂林，以桂林为中心再向柳州等地推进。会议选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卓、许进、李朝纲、黄一平等9人为前委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等3人为候补委员。前委书记仍为邓小平。另组织了一个士兵委员会，陈豪人兼书记。雷经天反对把全部赤卫队编入红七军并调离右江革命根据地，被会议错误地开除党籍。

11月8日，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3个师，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原红七军第一、第三纵队改为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龚鹤村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原第三、第四纵队改为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二十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任政委；原第三纵队留下一个连和右江各县的赤卫军重新组建为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留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部队整编、检阅后，韦拔群即率几十名老弱战士返回东兰、凤山等地组建二十一师。

11月9日，红七军主力约7000人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向庆远进发。因庆远守敌有防备，绕道渡过龙江到罗城。11月下旬，在罗城四把村遭敌阻击，撤至三防，稍事休整后，决定攻打融县长安镇。12月初，红七军猛攻四昼夜，虽有缴获，但损失较大，加上敌援兵赶到，红七军撤出战斗，转向桂湘边，从三江县福禄渡过融江，向古宜前进。12月中旬，到达古宜镇，准备攻打桂林，并派军前委委员、五十五团政委黄一平等先潜入桂林城作内应。后得知从古宜到桂林的道路已有敌重兵扼守，遂决定改道经湖南绥宁、武冈再攻桂林。21日，红七军占领绥宁县。25日进攻武冈。武冈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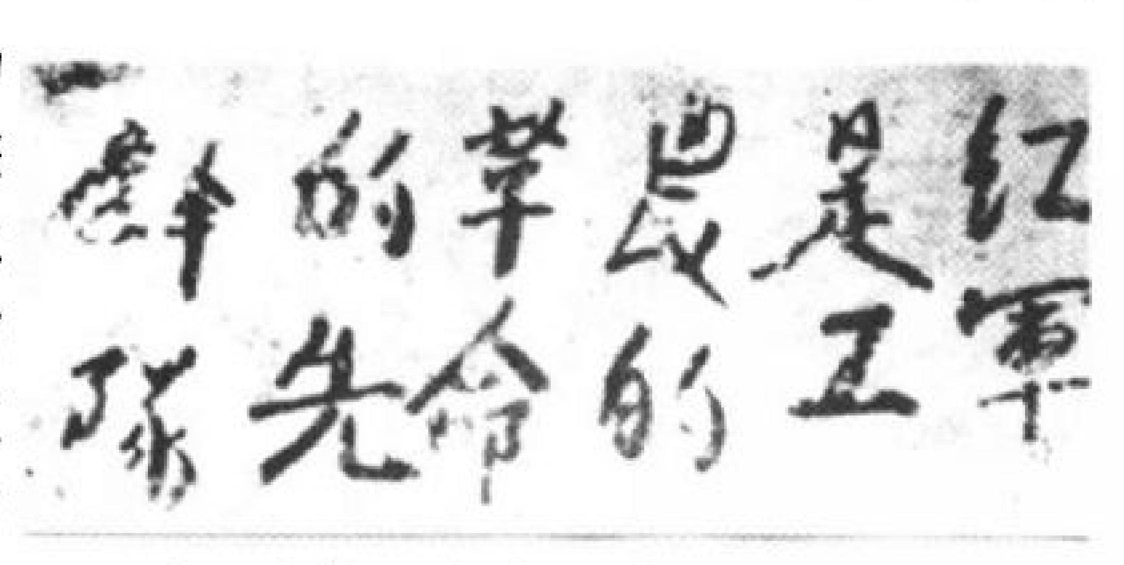
党军凭城固守，红军围攻4天未克，敌3个团的援兵到达，红七军即向广西边境转移。此役红七军损失200多人，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牺牲。1931年1月初，攻占全县县城。军前委在此召开会议，总结了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指令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兵力损失严重的深刻教训，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和攻坚打硬仗的冒险计划，拟将部队开往湘粤边，到粤湘赣边界与中央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把已不足员的两个师缩编成3个团，精简非战斗人员，充实部队战斗力。会后，南方局代表邓拔奇、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政治部主任由许进继任。

1月5日，红七军经三天休整后，按计划离开全县，经灌阳县境，向湘南道县前进。7日抵达道县，得到湘军正兵分三路合围的情报，便向江华进发，在江华征用了布匹、棉花、衣物，以解决御寒问题。11日，发现湘军已在宁远、蓝山一带布防拦截，便离开江华，到湘桂粤三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休整，根据部队减员的情况，又把3个团缩编为2个团，原来的各级干部均依次相应降级充实基层工作。18日，红七军经桂湘边界挺进广东连县、乳源县。在连州筹集了给养，2月2日到达乳源县梅花村。梅花村位于湘南粤北的交界处，四周高山重叠，地势险要，并受过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的影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据此，红七军拟在梅花村一带创建根据地。但不几天就遭敌3个团围攻，与敌人血战5小时，伤亡极大，“全军干部损伤过半”，① 遂决定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2月5日，在粤北的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时，被敌人截为两部，邓小平与李明瑞率渡过了河的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一部向江西崇义前进，张云逸则率未能过河的五十八团大部转道渡河北上。

乐昌分散后，邓小平一部2月中旬到达崇义县，与中共赣南特委取得了

①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402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联系，决定以崇义为中心创建根据地，整顿发展红军。他们取消了中共红七军前委，组建中共五十五团团委，邓小平任书记。3月初，经组织同意，邓小平离开崇义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因敌人重兵来犯，红七军五十五团向北撤到营前转往永新。张云逸一部转到坪石以北渡过武水，经桂东进入湘赣根据地与红军湘东南独立师、红二十军会合。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红军总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总指挥，曾炳春为政委。



红七军在河池宿营地留存的宣传标语

3月下旬，红七军两部分部队在江西永新县重新会合。4月，在永新召开中共红七军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滕代远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因根据地分散、消息阻塞而迟到了半年的决议，受到吃够“左”倾错误苦头的红七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会议总结了红七军自第一次党代会以来的经验教训，撤销了第一次党代会的错误决定，恢复了雷经天的党籍。党代会后，部队的革命热情高涨，与红二十军、独立一师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胜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7月11日，红七军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22日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此后，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编入红三军团序列。

红七军自1930年11月离开右江根据地到1931年7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历时9个月，行程达7000多里，历经桂、湘、粤、赣四省，大小战斗100余次，英勇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原来7000多人减至2000多人。但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终于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的愿望，并在新的革命历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红七军北上江西会合中央红军路线图

（1930年10月－1931年7月）

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红七军主力北上以后，桂系军阀和地主豪绅马上进行了反扑。他们一方面向右江苏区猖狂进攻，一方面对白区实行白色恐怖。广西的共产党组织被分割为互相不能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中共右江特委，一是中共郁江特委。他们分别在右江苏区和郁江两岸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在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

中共右江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斗争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新桂系立即调派廖磊纠集大量兵力，

先后对根据地进行了三次空前残酷的“围剿”。留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等，领导刚刚组建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和根据地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当红七军准备北上的时候，邓小平就在恩隆县燕峒召开了右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对坚持根据地斗争等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各地抓紧整顿党组织，扩大赤卫军，组织群众抢收粮食，防备敌人进犯。中共右江特委也进行了改组，因雷经天随红七军北上，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陈洪涛接任，韦拔群、黄明春、陆浩仁、李绍楚等为特委委员。

河池整编后，韦拔群即与陈洪涛、黄松坚等在东兰、凤山等地组建二十一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1931 年 1 月上旬，红七军二十一师在恩隆县乙圩宣告成立。它主要由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的赤卫军扩编而成。二十一师下辖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独立团共 4 个团，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他们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团结一致，保卫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

为了反击敌人的“围剿”，韦拔群一方面指挥部队扫清各地反动武装残余，一方面举办军政、地雷训练班，培训各种军事政治技术干部。同时，中共右江特委指示各县党政机关和赤卫军转移到山区，领导军民实行坚壁清野。

1931 年 3 月，新桂系发动了对右江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国民党第七军师长廖磊（不久任副军长、军长）率该军一部和民团武装并纠合黔军共 1 万多人大举进犯东兰、凤山根据地。廖部占领东兰县城后，制定了分兵向东兰、凤山根据地中心西山、中山、东山进攻的“三山搜剿”、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红军二十一师约 3000 人，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红二十一师和中共右江特委决定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采取避强击弱、敌驻我扰等战术反击敌人。敌人每到一处，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要菜无菜，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仅被地雷炸死、

炸伤的官兵不下1000余人。[①] 驻守凤山的红军六十三团还利用黔、桂军之间的矛盾，对黔军两个团展开政治攻势并采取离间计，使黔军于4月17日哗变，与桂军互相残杀后退回贵州。一个月后，廖磊改变策略，调整各路部队，分区驻扎“搜剿”。5月，新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反蒋，急电廖磊部主力撤回南宁。新桂系对东兰、凤山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宣告破产。

11月，新桂系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又纠集第四军的沈玖成团、第七军的余鸣剑团、罗活团和地方民团武装共7000多人，对东兰、凤山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七军二十一师已经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在韦拔群、陈洪涛指挥下，采取避实就虚相机歼敌的方针，退守山区游击。但由于敌军严密的封锁，根据地军民处境日益困难，红军在连续作战中已处于弹尽粮绝之境。至1931年底，红水河以东的革命据点全部丧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右江特委、右江独立师党委多次在东兰西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重要干部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外线开展斗争以减轻敌人对东兰、凤山根据地的压力。会后，黄松坚（独立师副师长）带领一批干部到右江下游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黄举平（右江革委会主席）带领一批干部及小部分武装到黔桂边区开辟工作，韦拔群、陈洪涛率警卫部队在东兰、凤山根据地坚持斗争。右江独立师也化整为零，取消了团、营、连编制，组成若干个杀奸团，负责杀奸肃特，动员群众和赤卫军配合行动。1932年春，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率部离桂，参与“围剿”的沈玖成团也随之撤走，迫使新桂系重新布防，第二次“围剿”至此结束。但余、罗两团仍留下对东兰、凤山根据地实行封锁。

1932年8月底9月初，新桂系增派廖磊部4个团1个营和民团等近1万兵力，对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专门军政会议，制定了“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根据这一方针，

① 邓拔奇：《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425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采取了“缩网收鱼”的狠毒策略和“梳毛篦发”的战术，步步为营，节节搜索前进。9月上旬，西山的大小弄京和都邑的果棉峒被攻占。桂军在围攻各峒场时，强迫山区群众迁出，把峒场里的东西抢光、房屋烧毁、庄稼铲掉，企图把红军饿死、冻死、困死。敌人还组织所谓“东风剿共宣传大队”，随军进行反动宣传。东兰、凤山根据地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廖磊在“搜剿”东兰、凤山根据地的同时，还在各县民团配合下，派5000多人“围剿”南丹巴暮区的红军、赤卫队。原红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政治指导员蓝志仁与营长黄桂德，率巴暮400余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分五道防线抗击敌军，经三昼夜激战，因敌众我寡，80多名红军战士退守甘孟山，他们宁死不屈，坚守至9月26日，有的战士抱住敌人跳崖壮烈牺牲。

10月6日，白崇禧到东兰“督剿”，以1.4万元悬赏缉拿韦拔群。韦拔群和陈洪涛深感形势的严重和危急，准备暂时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不幸，10月19日凌晨，广西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韦拔群在西山赏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终年39岁。不久，陈洪涛也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8岁。右江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失败，右江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黄松坚、黄举平等领导红军游击队继续在右江和滇桂黔边坚持不屈不挠的游击斗争。

中共郁江特委的艰苦斗争

中共郁江特委是1931年6月由原广西特委改组而成的。1929年冬，由于中共广西特委委员大部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特委领导机关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广西白区的工作，于1930年10月先后派陈春霖（陈福）、詹恒祥为特派员，会同原在贵县工作的南方局特派员吴茂祥，重建广西特委。由吴茂祥任书记，黄德普、张第杰、麦锦汉为委员，隶属南方局领导。1931年6月18日，中共两广省委巡视员詹恒祥在贵县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广西特委实际上只能领导郁江地区几个县革命工作的情况，会议决定改广西特委为郁江特委，机关设在贵县第八村。会后指

定杨建南为书记，杨没有到任，实际工作由詹恒祥负责。

郁江特委主要领导以南宁、玉林、贵县为中心的三个区域的工作。1931年8月，特委委员黄德普被捕叛变，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根据黄供出的名单，在全省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郁江特委机关被迫由贵县迁到邕宁七坡村。9月26日，中共两广省委代表邓拔奇主持召开郁江特委会议，传达了两广省委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的决定。会议总结了广西农运工作，讨论了以《土地法（草案）》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法令，修改了劳农会章程；结合学习中共党的“十大政纲”，批判清算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和右倾失败情绪。但另一方面，又推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确定以发动游击战争，冲破敌人“清乡围剿”为当前政治任务时，要求过高。如要求“把16岁至40岁的工农群众都组织在革命的军事组织之中”，“最近三个月内在南宁区最少发展到200人以上，在贵县区最少发展到200人以上，在玉林区最少发展到50人以上”。① 这显然脱离当时广西的实际。在组织上，会议确定特委成员并作了分工，书记詹恒祥，常委麦锦汉、陈嘉良，委员谢锐、陈岸、张第杰、杨建南。詹恒祥和张第杰负责南宁，陈岸负责玉林五属，麦锦汉负责横县，谢锐负责贵县，陈嘉良负责邕宁。

10月初，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郁江特委发表宣言，号召人民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团结和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广西各阶层人民反帝情绪开始高涨，郁江地区的群众自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学生举行了集会示威和罢课活动。当时，郁江地区共有中共党员272人，党能领导的赤色群众1700余人。② 但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31年12月，郁江特委解体。特委书记詹恒祥到香港汇报工作时被捕叛变，特委常委麦锦汉和陈嘉良相继被捕牺牲，委员谢锐动摇脱离组

---

① 《中共广西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工作决议案》，转引自《中共广西地方史教程》，26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② 邓拔奇：《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10月15日。转引自《中共广西地方史教程》，264页。

织，张第杰派赴右江工作后失去联系，杨建南于次年4月被捕关押。特委委员中，只剩下陈岸一人在玉林五属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特委所属各地组织也几乎均被破坏。加上1932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机关在香港遭国民党破坏，广西党组织与上级党的组织联系完全中断。从此，中共广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西革命斗争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

第九章　新桂系的“四大建设”

30年代初，桂粤联合反蒋后，广西省内逐步稳定，新桂系集中精力整理省政，制定了“三自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大建设”。新桂系进行“四大建设”，主要目的是通过各项建设，增强其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巩固广西割据统治。新桂系的“四大建设”中，政治建设主要是整顿各级政治组织，尤其是加强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训练干部，培养“新人”；军事建设主要是大力举办民团，组织和训练民众，实行“全省皆兵”，增强“自卫”力量；经济建设方面，兴办新式工厂，发展省营工业，鼓励民营企业，开采矿藏，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创办农林场，试验和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增加对外贸易，整顿金融财政，等等；文化建设方面，整顿各级各类学校，调整布局，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急需建设人才，尤其是开展国民基础教育运动，颇具特色。同时，兴建了一些其他的文化设施，活跃省内文化生活。为使各项建设有成效，新桂系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延聘一批省外专家、学者来广西参加经济、文化建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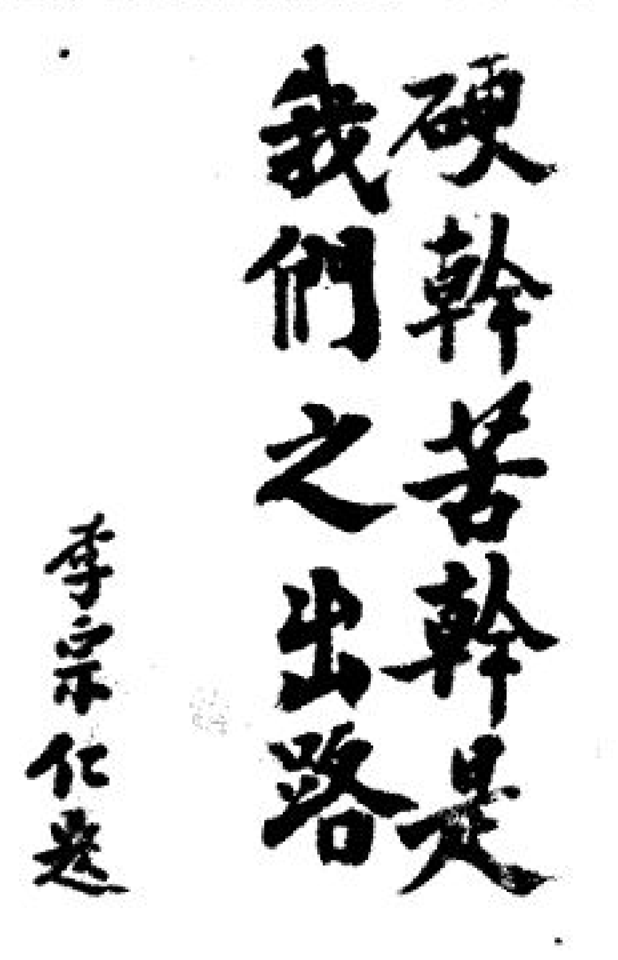
新桂系的“四大建设”，军事建设是重心，其次是政治建设，因而这两方面比较有成效。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成效甚少，效益很低。尽

管如此，30年代广西的建设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新桂系采取的一些建设措施对促进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新桂系开展“四大建设”，使当时广西出现一种与其他省不同的新景象，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瞩目，名流、学者纷纷来桂参观考察，对广西的“新政”多加赞许，有的还称广西为“模范省”。

一、“三自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

1931年桂粤合作后，广西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蒋、桂关系处于暂时和平的时期。新桂系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对外关系，整顿内部，重建家园。

对外方面，提出“亲仁善邻”，[①] 加强同邻省联络，避免力量不足时同外省对抗冲突，并派出使者主动与云、贵修好，乞求云、贵鸦片过境广西，以增加财政收入（征收鸦片过境税）。李宗仁长期驻粤，专办“外交”，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并联络其他反蒋派，接纳各方人士，维持两广团结。广西的军政事务则交由白崇禧和黄旭初处理。



对内方面，励精图治，整顿省政。首先是恢复各级政权，统一政令。1931年3月，省局初定即成立政治委员会，黄旭初任主席，内设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工商7处。同年7月1日改为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任省政府主席，下设秘书处、民政厅、

① 《白副总司令最近演讲集》，41页，1935。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

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等。1932年秋，全省按旧道属区域划为6区，区设区民团指挥部。1934年1月，省政府实行合署办公，以省府主席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各厅处会不得直接发布命令。3~4月，于各民团区设置行政监督，由各区民团指挥官兼任，不另设署，由省政府分派秘书及助理员前往协助办理督察事宜。除军政机关外，还设有广西高等法院，在桂林设第一分院，桂林、柳州、邕宁、苍梧、龙州等地设地方法院，在部分县设地方分庭。为加强党、政、军机关的统一，成立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由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第四集团军、高等法院等主要负责人组成，主席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担任。党政军联席会议是全省最高权力机关，全省党、政、军、财、文等重大问题都由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主管机关办理。党政军联席会议不设常务机构，遇到问题才开会。这一制度使全省党、政、军机关号令统一，军政一致，加强了新桂系的统治权力。

清乡剿匪，整顿治安。广西向来多匪，军阀混战导致政局动荡，匪患猖獗，尤其是山区和边远各县，拦路抢劫常有发生，治安混乱，官吏商旅裹足，人民深受其害。新桂系为稳定统治秩序，大力清剿匪患。先是举行全省清乡，划分全省为12个清乡区，每区设清乡正副司令，督饬各县肃清土匪、检验民枪、登记户口等。普遍清乡之后，各县实行“联络团防”，在交通要隘派兵放哨守卡，协同清剿。新桂系还把治安的好坏作为县长升迁、降免的重要依据。

整理财政。在桂林、柳州、庆远、百色、龙州等地设立财政整理处，整理税捐。当时所谓整理财政，“实以收云南、贵州两省鸦片烟过境税以及公开承包开赌抽捐为主要收入”。① 同时巧立名目，搜刮民财。1931年底至1932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4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4月，省财政厅打着“保障人民的所有权”，“减少业主们争执的纠纷”的名义，对人民的财产“厉行验契”。通过这次“验契”，新桂系强迫人民交纳“照证各费”313万多元。① 新桂系为获取外汇，竟然颁布“准以法光（法纸）、港洋（港币）抵纳税款”②的暂行办法，造成外币在省内泛滥，金融更加紊乱。直到1932年9月这项办法才宣布取消。

蒋桂战争以来，广西几经战火蹂躏，地方糜烂，社会混乱。因此，新桂系在30年代初着重于治乱，上述措施经过两年的努力初见成效。到1932年，全省动乱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新桂系的统治得到初步稳定。

广西政局初步稳定后，新桂系于1932年提出“三自政策”，作为其治理广西的基本原则。

白崇禧对“三自政策”作过多次解释。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给”。“自卫”就是“保障广西的建设，使广西一千二百八十万同胞，都能够安居乐业，不致受他人蹂躏”。“自治”就是实行“地方自治”，“一方面是地方人民有依照自己的需要来管理地方事情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地方人民，应各尽义务，各献能力，来办理地方事情”。“自给”就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生产来维持，不依靠别人的意思”。③ 白崇禧用简单的话概括：“自卫是用以抵抗敌人军事的侵略，自治是用以巩固我们下层政治的组织，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自给是用以抵抗外来的经济侵略。”④ 他强调“自卫”、“自治”、“自给”三者中，“自卫”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自卫，便谈不上自治和自给。反过来说，自治和自给，对于自卫也有影响，自治和自给的能力增进一分，自卫的能力也就加强一分”。⑤ 黄旭初对“三自政策”也作过类似的解释。白崇禧宣称“三自政

---

①② 《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报告书》，634页，南宁，广西省政府，1933。

③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7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④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54页，南宁，创进月刊社，1936。

⑤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8页。

策”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的。他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要民族能独立自卫，不受欺侮，使民族能自决；民权主义是要实行地方自治，使下层基础组织稳固；民生主义是要人民生活能自给自足，不依靠外人可以生存。“三自政策”就是根据三民主义规定出来的，因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才能优裕”。所以，“三民主义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义的实行”。[①] 后来，新桂系的理论家们都是根据这些要旨对“三自政策”进行阐述、发挥和宣传的。

“三自政策”是30年代新桂系维护其在广西“独树一帜”政权的基本政策。经过蒋桂战争以来的一连串的军阀混战，新桂系的实力大大削弱了，被迫局促广西一隅，不仅无力与蒋介石争雄，而且随时都有被蒋吞灭的危险。因此，如何求得生存是新桂系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三自政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制定的。新桂系打着“奉行孙中山的遗教”，“实行三民主义”的旗号，给“三自政策”戴上“革命”的光环，是为了掩盖他们割据广西，自保图存的企图。实际上，他们的“三自政策”，所谓“自卫”是加强军事力量，维持省内治安，抵御蒋介石军队的入侵；所谓“自治”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来建立独立的政治体系，防止蒋介石的势力插手广西政务，保持广西独立的地位；所谓“自给”是企图利用广西的自然经济，实行经济自给自足，防止外部经济势力的渗透，危及他们的统治利益。概而言之，“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军阀混战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它和当时山西阎锡山的“自强救国”、山东韩复榘的治鲁“四大纲领”等一样，是为了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控制和吞并，维护自己的割据政权。

新桂系为贯彻“三自政策”，1934年3月以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的名义颁布《广西建设纲领》，次年8月修订重新公布。《纲领》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基本认识”；第二部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基本认识”主要是说明广西建设的指导原则，宣称孙中山的

---

①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58页，南宁，创进月刊社，1936。

“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适当原则”，要“奉行总理遗教”，“一切建设计划，能以大多数生产民众之利益为基准”，“自卫、自治、自给之三自政策，应为本省建设之总原则”，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共27条。政治建设，提出整饬行政组织，健全政治基层组织；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树立文官制度的基础，实施公务员训练，提高行政效能，等等。经济建设，提出依法保障农工利益，革新旧式农业，振兴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开拓土产市场，扶植中小工商业，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奖励私人投资开发各种实业，发展交通，整理土地，奖励垦荒，振兴水利，发展农村经济，等等。文化建设，提出要“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奖励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根据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确定教育方针，改良教育制度，国民基础教育一律免费，并限期强迫普及，等等。军事建设,强调厉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

《广西建设纲领》是新桂系在30年代制定的最重要的施政纲领，它是“三自政策”的具体化。这个纲领公布后被称为广西的“根本大法”，① 成为新桂系当局教育训练干部的教材和宣传蓝本。②《纲领》设计了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蓝图，并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施政纲领，表明新桂系在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他们锐意进取的目的是反蒋，争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动力。新桂系意识到，广西是个贫穷落后的边远省份，要与蒋介石争天下不能不认真经营广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必须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其“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的深层次意义就在这里。然而，从历史来看，《广西建设纲领》是广西近代以来第一个全面规划广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完整方案。它的实施对推进广西社会近代化进程，促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南宁，64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 万仲文：《桂系见闻谈》，80页，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科研处，1983。

进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军事建设

军阀都视枪杆子如命根子，他们迷信有枪便有政权，有兵便有地盘这一信条。新桂系也是如此。

新桂系虽然宣称广西建设是“四大建设”，但首先强调军事建设。《广西建设纲领》强调要“以最大努力，从事军事建设，充实民族自卫能力”。白崇禧更明确地说：“我们的一切建设，都要以军事建设为中心”，“如果离开军事而妄谈教育，离开自卫而妄谈建设，那是一种自杀政策。”① 因此，30年代的广西建设是以军事建设为轴心展开的。

军事建设是根据“自卫”政策进行的。“自卫”政策主要是推行“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白崇禧说，“寓兵于团”就是效仿古代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寓兵于农”的办法，办理民团，组织民众进行军事训练。他认为民众经过军训，有了军事常识，一旦有事，政府一下命令便可成立军旅，开赴前线作战。“寓将于学”，就是在大、中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养成预备将校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平时从事各种事业，有战事可充任连、排级军官，指挥作战。白崇禧自信推行“寓将于学”，广西就无形中有了“若干黄埔军官学校”，能够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寓征于募”，就是用募兵的方式来征兵。白崇禧认为，征兵制和募兵制各有长短利弊，征兵制的兵是征调而来的义务兵，素质较好，国家可少花钱多练兵，但按期退伍技术不能精，也难免有胆小怕死不能打仗的；募兵的短处是素质不好，来当兵的多是因为没有饭吃，或者是想发洋财，需饷也太多，补充困难，但长处

① 《白副总司令最近演讲集》，10页，1935。

是久经训练，勇敢善战。“寓征于募”则“取两者之长，而舍两者之短”，在征兵的时候，对应征的壮丁先挑选自愿入伍者，自愿的太多或不足时，则用抽签办法来决定。①

“三寓政策”是新桂系根据当时广西情形制定的。30年代初，经过连年战乱后全省百业俱废，民生凋敝。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扩充军队是办不到的。因此，新桂系推行“自卫”政策，“一方面是整理原有的正式军队，一方面是办理民团，造成广大的民众武力”。②

新桂系整理军队，主要是裁减正规军。常备军缩小到最低的限度，最少的时候全省只有1个军5个师14个团，兵力不足3万。将省下的军费用来购买枪炮、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从1932年通过香港先后向德、日、英、法等国买进大批军火，包括山炮、轻重机枪、步枪、子弹、工兵器材和通讯器材等，仅步枪每年就购买1万枝。③ 同时继续办理南宁军校，培养中下级军官。1931年后在柳州成立航空处，培养飞行员。1935年正式成立广西航空学校，每年耗资500万元，向英、日购买飞机，聘请顾问和教官，还选派飞行学员去日本留学。

正规军裁减后，为弥补常备军力不足，新桂系大力举办民团，组织民众军事训练，作为后备军队。这样，民团训练成为30年代广西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

新民团制度

民团原是保卫地方治安的民间武装团体，清末年间广西已有之。民团的团兵是雇佣来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并且多为地主豪绅把持，为民众之害。新桂系整理正规军之后，在“寓兵于团”的口号下改造旧民团

①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9页。

② 黄旭初：《广西建设现状》，载《创进》月刊，第3卷第2期，8页，1935。

③ 蓝香山：《1932年至1937年白崇禧治理广西的几项政策》，存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组织，建设新民团武装。

1930年秋，滇军围困南宁三个月之久，形势危急。白崇禧率部由柳州去南宁解围时，在宾阳组织民团骚扰宾贵公路上的粤军，阻止其前往南宁增援滇军。民团与军队配合，使白崇禧得以击败滇军，省会南宁转危为安。新桂系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民团大有可为，便于是年冬开始建立民团。后来，民团在维持地方治安中发挥了作用。1931年7月，广西军政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行民团制度，以增强地方自卫力量。

新桂系的民团制度从组织形式到内容都与旧民团不同。最大的特点是把民团组织与行政组织结合起来，从省到乡村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民团组织。在省会南宁成立广西民团总指挥部，白崇禧兼总指挥，梁瀚嵩任副总指挥。全省划分12个民团区，即南宁、武鸣、桂平、玉林、梧州、平乐、桂林、柳州、庆远、百色、天保、龙州。每区设区民团指挥部指挥官、副指挥官各一人（后来区民团指挥官兼任行政监督）。县设民团司令部，县长兼民团司令，设副司令一人，由民团总指挥部委派。县以下的民团组织，区编为联队，区长兼联队长；乡（镇）编为大队，乡（镇）长兼大队长；村（街）编为中队，村（街）长兼中队长。凡在广西省内居住两年以上，年龄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①] 18岁至30岁的壮丁编为甲级队，31岁至45岁的壮丁编为乙级队。团兵又分为常备队、预备队、后备队三种。常备队由各县轮流征调各乡村甲级队团兵编成。预备队由常备队团兵训练期满退伍者编成。后备队由常备队、预备队之外所有适龄壮丁编成。1936年10月后，将各期常备队受训期满的团兵改为特种后备队，取消预备队、常备队名义。

民团指挥组织后来有几次变化。1932年4月，为节省经费，撤销广西民团总指挥部，在广西省政府内设团务处办理全省民团事务。1933年7月，又将全省民团事务改归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管辖，1934年5月设团务设计委员会

① 《广西民团条例章则汇编》，5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广西省政府，1934。

专负团务设计之责，1935年改为团务处办理团务。1932年4月民团区由12个区并为6个区，即桂林、柳州、南宁、梧州、龙州、百色等，每区设特务队。1933年5月，各县常备队集中区指挥部所在地，编为常备大队。同年7月，又将6个区改为8个区，即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龙州、百色、天保、平乐等。1936年再改为11个区，即桂林、平乐、梧州、玉林、浔州、南宁、龙州、天保、百色、庆远、柳州。1939年4月增设武鸣区，全省恢复12个民团区。1932年9月各县民团司令部合并于县政府办公。1936年1月撤销县民团司令部，在县政府内设团务科办理团务，县长仍兼民团司令，副司令兼副县长。

民团训练。各县常备队集中县城由县民团司令部训练，每期4个月。1933年5月后改为由区民团指挥部集中训练，每期6个月。各乡村后备队由县民团司令部派督练官巡回训练，利用农闲季节进行，以扣足180小时为限。预备队每年由县民团司令部选定地点复训一个星期。训练内容，有军事学科和术科、公民常识、自治概要、卫生概要、实业常识、识字等。民团训练期间，实行军事管理，团兵不按规定参加集训者处以罚金或拘役。

对编练民团，新桂系可真是苦心孤诣。白崇禧经常出巡各民团区、县，检查督促民团训练，几年间他走遍全省大部分区、县。到1936年全省已训练团兵40万，“民众尚武精神为之丕振”。① 李斗山在《新广西》一文中这样描述他考察广西的所见所闻：“到了梧州的街上，第一个印象是满街巷都军人化了。在这行走着的人，流着汗的人，买着东西的人，人力车上的人，笑叫喊……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②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经过民团训练广西“武化”已经推及到广大民众之中。新桂系自己也夸耀说“在广西各种建设中，民团制度算是一个最有声色、最

① 《广西与中国革命》，58页，南宁，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6。

② 许壁编：《广西建设集评》，88页，西南印书局，1935。

有功效的部门了”。[①]


正在训练的民团

民团建立后，不仅进行军事训练，维持地方治安，还被组织去筑路、造林、垦荒、举办成人教育等，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新桂系宣称“民团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的组织”，“成为本省政治经济文化诸建设的原动力”，是“建立新社会秩序的中心力量”。[②] 的确，经过训练教化之后的民团，名副其实成为新桂系统治的重要支柱。在30年代，新桂系“围剿”右江革命根据地，镇压桂北瑶民起义，堵截红军长征过广西，在两广事变中与蒋介石对抗，民团都起了重要作用。

民团组织庞大，经费开支浩大。广西省政府每年团务费320多万元。各县民团司令部和常备队的饷项费用由各县负担，各乡村民团后备队的训练饷款亦由各乡村摊派到各户。从1932年起，新桂系在田赋税项下附加五成，在鸦片烟税项下亦附加五成，缴作“团枪费”。一贫如洗的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压榨，被迫反抗斗争。1936年中渡、百寿、融县、平治、敬德等县爆发大规模的民变，反对新桂系“新政”，“反对征兵，反对训练民团，反对纳粮纳税”。[③] 一些乡绅因不满苛捐杂税，也卷入了民变风潮。民变遭到新桂系军队的残酷镇压。

广西民团干部学校

新桂系举办民团，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干部严重缺乏，难以完成编练任务，

---

① 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169页，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② 《新广西》，33～35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③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33页，南宁，创进月刊社，1936。

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新桂系把培养干部作为训练民团的首要工作。

1931年5月，在南宁成立广西警卫干部训练所，拨南宁军校第四期一部分学生，并考选一部分中学毕业生，合并编组，共260人。同年8月，在百色成立田南民团训练所，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和闲散军官，共100余人。1932年2月又在南宁成立民团训练班，调回各县民团整理委员和招收闲散军官，共230人。[①] 这几个训所班，训练时间6~8个月，结业后派任常备队长或训练员。但这几个所班规模小，远远不能满足干部配备的需求。1933年7月，为了扩大干部训练，停征各区民团常备大队，改办民团干部训练大队，调训各县在职乡（镇）村（街）长，招考中、小学毕业生，每期6个月。结业后分派各县任乡（镇）村（街）长兼民团队长（这时各乡村已实行“三位一体制”）。1936年1月，将各区民团干训大队和拟办的各区国民基础师范学校合并，改名为民团干部学校，区民团指挥官兼任校长。同年5月，为统一民团干部训练工作，将各区民团干部学校合并于南宁西乡塘，成立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直属第四集团军总部和广西省政府，白崇禧、黄旭初先后兼任校长。

广西民团干部学校以培养乡村长、民团干部和小学师资为宗旨，调训现任乡村长、小学校长教员，招考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学员修业期限分为三种：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6个月，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10个月，初中肄业一年以上或同等学历者18个月。课程设置有军事学科、军事术科、政治学科、国民基础教育、普通学科、实习等六大类，近40门课程。[②] 白崇禧、黄旭初等军政要员经常到干校训话，灌输“三自三寓政策”、“行新政，用新人”和“三位一体制”等“要政”。为配合干校学员的实习，在西乡塘设立“实验区分所”，划定附近的沙井、乔板、石埠、心圩等乡归该分所管辖。干校每届学员到乡下实习一个月，参加组织和训练民团，创办国民基础学校，扫除文盲，以及其他村政建设活动。

---

① 许高阳：《十年来之广西民团》，14页，桂林，西南导报社，1940。

② 许高阳：《十年来之广西民团》，49~54页。

从开办干训大队到创办民团干部学校，为各县乡村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新桂系推行“新政”的基层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为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输送了一批师资。

六、中学校军训

学校军训是民团训练的一部分。举办民团后，新桂系认为每个村（街）有民团后备队约100人，全省2.4万个村（街）约有240万团兵。一旦有战争，几百万团兵还要有几万将校去统率，这几万将校光靠军校培养是不够的，有效的办法是“寓将于学”。于是，决定在学校实行军训，培养军事后备干部。[①] 1931年秋高中开始军训，次年秋大学也开始军训。1933年春初中开始实施青年军训。

新桂系当局制定各级学校军训的“要旨”是：初中男生养成陆军预备军士人才，女生养成初级护士；高中男生养成陆军预备军官佐人才，女生养成高级护士；大学男生养成陆军初级军官佐人才，完成“寓将于学”的目的，女生养成优良高级护士及医药人才。[②]

实施步骤和方法：

初中或同等学校，自第一至第六学期每星期训练3小时。训练内容分学科和术科，要求掌握军事基本常识和军事基本制式及战斗技能。女生掌握看护技能。第六学期进行毕业会考后，男生集中军训半年。集训地点初分为桂林、桂平、柳州、武鸣、北流五区，每区编一军训大队。1935年后，柳州、桂林、桂平、北流区军训大队先后裁撤，改设军训总队于武鸣，所有应集训的男初中生全部集中武鸣受训。女生亦集中受看护教育训练，最初集中南宁女中，后改在南宁军医学校。

---

①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8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② 徐晓明：《广西之寓将于学政策》，20～21页，桂林，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1939。

高中或同等学校，第一学期每星期训练20小时，其余各学期每星期训练3小时。每年暑假期间进行两星期野营演习或步兵特种武器教练。1937年秋后高中第一学期军训亦采取集训办法，集中南宁军校受训。高中女生的集训与初中女生相同，亦在南宁军医学校受训。

大学和专科学校，大学自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专科自第一学期至第三学期每星期训练5小时，其余各学期每星期训练3小时。每年暑假训练与高中相同。大学女生各学期看护训练每周3小时。

大、中学校军训期间，实行军事管理。每校设一军训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一人。大队之下设中队，每中队设中队长一人，副中队长2~3人，助教若干人。每中队学生90~200人。大队、中队的正副队长和助教由第四集团军总部派军官充任。1936年取消大队部，改为军训处，设主任一人，有6个中队以上的设军训员一人。学生军训成绩严格考核，成绩不及格或操行被军训队长列为丁等的，不得毕业和升学。

在大、中学校实施军训的同时，高小也实施童军训练。童年训练是培养小学生“体格强健，纪律良好，毕业回家之后再施以民团训练，就可以当兵了”。①

30年代初开始的学校军训，是新桂系推行“三寓政策”，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新桂系当局为推行军训，制定了许多苛刻的规定，随意延长学生修业期限，过多占用上课时间，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军训教官态度粗暴，动辄打骂学生，引起学校师生和学生家长的极大不满。知识青年纷纷投考外省学校，离开广西。省立梧州中学全体学生罢课反对军训，新桂系当局采取严厉措施，先将全校学生解散，然后重新登记，开除学生20多人，罢课风潮才平息。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反对军训教官专横跋扈，被排挤去职。

① 徐晓明：《广西之寓将于学政策》，19页。

三、政治建设

30年代以前，广西县以下没有严密的政治组织。县以下设团练局，团总多由地主豪绅把持，乡村组织散漫，“萍若而合，絮若而散，犹如一盘散沙”，[①] 政府政令只能到达县。即使是县政府，“过去有所谓无为政治，县长除收粮判案以外就没有事做”。[②] 新桂系认为这种状况是推行“新政”的障碍，因此政治建设的重点是整顿县以下政治组织，提出“县政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政治组织，“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县政改革和公务员训练

广西政局稳定后，新桂系就着手县级政权的整顿。1932年开始调整各县行政区域，重新划定县界、县治，将飞地、插花地合理划拨。1933年全省设94个县，随后又增设5个县，共99个县。根据各县的面积、民户、人口和粮赋，把99个县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5个等级。后来每个等级又分为甲、乙两级。一等县，甲级3个，乙级11个；二等县，甲级3个，乙级7个；三等县，甲级2个，乙级12个；四等县，甲级5个，乙级37个；五等县19个。[③] 根据等级规定县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职员的数量和俸薪。县政府实行“裁局并科”，合署办公，由县长统一对外号令发文。经过整顿，县政府组织精干，加强了县政统一。

县级政权建设的重点是县政公务员训练。黄旭初说，办“自治”要由训练着手，“不然虽有好的组织，而没有好的人，就等于虽有好的机器而没有运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81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②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51页，南宁，创进月刊社，1936。
③ 《广西省政府公报》，121期，南宁，广西省政府，1936。

用机器的人才一样无用。所以人的问题，是很重大的”。[1] 于是，他们提出“行新政，用新人”[2] 的口号，大力开展干部训练。早在1931年新桂系就在南宁创办中国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白崇禧自任所长。该所的任务是调训各县党部执监委员，招收中等学校毕业生训练，每期4个月，学员结业后分派各县整理党务。1934年1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临时任用县长训练办法》，2月设立临时任用县长训练班，调训现任县长。5月，成立广西行政研究院，除调训县长外招收区长和县府秘书训练。训练科目主要有“三自政策”、《广西建设纲领》、行政法规、地方自治、军事常识等。特别强调对调训人员“注重心理建设”，“养成忠勇奋斗之精神”。[3] 新桂系高级干部亲自担任各科教授，主持考核。1936年3月，广西行政研究院改为广西县政公务员政治训练班，扩大训练规模和对象。班内分两部分，一是县长班，调训现任县长；二是县政公务员班，抽调县政府秘书、科长训练，并招考“志愿从事县政工作”的社会青年入班受训。训练科目，县长班“重在纲要”，[4] 县政公务员班“重在专业学科”。训练时间一个月。结业考核，及格者返回原职或分派各县任职，不及格者，现任人员予以免职，非现任人员不得任职资格。

县级机关以上的公务员除政治训练外，还要进行军事训练。由于公务员知识水准较高，所以训练内容和方法与民团训练有所不同，目的是要公务员去掉“重文轻武之习”，“接受军训之真谛，非独必须摹仿军队之形式，尤须体验融合军人之精神”。[5] 省、县机关公务员除出身军校和因病外，一律参加军训。各机关公务员分别编为某某机关公务员军事训练队，由所在地最高军事机关派军官负责训练。军训内容以民团后备队的术科为标准，训练时间以

① 黄旭初：《广西建设现状》，载《创进》月刊，第3卷第2期，8页，1935。
②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28页，南宁，创进月刊社，1936。
③ 邱昌渭：《广西县政》，89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④ 指《广西建设纲领》。
⑤ 《桂政纪实》，第五编军事建设，68～70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180小时为限。公务员军训从1934年4月开始，共训练两期。

对中层以上的干部，除了开班训练之外，新桂系还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加强控制。早在1930年，新桂系从湖南兵败退回广西时，黄绍竑消极离桂投蒋，新桂系面临分裂危险，李宗仁为稳定内部，巩固军心，采纳张定璠的建议，9月初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①]设中央干事会，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薛岳、吴奇伟、杨腾辉、李品仙、黄旭初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三人为常务干事，王公度为干事会书记。这个秘密政治组织，当时对桂张联盟反蒋起了团结和统一思想的作用。1932年1月，张发奎第四军离开广西。鉴于情况的变化，李宗仁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更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同志会改采会长制，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任副会长。会员入会必须向会长、副会长宣誓效忠。同志会制定了政治纲领和严格的纪律，会员必须无条件遵守执行。1934年，李宗仁再次改组同志会，扩大内部机构，加强领导力量。

11月1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西乡塘秘密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会上通过同志会的章程和政治纲领，设立领导机构，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为副会长。会长之下设秘书部、组织训练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邱昌渭、王公度、潘宜之、黄旭初、叶琪等分任主任。过去的同志会会员加入新会，重新登记、宣誓。入会的会员大多数为中上层军政干部。会员须经三个会员的介绍，并由李宗仁、白崇禧两人亲自批准。会员要绝对效忠李、白，入会时要向正副会长宣誓，“绝对服从领袖命令，效忠团体。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②]同志会最高权力属于正、副会长，正、副会长对一切有最后裁决权。同志会在南宁设会本

---

① 虞世熙说这个政治组织的名称叫“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42页。

② 《新桂系纪实》（上），534页，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部，在全省各地设分会和小组。各级组织对外绝对秘密，横的组织隔离，会员与会员之间也隔离，非经上级组织的介绍，不得沟通。同志会成立后，全省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事任免，都要经过这个组织讨论决定。同志会通过它在各地和部门设立的分会和小组，侦察、调查和掌握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情况，发现问题即通过秘密方式报告会长、副会长。这样，李、白不仅控制省级党政军机关的重大事务，而且也支配着全省各地区党政军机关的重大事务。1937年抗战爆发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宣告解散，文件全部焚毁。

广西是个贫穷的省份，经过连年战乱，省内经济凋敝，财政拮据，军政费用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新桂系不得不要求军政官员节衣缩食，廉洁奉公，以渡时艰。规定所有公务人员，穿布底鞋，着灰布公务服，戴灰布帽，禁止穿西装、丝绸便服和皮鞋。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公务员犯赃治罪条例》，惩治贪官污吏，以"树立廉洁政治"。这个条例虽然没有都得到贯彻，但迫于当时形势新桂系也惩办了一些贪污的军政人员。如玉林警备司令张壮生因贪污罪，柳州驻军团长罗活的副官因私贩鸦片被枪决。新桂系还号召军政官员要勤政，"苦干"、"穷干"、"硬干"，并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如《广西所属公务员奖惩办法》、《广西县长奖惩章程》、《县长巡视章程》等。1935年广西省政府公布对上年度违令不出巡的县长的处分，苍梧、富川、柳州三县县长三季不出巡，给予记过处分；崇左等16县县长两季不出巡，给予"申诫"处分。[①] 1936年4月份，有县长9人，副县长4人，县府秘书、科长2人，乡（镇）长6人，分别因"渎职行为"、"玩忽功令"、"办事不力"、"放弃职守"和"督饬无方"等被撤职、记过、取消任职资格和申诫等处分。[②]这些措施对整顿各级军政机关和官员的作风起过一定的作用，抗战前广西一度出现过俭朴苦干的风气。

---

① 《广西省政府公报》，103期，广西省政府，1935。

② 《广西省政府公报》，121期，广西省政府，1936。

30年代蒋桂对峙时期，新桂系力量弱小，处于劣势，新桂系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巨大的压力往往成为动力。新桂系为了对付蒋介石，除了加强武装力量外，最重要的措施可以说是训练干部了。他们精心培养“新人”，成效是比较显著的。当时广西各级军政官员的物质待遇并不丰厚，但经过训练教化的“新人”也“乐于”为新桂系效劳。蒋介石曾用收买的办法分化新桂系集团，但始终没有得手。这个时期新桂系牢固地控制广西，与蒋介石长期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得益于干部训练。

乡村行政与“三位一体制”

县政建设大量的工作是整顿乡村政务，建立和健全基层政治组织。新桂系强调政治建设的重心是健全乡村基层组织。1931年8月，新桂系设立第一训政区（包括桂林、兴安、全县、灌阳、平乐、富川、恭城、钟山、贺县等10个县），试办清查户口、整理户籍、推行保甲制度。取得经验后，193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普遍推行。

1932年9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各县甲村街乡镇区编制大纲》。大纲规定县以下的行政组织编制：农村为乡，城市为镇；农村民户多于城市民户的地方城市归并于农村为乡，城市民户多于农村民户的地方农村民户归并于城市为镇。乡、镇以下，农村为村，城市为街。村、街之下为甲。甲由户组成，以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村（街），10村（街）为一乡（镇）。甲设甲长1人。村（街）设村（街）公所，村（街）长1人，副村（街）长1~3人。乡（镇）设乡（镇）公所，乡（镇）长1人，副乡（镇）长1人。乡（镇）与县之间，辖有20个乡（镇）以上的县得设区，区设区署，为县政府的辅助机关，代表县政府管理区内各乡、镇。① 到1934年，全省基本完成甲、村街、乡镇、区的组织编制，全省99个县共2312个乡镇，24068个村街，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77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247425个甲，2620742户，13651167人。[1] 通过编制甲、村街、乡镇，建立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政权机构，奠定了新桂系统治的基础。

新的乡村政权，乡镇村街长大都由新桂系当局派“新人”充任，或送到民团干校训练过。据统计，到1939年，全省83%以上的乡镇长和21%以上的村街长经过干训。[2] 这些乡镇村街长成为新桂系得力的乡村统治者。

新桂系完成乡村行政编制后，接着又推行“三位一体制”。1934年6月，广西省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乡（镇）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大队队长，村（街）长兼任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乡（镇）村（街）公所、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后备队队部三个机构合并办公。这样，乡村行政组织形成了“三位一体制”。

新桂系称，实行乡村行政“三位一体制”，是为了统一事权，集中意志，形成以乡（镇）村（街）公所为领导中心，通过民团组织“发挥民众集体力量”，通过国民基础学校运用教育力量推进“四大建设”。同时，三个机构合并办公和“一人三长”，又可以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开支，提高工作效率。[3] “三位一体制”是新桂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又一重要措施。这是30年代广西乡村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个制度的推行，在乡村形成了“政教卫合一”，统一了乡村政务，提高了基层政权的效能，使新桂系的各项政令顺利地贯彻到乡村和民众，有力地加强了新桂系的统治。新桂系官员说：“广西今日一切都表现得有办法，如征兵有办法，征工有办法，筑路、造林、种桐、村仓等无一不有办法，都是三位一体制效用的表现。”[4]

新桂系整顿乡村政务，建立健全基层行政组织，推行“三位一体制”，目的是加强其统治基础，是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但它对当时广西乡村社会是一次有效的整治，结束了乡村社会涣散无组织的状态，客观上推动了广西乡村

① 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84页，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② 梁上燕：《广西建设》，11页，桂林，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2。
③ 亢真化：《广西的三位一体制》，20页，桂林，民团周刊社，1938。
④ 亢真化：《广西的三位一体制》，29页，桂林，民团周刊社，1938。

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对维护广西社会的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为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创造了社会环境。

村街民大会制度

村街民大会是30年代广西各县普遍建立的乡村“民意”机构，是新桂系县政建设的成果之一。1935年12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村街民大会规则》。规则规定各村街“为提起民众政治兴趣及讨论村街兴革事宜”，应举行村街民大会。凡年满20岁男女村民、学校教职员和年满14岁的学生、民团后备队团兵，必须参加村街民大会。村街民大会由村街长每月召集一次。大会职权是：宣布政府政令并议决政令的推行办法；总结本村街一个月来的工作，议决应兴应革事项；议决本村街“禁约”、预算和村街甲长提案等。①

新桂系称民团是自上而下的民众训练，而村街民大会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训练，“使最基层之民众，得一练习民权初步之机会”。②黄旭初甚至把村街民大会称为“民众的政治学校”，举行村街民大会“使民众普遍地受政治训练，能够实际参加政治”。③ 应该说，村街民大会是一种具有近代化意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多少带有“民主政治”的意味。但是，有了形式不等于有内容。村街民大会制度的实施情况是怎样呢？新桂系一位官员谈到村街民大会的活动时感慨地说：“壮丁因谋生问题，多不到会，而以老幼顶替”，在村街民大会上常常是“村街长发言太多，民众多不肯发言”，“不表示意见”，地主豪绅则借此机会“假造民意或强奸民意”。许多村街民大会平时不开会，遇有派捐派工才开会，因此民众“只认识村街民大会是一个派捐派工的场所，而没有其他关系”。④ 这些情况表明，村街民大会虽然成立了，但并没有真正成为民意机关。它实际是当时新桂系当局宣布政令和摊派的机构。

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西当局利用村街民大会发动民

---

①② 雷殷：《地方自治》，191、173页，1939。
③ 黄旭初：《抗战的结果与政治演变》，38页，桂林，民团周刊社，1938。
④ 邱昌渭：《广西县政》，268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众抗日。尤其是桂南会战期间，学生军、战工团等抗日团体通过村街民大会去宣传和动员群众，各地掀起了支前参战热潮，配合军队打击入侵日军、村街民大会在抗战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农村“合作事业”

30年代初，经过长期战乱后的广西，“农村崩溃，百业衰落”，[①]“农民节衣缩食，大多数已难维持其原来苟安状态，而高利贷复随之活跃，农村社会，更岌岌不可以终”。[②] 新桂系意识到农村社会不安定，就无法推行“新政”，开展“四大建设”。于是，他们提出“救济农村经济”的口号，在农村开办“合作事业”。

所谓“合作事业”，主要是建立平民借贷所、村（街）仓和举办公耕等。1934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平民借贷所章程》，1935年9月颁布《广西省办理村（街）仓章程》和《广西省村（街）公耕章程》。《广西平民借贷所章程》称建立平民借贷所的宗旨，是“以使民众得有借款机会，以从事生产事业，以及免高利贷之压迫”。[③] 规定每县开办一所平民借贷所，资金5000元以上，由县款提拨或由地方人士筹集。《广西省办理村（街）仓章程》规定，每一村（街）设一个公共谷仓储谷，为各村（街）“公产”，设保管委员会保管。仓谷向村（街）内各户按每年产谷量额以累进方式抽收，500斤以上抽1%，1000斤以上抽2%，5000斤以上抽3%，1万斤以上抽4%。其他农产品的收获，比照谷价抽收现金购谷存储。村民遇灾荒或青黄不接可向村（街）仓借谷，新谷收成偿还，每100斤收息20斤。[④]《广西省村（街）公耕章程》规定，每村（街）每年应利用空闲土地、荒地，征用劳力，由村（街）甲长督率从事公共耕作。公耕所需耕牛、农具、种籽、肥料由村内各户分担。公耕收获农

---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工商业”，37页，南宁，广西印刷厂，1936。
② 《广西年鉴》（第二回），165页，南宁，广西统计局，1935。
③ 《新广西》，33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④ 《正路》，第1卷第2期，1935。

作物交由村公所保管，作为村（街）“公有财产”，补助学校和其他公共事业的费用。[①] 此外，“合作事业”还有组织村（街）民挖鱼塘，筑水坝设水车，经营公有园林、畜牧等。

在农村开办“合作事业”，也是30年代广西县政建设的内容之一，新桂系曾比较努力推行。新桂系宣称开办“合作事业”后，农村“仓廪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②] 但事实上，广西农村并没有出现新桂系所描绘的盛景，“合作事业”没有能挽救农村社会的日益恶化，广大农民依然十分贫困。左右江地区农民“恒终年以杂粮为主食品，而以所获之谷米，全部换取其农村所需之物资”。[③] 1936年中国社会教育社考察团在广西考察后指出：“广西农民的生活大都是入不敷出，辗转于告贷糊口的痛苦生活中，整个广西是穷，是困。”[④]

“合作事业”没有能够挽救广西农村的破产，是因为新桂系不敢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制度。30年代的广西，封建剥削仍然十分严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户手中，大多数农民靠向地主租佃土地维持生活。据广西省政府的统计，全省有54%以上的农民须向地主纳租求耕地。[⑤] 田租以物租为主，有“定额租”、“分租”、“浮租”和“实租”等，不论哪种形式，租额一般都是收获量的50%以上。农村中的高利贷也很普遍，借贷利率一般是3%~4%之间，高的达5%~8%。借谷的利率，每100斤利息20~30斤。[⑥] 沉重的封建剥削是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新桂系在30年代初曾推行所谓“土地改革”，1931年7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耕地租用暂行条例》，1932年5月修正重新

---

① 《正路》，第1卷第2期，1935。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6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③ 邱昌渭：《广西县政》，180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④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61页，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⑤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61、55页。
⑥ 《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36页，桂林，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

颁布。《条例》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正产收获总量375‰。欠租满两年，方许田主脱耕。每年租谷无须佃农送到田主家中，如田主请其运送，须照价给运费”。① 但这个《条例》不过是官样文章，并没有真正实行。新桂系承认：“土地改革在廿三年至廿六年曾雷厉风行，可是收获不大”，“各县能切实照规定减租者，寥寥无几”。② 新桂系在农村推行“合作事业”，也没有触动封建剥削制度。平民借贷所开办后，大多数被地主、豪绅把持，成为他们剥削农民的新工具。连新桂系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平民借贷所“于农村事业，无所进展”，“真正的劳苦农民，丝毫得不到利益，只是中产以上的人家，凭着其不动产的契卷，取得一些贷款，以谋其个人利益，甚至以高利贷再转借给别人，从中剥削。这个，就比较从前的典押，尤是望尘莫及”。③ 因此，这种平民借贷所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由于各县经费支绌，多无从提拨或无法筹集，到抗战前夕只有20个县开办。公耕则遭到地主、豪绅的反对，新桂系“不敢与恶势力抗衡，而以吞声忍气了之”，④因此仅有南丹等少数县举办。比较有成绩的算是村（街）仓了，各县乡村都普遍建立。但村（街）仓“保管委员会”大都被村长、地主控制，并没有真正成为农民的“公产”。“保管委员会”成员利用仓谷收买壮丁顶替征兵者有之，集体贪污者亦有之，以致仓谷一空，徒具虚名。新桂系希望通过举办“合作事业”救济农村经济，没有如愿以偿。

四、经济建设

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交通闭塞，地瘠民贫，经济十分落后。20年代

① 黄旭初：《抗战的结果与政治演变》，38页，桂林，民团周刊社，1938。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18日。
③④ 邱昌渭：《广西县政》，176、194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中期，新桂系开始进行经济建设，但那时偏重于交通建设。30年代初，新桂系在饱尝了战争失败的苦楚之后，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黄旭初说，建设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注重军事建设，忽略经济建设，“恐怕军事建设也不能单独成功”。[①] 白崇禧也说，军事实力最终是取决于经济实力，“因为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战争，武力的战争，而且是国力的战争”。因此“我们要准备斗争的力量，不仅在军事上要有准备，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要有准备”。[②] 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桂系在整军经武、加强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的同时，也把目光注视到经济建设上。然而，最初一两年新桂系主要集中力量举办民团，整顿治安，稳定社会秩序，1934年颁布《广西建设纲领》后才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广西省政府陆续成立经济委员会、工商局、矿务局、农林局等机构，负责全省各方面经济的调查、设计和建设。自此，经济建设全面开展起来。

工　业

20年代后期，新桂系筹建几家新式工厂，如广西硫酸厂、南宁制革厂、广西酒精厂、柳州机械厂等，蒋桂战争时遭到破坏，先后停办或停建。1931年后新桂系逐步将这几家工厂恢复。1933年广西省政府制定广西工业发展计划，“凡民间所能办之工商业，政府主要负责设计和指导，予以扶助”；“凡必要举办之工业，又为民间力量所不及者，由政府筹办”；“重要的需要巨资的企业，由省内外商民投资，或由政府与其合办”。[③] 这些计划后来列入了《广西建设纲领》。根据这个方针，新桂系开展工业建设。首先是抓省营工业的建设，一方面，对原有各工厂加以整理改造，增加资本，扩充设备，提高生产

① 《黄旭初先生之广西建设论》，20页，桂林，南方建设书店，1938。
②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8页。
③ 《广西年鉴》第二回，401页。

能力；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建立新工厂。到1936年，省营工厂共有12家。[①]现将各厂略述如下：

广西硫酸厂　1927年筹设于梧州，次年正式成立。1929年因战事停顿。1932年恢复，并与粤省合办，改名为两广硫酸厂。该厂资本50万元，有150HP蒸汽机一部，100KVA发电机一部，67KW电动机11部和碎矿机、除尘机、喷酸机、制硝酸机、抽酸机、蒸酸机等比较先进的德制设备。生产能力日出硫酸7~10吨，[②]曾远销港、粤、南洋等地。后因广东自行设厂，销路日狭，成本过高，又受外货倾销影响，连年亏损，数度停工。1937年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接办。抗战爆发后不久，屡遭日机轰炸，损失巨大，遂告停办。

南宁制革厂　1927年筹设于南宁，次年正式开工。1930年因战乱停办。1933年恢复，1934、1936年两次扩充。固定资本7万余元，设备有11HP、10HP、2HP马达各一部，各种制革机器15部，每日可制各种皮革280余张。[③]该厂附设有骨粉厂，碾制肥田粉。

广西火柴厂　原为梧州火柴厂，1921年由商人创办于梧州。1935年广西省政府与粤商"收购合办"，增加资金，扩充设备，改名为广西火柴厂。该厂官商股各5万元，[④]设备有15HP油渣机一部及全套制造火柴机器，生产能力为年产火柴2万余箱。

广西酒精厂　1927年筹备于梧州，后迁柳州，因政局动荡停顿。1932年重建。该厂设备较好，大部分是向德国购买的德制机器，日产酒精17加仑，后增至30加仑。[⑤]但由于原料缺乏，销售市场狭小，年年营业亏损，1935年该厂拨归广西农业试验场。

---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27~29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②③ 梁任葆：《广西工业建设之回顾》，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6月21日。

④ 《广西省政府公报》，第16期，广西省政府，1937。

⑤ 梁任葆：《广西工业建设之回顾》，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6月21日。

广西印刷厂 1933年在原广西印刷所的基础上改办，厂址设于南宁，1936年迁桂林。厂内设有铸字、排字、石印、胶印、板印、铅印、照相、制板、水刷、装订等部，设备比较先进，每日可印书6万册。该厂是当时省营企业中效益较好的工厂。

南宁染织厂 1933年创办于南宁，1935年正式生产。厂内有电力织布机100部，提花机10部，纬纱机7部，还有染布机、经纱机、摺布机、打包机、电动机等，设备完好，每日织布240余匹，袜72打。


南宁染织厂的厂房

广西糖厂 1934年筹备于柳州，1935年迁贵县罗泊湾，同年安机完竣开工榨蔗。该厂设备新式完备，各种制糖机器49部，固定资本68万元，生产能力每24小时榨蔗300吨，产24号白糖30吨。①

广西制药厂 1934年在梧州成立，厂内有制片机、制丸机、筛粉机、油膏机等制药设备，资本16万元。产品有痘苗、针药、化学药品、成药、制剂等300余种。

柳州机械厂 1927年筹设，次年春正式开工，1929年因战事停办，1930年恢复。广西当局一向将该厂作为省工业重点加以经营，厂内分木工、翻砂、打铁、机械、电器五大部，制造和修理飞机、汽车与普通应用机器、手榴弹、迫击炮以及农具等。厂内还附设机械学校，招收学生，培养技工。

南宁机械厂 1936年由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附属工场改办，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仅有几部机床、刨床、锯铁机等，只能制造一些农具和修理

① 梁任葆：《广西工业建设之回顾》，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6月21日。

机器。

宾阳瓷器厂　原为商办董南公司，1933年广西省政府接办，改为宾阳瓷器厂，固定资本1万元。1935年后几次扩充，增建厂房，购买设备，改进生产方法，产品较前精良。但生产纯用人力，年产各种瓷器6万件，以销售省内为主。

广西桐油厂　1935年创办于梧州，提炼本省出口的桐油，以提高价格，增加对外贸易。厂内设有蒸仓、抽油机、收油机、油仓等。每月可提炼桐油500吨。

此外，还建立了广西电力厂、柳州电力分厂、贵县电力分厂、龙州电力分厂、桂林电力分厂、八步电力分厂和广西自来水厂、南宁自来水分厂等。另外在柳州开办有轻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手榴弹厂等，生产枪支、弹药。这些兵工厂资金充足，有的“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①

新桂系在兴办省营工业的同时，提倡民营工业，“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企业”。因此，30年代前期民营工业有一些发展。民营工业主要集中在梧州，先后开办有华兴织造厂、广西电池厂、大东南印刷厂、广西帽厂、梧州雪厂、华西工业社、文化墨汁厂、国兴祥号等。尤其是土制炼油业发展较快，1932年梧州精制火油厂共有24家，资本最大的10余万元。但从1933年起，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等外国炼油公司大量削价倾销，梧州土制煤油业因亏损纷纷倒闭，是年10月后只有2家勉强开工。南宁也出现一些民营工厂。到1936年，全省大小民营工厂共有62家。②

手工业方面，30年代前期在全省经济生活中较有意义的是土布业和榨糖业。土布业分布全省，就其存在的方式而言，可分为三类：一、农家妇女的副业；二、家庭手工业；三、手工工业。第一类遍布全省，第二类以玉林为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下），64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② 梁任葆：《广西工业建设之回顾》，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6月21日。

中心，第三类以桂林为中心。广西各县都产甘蔗，因此制糖业很普遍，尤以邕宁、柳州、贵县为最盛。除土布业和榨糖业外，还有纸业、油业和瓷器等。但这个时期新桂系当局对手工业“尚少专力注意，未能普遍指导之”，[1] 任其自生自灭。各种手工业仍沿袭千百年来的生产方法，墨守成规，产品粗劣，效益低下，大部分仅能行销省内，省外市场则无插足余地，许多逐渐衰落和消灭。因某种特殊环境而幸能苟存的，如玉林的土布业和都安、隆山纸业等，“也仅能在艰苦环境中利用最低廉的劳动力，在一很狭小的市场内挣扎度日”。[2]

30年代，新桂系兴办工厂，发展实业，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专业人才，对广西近代工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新桂系创办工业主要是为了增强其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大多数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服务的，带有浓厚的军事性。当时在广西进行经济调查的经济学家千家驹等人指出，广西官办的新式机械工业的兴起，“非缘于社会自发之需要”，“故于该省经济发展之意义上作用殊少”。[3] 由于军事性浓厚，使工业市场狭窄，销路不畅，效益差。例如硫酸厂，所生产的硫酸主要是用于制造军火，除少量行销省内之外，大部分运销广东，市场操纵于粤人，经常因销路呆滞而停工。后来广东自行设厂生产硫酸，该厂即告长期停产，最后倒闭。工业原料也大都仰赖于省外，甚至国外。如柳州机械厂所用的木材向加拿大购买，使成本昂贵，效益很低。30年代前期，新桂系的工业建设成效甚少。

新桂系虽然提倡和鼓励民营工业，但同时又对民营工业进行掠夺和吞并。上述省营工业兴办过程中，有些是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接管”、“收购”或官商合办等形式吞并民营企业建立起来的。例如商办的梧州、桂林、柳州等电厂，由于资金不足或经营不当，连年亏损，新桂系乘机先后用“接办”、“收购”，甚至以“统制电业”之名，把这些民营电厂掠夺过来变为省营电厂。新

---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工商业”，2页，南宁，广西印刷厂，1936。

②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93页，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③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9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桂系的掠夺和吞并，抑制了民营工业的发展。抗战前广西民营工厂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不少工厂实际上是手工工场，技术落后，效益低下。

矿　业

广西矿藏丰富，种类繁多，尤其是金、锡、钨、锑、锰、煤等产量丰富。20年代后期新桂系已开始筹划开发矿产，成立矿场，但不久爆发蒋桂战争，开发矿产工作中断。30年代初新桂系在筹划各项建设中，认为矿业对促进外贸、开辟财源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很重视矿业，提出现阶段的“自给”措施“第一就是开矿”。[①] 1931年后广西省政府对全省矿藏有计划地进行勘察和钻探，边查明边开采。1934年5月，省政府成立矿务局，负责管理和开发全省矿业。矿务局之下，在钟山设平桂区办事处，在南丹设百柳区办事处，在田阳设天龙区办事处等，矿产开发全面兴起。

首先对藏量最丰富的锡矿进行开发。锡矿主要集中在富川、贺县、钟山一带和南丹、河池一带，这里成为开发的重点。广西省政府首先恢复并增加资本经营钟山模范矿场，“作为引起人民开采的模范”，“提起人民实业兴趣和指导人民开矿方法”。[②] 模范矿场除开采锡矿外，还开采煤、钨等矿，从国外购进新机器，进行新法开采。后来将模范矿场承包给华侨邓泽如等人组织的贺成公司，官商合办，进一步用机械开采。在开发富钟贺矿区和丹池矿区的同时，1935年开发上林、昭平金矿，1936年开发合山煤矿，1937年开发灌阳钨矿等。30年代广西先后建立了十来家省营矿业公司和矿区。

由于财力不足，广西当局除设立省营矿场外，主要是通过鼓励民营开发来发展矿业。1931年后，广西省政府开放矿区，允许海内外商人投资开发。1934年制定《广西省请领矿业权暂行章程》，规定省内各种矿藏，只要不影响军事要地和重要公共建筑物、古迹、交通要道和重要商埠，均可开采，各矿

① 白崇禧：《三自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白崇禧言论集之五），102～103页，全面战周刊社，1938。

② 苍山：《新广西的经济建设》，载《南方杂志》，第2卷第3期，1933。

区只需缴注册费300元。对民间小资本经营的矿业给予优惠，制定了《富贺钟请领小矿区暂行简章》等，规定50亩以下也可设矿区，只需向矿产主管机关缴交呈文费5元，印花费和查勘费若干即可。同时，开放矿砂收购、提炼和运销，矿商领取执照、交纳保证金后可设厂收购、提炼和运销。广西银行还为矿业提供借贷资金，1933年放款4.8万元，1936年增至11.4万元。

这些矿业政策，对广西矿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34年后，富商、华侨、达官贵人等纷纷来桂，请领矿区，投资开采，大小矿业公司和矿场相继建立。据统计，1931年经核准给照的大矿业公司只有15家，大矿区只有20个，1937年大矿业公司发展到286家，大矿区发展到304个。[①] 至于小矿区则星罗棋布，遍及全省。各种矿产大幅度增加，1932年全省纯锡356吨、钨砂9吨、锑砂308吨、锰砂7714吨，至1936年纯锡2889吨、钨砂1335吨、锑砂4136吨、锰砂27255吨、煤27255吨。[②] 广西矿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矿业的发展，为新桂系开辟了重要财源。首先是增加了税收。抗战以前，新桂系规定矿税税率按矿质分为三等，高者征20%，次者征15%，低者征10%，矿税成为新桂系一项可观的收入。1936年广西省政府实行矿产运销统制政策，规定全省矿产品运销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统管，收购矿产品外运，不许私商营运。新桂系从垄断矿产品贸易中获取巨利，仅锡矿一种，1936年出口收人743.8万元，1937年增至2260.1万元。[③]

30年代前期，广西矿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矿业的生产方法仍然很落后，除了少数省营矿场采用机械生产外，大部分民营矿场仍然是土法开采。以锡矿开采为例，采取人工凿石穿洞寻取矿石，或引水冲洗山岭土层取矿，或挖地取含锡砂土用水淘洗矿粒。土法开采，效益很低，工伤死亡事故屡见

---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23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② 《本省主要矿产的消长》，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1月28日。

③ 《桂政纪实》，第三编经济建设，130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不鲜。土法开采缺乏科学方法，浪费极大，破坏生态，缩短矿场寿命。新桂系发展矿业的主要目的是为增加外贸获取外汇，大量外运矿砂出口。因此，当时矿业的发展对本省工业没有起促进作用。

抗战爆发后广西矿业迅速衰落。一方面是由于战事影响，出口通道被封锁，矿产品滞销；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矿业统制，资源委员会在桂林设立锡、钨、锑等矿管理处，统一收购，价格不及成本。1938年后广西矿业公司纷纷倒闭，1939年全省大矿业公司减少到80家，大矿区减少到82个，小矿区只剩下21个。[①]

交　通

20年代后期，新桂系开始建筑公路，贯通邕、柳、桂、梧和各重要城镇，形成全省公路网的雏形。后因政局动乱，路政停顿，路段多被毁坏。30年代初，新桂系把交通建设列为“要政”之一，再兴筑路，疏浚河道，创办民航，架设电话等。

1931年，广西省政府取消分区设局的公路管理体制，成立广西公路管理局，统一管理全省公路的养护和营运。新路建筑由建设厅实施，路成后交管理局接收管养。广西公路管理局成立后，首先修复旧路。由于战争破坏，原有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涵等严重损坏，交通阻滞。新桂系当局调派第四集团军1万余人进行抢修，将邕、柳、桂各区公路干线修复。以后省公路管理局派工队和征集民工对各路进行改善，改弯降坡、截弯取直、加铺砂石、加固桥梁涵洞、修建渡口等。到1936年，经过修复和改善的线路有邕柳、柳桂、邕武、邕龙、容苍、宾贵、玉容、容武、荔八、柳池等线。

在修复和改善旧路的同时，大力建筑新路。首先是续建和新建省道干线。新建公路重点是桂西南和桂西北。建筑工程由建设厅组织临时工程局或工程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23~24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处进行测量和设计，利用沿路各县民团组织，征调民工参加建筑。建筑经费，一部分由省政府拨款，另一部分是粮赋附加、百货税附加以及烟灯税附加等。续建的省道干线有邕龙路的邕（宁）那（堪）路段、百（色）平（马）路、邕钦路的吴（圩）东（崑）路段等。新建的省道干线有丹（南丹）池（河池）路、武（鸣）平（马）路、桂（林）全（县）路的黄沙河至湘界路段、百（色）乐（里）路、榴（江）永（福）路、信（都）梧（州）路、荔（浦）蒙（山）路等。其次是县道及其他支线的修筑。1930年以前，省内县道建设很少，1931年后新桂系当局饬令各县修筑县内公路，与省道、邻县县道衔接，联络各重要圩镇。规定“修筑县道所得盈利，由地方办的应归地方，商办的则归商人”。[①] 随后制定了县乡公路计划和修筑县乡道路办法。修筑的重要县道，有贵（县）桂（平）路、良（桂林良丰）锦（永福罗锦）路、宾（阳）南（横县南乡）路、邕（宁）永（淳）横（县）路、武（鸣）都（安）路、驮（崇左驮卢）茗（龙茗）路等。此外，还有为开发矿山、垦殖区和“赈抚”瑶民的山区公路。

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全省新建成省道和县道共2359公里。连同修复的旧路，全省公路，省道约2800公里，县道2900公里，合计约5700公里，其中实际可通汽车的约3300公里，占公路全部里程的60%左右。[②] 公路的修筑，促进了全省交通运输的发展，大多数县已通汽车，乡村民众旅行也较方便了。

广西交通历来主要靠水运。省内河流分布各地，主要的有柳江、黔江、郁江、桂江等，都是西江的支流，航运尚算发达。但河道复杂，只有在夏秋之间水涨时运输较便利，冬令水涸，滩多流急，仅可航行民船。30年代初，新桂系推行“四大建设”，比较注重开发航运。广西省政府成立全省治河委员会，组织测量队勘测各主要河道，制定疏浚计划。1932年后先后对桂江、郁

---

① 《都安公路汇刊》，8页，都安公路局，1932。

② 陈晖：《广西交通问题》，5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江、左右江、柳江等河道进行疏浚。同时，加强航运管理，在梧州成立广西航务局，统一管理全省航运事务。1934年后，在各河流设立水文站、水标站、航标等，并派专人管理。经过几年的治理，全省河流通航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全年可通航轮渡船的有1522公里，半年可通航轮渡船的有948公里，只可通民船的有3130公里。[①] 全省主要航线有邕梧、桂梧、梧柳、邕百、邕龙等。通航状况的改善，促进了全省水上运输的发展。

30年代以前，广西没有航空。30年代初，新桂系创办军用航空，在柳州建立航空学校的同时，筹办民用航空，但限于财力没有实现。1933年6月，两广合办西南航空公司，额定资本200万元，为官商合办性质。先是由桂粤两省政府拨付30万元，开辟广州—梧州—南宁—龙州航线，购有“长庚”、“启明”、“北斗”、“北狼”等型号4架邮客机，1934年5月开始营业。后招募商股续开广州—茂名—琼州—北海航线和南宁—柳州—鹿寨—独山—贵阳航线。西南航空公司还与法国实行邮件联运，寄法国邮件先由飞机运至龙州，从龙州交汽车运河内，再由河内交飞机转到法国。当时广西与欧洲来往邮件几日内即可互达。抗战爆发后，西南航空公司交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西南航空公司名为民用航空，实际上主要为两广当局用于军事交通，供军政要人来往进行政治、军事活动使用，经济价值不大。

20年代时，新桂系在邕、柳、桂、梧和一些重要城镇、边防要地架设市内电话、长途电话和有线电报，用于军政机关通信。1930年后，为适应“四大建设”需要，新桂系当局积极发展电信交通，成立电话局、电报局，修复原有各线路，新架长途电话，建设市内自动电话。同时，饬令各县架设乡村电话，先架通各县城区和区公所线路，后架通各乡镇和重要村街线路。1933年区乡村电话完成架设者有20余县。到1936年底形成全省有线电通信网。无线电通信方面，归第四集团军总部办理，南宁、柳州、梧州、龙州等地设有短波无线电台，主要用于军事，有时兼收发商电。各县乡村电话虽然大多是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1075页，桂林，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因陋就简，仅可勉强通话而已，但它使交通闭塞的乡村通信得到改善，政府政令和各乡村信息得以快捷传达。抗战爆发后，乡村电话对动员民众支援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交通建设是30年代广西一项比较有成绩的建设，其中公路建设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一些人士考察广西后说：“在贫瘠之广西，而汽车公路能得如此发达，诚属难得！”① 广西素称山国，到处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在30年代经过几年建设，公路遍布全省，面貌的确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应该指出，当时限于财力和技术，所建的公路大都还很简陋，有的省道干线路线弯曲，纵坡陡峻，路面狭窄，桥涵不固，以致晴通雨阻，而且不能运输大宗货物。当时广西的汽车载重量平均在2.5吨以下，而省内所能输出的多是量重值廉的农产品和原料品，难以在公路运输。各县乡村公路，工程更为简略，大多只有路基而没有铺设路面，有的通车后不久失修毁坏，“县与县间，亦多未能衔接，致失联络”。② 因此，广西公路发展虽然迅速，但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意义还很有限。一些学者考察广西时指出：广西公路“除便利行旅和军运外，其在运输经济上的意义，却不甚大”，“其所谓便于运输的不过是从外省运入的洋货”。③ 如丹池公路建成后，桂黔商务关系进一步密切，贵州“特货”（鸦片）顺利经由此路运销粤、港、澳等地，1934年广西的“禁烟罚金”收入达1266万元，比上一年增收46.7%。

农林业

广西地处温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于耕种，各种温带和亚热带种植物比较丰富。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和其他社会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广西的优越自然环境未得到开发利用，地弃其利，农林业还很落后。30年代初推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游桂名人评语摘要”，17页，南宁，广西印刷厂，1936。

② 邱昌渭：《广西县政》，171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③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80页，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行“新政”后，新桂系把发展农林业作为“根本要图”，① 1934年5月成立农林局，筹划和推进农林业建设。

农业方面。首先从建立和发展各种农业试验场入手。全省原有柳江、南宁、桂平3所农林试验场。1932年广西省政府将柳江农林试验场改为广西农业试验场，1935年又改为广西中心农事试验场。场内分农艺、园艺、畜牧、病虫害四部，并在桂平设立水稻试验分场，在邕宁设立棉业试验分场，在南宁西乡塘设立水稻试验分场和糖蔗试验分场。南宁农林试验场改为热带果树场。1935年在8个民团区设立区农林示范场，示范场受省中心农事试验场指导，负责指导区内各县农林试验和推广工作，并供民团干训队学员实习。有一部分县也设立了农场。农业试验场、示范场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各种农作物的改良、繁殖和推广。水稻是广西主要的粮食作物，各试验场都比较重视水稻品种的试验。一方面采集、挑选本地优良品种繁殖推广；另一方面从外省引进优良品种繁殖试验。棉花大约在清末以前广西尚能自给，后因品种太劣，收益很低，土纱土布竞争不过洋纱洋布，农民逐渐弃而不植。此后广西每年大量进口棉纱、布匹，这是广西严重入超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桂系有鉴于此，大力提倡种棉，并由试验场引进湖南棉和海南棉，进行试验和推广，全省棉花产量逐步有所增长。各试验场还对甘蔗、烟草、苎麻、茶、果等经济作物进行改良和试验。此外，各试验场还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分赴各地调查各县气候、土质、作物种类、耕作技术和生产状况等，为推广先进农业做准备。

其次是农田水利建设。水利是农业命脉，但30年代以前广西无水利可言，这是广西粮食低产的一个原因。1932年广西当局开始查勘水利资源，筑坝引水灌溉农田。同时，饬令各县设立雨量测验站，安设水站标，指导农民兴办水利。1934年成立广西水利工程处，专司农田水利事务。1935年划全省为8个水利区，设水利专员，负责查勘、筹建水利工程。这个时期新桂系虽

① 《新广西》，14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然开始注意水利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财力不足，除在南宁、柳州、镇南、梧州等地建成几处水坝、水塘外，全省水利工程多未能兴建。各县自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到1937年也仅建成169个，灌溉面积164681亩。[①]

再次是采取措施增加粮食生产。提倡冬种，30年代前广西冬种作物很少，广西当局派员分赴各县宣传冬种，督导农民种植小麦、荞麦、豌豆、蚕豆、油菜等冬季作物，并规定冬季作物种植面积须占各县耕地20%～30%。增加肥料，主要是种绿肥，省政府从外地购买红花草、肥田草等种籽，分发各县试种、繁殖推广。防治病虫害，在南宁、柳州、梧州等处设病虫害研究室，派员到各地调查病虫害，研究防治措施。改良农具，从国内外购进农具样品，委托省机械厂仿造，向各县推广。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建立农具厂，从事犁耙、锄、铲等各种农具的改良和生产。这些措施对增加粮食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林业方面。广西山多田少，荒山荒地很多。广西当局比较重视开垦荒山荒地，发展林业。30年代前已有几处省营林场。30年代初在原有林场的基础上成立南宁、柳江、镇南、桂林、百色等5个林垦区。1932年在柳城设立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1934年改为广西农村建设试办区。同时在玉林、兴业、博白交界的六万大山设立广西六万垦殖区。在林垦区、垦殖区内，一方面由政府开办林场造林，到抗战前夕，办有桂林、宜山、雒容、龙州、罕山、茅桥、槎路等7个规模较大的省营林场。另一方面，从人口稠密地区迁移农民开垦，经营农林业。广西垦殖水利试办区先后从北流、容县、岑溪等县迁移垦民500户2500余人。六万垦殖区从附近各县招徕垦民500户2400余人。广西当局还在全省范围内放垦荒地。先是对荒地进行调查、清理，收归公有，然后任人承领垦殖。据统计，自1932年至1941年，全省共放垦荒地90.5万亩，[②] 垦民可向政府贷款，经营若干年后土地便为自己所有。从30年代初开

① 《桂政纪实》，第3编，64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② 《广西建设季刊》，1943年第1期。

始，大小私营垦殖公司相继成立。仅柳州就有民生公司、裕成公司、茂森公司、厚生公司、共和公司等，这些公司大都是达官贵人或巨商所办。

广西当局除开办省营林场外，还推广地方造林和发动民众造林。1934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各县造林办法，规定各县、区、乡（镇）、村（街）凡有荒山荒地者都要设立林场，造公有林，并规定各级林场的面积和每年造林数量。为保证造林所需的树苗，省政府饬令县、区、乡设立苗圃，培育和供应苗木。同时发动民团、学校师生在河流沿岸和公路两旁栽种树木。在发动地方和民众造林中，广西当局大力提倡种植经济林，尤其是油桐、油茶。桐油、茶油是广西重要的出口物资，当时在国际市场上十分畅销。因此广西当局十分重视，省政府颁发各县乡村植桐办法，规定各乡村每年征工种植数量，所需桐种由各县无息贷款购发，若干年后偿还。① 由于采取有力措施，全省桐油产量逐年增长。1935年桐油出口23万担，占出口总值16.36%，仅次于谷米。1937年增长为28.9万担，占出口总值四分之一，跃居首位。②

广西当局在发展农林业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畜牧业和渔业。1934年在南宁成立广西家畜保育所，聘请外国兽医专家帮助培养畜牧兽医人才。次年将全省分为南宁、玉林、柳州、平乐、百色五个防疫区，在一部分县设立兽疫防治所，防治家畜瘟病流行。1937年在桂林设立种畜场，从外地引进优良种牛、种猪、种鸡、种鸭等，繁殖推广。渔业方面，号召每个村（街）设一张公共鱼塘，并在容县设立水田养鱼示范场，作养鱼示范并供给农户鱼苗。

30年代初以来，广西当局在农林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措施，使广西农林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各种农业试验场的建立，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优良农作物品种得到逐步推广，垦荒和农田水利建设使粮食种植面积和灌溉面积逐步扩大。广西的粮食产量逐年有所提高，主要粮食作物水稻产量在30年代以前年产量约45亿斤，30年代都在50亿斤以上，1933年达到61亿斤，③ 是

---

① 《本省林业建设概述》，载《广西省政府公报》，18期，1937。

②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105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③ 《广西年鉴》（第二回），199页，南宁，广西统计局，1935。

解放前历史最高的年产量。但总的来说，广西农林业仍然比较落后，发展很缓慢。农业耕作技术陈旧，尤其是山区少数民族有的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农作物产量还很低，水稻亩产量高的200~300斤，低的只有100余斤。造林方面成效也不大，连新桂系的官员也感到失望，感叹全省“童山大部分还是童山”。①

广西农林业建设起色不大，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从客观方面说，广西农林业基础十分薄弱，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结构和沿袭几千年来陈旧的生产技术仍然占绝对优势，这种落后状况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容易的。从新桂系的建设方针和措施上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四大建设”是以军事建设为重心的，经济建设的投入一直很少。全省历年的经济建设费除1937年占总支出11.5%之外，各年只占6%~7%之间，1935年只有4.6%。② 而各年军事建设费则占总支出多达40%以上，③ 还不包括公安费在内。由于经济建设投入太少，资金不足，包括农林业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有大的起色。新桂系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黄旭初在总结广西建设时说：“广西过去之建设程序，因环境需要，注重民团之组训，以为一切建设之推动力，故对于军事建设，成就较多，经济建设则居其次。”④

商业和对外贸易

由于广西工农业落后，30年代全省商业还很不发达。主要的商业区有南宁、梧州、柳州、桂林、龙州、百色、玉林等处。梧州地处桂粤咽道，出入口贸易几乎都以此为纽带，成为商业中心。南宁是全省政治中心，商业繁荣仅次于梧州。桂林为通湘要道，柳州扼全省中部，龙州、百色为左右江重镇，

---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194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② 《广西地方经济建设费各年度支出比较》，5页，桂林，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③ 《桂政纪实》，第五编，93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④ 黄旭初：《抗战以来的广西》，87页，桂林，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1943。

玉林为南部交通中心，这是省内重要都市，为商业荟萃之所在。此外，八步、平乐、贵县、桂平在商业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主要商业区，不仅还没有大百货公司，而且营业尚未严密分工。商店营业种类，以杂货行为最多。据1936年出版的《广西一览》的统计，梧州1393家商店中洋杂126家，南宁979家中杂货160家、洋杂109家，桂林906家中杂货169家、洋杂76家，柳州622家中杂货147家、洋杂52家。其他城市也都是这样。除洋杂业外，主要的商行是谷米行、平码行、苏杭匹头行、花纱行、牲口行和纸业行等，规模小，组织简单，大都是旧式商店。商店还多兼营制造业，如卷烟、皮箱、藤竹木器、缸瓦、织席、爆竹、梳篦、扇子、牛皮等。

广大乡村农民主要以圩市为贸易市场，全省圩市有1000余处。[①] 各地圩市的聚集日期，根据当地的习惯和便利而异，有三日一圩、五日一圩、六日一圩等，其中以三日一圩为最多。赶圩人数，少者一二十人，多者数千甚至上万人。贸易大宗货物主要有谷米、油类、牲畜、山货、糖、牛皮、棉纱、匹头、食盐、煤油、洋杂、药材等。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人民购买力降低，各地圩市贸易情形“不脱日中为市的市廛状态”。[②]

“特货”（鸦片）在商业上占特殊的地位，这是全省商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广西不种鸦片烟，也不是鸦片烟重要消费市场，“仅为一通过市场性质”，即云、贵两省出产鸦片烟，经由广西出口。每年过桂鸦片烟约2000万～3000万两，以1931年为最多，约3700万两。这些鸦片烟在省内行销约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运销粤港约十分之八至十分之九。[③] 大量鸦片烟过境对广西市场影响巨大，省内城镇尤其是沿江都市“特货行”林立，这些“特货行”自行买卖或介绍货主与烟商作鸦片交易。在省内交易后转运省外的“特货”总额，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工商业”，45页，广西印刷厂，1936。

②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61页，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③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1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价2000万元左右[①]。不少商行、银号也兼营“特货”，梧州、南宁的金融机关都以“特货行”为营业主要对象，其存放款项大半为“特货业”所独占，“特货业之兴衰，足以决定全省商业之荣枯”。[②]

广西对外贸易，自民国以来一直是入超，而且逐年增长，这是广西商业长期不景气的重要标志。据统计，1912年全省入超货值7950342元，1933年增长为19551422元，增长245.94%。[③] 对外贸易逆差如此巨大，严重困扰广西的经济建设。白崇禧惊呼：“长此下去，是不得了的。”[④] 为扭转这种局面，广西省政府一方面设法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1934年10月，与上海永安公司在梧州合办永康公司，经营对外贸易。次年12月，在梧州成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并在南宁、八步、平乐、广州和香港等地设立分处，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统制。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原计划统制全省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但由于资金不足，仅以出口为主，以统购统销形式控制桐油、茴油和钨、锑、锡、锰等矿砂的贸易。油、矿出口由梧州总处及各分处收购，集中梧州运销香港和国外，取缔私商营运。进口仅是信托业务，代省内政府机关和部分企业在香港采购物资。为提高出口货物的质量，梧州总处还附设炼矿厂和炼油厂，对各地运来的矿、油进行精选、化验和加工提炼。

广西出入口贸易处是新桂系官僚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设立加强了全省对外贸易的管理，此后几年内全省对外贸易严重入超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1937年全省出口货值为44053412元，入口货值为45109749元，出入相抵，入超1056337元。[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入超缩减也是由于农村经济

---

①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工商业”，45页，广西印刷厂，1936。

②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③ 王逊志：《广西对外贸易概况》，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45页，桂林，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④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8页，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⑤ 《广西省统计摘要》（第二号），37页，桂林，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衰落，人民购买力不断下降导致入口货物的减少。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新桂系获得了可观的外汇，增加了财政收入。新桂系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减少了入超，但由于他们将出口贸易所得收入主要用于军政开支，工农业发展仍然落后，加上金融不稳定，货币不统一，桂钞与外省货币对换贴水低折等，因而始终无法根本解决对外贸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垄断了矿、油等重要物资的出口，也就垄断了价格，实行低价收购，这对省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又起了抑制作用。

财政金融

30年代初，广西金融紊乱，百业凋敝，财政枯竭。新桂系军费浩大，同时又要进行“四大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设法增加收入成为当务之急。新桂系制定“开源节流并重，治标治本兼施”① 的方针，大力整顿财政金融。主要的措施是：调整机构，统一收支，划分国地税，整理旧税，推行会计岁计等。

1931年广西省政府成立后，设立财政厅，恢复各级税务和稽征机关，除海关自行系统外，其他如盐税局、印花烟酒局、禁烟局、统税局、饷捐局、卷烟督销局等由省政府统管。国家、地方财政分开，1931年12月成立财政部广西特派员公署，接管国家财务行政及国税征收。国税主要是盐税、烟酒税、印花税和矿税等，确定国税占41%，省税占59%。但所谓国家、地方财政分开，仅属收支数字上的划分而已，国款收支完全由新桂系控制。1933年新桂系索性将财政部广西特派员公署裁撤，国款收支并入省财政厅办理。直到1937年10月，国税才由财政部接管。

广西税收向来多由驻防军把持留拨军饷，新桂系为统一财政收支，通令除通省外的边境税局外，内地税局、关、卡一律裁撤，税务由省辖局统管。统一财政是新桂系一项重要财政改革措施，这一举措杜绝了各地税收机关中

① 黄钟岳：《近年来之广西财政》，载《建设研究》，第1卷第3期，1939。

饱，增加了省财政的收入。为使财政收支合理化，1935年广西省政府成立会计、审计两处，办理岁计、会计、审计事务，厉行预算、决算，逐步建立收支合理制度。

县地方财政也进行整顿。1933年以前各县财政收支无预算，办理无标准。1933年广西省政府通令裁撤各县财务局，在县政府内设科办理，划分省、县税捐，规定县政府管理稽征，县金库专司出纳，县财政监察委员会掌理审核，分别独立，互相监督。自此，县地方财政逐步纳入正轨。

金融方面，1932年8月成立广西银行。该行采取“官商合办”形式，银行资本额定为1000万元，51%为官股，49%为商股，分期筹集。第一期基金由省政府拨付340万元为官股。[①] 这笔官股是由省财政厅举办税契筹集来的。所谓税契，就是对房屋田地所有者的契纸进行验证，发给一张证明书，附贴于契纸上，确定其所有权，作为法律的保护，这张证明书收取1~3元的手续费。因此，这笔官股实际上大部分是从人民身上取来的。商股方面由银行招募188万余元，这笔商股大部分是从全省军政人员薪水中扣出来作为私人股款的。因此，所谓“官商合办”的广西银行，实际上是完全由新桂系控制的金融机构。广西银行设总管理处，由省财政厅长等7人组成董事会，财政厅长兼主席。在南宁、柳州、香港等地设分行，桂林、龙州、玉林等地分设汇兑所、办事处等20余处。该行成立的目的是代理省政府募集和经理债款，经营的业务是存款、放款、汇兑、投资等，1937年11月以前带有国家银行性质，负有调节省内通货的责任，享有发行钞票特权。1932~1937年共发行桂币6336万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整理桂钞办法，以桂钞2元折合法币1元的比价，收回桂钞换发法币。至此，广西银行停止发行钞票权。

广西银行成立后，新桂系企图以该行发行的兑换券、嘉禾银毫为市场主要流通手段，以统一货币市场。但省金库又发行国币券，允许各县金库发行铜圆券，银号有5万元以上资本者可发行凭券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银

① 《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报告书》，634页，广西省政府，1933。

元，如龙洋、中山洋、袁头洋、港洋和外国货币法光等在市场流通。因此，广西货币市场一直处于混乱的局面。银元和外币直到1949年广西解放才退出流通市场。

1937年1月，广西省政府在桂林成立广西农民银行。该行成立的目的是“调节农村金融，解除农民痛苦”，办理农村放款。[①] 30年代初广西开展经济建设以来，农村经济有了一些发展，农村中借贷关系也发展起来，高利贷很活跃，新桂系一些官员认为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放农业贷款有利可图，而当时广西银行每年发放的农业贷款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向省政府建议成立广西农民银行，建议得到批准。广西农民银行资本初定毫币300万元，由省库拨半数开始营业。总行设在桂林，省内各重要城镇设办事处。经营的主要业务是放款与投资，包括信用放款、不动产和动产的抵押放款、青苗放款、农产品及运销的投资、农村生产放款等10余项，还办理农仓业务。但办理贷款不对个体农民贷款，只对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即农民借款协会贷款。放款利息月息1分，后增加到1分3厘。广西农民银行从1937年成立到1940年5月结束，历时3年半时间，对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值钱的东西作抵押，借款协会又多为地主豪绅把持，能得到农贷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农民是贷不到款的。

除广西银行和广西农民银行外，30年代前期广西省内金融流通多依赖银号（亦称“钱庄”）、典当业等旧式金融机构。银号以梧州、南宁为最发达，典当业则遍及全省小城镇和乡村。

广西的财政收入，主要靠重赋税和征收“禁烟”税、花捐、赌捐等。因此，新桂系在调整财政金融机构的同时，对各种赋税进行整理。所谓整理，主要是归并繁杂税捐种类，力求“简单划一”，减少征收繁琐过程，实行直接征收，取消包商制度，“以免中饱之弊”。[②] 整理赋税后，全省税捐并没有减

---

① 《正路》，新1卷第2期，广西民团干部学校，1935。

② 黄钟岳：《近年来之广西财政》，载《建设研究》，第1卷第3期，1939。

少，有国税、省税、县税，还有各种各样的附加捐等。还举办了一批新税，如民团费、保安费、教育附加费等。各县除田赋和田赋附加外，税捐仍有70余种。人民的赋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只不过是有的税捐名目改变了而已。

鸦片烟税收是新桂系的财政命脉。广西是云、贵烟土销粤、港必经道路，每年有大量烟土过境。新桂系厉行“禁烟”，设立禁烟局，但实行的是“寓禁于征”政策，即对过境烟土征收“禁烟罚金”。“禁烟罚金”是一项大收入，每年占全省财政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新桂系对“禁烟”十分重视。李宗仁对禁烟局局长陈雄说：“整理财政，首先要搞好禁烟，禁烟收入在我们全部收入的比重将近一半，搞好了禁烟，再搞其他。”① 新桂系在全省各地设立“禁烟”税局、所、卡，对入境烟土每千两征收“禁烟罚金”500元，销售广西的加征200元。还组织“禁烟缉私队”，严厉取缔私售私运。“禁烟”税除过境税外，还有烟馆捐、烟民开灯吸毒“证照费”等。据统计，1936年至1940年全省登记烟民共30万余人，② 逃避登记者不计其数。新桂系还与广东陈济棠“订约联运，互杜私销”，命广西禁烟局局长与广东禁烟局副局长、烟赌大王霍芝庭搞联营，合作购运和贩卖鸦片烟，从中获利。“禁烟”税收成为新桂系的一大财源，1934年“禁烟”收入达1375万元，占当年省地方总收入近50%。③

蒋介石知道鸦片烟税是新桂系的重要财源，1935年秋冬后蒋桂矛盾激化，蒋介石强令云贵烟土改道湘鄂外运，不再经过广西，以扼杀新桂系的经济命脉。新桂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派兵化装成土匪潜入湘黔边界抢劫烟商，企图迫使烟商畏避土匪改途运烟入桂，但此计因湘黔两省武装护送而失败。云贵烟土改道使广西烟税收入大大减少，与1934年同期相比，1935年的收入不

---

① 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67页。

② 《广西年鉴》（第三回），1287～1293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③ 《广西年鉴》（第三回），923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到二分之一，1936年不到三分之一，致使“府库枯竭，军政各费全无着落”。[①] 新桂系最后被迫同蒋言和，经过疏通，云贵烟土重新运桂。

从30年代初开始，新桂系整顿财政金融，建立了自己的财政金融体系，强化了财政金融机构的职能，加强了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财政收入逐年“渐呈起色”。仅“省地方普通岁入”方面，1932年度只有1727.7万元，1935年度增长为2848.3958万元。[②] 然而，在30年代新桂系统治下的广西，财政金融仍然很不稳定，困难重重。新桂系虽然法定以银毫为本位，但由于20年代以来省政动荡，银行几番倒闭，券成废纸，人民深受切肤之痛，因而“对于币制仍常处于怀疑而恐惧的心境中”，银毫、钞票在人民中毫无信用。一般人尤其是乡村农民所用的货币单位是铜元，而不是银毫，“他们宁愿挑着很沉重的铜元来往，却不愿携带纸币甚至银毫”。[③] 桂钞与外省对换大都贴水低折，而且不能通行外省，而外省货币如东毫(广东造币)却可通行广西。货币本位不统一与货币贬值,对全省经济影响甚大,是造成对外贸易入超的一个原因。

新桂系厉行整军经武，扩张军备，军费开支浩大，造成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赤字巨大。全省财政收支划分为两部分，即代理国家收支和省地方收支。省地方收支方面，抗战前几年间大部分年份收支尚维持平衡。但代理国家收支方面（军费列入这方面支出）年年支大于收，1932年收入1407.4万元，支出1467.4万元；1933年收入1052.9万元，支出1234.9万元；1934年收入203.4万元，支出1421万元；1935年收入401.3万元，支出1980.5万元；1936年收入1096.2万元，支出3738.6万元。支出数以军费占首位，1932年为1312.3万元，1933年1092.2万元，1934年1358万元，1935年1931.4万元，1936年3682.3万元。[④] 财政出现巨大赤字，新桂系就通过向银行透支和滥发纸币来弥补，于

---

① 陈雄:《新桂系统治下我所主办的广西“禁烟”》,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73页。

② 《广西财政纪要新编》，55页，广西省政府财政厅，1938。

③ 《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61页，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④ 《广西年鉴》（第三回），920页。

是造成通货膨胀。

尤其要指出的是，新桂系为维持其财政开支，不顾人民的生命，在“禁烟”名目下大搞鸦片经营，为害巨大。当时就连称赞“四大建设”的人士也指出，广西“财政尚须仰给于烟赌，谈话所、银牌馆，到处皆是，这是广西绝大的缺点”！①

五、文化建设

30年代初新桂系推行“新政”后，需要大量的各方面建设人才，因此比较重视文化教育，认为文化教育是“完成广西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新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② 先后聘请民主人士、进步教育家李任仁、雷沛鸿任省教育厅厅长，主持全省文化教育工作，延揽专家学者研究和设计文化教育发展规划。1931年后，广西省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文化教育法令法规，对全省文化教育进行整顿。例如，1931年8月公布《广西省教育施政纲领》。1933年5月，全省行政会议通过《改进全省教育方案》。这个方案制定了全省教育行政、国民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苗瑶教育等的实施纲要及进行程序。这个时期全省文化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一般占当年总支出15%左右。因此，30年代广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初等教育

20年代中后期，广西的初等教育有了一些发展。1929年夏蒋桂战争爆

① 毅庵：《全国瞩目的新广西》，载上海《新社会半月刊》，第6卷第8号。
② 《新广西》，25页，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发，广西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学校被迫停课或停办。后来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李任仁说：那场“令人恐怖的战争”发生后，“广西便无日不在战神的铁蹄下挣扎，社会秩序已失宁，民众在飞机枪炮之下战栗，实在可以说生命财产尚不能自保的时候，那里还谈得到教育！”① 1931年夏，新桂系重新统一广西后，恢复教育，首先是整理初等教育。同年5月，广西政治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广西省推行义务教育计划概要》，提出义务教育的计划和实施办法。8月，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省教育施政纲领》中对初等教育规定，“初等教育以普及为主，设施务从简易适用，尤应注重乡村教育”。② 省教育厅派员视察各县，督促检查各县办理义务教育的情况。省政府还鼓励私人办学，制定措施，对以各种形式资助办学者给予奖励。

由于新桂系采取一系列措施办理初等教育，30年代初，全省小学逐步发展起来。1930年，全省小学10702所，学生442278人，教职员22630人。到1933年，全省小学发展到14839所，学生658182人，教职员26286人。但各县因经费困难，还有许多行政村（街）未开办小学。据1933年的统计，全省99个县共25494个行政村（街），只有12640个村（街）办有小学，占49.6%。③办有小学的村（街），学龄儿童入学率还很低，30年代初学龄儿童入学率最高的桂林县也只有38%。1933年全省小学生仅占全省总人口的5.12%。④

初等教育发展缓慢，与广西地方建设不相适应。有鉴于此，1933年第三次出任省教育厅厅长的雷沛鸿提出“教育大众化之施政方针”，改造传统的初等教育，倡议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雷沛鸿（1888～1967），字宾南，乳名寿增，笔名鲁儒。广西南宁府宣化县东门乡津头村（今南宁市津头村）人。14岁参加岁考，获府学第一。1905年考入两广高等工业学堂。1907年在香港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历任广西左江师范监督，南宁中学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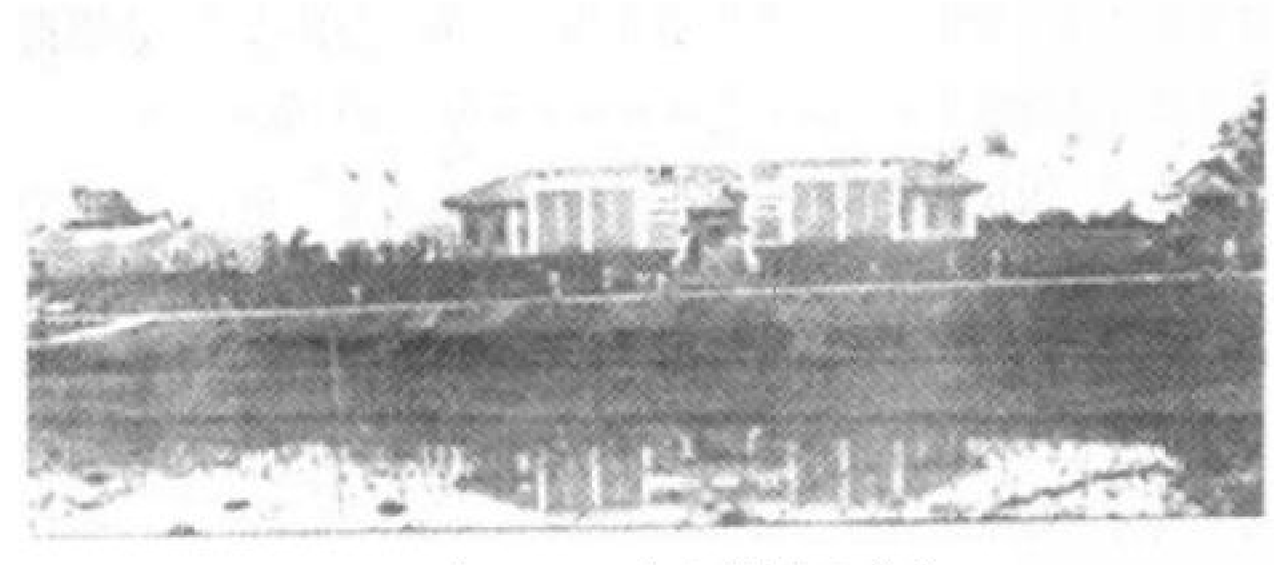
① 《教育论坛》，第2卷第3、4期合刊，南宁，广西省教育厅，1932。
② 《广西通志·教育志》，13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广西教育旬刊》，第1卷第6～8期，南宁，广西省教育厅，1934。
④ 《广西通志·教育志》，133页。

1913年考取公费生赴英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赴美半工半读，先后就学于密西根大学、欧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专攻政治、经济、教育和法律，曾获欧柏林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投身于改造教育、改造社会的事业，五度执掌广西教育行政，一度执掌广西大学，五次出国考察，并先后执教于暨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大厦大学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国民基础教育的倡议者雷沛鸿

他在为桑梓服务的过程中，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创制国民中学，创办西江学院，为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广西省情、中国化、大众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或民族教育体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雷沛鸿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教育革新家。

1933年9月，广西省政府根据雷沛鸿的建议，颁布《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次年修订为六年计划大纲）等法案，在全省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同年12月，在南宁成立以雷沛鸿为院长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作为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指导和实验总机关。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

国民基础教育是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并办理的新的初等教育制度。其宗旨是：“以扫除文盲，扫除政治盲，以至经济盲，助成各项建设为

职志。”① 广西省政府用行政的力量直接推行国民基础教育，规定每村（街）设立一所国民基础学校，每乡（镇）设立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由乡（镇）村（街）长兼任校长。所有适龄男女儿童和16岁以上45岁以下的失学男女成人，一律强迫入学。

国民基础学校分初级班、高级班、短期班和成人班。学制：初级班4年，高级班2年，短期班1~2年，成人班6个月。课程设置，对全国统一学制的小学科目进行精简和合并，增加地方乡土内容，由省教育厅编订教材。初级班设国语、算术、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及卫生常识）、唱游（包括音乐、体育）、工作（包括美术、劳作）、集团活动（包括早会、升旗、降旗、纪念周等）。高级班设国语、算术、自然、社会、音乐、体育、美术、劳作、集团活动等。短期班设国语、算术、音乐、劳作、集团活动等。教材均为省教育厅编印的《国民基础读本》。成人班设国语、算术、音乐三大科目。国语包括社会、自然、公民、卫生常识，每周另有集团活动。教材亦是省教育厅编印的《民众基础读本》，后改为《国民基础读本》成人班课本。教学方法，儿童班和成人班分别施教，成人班又分男女班授课，设成人班教师和班主任。成人班教学利用农闲、工余和晚间上课，以不妨碍生产、工作、生活为原则。儿童班和成人班均实行“教学做合一”、“互教共学”和“小先生制”。强调边教边学边做，教师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把教、学、做紧密结合起来。办学经费，政府拨款补助，主要由地方多渠道筹集，如举办公共造产、志愿捐助、村户派捐以及发动群众和小学师生造林种植果树等，实行群众办学。

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基础教育是采取“特种部族教育”的办法。1932年4月，广西省政府规定，凡苗、瑶族乡村，均设立特种学校。1933年公布《广西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对特种教育的设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具体规定。1934年成立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1935年在南宁开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培养少数民族师资。新桂系对少数民族实行“特种教育”，是

① 雷沛鸿：《六年来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9页，民团周刊社，1939。

由于他们认为少数民族“顽愚不化”，必须用特别的教育方式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化，这是民族歧视政策。但“特种教育”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

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是30年代新桂系为适应“四大建设”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这场教育运动的主持人雷沛鸿，利用当时广西的社会环境和新桂系的支持，延揽一批国内进步教育工作者参与设计和试验，借鉴国内外的教育经验，结合广西实际情况，大胆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动员各方面力量协力办学，使它成为规模宏大的有地方特色有创新精神和群众办学的教育普及运动。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开展后，几年间广西的初等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1933年度，全省村街国民基础学校13736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1101所，入学儿童658182人、成人47671人。到1938年度，全省村街国民基础学校发展到19699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发展到2301所，入学儿童1638046人、成人1337604人。[①] 不少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校是在这个时期创办起来的。虽然有许多学校因陋就简，是利用庙宇或借用民房等建立起来的，师资、设备不足，教学质量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开展“无地不学，无人不学”的普及教育，全省形成兴办教育的风尚，是广西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等教育

30年代初，新桂系当局对全省中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和体制进行初步的调整和改组。1934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方案》。这个方案提出广西中等教育的“使命”是：1．“为国民基础教育之继续教育”；2．“为青年之生活教育”；3．“为技术教育”；4．“为集团活动之训练”；5．“衔接高等教育而为研究高深学术之准备”。[②] 总之，中等教育要根据广西的实

---

① 雷沛鸿：《六年来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18～19页，民团周刊社，1939。

② 《广西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方案并说明书》，载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下册，299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际，适合省内各项建设的要求。方案对普通中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提出改造的原则和办法。30年代广西的中等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案办理的。

普通中学方面，1931年8月省政府颁布的《广西省教育今后施政纲领》规定，初级中学视地方需要及国民经济状况为添设标准，高级中学以改进充实为主，不急于增加数量。根据这个规定，中学设置以省立为原则，县立中学逐步合并和改组，私立中学加强管理和整顿。高级中学，在南宁、玉林、桂林、梧州分设省立第一高级中学、省立第二高级中学、省立第三高级中学、省立第四高级中学。初级中学仍分省立、县立、私立三种。省立初级中学，按全省12个民团区每区设一所。第一初中设于南宁，第二初中设于梧州，第三初中设于桂林，第四初中设于柳州，第五初中设于百色，第六初中设于崇善，第七初中设于龙州，第八初中设于桂平，第九初中设于武鸣，第十初中设于平乐，第十一初中设于宜山，第十二初中设于宾阳。此外，在梧州、桂林、南宁、柳州分设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省立第三女子中学、省立第四女子中学。柳州省立第四女子中学因招生不足，于1933年停办。县立初中共有苍梧县等37所。私立中学，30年代初有一些发展，经省教育厅批准立案的有：玉林的晴川初中、紫泉初中和育才初中，博白的民光初中，桂平的正心初中，贵县的树人初中和怀城初中，容县的都峤初中和珊萃初中，桂林的三民初中等。1934年后，新桂系当局对全省中学进一步改组整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改为省立南宁高级中学，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改为省立桂林高级中学，省立第二、第四高级中学合并拨归广西大学办理，称广西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凡省立初中所在地的县立初中分别并人省立初中，以当地地名为校名。有些县立初中因经费困难在此之前已停办。省立女子中学均只办初中。私立中学在全省实行中学会考后，因招生不足，经费困难，纷纷停办，能继续开办的寥寥无几。1936年全省中学共49所，305个班，学生12854人，教职员1203人。

新桂系当局为使中学教育适应其“四大建设”的需要，还在学校管理体

制、教育内容、教师资格、学生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各校在校长之下先后设训育主任、级主任、政治教育指导员等，负责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31年高中开始军训，1933年初中也实行军训，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过去中学教师由校长聘任，1933年改由政府任免，省政府举办中学教员资格审查，所有中学教员由省政府委任。此项措施使中学教师不因校长去留而变动，安心教学。1934年以前，中学招生由各校自行办理。从1934年起，中学招生一律由省政府派员分区举行会考，统一新生录取标准。教育内容上，除文化基础课外，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建设纲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使中学生“切实信奉三民主义，在革命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领导之下，努力于建国工作”。①

随着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1936年2月广西省政府根据教育厅长雷沛鸿的倡议，颁布《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创办国民中学。是年先后设立邕宁、苍梧、桂平、桂林4所县立国民中学。后来逐年增设，1937年发展到32所。这样，广西的中学形成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国民中学四种类型。国民中学是为继续国民基础教育，培养地方建设人才而创办的新的中学教育制度。国民中学以县立为原则，或数县联办。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与传统普通中学不同。学制为4年，分前、后期各2年，前期结业后需有一年以上的社会实践才能升入后期。课程设置以“四大建设”为依据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四大类。教学方法，强调学问与劳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互教共学，参加地方建设事业，学习“作人做事及治学”。②

雷沛鸿倡办国民中学，目的是改革传统的中学教育制度，探索培养地方建设人才的新途径。他原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① 《广西省中等教育述要》，3页，桂林，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9。

② 《广西省国民中学课程教材及训导》，4页，广西省教育厅，1941。

但新桂系当局急需建设人才，修改办学宗旨，如取消四年一贯制，前后期均可毕业，大规模发展国民中学，企图取代普通中学，取消师范学校。因此，国民中学大都设备简陋，师资缺乏，许多科目教材借用初中课本，教学质量与普通中学有明显的差距。尤其是学生不便升学，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和责难，学生也不愿报考。所以，国民中学创办后困难重重，由于政府当局坚持办理才得以维持。[①] 尽管这样，国民中学的创办对广西中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县有中学是从创办国民中学开始的。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29年新桂系当局对全省师范教育进行改组，将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分别并入梧州、桂林、南宁高级中学，设男女兼收的高中师范科。梧州、桂林、南宁、柳州4所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女子中学。30年代初，新桂系当局又提出师范学校独立设置，尽量培养乡村师资。但这个计划未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办成一所省立师范学校。1932年全省仅有北流、邕宁、奉仪、凌云县4所县立师范学校。1933年9月，在教育厅厅长雷沛鸿的倡议下，省政府公布《广西省国民基础师范学校办理规程》，划全省为8个国民基础教育师范区，每区设立一所国民基础师范学校，培养国民基础教育师资。但当局有人又主张，师范学校不应单独设置，培养小学师资的任务可以由民团干部学校办理，以体现“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精神。这样，又取消了设置师范学校的计划，只办了龙州国民基础师范学校一所，但该校不久又停办。1936年后县立师范学校又奉令改办国民中学。全省师范学校只有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和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县立简易师范12所以及一些县办的短期师范班。1933年后全省开展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急需小学师资，但师范教育却不断削弱，造成30年代前期全省师资严重缺乏。国民基础学校开办后以民团干校毕业生担任教师，因民团干校不是训练师资专门机构，训练时间也仅半年左右，其毕业生多数不合格，教

① 1946年2月广西省政府决定除保留邕宁、宾阳、靖西三所国民中学继续试验之外，各县国民中学改办初中或师范学校。

学质量较低。

中等职业教育方面，30年代初新桂系当局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制定职业教育计划。1931年8月颁布的《广西省教育今后施政纲领》中，提出“职业教育注重农业及改进本省原有工业”的方针，将女子中学改为女子职业学校。在1932年度施政纲领中，拟订职业教育实施方案：筹办省立高级职业学校，规定设置初级职业学校的地点和办法，指导原有或新设的县立或私立中学改办职业学校，筹设职业补习学校和简易职业学校等。1933年省政府公布《改进全省教育方案》，更具体地提出发展职业教育的计划。但由于广西的农工商业不发达，就业不容易，职业教育“设计较多，执行较少”，[①] 只有南宁、梧州、桂林等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富川、贺县、钟山、信都四县成立联立高级职业学校，少数县设立初级职业学校，一些军政机关开办短期的工读学校、职业训练所等。到1936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约10所，学生近1000人。这些职校不仅规模小，设备简陋，而且在招生、学制、教学等方面都很不正规，成效甚少。

高等教育

1929年广西大学因战乱停办后，广西高等教育中断。30年代初广西重新统一后，新桂系当局恢复高等教育，并确定“先从设置专科人手，授以应用科学养成专门人才”[②] 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恢复广西大学，创办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省立医学院；同时采取措施资助在省外各大学学习的广西籍学生，派送人员出国留学，培养省内建设急需各种高级人才。

1931年5月，粤军退出梧州，省政复归统一。广西政务委员会议决恢复广西大学，电请马君武、盘珠祁返桂主持校政。7月，省政府颁布《广西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西大“以适于实用之科学为基础，以养成三民主义国家之

---

① 《广西年鉴》（第二回），911页，南宁，广西统计局，1935。
② 《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报告书》，638页，广西省政府，1933。

建设人才为宗旨”。9月，西大复课，并成立理学院，招收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次年9月，成立工学院、农学院。理学院设数理系和化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系，农学院设农学系和林学系。1933年9月，工学院增设机械工程系。1934年2月，数理系分为数学系、物理系。同年8月，工学院增设采矿专修科。1935年8月，采矿专修科改为采矿冶金工程系。

马君武重返西大后，为办好西大，培养广西建设人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在西大复课开学大会上说：我今年已50多岁了，其他一切都不管，也不想过问，把西大办好就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想使西大稳定发展，西大根基何日稳定，我即何日告退。[①] 马君武继续广招人才，从省外聘请名流学者任教授，如马名海、林柄光、叶道渊、苏鉴轩、曾锐庭、张谦、谢原藩等。他认为没有充足完备的图书仪器设备是办不好理工大学的，因此不惜重金购买图书仪器。1931～1932年，他花了40万毫洋购买理化仪器。1934年他去欧洲考察时，高价从德国买回60多个很贵重的大小不等的白金坩埚和一个电解槽。这样的仪器，在当时国内大学是绝无仅有的。他派人到上海、北平、广州大量购买各种图书，花了6000多元买回康有为的遗书。马君武十分关心和爱护学生，经常到学生宿舍巡视，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他在校内筹集“苦学基金”，用学校在银行存款所得的利息和教职员捐款接济成绩优秀的贫苦学生。他教导学生努力学好功课，参加生产劳动，关心国家前途。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提出西大“三项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知识”、“工作的技术”、“战斗的本领”，“以达到救国的大目的”。他号召“西大学生一致团结起来，拿书本、拿锄头、拿枪炮去救国”。[②] 30年代前期的广西大学，在马君武的领导下，教授安心教学，学生用功读书，刻苦耐劳，艰苦朴素，校誉日隆。

---

① 钟杰生：《设立在梧州时的广西大学》，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2期，180页。

② 石胜轩：《马君武与广西大学》，载《广西教育史志》，1987年（1），99页。

1936年6月，广西省政府根据《高等教育整理案》，改组广西大学，由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改聘马君武为省政府高级顾问；废除副校长制，改设秘书长；设立校本部，统辖各学院；将理学院、工学院合并为理工学院。8月，将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广西大学，设文法学院；省立医学院改为广西大学医学院。校本部、文法学院和医学院设在南宁，理工学院和农学院仍设在梧州。10月，校本部和文法学院随省政府迁往桂林。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一角

1932年3月，广西省政府决定筹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在桂林雁山西林公园。省政府创办师专的宗旨是“为培养师资，促进乡村教育”。[①] 同年7月，招收第一届学生，两班80多人。8月，师专开学上课。10月12日，师专隆重补行成立典礼。经教育厅厅长李任仁的推荐，省政府聘请杨东莼为师专校长。杨东莼（1900～1980），湖南醴陵人。教育家、历史学家。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东莼任师专校长


杨东莼校长

① 《教育论坛》，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

后，利用新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和新桂系提出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实行民主、进步的办学方向，确定师专的宗旨是：建设广西、培养乡村教师和革命人才。他提出两个口号：一个是学习上提倡“自由研究”，允许对各种主义、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另一个是生活上主张“集体生活”，克服自由散漫，培养集体主义精神。[①] 为贯彻进步办学方针，他延聘一批进步学者到校任教和工作，如朱笃一（原名朱克靖）、薛暮桥、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杨潮、夏征农、张海、金奎光、朱少希、崔真吾、官亦民等。

师专创建时不分科，1934年起分史地、文学两组（科）。学制初为2年，后改为3年，招收公立或立案的私立高中毕业生或在教育界服务两年以上具有同等学历者，并须是18~30岁的广西籍男女青年。课程设置，除开设师范专业课外，还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发展史、世界形势、农村经济等课程。在杨东莼校长的倡导下，师专教师启发和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变革，了解国内外革命形势和前途，树立革命人生观。学校办有农场，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假期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接触社会。杨东莼任校长期间，师专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所民主、进步的高等师范学校。但杨东莼的进步办学思想终于为新桂系所不容，1934年5月，杨东莼被迫辞去师专校长职务。一批进步教师也被迫离开师专。1936年8月，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改为文法学院。

1934年7月，广西省政府为培养医学人才，办理省内卫生事业，决定创办广西省立医学院，聘请戈绍龙博士任院长，张鎔、李恒蔚、孟宪荩等协助筹备。院址设在南宁凌铁村，后迁往民权路省府旧址。同年10月举行入学考试，录取本科生30名，助产班学员28名，护士班学员19名。11月20日，学院正式开学。学制：本科6年，专修科4年，助产班3年，护士班2年。1936年8月，省立医学院奉省令改隶广西大学，更名为广西大学医学院。

---

① 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77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0年代初以来，新桂系当局为培养"四大建设"人才，比较重视高等教育。由于广西缺乏高等教育人才，新桂系当局从省外聘请大批学者、专家来广西任教和工作，其中有不少是进步教师。这些进步教师为广西培养了各方面建设人才，同时也传播了革命思想，推动了广西革命运动的发展。

新桂系当局在办理省内高等教育的同时，还利用省外高等学校为广西培养建设人才。早在20年代中期，省教育厅就与北京师范大学签订协议，由该校开办广西特别班，广西每年选送30名学生到校学习，5年为期，广西省政府给该校拨给一定的办学经费，此项办法30年代初继续实行。1931年度北京师范大学广西特别班有56人，广西省政府每人每月津贴国币8元。在其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的广西籍学生，广西省政府也给予津贴，从1931年度起改为奖学金。1931年11月，省政府公布《广西留学省外学生奖学金暂行规程》，1933年12月修正重新公布。规程规定，凡经教育部核准立案的省外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及国立专科学校的广西籍学生，每人每年奖学金为国币100元，暂定名额400人。给予奖学金的条件是：(1) 本科一年级以上者；(2) 学年考试成绩在各该校及格标准分以上者；(3) 序奖次第就各该校额先国立次省立私立，依年级之高低，年级相同者以成绩定之，成绩相同者以抽签法决定；(4) 凡领有官费及省款津贴的学生，不再给奖学金。规程还规定，"有反革命言论行动者"和"行为不检者"，不给奖学金。这一规定意在限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度广西留学省外各大学的学生共有295名获得奖学金。① 此项措施对鼓励留学省外各大学的广西籍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学成回省服务起了积极作用。

30年代初，新桂系当局还根据省内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28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省费留学国外学生暂行规程》。1934年6月，又公布《广西省公费留学国外学生暂行章程》。1936年2月，公布《广西最近五年度考送留学国外分科研究实习公费办法》。以上章程、办法规定，

① 《教育论坛》，第2卷第3、4期合刊，广西省教育厅，1932。

省公费生选派“以适应本省各种建设特殊需要为目的，其应习学科以农工矿理医等科为原则”。公费生留学一般以4年为限，如本省有实际需要及所习学科需要，得减少2年或延长2年。选派省费生每年举行一次选拔考试，由省政府组织考选委员会办理。“有反革命言论或行动者”不得参加留学考试。省费留学生留学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省费：(1) 继续留级2年者；(2) 本学年所选学分有二分之一不及格者；(3)“有反革命之言论及行动者”。省费生毕业回国后，应向省教育厅报到，呈验毕业证书及学习成绩，并需为本省服务3年以上，否则追缴学费。

30年代广西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选派公费留学生在经费、生源上都比较困难，每年选派的人数很有限。据统计，1933年为3人，1934年4人，1935年7人，1936年9人，以留学美、英为多。① 30年代以来也有一部分自费出国留学，但许多自费留学学生因学费难继，相继休学回国。省政府决定资助自费留学生，凡在国外著名大学及专门学校修业满一年以上者，择优叙补为省费生。1931年度省政府核准叙补省费生，留法5人，留德3人，留美1人，留比（比利时）1人，留日3人，共13人。② 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广西留日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回国。省政府制定《广西省费留日学生转学欧美各国暂行办法》，留日学生可以申请转学欧美各国，如能考入欧美著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得按省费留学规程申请补助费，但后来转学欧美的留日学生极少。

社会教育

30年代初以来，新桂系当局为使其“新政”得到顺利的推行，在办理普通教育的同时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使30年代广西的社会教育有所发展。

1931年7月，广西军政会议通过《厉行推广民众教育办法大纲》，提出各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1183页，桂林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② 《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报告书》，638页，广西省政府，1933。

级学校、机关和社会文化团体兼办民众补习教育，附设民众学校、民众夜校和其他补习学校。凡16～40岁的失学青年及成人，须入民众学校或民众夜校，接受识字教育和公民训练。省、县教育经费要划出10%～20%作为民众教育经费。省教育厅设民众教育股，各县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负责民众教育工作。自此，各县先后建立民众学校和民众夜校。1931年度全省设立民众学校679所，1934年度民众学校发展到714所。还有民众阅报处1448处，民众问字代笔处1380处，通俗教育讲演所39所。[①] 民众学校按教育部颁《民众学校办学大纲》办理，多数附设于中小学校里，男女兼收，不收学费，修业期限4～6个月，教员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兼任，教材采用部颁《三民主义千字课本》，利用晚间上课。

新桂系当局还利用民团集训的时间兼施补习教育。1932年10月，广西省政府颁布《民团后备队补习教育办法》，规定全省民团后备队训练期间，除小学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者外，一律兼施识字教育。识字教育由县政府会同县民团司令部办理，以6个月为一期。各民团后备队配备一名教员，由县政府派区教育委员兼任，或选当地具有小学教员资格者充任。教材由省教育厅编印《民众基础读本》和补充读物若干种，队员领用课本不收费。识字教育采取一边训练、一边上课的方法，即将各队队员分为甲、乙两组，甲组训练时乙组上课，乙组训练时甲组上课。

1933年3月，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作为全省社会教育中心机关。馆内设生计、展览、教学、康乐、研究等部。省立民众教育馆成立后，开办民众补习学校，组织文娱、体育等各种比赛活动。各县也奉令筹建县立民众教育馆，全省先后成立56所县立民众教育馆。但县立民众教育馆大多数设备简陋，经费困难，难以开展正常活动，不少是有名无实，徒具虚名。

---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35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1935。

1934年以后，国民基础教育逐步开展起来。国民基础教育实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合并，各种民众学校、民众夜校、民团后备队兼施补习教育和民众教育馆等先后停办，社会教育并入各级国民基础学校办理。

30年代初以来，新桂系当局重视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宣传“三自三寓政策”，加强“公民训练”，贯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方针。但这些活动在当时对普及教育起过积极的作用，为后来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开展做了准备。

新闻出版

新桂系在20年代后期创办的报纸，如《南宁民国日报》、《梧州民国日报》、《桂林民国日报》、《柳州民国日报》、《玉林民国日报》、《百色民国日报》和《龙州民国日报》等，在30年代初仍然继续出版发行。1931年，梧州地方人士黄剑父创办梧州《大公报》。1934年，新桂系为集中财力举办民团，大量缩减新闻经费，除《南宁民国日报》外，各地民国日报停办。各地民国日报停办后，一些地方人士集资先后创办了一批报纸，如《梧州日报》、《桂林日报》、《柳州日报》、《田南日报》、《镇南日报》等。后来新桂系当局通过补贴经费，逐步控制了其中一部分报纸，如《梧州日报》、《桂林日报》又成为新桂系官办报纸。另外，各民团区先后创办了一些周报，如庆远区民团指挥部办的《民众周报》、平乐区民团指挥部办的《平民周报》、桂林区民团指挥部办的《湘漓周报》等。这些报纸除《梧州日报》和《桂林日报》规模稍大外，其余各报规模都很小，每日或每期发行仅千余份，甚至只有数百份的。[①]

《南宁民国日报》是新桂系的喉舌，省会迁往桂林前是广西规模最大的报纸。该报自设电台，收取国内外新闻，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驻有特派记者，省内各县有通讯员。1936年春创办民众通讯社。该报坚持反蒋反共立场，刊登大量反蒋反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报道。华北事变后，抨击蒋介石“攘外必

① 《广西新闻事业概况》，载《桂林日报》，1937年2月15～16日。

先安内”政策，发表抗日言论，为海内外所瞩目。报纸发行量由8000份增至1万余份，远销粤、港、沪和南洋等地。1936年10月，省会迁桂林，南宁民国日报社大部分职员随军政机关迁桂，一部分留邕，继续办理《南宁民国日报》。

1937年4月1日，新桂系将迁桂的南宁民国日报社与桂林日报社合并，创办《广西日报》。《广西日报》为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机关报，继续奉行《南宁民国日报》的宗旨，经常就国内形势发表社论和时评，反映新桂系的立场和态度。每日出对开四版，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并重，占两版。副刊《桂林》为短篇文艺刊物。还有《现代学生》、《儿童作品刊》、《农村经济周刊》、《社会周刊》、《国际周刊》、《戏剧周刊》等定期栏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一份拥有较多读者的报纸。

期刊方面，30年代前期以省会南宁出版最多。主要有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办的《南方杂志》（月刊）和《南方青年》（月刊）；广西省政府办的《新广西》（月刊）和《时事评论》（周刊）；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办的《创进》（半月刊）和《政训旬刊》；广西民团干校办的《正路》（月刊）和《民团周刊》；广西省教育厅办的《教育论坛》（月刊）和《教育旬刊》，等等。这些期刊有的时办时停，出版不正常。还有一些政府机关、团体出版公报、月报和月刊、季刊，大、中学校出版校刊等。省会迁桂林后，《创进》、《正路》等迁桂出版，在桂林新创办了一批刊物，如《前导》（周刊）、《抗日旬刊》、《风雨》（月刊）等。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主张抗日，并借助进步势力与蒋介石抗衡，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进步人士和抗日言论的存在，因此在南宁和其他城市出版过一些宣传抗日的进步刊物。1935年，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教师杭苇、肖施培等主编发行《广西儿童》，向小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1936年春，在广西民团干校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方与严主编《新动向》（半月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日言论。同年，在广西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共党员宣侠父先后在南宁、梧州创办《联合战线》、《民族战线》等。1937年春，

广西民团干校中共地下党员刘敦安、麦世法创办《现实》（月刊）。同年夏，中共苍梧县委在梧州创办《战报》。这些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但当新桂系发现是共产党人创办的，即下令查封，编辑、出版人员遭到迫害。

1933年12月，新桂系在南宁中山公园建成南宁广播电台，1934年元旦开始试播。由于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试播后不久即停播，1936年7月1日恢复播音。省会迁桂林后，在桂林筹建桂林广播电台，但直到1938年底才建成，1939年元旦开始播音。

抗战前，广西的出版业还很落后，几乎没有一家正规的出版机构。新桂系宣传"三自三寓政策"和广西"四大建设"的政治读物，大都由民团周刊社和有关政府机关编辑出版。一部分中、小学教科书由省教育厅编辑出版，大部分的学校教科书和民间图书如古典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和其他文艺书籍等，则由私营书店发行。私营书店主要分布于梧州、南宁、柳州、桂林和一些重要县城。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梧州是全省书店最多的城市。1932年后，随着广西教育的发展，学校增多，梧州的几家书店向各地发展，设立大小书店。桂林有商务经理处、唐文南书局、正文书局；柳州有福记书局、兴盛书局、利群书局、生盛昌书局；南宁有强华书局、麟经阁书店、三管书店、大有祥书店；玉林有大同书店、图书公司；贵县有大中书局、商务经理处中华特约所；桂平有商务荣记书局，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大小书店共180多家。①

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筹集资金开办书刊发行机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春，凌建平、黄经柱受党组织的委托，在玉林创办新生书店（后改为群生书店），并在陆川、博白、北流等地设立分店。1935年杨铁如在香港

① 盛德萱：《广西图书行业发展基本情况》，载《广西文史资料》，第27辑，222页。

创办半岛书店，1936年该店迁到梧州更名为苍梧书店，抗战开始后又迁南宁营业。新生书店和苍梧书店开办后，发行了大批进步书刊，在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戏剧电影

1931年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广西戏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成为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重要形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广西各界群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各地学校、机关、团体排演话剧，进行抗日宣传。新桂系对抗日话剧运动给予支持，1931年10月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抗日救国艺术戏剧委员会，为话剧演出提供场所，安排演出时间，并资助演出费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和省立民众教育馆先后几次在南宁组织话剧比赛，一些县城也举行话剧比赛活动。一时之间，全省兴起抗日话剧比赛热。随着抗日话剧运动的兴起，各种业余话剧社团纷纷建立起来。1932年1月，梧州民船工会建立梧州工人剧团。同年，南宁民国日报社李曼尼组织文艺茶话会，南宁乐群社设立话剧组，宜北县成立惊梦白话剧社。1933年省工商局和统计局职员联合组建“二一”剧团。1935年，广西师专成立师专剧团，桂林社会青年成立风雨剧团。同年，梧州中共地下党成立救国话剧社，雒容县成立洛清话剧社。许多剧团不仅在城市演出，还到附近农村巡回演出。如梧州“救国话剧社”经常到苍梧、藤县、平南、岑溪、容县、贵县等地乡村演出抗日话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用戏剧和歌声宣传抗日，激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新桂系为争取民心，与蒋介石对抗，大力倡导抗日救国话剧运动，6月中旬在南宁举行抗日戏剧宣传周。人民群众出于爱国热情踊跃参加，参加演出的单位有17个之多，掀起了群众大演抗日话剧的热潮。

同年9月，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在南宁成立国防剧社（后改为国防艺术

社），聘请戏剧家万籁天为导演。这是广西第一个专业话剧团体。国防剧社成立后，首演话剧是田汉名作《回春之曲》。演出轰动了南宁，各剧团纷纷聘请万籁天执导排演话剧，使话剧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为广西话剧运动走向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在30年代前期，话剧迅速兴起，但由于新桂系当局对民间艺术不重视，甚至采取歧视和摧残政策，使大多数地方传统戏剧日趋衰落，有的濒临灭绝。

桂剧是广西有近200年历史的地方剧种，流行于桂东北，用桂林话演出，唱流行曲调，表演艺术细腻，尤其是刻画人物性格具有特独的风格。到30年代，桂剧虽也吸收了一些其他戏剧的声腔、剧目，丰富了自己，但由于内容陈旧，演技落后，观众越来越少，日益衰落，有人认为桂剧已“走向死亡”。①

彩调剧（又叫“采茶”、“调子”）是一种民间剧种，已有100多年历史，主要流行于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南宁等地。彩调曲调平易口语化，轻快、活泼、优美动听，表演艺术载歌载舞，丰富多姿，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但大革命失败后，新桂系当局以“调子伤风败俗，淫调扰乱人心”② 等罪名，强令禁演。彩调剧艺人受到残酷迫害，被迫流落边远山区活动。1936年，柳州彩调艺人在贵州边境组织“鸳鸯班”被反动当局以“窝匪”、“藏赌”等罪名强行解散后，彩调就逐渐“销声匿迹了”。③

邕剧（又叫“南宁戏”、“本地班”）是以南宁为中心，流行于西南地区的地方剧种，已有100多年历史。邕剧是吸取祁剧、桂剧、粤剧等剧种的成分逐步发展起来的，唱、白用邕州官话，表演风格显示一种雄浑、粗犷、豪迈、激昂、爽朗的情调，富于桂西南地方特色，深受壮、汉群众的欢迎。到30年

---

① 《桂林日报》，1936年9月15日。

② 张光雄：《广西彩调剧》，载《广西文史资料》27辑，89页。

③ 张光雄：《广西彩调剧》，载《广西文史资料》27辑，90页。

代初，邕剧还有发展。"小武金"班在南宁被称为"广西第一班"。① 各班在南宁昼夜轮流演出，邕剧艺人云集，空前兴盛。1932年后，邕剧观众逐步被广东粤剧班吸引去，邕剧班离开南宁，转移到圩镇山区巡回演出，这时邕剧班被称为"过山班"。②

粤剧是广东地方剧种，相传清中后期传入广西，流行于桂东南、左右江和柳州部分地区。30年代初，广东粤剧班来广西演出越来越多，来的戏班阵容整齐，剧目丰富，灯光布景现代化，并改用粤语演唱，深受观众欢迎，在南宁逐步取代了邕剧。

此外，在部分地区流行的民间戏曲还有壮剧、师公戏、文场等。壮剧，是在壮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和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少数民族戏剧。由于地域、方言、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的不同，壮剧有北路壮剧和南路壮剧之分。北路壮剧流行于田林、隆林、西林、百色和云南省富宁等地。南路壮剧流行于德保、靖西、那坡、大新一带。师公戏，是在古老的师公"跳神"和壮族民间文娱歌唱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民族戏曲，流行于河池、宜山、来宾、贵县、邕宁、武鸣等地的壮族农村。文场，是用桂柳方言演唱的一种优美动听的民间曲艺，流行于桂北、桂中和桂西讲桂柳方言的地区。这些民间戏曲，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生动朴实，为当地群众喜爱。但由于政府当局歧视，不能登大雅之堂，长期以来仅在民间流传，到30年代发展还很缓慢。

电影在20年代初传入广西，那时还是无声电影。30年代初南宁开始放映有声电影。1933年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成立电影队和巡回讲演游艺团。巡回讲演游艺团既是文艺宣传团体，又是放映电影的组织，到各地演出、放映。电影队是专门拍摄电影的团体，招考学员，培养电影工作者，这是广西最早的电影摄制团体。1935年电影队先后摄制了《七千俘虏》、《广西剿共记》等

---

①② 蒋细增：《邕剧是南宁戏》，载《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二辑，35页。

以反共为题材的纪录片。《七千俘虏》取材于红军长征过广西时，蒋介石电令新桂系派军堵截红军，新桂系为了向蒋介石报功请赏，编造了这部纪录片。所谓“七千俘虏”，只有小部分是红军过境掉队的伤病员，大部分是新桂系用钱雇老百姓临时伪装成红军俘虏的。但从电影发展史上来说，它可算是广西摄制最早的一部大型电影纪录片。1936年，新桂系创办“电化教育”，利用放映电影宣传民团制度和“四大建设”。次年，划全省为四个电影巡回放映区，电影得到进一步发展。

体育卫生

20年代后期广西体育活动曾一度比较活跃。30年代初，新桂系推行“三寓政策”，军训“替代学校体育及民众体育”，全省大、中、小学的体育课改为课外活动。① 后来，新桂系认为开展体育活动有助于军训，于是又提倡各种体育竞赛。1932年后各种体育活动逐步开展起来。

1932年5月，新桂系举办南宁第一次运动大会，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任名誉会长，比赛项目主要是田径赛。同年12月，在南宁举行第一次民众运动大会。此后，各种球类、棋类、游泳、越野赛跑等比赛陆续开展起来。1933年夏，广西体育会在南宁成立，进一步促进全省体育的发展。1934年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带领北派拳师来广西推广国术。次年12月在南宁成立广西国术馆，白崇禧兼任馆长。该馆开办国术训练班，教授北拳，各县送学员受训，6个月结业后回各县推广，广西掀起了国术运动热潮。1936年1月，在南宁举行全省第一届国术运动大会，各县参赛运动员670余人。比赛项目有太极拳、男女搏击、童子对击等，“每日前往参观者以万计，为空前之盛举”。② 一些县也举行了国术比赛。各种体育竞赛的开展，使广西体育运动水平逐步提高。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

---

① 《桂政纪实》，文化建设编，297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②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文化”，32页。

全国运动会上，广西代表队取得了游泳比赛团体总分女子第3名和男子第5名的成绩。①

这个时期，各地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舞狮是广西民间最常见的群众文娱体育活动。新桂系当局提倡舞狮竞赛，在全省发起“醒狮运动”，规定每个村庄、城镇街道、部队连队都要组织一个狮队，每年春节举行全省舞狮比赛，成绩优胜者赐以“广西狮王”称号。② 因此，每逢年节或喜庆日子，各地舞狮很盛行。舞龙和赛龙舟也是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每年元宵节城乡举行舞龙活动，每年端午节邕、柳、桂、梧和一些县城举行龙舟比赛。

1931年以前，广西的卫生事业还很落后，全省公立卫生组织仅有梧州市公立医院1所，各地一些医疗卫生机构都是私人开办的。③

1931年7月，广西省政府民政厅设卫生股，开始办理卫生行政工作。1933年4月将全省划分为梧州、南宁、桂林三大卫生区，每区设一所省立医院。1935年7月，改设八大卫生区，同年12月又改为九大卫生区，每区仍设一所省立医院。1937年再改为十一大卫生区，每区除设一所省立医院外，各设一所卫生事务所，专司卫生行政事务，卫生事务所下设巡回医疗队和检疫所。到30年代末，全省省立卫生机构有卫生事务所12所，医疗防疫队15个，省立医院11所。除划区设立卫生机关外，县、乡、镇也分别设医院、医务所。1936年度，11个县设立了县立医院，富川、贺县、钟山联合设公立医院，73个县设立了医务所，有11个县设立了乡医务所25所，3个县设立了镇医务所3所。④ 全省初步形成由卫生行政区、省立县立医院、乡镇医务所构成的卫生医疗系统。此外，还有少数的军医院、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1933

---

① 《广西通志·体育志》，23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广西通志·体育志》，42页。

③ 虞乔僧：《广西的保健事业》，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76页，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④ 《广西年鉴》（第三回），1199页，桂林，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年有军医院3所、私立医院3所、教会医院6所。

为适应卫生事业的发展，1934年广西省政府创办广西省立医学院，在南宁、梧州、桂林等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培养医务人员。同年成立广西制药厂，1937年成立广西卫生试验所，研制生产各种药品。1933年在龙州开办种痘传习所，培训防疫人员。此外，还在各级学校推行卫生保健教育，省、县成立了健康教育委员会，提倡大扫除、清洁检查和防疫、防毒运动。

总之，从30年代初开始，新桂系逐渐重视卫生保健工作，全省卫生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全省医疗机构和设施仍然很少，而且设备很简陋，除梧州、南宁、桂林3所省立医院规模稍大点外，其余省立医院每所只有几十张病床。县立医院，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械都很缺乏。乡镇医务所就更为简单，“每所仅设候诊处及中医生一人，担任诊视普通疾病而已”。[①] 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多大的改变。

图书馆、博物馆

30年代以前，广西省级图书馆只有设在桂林的广西图书馆。1931年4月，新桂系当局在南宁创办省立第二图书馆，桂林的广西图书馆改为省立第一图书馆。1934年2月，省立第二图书馆新馆在南宁中山公园落成。1936年省会从南宁迁桂林，省立第一图书馆与省政府图书馆合并，称广西省政府图书馆。1937年省立第二图书馆改为省立南宁图书馆。1940年广西省政府图书馆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

30年代以前，全省县立图书馆也很少，3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多。1931年全省县立图书馆40所，1935年增至73所。此外，还有大中学校设立76所图书馆，省政府各机关设立13所图书馆。30年代是广西图书馆业发展较快的时期。

1934年7月，新桂系当局在南宁创办广西省立博物馆，馆址设在共和路。

---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1199页，桂林，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馆内分人文、自然两部，负责搜集、整理、保管和陈列全省历史、自然文物品。到1935年，该馆搜集到文物品共22027号，27305件。其中历史文化品1589号，31865件；苗瑶文化品164号，198件；当代名人书画88号，91件；工商品3400号，4898件；各种模型115号，130件；农产品877号；动物标本3961号；植物标本9707号；地质矿物标本1144号。珍贵文物品有：刘永福“黑旗”、各型铜鼓、南宁近郊出土的汉代陶鼎、八步矿场出土的陶器时代器物、兴安出土的宋代金银器和古钱，以及省内各地历代碑碣摩崖拓片等。这些文物对研究广西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1937年5月,广西省立博物馆改名为省立南宁博物馆。1939年南宁沦陷,损失文物27000余件,一部分转移田东保存,1940年存放田东的文物运往桂林,1941年博物馆改为广西省立科学馆。

改良社会风俗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峦叠嶂，交通闭塞，地瘠民贫，省民淳质耐劳，俗尚俭朴，粗衣淡食。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风气未开，民众知识程度低，富于保守而鲜进取，地域观念、迷信鬼神、好习争斗、游惰偷安之风盛行。民间婚丧、生寿、喜庆多有陋俗。民国以来，旧桂系搜刮民财，贪婪无度，公然开放烟（鸦片）赌，致使烟、赌、娼泛滥，社会风气日趋颓废。

新桂系推行“新政”后，提倡改良风俗，革新社会，以振兴民族精神。

早在20年代后期黄绍竑主持省政时，曾开展社会风俗改革运动。1926年7月，广西省政府通令各县捣毁寺庙偶像，破除迷信，规定除孔、关、岳庙之外，所有寺庙偶像一律捣毁。1927年5月，通令全省废娼和解放奴婢，规定所有全年20万元的花捐收入概行取消，原以该项收入作经费者另由省库筹补。[①] 1928年1月，下令全省分区禁赌，规定除在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平乐、玉林、龙州、百色8个市县划定区域，准许开设番摊、宝馆两种赌场之外，其余各县及以上8市县乡间无论何种赌博，一律禁绝。蒋桂战争发生

① 《广西大事纪要》（1912～1930），42页，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后，改良风俗活动停止。

30年代初，新桂系开展“四大建设”，又兴起社会风俗改革。1931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通令各县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开展风俗改革。1933年3月，省政府改订《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具体规定凡婚嫁、丧祭、生寿、喜庆及其他一切陋俗一律取缔。新桂系还把整顿乡村习惯法作为整理乡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5月，省政府颁布《广西乡村禁约》，整顿全省乡规民约。该项禁约多达50条，列举了乡村各种陋俗及改革办法，制定了乡民必须遵守的条规及处罚措施。如禁止毁坏公共设施和他人作物财物，禁止放火烧山毁林，禁止闹事斗殴，禁止窝藏盗匪容留形迹可疑或来历不明之人，禁止聚赌、暗娼卖淫、麇集歌圩唱淫邪歌曲，禁止各种神巫邪术、施放鸡鬼火剑和雇用僧道尼巫，禁止早婚和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禁止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规劝乡民拥护“新政”、勤谨生产、崇尚节约、清洁卫生、尊长爱幼、笃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违者由乡村甲长处以罚金，直至送县政府究办。①

改良风俗运动，经过广泛的宣传和乡村长督率实施，乡村中各种陋俗减少，社会风气改观。例如桂南一带女子婚后不落夫家陋俗比较普遍，新桂系当局组织广西民团干校学员下乡宣传动员，乡村政府也采取强制性措施，许多婚后不落夫家的女子纷纷到夫家生活，改变了乡村一大陋俗。② 但是，改良风俗有的是直接或间接同新桂系的利益有矛盾，这些措施就无法实施或实施不彻底，有的则有名无实或走过场，不了了之。如禁烟、禁赌、禁娼就没有真正成效可言。

烟（鸦片）、赌、娼为社会三大害，人所共知。新桂系感到让“三害”泛滥将影响其“新政”的声誉，同时也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因此声称厉行“禁政”。但是，烟税、赌饷、花捐却是省财政一大收入，仅烟税就占全省财政收

① 《广西省政府公报》，123期，广西省政府，1936。

② 亢真化、梁上燕：《改良风俗的实施》，20页，民团周刊社，1938。

人近一半（前面已记述），如果禁绝“三害”无异断绝一大财源。新桂系为了标榜“新政”，又要维持主要财源，采取所谓“寓禁于征”政策，即通过征收高额税捐，逐步“禁绝”。

新桂系为表明厉行“禁政”，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禁烟方面，1931年1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禁种罂粟治罪条例》，通令各县禁种烟苗。1934年5月，公布《广西省禁吸鸦片办法》。1935年7月，修订为《广西省禁吸鸦片实施章程》。禁赌方面，1932年11月颁布《广西禁绝麻雀杂赌办法》，1933年9月公布《广西禁赌办法》，1935年修订重新颁布，“凡以财物为赌博或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均予禁止”。[①] 以上办法、章程、条例都规定了“禁绝”具体措施。新桂系的“禁政”虽不少，但真正实施的主要是：成立禁烟局，统一管理鸦片运销，取缔私运私贩；由各县警察局统一调查登记烟民，发给“登记证”，烟民凭证购膏吸食；从1934年起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和重要县城设立赌、娼特别区，称“特察里”，“特察里”以外一律“禁绝”。新桂系这样实施“禁政”，实际上是强化烟税、赌饷、花捐的征收。成立禁烟局，统一管理鸦片运销，目的是垄断云、贵鸦片过境税，保证“禁烟罚金”的征收；调查、登记烟民，发放“登记证”，是为了征收“证照费”；设立“特察里”就更便于征收赌饷、花捐了，因为到“特察里”开赌设妓馆都得先缴纳巨额承包费。这样一来，只要纳税交费，鸦片就可通行，烟民可吸食不限，既然“特察里”允许赌、娼，社会上就不可能禁止赌、娼。当时城市和许多县城有一种妇女，专为人介绍私娼，称为“拉马扯皮条”。在旅馆则由茶房兼任此职。30年代的广西，烟、赌、娼禁而不止。

烟、赌、娼是败坏社会风气的最大祸害。新桂系的“寓禁于征”不但不能禁绝“三害”，反而助长其泛滥。新桂系既不愿也不可能真正治理“三害”，其改良社会风俗的成效就可想而知了。

---

① 《广西省政府公报》，68期，广西省政府，1935。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为在广西实现团结抗战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利用30年代初的形势变化，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广西各地城乡发动群众，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西革命运动迅速复兴起来。李宗仁等新桂系领导人在民族危亡形势下，提出抗日救亡主张，反对妥协投降，在广西允许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鉴于新桂系的态度，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对新桂系的抗日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开放民主，以实际行动实行抗战主张，并同他们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协定。中共中央对新桂系有效的抗日统战工作，不仅促进了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一、30年代前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在根据地和国统

区的组织和工作都遭受严重损失，中共广西右江特委和郁江特委相继解体，并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这时，又正是新桂系强化对广西的统治，加紧整顿内政，在政治上肃清异己的时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广西仍有一些共产党员坚持斗争，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了"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一点一滴地积累革命力量，重新建立和发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

新郁江特委的筹建与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成立

1932年初，郁江特委被破坏后，仅剩陈岸一名特委委员在玉林五属一带坚持领导革命斗争。他一方面先后5次派人到上海、云南、贵州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从1932年秋至1936年春，均未能正式恢复广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一方面继续坚持斗争，秘密联络各地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进行恢复和发展组织的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陆川、北流、兴业、贵县、南宁、宾阳、永淳、迁江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发展起来。为了加强对郁江地区各县党组织的统一领导，陈岸与贵县地下党负责人黄彰商量，决定重建郁江特委。

1935年11月7日，中共郁江特委筹备会议在兴业县葵阳乡木根圩永源客栈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陈岸、黄彰、杨第鹍、黄文光、朱育奎、罗青松等10多人。会上成立了重建郁江特委筹委会，推选陈岸为筹委书记，黄彰、杨第鹍为委员，并决定筹委于1936年适当时候召开中共郁江地区代表大会。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起来，这给广西各地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至1936年，桂林、梧州、柳州等地的中共组织也恢复和发展起来。9、10月间，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派李守纯到南宁与郁江特委筹委会取得了联系，同时，郁江特委筹委会也与右江地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新形势，中共郁江地区代表大会于1936年11月7日在贵县三里罗村召

开。出席大会的有陆川、北流、兴业、南宁、横县、贵县等县市代表和右江地区代表共20人。因代表已超出郁江地区的范围，根据李守纯建议，决定把大会名称改为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把原计划重建中共郁江特委改为成立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会上，陈岸致开幕词，李守纯作《目前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黄彰等6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恢复、发展组织工作的发言。与会代表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几年来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遭受敌人严重破坏和与上级党组织中断关系后坚持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劳农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陈岸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彭懋桂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滕雪心任常委兼妇女部长，黄彰、陈湖光、黄桂南等任委员。省工委机关设在南宁。会后几天，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薛尚实到南宁巡视，确认了广西党组织和南方临委的组织关系以及党代会的选举结果。

中共广西省代会的召开和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成立，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广西地方组织已经经受住了最艰难时期的考验，结束了分散无统一领导的局面，重新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此后，广西党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右江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中共右江特委于1932年底因韦拔群、陈洪涛的遇害而解体后，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承担起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中共右江下游临委是1932年6月建立的。1932年春，敌人对东（兰）凤（山）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后，中共右江特委、红军右江独立师党委为了减轻敌人对东凤根据地的压力，派黄松坚带领一批干部到右江下游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黄松坚等到达思林、果德两县交界的山区，与右江下游的右江独立师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政委黄书祥会合，成立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滕国栋兼任。任务是组织恩隆、奉议、思林、果德、那马、向都、天

保等县红军、赤卫军坚持游击战，配合韦拔群、陈洪涛领导的东凤地区的反“围剿”斗争。6月上旬，在果德县岜独屯成立中共右江下游临委，黄松坚任书记。东凤根据地丧失后，中共右江下游临委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1933年1月，中共右江下游临委在思林、果德两县交界处的弄纳屯召开会议，改名为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仍由黄松坚担任书记，滕国栋、陆浩仁、黄书祥为常委，黄大权等为委员。当时，右江下游党委领导右江地区和滇桂边14个县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做了艰苦的努力。5月，黄书祥在思林县梅竹乡领导群众斗争时被敌包围，不幸牺牲。6月，黄大权在往滇桂边开辟工作途中，被叛徒出卖而被捕遇害。1934年5月底，黄松坚将离开右江下游到滇桂边工作，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撤销，另成立中共思果中心县委，由陆浩仁任书记，滕国栋、黄永祺为常委，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工作。

黄松坚、黄德胜等10多人自1934年7月到达滇桂边后，工作较有成效。他们根据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进行了党、政、军、农的组织建设。同年12月，在云南富宁县九弄组成了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黄德胜、韦日有等为委员。接着又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组建了滇黔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黄松坚兼联队政委，梁超武为联队长，并成立了滇黔桂边劳农会。黄松坚等率领劳农游击队在富宁县镇压土豪劣绅，举行武装暴动，攻占国民党区公所，宣传中央红军的长征和中共的主张。这样，在白色恐怖之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革命斗争得以坚持下来，其活动范围包括广西6个县、云南3个县、贵州两个县。可以说，这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延伸。

1936年春，右江上游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在抗日救亡形势推动下，也出现了生机。2月中旬，中共东兰中心县委在西山召开右江上游各县代表会议，成立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主席黄举平，副主席黄世新。下辖凌云、凤山、万冈、都安、东兰等县革命委员会。其所属的革命武装统编为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队长黄世新，政委黄举平。联队在东兰向反动势力进攻，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革命组织。7月，在西山召开了中共

右江上游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上游中心县委，黄举平任书记。12月，右江地区党组织与广西省工委接上关系。省工委派巡视员林鹤逸到田东县召开右江地区各县党组织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决定建立中共桂西区特委，由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张宪为委员。桂西区特委的建立，使右江地区及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实现了统一领导，并在广西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转入了抗日救国的斗争。

二、广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然而，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开始行动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动的情况下，一方面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另一方面克服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前进。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就于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在东北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当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时，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黄敬、姚依林、郭明秋

等组织和指挥了北平各校学生要求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以此为起点，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风暴影响下，广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12月18日，在南宁体育场举行了广西省会全体学生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该院在1934年秋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南宁高中等校学生8000多人参加。大会通电全国，表示“誓愿领导全桂三百万青年”，“誓死反对任何分裂中国领土主权之自治运动及政治组织”，“援助北平同学奋起救国、首树风声之民族争斗，并警告当局，停止对爱国学生之非法迫害，立即释放被捕同学”。会后，学生列队向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省党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请愿，并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告同胞书》和高呼抗日口号，晚上又组织50多个宣传队到大街小巷宣传。同日，南宁高中校长雷荣珂等538人也以“广西省会各学校教职员”名义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21日，南宁各校学生自治会举行联席会议，发起组织广西省学生救国会，会后以广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名义向北平学生发出慰问电。在此前后，梧州、桂林、陆川、柳州、百色、龙州、崇善、贵县、桂平、天保、宜山、武鸣、合浦等地的学生和教职工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政府出兵抗日，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1936年2月下旬，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修正通过了《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章程》，确定以唤起民众，集中全省学生救国力量从事抗日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宗旨。还选举产生了由共青团员蔡凯等25名干事、李朋章等7名候补干事组成的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干事会。5月底，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广西省学联与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四市学联被推为常委，可见广西学生爱国运动在当时全国的影响。到10月，广西各地已成立60多个县学生救国分会，会员达4万余人，省学联还出版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不定期刊物《广西学生》。

在城市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热潮中，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积极利用各种方式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1936年春至冬，中共邕宁县

委通过南宁民团干校的中共党员方与严，编辑出版了半月刊《新动向》，以中共1935年12月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汉文报纸《救国时报》为依据，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每期发行上千份，深受群众欢迎，后被桂系当局查封。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印发《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农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团结起来，反帝抗日，打倒国民党军阀。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发出的第一号通告，也明确提出了积极投入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抗日义勇军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任务。有的地方党组织和中共党员通过开办书店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如中共党员梁寂溪在梧州大中路开办的生活文化合作社，中共党员凌建平在玉林开办的群生书店和在陆川、博白、北流开设的分店，都深受进步读者欢迎。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通电全国要求抗日救国。并随即派桂粤两军人湘，作出欲一举下长沙而趋武汉之态势，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但因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与粤军内部分裂，陈济棠于7月18日失败离粤，事变中心转移到广西。在此关头，李宗仁、白崇禧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抓住抗日的旗帜不放，解除取缔抗日救国运动的禁令，公开主张开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这就使得广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

1936年6月3日，由广西文化界救国会发起的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在南宁成立。著名人士马君武、李任仁等17人当选为理事会理事。该会通过了成立通电、成立宣言、全省学生抗日救国计划、抗日救国指导大纲等案，决定举行广西各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大会。6月4日，南宁各工会、妇女救国会以及农、学、商各界113个单位共4.5万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大会。梧州、桂林、柳州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广西教育厅还饬令全省大、中、小学校停课，提前放暑假，分别到民间宣传抗日救国，颁发广西民众抗日公约，

通令全省中学指导学生利用暑假各回本县本乡努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 一时间，学生抗日宣传队遍布全省广大城乡。学生们以小分队为单位，深入到偏远的乡村作公开的抗日救国宣传。宣传的标语口号主要有："大家起来抗日！大家起来救国！""以抗日为唯一目标，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中国军队打中国军队！"广西当局当时还允许聘请外地进步学者来广西讲学，传播民主爱国思想，培养抗日救国人才。在当时广西这种特殊环境下，抗日救国的气氛显得特别浓厚，抗日思想的宣传也比较广泛。工人、商人、学生、妇女、儿童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故时人评说："对于青年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广西可说是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2]

时属广东的合浦、北海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断高涨，1936年9月的"北海事件"是北海民众强烈的抗日爱国情绪的集中反映。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揭开了序幕。当时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的学生在学生会领导下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他们组成纠察队，查缉日货。"一·二八"事变后，北海青年学生及市民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声援十九路军及上海人民的淞沪抗战。1935年12月底，北海各界人士2000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以北海学生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援"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斗争中涌现了赵世尧、冯廉先、吴世光、庞国泰等一些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后，新桂系为增加抗日反蒋的实力，邀请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入桂，其中包括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他们到广西后，于8月22日在南宁宣布恢复十九路军建制，蔡廷锴自任总指挥，下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3个师，分别进驻广东的合浦、北海和广西玉林。

由翁照垣任师长的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进驻北海，受到北海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1936年9月3日晚，有间谍嫌疑的北海"丸一洋行"老板日本人

---

① 《广西省政府公报》，131期，1936。

② 章乃器：《西南事变所给予我们的教训》，载《救国会》，157页。

中野顺三被愤怒的北海军民杀死，成为轰动一时的“北海事件”。日本方面即向国民党外交当局提出抗议。9月中旬，国民党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派员到北海调查，遭到第六十一师的拒绝，北海群众在码头一带示威抗议，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屈辱外交”“打倒日本侦探”等口号，① 抗日情绪高昂。日本海军当局亦相继采取一些措施，先是于9日单方派出军舰“嵯峨号”赴北海，意欲调查，结果未遂离去。后于17日会同国民党方面调查员再赴北海登岸调查，并派出六艘军舰在北海口外游弋，进行武力威胁。但慑于十九路军的严阵以待及北海民众的同仇敌忾，始终不敢贸然强行登陆。

“两广事变”结束后，第六十一师被迫撤离北海，国民党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又派员会同日方于9月下旬进行第二次调查。12月30日，中日两国当局达成了由中国政府发给中野遗属3万元抚恤金的协议，② “北海事件”遂告结束。

“北海事件”是十九路军的爱国将士和进步分子在北海各界群众的支持下采取的一次抗日正义行动。它是当时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与全国的抗日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推动和促进了合浦、北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事件结束后，北海进步青年和群众受到进驻北海的国民党军队镇压。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虽然被压制下去，但进步潮流却以另一种形势继续保存和发展起来。

三、红军长征过广西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的计划是从

---

① 《北海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105～106页。

② 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12月31日。

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合。

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7月先行踏上西进的征途。他们经湖南桂东地域，转新田、祁阳、零陵，于9月2日突破桂军防堵，从清水关首先进入广西。

当时，新桂系为对付红六军团，出动了其主力第七军全部兵力两个师7个团共12000余人，以及桂林、平乐、柳州三地区的部分民团，由第七军军长廖磊驻桂林统一指挥，妄图堵击红军于桂、湘边境。

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市渡口组织横渡湘江，以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为后卫在湘江东岸阻击敌人，击退了桂军两个团的攻击，但第五十团团长刘式楷在战斗中牺牲。4日，红六军团经石塘、麻市直抵湘江之滨，在全县凤凰嘴顺利渡过湘江，然后越过越城岭的三千界，6日到达西延地域的大埠头（今资源县城）。在鲁塘遭桂军第七十团突然袭击，红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牺牲。桂军深恐红军在西延、龙胜、三江一带建立根据地，连忙调兵实行追击堵剿，并派遣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和扫射，红军在西延区石溪村击落敌机一架。9日，红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要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一带钳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中央红军配合行动的补充训令，即于9日、10日两天，率主力及后卫部队离开广西，先行进人湖南城步县。待桂军11日尾追而至时，看到的只是上书有“此是湘、桂交界处，不劳桂军远送”的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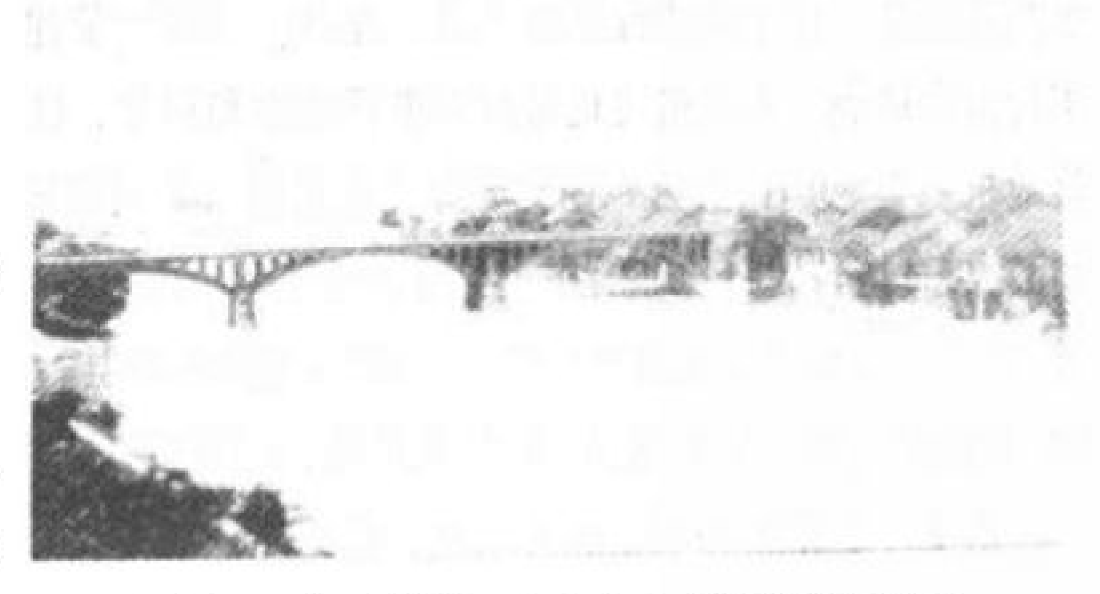
从9月2日至10日，9天时间，红六军团长驱210公里，历经灌阳、全州、资源3县，胜利通过广西，达到了横渡湘江、进军城步的预期目的。负责追堵红军的桂军指挥廖磊不得不承认，红军“行军力量极强大，尤以爬山越岭为其特长。我军随后追剿，常有追赶不及之慨”。①

在先遣部队红六军团经过广西两个月后，中央红军开始进军广西。对中央红军的突围和转移，蒋介石已有察觉，调遣了“追剿”军16个师、77个

① 《桂林日报》，1934年9月20日。

团，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1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决定从广西全县、兴安两县之间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当时，蒋介石沿湘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兵力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何键部集中零陵、黄沙河一线；桂军主力进到全州、兴安、灌阳地区，布成袋形阵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李韫珩等部，尾部追击，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但新桂系与蒋介石有着严重矛盾，他们既怕红军深入桂境，又怕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追击红军为名跟进广西。于是令其主力南下龙虎关、恭城等桂湘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不让红军轻易入桂。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让出桂北一条路，给红军通过，但决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催促红军快走。同时，也防止蒋军乘机进入广西。这样，既可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界首——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封锁时的重要渡河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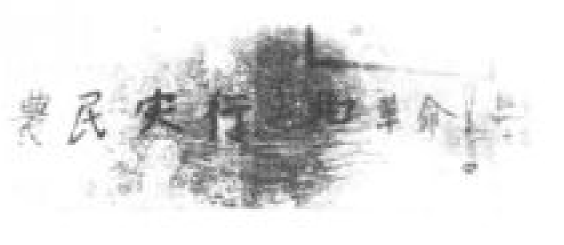
根据这种情况，中央红军抓住战机，乘虚抢渡湘江。11月26日，中央红军7万余人，以一军团为右翼，三军团为左翼，经湘南由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27日，右翼的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上的脚山铺布阵，准备阻击已占领全县的湘敌。左翼的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五师占领了新圩和马渡桥，以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军。如果红军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随携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

中央机关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固守渡口的红军为了掩护其他部队渡江，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28日至30日，红军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30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4个师渡过湘江，但尚有8个师未能过江，军委令后续部队要在12月2日前通过湘江。为此，脚山铺、光华铺等处的阻击战更为激烈。至2日晚，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东岸而全部损失外，主力红军渡过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对“左”倾领导者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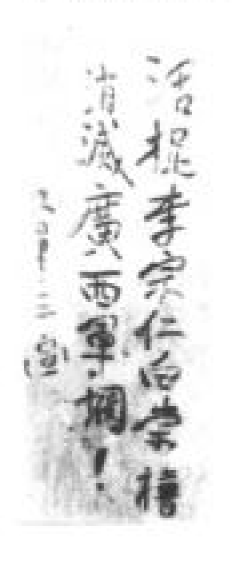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向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前进。计划在西延地域休整一两天，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计划被敌察觉，蒋介石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人，以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引起了各种争论，并开始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2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纵队，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继续西进深入越城岭山区。4日，又决定向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进军，这就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鏖战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破产。5日，红军在越城岭山区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险峻高山——老山界（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和资源县交界），顺利地通过了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12月8日以后，红军继续西进，11日，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先后经广西境进人湘南。13日，红军最后一支收容部队离开广西。

红军长征过广西，在险恶的战斗环境和紧张的行军途中，仍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进行了大量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每到一处，就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和向群众口头宣传。至今发现中央红军在广西留下的标语还有

72条，多是针对广西情况的，如“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现金”“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民众修炮楼”等。散发的宣传品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告白军弟兄书》、《革命歌谣选集》等等，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提高群众的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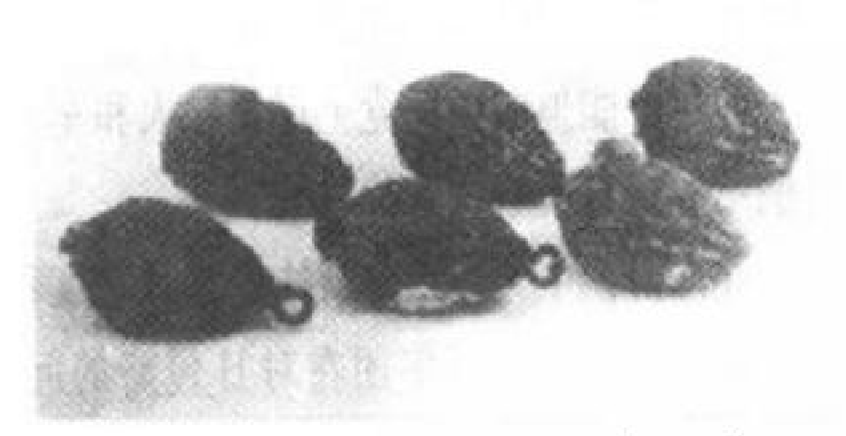
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的标语

红军还以严明的纪律和模范的爱民行动让群众认识、了解自己。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尊重妇女，热心帮助群众解决困苦。还沿途发动群众打击土豪，为民除害。据统计，红军长征过广西沿途镇压土豪劣绅32人，[1] 所没收的财物分配给群众。他们还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渡湘江之前，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了《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在通过越城岭苗瑶聚居区时，红军与少数民族平等相处，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以实际行动打消少数民族的疑虑，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顺利地通过苗瑶地区。

广西民众从红军的言行中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热情帮助红军。他们为红军送饭送水，在前沿阵地抢运伤员，帮红军架桥、带路，掩护和护理伤病员。全县、灌阳、资源、龙胜等地一些穷苦农民还踊跃参加红军。

① 《红军长征过广西》，4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红军长征经过广西先后28天(其中红六军团9天，中央红军19天)，途经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五县。时间虽短，但他们在广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红军过境时，



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的手榴弹

曾给灌阳县立田村送了一批枪支。在国民党严查武器和白色恐怖中，全村无一人泄露机密。10年后的1944年，当地地下党利用这批武器来建立抗日武装，1947年又凭借这批武器领导了全州、灌阳起义。红军经过的龙胜东北部的江底、泗水、马堤、瓢里、平等等地，在解放战争中出现了桂北最早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而长眠在桂北土地上的红军烈士，则在人民心中铭刻了不朽的丰碑。

四、中共对新桂系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新形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形下，不但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①] 为此，中共中央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积

①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极促进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好中下层基本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与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广西，中共注意到新桂系对日态度和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在对日侵略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不仅要消灭共产党，而且要剪除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以便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因而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采取不抵抗政策，新桂系不满蒋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和支持抗战。“每逢中日问题陷于严重紧张的时期，西南的同志都有一种抗战的表示……淞沪之役，西南空军曾飞到杭州助战，长城之役，曾出兵湘南，请缨北上……”① 新桂系批评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除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外，决无第二条死里求活的出路”。② 不抵抗政策是“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的领土主权，做媚外求荣礼物的主张”。③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就中日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言“焦土抗战论”，要求在政治上，必须下最大的政治决心，发动举国一致的对日战争，不怕流血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与暴敌血战到底，不获全胜不收兵；在军事上，必须是总动员的全面战，而非局部战，是主动的进攻战而非单纯的防御战，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长期消耗战而非速决战。“中国之生死存亡，全系于中国本身之能否抗战。”“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奋斗之一点而已。”④

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和影响的

---

① 《六一运动后白崇禧的言论》，18页，南宁更生报社，1937。
② 白崇禧：《抗日救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6月9日。
③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78页，创进月刊社，1936。
④ 李宗仁：《我对于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

扩大，加上蒋桂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新桂系对中共的态度也有了转变。1934年以前，新桂系是把抗日与反共硬扯在一起，白崇禧说："共产党在中国是心腹之患，共产党不剿灭，是不能抗日的。""从目前中国的形势来看，我以为长江以南的军队，应多负点剿共的责任，长江以北的军队，应多负点抗日的责任。"① 1934年后，新桂系为了达到反蒋的目的，转而对中共中央采取了联合态度。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他们是采取"开放"湘桂边境，催促红军快走的做法。1935年冬至1936年春，新桂系派出对外联络代表刘仲容，先后到天津、西安，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李宗仁呼吁："希望全中国军人的血，都是对外而流，全中国军人的枪杆子都一致向着日本帝国主义。"② 白崇禧也表示："过去的一切旧账应该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再打中国人，重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拼命。"③ 鉴于新桂系对日、对中共的态度，中共积极开展了对新桂系的统战工作。

新桂系对共产党实行外联内压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要借助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中共中央采取联合态度；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在广西危及他们的统治，对广西境内的共产党地方组织采取镇压政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与桂系的统战，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即对新桂系上层人物，由中共中央出面；对其下层人物及基本群众，则由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出面做秘密工作。这样，党在广西形成了两条渠道的统一战线工作，它们互相交织，相互配合，促进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广西的实现。

中共中央对新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从1934年秋就开始了。当时，中共中央特别事务科派遣原在吉鸿昌抗日部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谢和庚到广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宣侠父着重做十九路军在桂林将领的工作，谢和庚在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任科员（后任白崇禧机要秘书），负责了解桂系上层的情况

① 《梧州民国日报》，1932年2月9日。

② 李宗仁：《抗日救国》，载《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6月9日。

③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156页，创进月刊社1936。

并相机做他们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多次表示了抗日反蒋的态度，对此，中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36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发表《我党在两广的任务》一文，指出中共在两广的任务是：(1)赞成与拥护抗日反蒋的口号，积极参加一切抗日反蒋的运动；(2)坚决反对与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走狗的任何妥协行为；(3)要求民众运动自由与群众生活改善；(4)号召民众拥护李宗仁的抗日主张，可能时与李宗仁订立正式合作协定，推动李宗仁在广西的范围内即刻执行抗日反蒋的各项纲领。

“六一事变”发生后，新桂系即派刘仲容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寻求支持。中共中央对两广发动抗日反蒋的事变予以支持和肯定，表示要加速西北的发动，响应与配合这一事变。6月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了对“六一事变”的谈话，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因此，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赣军区对两广出师抗日讨蒋问题发表了宣言，表示同意与赞成两广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中共中央在《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也提出：“我们的策略，是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①

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开始将“抗日反蒋”的方针逐步改变为“逼蒋抗日”。在1936年5月初就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因此虽然在策略上支持两广“六一事变”，但不赞成蒋桂冲突诉诸战争，主张双方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为此，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化名林秀先）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到广西进行抗日统战工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25～2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作。云广英7月下旬抵达南宁，先后会见了李宗仁、李济深等人，表明中共方面对两广事变的态度，说明中共“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李宗仁等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蒋不抗战，我们要进行抗日救国，就不能等蒋介石。[①] 这表明李已接受中共的逼蒋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原赴两广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胡鄂公、黄杰、王世英、杨东莼等，都在南宁配合云广英的工作。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抓住“六一事变”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中共中央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广西的实现。“六一事变”当天，中共南宁（邕宁）县委以广西抗日同盟会的名义发表《拥护抗日宣言》，提出立即召集全省或全国的国民会议，产生国防政府等10项主张，号召一切党派联合起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一切武装队伍和民众共同抗日。中共党员谢和庚向白崇禧建议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等工作，被白采纳。一支约有300人的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史称广西第一届学生军）于6月27日建立，分为3个分队10个小队到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从事抗日宣传。另有40余所中等学校的在校师生在此前后被派往各县农村宣传“抗日反蒋”，造成了强烈的要求抗日、反对蒋对日妥协的群众声势。

中共对新桂系的统战工作，既促使桂系和平解决桂蒋冲突，又使他们在逼蒋抗日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除了通过“两广事变”打击蒋介石对日屈辱的妥协政策外，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桂系也站到了逼蒋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一边。他们通电全国，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要求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等等。李宗仁、白崇禧还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

---

① 云广英：《“六一运动”前后我党在南宁活动的片断》，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46页。

事变的主张”。① 这种态度，是中共与新桂系实力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五、红、桂、川联合抗日纲领草案的签订

“六一事变”平息后，蒋桂之间仍有矛盾。蒋介石想方设法，企图分化瓦解新桂系，扩大蒋在桂的势力，而李、白深感自己力量不足，表示愿意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中共为了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也需要与一切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人、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携起手来，于是对新桂系采取进一步争取和团结的方针。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同桂系交换订立合作抗日救国协定的意见。当时，新桂系曾派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接到此草案后，托钱寿康带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予桂方，申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和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并于9月22日致函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对于中共与新桂系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一事，毛泽东表示：“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他对桂方所提草案，逐条提出意见和略加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寿康带回，并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希望“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

① 刘仲容：《西安事变的回忆——顺记三次西安之行》，载《广西文史资料》第9辑，55页。

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1] 这是中共与新桂系建立抗日合作关系的开端。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出现了有利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各地方实力派、爱国将领相继同中国共产党接触洽谈抗日，中国共产党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或派人联络，或分别致函，以推动各方舆论和行动逼迫蒋介石改变国策，进行抗日。1937 年 1 月，周恩来邀请新桂系代表刘仲容到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刘仲容，表示赞同广西的抗日主张，要刘向桂系转达中共关于联合各方力量逼蒋抗日的策略。

为推动新桂系走上抗日战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指示，从多方进行积极配合。一是适时改变斗争策略，把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改为抗日救国会、抗日会、抗日小组，赤色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等；二是就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开始同桂系当局谈判。这是在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指导下进行的。1937 年 3 月 22 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桂军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致函中共桂西区特委，提出五点工作指示。主要内容为：为迅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领导广大群众及实力派走上抗日战场，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促蒋抗日”；桂西区红军游击队现时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应立即提出“拥护李白总副司令对日焦土作战主张”口号；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之下，南方党与游击队应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谈判的内容，应在抗日救国战斗纲领和不干涉政治上的活动与组织独立存在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判自由原则下提出；在谈判进行中，丝毫不能减弱我们扩大党与武装部队之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桂系民团工作；广泛开展抗救会工作，迅速设法建立桂西区抗救领导机关，健全巩固桂西各县抗救会，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加紧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要与党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

[1] 《毛泽东书信选集》，7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根据这一指示，中共桂西特委于6月开始与桂系地方当局谈判，提出了谈判的五项要求、六项保证。同时，中共广西省工委向广西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抗日时期党的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信》，提醒和强调各级党组织应注意目前工作的几个问题：(1) 扩大普遍的宣传国共合作及广西政府和我党合作的需要，使有系统的具体进行领导；(2) 特别加紧党的工作；(3) 避免和广西政府对立的一切行动；(4) 停止武装游击行动。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克服过去的工作缺点，迅速的灵活的进行新的策略路线”。这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在广西的实践，表明了中共对团结抗日的诚意。

中共中央也加紧了同新桂系谈判协作抗日的工作。1937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派赴华南地区领导抗日统战工作的张云逸抵达香港。张云逸与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取得联系后决定了在华南的活动方针：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的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6月初，在桂系当局的催促下，张云逸赶赴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并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进行了会谈。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复张云逸，同意张在华南的活动方针，并对谈判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张云逸坦诚地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我们联蒋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推动。在谈判中要注意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等等。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多次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就三方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商谈，6月下旬拟就了红（军）、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

红、桂、川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主要内容有七条：(1) 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2) 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3) 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4) 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5) 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6) 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7) 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

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这七条协定草案，张云逸于6月26日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次日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去，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

红、桂、川联合抗日纲领草案的达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南地区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中共推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步骤，是逼蒋抗日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有利于整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巩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于7月14日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及南京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做好各自的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张云逸就此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了实际效果。从此，新桂系对抗战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全省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的形势。

中共中央对新桂系卓有成效的抗日统战工作，不仅推动了广西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对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十一章　抗战大后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广西当局迅速整编部队，出师参加对日抗战。大中学校学生投笔从戎，组成广西学生军随军出发，奔赴前线，开展战地服务。各族青年纷纷应征人伍，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兵源。各界群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以各种形式开展支前活动，男女老幼捐钱、捐物，百万民工参加修筑铁路、公路、机场、工事等。广西当局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颁布各种战时法令，调整政府机构，设立广西建设研究会和省、县临时参议会，制定《广西建设计划大纲》。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中国共产党与桂系的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各地中共组织与地方当局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如桂东南、南宁地区建立的战工团。广西当局又于1938年组建第三届学生军，深入桂东南、桂南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广西出现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发挥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作用。

一、桂军出师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推动下，新桂系出兵北上，参加对日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新桂系积极主张抗日。7月16日，李宗仁发表《对日抗战重要谈话》，针对南京政府仍幻想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指出：“惟有对日立即应战，我们的民族才有生路，惟有立即发动全民族总动员的对日战争，我们才能应付日本当前的侵略。”① 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对日态度开始强硬。7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坚决拥护抗战，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②

7月10日，蒋介石曾以“蒸午”电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蒋自兼团长)。李宗仁未就任，但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夏抵庐山后，被蒋介石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电白崇禧，转达蒋介石邀请白去庐山或南京相晤。因蒋介石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夏威，要他们电请白崇禧，并转告蒋介石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同时，蒋介石亲电李宗仁、白崇禧，约他们去南京“共商抗日大计”。此时，日军大批援兵到达华北，分三路攻占平津，形势危急。李、白接电后，召集李品仙等高级军政人员商讨，认为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形势下，蒋介石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抗日诺言

① 《李白两中央委员最近言论三集》，1～2页，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1948。

② 《大众报》，1937年7月22日。

是完全有可能的。[①] 白崇禧首先表示愿先应邀去南京，李宗仁暂留广西做整军动员工作。8月2日，蒋介石又电白促驾。8月4日，蒋派一架水陆两用机飞抵桂林接白。当天下午白崇禧偕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乘该机飞往南京。白抵宁后当晚晋见蒋介石，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后又兼任军训部长。8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接替蒋介石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划全国为5个战区，广西部队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编为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崇禧。不久，又奉令改为第十一集团军，[②] 北上参战。第十一集团军由3个军组成，除原第七军、第十五军（改称第四十八军）外，另成立第三十一军。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参谋长何宣。第七军，军长廖磊，副军长周祖晃，参谋长张淦，下辖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副军长覃连芳，参谋长韦布，下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兼；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馨；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张义纯，参谋长刘清凡，下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第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同年10月，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奉令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周祖晃升第七军军长。留守广西的部队后来也奉令编为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为夏威。由于抗战前广西推行民团训练，因此军



广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① 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载《学术论坛》，1987（2），79页。

② 桂军改编第十一集团军后仍保留第五路军总部名义，1939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撤销第五路军总部。

事动员比较迅速，一个月之内即完成军队组编工作，整装待发。9月中旬，第四十八军作为先遣部队从桂林人湘北上，向徐州集结。10月初，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也出发北上。新桂系在抗战前苦心经营的空军和兵工厂也交给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和管理，空军编为航空委员会第三大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参加抗战。

10月10日，李宗仁乘飞机离桂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行前，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名发表《告广西党政军全体同志暨全省同胞书》，指出："民族之存亡，决定于这次自卫的战争；战争的最后胜利，决定于今后长期的战斗；而长期的战斗，则深赖于后方不断的振奋，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建议，不断的贡献。"希望全省同志同胞"负起我们光荣的任务，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发布《训勉全体将士书》，表示"纵使全国化为焦土，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全体将士"精忠报国，努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① 当日，李宗仁飞抵长沙，对中央社记者谈话时表示："广西全省民众，皆抱抗敌决心，各军团民众等纷纷请缨，目前可出师20万，后备者有110余万人，将来可征至300万人，与敌作殊死战。"②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

桂军出师抗日，李宗仁、白崇禧赴南京任职，标志着蒋、桂由对抗变为合作，这对当时国民党各派的团结统一和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广西学生军奔赴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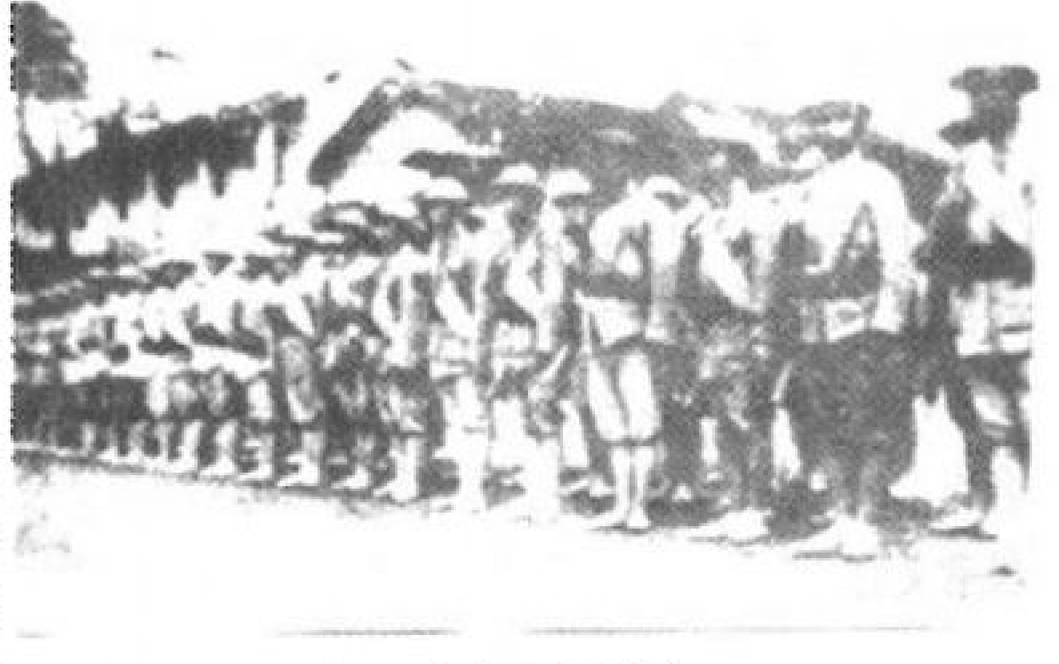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各种抗日组织

①② 罗飞鹏：《李宗仁与白崇禧》，43、49页，建国书店，1938。

和团体纷纷成立。广西学生军就是其中一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抗日战斗队伍。

卢沟桥事变后，广西当局在整军动员、出兵抗战的同时，招收知识青年组建广西学生军随军出发，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全省大、中学校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军，出现投笔从戎的热潮。10月，广西学生军在桂林正式成立（习惯称广西第二届学生军），编成一个大队，共280人。参加学生军的有广西大学和各地高、初中学生以及国防艺术社社员等。大队长蒋元，副大队长黄之岗。辖男、女两个中队，中队正副队长由教师担任，班长由学生推选。另外设政治指导员和艺术指导员。[①] 中共广西省工委为掌握这支抗日武装，开展抗日宣传，派10名党员参加学生军。学生军到达安徽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于1938年5月建立中共学生军支部，发展新党员，成为学生军的骨干力量。

学生军成立后，在桂林李家村集训两个月，进行军事和战地宣传工作的训练，排练抗日歌剧等。集训结束后，12月中旬，学生军出发北上，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途经武汉时，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易凤英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系，通过程思远邀请周恩来、叶剑英、聂鹤亭、邓颖超、蔡畅、王明、博古以及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先后给学生军作报告和演讲。周恩来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演讲中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当前敌人虽然一时得逞，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他指出，



广西学生军的英姿

① 《抗战中的广西动态》，25页，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全国军民要紧密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到底。他勉励同学们到前线去要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周恩来坚强的战斗意志和热情洋溢的演讲，使学生军深受教育和鼓舞。① 白崇禧也很关心学生军，先后几次对学生军训话，讲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民族与青年出路等。学生军在武汉期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深入街头和公共场所，进行演讲、歌咏、演剧、漫画等宣传。他们还参加了武汉群众"保卫武汉"示威游行，同学们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前面作先导，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1938年2月，学生军离开武汉去第五战区前线。他们先后在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战场辗转巡回，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慰问部队，救护伤员，担负交通，收集情报等。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学生军出现。他们与抗日官兵共同战斗和生活。"当敌机在阵地施轰炸、掩护冲锋的时候，学生军也跳入战壕里，把负伤的战士们，殷勤小心的用担架抬到后方医院去疗治……"② 有的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为民族解放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学生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受到抗日将士的称赞。李宗仁在河南潢川看望学生军，表彰他们的抗日精神，并发给每人一条军毯、两套军服和多发给一个月的饷银，以资鼓励。

武汉失陷后，学生军一部分随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另一部分随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撤往鄂西。后来随着国民党日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桂系当局害怕学生军"赤化"，1939年10月解散学生军，另行安排工作或遣回广西。在大别山的学生军中的一批进步青年，在中共学生军支部领导下撤退到淮南淮北，参加了新四军，走上抗日的新战场。

广西学生军是广西当局在抗战初期为配合前线部队作战而建立的青年抗

① 雷成：《我所知道抗战初期的广西学生军》，载《广西文史资料》，第20辑，40页。

② 《抗战中的中国军事》，221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日团体。它从广西千里迢迢奔赴中原大地，转战大江南北，进行抗日救亡，这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仅有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支爱国进步的抗日战斗队。学生军后来虽然被解散了，但它为抗日救国英勇战斗的精神，唤起和鼓舞了广大人民团结抗战。武汉失陷前，学生军曾派出中共党员易凤英等8人组成代表团回广西，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指导下，巡回桂、柳、邕、梧各地汇报宣传，举办前方战利品和侵华日军暴行展览等，激发了全省人民尤其是青年的抗日爱国热情，促进了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11月广西组织第三届学生军时，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踊跃参加。

三、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一切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同仇敌忾，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洪流。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使广西一度形成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

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

抗战爆发后，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蒋、桂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但并没有消除，互相之间仍有戒心。新桂系害怕蒋介石的势力借抗战之名，向广西渗透，危及他们的利益。李宗仁对李任仁说：“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① 因此，新桂系一面参加抗战，一面采取措施防蒋，以维

① 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78页。

护他们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李宗仁离桂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前，对广西作了一番部署。他认为以前的革命同志会是秘密组织，现在既和蒋介石合作抗日不能再搞秘密组织了，但可以搞公开的合法组织。经过几番谋划，决定利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组织一个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团体。①

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正式成立。李宗仁、黄旭初、夏威等桂系军政高级干部和文化界人士共4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李宗仁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就研究会的成立作了说明。他说研究会是个学术团体，但它负有“异常严重的使命”，它的任务是根据广西的“省情”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方针对广西的各项建设进行研讨，以“供政府采择施行”，并“去影响全国去推动全国”。② 会上宣布研究会的组织大纲，规定研究会的宗旨是“根据三民主义及广西历年来建设经验为适应对日抗战时期之需要从事于广西省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问题之研究”。具体任务是“搜集并整理与建设研究有关之各种资料以备研究员参考”，“对广西建设之一般理论及各种具体方案以个别方式与集体方式作有系统的研究以贡献于当局备其参考”，“答复当局之咨询事项”，“刊布各种问题研究结果及广西建设实绩”。③ 会后公布经李宗仁与黄旭初等商定的研究会组织机构，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会长下设常务委员，李任仁、陈劭先、朱佛定、黄同仇、韦永成为委员，但实际主持会务的是李任仁和陈劭先。研究会内分设政治建设部、经济建设部、文化建设部三个研究机构，黄旭初任政治建设部主任，黄蓟任经济建设部主任，邱昌渭任文化建设部主任。还设有秘书室、编译室，万民一、胡讷生分别为主任。由会长、副会长聘请广西高级军政人员和专家学者共56人为研究员。一年后研究员增至150人。

① 陈劭先：《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69页。
② 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669页，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③ 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670页。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新桂系的公开政治组织。新桂系成立这个组织，目的是联络各党各派，接纳各方知名人士，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防止蒋介石势力并吞广西，维护广西的半独立地位。新桂系为达到这个目的，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进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主持研究会的国民党民主派李任仁和陈劭先，先后引荐夏衍、胡愈之、范长江、杨东莼、张铁生等一批党员和柳亚子、何香凝、千家驹、李达、李四光、金仲华、陈此生、欧阳予倩、莫乃群等进步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或应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千家驹还分别担任文化建设部、经济建设部的副主任。他们以研究会为阵地，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进步，发展进步力量，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研究会中的进步人士推举李任仁、陈劭先等出面，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民主宪政运动相呼应，成立广西宪政协进会，发表宣言，催促蒋介石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在海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研究会成立后，对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出版了《建设研究》、《时论分析》、《敌国舆情》等定期刊物和《广西之建设》、《列国国势要览》等丛书。

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新桂系为一定政治目的而成立的，其成员和成员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但由于它是在李任仁、陈劭先两位民主派人士的主持下，又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团结了抗日爱国的中间分子，使反动分子受到一定的孤立，因此它事实上成为抗战时期广西团结抗战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而且成为西南军事重镇和联结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桂林也是通过香港同海外特别是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根据武汉失守后的形势，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动员国统区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决定

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原桂北路一三八号）

10月下旬，周恩来从武汉撤退长沙途中遇上白崇禧，并与白同行。周恩来向白崇禧分析了武汉失陷后的抗战形势，指出广西将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抗战基地，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广西抗战。白崇禧表示“欢迎”。[①] 这样，中国共产党与桂系就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达成了口头协议。11月中旬，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桂林，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②] “八办”设在原桂北路138号（今中山北路144号），另在桂林市北郊路莫村设转运站。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桂系抗日统一战线新发展的标志。“八办”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公开机关，它的建立为党在广西宣传抗日，动员和团结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周恩来先后三次到桂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8年12月初，周恩来第一次来到桂林，和郭沫若一起拜会白崇禧等桂系上层人物，争取了他们支持《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12月8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讲话。1939年2月，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到桂林，应白崇禧的邀请，

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9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办事处始称“新四军驻桂办事处（通讯处）”，处长吴奚如，1939年初吴调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周、叶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周恩来发表《军训工作之重要》演讲，号召坚持长期抗战，不但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还要准备着明天的胜利决战。[①] 周恩来还同各界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广泛的接触，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叶剑英、徐特立等也先后来过桂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开展团结各界群众的工作。李克农以合法的身份，经常同黄旭初等桂系重要人物交往，结交朋友，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争取广西当局开放民主，支持进步，坚持抗战，为团结救亡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八办”根据武汉失陷后桂林的形势，团结来桂的各种文化人士，组织文化新军，形成了强有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掀起闻名海内外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



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与小儿子李伦在桂林北郊路莫村合影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和指导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为这些地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这些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抗战前，由于新桂系的摧残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处境十分艰难。“八办”建立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归“八办”直接领导。根据周恩来关于隐蔽精干，不忙发展，以发动群众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指示，[②] “八办”帮助广西党整顿组织，建立精干的领导机关，使广西党很快适应新形势，成为广西抗日救亡的坚强领导者。

①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②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桂林“八办”还担负着筹运抗日军需物资和输送革命干部的任务。广州沦陷后，从广西通往越南的交通线成为我国与海外沟通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八路军、新四军从香港、南洋等地筹集和华侨捐献的各种物资的运输，主要靠这条通道。“八办”工作人员不畏艰险和辛劳经常来往于越南和广西各地，疏通地方当局，克服种种困难，把军需物资接送到抗日前线。许多过往的秘密党员、干部以及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也都是由桂林“八办”设法护送到目的地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及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加强和发展了广西和西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大后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支援了全国抗战，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地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新桂系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战时期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两面性的政策。一方面，由于他们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有矛盾，害怕蒋的势力渗透广西，危及他们的统治利益，因而需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借助进步势力，以增强他们的力量，维护广西的半独立地位。所以，抗战初期，新桂系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抗日统战关系，实行一些开明进步的政策。另一方面，新桂系仇视和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发展，不容许共产党组织在广西存在，对广西地方组织肆意进行破坏。全面抗战爆发后，新桂系继续制造一系列迫害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严重事件，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处境十分困难。

由于新桂系只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只同中共中央讲统战、讲联合，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不但从来不承认，而且残酷镇压，因此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抗日统战工作只能在中下层秘密进行，建立地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样，广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共中央与桂系上层的统一战线，这一种前面已叙述过；另一种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与各地方当局的秘密统一战线。

抗战爆发后，中共广西党组织先后召开各地区党的代表会议，学习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鉴于当时广西党组织所处的政治环境，确定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与同情党的国民党中下层军政人员进行联络，派党员打入地方政权各部门，利用社会关系，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下层，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推动国民党地方当局抗战。广西党组织的这个方针符合当时广西的实际情况，是正确的，党的统战工作是有成效的。

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广东南路和广西玉林、南宁一带形势紧张。广西当局饬令各地组织抗日战时工作团，开展抗日救亡。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与战工团的组建工作。2月，在中共陆川县委的推动下，国民党陆川县政府同意成立陆川县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团，县长肖道龙任团长，国民党县书记长高武潮任副团长，中共党员李耿、林克武和朱旭奎任副团长和秘书，具体组织和领导全县抗日救亡工作。中共玉林中心县委推广陆川县委的做法，要求各县党组织推动各县组织战工团。不久，北流、玉林、博白、兴业等县相继成立战时工作团，各县县长、国民党县书记长或县参议会议长担任正副团长，一批中共党员分任战工团的秘书、股长、干事等职务，负责具体工作。同年6月，中共玉林中心县委在各县建立战工团的基础上，争取玉林民团区指挥部同意成立玉林五属战工团，统一指挥各县的战时工作。总团长由民团区指挥官王景宋兼任，副总团长由副指挥官肖道龙兼任，爱国人士龙明勋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金石生任专职秘书，玉林中心县委派党员熊景升、张祖贵、黄汉贞等常驻总团，与金石生一道工作。在中共玉林中心县委的推动下，玉林地区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界群众普遍动员起来，组织战时教育工作团、农工抗日救国会、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敌后援会等等抗日团体，捐钱献物，支援前线，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救亡日报》报道说："救亡工作最为蓬勃发展的是玉林地区，该地区各县尤以陆川县最为

普遍与深入”，“已成为西南最活跃的一环。”①

在南宁地区，中共南宁党组织对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翰嵩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成功。梁翰嵩参加过北伐战争，受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思想倾向进步，因而受到排挤。1939年初，中共南宁党组织派梁寂溪等人去做梁翰嵩的工作，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梁翰嵩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活动。他协助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把爱国华侨捐献的抗日物资通过广西运送去延安。同年11月，日军入侵桂南，中共党组织建议梁翰嵩成立战时工作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梁接受了建议，并亲自担任战时工作团团长，委任梁寂溪为副团长，同意15名中共党员参加战工团工作。战工团成立后，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慰劳抗日将士，配合部队打击日军，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国热潮。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还派遣一批党员打入桂系当局组建的各种群众团体，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统战工作，并掌握了这些团体的基层实际领导权，发动和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1月，桂系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团（习惯称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利用青年学生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保卫广西。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派党员并带动知识青年参加学生军。在党的推动下，在青年学生中形成了参加学生军热潮。桂系当局原拟成立一个1000多人的学生军团，报名者却近2万人，不得不改变计划，录取4200人，扩编为三个团，并成立广西学生军司令部，夏威兼任司令。由于桂系当局原来只准备建立一个团，后来匆促扩编为三个团，干部来不及配备，不得不依靠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来主持工作。中共党组织利用各团队编组的机会，将90多名党员安排到各队去，结果全军29个男中队有23个中队有党员，3个女中队都有

① 《救亡日报》，1939年2月8日。

党员，并大部分当了班长，有的还担任了大队和中队的指导员。各团建立了党支部，队有党小组。[①] 这样，中共党组织实际上掌握了学生军的基层领导权。

学生军建立后，学生军中的中共党组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打击托派和反动分子，保证了学生军的进步方向。中共党组织还积极开展对夏威等学生军上层领导的统战工作。夏威提出学生军的任务是“叫”、“裹”、“打”。[②] 他说的“叫”就是宣传群众，“裹”就是组织群众，“打”就是打日本。党利用这个口号，带领学生去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由于学生军做出了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夏威的信任，使党得以利用学生军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去传播革命思想，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学生军开赴桂东南、桂南等地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带领下，运用各种形式，如街头宣传、墙报、漫画展览、教唱歌曲、演出戏剧、举办夜校、组织救亡团体和抗日游击队等，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桂南会战爆发后，学生军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组织军民合作站，进行战地救护，打击汉奸伪政权，直至参加作战等等。学生军不仅是一支得力的宣传队，而且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受到人民群众和抗日将士的赞扬，被称为“兵王”。[③]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三青团广西支团和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妇会”）的统战工作也卓有成效。

1939年初，广西筹建三青团广西支团时，蒋介石趁机要派人参与，企图控制广西的三青团。桂系抵制蒋的势力进入广西，但又缺乏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广西省工委通过各种渠道，选派党员打进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各

① 《党在广西学生军》，3～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夏威：《学生军的自我认识》，载《广西学生军纪实》，6页，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1940。

③ 《党在广西学生军》，30页。

县分团部工作。周可传等人进入三青团广西支团部担任组训、总务组组长和干事，李云蒿等人进入十几个县的三青团分团部，任主任、书记或股长、股员等职。他们在广西各级三青团组织中，取得了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书记程思远、指导长李任仁等人的信任和支持，掌握了部门和基层的实际领导权。他们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掩护党的活动，团结广大青年，同团内反动分子作斗争；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启发青年觉悟，走革命的道路；宣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开展救亡活动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①]

广西省新生活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领导下于1939年7月1日在桂林成立的广西妇女组织，郭德洁为主任。由于郭德洁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有矛盾，彼此不合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利用“省妇会”急需干部的机会，派遣10名党员进入该会工作，并担任会内各组（队）长。她们利用合法的地位，贯彻党的抗战主张和党关于妇女工作的方针，拥护和支持郭德洁在省妇会的领导地位，争取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在郭德洁的支持下，省妇会进行救亡宣传和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募捐、献金、劳军和举办各种妇女训练班，组织战时工作队、伤兵服务队和救济难童难民等。还出版了《广西妇女》杂志，指导各县妇女团体，发动妇女群众投入抗日，使妇女成为一支救亡的生力军。

总之，抗战爆发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根据广西的实际环境，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采取灵活巧妙的策略，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争取中下层，建立地区性或部门的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发动群众，使广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

① 李朋章：《地下党在三青团广西支团的活动》，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140页。

四、战时广西省政

省、县行政

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为适应战时需要并与国民党中央政制相统一，先后几次对省政府和县政府等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

30年代初期，广西省政府机构还比较简单，后来机构不断增设，人员越来越多。抗战开始后，机构膨杂、人浮于事的状况暴露出种种弊端，不能适应战时需要。1937年后作过几次调整，但效果不明显。1940年新桂系对省政府机构进行较大的改组，裁撤或合并部分厅、处、局和委员会，下放部分工作人员到下级机关，并规定各厅、处内部组织不得超过6个单位，缩小各厅、处的规模。省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9~11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会计处、统计处、审计处、粮食局等。经过改组，省政府机构比较简单灵活，指挥统一，效率提高。

1940年7月，广西省政府正式设立派出机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30年代前期广西设有行政督察区，但不设公署，每区只派行政监督一人，由区民团指挥官兼任。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后，全省仍分12个行政督察区，即桂林、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百色、天保、龙州、浔州、玉林、庆远、武鸣等，各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专员公署机构设一室四科，即秘书室、第一科（民政）、第二科（财政）、第三科（教育）、第四科（建设）。行政督察专员的主要任务是督饬所辖各县政府实施省政府颁布的各项施政，考核各县县长的工作成绩等。1944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广西，省政府西迁百色。是年11月，新桂系为适应当时形势，设立省政府桂东、桂北两个行署，处理桂东、桂北两区的行政。

抗战开始后，广西各县行政组织仍沿袭30年代初的建制，直到1939年，由于桂南形势的紧张才作调整。是年6月，省政府决定废除副县长制，县民团改为县国民兵团，由县长兼任县国民兵团团长。同年11月，省政府颁布《广西省战时各县县政府组织大纲》，对县政府组织又作了较大的调整，县政府只设秘书室和军事、政治两科，分别办理原有各科机关的工作。随后，省政府又规定战区或临近战区各县，分别设置县政府办事处，以适应战时环境。桂南会战期间，邕宁、横县、左县、宾阳、武鸣、上金、绥渌、龙津等县一度设立县政府办事处。此外，省政府还调整了可能沦为战区的各县县长，选派有军事指挥能力的人员充任县长，实行军政统一的战时县政治体制。1940年4月，省政府还设置桂林市，这是民国时期（除30年代初梧州一度设市外）广西惟一设市的城市。

抗战时期，新桂系为适应战时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比较注意培养各级党政干部。抗战开始后广西省政府继续开办县政公务员政治训练班，同时又举办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1938年10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班，选调省、县党部及政府机关的秘书、科长、科员以上人员入班受训。1939年2月，成立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养基层干部。1940年，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停办后，成立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主持全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和考核，在桂林设立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各区设立训练班，各县设立训练所，大力培养干部。

抗战前期，新桂系根据抗战形势，调整和健全各级行政组织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培养抗战干部。这些措施对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七七事变发生后，广西省政府饬令各级政府、学校、机关和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各种抗日团体，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全省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征兵方面，由于全省基层组织严密和有民团组织，动员迅速，先后征调100万兵员开赴抗日前线作战。[1] 群众动员

① 《桂政导报》，12月份，广西省政府，1945。

成绩最显著的是征调民工修筑铁路、公路、机场和工事等，仅到1938年9月，全省动员劳力达1587510人。[1] 动员各界献金献物不计其数，仅广西省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募捐，得现金150万元，布鞋30余万双，棉衣、棉背心6万余件，还有大批金银首饰和其他日用品。[2]

但是，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统治日趋腐朽，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广西各级行政及其官员“日趋浮惰”，“政治风气颓败，社会风气惰落”，“政府与民众之间不无隔阂，军队与民众之间，亦不甚和洽”，抗战初期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已不存在。1942年7月黄旭初发起“革新政治风气运动”，“力谋恢复本省过去刻苦耐劳朴实廉洁之精神”，但“奈惰性已成”，“收效甚微”，[3] 宣告失败。这种腐败政治，是导致后来桂柳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省、县临时参议会

1938年8月27日，广西省政府宣布广西训政工作基本完成，决定自1939年1月1日起为自治开始时期，并颁布《广西各县自治施行办法大纲》。8月31日公布《广西省县临时参议会章程》，令各县于1939年2月以前成立县临时参议会，作为县民意机关。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省临时参议会条例，令各省成立省临时参议会。12月8日，广西省政府通过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候选人提选办法，开始进行提选参议员，筹备省临时参议会。

1939年4月中旬，国民政府电令广西省政府，选定李任仁为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陈树勋为副议长，区文雄为秘书长，白鹏飞等33人为参议员，覃竹饶等18人为候补参议员。5月1日，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成立。5月21日至6月7日，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正式举行。至此，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宣告成立。

---

① 黄同仇：《抗战中之广西的民众动员》，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170页，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② 李一夫：《广西建设之史的发展》，载《建设研究》，第6卷第5期。

③ 《桂政导报》，12月份，广西省政府，1945。

按照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任期为一年，但因桂南会战，不能正常改选，所以第一届参议员延任至1942年1月。1942年10月和1945年1月，进行两次换届。第二、三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仍为李任仁，副议长先后为杨晅、陈锡珖，参议员和后补参议员略有变动。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省临时参议会每6个月开会一次，每次为两星期。广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后，第一届举行6次会议，第二届举行3次会议，第三届只举行1次会议。

各县临时参议会，按广西省县临时参议会章程规定，由各乡镇选出1人为参议员。此外，由县长按本县乡镇数推出若干合格人数，呈请省政府圈定。县参议员任期为一年。县临时参议会设议长1人，副议长1人，每3个月开一次会。县临时参议会的职权，凡县经济、政治、文化、警卫等各项设施，都需经过县临时参议会议决，然后咨送县长分别执行。[①] 1939年2月以前，全省各县临时参议会先后成立。

各乡镇也先后成立乡镇民代表会，由本乡镇内每村街选出代表2人组成。乡镇民代表会设主席1人，由乡镇民代表中选出。

省、县临时参议会和乡镇民代表会的成立，连同抗战前成立的村街民大会，形成了从村街到县、省的各级民意机构，这是抗战时期广西重要的政治设施。这些民意机构的成立，使各方面的人士有了发表意见的讲坛和机会，对抗战是有益的。然而，这些机构并不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首先，从省、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数是桂系当局指派或圈定的，全省2694名县参议员中基本上是过去的政府公务员，工人、农民“可说是竟等于零”，因此各县临时参议会“不能在积极方面注重于人民的衣、食、住问题”。[②] 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说：省临时参议会每次开会，除了几个新闻记者外，并没有人民到会旁听。他指出，“人民对议会如此冷淡，原因虽有若

① 邱昌渭：《广西县政》，261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② 邱昌渭：《广西县政》，265页。

干，但主要的还是参议员之产生并不由于人民推选”，“议员不由他们自动推选，就不会被认为他们的代表，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政府的公务员之一”；[①] 其次，省、县临时参议会只有议事权，没有决定权，决定权仍在省、县政府，政府也不对临时参议会负责，临时参议会不但不能强迫政府执行，亦不能向政府质问，只有询问权。[②] 因此，省、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后，虽议过不少事，提过不少议案，但有利于新桂系的才被政府当局受理，否则被以种种理由拒绝。这样使得不少参议员心灰意冷，有的临时参议会议长几个月不到会一次，参议员不依时办公为数颇多，有的临时参议会开会时缺席人数差不多占二分之一，[③] 临时参议会形同虚设。由此可见，省、县临时参议会虽被新桂系称为“民意”机关，实际上它既不代表民意，也没有什么权力，只不过是新桂系为应付时势而设的政治点缀品而已。

《广西建设计划大纲》

全面抗战爆发后，曾经被称为广西“根本大法”的《广西建设纲领》，实际上已失去了指导方针的作用。抗战中期，鉴于形势的变化，为适应新的环境，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1941年8月1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541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广西建设计划大纲》，作为新时期广西的施政纲领。《广西建设计划大纲》颁布后，广西省政府又于1943年制定《广西建设计划大纲战时三年实施计划》，作为“大纲”的“第一期实施计划”。新桂系宣称经济是抗战与建国成功的重要因素，“经济建设不成功，则其他一切建设皆不免受其影响而落于空虚”，因此《广西建设计划大纲》“特定经济建设为首要”。这样，《广西建设计划大纲》被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指导方针。[④]

---

① 李任仁：《议会三年》，载《建设研究》，第7卷第6期，1942。

② 邱昌渭：《广西县政》，263页，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③ 邱昌渭：《广西县政》，265页。

④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宣言》，第2页，1941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全文分为三部，第一部总纲，第二部各级建设要项，第三部建设实施程序。第一部总纲，确定建设的最高指导原则与目标。最高指导原则为“三民主义”。目标分两个阶段逐步完成，第一阶段为“中华民国之建设，以达到民有民治民享为鹄的”；第二阶段为“世界和平之建设，以达到大同之治为鹄的”。总纲将广西建设纵分为省建设、县（市）建设、基层建设，横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第二部各级建设要项，按省、县（市）、基层三级开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条文。在省建设要项中，经济建设15项，主要是完成土地陈报、放垦荒地、重要企业由政府及地方团体公营、发展粮食生产、建立全省金融网和合作组织、使经济结构组织化等。政治建设9项，主要是完成地方自治、举行户口普查、健全各级行政机构、提倡廉洁风尚、肃清贪污土劣等。军事建设7项，主要是健全国民军事组织、普及国民军事训练、加强保安机关及保安部队、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等。文化建设16项，主要是完成国民基础教育、扩大师范教育、调整和增设中等学校、发展职业教育、充实各级图书馆、发展国民体育、增设其他文化设施等。第三部建设实施程序，规定省、县政府及乡镇公所根据大纲制定贯彻大纲的计划和执行、考核措施。

《广西建设计划大纲》是抗战时期新桂系的重要施政纲领。这个大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首要”，制定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的目标，它对广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当时广西作为抗战后方，担负着对抗战人力物力的支持的任务，因此这个“大纲”的制定和实施对抗战也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广西建设计划大纲》“仅为原则之指示，而无实施进度经费人员各项之规定”，① 实际上许多是空洞的条文。后来虽然制定了《战时三年实施计划》作为“大纲”的第一期实施计划，但这个计划也仅仅是为了应付当时

① 《黄旭初在省临时参议会报告词》，载《桂政导报》，12月份，广西省政府，1945。

形势的应急办法，如经济建设只强调粮食和衣料的生产为“首要”等。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全省沦陷。因此，大纲的计划大多数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广西建设计划大纲》的制定，也反映当时蒋桂矛盾的历史背景。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势力逐步向广西渗透，尤其是财政经济上已基本上控制了广西。新桂系感到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广西终有一日完全被蒋介石控制，因此必须设法保持广西在经济上的一定的独立性，制定《广西建设计划大纲》就是一项重要措施。“大纲”强调“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均权之原则”，“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划归中央者”外，“其有因地制宜之性质划归地方者，由本省地方政府分担建设之”。“大纲”颁布后，新桂系即成立广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接收大部分省营厂矿和农林场，同时将省政府对各企业单位投资股份接收管理。新桂系成立广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招募商股统一办理省营企业，实际上是防止和抵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广西企业的吞并。

第十二章　全国抗日战场上的广西子弟兵

桂军抗日部队原定开赴徐州防守，北上途中正值淞沪战事吃紧，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一七一师奉令改赴淞沪增援。淞沪会战后，桂军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武汉沦陷后，桂军一部由李宗仁率领移驻鄂西北，另一部由廖磊率领留守大别山。抗战前广西推行民团训练，从民团中征兵，因此桂军的军事素质比较好，抗日情绪高昂，作战英勇，许多将士为国壮烈捐躯。桂军英勇抗战曾赢得世人的好评："彼等之勇敢，组织之良好，军事技术之优越，及持久耐战"，国内外军事观察家"深为羡慕"。①

一、血战淞沪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中了国民党军队三分之一的兵力（50余个师，70万人）在淞沪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至9月底，日军在优势的海、空军支援下，展开全线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取守势，主力置于蕴藻

① （苏）《消息报》评论，转引自《救亡日报》，1939年2月16日。

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10月7日，日军主力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企图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蕴藻浜南岸阵地，进占大场，直趋南翔，切断京沪线，迫使国民党军队全线后撤。经数日激战，日军攻占南岸阵地。在此危急关头，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正在开赴徐州途中的桂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改赴淞沪增援。廖磊率第四十八军（辖第一七三、一七四、一七六师）和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于10月15日赶到，奉命投入战斗。经顽强抵抗，反复冲杀，始将阵地稳定，使日军威胁国民党军队东正面作战军侧背的企图未能得逞。

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为消灭南渡之敌并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决定分三路进行反攻：第二十一集团军①以步兵6个旅编为第一路攻击军，由谈家头、陈家行正面攻击前进，保持重点于左翼，第一攻击目标为盛宅、桥亭宅、顿悟寺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西塘桥、东赵家角、西六房之线。第十九集团军之第六十六军编为第二路攻击军，由孟家宅、马家宅正面攻击前进，第一攻击目标为杨家宅、徐宅、唐乔头、卫家宅之线，第二攻击目标为田都、孙家头之线。第十五集团军以第九十八师编为第三路攻击军，由广福、费家宅正面攻击前进，向东南方向压迫敌人，第一攻击目标为老宅、张家宅，其他第一线正面各师除守各阵地部队外，应编成数个有力突击队，向敌阵地要点突击，策应攻击军的战斗。原固守第一线阵地邻接攻击军之各师，应抽调预备队协同攻击军前进，掩护其侧背，另以炮兵作有力支援。

从21日晚8时攻击开始，第二十一集团军向谈家头、陈家行正面之敌发动猛攻，22日晨克复陈家行、桃园滨。此时日军倾全力大举反攻，陈家行以北之敌先以飞机及重炮密集轰击陈家行一线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继以大队步兵由坦克开路疯狂反扑。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抵抗，然工事被毁殆尽，守军损失甚重，北候宅、谈家头、陈家行阵地先后被敌突破。第二十一集团军为夺回得而复失的阵地，三次发起反攻，虽经拼死冲杀，仍无进展。

---

① 由桂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编成。

23日晨，蕴藻浜南岸之敌在飞机、炮兵掩护下以主力向第二十一集团军阵地猛烈攻击。第二十一集团军拼死抵抗，反复冲杀，但因伤亡过大，部队混乱，阵地被敌突破，被迫撤出战斗。26日，中央作战军主力撤到苏州河南岸小南翔地区。之后，日军多次强渡苏州河，均收效甚微。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这就是淞沪会战中著名的“大场之战”。

大场一仗，国民党军队伤亡近20万人，日军伤亡亦达4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坚守，勇猛冲杀，给敌人以重大创伤，停滞了敌人的进攻，同时自身也伤亡2万多人。第一七〇师五一〇旅少将旅长庞汉祯和第一七一师五一一旅少将旅长秦霖“身先士卒，力战冲锋，竟以阵亡”。团长谢鼎新、褚兆周、蔡乾琨等殉国。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然后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中国守军实行迂回包抄，同时苏州河方面之敌亦加紧向右岸攻击，中国守军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夜，上海沦陷。

在上海大军向内地撤退之际，统帅部命令周祖晃率桂军第一七〇师、第一七二师从徐州乘火车南下集结于武进，然后火速转赴吴兴阻止敌人第六师团西进，掩护我大军后撤。两师于11月15日抵达吴兴，17日与西进南浔之敌2万余人在南浔镇附近遭遇，即展开激烈战斗。因为力量单薄，敌不住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守升山市。21日，敌集结重兵猛攻升山市。第一七〇师中将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与敌争夺西山，壮烈牺牲。升山市当日失守，桂军退入吴兴城。24日受敌压迫又被迫撤退。团长韦健森殿后掩护，中弹殉国。桂军退到朱家巷一线阵地，决心死守朱家巷一线，以保证上海大军从50里外的泗安安全通过。25日，敌人飞机、火炮、坦克、步兵一齐出动，向桂军阵地猛扑。桂军以血肉之躯抵挡，坚持到晚上，然后被迫向泗安撤退。次日到泗安收集残部，第一七〇师四个团只剩下一团半，第一七二师也只余一团二营。这时大军已过泗安，桂军遂奉令转移。

上海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虽未负直接指挥之责，但他们对蒋介石死守硬拼的战略颇不以为然。他们向蒋陈述意见：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

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李宗仁并建议将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既设阵地，凭借阵地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京沪，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督战，深知死守淞沪三角地带的危害，数次向蒋建议下令撤退。但蒋固执己见，坚持死守上海，结果损失惨重。

上海抗战后，蒋介石几次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是否守南京的问题。李宗仁在会上力主放弃南京，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认为这样做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沿长江西窜。白崇禧也极同意李宗仁的主张，认为防守南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应当吸取淞沪会战的教训，放弃守点守线的做法，改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并在会前起草了放弃南京的计划。但蒋介石认为南京是首都，又是孙中山陵寝所在，必须防守，再次拒绝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结果，南京很快于12月13日失陷。

二、台儿庄战役前后

日军攻占南京以后，便以夺取徐州为首要战略目标。于是，日军分三路由南京、芜湖、镇江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妄图与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打通南北联系。国民党政府鉴于徐州的安危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全局，决定全力防守徐州，并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沿线的作战。参加徐州会战及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中，有桂军的主力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

面对日军沿津浦线南北夹击徐州的态势，第五战区决定“乘敌分离时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具体部署是：“先拒止南下之敌于黄河北岸，而集中

主力先求击破由南京北上之敌。”李宗仁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津浦南段战场的作战。李品仙除以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置于淮河北岸正面拒敌北进，并以徐道源第十军推进合肥地区、杨森第二十二集团军驻防安庆，以为策应外，以桂军第三十一军担任主攻任务。第三十一军的部署是：一部在浏府附近，主力在红心铺、凤阳一带，对沿铁道线北进之敌实行侧面攻击，将敌切断分割包围而歼灭之。1938年1月18日，日军进占明光镇。2月1日，敌搜索警戒部队占领临淮关，于是敌以大部队沿铁道两侧向蚌埠进击。第三十一军认为时机已到，乃由红心铺、凤阳一线向敌之侧后发动突然攻击，将敌切成两段，鏖战两日。但终因力量单薄，未能彻底发挥侧击之效，于是主动撤至定远、浏府、考城一带，对敌牵制。至2月6日，第二十一集团军自江南赶到合肥，8日即分两路再次向敌出击。第三十一军对浏府、考城、蚌埠之敌进攻；第七军由定远、红心铺向铁道线进击，遮断敌后方联络线；第四十八军攻击第



指挥台儿庄大战的李宗仁



李宗仁（左）、蒋介石（中）、白崇禧（右）在徐州前线

三十一军右翼之敌，协同第三十一军作战。经激烈战斗，毙敌千余，击毁敌战车十余辆，并一度收复凤阳、考城。日军被迫停止北进，津浦路南段遂成对峙状态。3月9日，第三十一军取代于学忠部担任淮河北岸的防守。

台儿庄决战时，南敌再度北犯，遭到第三十一军顽强阻击，日军始终未突破固镇以南一带阵地。津浦路南段阻击战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徐州的战略计划，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5月初，日军对徐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路之敌以主力循涡河北上，企图切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西退之路。桂军第十一、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敌激战，阻滞了日军的进攻，为徐州地区大军撤退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第一七三师副师长周元率部死守蒙城，与2000多名将士壮烈殉国。

三、“保卫大武汉”

日军占领徐州以后，又集中重兵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攻占武汉，迫使中国屈服。中国军民展开了惊天动地的“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针对日军溯江而上的态势，中国军队集中第五、第九战区4个兵团约100万部队，展开武汉保卫战。第九战区所部27个军，分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和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负责长江南岸的防守；第五战区23个军，分为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负责长江北岸的防守。

7月26日敌人攻占九江以后，开始分五路向武汉进攻。在江南方面，一路沿瑞（昌）武（昌）路西进，迂回武汉之南；一路沿南浔路向南，攻占德安以掩护其左侧背。在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别山南麓，经太湖、宿松、黄梅、广济、黄岗从正面向武汉进攻；一路沿大别山北麓经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迂回武汉之北；一路经六安、霍山越大别山出麻城、黄陂，从东北方面压

迫武汉。再以海军溯江西上。

正在这时，李宗仁因牙病复发住院，白崇禧奉令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为阻止长江北岸日军西进，白崇禧将所属各部分为左、中、右三军团。右翼由李品仙指挥，下辖第三十一军（韦云淞）、第八十四军（覃连芳）、第二十六军（肖之楚）、第八十六军（何知重）、第八十七军（刘古膺）、第五十七军（曹福林），任务是"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中央区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第四十八军（张义纯）、第十军（徐源泉）和豫皖地区游击队及皖省团队，任务是"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之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左翼由孙连仲指挥，下辖第三十军（池峰城）、第四十二军（冯安邦）、第五十一军（于学忠）、第五十九军（张自忠）、第六十八军（刘汝明）、第七十一军（宋希濂）和第十七军（冯治安），任务是"逐渐诱敌西进，并结集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①] 其中，桂军4个军的部署如下：第八十四军守备黄梅以南的长江沿岸地区；第三十一军以两个师位置于宿松、凉亭、太湖一带地区，阻击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其余一个师位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第七军在立煌（今金寨）源波疃、霍山之线，阻止合肥西进之敌，固守立煌根据地；第四十八军转进至张家塝附近，占领待机阵地，侧击由大别山南麓西进之敌。

7月下旬，安庆、潜山日军开始向黄梅、宿松进攻，遭到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的顽强抵抗；同时，日海军陆战队向九江对岸的小池口第六十八军防地进犯，26日陷小池口。在南北日军的夹击下，桂军等予敌以迟滞后，即主动撤出战斗。黄梅、宿松遂于8日初陷敌。

敌占黄梅后，右受中国军队瞰制，左为长江及湖沼所限，西进困难。此时，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位置于黄梅西北团山河、破山口、大河铺、苦竹口、渡河桥一线，取守势，意在阻敌西进；第三十一军、第七军、第十军

① 《白崇禧回忆录》，142～143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及川军一部控制于黄梅东北、太湖、潜山西北的高地，取攻势，意在由侧面攻击潜、太、宿之敌。26日，第七军、第十军反攻潜山、太湖，经一昼夜激战，将两地收复，28日再下宿松。28日、29日，正面第八十四军、第六十八军复开始向黄梅之敌攻击，激战两昼夜。“敌据险顽抗，攻击迄少进展，唯予敌以重创，死伤累累，惜我之伤亡亦重。”①

8月23日，日军开始反扑。8月31日和9月1日、2日，“敌分数纵队向我八十四军及刘军团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我军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驿、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② 经此激战，“第八十四军损失已达二分之一以上”，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伤亡亦在二分之一”；③同时，潜山、太湖、宿松又告失陷。

9月2日晚，中国守军将正面阵地撤回第二线阵地，以第八十七军固守团山河、观音寨、兰家湾、兴隆寺、大佛寨既设阵地；以第八十六军六团固守笔架山、田家寨、南无井阵地；以第三十一军之第一三五师两团扼守生金寨、鼓山寨、该湖山之线；以第八十四军沿后湖寨以东经鹅公岭至大洋庙土包之线；以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撤回荆竹铺附近整理后，策应第一三五师并以一部增强正面之兵力；以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一师置于广济为总预备队。日军继续进攻，双方在黄（梅）广（济）一线展开激战。9月6日，敌对广济猛烈攻击，防守广济的第八十四军、第三十一军经顽强抵抗后，于是日夜向广济西北一带高地撤退。为支援广济保卫战，第四十八军向黄梅侧击日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

9月7日，第四兵团发布“广济附近第二期会战计划”，具体部署是：第八十六军和第五十五军为守势部队，在广济西方设防，拒止向西突进之敌；

① 《国民党第五战区关于武汉会战长江北岸之战斗经过概要》（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五）2653。

②③ 《李品仙关于武汉会战广济附近作战经过电文》（1938年9月3～7日），《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二五）3469。

第二十六军位置于广济和田家镇之间，对由广济沿公路西进之敌攻其侧背，对直接攻击田家镇侧背之敌尽力拒止之。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和第八十四军为攻势部队，“应协同友军对黄梅经广济至界岭公路沿线之敌，由北向南不分昼夜不断地猛烈攻其侧背，务压迫敌人于其背后联络线外”。其中，第三十一军（附第一七六师）“应即以有力之一部推进广济北方，沿公路北搜索敌情，其余部队保持重点于两翼，对向西或向南突进之敌断行攻势，以一部固守要点并构筑工事”；第八十四军除第一八九师同现任务及行动外，其第一八八师“以有力之一部对公路沿线地区搜索敌情，其余主力保持机动，对向西突进之敌，不分昼夜攻击其侧背，遮断其后方联络”。①

9月8日，第三十一军、第八十四军对敌侧背发动攻击，盘驻广济之敌仓皇败走，桂军乘胜收复广济。次日，敌增兵反攻，广济得而复失。此后，敌我遂相持于广济界岭之线。

9月16日，敌水陆两路向武穴夹攻。19日陷武穴之后，续攻田家镇要塞。为策应田家镇的防守战，第四十八军等侧击进攻田家镇之敌，激战旬余，大有斩获。至9月28日，已攻至田家镇附近，将敌压迫于黄泥湖地区。惟田家镇守军已抵不住敌人的猛攻，于29日退守蕲春，田家镇遂告失陷。桂军见策应无效，乃退回广济附近阵地。

敌陷田家镇后，继续西犯，但因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由北向南压迫，截断敌交通线，威胁敌后方，使敌一筹莫展，敌我双方成胶着状态。但这时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之敌进展迅速，并已于10月12日攻占信阳，长江南岸之敌也大举进攻。长江北岸之敌乘机西犯，陷蕲春、黄岗，直逼黄陂。武汉已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中国军队全线撤退。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遂告结束。

武汉会战后，桂军一分为三：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辖第七、第四十八军）留守大别山；李品仙率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

① 《李品仙关于武汉会战广济附近作战经过之电文》（1938年9月3~7日）。

包括钟毅第一七三师、张光玮第一七四师、凌压西第一八九师）驻防鄂西北；因第三十一、第四十八军伤亡过重，乃把第三十一军士兵拨给第四十八军，其余官佐由韦云淞带回广西，经征兵补充，重新成立第三十一军，辖贺维珍第一三一师、苏祖馨第一三五师、魏镇第一八八师。同时，第四十六军在广西成立，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夏威兼任军长，辖黎行恕第一七〇师、冯璜第一七五师、黄固新第十九师。1939年夏，以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合编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任总司令，韦云淞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一军军长，第四十六军军长由何宣继任。

四、拱卫鄂西北

1939年4月，日军为扫荡第五战区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集中第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共约10余万人，分三路向随枣地区进攻：中路沿襄（阳）花（园）公路西进，南路循京（山）钟（祥）公路和汉水东岸北上，北路自信阳向桐柏、唐河方向前进。李宗仁判断敌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即以主力的第八十四军、第十三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防守正面随枣一线（三军均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防守大洪山以南及以西汉水两岸；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防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以第三十九军防守大洪山，形成一孤立据点，牵制敌军行动，归第十一集团军指挥；以随后赶来增援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进驻桐柏山南麓，意在以桐柏山为依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正面守军将敌人主力引入随枣地区后，即一举截断襄花公路，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在随枣正面，第八十四军位置于鹿头镇、吴山店地区占领阵地，并与第十三军联系，准备予敌侧背攻击；第十三军向唐店、大山庙、天河口、高城间占领机动阵地，掩护守军左翼，并准备对敌侧背攻

击；第四十五军之第一二五师集结于茅次畈、朱家集、长岗岭地区，准备策应右翼方面的作战，同时与第三十九军保持联络。

4月30日，敌第三师团由安陆、应山方面向第八十四军正面攻击。该军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于郝家店、徐家店与敌激战一昼夜后，撤退至塔儿湾阵地继续抵抗。5月2日，敌续攻塔儿湾和第十三军阵地。在敌人机械化部队的疯狂进攻面前，桂军等奋勇迎击，据壕死守，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与敌发生激烈阵地争夺战，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7次之多。战至4日，塔儿湾阵地陷入敌手，第十三军方面的高城镇阵地也受敌人压迫而放弃。左翼方面守军遂移至漂水西岸防守。5日、6日，敌分别向天河口、白庙镇及江家河、庐山之线攻击。桂军等拼死抵抗，敌进展甚微。

敌人见正面不易得手，便加强了南北翼的攻击。南路经大洪山西侧沿汉水东岸北上之敌，这时已突破第一二七师和第一八〇师防守的长寿店及丰东镇一带阵地，迅速向北推进，并于6日窜至襄阳对岸的张家湾附近；北路日军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日军会师枣阳，包围中国守军于桐柏山、大洪山中间地带。第十一集团军为避免被敌军围歼，令第八十四军立即脱离战斗经随阳店向唐河转进；第十三军仍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区，相机以攻势行动攻击西进之敌，并切断敌后方联络线；第三十九军仍留驻大洪山一带，牵制西进之敌，相机向敌后采取攻势。第八十四军遵令迅速转移，随县、枣阳随之陷敌。

5月9日，第八十四军到达唐河附近，奉令即在唐河、南阳之间选择阵地，阻止北进之敌。第十三军一部也在泌阳附近占领阵地，准备迎敌，随后第二集团军到达南阳。16日，第八十四、第十三军和第二集团军开始反攻，敌包围圈内的第十三军一部和第三十九军相呼应，第三十三集团军也过汉水向东出击，汤集团军亦自豫西南下。15日开始总反攻。敌因轻装突进，补给困难，敌不住中国军队的内外夹击，至18日开始总退却。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失地乃告收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仍分三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敌军主力即配置于此线”。[①] 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

5月初，敌步骑万余，炮30余门，战车、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桂军等奋起抵抗，双方激战甚烈。敌藉飞机、炮火的掩护，并以战车、装甲车开路，由凉水沟、万家店等处突进，桂军等节节阻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至5月6日，双方激战于澴潭、何家店、净明铺、尚市店、江家河。为确保枣阳，掩护襄樊，协同友军歼击新街之敌，并为避免被敌人包围，李宗仁令变换阵地：第八十四军以有力部队于净明铺、唐县镇、兴隆集南北各线节节抵抗，迟滞敌之西进，主力转移于土桥铺、枣阳、鹿头镇之线及吴家店、兴隆集、枣林店之线前进阵地作战；第四十五军除以一部于三里岗、澴潭逐次抵抗外，主力取捷径速转移于七房岗兴隆寺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

部署甫定，随枣之敌即倾全力向前突击，第八十四军节节抵抗，迄7日仍相持于兴隆集、枣林店一线。7日晚，日军突破双沟阵地。次日晨，日军由双沟分途进犯，一部向七房岗，一部经程家河向刘家寨，一部经三合镇及吕堰镇附近向新野。第八十四军陷入包围，一度失去联络。因第八十四军“连日战斗，伤亡颇重”，[②] 黄琪翔（新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令其突出包围圈于老河口东之石桥、张家集、巨兴集、薛家集间整理待命。“一七三师师长钟毅奉令由枣阳向西突围，节节被敌截击后，随行仅余一营，复在苍苔镇与敌步兵千余遭遇，结果该营亦被冲散，仅余四五十人。行至苍苔西北约10余里地方，又遇敌骑兵数百袭击，虽经拼死抵抗，终以弹尽，全部壮烈牺牲，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40年4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3）。
② 《黄琪翔致蒋介石电》（1940年5月11日），载《历史档案》，1985（3）。

钟师长亦饮弹自戕。”[1]

5月31日，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在欧家庙渡过襄河南下，6月5日又在沙洋向南北强渡西犯，形成南北两路夹击宜昌之势。6月12日，日军侵入宜昌。国民党军队力图反攻宜昌，但未奏效。6月24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宜昌。第二次随枣会战至此结束。



钟毅师长遗像

1940年11月，日军第三次进攻随枣地区。李宗仁率部奋起抵抗。第八十四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自11月24日至30日，经七昼夜苦战，粉碎了日军的进犯。

五、战斗在大别山区

1938年2月13日，李宗仁在安徽省会所在地六安宣誓就任安徽省主席，开始了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

李宗仁就职伊始，制定了对安徽统治的基本方针政策。在《告全省民众书》中，李宗仁表示，他这次到安徽来，目的在发动安徽省人民的力量来保卫安徽，保卫中华民族，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为此，李宗仁发布施政方针：“总求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李宗仁并在《致全省各机关勖以三文电》中，要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做到“不苟免”、“不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40年5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3）。

苟得”、“不苟安”。①

李宗仁上任之初，对安徽省政府进行了局部改组，建立起对安徽的统治机构。第四十八军副军长（旋升军长）、原籍安徽、属桂系外江派的张义纯出任民政厅长并代理省政府主席，民主人士章乃器出任省政府委员代理秘书长。另成立皖南行署，派省府委员戴戟为行署主任。其他仍旧（财政厅长杨绵仲，教育厅长杨廉，建设厅长刘贻燕）。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率五战区长官部进驻鄂西老河口，所遗安徽省主席一职由廖磊继任。廖磊于1938年10月24日接任后，对省政府进行了改组：调陈良佐任民政厅长，任命朱佛定为省府秘书长，章乃器为财政厅长，蔡公望为建设厅长，方治为教育厅长。1939年10月，廖磊病故。1940年1月，李品仙到安徽接任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担任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样，安徽党政军大权操于李品仙一人之手。李品仙对人事重新作了安排，一批湘籍人员（如苏民、杨绩荪等）得到重用。

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进一步加紧。桂系对安徽的统治，是以军事实力作后盾的。李宗仁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初，除了第五战区部队陈兵豫鲁苏皖广大地区外，桂系的两个集团军进驻安徽：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寿县，下辖第三十一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合肥，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徐州会战后新成立第八十四军，隶属于第十一集团军。武汉会战以后，第十一集团军（辖第八十四军）随第五战区长官部撤往鄂西驻防（第三十一军调回广西），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守大别山区。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部署，第二十一集团军负责坚持豫、鄂、皖边区的敌后抗战，确保大别山抗日阵地，并对付这一地区的新四军。

武汉会战结束后，第二十一集团军即以立煌为中心，向横贯豫、鄂、皖三省的大别山区展开。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立煌，总司令廖磊（廖磊病故后李品仙接任），副总司令先后由张义纯、张淦等人担任，参谋长先后由徐启

① 民团周刊社编：《焦土丛刊》第4辑之2，9、25页，1938。

明、陆荫揖、钟纪等人担任。下辖第七、第四十八军，1942年后增加第八十四军。第七军军长张淦（1943年调任集团军副总司令，遗职由参谋长徐启明接任），初辖第一七一师（师长漆道征）、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1941年将原属第八十四军的第一七三师（师长粟廷勋）调到大别山，改隶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纯（1940年调升集团军副总司令，由区寿年接任军长），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后为谭何易）；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辖第一七四师（师长张光玮）、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

从1938年至1941年，第七军守卫豫、鄂山区，军部在滕家堡；第四十八军守卫皖省山区，军部在深沟铺。两军的作战地带为豫、鄂、皖省界南北之线。1942年第八十四军调入大别山区后，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各军部署又有变动：第七军军部设独山，全军驻防皖中；第四十八军军部设岳西，全军驻防皖西；第八十四军军部设河南商城堡，全军驻防豫、鄂。

桂系在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其中，以程汝怀指挥的第五战区4个游击纵队担任鄂东外围的游击；以李盛宗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十一、第十四两个游击纵队及第七独立支队担任皖西北外围的游击；以李本一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及一个正规师担任皖东的游击；以黄师岳指挥的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担任桐（城）怀（宁）外围的游击。

1943年，国民党政府设立鄂豫皖边区游击总部，由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担任总部总司令，统一指挥鄂豫皖边区的正规部队、游击部队和保安团队，大别山及其外围地区的军事力量遂全部掌握在新桂系手中。

新桂系对安徽的统治，在抗战初期，有“某个时候的进步”，“对于抗战曾给了很大帮助”。[1] 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比较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

①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99页，1957年重印本。

运动。

“在华中各省，安徽要算是民运有成绩的一个地方。”①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伊始，即在“动员民众，焦土抗战”的旗帜下，筹备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后改为安徽全省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动员委员会）。1938年4月，“动委会”在六安正式成立，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章乃器任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组织、宣传、情报、后勤等部，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分子朱蕴山、沈子修、光明甫、周新民、狄超白、张劲夫等分任各部正副部长，先后任“动委会”委员的有100多人。“动委会”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指导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全权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安徽民众抗日运动，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动委会”在各区设有办事处，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办事处主任；各县有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以下还有区、乡、镇分会，分别由区、乡、镇长兼任主任委员。

在新桂系的领导下，安徽的群众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各级各类群众抗日组织纷纷成立。据1939年7月底的调查统计，全省各级“动委会”、抗敌协会、抗敌团队共达4223个，各级“动委会”委员、抗敌协会会员、抗敌团队员共计462742人。其中，农民抗敌协会声势最大，安徽“农民青年参加者很多，一县之农抗，往往有数万民众参加”，进行“协助政府除奸，铲除土劣等事”。②

安徽的群众抗日武装开始包括县乡镇游击队和各路人民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2月27日，李宗仁授意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颁布各县乡镇自卫队组织训练办法，要求18岁至45岁的壮丁均编入乡镇自卫队，县成立自卫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保家卫国。此后，安徽各县乡镇自卫队纷纷成立。同时，新桂系还把安徽各地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张义纯任总司令，下辖6路，分别以石寅生、李武德、郭造勋、岳相如、余亚

①② 何伟：《安徽目前的动态》，载《新华日报》，1939年3月27日。

农、宋邦翰为总指挥，每一路相当于师的编制，指挥部下设立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各路自卫军共编练约4.2万人枪。

李品仙主皖以后，把广西的民团制度搬到安徽，将18岁至45岁的男子，依地区划分，编成国民兵团。国民兵团以一个行政督察区为单位，各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对其辖区内的国民兵统一指挥。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乡镇长兼国民兵团大队长，保长兼国民兵团中队长。

对于安徽的民众武装，《新华日报》曾赞扬说：这“真是我们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这些民众武装，潜伏在城市中、村庄里、山林间，不知有多少。表面上的力量是看不见，在实际上的力量是说不清。”“安徽的民众武装，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敌人万想不到的。在敌人心目中，以为炮火所及的地方，我们民众都会逃跑的。哪里知道安徽的民众是家家有枪，人人是兵，一见敌人，便把敌人打得走投无路。”①

抗战初期，新桂系在安徽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新四军一度在立煌设有办事处，具体负责与新桂系的联系事宜。桂军与活跃在大别山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经常互换情报、物资，并曾在战场上共同对敌作战。1939年端午节前的突袭安庆，就是桂军与新四军合作对敌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还应邀到新桂系所办的干训班演讲。廖磊曾许诺每月补助四支队给养2万元，并公开表示：“四支队是我们的友军，新四军是有理智的。”“他们帮助我们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我们不但不应该猜疑他们，还应该诚诚恳恳向他们拜谢。”②

---

①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278、279页，1957年重印本。

② 安徽省动员委员会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编：《廖主席言论集》，31页，中原出版社，1939。

第十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和桂南会战

1939年11月，日军偷袭桂南，在钦防登陆后，沿邕钦公路进攻南宁，南宁迅速沦陷。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收复南宁，调集军队进行桂南会战。中国军队以南宁为中心，大规模对入侵日军作战。经过半个多月的英勇奋战，中国军队攻占南宁外围的重要战略要地昆仑关，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失败后迅速增兵桂南，反攻昆仑关。中国军队防御战略失误，在强敌反攻面前仓促应战，被动挨打，昆仑关重陷敌手，以收复南宁为目的桂南会战失败。桂南会战期间，桂南人民群众纷纷参战支前，配合军队打击侵略军。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盘踞桂南的日军自动撤退，桂南收复。

一、日军钦防登陆，南宁沦陷

广州、武汉失陷后，沿海沿江工厂内迁广西；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文化人士纷纷来到桂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任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对日作战，桂林成为西南

军事重镇；从广西通往越南海防的交通线成为我国与国外联系的惟一出海通道。广西日益发挥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因此，广西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

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后即准备进攻广西。日军进攻广西的目的是：占领南宁，切断桂越公路，阻止国外援华战略物资输入，威胁柳州、桂林、贵阳、重庆、昆明，迫使中国尽早屈服，结束战事。4月，日军第五师团在青岛附近进行登陆作战训练，随后调至海南岛作进攻广西的主力。同时，日军在钦州湾附近侦察登陆地点，测量水位，封锁海上交通。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命令驻华南第二十一军乘中国军队主力集中湖南之机，执行切断南宁——龙州交通线的作战任务，作战时间定为11月中旬。① 日军进攻桂南，采取声东击西秘密偷袭的战略。11月上旬，日军近卫混成旅团自日本国内增援广东后，第二十一军在粤西四邑蠢动，摆出由粤西进攻广西的姿态，迷惑中国军队，而第五师团等部在钦州湾突然袭击，强行登陆。

国民党军事当局对日军进攻广西存在麻痹情绪。桂林行营认为，日军近期无力开辟新战场，其战略是在珠江流域维持几个据点，在长江流域维持几条交通线，在黄河流域努力扫荡游击队，以造成“以战养战”。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更是认为日军在湘北新败，目前无力发动新攻势，蒋介石也判断日军不会进攻北海。③ 因此，国民党军事当局对日军在钦州湾活动的情报未予以重视。随着日军在南海活动日益频繁，桂林行营才意识到日军有进攻广西的企图。但认为如果日军进犯广西，必以海南岛为基地，以柳州为目标，其主力从广州湾登陆窜经玉林、贵县，攻略柳州。④ 当时驻桂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4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白崇禧：《敌人战略的演变与吾人之对策》，载《建设研究》，第1卷第6期。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218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④ 覃戈鸣：《第三十一军桂南抗战经过》，载《广西抗战亲历记》，19页，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南的第十六集团军总部的参谋人员力持异议，认为南宁是我对外交通的要道，战略上的要点，必为敌方所注意，敌人如进攻广西目的必在南宁。从钦州湾到南宁路程最短，因此敌人由钦防登陆，沿邕钦路进攻南宁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个意见未被重视。军委会军令部派来校阅第三十一军参谋业务的人员还斥责说："一个小参谋懂得什么！"①

国民党军事当局根据上述敌情判断部署桂南的防御。当时国民党军在桂南和广东南路只有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两军6师。集团军总部设在贵县南山。第四十六军军部驻南宁，新十九师驻钦县、防城一带，第一七五师驻合浦、北海一带，第一七〇师驻贵县附近。第三十一军是参加徐州会战后调回广西整补的部队，军部驻桂平附近，第一三一师驻桂平、平南之间，第一三五师驻大湟江口一带，第一八八师驻平南附近。第十六集团军4个师摆在贵县、桂平、平南一带，一边整训，一边构筑工事，准备拒止敌窜犯柳州。而邕钦路方面只有新组建的新十九师，兵力单薄，南宁基本上是空虚的。11月初，桂林行营获悉广东日军在粤西四邑蠢动，认为日军由粤西攻略广西的判断得到证实，即令第三十一军由桂平、平南出发，开往粤西新兴、开平、阳江、阳春等地布防。

国民党军事当局对敌情的判断及其防守部署，正中日军声东击西之计，造成后来作战陷人被动的局面。11月上旬，日军第五师团、台湾旅团陆续从海南岛运抵钦州湾，附有航空母舰2艘，舰船50余艘，飞机100余架，兵力共3万余人，做好进攻广西的准备。11月15日凌晨，日舰猛烈炮击防城企沙。上午8时，第五师团一部在海、空军掩护下强行登陆，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下午1时，日舰炮击钦县龙门，台湾旅团一部登陆，被我守军击退。16日午后，日军一部利用黄昏在钦县黎头咀登陆，与我警戒部队激战。日军还分别在金鸡塘、沙井、辣椒槌等地登陆。钦防沿海中国守军对人侵敌人进行

① 覃戈鸣：《第三十一军桂南抗战经过》，载《广西抗战亲历记》，20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顽强的抵抗，海滨滩头变成血池火海。但敌众我寡，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攻击，阵地被轰毁，官兵伤亡惨重，被迫后撤。登陆日军同时围攻防城、钦县。16日晚，防城、钦县同时失陷。日军攻占防城、钦县，巩固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继续登陆。18日上午，日军一部攻击北海，以牵制北海、合浦中国守军，阻止其西去阻击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向邕钦路进攻。19日，第五师团主力自钦县向小董进攻，另一部向大寺进攻。台湾旅团自防城向大直、贵台进攻，然后三路会合沿邕钦路向南宁急进。

日军钦防登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尚在重庆，白急报蒋介石。蒋令桂林行营拒止日军北进，保卫南宁。桂林行营一面令第四十六军固守南宁，一面急令第三十一军停止东进西援南宁，并令杜聿明第五军由湖南衡山和桂北增援桂南。这时邕钦路上只有新十九师，该师大多数是新兵，战斗力很差，连战几日损失惨重，溃不成军。日军击溃新十九师后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22日逼进邕江南岸。与此同时，日机几十架对南宁南北地区轮番轰炸。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和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日夜兼程赶到南宁，在邕江北岸构筑工事，准备阻止敌人渡江。但城防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已开始渡江。22日晚，日军在良庆思源塘偷渡，被中国军队击退。次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分由良庆、蒲庙、亭子等处强行渡江。邕江北岸中国守军阵地是临时修筑，被敌机炸毁，未能阻敌渡江。24日，过江的日军从东、西向南宁夹击。中国军队进行英勇抵抗，但腹背受敌，战至下午2时，日军突入市区，中国军队撤出南宁，分向邕武、邕宾公路转移。日军占领南宁后，兵分两路继续进攻。一路沿邕武路追击，28日陷高峰隘。一路沿邕宾路推进，当推进至二塘时，第五军第二〇〇师第六〇〇团从全县赶到与敌遭遇，发生激烈战斗。第六〇〇团官兵奋勇杀敌，一次又一次击退日军进攻，团长邵一之阵亡。日军向第六〇〇团迂回包围，切断退路，该团被迫撤退转移。日军沿邕宾路继续进攻，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日军攻占高峰隘和昆仑关后，巩固了南宁外围的战略据点，攻势告一段落，敌我形成对峙局面。

二、昆仑关鏖战

南宁迅速沦陷，重庆震动。蒋介石感到日军入侵桂南事态严重，不但桂越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果敌北犯柳州，西攻百色，将威胁滇黔和重庆。蒋介石指示桂林行营组织反攻，乘敌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国民政府军委会从粤湘赣鄂黔等省调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蔡廷锴第二十六集团军、邓龙光第三十五集团军和叶肇第三十七集团军共15万余人增援桂南，会同夏威第十六集团军，反攻收复南宁。11月19日，白崇禧由重庆飞返桂林。20日，白崇禧指示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队，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入侵之敌。26日，白崇禧到迁江县扶济村设立行营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反攻作战计划。

日军占领南宁后，第五师团司令部及第九旅团驻南宁，台湾旅团警戒邕钦路，保护补给线，第十二旅团两个联队守昆仑关和九塘至南宁的邕宾路，另以一联队守高峰隘至南宁的邕武路。12月上旬，白崇禧在迁江行营指挥所连日召开军师长会议，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制定“一面向邕江南岸用战略包围，一面在北岸用翼侧战术包围”① 的反攻作战方针，先夺取昆仑关，然后各路会攻收复南宁。12月15日，桂林行营向各参战部队发出作战命令：“以攻击北犯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为十二月十八日。”② 参战部队分东、西、北三路军：西路军，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总指挥，

① 白崇禧：《抗战中敌我战法演变》，8页，中央训练团，1942。

② 《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关于南宁会战经过之战报》，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室档案，（二五）1831，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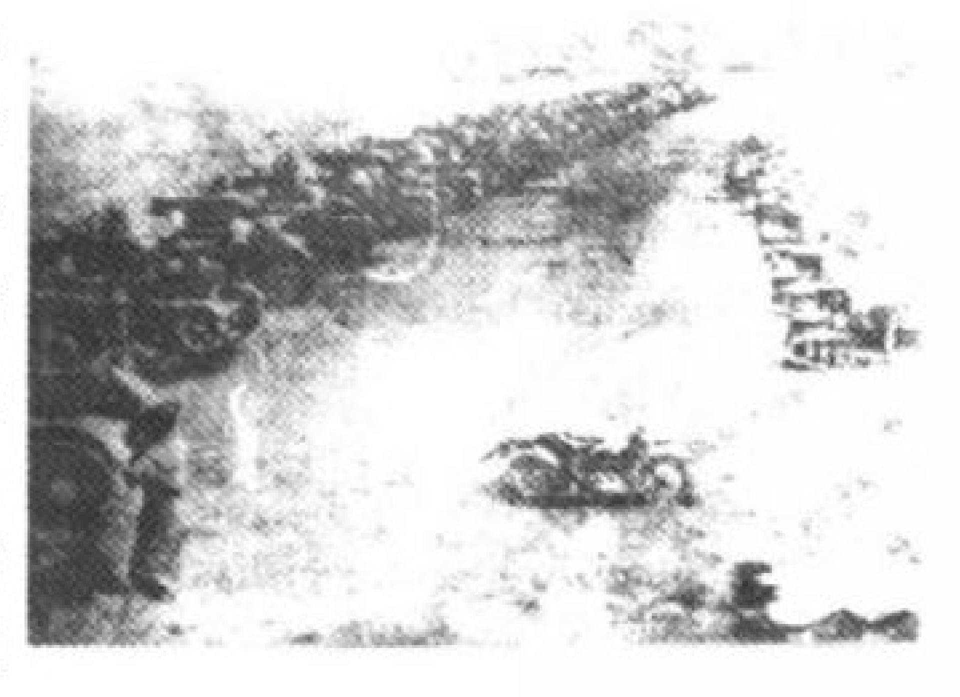
辖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第一七〇师。分两个纵队，第一纵队进攻高峰隘之敌，并向四塘、五塘出击，协同北路军进攻昆仑关；第二纵队向苏圩、大塘出击，切断邕钦路北段，阻击敌北上增援。东路军，以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为总指挥，辖第六十六军、第四十六军（欠1师）、挺进第三支队等部，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出击邕钦路南段，破坏交通，截击敌之后续部队。北路军，以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为总指挥，辖第五军、第九十九军一个师，从宾阳方向包围攻击昆仑关守敌，而后协同东西路军进攻南宁。另以第九十九军主力为战略预备队，置宾阳古辣附近。还有炮兵、空军、工兵队配合作战。蒋介石从重庆派来陈诚、李济深，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

12月18日凌晨，各路军按预定目标向日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以收复南宁为目的的反攻战斗开始了。作战第一阶段主战场是在昆仑关。在这里，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空前惨烈的高地争夺战。

昆仑关位于邕（南宁）宾（阳）公路的中途，离南宁约40公里，至宾阳30多公里。邕宾公路两端的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而昆仑关四周群山叠嶂，绵亘相依，悬崖深谷，公路进入这个地区迂回曲折，昆仑关雄踞于两山之间，地势险要，控制着邕宾公路，如食道之咽喉，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昆仑关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南宁外围的重要战略据点，历史上南宁有事昆仑关必成为攻守两方胜败的关键，要守南宁必先守昆仑关，要攻南宁必先取昆仑关。

日军深知昆仑关的战略价值，是南宁存亡之所系，因此以重兵把守。守军是日军精锐第五师团，该师团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慓悍，长期受武士道训练，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战斗攻守经验丰富，在开辟华南战场前经过几个月山地作战训练，在这次进犯桂南中是主力。除以精兵守关外，日军在昆仑关四周的仙女山、老毛岭、同兴堡、界首、罗塘和四四一、六五三、六〇〇等高地修筑据点式的堡垒工事，外围有数道铁丝网，构成拱卫昆仑关的坚固防线，并以轻重机关枪编成火力网，各阵地以火力互相支援。还附有炮兵、机械化部队协助防守。

担任对昆仑关主攻任务的中国军队是第五军。该军是抗战时期建立的国民党军第一个机械化部队，军长杜聿明，辖荣誉第一师、第二〇〇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军直属队有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装甲车搜索团、重炮团、汽车兵团、工兵团、辎重团，并有苏联顾问帮助训练，是一支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第五军奉命担任主攻昆仑关作战任务后，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会议，部署各师团战斗任务。第五军采取“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以荣誉第一师、第二〇〇师为正面主攻，攻击昆仑关和九塘各据点守敌，军重炮团、战车兵团、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作战；以新编二十二师为右翼迂回支队，越过昆仑关，抄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南宁至昆仑关之间公路交通，堵击敌增援部队北上；以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彭璧生指挥两个步兵补充团协同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为左翼迂回支队，由马岭圩向七塘、八塘迂回，袭击该地守敌，策应正面部队对昆仑关的攻击。①



参加攻打昆仑关的中国军队战车部队



中国军队攻占昆仑关

① 郑洞国、郑庭笈：《昆仑关攻坚战亲历记》，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9辑，5页。

总攻开始后，第五军集中炮兵火力对昆仑关及其周围的敌人阵地进行猛烈炮击。守敌亦以炮火抵抗。枪炮之声，喧天动地，四野弥漫着硝烟。在我军远程重炮火力压迫下，敌炮兵中断射击，第一线攻击部队荣誉第一师在战车掩护下向敌阵地发起冲锋。战斗开始不久，敌机乌鸦般一群群地疾飞而来，在我军阵地上盘旋，企图袭击我地面步兵，遭到我军高射炮兵射击不敢低飞。荣誉第一师是由抗战伤愈的官兵组成，因此加上“荣誉”二字。官兵久经战阵，士气旺盛，英勇顽强，冒着枪林弹雨奋力冲向敌人阵地，同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搏斗，先后占领了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高地等。午后又占领罗塘、石家隘等，一部进逼九塘附近。敌人不甘心失败，下午4时许，敌战车2辆、装甲车1辆、汽车10余辆、骑兵数十由八塘经九塘向昆仑关增援，猛烈反扑。荣一师与敌激战至晚，伤亡严重，大部分阵地复被敌夺去。

19日拂晓，荣一师继续对正面之敌攻击，敌我在六五三高地展开激烈争夺战。六五三高地为昆仑关东北要点，瞰制全战场，敌以200余人据守。荣一师初由正面攻击，继分击敌之两侧，受到敌火力猛烈侧射，官兵伤亡及半，攻击陷于顿挫。此时敌正欲乘势逆袭，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奋不顾身，携手榴弹率众直冲敌阵地，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剧烈，敌伤亡殆尽，我军遂占领该阵地。

担任右翼迂回作战的新二十二师，绕过昆仑关向五塘、六塘急进。18日晚先头部队驱逐五塘、六塘之敌并占领之，一面构筑工事，一面破坏道路和桥梁。19日7时，敌汽车40余辆满载敌兵向九塘增援，被新二十二师截击，激战1小时，敌复占五塘。下午，新二十二师全线转移攻势，战斗2小时，将敌击溃，恢复原阵地，并将敌修补的道路、桥梁重加破坏，阻敌前进。

由于敌人正面顽抗，敌后方部队不断强行增援，军长杜聿明决定调整作战部署，加强第一线攻击力量，以第二〇〇师接替荣一师作正面攻击，荣一师向敌两翼包围攻击。20日晨，第二〇〇师在重炮支援下向昆仑关正面攻击。荣一师以主力自老毛岭、四四一高地，一部自石塞隘、同平夹击九塘及其北方公路两侧之敌。开始战况甚为顺利，我战车一度冲入昆仑关口，步兵

亦逼进昆仑关东、西、北三面。旋敌增援逆袭，双方陷入对峙状态。我战车受敌战车防御炮阻击，不能前进，被迫退出昆仑关。

新二十二师占领五塘、六塘后，20日晨敌约千余，战车10余辆，在飞机掩护下向新二十二师猛攻，双方激战竟日，五塘、六塘又被敌占领。新二十二师占附近高地，阻敌北进。左翼支队于19日晚进抵八塘东侧，20日晨以一部占领山心，主力向八塘推进。中午将八塘东南侧高地全部占领。至此，南宁与昆仑关的交通完全被我截断，公路、桥梁被彻底破坏。

21～23日，我正面两师继续向昆仑关守敌猛攻。第二〇〇师第五九八团与敌肉搏数十次，始克罗塘高地部分据点和同兴北端据点。第六〇〇团曾迫近昆仑关前200公尺处，因受公路两侧敌火力侧击，不能立足而退。荣一师主力猛向昆仑关西南侧攻击，九塘至昆仑关间公路桥梁、电杆均被我破坏，对敌合围之势已成。昆仑关守敌不愧是顽强之敌，后方补给交通已被截断，陷入我重围之中，弹药、粮食甚至饮水已很困难，但仍死守不退。三木联队官兵“把附近田间剩下的食物已经吃光，只能捡拾田间落穗充饥。弹药缺乏的情况更为严重，迫击炮中队因没有炮弹把炮埋在地里，用竹子削成扎枪来拼命”。[①]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能靠飞机空中投下弹药、食物和饮水。甚至，指挥官战死后后方用飞机运送新指挥官用降落伞降到阵地，继续指挥战斗。

昆仑关守敌陷入我重围后，南宁日军司令部万分焦急，不断派兵前往增援，但援军在邕宾路上遭到我左右翼两支部队的堵击，迟迟不能如期到达昆仑关。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率两个大队20日即从南宁出发，前进至五塘后不断遭到我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二师等截击、伏击和围困，“踏上二十五公里长的狭路，极尽艰难”。[②] 中村不得不率队窜入山中绕道前往九塘。23日，中村进入七塘西北渌留榈子岭附近时遭到我伏兵截击，左颊被子弹射中。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一分册，56页，北京，中华书局。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一分册，55页，中华书局，1981。

24日，负伤的中村窜至九塘西木橙村时又被我荣一师伏击，腹部中弹受重伤，由士兵抬至九塘指挥部。军医正为中村动手术之际，遭我炮火袭击，炮弹击中手术室。中村苟延一个夜晚，次日毙命。

我攻关部队对守敌进行了一周的作战，断绝其后方交通，团团包围，猛烈攻击，但终未奏功，守敌依然顽强如故，未稍动摇。军长杜聿明同各师师长总结一周以来的作战经验，检讨得失，认为我军攻击进展缓慢的原因，一方面是敌第五师团“素质训练特别优越”；另一方面我军也有不少错误，各级指挥官对敌情地形的侦察缺乏周到，多属盲目攻击；步炮缺乏协同，炮兵火力分散，攻击成果甚少。① 杜聿明军长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力量，改进步炮协同，逐个攻略敌主要据点。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来到昆仑关前沿阵地，亲自观测敌据点火力，指示步、炮兵指挥官都要到一线指挥，直接联络，协同作战。白崇禧与杜聿明等将领共商步炮协同战术，决定采取“诱导射击办法”。就是攻击开始时炮兵先行射击几十发炮弹以后停止射击，让步兵前进，步兵进到敌阵地200~300公尺敌人要出来时，炮兵又行射击，炮兵停止射击步兵利用炮火烟尘飞扬之瞬间迅速突入敌阵地而占领之。②

24日，我攻关部队按新战法对昆仑关守敌发起新攻击。荣一师主力集中攻略敌左翼要点罗塘高地。罗塘高地是敌坚固支撑点，为昆仑关西南屏障，敌以二十一联队迢田中队把守，配以轻重机枪28挺，外围有3道铁丝网。是日下午4时半，荣一师第二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力冲锋，冲到敌阵地前用铁锹、镐、锄头等破坏铁丝网，突入内围，与敌白刃肉搏。战斗空前激烈，战至下午7时遂克该高地，毙敌官长10余名，士兵200余名，俘敌兵2名。荣一师第二团突击队亦伤亡巨大，仅存数十人。25日、26日，我正面两师乘克罗塘高地余威，士气大振，向昆仑关东北侧界首、六五三高地包围攻击。同兴附

① 原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纪要》，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9辑，25页。

② 白崇禧：《抗战中敌我战法的演变》，9页，中央训练团，1942。

近敌一部企图突围，被我军击溃，顿时一片混乱，狼狈向南逃窜，遗尸遍野。界首、六五三高地虽未克复，但我军空前猛烈的攻击，占领其附近高地，缩小包围，敌阵地渐呈颓势。在俘获的日军日记中写道："数日以来，当面之敌对我猛烈攻击，其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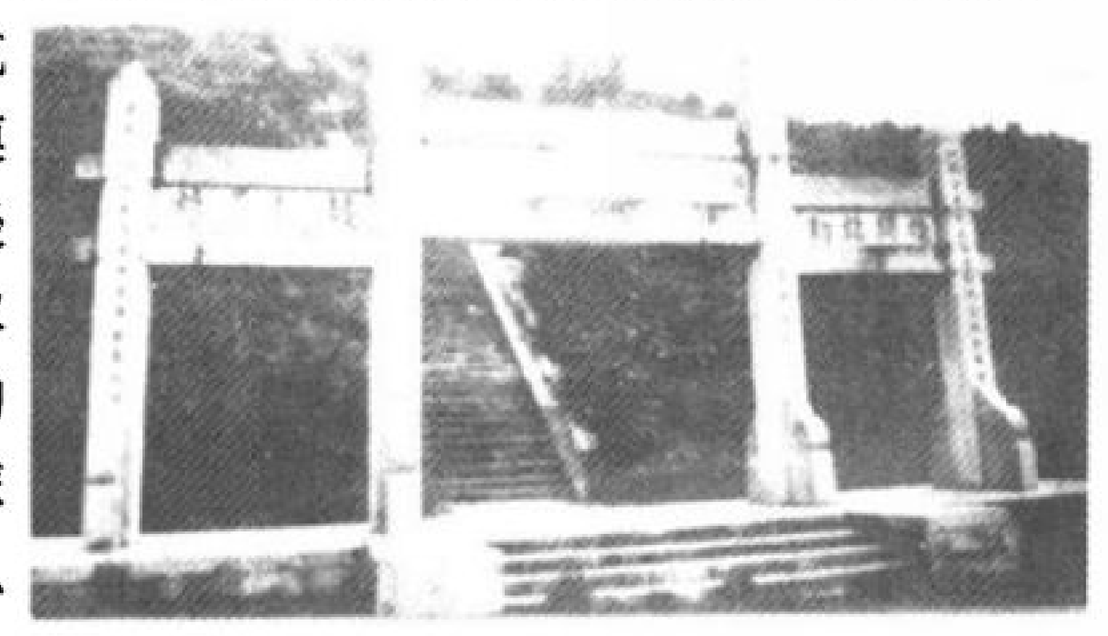
连日以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二师在八塘附近同敌援军激战。敌人为打通公路交通，对新二十二师、九十二师不断发起攻击，不顾一切向九塘增援。我阵地不时被突破，交通时断时通。27日，敌生力军台湾旅团林联队和渡边联队到达八塘，向九塘增援。杜聿明军长为在敌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攻克昆仑关，决心彻底集中兵力于正面，迅速击破守敌。决定将新二十二师及军补充一、二团调至正面，新到的第一〇二军第一五九师亦加入昆仑关正面，加强攻击力量。

28日，荣一师、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协同向同兴、界首守敌发起新攻势。当日黄昏第二〇〇师克复同兴、界首各附近外围据点。29日，第二〇〇师继续昨日成果，向界首东西各要点猛烈攻击。我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奋勇争先，冲入敌阵地，各据点之敌伤亡殆尽，各堡垒遂为我逐一攻克。30日晨，新二十二师接替第二〇〇师为昆仑关攻略突击队，再向界首、同兴攻击，12时将该两据点残敌完全肃清。第一五九师亦克复六五三高地。31日晨，我军各部向昆仑关进攻。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自同兴向昆仑关迫进，11时攻入昆仑关，残敌向九塘溃退。至此，昆仑关完全被我攻克。

昆仑关之敌溃退后，四四一高地之敌仍顽据不退，等待援军，与我荣一师对峙。昆仑关攻克后各师官兵损失惨重，残存无几，因此攻击进展甚少。1940年1月3日，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各一部协助荣一师再向四四一高地发起攻击。敌利用反斜面阵地顽抗，并施放毒气。荣一师不顾严重伤亡冲

① 原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纪要》，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9辑，28页。

入敌阵地，同敌人肉搏，敌不支向九塘溃退。我军乘胜追击，4日占领九塘。



昆仑关抗日阵亡爱国将士墓园

昆仑关之战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规模最大的攻坚战役，经过半个月的苦战，取得了首次攻坚战斗的胜利。此役，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坂田元一大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班长以上的军官，士兵4000余人；俘虏士兵102人；缴获山炮10门、野炮12门、战车防御炮10门、轻机枪102挺、重机枪80挺、步枪2000余支，文件9大箱，其他军用品和弹药等堆积如山。中国军队为攻关歼敌，空前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付出了伤亡1.4万人的巨大代价。昆仑关战役胜利，打败了号称“钢军”的日本精锐第五师团，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昆仑关战斗中，东、西路军在邕江南岸担任战略包围，频频出击，积极配合北路军围歼昆仑关守敌。总攻开始后，西路军第一纵队第一三五师和第一七〇师向高峰隘守敌发起进攻。19日，第一七〇师攻占高峰隘周围山头，第一三五师克香炉岭。敌四十一联队长纳见闻高峰隘被攻，率一大队从南宁出发增援，从三塘侧面抄袭高峰隘我第一七〇师，援军与守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21日我两师被迫向武鸣撤退。纳见击退我军后当晚撤回南宁，留下佐野大队守高峰隘，形成与我对峙状态。西路军第二纵队和东路军向邕钦路开展游击战，破路炸桥、砍电线杆、袭击敌人据点和过往车队，使邕钦路交通不时断绝，造成敌人运输极大困难。敌人运输车队不得不由装甲车开路，扫清障碍，修桥补路，并派飞机空中掩护，才能前进。在邕龙路，西路军第二纵队痛击由南宁西窜之敌。12月17日，敌第五师团及川支队约2000人由吴圩沿邕龙路经西长窜犯龙州。及川支队窜到明江时接师团长今村

均急电昆仑关告急，奉令派一部回援。我第一三一师得到消息，在西长邕龙路上布置口袋阵地，待敌回窜时包围歼灭。20日下午，首批回窜敌步骑炮兵约600人，汽车几十辆，到达西长时即遭到我截击。我第一三一师将敌包围后，用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敌人几次突围不遂，最后利用山地进行顽抗待援。第二天，敌机数架来援，轰炸扫射第一三一师正面，掩护敌军装甲车、骑兵和步兵突围。此次战斗我军毙伤敌军过半。及川率其余部队于21日陷龙州，烧毁掳掠物资后于24日退出龙州回窜南宁。第二批敌人回窜至山圩附近，进入我第一八八师预先埋伏的阵地。敌人在路旁休息，打开饭盒罐头要吃饭时，我伏击部队突然以轻重机枪、迫击炮、步枪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乱喊乱叫，乱作一团，死伤惨重。不一会儿，敌人整理了队伍向我阵地猛扑，但已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这时夜幕降临，我军逐步缩小包围，继续射击。包围圈内敌人逐渐减少，我军官兵认为敌军已被消灭了。次日天明，战场上已无敌踪。原来敌人利用夜晚沿着一条干沟绕过一座石山逃出我包围圈，窜回南宁。这次围歼毙伤敌200多人。我军邕龙路伏击战，虽未能全歼敌军，但延缓和削弱了敌人援救昆仑关的兵力。

三、日军反攻昆仑关

日军在昆仑关惨败后，残部退至八塘，沿邕宾路两侧构筑工事据守，等待援军。我军经过半个月苦战，伤亡巨大，疲惫不堪，暂时停止进攻。1940年1月5日，白崇禧自宾阳白岩村回到迁江指挥所。次日，蒋介石偕陈诚、张发奎、徐庭瑶、林蔚等自柳州来到迁江白崇禧指挥所，与白商讨对敌作战计划。白崇禧向蒋介石汇报昆仑关战斗经过后，建议乘敌失败援兵未到之机，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发起新的进攻，一举收复南宁。经过一番议论，蒋介石和与会将领一致同意白崇禧的主张，决定重新作战略部署。部署是：以第三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为北路军总指挥，率第二军、第三十六军增援第五军为正面，沿邕宾路向南宁进攻；以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为西路军总指挥，率第六军、第九十九军从昆仑关以西，沿邕武路向南宁进攻；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南路总指挥，率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从邕钦路西向南宁进攻，并阻敌增援；以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为东路军总指挥，率邓龙光集团军的第六十四军为主力，另有四个独立团，从邕钦路东截击敌军增援；以叶肇第三十七集团军为预备队，巩固邕宾路以东地区。部署既定，即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布命令，并预定1月10日开始新的总攻击。会后，蒋介石回柳州。8日，蒋派人给白崇禧送来一封亲笔信，推翻了6日决定的计划。信中说，昆仑关一役，我军异常艰苦，战后疲惫，应巩固既得阵地，待自渝东、湘南调来生力军，增强实力，再发起新攻势。① 白崇禧读后大为不满，认为蒋临阵变计，命令已发，又要改变，必将影响军心士气。但又无可奈何。9日，白崇禧又以桂林行营指挥所名义发出改变作战计划的命令：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巩固八塘以北及以西占领线，暂不采取进攻行动；甘丽初第六军集结于武鸣林圩、葛圩附近待命；邕江南岸夏、蔡两集团军扰袭敌人，破坏交通，阻敌增援。

作战命令变来变去，引起前线部队部署的紊乱。徐庭瑶已发出作战命令，令第五军于10日拂晓向八塘攻击，第三十六军向古寨及其西北高地攻击，10日拂晓两军已开始战斗。徐庭瑶接到变更作战命令后，又令第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停止作战行动，将第五军从第一线撤退下来，集结宾阳附近的思陇、太守圩整训，原阵地交第三十六军接防。正当中国军队频繁改变作战计划之际，日军从广州增援部队准备反扑。日军在昆仑关受重创后，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以南宁危急，从广州抽调近卫师团第一旅团、第十八师团等部增援南宁。1月10日，日军开始在钦州湾登陆。14日，各部登陆后向邕钦路推进。我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六军节节抵抗后撤退。20日，敌援军云集南宁，组建

① 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载《学术论坛》，1988（1），74页。

第二十二军，久纳诚一任司令官，安藤利吉亲到南宁指挥作战。25日，日军完成反攻部署，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布防于五塘至八塘，近卫师团第一旅团驻亭子附近。桂林行营得报日军援兵赶到，意识到敌人大规模反攻迫在眉睫，白崇禧紧急调整部署，准备迎敌。作战部署以邕江为界，分南北两个战区。北岸分右翼、中央、左翼三路军，右翼军总指挥甘丽初，辖第六军，以一部对四塘警戒，主力集结于葛圩、林圩准备攻势；中央军总指挥徐庭瑶，辖第二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九军，巩固八塘以北以西，准备攻势；左翼军总指挥叶肇，辖第六十六军、第九十九军第一一八师，确保邕宾路以东地区。南岸仍分东、西两路军，西路军总指挥夏威辖第三十一军，以十万大山为根据地，向邕钦路大塘、吴圩间袭击，破坏交通，阻敌增援；东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辖第六十四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新十九师，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向大塘、小董间攻击，破坏交通，截击敌增援。[①] 桂林行营发现敌援军赶到并做好反攻准备，才急忙调整部署，在战略上完全陷人被动的地位。有的部队尚在运输途中，部署未完成，日军进攻开始了。

桂林行营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又发生错误，只注意邕宾路正面的防御，忽略了日军可能从东面抄袭宾阳。1月28日，日军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自八塘向我军发起进攻时，近卫师团第一旅团已从亭子出发，沿邕江南岸邕永路东进，连陷蒲庙、南阳、永淳，30日渡过邕江，向甘棠推进，迂回宾阳东面。第十八师团一部由五塘、六塘东窜向武陵进攻，与近卫师团呼应会合。这样，战局重心很快转移到宾阳以东。这一地区我左翼兵力单薄，守军叶肇部抵挡不住敌人攻击，竟为千余敌骑兵所吓倒，一触即溃，近卫师团长驱直人。白崇禧急令到达贵县的第六十四军转向黎塘侧击北进之敌，又令刚到的第六军一个师自宾阳南下增援阻敌。连日以来，日机数十架对宾阳及其附近村镇狂轰滥炸，我各部援军被阻于途中。当决战关键时刻，蒋介石剥夺白崇禧的指挥权，命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从2月1日起指挥桂南会战，以

① 黄启武：《抗战期间广西南宁攻防战》，载《广西文献》第10、11期。

陈诚协助。2月2日，敌机继续对宾阳轰炸，城内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弹起火，与各部联系中断，各部各自为战，陷入混乱状态，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纷纷逃窜。当日下午，日军占领宾阳。日军占领宾阳后，与邕宾路上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相呼应，东西夹击昆仑关。我关西第九十九军连日与敌激战，第二军、第三十六军在思陇以北山地抵抗，坚守阵地。2月3日，敌第十八师团一部占邹圩，进抵清水河南岸，近卫师团也西进陷上林巷贤圩。我军因后援断绝，分向隆山、都安、忻城撤退，昆仑关又陷敌手。日军乘胜追击，4日占上林，6日占黄圩，7日围攻武鸣。武鸣守军与敌激战一昼夜，伤亡过半，8日武鸣陷敌。

日军反攻昆仑关得手后，从2月9日起由上林、武鸣、宾阳撤退，放弃昆仑关，退守三塘、四塘至高峰隘一线。第十八师团南下钦县上船调回广州。

宾阳会战后，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部分已残破，无力再反攻南宁。这时从河池经田东、德保至靖西边境岳圩入越南的新国际交通线已经开通，因此，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当前无反攻南宁的必要。1940年2月14日，蒋介石给桂林行营发出“关于桂南方面作战指导要旨”密电说：“桂南我军应以消耗敌兵力并确保我西南新国际线路安全之目的，以有力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不断袭扰并加强截断邕钦路交通，主力分别控置于后方整顿，迅速恢复战力，相机收复南宁。”蒋介石还具体指示各部的部署：夏威第十六集团军任邕钦路以西及邕武路的作战，以一部袭击邕钦路敌交通，主力分别控置于绥渌及田东、果德间整顿，掩护新国际交通线；第三十八集团军任高峰隘以东昆仑关一带作战，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控置于都安、柳州间整训；第三十五集团军任昆仑关以东至邕江北岸作战，以一部袭击邕宾路之敌，主力控置于永淳附近掩护西江；蔡廷锴所部任邕江南岸邕钦路以东作战，与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协合袭击邕钦路断敌交通。[①] 根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和部署，桂南中

① 《蒋介石关于桂南方面作战指导要旨密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档案，（二五）3752，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军队大部分调回后方整补，只留少数部队与敌周旋，打游击。

2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桂林转赴柳州，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陈诚、李济深、张发奎、张治中以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等。会上，蒋介石指责桂林行营在桂南会战中的错误，说对敌人从东面进攻警惕不高，在邕宾路以东地区配备兵力不足，又不掌握有力预备队应变，以致战局不可收拾。白崇禧承认对全局考虑欠周，指挥失当，自请处分。陈诚也自称指导不力请处分。蒋介石大谈战略战术，要求各将领吸取教训。25日，蒋介石宣布，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陈诚“指导无方降级”。白、陈的处分会后未正式下文，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蒋还宣布对其他将领的奖惩，会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正式下文：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违令避战贻误全局着即撤职交军法审判”；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处置无方决心不坚未能挽回战局”，撤职查办；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放弃重要阵地不负责任”、第六十六军军长陈骥“放弃职责作战不力”、第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作战不力军纪废弛”、第一六〇师师长宋士台“作战不力”、第三十六军参谋长郭解“意图卸责罔识大体”，撤职查办；[①] 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四十六军军长何宣、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之记功一次。26日，蒋介石由柳州回桂林，飞返重庆。4月20日，蒋介石决定撤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改设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白崇禧调回重庆，仍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6月1日，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正式成立，9月4日李济深由重庆到桂任职，在此以前由副主任林蔚代理。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快邮代电，1940年3月3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档案，（二五）3752，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四、民众支前参战热潮

日军入侵桂南，给桂南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抗战爆发后不久，日本飞机就开始对广西城乡各地进行空袭。日军钦防登陆前几个月，日机频繁地对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城市狂轰滥炸，有时一天几批轮番轰炸扫射。日军进攻南宁时，连日几十架飞机对市区漫无目标地投掷炸弹、烧夷弹、毒气弹等，并以机枪猛烈扫射。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摧毁，被炸死炸伤的民众不计其数。市区到处弹痕瓦砾，断壁残垣，尸陈街头，惨不忍睹。日军入侵桂南后，穷凶极恶，大肆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日军侵占宾阳10余日就屠杀数千人。日军进攻上林，途经大丰、亭亮、万加、巷贤、灵村等地，一路烧杀，数十里村庄、圩场被大火焚烧。据统计，日军占领桂南期间，桂南19个县死亡11147人，受伤2161人，失踪3986人，财产损失14663.1万余元。①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广西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动员起来，同仇敌忾，投入保家卫国的战斗。

日军钦防登陆后，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广西学生军和战时工作团，深入桂南各县发动群众，配合正规军打击侵略者，各县迅速掀起抗日救亡、支前参战的热潮。在敌人可能入侵的地方，群众夜以继日地破坏公路，断绝交通，坚壁清野。我军收复南宁的战斗打响后，各地到处呈现出繁忙的支前景象，抢修公路，设立军民合作站，帮助部队运送弹药粮食，为部队做向导带路等。许多地方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武装，骚扰和伏击敌人，配合军队作战。日军沿邕钦路北上进攻大塘时，邕宁县那陈乡群众在学生军的发动下，

①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76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拿起武器截击一支200~300人的日军，这支日军受到突然阻击被迫撤退。南宁沦陷后，四郊群众自动组织抗日自卫队，经常袭击从城里到乡下抢劫的日军。邕宁县那莲乡群众在进步青年的带动下，卖牛卖糖购买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同进犯的敌人战斗。后来这支抗日武装与各乡抗日武装联合，组成邕宁县八尺区抗日游击队，全队400多人，与日军战斗100多次，毙敌200余人。灵山县群众在中共灵山特支的领导下，成立灵山青年游击队和灵山民众抗日自卫大队，活跃在邕钦路以东地区，协同蔡廷锴东路军，破坏敌人交通，支援昆仑关战斗。武鸣县也在学生军的帮助下，成立抗日游击武装，支援前线作战。昆仑关战役打响后，宾阳县支前参战活动尤为热烈。群众纷纷参加游击队，开赴前线参战，各乡成立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和军民合作站，协助部队运送弹药粮草，抢运伤员，捐赠军粮和物品，部队所需物品都及时送到。攻关战斗初战告捷时，群众纷纷向部队赠送慰劳品，其中有粽子11万多个，甘蔗1.2万余根，饼果10余担，肉2000多斤，劳军款2.5万元，军鞋2万余双。[①] 人民群众热烈支前参战，鼓舞了前线的抗日将士，为攻关战斗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桂南会战中，不仅战区群众热烈支前参战，远离战区的各界群众也通过各种形式积极支援前线抗日。桂林文化界人士大力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援桂南抗战，并组织慰问团奔赴桂南前线慰问抗日官兵。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组织战地服务团到桂南进行战地服务。新安旅行团和抗宣一队等文艺团体在桂南会战期间一直在前线活动。许多地方群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北流县新圩妇女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圩妇女抗日游击队，全队40余人，队员全副武装，进行军事训练和野战演习，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救亡等。陆川、博白、玉林等县，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各县都成立了抗日游击武装，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协同部队作战。还组织了农工抗日救国会、文化教育界救国会、妇女抗敌后援会、青年学生抗日救

① 《宾阳县志》，18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国会等，发起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抗战。

桂南会战期间，广西人民热烈支前参战，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以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广西人民爱国的斗争精神。

五、桂南收复

日军退守南宁近郊后，为巩固南宁，抢修邕钦公路，修复桥梁，填平路坑，并沿途增筑护路工事，保证补给线畅通。在钦州湾修建兵站基地，供从广州和海南岛来的船舰装卸存放货物。修复南宁机场，拓宽跑道，还修建了飞机修理厂。在南宁城北郊到处修筑明碉暗堡，围上数层铁丝网。日军占领南宁之前，居民已逃避一空，因此日军占领南宁后困难重重，没有粮食、副食品供应，没有人修工事，也探听不到情报。因此，日军一面出安民告示，欺骗市民回城，一面物色汉奸，充当其鹰犬。先后在南宁、钦县、小董和南宁近郊圩镇收买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实行“以华制华”政策。但是，日军烧杀淫掠的野蛮行径，已为大多数民众所痛恨，不愿受敌利用，只有少数被欺骗或被胁迫回了城。但回城的市民不久又被驱赶出城外。维持会的汉奸都是无耻政客或流氓地痞，其任务是发放“顺民证”，帮助日军征工修公路、机场，筹集粮食副食品和搜罗妇女供兽兵淫乐等。维持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抵制，有的汉奸被游击队捉拿惩办，震慑了敌伪。因此，日军始终无法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民众留在敌占区当“顺民”的极少，大多数都随政府撤退到右江、都安等地，支援军队抗战，日军“以华制华”政策遭到失败。广大民众不同敌人合作，日军就更加疯狂地四出窜犯，烧杀抢掠，百姓备受蹂躏，生命涂炭。

为了打击盘踞邕钦的日军，邕江南岸中国军队自 1940 年 3 月起向敌出击。3 月 1 日，第四战区向各部下达作战命令，发动“春季攻势”。邕钦路东

以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编成东路兵团，由吴奇伟指挥，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至小董东北地区，第六十四军控置于灵山西北地区。12日，第四十六军一部攻击大塘、小董之敌，占领崇匡、大路岭，第一八八师亦于同日占领十二坛，邕钦路被截断。邕江北岸五塘一带我军亦向敌攻击。日军为解除其侧背的威胁，3月14日开始分三路进犯灵山。钦县之敌第二十八师团第一联队，附骑炮兵各一部，由牛岗、平吉进犯，16日占领陆屋。南宁之敌第五师团第四十一联队由良庆沿邕永路东窜，至南阳分两路，一路向太平进犯，一路进占永淳，16日陷旧州，窜抵沙坪。我第六十四军与敌遭遇，激战竟日，伤亡巨大。17日，敌三路合击灵山，当日灵山失陷。我东路军兵力雄厚，本可与敌一战，但吴奇伟只作节节抵抗，主力退至灵山东北与敌对峙，吴总部移驻贵县，远离前线。20日，我第九十三师由横县南乡渡江南进，此时敌已开始退却。21日，日军纵火焚烧灵山、平南市街后分由原路撤退。

3月下旬，日军又在邕钦路西侧蠢动。26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联队、第四十二联队附骑兵各一部，由亭子圩、沙井分向邕扶路、邕龙路西犯。27日，陷苏圩。28日，陷扶南后分途西进。一部29日窜至绥渌，另一部31日陷西长、旧城，准备向我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进攻。近卫旅团主力和第二十八师团一部亦由小董西犯，28日占上思，29日窜至佛子，与西长、旧城之敌对我第一三一师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我第一三一师一营对西进之敌尾随袭击，主力集结那江附近，一部在佛子坳伏击敌人。此时扶南、大塘、山圩至东门、西长、旧城之敌成弧形线向南压迫，对我第一三一师形成包围圈。第一三一师为避免重大牺牲，4月2日夜突围，北渡左江，次日冲过上善公路退至罗白圩。敌渡江向西追击，一部进抵驮卢，另一部亦攻入崇善县。第一三一师节节抵抗，向雷平县继续退却，部队被敌冲散，各团各自为战，分别到达左州揽圩、大岭一带。5日，各路敌人退却，分途返回南宁。

5月，德军闪击西欧成功，英法联军失败。6月14日，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英国处境艰危。日军乘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准备入侵越南，抢占法国殖民地，断绝我西南国际交通线。6月，日军调集大批海军舰船于东京湾，准

备由海防登陆。同时，派军进占广西龙州、凭祥，做好由陆路进入越南的准备。第四战区鉴于欧战形势的变化，判断日军将进攻越南，除第三十一军守邕龙路外，增派第四十六军到左江驻防备战。6月17日，日军以第五师团主力附骑炮兵各一部由绥渌西犯。此时我邕龙路仅有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五师2000余人，抵挡不住敌强大攻势，敌进展神速，18日占东门，20日陷西长，24日克北江圩，26日陷明江县城。随后，敌分两路在飞机支援下向西北继续进犯。一部于29日攻占凭祥，30日占镇南关；另一部北上进攻龙州，我龙州守军与敌激战两日，敌伤亡甚众，我阵地亦被敌机和大炮击毁，我军被迫退至龙州北郊据守，7月1日龙州陷落。

3月至9月，国民党军在邕江南岸的邕钦路和邕龙路与日军进行多次作战，袭击敌交通，阻击敌进犯。据统计共会战3次，较大战斗5次，因敌出扰而予以反击58次，出击181余次。[①] 但国民党军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集中力量，给敌人予重创。日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蹂躏了绥渌、思乐、明江、宁明、龙津、龙州、凭祥等县。

9月22日，日军以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为主力由镇南关攻入越南。第五师团主力进入越南后，龙州方面敌人兵力薄弱，我第三十一军遂于10月12日乘机围攻龙州。一部由西门突入城内，与敌发生巷战，敌固守城外工事及城内房屋顽抗，并施放毒气，我军伤亡巨大，但仍奋勇冲杀。至13日晚，敌增援向我反攻，被击退。敌凭藉坚固工事防守，我军进展困难，遂退回原阵地。

日军第五师团已进占越南，桂越交通线自断，南宁已无占领价值。10月中旬，南宁日军开始向邕钦路移动，准备撤离桂南。我邕江北岸第六十四军发现敌放弃南宁的迹象，遂发起攻势，23日主力向四塘攻击，另一部迂回三塘。敌迅速增援，并以飞机助战，我军退回潘村、牛头岭一带，监视敌人。我军围攻龙州和出击四塘后，邕龙路日军恐慌，分由凭祥入越及向吴圩转钦

① 《桂南从沦陷到收复》，161页，桂林，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1941。

县，陆续撤退。我左江第四十六军于24日、25日由驮卢渡河，分向思乐、绥渌、山圩截击敌人，并收复思乐、明江、扶南、山圩等。10月下旬，盘踞龙州之敌亦准备撤入越境，27日纵火焚烧城内房屋。我第一八八师当日即向龙州进攻，28日拂晓进迫县城，敌退守城内，敌炮兵从南岸炮击我军掩护主力撤退。经过几十小时的战斗，我军克复龙州。我军继续向凭祥追击，30日敌退入越南，镇南关为我军收复。

龙州克复后，我军又向南宁发起进攻。28日，第六十四军主力从邕宾路、邕武路向南宁推进。29日一部进占高峰隘，并向西乡塘进攻；另一部从剪刀圩渡过邕江包抄敌退路。是日晚，敌向邕钦路退窜。30日晨，我军收复南宁。

我第六十四军主力向南宁进攻时，即以一部由伶俐、永淳间渡江，向邕钦路急进，追击逃敌。第六十四军收复南宁后，迅速渡江向南追击。退集邕钦路南段之敌，以东西两江为依托，据守平乐桥以南一带山地，构筑工事，负隅顽抗，掩护其主力及辎重撤退。我正面追击部队因道路修复困难，11月7日才到达小董开始攻击。我邕龙路第四十六军东进部队于9日进迫黄屋屯，邕钦路以东我军及粤南游击队也从钦县以东向敌侧击。10日，我正面部队与敌激战终日，公路以西部队进占望塘岭一带，向小峰门侧击。公路以东部队向石窟、猫公岭之敌攻击。11日各路部队继续向敌猛攻，14日黄屋屯之敌首先动摇，向钦县西郊退却，当天中午我军克复钦县。随后，我军分两路继续追击。一路由钦金路向金鸡塘攻击，一路向辣椒槌南下。15日、16日，敌以数十架飞机轮番向我追击部队轰炸，我军仍奋勇前进。17日，收复辣椒槌和金鸡塘，残敌纷纷登舰出海。至此，桂南全境收复。

第十四章　皖南事变前后的广西反共逆流

抗战时期，国民党桂系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新桂系由于同蒋介石的矛盾，为了自身的利益，愿意同中共中央联合抗日，容纳进步势力，实行某些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开明政策；另一方面，新桂系出于其阶级本性，始终坚持敌视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立场，尤其是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一直实行迫害和镇压的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皖南事变后，新桂系更加疯狂地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制造了“七九事件”等，使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遭受严重损失，大批党员被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为保存力量不得不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党的工作，逐步发展壮大了党在农村的力量。

一、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对共产党的两面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社会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种是日本帝国

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一种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桂系集团与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还有一种是新桂系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矛盾。而这几种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并互相影响的。

新桂系的领导人一方面有一定的爱国思想，要求抗日；同时，又想通过举起抗战的旗帜，广泛争取社会的支持，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抗战爆发前后，他们积极与中共中央建立统战关系，想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蒋介石集团讨价还价，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共产党在广西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危及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因而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仍继续采取不承认和镇压的政策。这就是抗战爆发后新桂系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外联内压的两面政策。这一政策，给抗战时期的广西造成一种复杂而特殊的社会环境。

新桂系外联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在广西进一步发展。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设立，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桂林的活动，不少进步专家学者被聘到新桂系当局的机关学校里工作，这是中共中央与新桂系首脑多次商讨，对抗战一些问题取得共识的结果，也是新桂系实力派开明、进步的一种表现。这对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新桂系当局所实行的对内反共反民主政策却使广西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从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的近两年时间里，新桂系连续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

1937年8月至9月，新桂系借“王公度事件”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广西进步力量。8月30日，新桂系当局以“托派”罪名逮捕在桂系中颇有势力的广西军校政训处处长王公度及谢苍生、区渭文、韦干等人，同时趁机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党员蒋汝志、崔真吾及一些进步人士。9月14日，王公度、谢苍生等4人被枪决，陶保桓、崔真吾也同时被杀害。

9月7日，中共郁江特委被破坏。由于国民党特务分子刘锋民混进共产党内，并窃取了中共宾阳县委书记职务，摸清了中共郁江特委及所属组织的

情况。他指使国民党特务在横县逮捕了中共郁江特委书记陈湖光、委员李蔚梁。此后，出席中共郁江区党代会的代表先后被捕7人，另被捕党员9人。横县、宾阳、永淳、南宁、武宣等9个县中共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切断了与郁江区特委的联系。

9月至11月，又发生了“百色谈判”事件。9月中旬，中共桂西区特委在田东县那浪屯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与国民党桂西当局举行谈判以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会议根据中共南方临时工委的指示，决定与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部举行谈判，将桂西区特委领导的武装队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北上抗日。会议选出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南方临时工委派往右江指导工作的高朗如、桂西区特委所属武装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徐泽长3人为谈判代表。在此之前，黄桂南曾于4月按照南方临时工委的指示，同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部进行了非正式的联系，提出以承认赤色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和在报上登载两党谈判消息两项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国民党方面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9月下旬，黄桂南等3人到达百色，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百色区少将民团指挥官黄韬、参谋长罗荪等3人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背信弃义，不承认原已同意的两个条件，把谈判说成是“土匪自新”、“招安改编”。中共桂西区特委方面坚持原议，又因黄韬暴卒，谈判中断。10月下旬，新任百色区民团指挥官梁家齐到职，谈判继续进行。梁表示同意黄桂南提出的两项条件。黄桂南等人经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改编方案：(1) 特委领导的所有武装全部改编北上抗日，政府取消对中共人员的通缉令；(2) 队伍番号按全国统一编制，军需给养全部由政府供给；(3) 除队伍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外，不足部分由政府补充；(4) 部队编为一个旅，旅、团长由原部队人员充任，政府可适当派副职人员。梁家齐答复：(1) 同意中共桂西区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全部改编，给正式番号和登报，保证出来部队的安全，过去的一切不予追究，但政府不另下令取消通缉令；(2) 部队改编后的名称与全国统一，称国民革命军，但是否编成旅、具体番号如何，待请示后答复；(3) 军需给养完全由政府供给，先拨款10万元作伙食费；(4) 武器弹药不足部分由前方供给；

(5) 人员配备另行研究。11月上旬，中共桂西区特委接到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信，认为“这种谈判是不适宜的”，要求“即刻停止”。但黄桂南借口谈判已无法停止，擅自继续进行谈判。结果，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共2000多人，600多枝枪参加改编。次年春节后，队伍开到安徽，被国民党瓦解，仅有20余人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有几人从安徽逃离国民党部队后回到右江。黄桂南则接受国民党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上尉组员的任命，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这给桂西区中共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

1938年6月，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被国民党破坏。事件的起因是1937年底，中共都安县委镇西支部领导瑶、壮等族人民进行抗击县警民团的武装“清乡”斗争。南宁区民团指挥官率兵2000余人到该乡进行“围剿”，群众奋起抵抗，相持数月之久，事态继续扩大。乡党支部派人到中共那马中心县委汇报情况，请求支援。南宁区民团指挥官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只好派人请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负责人徐泽长（当时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八、九独立团那马后方留守处主任）等人出面调解，徐做了工作，并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停火，在群众要求下，广西省政府被迫判处都安县长陈泰春15年有期徒刑，事态平息。国民党桂系当局见共产党在群众中有如此高的威望，遂起除掉之心。1938年6月中旬，南宁区民团指挥部派人与那马中心县委负责人会见，制造真诚合作抗日的假象，以商谈“处理镇西事件善后工作及抗日诸问题”为名，邀请中共那马中心县委成员徐泽长、李凤彰、韦成篇到那马县城周鹿镇。6月28日，徐等3人到达后当即被捕，并于8月3日被杀害于武鸣县城东门外。那马中心县委解体。

同年5月，桂系在南宁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原中共南方工委巡视员莫西凡和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彭懋桂等6人，广西省工委和南宁市委均遭到严重破坏。广西省工委宣传部长陈岸在横县获讯后，即赶回南宁了解情况，布置善后工作，并到广州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进行营救。广东省委指定陈岸代替广西省工委书记。经周恩来与白崇禧交涉，年底，黄松坚等

6人获释。黄即转往广东工作。

新桂系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破坏还在继续。1939年6月29日，中共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委员赵润兰、李修学、张宪等，在离田东县城仅三华里的合恒乡那恒屯开会，在滇桂黔边活动的党员岑世奎也到会汇报工作。由于土豪告密，以及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思想麻痹，是日下午，国民党田东县军警包围那恒屯，捕去韩平波等12人。12月2日，韩平波、赵润兰、张宪、李修学、岑世奎等6人在百色被杀害。事件发生后，中心县委宣传委员黄明山等5名党员被迫上山隐蔽，中心县委解体。

新桂系当局破坏和迫害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如何处理抗日战争期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进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进行抗战的过程中，为了支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国民党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要坚决团结人民，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在广西，中共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坚持抗战，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倾向；而对桂系的反共行径，是在团结桂系抗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巧妙的斗争。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党在广西的工作策略作了适当调整，对桂系当局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如周恩来曾向白崇禧表示，中共不挖广西的墙脚，不在广西的军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1939年4月，周恩来指示广西党的工作应放到下层，组织不忙发展，缩小目标。同年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缩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规模，撤销广西省工委，改为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桂林、南宁、梧州三个平行特支。各特支

不建立新的组织，少量地发展党员。1939年底，全省党员人数约730人。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这种局面下，工作难度增加了。一方面要努力贯彻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群众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并在桂系组织的一些社会团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镇压，做好隐蔽精干的工作。所以1938年至1940年初，广西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当然，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二、皖南事变中新桂系的反共行动和中共对新桂系的政策

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但由于他们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阶级矛盾尖锐化时，他们就会和国民党中央顽固派势力站在一起，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① 新桂系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正是如此。

1940年9月，世界局势发生新的变化，德、日、意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更加猖狂起来，继1939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新桂系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参与了蒋介石这次反共行动。

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故意制造摩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企图将在苏北的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于自卫，在10月4日至6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7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1.1万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即何、白“皓电”），开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功绩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攻击国军”，命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大肆叫嚣“军纪”“军令”重要，在军事、政治和舆论上进行反共内战的动员。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佳电”，一方面，据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拒绝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委曲求全的让步，决定皖南新四军转移江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执行“军令”，进一步做反共的舆论动员。同时，蒋介石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进攻。对此，中共中央曾严肃指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①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特别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

① 《中央1941年3月政治情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62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时造成的严重损失。新四军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17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国统区内亦加强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广西的政治形势也日益恶化。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0日，新桂系军警当局强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勒令桂林进步文化机关停止活动。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救亡日报》、桂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国际新闻社等被查封停业。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被迫转移。“一度繁花似锦的西南文化中心桂林，这时在风雨如磐的肃杀气候之下，一时显得秋风飒飒，萧索落莫了。”①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同时又把新桂系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顽固派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对策。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中共中央一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一方面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向全国和世界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而使日本坐收渔利。中共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使蒋介石处于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对于新桂系地方实力派，鉴于他们在皖南事变时期的实际表现，中共采取了与蒋介石区别对待的政策。早在事变之前，1940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

---

① 周钢鸣：《桂林文化城的政治基础及其盛况》，载《学术论坛》，1981（2），102页。

书记处就致电刘少奇、周恩来等，指示对桂系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认为，由于抗战以来国民党中央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桂系进行利诱威胁以及历史上的其他的原因，桂系积极参与反共，成为蒋介石、何应钦等发动反共内战的一部分先锋队，并非偶然。但由于桂系与蒋系仍有矛盾，桂系要保存实力，害怕当反共先锋遭致挫败，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的影响，争取桂系对我党同情或保持中立是可能的。电文指示，对桂系政策应注意：白崇禧与何应钦在对日对共的关系上仍有分别；桂系在现时还要算作中间力量；桂系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以至一部分中级将领，可能不积极反共或保持中立；对被迫与我发生冲突之桂军，应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因此，我们应通过各种关系向桂军宣传解释，陈之利害：蒋介石、何应钦利用桂军作反共先锋是借刀杀人的渔人政策；白崇禧受何应钦利用一起反共，将断送桂系三年抗战光荣，如其在反共中受挫，则桂军一半人枪将被蒋系吞并；桂军最好的政策是一面敷衍蒋介石求得保存其实力，并在必要时出面调停国共冲突，取得全国信任。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根据这一策略，对新桂系进行又斗争又团结的工作。毛泽东指出：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 中共一方面批评新桂系的反共行为，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关系派人向桂系领导集团、桂军各级官兵以及同桂系有关系的各种团体或个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争取工作，尤其注意加强与李济深、李任仁等国民党民主派的联系。李济深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这一机构是撤销桂林行营后设立的，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办事机构。但李济深是广西军人的领袖人物。他是李、白的扶持者，又与黄旭初有师生之谊。1940 年 10 月，由于黄旭初的动议，他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李任仁是当时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曾是白崇禧的老师。李济深和李任仁虽无政治军事实权，但在桂系中有较大的影响。而他们对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7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国共产党抱友好合作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与李、白、黄的历史关系，对桂系当局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去推动桂系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措施。同时，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中共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名单中，只提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而没有点李宗仁、白崇禧的名字，以争取桂系在反共态度上的转变。这一政策及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新桂系当局在执行蒋介石反共政策时，仍留有余地，没有把事情做绝。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仍需要借助进步势力，需要采取一些暂时的开明措施，以增强其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因而对外省籍的中共党员及文化界的中上层进步人士，大部分是“礼送出境”，给予出境的方便。李克农、夏衍、邹韬奋等都是在桂系当局帮助下离开广西的。桂系当局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有所区别的做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巩固是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中对桂系的策略，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但桂系地方实力派除与人民共同抗日外，只能在进步势力与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态度，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同人民一道建立民主政权。一旦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便日益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三、“七九事件”

皖南事变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经过调整有所恢复，但1942年夏至1943年春，连续遭到新桂系当局的摧残破坏，进入了困难时期。

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发出了《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隐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年1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根据这些方针和原则，根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后的广西实际情况，中共南方局采取两项措施来加强党对广西工作的领导。一是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曼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二是成立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但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主要通过单线联系领导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其职责主要是：搞好与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在柳州与第四战区的张发奎搞好统战关系；组织领导理论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工作。广西各地党组织工作则由中共广西省工委负责。

中共广西省工委重建后，积极进行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至1942年7月，恢复建立了桂西南区特委、玉林区特委、桂林市委、柳州市委、南宁市委，县一级组织除原有的陆川、博白、贵县、玉林外，新建立了平治县委、北流特支、龙州特支、明江爱店特支、钟山英家特支、武鸣特支和上思特支。此外，中共粤北省委派人到镇边县（今那坡县）建立了中共平孟支部。全省党员人数由原来700多人增至近1000人。同时，省工委还注意提高党员的素质。1941年7月至8月先后在桂林良丰、六合路举办了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各地党员干部，省工委领导苏曼、黄书光等给学员讲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论共产党”、“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中国革命问题”等内容。玉林区特委也于1942年春在北流新圩举办了两期党员训

练班，学习党的建设、党的纪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革命气节等内容，使党员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去搞好党的工作。

1942年2月，中共南委指示广西党的组织由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钱兴为中共广西省特派员，苏曼为省副特派员。[①] 地区和市一级的党组织也先后取消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当时各地区特派员为：桂林市张祖贵，桂西南区黄书光，柳庆区路璠，桂东区黄嘉，玉林区吴家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执行中共关于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方针，积蓄了一定的力量，各方面工作都有进展，但“七九事件”的发生却使刚恢复发展起来的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事件的经过是：1942年5月16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到桂林，领取中共中央南方局汇给南委的活动经费，并检查广西党的工作。26日，郭回到广东韶关被捕叛变，供出了南委和中共广西省工委，并带领国民党特务破坏了南委机关，广西省工委因此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6月16日，中共广西省工委组织部长黄彰，携带省工委1941年工作总结向中共南委汇报，到韶关后获悉南委已遭破坏，即返回桂林向钱兴汇报。省工委当即开会研究，初步确定了应变措施。但对局势变化估计不足，措施不力，没有能避免严重损失。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急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令其即行着手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7月7日，中统特务庄尚之带叛徒郭潜等6人到达桂林。8日晚，首先逮捕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外部交通员梁耀宝，梁随即叛变，供出所知党员名单。9日，广西当局开始全面捕人，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7人被捕。

9日晚，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采取紧急应变措施：立即通知桂林市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系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一律撤退，撤到安全地方后，停止向外

---

① 但在实际上，各级组织对省领导机关仍称省工委。

通信；凡留恋职位、家庭、学籍而不肯撤退者，一律开除党籍；省工委机关只留个别干部处理撤退工作；派党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通告桂林事件和做撤退准备工作。这些果断措施，使中共广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苏曼、罗文坤、张海萍被捕后，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在敌人的威胁利诱和酷刑面前坚贞不屈，13日凌晨，在派人向党组织报信后，集体自缢牺牲。



苏曼烈士　　罗文坤烈士　　张海萍烈士

至9月1日止，共有30多名中共党员在桂林及灵川、临桂等地被捕。“七九事件”使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彭维之的叛变又引出了一连串恶性事件。彭维之，原桂西南特委书记，“七九事件”前在桂林治病兼协助省工委做些组织工作，事件中他留在桂林处理善后工作于7月11日下午被捕。1943年1月上旬，彭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百人，导致了玉林地区“一·一三”事件和南宁地区“一·一五”事件的连续发生。

1943年1月13日，新桂系特务和玉林五属的顽固派根据彭维之的供认，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进行大逮捕。30多名中共党员和20多名进步群众被捕入狱，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被查封。

1月15日，新桂系特务伙同国民党南宁专员公署，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曙光报社、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10多个单位，根据彭维之供出的名单，逮捕中共党员51人。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也先后逮捕了中共党员28人，进步群众20多人。

“七九事件”以及“一·一三”事件、“一·一五”事件，是抗战时期中共

广西地方组织遭到破坏最严重的事件。三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党员共130多人，群众30多人，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南宁市委、武鸣县委、北流、玉林、龙州特支等遭到严重破坏。至1943年底，全省党员人数降至580余人。这除了暴露新桂系当局的反共面目之外，给广西党组织的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主要是省工委及各级党的组织对皖南事变后桂系的反动性认识不足，满足于桂系当局某些策略式的开明或进步的措施，因而模糊了认识，强调或夸大了它的进步性，忽视或缩小了它的基本的反动性。当6月16日得知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后，对桂系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严重性也估计不足，行动过缓，没有及时迅速地把已暴露的干部撤走，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匆忙撤退。而“七九事件”距“一·一三”事件、“一·一五”事件的发生也有好几个月，防止事态扩大还来得及，中共广西省工委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事件向全省扩展，然而，各地党组织及党员对应付突发事变的认识和准备仍不充分，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桂系当局制造反共事件时遭受的严重损失。

四、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转入农村活动

“七九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由于房东的掩护，得以从桂林转移到灵川，安全脱险。在与上级党组织关系中断的情况下，省工委机关一方面独立领导部署党员转向农村继续坚持隐蔽斗争，另一方面积极设法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艰苦环境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2年8月，钱兴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9月，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随后，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吴赞之、庄炎林、肖雷等党员干部到英家乡，组成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建立与各地新的交通联络系统，以此为据点，领导全省党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共广西省工委不畏强暴，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特务和桂系当局的反共罪行。“七九事件”后，钱兴于7月11日在灵川起草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人刻印，秘密散发桂林等地。1943年“一·一三”事件、“一·一五”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于1月21日以“中共桂委”的名义，再次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自上年“七九事件”以来，顽固反共分子继续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指出顽固反共分子的反动行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如不从速制止，则“煮豆燃萁”之痛复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祸害国家民族；重申了广西共产党人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竭力从事抗日救亡和广西建设的立场不变；要求广西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并撤销通缉令，制止恐怖事件再扩大，以国法制裁迫害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人的主谋分子，恢复被迫出走人员的职业、学业，并保障其生命安全，恢复“七九事件”以前的和平合作状态。

此外，中共广西省工委还向全省党员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指出：反共逆流已从桂林泛滥到全省各地，顽固反共分子为了扑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的迷梦，正在强迫中共党员“悔过”、“自新”，威胁中共党员的家属亲友劝降，并利用叛徒、特务，通过地方政权进行跟踪追捕，继续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告诫和号召全体党员做到：(1) 无论局势如何严重，都要信守不渝地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2) 要学习苏曼、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宁死不屈，以身殉党的革命气节，反对梁耀宝贪生怕死，叛党变节的可耻行为；(3) 要坚决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发扬坚韧奋斗的精神；(4) 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秘工条例，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5) 要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6) 要向各界人士普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

《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和《告全体同志书》两个文件的印发，对当时造谣说共产党省委已被消灭的国民党桂系当局无疑是一大打击，对共产党

员和人民群众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它稳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相信：只要共产党的组织还在，人们心里就有希望。

在白色恐怖下，省工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存党的力量，撤离和安顿事变后暴露的地下党员，确定今后党在广西的工作重心。这方面的工作是相当艰难和繁重的。1942年8月，省工委书记钱兴从灵川启程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宾阳、南宁、武鸣等地，布置全省党员撤退。根据当时党在城市已难以落脚的严重形势，省工委部署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省工委机关撤退到钟山英家，桂西特委撤退到桂西山区，玉林特委撤退到兴业与广东合浦交界的地区。1943年3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交流各地党的工作情况，研究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总结和吸取了“七九事件”、“一·一三”事件、“一·一五”事件的教训，决定进一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界。会后，根据会议的部署，黄彰、江明彬、韦敬礼继续留在武宣，杨烈、黄耿到靖西镇边，区镇、陈衷到右江，覃桂荣来往于粤桂边和右江之间，路璠到柳北。当时整个广西党的工作领导具体分工为：省工委书记钱兴在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设省工委机关，领导桂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在来宾大湾设领导机关，领导桂南地区的党组织。

广西各地中共党员转入农村后，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继续大搜捕和生活来源的断绝，生活条件和斗争十分艰苦。但他们坚决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坚持扎根农村，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开荒种地，割草打石，烧石灰造砖瓦，当小贩、店伙，有的甚至靠当庙祝或打短工来维持生活。他们都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勇气和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隐蔽斗争，各级党组织在农村发展和壮大了力量。至1945年8月，全省党员人数增至1000余人，除恢复原有的组织外，还新建了近20个县委、县特支和数

十个支部。①

这期间，省工委还抓紧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从城市工作转入农村活动，有的党员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有的怕苦怕累，有的缺乏工农感情，与农民群众关系搞不好。若不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便不能提高党的战斗力，无法带领群众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去夺取抗战的胜利。1944年春，钱兴获得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文件，立即组织省工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在英家乡周围工作的党员学习讨论，开展整风。他根据当时存在的各种不良思想和延安整风精神，提出了整风的任务是：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信心，批判各种错误认识，树立长期隐蔽于农村的思想；加强革命气节教育，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② 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钱兴带头检查自己在“七九事件”以来的缺点错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在他的带动下，党员们都自觉作深刻检查。次年春，又再次学习，以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点，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工作，为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后中共领导开展的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共广西省工委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43年春，钱兴通过庄希泉与当时属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党员张兆汉取得了联系。钱兴委托张兆汉向上级组织汇报广西党受破坏的情况。张即向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汇报。听了张兆汉的汇报，李亚群表示：(1) 同意把广西党的情况转报南方局；(2) 可以向广西党组织传达中央有关指示；(3) 双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张兆汉通过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庄

---

① 从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新建的县一级党组织有：中共横县县委、中共容县特支、浔梧玉师范学校特支、武宣特支、修荔蒙特支、南路特支、灵川特支、三江富录特支、桂滇边特支、向都特支、怀集特支、来宾特支、灌阳特支、贺县特支、恭城特支、河池特支、万冈特支、武鸣特支等。

② 肖雷：《战胜艰难险阻的保证》，载广西《支部生活》，1984（1）。

炎林，把李亚群的意见向钱兴作了转达。此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情况通过张兆汉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中共中央的指示又由张兆汉向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传达。至此，广西省工委与南方局取得了间接联系。

第十五章 日军全面入侵广西和桂柳会战 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开展

1944年，日军全面入侵广西。国民党军队部署桂柳会战，保卫广西。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腐败，各派系争相保存实力，消极作战，导致会战失败，广西全省迅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广西人民遭受空前大灾难。广西沦陷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共的领导下，桂东北、桂西北、桂东南、桂中南、桂南等地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侵略者，惩办汉奸，反对不抗日的顽固派。1945年5月，日军为作垂死挣扎，收缩占领区，开始退出广西。国民党军队对撤退的日军进行反攻追击，歼灭了日军部分有生力量。8月，广西全省光复。

一、日军全面入侵广西

1944年，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联接南洋交通线，摧毁在湖南、广西的美国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的“一号作战”。4月发动河南会战，占领平汉

路。6月发动湖南会战，先后攻占长沙、衡阳。日军占领衡阳后，8月设立第六方面军司令部，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统辖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等部，筹划“桂柳攻略作战”。日军作战计划是：以第十一军沿湘桂路南下，攻略桂林，并策应第二十三军攻略柳州；以第二十三军自广东西面进攻梧州、桂平，与第十一军合击柳州；在桂柳地区围歼国民党军主力后攻略南宁，打通桂越路。①



日军飞机滥炸梧州

8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以第三、十三、四十、五十八4个师团共10万兵力向湘桂线推进。9月初，占领祁阳、零陵、东安。中旬，第三师团南下占领道县、永明、江华。9月8日，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由零陵沿湘桂路向广西进攻。湘桂边境中国守军薄弱，9月12日，日军迅速突破黄沙河，向桂北大门全县扑来。13日，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弃城逃跑，日军不战而占全县。9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从湖南永明进攻龙虎关突入广西，向灌阳、恭城、平乐、荔浦方向进击，从东南面包围桂林。广东方面日军第二十三军主力为策应桂北日军作战，突破高要、四会中国军队防线，溯江而上，9月22日占领梧州。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从雷州半岛攻取遂溪，北上进入广西，陷容县，与西江方面日军会合，攻占丹竹美军机场和平南县城，围攻桂平。10月12日，日军占领桂平。

桂北日军占领全县后，在全县、兴安、灌阳一带集结兵力，准备进攻桂林。10月中旬，日军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路向大溶江，一路向高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辑，55页，台北，军事译粹社，1978。

尚田，一路向海洋坪，合击桂林。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击溃桂林外围中国守军，10月底逼近桂林城。这时，日军一部南下攻占永福，截断桂林与柳州的交通，桂林处在日军四面包围之中。



被日军焚烧破坏后的桂林一角

日军完成对桂林包围后，11月1日从北、东、南三面向市区进攻。经过一个星期的攻击，日军占领漓江东岸沿河阵地，随后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火炮、战车的支援下强渡漓江，突入市区，与中国军队进行激烈的巷战。北门的日军用炮火击毁鹦鹉山中国守军阵地，冲入市内。10日，日军占领桂林城。

日军围攻桂林的时候，发现桂林中国守军有限，即分兵一路南下，第十三师团占永福，第三师团占修仁，之后向柳州急进，会同桂平方面的第二十三军，从东、北、南三面合围柳州。11月10日，日军攻占柳州。日军入侵桂林、柳州得手后，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二师团和二十三独立旅团南下进攻，一路击溃国民党军，占领宾阳，沿邕宾公路进攻南宁，11月24日占领南宁。这时，在越南的日军第二十一军乘中国军队溃败之机，分路北上，侵入中国境内，击溃中国守军，12月10日，与自南宁南下的日军在绥渌会师。至此，日军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

日军在广西攻城略地，连连得手后，为给中国军队以进一步的打击，第十一军令第三、第十三师团沿黔桂铁路向西追击，攻占宜山、金城江、南丹等县城。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八寨，3日进至都匀才停止前进。黔桂沿线中国军队望风而逃，从各地疏散来的大量战略物资及补给品，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各部队几乎以其虏获之机关枪等为其主装备”，此“诚属奇异

现象”。[①]

1944年12月，日军攻占桂、柳、邕、梧和大部分县后，攻势作战结束，转为占领固守。第二十三军一部撤回广东，一部调入越南，还有一部开往湖南，第十一军留守广西。第十一军分布广西各地，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因此，日军占领广西也和其他沦陷区一样，实行“以华制华”政策，收买汉奸，建立伪组织，以达到“以战养战”。

但是，广西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极端仇视，沦陷区人民已逃避一空，物资迁走，日军占领的许多城镇只是一座空城。日军虽然尽力收买汉奸走狗，建立维持会、伪县市政府等，但普遍遭到人民抵制，有的地方始终无法建立起维持会，直至1945年日军撤离广西时，仍建立不起全省统一的伪组织。在日军刺刀下建立的伪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流氓、地痞、土匪、恶霸和失意军政人员，这些民族败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鱼肉同胞，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1944年11月，日军占领桂林后设立警备司令部，司令部有个复兴处，分总务科、军事处、民政科、交际科、财政科、警察队等，处长白堃公。1945年2月，复兴处改为维持会，白堃公失宠，刘志坚当主任。城郊各乡也拼凑了维持分会。桂林沦陷后，城内居民很少，无商业、无税收，因此伪组织的任务是替日军筹粮筹款，其主要活动是开烟设赌，征收税捐；诱骗群众回城，发放“良民证”；派丁拉伕四处搜集食物，寻找妇女供兽兵泄欲等。[②]由于伪组织遭到人民的抵制，回城的群众寥寥无几，维持会一筹莫展。不及逃避和回城的百姓，则任由日伪蹂躏，备尝亡国奴的惨痛生活。1945年7月，日军撤离桂林时，大肆烧杀，就连汉奸也不放过。日军宪兵队将维持会大小汉奸一网打尽，严刑拷打，有的被关押处决，有的被活埋和刺死，有的全家被抄斩，有的闻风事先逃亡，有的投奔国民党军后被捕杀。白堃公被关押，在狱中服毒自杀。刘志坚下落不明。

---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辑，57页。

② 阳家臣：《记桂林沦陷期间的伪组织》，载《桂林文史资料》，第5辑，226～227页。

日军占领广西期间，所到之处穷凶极恶，大肆烧杀淫掠，惨绝人寰，充分表现了法西斯侵略军的疯狂性和野蛮性。1944年10月28日，日军进攻桂林时，市东郊王家村及其附近农民400余人为躲避日军杀害，躲入村东的岳山黄泥洞岩内。29日晚，日军窜到王家村，抓不到村民，放火烧村后佯装撤走。这时躲在岩内的一些青年下山救火，日军发现山洞有人躲藏，立即包围上去。两个日本兵追到山洞里，强奸了跑回洞里的两个女青年，出洞时一人失足跌死。山下日军闻讯后，蜂拥而上，把农民存放在洞口的谷米、财物堆在洞口焚烧，将浓烟灌入岩内。过了一天，日军见还有人从岩洞逃出，即到村中抢来干辣椒，用衣服包裹毒气瓶加火烧熏，使岩洞内避难的村民全部熏死。仅王家村躲避在岩内的142人，就惨死137人。后来当地群众为纪念死难亲人，控诉日军暴行，将黄泥洞改名为“白骨洞”。

同年11月16日，盘踞雁山的日军闯入五塘村掳掠，村里群众已躲入村西大吉山岩洞。日军见村里无人，走出村外发现山上有炊烟，即搜山找到岩洞口。日军在洞口叫喊无人答理，就恼怒地将农民堆放在洞口的箱笼、衣物、干烟叶等淋上煤油，点火燃烧向洞里熏烟，洞内208个村民活活被熏死。大吉岩对面一座山上也有一个岩洞，莫家村几十人躲在洞内，也被日军熏死不少人。

日军盘踞南宁期间，也四出城郊大肆烧杀。金鸡、乐贤村一带一次遭到日军洗劫，惨遭杀害群众近千人，村里村外死尸遍地，令人触目惊心。1945年春节期间的一天上午，日军闯到钦县上那岭村，强迫村民和躲避到这个村的难民到村边伏在地面，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未射死的用刀砍死，将3个不满两岁的婴孩“抛刀花”刺死。上那岭村在半天被杀108人。

在平乐，日军一次抓到抗日自卫队24人，押到村边，强迫他们挖一个大坑，然后强迫他们站入坑内，将他们活埋。在迁江县（今属来宾县）大里乡，日军将一位78岁的老妇人的手足缚在4头牛腿上，驱牛前走，日军以听这个老妇人的惨叫声为乐，直至这个老妇人断足拆臂，日军还大笑不止。

日军强奸妇女，像一群野兽惨无人性。在龙州，日军一次抓到60多个妇女轮奸，老的60岁，小的11岁，11岁女孩被轮奸后死去。在贵县太平村，

日军抓住11个妇女强奸，有一位妇女坚决反抗，日军砍掉她的手，她不服从，又砍掉她两脚，她仍不服从，至死不屈。在阳朔县报安乡下寨，一天晚上日军突然来“扫荡”，一些妇女来不及逃跑被捉去轮奸。日军发泄兽欲后将她们的衣服剥光，要她们裸体推磨、挑水、煮饭，日军在一边戏弄狂笑。白沙五里店一对新婚夫妇被日军抓住，日军令其丈夫和另一青年用木板抬着妻子，由日军轮奸，那妇女哭喊挣扎，兽兵们则在狰狞大笑，丈夫反抗，被兽兵刺死。兴坪乡有个70多岁的老妇女被日军强奸，日军蹂躏她后还用竹签插入其阴部，她当场惨死。

日军入侵广西期间，烧杀淫掠，罪行累累，举不胜举，给广西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据统计，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全省遭日军蹂躏的地域范围达80个县、市、局；① 人民死亡497364人，受伤431662人，失踪54470人；被破坏受损失的工厂253家，矿场691个，公路80%，公私汽车546辆，各种船只11476艘，还有大量的其他人民财产，共计8277亿元（价值以1944年计算）。② 在沦陷区，到处是凄凉惨景，遍地是断垣残壁，收复时桂林、柳州等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所完整的建筑物。广大乡村田园荒芜，庐舍坵圩。日本侵略军大肆焚毁房屋，使千百万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日军所犯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二、桂柳会战，国民党军溃败

日军进攻广西时，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进行“保卫广西”的“桂柳会战”。但国民党军各部在敌人进攻面前，争相保存实力，消极抵抗，节节溃败，致使广西迅速沦陷。

日军进攻衡阳后，蒋介石即命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部署桂、柳防

① 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全省沦陷75个县、市，其余为敌窜扰区。局即金秀设治局，1942年设置，1947年撤销。

②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76～78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御，“死守”桂林、柳州，并派白崇禧回广西指导。广西是桂系老巢，白崇禧打算组织一次会战，以第十六集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等部确保桂林、柳州，并请蒋介石将在贵州的中央军主力调进广西，协同反攻，围歼入侵桂柳的日军。1944年8月，在白崇禧指导下第四战区部署“桂柳会战”，以中央军第九十三军“死守全县三个月”；在桂林成立“防守司令部”，挑选在军阀战争时期守城“英雄”韦云淞为防守司令，守城部队为桂军第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任务是“死守三个月”；柳州的防守，由广东方面调来的粤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实际只有第六十四军一个军）担任，任务也是“死守三个月”。此外，还有从湖南败退广西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九十七军、新十九师等作为机动部队。

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桂林危急。桂林城防司令部命令全市紧急疏散，市内顿呈紧张状态。各机关纷纷抢夺交通工具，将人员、物资外运，市民无运输工具者丢掉财物，携儿拖女向南逃难，秩序极为紊乱。守城官兵纪律废弛，晚上四出入商店、民房，倒笼翻箱搜寻财物，见鸡杀鸡，见狗杀狗，把人民带不走留下的财物抢得精光。这时，广西省政府不顾百姓死活，只顾逃亡。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先是疏散到宜山，桂林沦陷后迁往百色，到百色不几天闻敌陷果德，各机关人员又分路奔向凌云、思乐，直至敌人停止进攻，才陆续回百色。

9月上旬，日军向湘桂边界黄沙河进攻，桂柳会战序幕拉开。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一部与敌人一触即溃，日军迅速逼进全县。13日，敌我主力尚未展开战斗，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就惊慌失措弃城南逃大溶江。撤退时陈牧农下令放火焚烧屯积在这里的大量军需物资，全城大火冲天，燃烧十几天才熄灭。原来向人民宣称“死守三个月”的全县守军，竟然一夜之间失守，桂林、柳州顿呈慌乱。全县失守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十分震怒，经请示蒋介石批准，10月20日在桂林将陈牧农处决。

在湖南，日军进攻桂北的同时，广东日军第二十三军沿西江进攻，占领梧州、桂平。桂平失守，严重威胁桂柳侧翼。当时，中国军队无法在桂北和桂东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张发奎和白崇禧商议决定放弃在平乐与敌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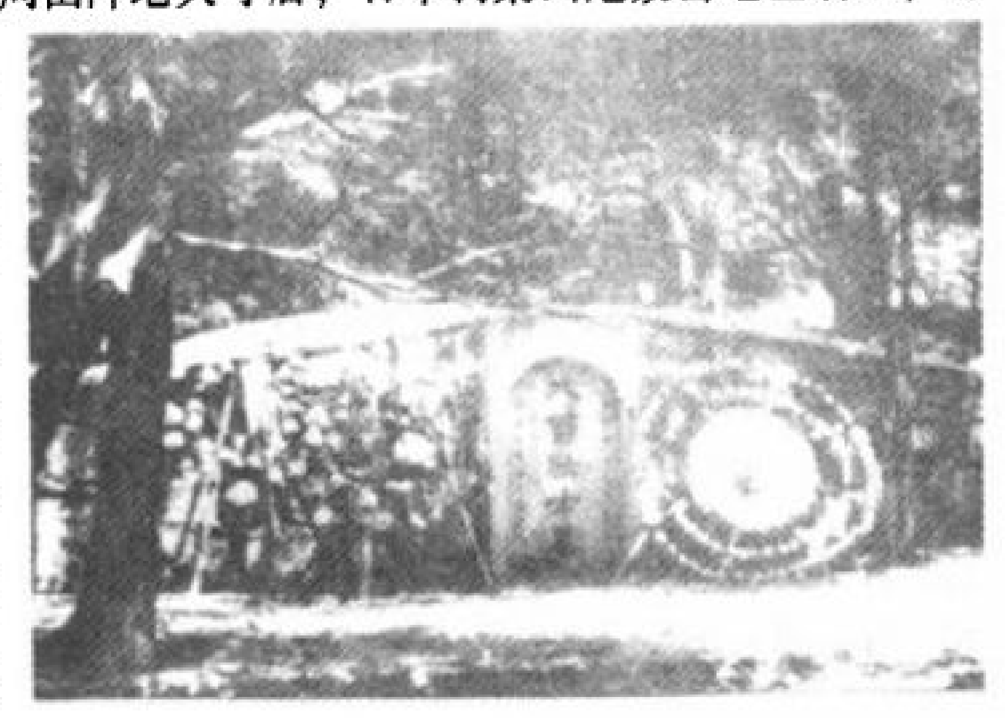
战的计划，利用桂柳间铁路和柳江河道，调张池第六十四军和黎行恕第四十六军至西江方面，先求击破桂平之敌，排除背后之威胁，得手后再将主力转用桂林作战。为掩护主力集结，第四战区成立武宣指挥所守备队，以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周祖晃为指挥所主任，指挥武宣、桂平方面的第一五五师和新编广西绥靖公署第一、第二纵队，积极作战，阻止敌人前进，策应桂平主力攻击。反击桂平的作战是计划5天内攻下桂平，将当面之日军独立第二十三混成旅团和第二十二旅团全部予以歼灭。10月中旬，桂平反击战开始，攻击正面日军的为张池第六十四军3个师，另配有美式榴弹炮一个团、山炮一个营，美国空军以柳州机场为基地使用约50架飞机协同作战。战斗开始后，中国军队士气旺盛，攻势凌厉，美机轮番对日军阵地猛烈轰炸扫射，陆空、步炮协同动作，攻略了日军蒙圩前进据点，据守桂平日军伤亡惨重。配合桂平反击战的平南以北中国军队也屡次破敌。陷入困境的桂平日军纵火烧城，准备撤退。日军司令部为解救桂平之危，令桂平南岸之第二十二师团火速救援。在日军调集兵力增援反扑时，白崇禧保存实力，不按原计划调第四十六军渡过邕江，与张池第六十四军夹击日军，改为配备于张军的背后。这样，使日军得以集中全力应付正面。中国军队打到第10日，越打越被动，加上桂北日军南下威胁柳州，不得不撤退。中国军队反击桂平失败，日军向西进攻，柳州危急。

在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桂平作战的时候，桂北日军已做好进攻桂林的准备。10月中旬，日军向大溶江、高尚田一带中国守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九十三军、新十九师等部对敌作了一些抵抗，但抵挡不住日军攻势，节节后退。10月下旬，日军对桂林形成合围，形势危急。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在贵州按兵不动，不肯参战。白崇禧见蒋军主力不来，于是放弃在桂林会战的计划，保存实力。白崇禧以桂林防守“应用依城野战之手段，把主力控置于城外实施决战防御”① 为名，将第四十六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七五师和第三十一

① 李汉中：《一九四四年“桂柳会战”》，载《广西抗战亲历记》，63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

军的第一八八师调出城外，进行“野战防御”，城内仅留城防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及所属第一三一师和第四十军的第一七〇师，以应付蒋介石的“死守”命令。白崇禧把桂军两个主力师调出后，原来两个军四个师的防御阵地，由两个师来防守（两师大半是刚征集来的新兵），加上一些零散部队，城内总兵力约2万人，防守力量很单薄。调出城外的两师和其他部队，在保存实力的方针之下，拼命逃跑，桂林城内守军成了孤军，军心大受影响。蒋、桂保存实力，无意防守桂林，当时连日军也看出来了，“敌军虽然高唱死守桂林”，但事实上“已决定放弃该地”。[①] 更令人痛心的是，日军尚未到桂林，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就以“扫清射界”之名下令放火。当天西北风特别大，火势从北向南，迅速蔓延，桂林一片火海，人民财产付之一炬，整个桂林在敌人来到之前已成了一片焦土。

虽然蒋、桂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但守城的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他们以2万人抗击近1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战斗，有的阵地打到最后一个人。漓江东岸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七星岩守军凭险固守，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周围阵地失守后，日军调集山炮轰击七星岩口，守军伤亡严重，不得不撤入岩内。日军攻占岩口后，先以手榴弹投入岩内，继则用汽油灌入岩内燃烧。但守军宁死不屈，仍在岩中向岩上之敌还击。日军竟惨无人道地使用毒气弹投入岩中，岩内8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日军突入市区后，守城官兵同



800爱国将士在桂林七星岩被日军毒气杀死，此为800将士墓

①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辑，54页。





保卫桂林战死的三将军——陈济桓(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左)、阚维雍(第三十一军第一三一师师长,中)、吕旃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右)

敌人展开顽强的巷战，誓与桂林共存亡。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率队向敌人冲杀，壮烈牺牲。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负伤不能行动，不甘被俘受辱，以枪自戕。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少将对城防司令韦云淞的贪生怕死弃城逃跑，悲愤交加，深恨未能保卫桂林，遂步入寝室，举枪自戕，壮烈殉国。[①] 由于国民党当局奉行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的方针，桂林仅"死守"10天即告沦陷。

柳州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原部署粤军邓龙光第三十五集团军等部防守，后来张发奎以"机动"掩护柳州之名先后将其调出。日军进攻之前，张发奎指定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守柳州。杨部系第九战区败残，号称3个军实际不足2万人。日军进攻桂林时得知柳州城防薄弱，令第三、第十三师团主力从桂北直扑柳州，会同桂平方面日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柳州。在强敌合围形势下，杨森部军无斗志，贪生怕死，3个军中，杨汉城是杨森侄子，杨军是杨森老本，不愿担任城防任务。罗奇军是蒋介石嫡系，不愿归杨森指挥，擅自向桂西而去。于是柳州守城任务就落在一个杂牌军丁治磐头上。日军向柳州发起攻击后，守军隔河与敌对战一天，丁治磐不待敌主力展开，就弃城突围。其他外围各部也纷纷向西逃奔。张发奎率第四战区长官部

---

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晋阚维雍为陆军中将。1946年3月29日，桂林举行广西各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和八百壮士安葬于七星岩霸王坪。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三将军为烈士。

从宜山一直逃到贵州六寨。在国民党军各部争相保存实力之下，柳州与桂林同时告失。

由于国民党军保存实力，消极抗日，所谓“桂柳会战”最终成为大溃败，广西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浩劫。

三、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开展

在国民党军消极抗战，节节溃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保卫家乡，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

1944年7月，在桂柳形势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到广西，检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在桂林、柳州等地工作的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疏散转移情况，并通过张兆汉向中共广西省工委传达了南方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指示。指示说：日军企图打通大陆干线作最后挣扎，国民党为保存实力，将不战而退，广西即将沦为敌后。因此，今后应按实际情况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党内同志能够上山打游击的，就上山去打游击。[①] 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8月作出了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决定指出：广西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战而退的政策，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抗日保卫家乡的武装斗争，准备干部和枪弹，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②]“八月决定”为广西党组织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各地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

① 刘隆华：《我对南方局广西统战部工作的回忆》，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3（9），17页。

② 《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18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在桂东北，1944年8月，省工委交通员肖雷到全县、灌阳部署抗日武装斗争。9月，全、灌沦陷后，中共灌阳特支通过统战关系以国民党地方当局名义，先后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抗日政工队、抗日宣慰队等7支抗日武装，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灵川特支在灵川沦陷前夕，成立了潞江抗日自卫队，随后又争取灵川县长的同意，成立灵川青年抗日政治工作队。灵川沦陷后，这两支抗日武装积极发动群众，袭击日军，捕杀汉奸，开辟了河东、潞江两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肖雷又到阳朔、平乐，和当地党员发动群众，先后成立阳朔兴坪战时服务队和平乐平北游击队。1945年2月，平北游击队转到阳朔兴坪与战时服务队会合，建立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在阳朔、临桂、灵川、平乐、荔浦、恭城等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修仁县十锦乡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共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保家乡斗争，组建了十锦抗日自卫队，开展乡村联防，打击入侵日伪。昭平、贺县党组织和撤退到这里的进步人士开展抗日宣传，也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等武装。

在桂西北，当地共产党员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48支民众抗日自卫队。1944年12月，德胜、加保、乾合、都衔、永泰等抗日自卫队数千人联合作战，围攻入侵道村的日伪军300余人，经两昼夜激战，毙敌100余人。宜山县民众声势浩大的抗敌斗争，有力地阻滞了日军对南丹、都安的进犯。同年11月，中共融县特支、柳州日报社特支和桂林文化支部联合成立中共桂北临时工委，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桂北临时工委通过统战关系建立了融县自卫队第二分队，次年1月第二分队脱离县政府开赴河东，改编成立融县抗日挺进队，后发展到7个分队，800余人。2月，又在北区组建融县抗日挺进队，100余人。5月，挺进队在高滩底伏击、毙伤日伪军400余人。

在桂东南，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在贵县木格乡社塘村召开贵县、兴业、博白、陆川等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工委“八月决定”，制定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行动计划，成立了以黄彰、吴家宜为正副主任的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会后，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队、自卫军和抗日同盟会等28支武装，2800余人。1945年2月底至3月初，陆川、博白、兴业、贵县在办

事处的领导下先后举行抗日反顽起义，攻占国民党30多个乡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起义后，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残酷镇压，黄彰、吴家宜等被捕牺牲。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南路，其余分散隐蔽，坚持斗争。平南、桂平县人民在共产党员的领导和影响下，建立数千人的抗日自卫队。两县抗日武装经常联合抗击日伪“清乡扫荡”。1944年10月，桂平大宣、金田、彩村、武靖、江口、紫荆等乡自卫队联合平南鹏化抗日自卫队共2000余人，围攻驻大宣圩日军两昼夜，毙伤敌多人，夺回稻谷10万余斤，收复大宣圩。次年4月，桂平县抗日自卫总队成立。5月，率各区乡抗日武装围攻县城，迫使敌人撤退。

在桂中南，在国民党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职的共产党员梁宁、卢哲等，通过民团指挥官梁翰嵩的统战关系，领导上林县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11月，在镇圩召集上林、隆山、都安、武鸣、那马五县抗日青年代表开会，部署抗日武装斗争。会后，上林各乡纷纷建立抗日自卫队，袭击入侵日伪军。武鸣县在夏黄成立抗日自卫队，次年初改称武鸣人民抗日义勇队，辖3个中队，120余人。宾阳县成立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宾阳永淳革命同志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44年10月，中共武宣特支建立通挽、伏柳抗日自卫队。次年1月，联络武宣、来宾、贵县三县边界抗日人士70余人在通挽村召开抗日联防武装大会，成立贵武来边抗日联防委员会。在东乡建立了东乡抗日义勇队，1月下旬，义勇队在浔江红石滩伏击日军船队，毙敌150余人。

在桂南，邕宁县各区乡纷纷成立抗日武装，不断袭击日伪军。坛洛区民众抗日自卫联队频繁伏击敌人，1945年3月至4月间作战多次，歼敌100多人。中共横县党组织领导各乡迅速成立抗日自卫队，抗击日军入侵。1944年12月11日，驻贵县日军派15艘木帆船队赴南宁，横县县委调集抗日自卫队300多人沿江截击，击毙日军100多人，击沉木船8艘，缴获一批弹药。1945年1月，日伪军300余人从南宁进犯横县县城，横县县委调集自卫队300余人，配合国民党横县自卫大队作战，毙伤敌数十人。龙州、凭祥的群众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1944年12月成立中越边界抗日自卫队。思乐、明江地区中共党组织在1944年冬建立爱店青年抗日救国队、明江河南岸抗日政工队，通

过统战工作把思乐县民团大队改编为思乐民众抗日义勇大队。钦县、合浦、灵山、防城四县在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2月至3月，四县发动声势浩大的南路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军围攻，失利后分散转移，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

日军全面入侵广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西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同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全省沦陷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哪里有侵略者哪里就有游击队的战斗。他们阻击、袭击过往日军，破坏交通线，打击清乡抢劫的敌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惩办汉奸，打击破坏和阻挠抗日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建立了一批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轰轰烈烈的广西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人民，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广西收复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急骤变化。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胜利结束。太平洋战场美军反攻取得节节胜利，攻占冲绳岛后，对日本本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于孤立，处于最后挣扎的境地。日本大本营为应付美军对日本本土的作战，并准备应付苏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决定收缩在中国的占领区，特别是收缩其在华南的兵力，以确保华中和华北，并抽兵加强日本本土的守备。4月14日，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将在广西的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师团等部调往华中、华北。日军收缩在广西的兵力，为国民党军收复广西提供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军在湘西反攻作战胜利后，发现日军有收缩防线的迹象，即以第

二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对广西日军发动进攻。5月初，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开赴邕龙路两侧，切断南宁与越南的日军交通。5月中旬，张池第六十四军一部潜渡左江到南宁侧后活动，主力推进至南宁近郊。同时，韩练成的第四十六军推进至都安、上林、宾阳，攻击邕宾路之敌。国民党军从四面逐渐向南宁合围，日军逐渐放弃南宁外围据点。5月26日，第二方面军各部向南宁发起进攻。经过一天的战斗，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的五十二旅团向邕柳路撤退，一部逃向龙州，第六十四军收复南宁。接着，第六十四军沿邕龙路向西追击。7月3日，退至龙州的日军经凭祥退入越南。

第四十六军奉令向柳州追击日军，连克宾阳、迁江、隆山。此时，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沿黔桂路东下，5月20日，第二十九军克河池，23日克德胜。6月14日后连克宜山、柳城。随后，在第二方面军的配合下进攻柳州。29日，日军向桂林溃退，第二十九军进占柳州。

柳州收复后，第三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桂林追击。中路第二十九军沿桂柳铁路正面追击，克雒容、中渡、黄冕。7月24日占永福。右路第七十一军一部沿桂柳公路前进，克荔浦、白沙，24日占阳朔，直逼桂林近郊。左路第七十一军另一部从越城岭方面向桂林西北进逼，7月9日攻百寿，同日军反复争夺，23日占百寿。与此同时，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由龙胜向义宁，第二十六军向兴安、全县，截断敌人的退路。日军为保持通湘联络线，增援兵力反攻，战斗很激烈，双方伤亡严重。27日，包围桂林的中国军队向市区发起总攻，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主力和第十三师团一部由桂林东北逃经灌阳进入湖南，当日晚10时，桂林收复。日军撤退前对桂林进行疯狂的焚烧破坏，全城变成废墟，面目全非。当时驻桂美军新闻处报道："中国无任何一城较此次桂林所遭劫祸更甚者。"①

南宁日军败退时，贵县、桂平、平南一带的日军也撤退梧州。桂林收复后，第三方面军的第十三军由桂林向梧州进攻。8月15日，第十三军攻击梧

① 《桂林市年鉴》，36页，桂林市文献委员会，1949。

州市区，敌我相持到次日晨，敌乘船向广东撤退，梧州收复。至此，广西全省光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日军为作垂死挣扎，收缩战线，自动撤离广西，国民党军乘机跟进反攻，追击日军，收复广西。国民党军这次跟进反攻，是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场发动的有限的局部反攻作战之一。在这次反攻中，国民党军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有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给日军一定的打击，消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从而加速了日军撤离广西，使广西成为最早收复的省份之一。

第十六章　抗战时期的广西经济

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工厂向内地迁移。1938年内迁各厂和鄂湘工厂继续西迁，其中一部分迁入广西。外省工厂迁入广西，促进了省内工业的迅速发展，国民政府各经济部门和民营企业家纷纷在桂创办工厂企业，广西当局也利用有利的时机设立了一批省营工厂，广西出现战时工业繁荣的景象。省内各地手工业也因军需民用的需求，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林业方面，广西当局采取一系列建设措施，增加粮食生产，保证战时军需民食。由于农村壮丁大量被征调，劳力缺乏，尤其是日军入侵的破坏，广西农业生产严重衰落。抗战开始后，为保障军需民用的运输，广西当局征调数百万民工协助交通部修筑公路、铁路，建成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公路网络遍及全省，广西成为战时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建设促进了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支援了全国抗战。

一、外省工业迁入广西

抗战前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内地和边疆省份很少。抗战

前在国民政府实业部登记注册的工厂共有2435家，其中上海一地就集中了1186家，占全国总数的48.7%。[①] 七七事变后，日军把矛头直接指向东南各省尤其是上海，妄图摧毁中国的经济中心，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直到八一三事变前夕才决定将上海等地部分工厂西迁内地。上海等地工厂西迁，初期大部分是迁到武汉地区。南京沦陷后，日军溯江西进，武汉形势紧张，武汉地区的工厂分三路向西南、西北地区迁移，一路迁陕西，一路迁湘西南和广西，大部分迁往四川。

广西是崇山峻岭的边远省份，一时离战区又比较远，因而成为战区工厂迁移的地区之一。迁入的工厂主要集中在桂林，大多是与国防、军需关系密切的工业，如机器、兵工、电器、电力、汽车制造、化工材料、交通器材等。1938年迁到桂林的有中央铁工厂、华中铁厂、希孟氏军需机械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林分厂。迁到柳州的有捷和钢铁厂柳州分厂、广西中华铁工厂。迁到全县的有交通部全州机器厂；1939年，先后迁到桂林的有怀民实验工厂、强华机器厂、振昌五金机器翻砂电镀厂、朱洪昌铁工厂、熊发昌机器翻砂厂、六河沟制铁公司桂林机厂、中央电工器材第二厂、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科学印刷厂、三户印刷厂、国光印刷厂、中国印书馆、鼎丰美术制板印务馆、新华煤气制造厂；1940年迁入桂林的有东达昌机器厂、宝泰机器厂、大新机器木厂；1941年迁入桂林的有中一机器厂；1943年迁入桂林的有四达机器铁厂、启文机器厂、赵金记机器厂等。据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的统计，抗战时期迁入广西的工厂共计29家。[②] 这些工厂主要来自江、浙、沪、湘、鄂等省市。迁入各厂经过选址、购地、建房、装机等一系列筹建过程，到1940年有17家工厂完成建厂复工工作。[③]

迁桂工厂中以国营工厂规模比较大，资金雄厚，技术和设备先进，是当

①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7。

②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54～56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③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88页。

时全省战时工业的中坚力量。例如，桂林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有各种机床200部，年产发报机500部、收音机2500余部、收报机800部、电动发电机400部、手摇发电机1200部，还生产航空发射机和收受机等；中央电工器材第二厂有大型发信管抽气台一座、灯泡自动抽气机2部等，年产收信管2万只、发信管6000只、灯泡100万只、氧气2000筒；中央电工器材第四厂有各种工作机床200部，年产甲、乙组电池12万余只、单节电池5000打、加水电池2万只，还生产电动机、发电机等；浙赣铁路桂林机厂有工作母机30多部和化铁炉一座，制造各种精密车床、钻床机、抽水机等；湘桂铁路桂林机厂有工作机床150多部，各种锅炉14座，年修理机车36辆、客货车180辆。柳州的军政部第四酒精厂，年产酒精18万加仑；交通部柳江机器厂有工作机床220多部，生产大批修配汽车零件制造工作机及铁用品；交通部全州机器厂有工作机床80部、熔铁炉3座、炼铁炉2座和炼钢炉1座，年产工作机2000余部，修理火车头360多个。这些国营工厂大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战时服务的，为抗日前线生产和供应各种用品。在桂林、柳州还有几家兵工厂，生产和修理各种枪炮，保障抗日部队的作战需要。

抗战前，广西工业还很落后，只有10余家小型省营工厂和几十家小规模的民营工厂。抗战期间，外省近代化工厂迁人广西，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了广西工业的迅速发展。1938年后，在桂林、柳州、梧州和一些县城，新工厂纷纷成立，到1944年上半年全省登记注册的工厂发展到234家。[①] 广西成为战时工业发达地区之一，是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大本营”之一。

---

①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34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另据1948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三回统计，至1943年全省工厂共287家。

二、省营工业的发展

抗战前新桂系就比较重视工业建设，创办工厂、勘探和开采矿产等，初步形成了省营工业的规模。但由于广西工业基础落后，财力和技术有限，工业建设成就甚微。抗战军兴，战区各省工厂迁人广西，促进了广西工业的发展。新桂系抓住有利时机，一方面扩充原有各厂，另一方面积极筹建新工厂，实力不足的则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或民族企业家合办。广西省政府先后单独开办广西糖业指导所、广西造纸试验所、广西工业试验所、广西纺织示范场、广西玻璃厂等。与中央政府各部门合办的有：与经济部合办广西纺织机械厂、柳州电力有限公司、平桂矿务局；与贸易委员会中国茶业公司合办广西实验茶厂；与农林部合办广西蒸制骨粉厂；与中国银行合办迁江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等；与国内民族企业家合办的有广西面粉厂、广西中华铁工厂等。到1941年，规模较大的省营工厂发展到16家。[1]

新桂系筹建的新工厂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尤其是1939年后桂南形势紧张，许多厂矿遭敌机轰炸，生产停顿。有的被迫辗转迁移，资产器材损失严重。广西硫酸厂、广西糖厂、广西玻璃厂等先后停办。新桂系的工业建设遇到重重困难。1941年8月1日，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建设计划大纲》，确定“经济建设为首要”，制定了省、县建设目标和措施。根据这个大纲，为“统一生产组织之方式，集中人力物力，负起促进本省农工矿业生产，调节市场盈虚之重大使命，以达成本省建设计划”，[2] 同年9月在桂林成立广西企业公司。广西企业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设董事会，董事长陈雄。董事会下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34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② 陈雄：《广西企业公司概况》，载《建设研究》，第8卷第2期，1942。

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内分设总务、财务、工矿、农业、采销五部，并在桂林、柳州、梧州设营业处，负责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公司资本原定资本总额5000万元，由广西银行投资1000万元，各县区地方公股2400万元，各发起人认股1600万元。① 1942年增募股本5000万元。

广西企业公司以发展工业为主要任务，同时兼营农业、商业、金融等。公司成立后呈准省政府“备价承购”省营厂矿、农林场等14个单位，并“承购”广西中华铁工厂、广西面粉厂、广西贸易公司等各单位的省政府投资部分股本。1941年11月，公司正式接办省营士敏土厂、酒精厂、陶瓷厂、糖厂、印刷厂、桂林横塘农场等。12月，接收染织厂、制革厂。次年1月，接收庆远林场、南宁茅桥林场、柳州龙潭农场和昭平金矿区等。2月，再接收机械厂、雒容林场。同时，省政府原对其他各企业单位投资股份也被陆续接收管理。到1943年，广西企业公司拥有事业单位共34个，其中工业17个，矿业2个，农业6个，商业8个，金融1个。经营方式，独资经营21个，投资合办13个，投资资金共1.1亿元以上。②

广西企业公司名义上是商办形式，实际上是新桂系官僚资本的重要企业机构。企业公司董事长陈雄是广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公司经理和其他重要人员是省政府指定的。所谓向各县区招股，“实际上是由省政府指定专员为股东代表”。③ 广西企业公司的成立，是当时新桂系为抵制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统一财政和废除省级财政，保持广西经济半独立的措施。新桂系企图用组织商办公司来保存其苦心经营起来的工、矿、农、林企业，避免蒋介石的吞并。广西企业公司成立后，对原省营各厂矿、企业单位进行了整顿，增加资金，扩充设备，改善经营，使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企业恢复生产。由于采取了有

① 陈雄：《广西企业公司概况》，载《建设研究》，第8卷第2期，1942。
②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12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③ 李四杰、陈雄：《新桂系官僚资本的两个企业机构》，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84页。

力的措施，广西省营工业在抗战中后期得到一些发展。虽然省营工厂数量不多，但资金比较充足，技术和设备也比较先进，成为战时大后方工业的组成部分，为抗战生产和供应军需民用工业品。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新桂系惨淡经营的工厂企业大部分被焚毁破坏，损失惨重。

三、民营工业的兴起

抗战前广西民营工业除梧州外，寥寥无几。抗战爆发后，洋货来源缺乏，战时各方面的需要，外省工厂迁移来桂，刺激了民营工业的兴起，广西民营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桂林是省会和西南重镇，民营工业发展最快。战前桂林稍具规模的民营工厂，只有广宜安机米厂和民生木机纺织厂两家。抗战开始后各种工厂纷纷迁入或成立。1938年有永兴米厂、利成枧厂、钱荣记机器厂等相继建立；1939年有中兴机器厂、怀民机器厂、熊发昌记翻砂厂、三友电焊厂、陈昌记肥皂厂、强华机器厂、新华煤气机制造厂、中国兴业铸铁厂、科学印刷厂、三户印刷厂、中国印刷厂等设立；1940年有建成铸铁工厂、国华电焊厂、茂海铁工厂、中华锯木厂、中国动力机厂、君武机厂、利华机器五金厂、沈宜甲煤气机制造厂、大华铁厂、民权卫生材料厂、建设印刷厂、青年印刷厂等成立。直到1944年上半年，还有一些新厂设立。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桂林登记注册的民营工厂共64家，其中金属品冶制业23家，机器业14家，交通器材业10家，印刷业6家，电工器材业3家，碾米业3家。[1]

梧州向来是广西工商业中心，民营工业有一些基础。1937年后民营工业进一步发展。1938年有华南炼矿厂、银星工厂、广利安修机厂、叶国光线辘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32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厂、代月五金属制品厂等设立；1939年有珠光工厂、兴业机造厂、先进金属制造厂、华南铸铁厂、西荣棉厂、利文印务局等成立；1940年有民生工业社、复兴纸厂、发明电泡厂、徐国保制造灭火筒工厂、中华炼铁厂等设立。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梧州民营工厂共53家，其中金属品冶制业10家，棉纺业6家，电工器材业5家，印刷业5家，机器业3家，教育用品业3家，面粉业2家。①

柳州地处全省交通中心，民营工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新建立的工厂主要有福龙机器厂、新华英机器厂、柳州锯木厂、捷和钢铁厂柳州分厂、柳江机器厂、捷兴煤气发生机制造厂、华强机器工厂、合众煤气机制造厂、兴国机器厂、建筑机器厂等。

田东、贺县、平南、昭平、隆山、雒容、北流、象县、全县、桂平、岑溪等县，也先后办有一些小规模的民营工厂。到1942年上半年，根据登记注册统计，全省民营工厂共133家,其中金属品冶制业34家,机器业20家,交通器材业11家,印刷业11家,碾米业9家,棉纺业6家,电工器材业8家。②

抗战期间，广西民营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大后方战时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战时军需民用的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民营工厂除了生产民用品外，许多工厂都同政府有关部门或军工厂家签订合同，承做军工订货，或为其做一部分工作，生产战时军用品。如桂林大中机器厂，年生产军用引信4万套，平板测量仪500套；大新机器锯木厂年产手榴弹木柄15万个，纱管1.2万个。据统计，抗战期间，全省五金器材业年产弹柄、弹管50万枚，大部分是民营工厂生产的。③ 民权卫生材料厂专门生产药棉纱布和绷带，供应前线。机械和电器制造业除做普通机械电器外，生产收发报机、手摇发电机、无线电收

①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32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② 《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32页。另据1948年出版的《广西年鉴》第三回的统计，至1943年，桂林、梧州、柳州三市民营工厂共216家，其中桂林99家、梧州65家、柳州52家。

③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38~41、47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音机等供应部队。还有电信器材业生产的电线、电池、收信管、发信管，化学行业生产的氧气、硫酸钠、电水，纺织行业生产的布匹、毛巾、棉纱、棉花，等等，也大都是供应抗战前线的。

然而，抗战时期广西民营工业规模比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材料来源困难，效益低，许多工厂实际上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桂林市民营工厂中资本50万元仅一家，30万元2家，20万元3家，18万元与15万元各1家，10万元12家，5万元至10万元13家，其余均在5万元以下。① 有43家工厂完全利用人力，无动力设备。厂房设备多半因陋就简，租赁一二间民房，将各种机械挤在一室，光线既不充足，安全更少顾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是影响民营工业的最大问题。生铁，战前每吨40元，1940年涨至900元，1941年又涨至2800元。②物价不断高涨，使民营工厂成本不断加重，资金周转呆滞，无力购买原材料，营业越来越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统制，加捐重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乘机掠夺，大后方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1941年后走向衰落。民营工业集中的桂林，新设工厂日趋减少，许多工厂停工停产或改组合并，能勉强维持的都缩减生产规模。1943年各厂称“目前各工厂的情形，最多再维持半年或一年，一年以后，北极路上，不会再看见工厂烟囱冒烟了”。③ 大后方民营工业的衰落，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很艰难，前景暗淡。

四、战时手工业

广西手工业原来品种繁多，凡家用器具及一切衣食日用必需品均有生产。

①② 秦柳芳：《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市工业调查》，载《广西省银行特刊》，第5期，20页，1941年。

③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145页。

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入后，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落后，产品粗劣，不能与外货竞争，许多逐渐被陶汰。抗战前，残存的手工业多是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村副业，如桐茶油业、制糖业等和各城镇以本省特产为原料的加工制造业，如制革、造纸、织布、陶瓷、酿酒等。抗战爆发后，沿海被封锁，对外贸易锐减，洋货短缺，各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手工业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制糖是广西重要的手工业，各县普遍种植甘蔗，因此各地盛行制糖。制糖多沿用土法，以产黄糖为多。1937年全省黄糖产量61万担，白糖7万余担（一担约50公斤）；1940年黄糖产量增长为87万担，白糖12.7万担。[1] 桐油业是战前广西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之一，抗战期间继续发展，至1940年桐油输出每年保持在25万担以上。

土布业是遍及全省的传统手工业，以玉林、桂林为中心。抗战期间洋纱洋布缺少，土布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玉林、全县纺织和弹花机有3万余架，从业人数7万以上，产品优良，可与洋布竞争，每年销售数量达100万匹，销售市场远至粤港和南洋。[2] 桂林是省会，1938年后人口成倍增长，各种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织布是其中重要的行业。据统计，1941年登记的织户300余家，还有不少未登记注册的织户。[3] 产品名目繁多，有小白布、小洋布、斜布、花格布、柳条布等，每年产布20余万匹，产品远销黔南和湘省东安一带。临桂六塘的麻布是著名手工业品，年产8000匹。

造纸业在广西有悠久的历史，但抗战前由于洋纸廉价倾销，日趋衰落。抗战开始后随着各种手工业的复兴，造纸业重新发展起来。全省造纸业可分为五个生产区，兴安、百寿区，出产湘纸；融县区，出产东纸；昭平、贺县区，出产桂花纸；北流、容县区，出产福纸和万金纸；都安、隆山、那马区，出产纱纸。前四区皆以竹子为原料，故又称竹纸区。纱纸是以纱树皮为原料，故又称为纱纸区。竹纸多供省内消费，纱纸除供应省内外，还远销港粤和南

---

①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109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②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63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③ 《广西统计季报》，第2~4期合刊，40页，1946。

洋。

抗战期间，各种手工业最兴旺的是桂、柳、梧等几个城市。桂林除织布业外，还有染布、梳篦、酿酒、纸伞、纸扇等。梳篦作业户有40余家，年产梳篦90余万把，质坚耐用，远销武汉、北平等地。酿酒业有50~60家，以产“三花酒”著称。柳州手工工业最发达的是卷烟业，手工卷烟作坊不下数十家；其次为制革业，有10余家。梧州手工业种类也很多，有牙刷、毛笔、制革、墨油、卷烟、酿酒、印刷等众多的手工工场。农村手工业最发达的是宾阳，织布、织席、纸伞、纸扇、牙刷、毛笔、竹木器、铁器、首饰、卷烟等各业兴旺；尤其是瓷器最著名，据1943年调查统计，安宁、孟圩、河田3个乡作业户789家，窑孔48个，[①] 产品主要在省内销售，少量销至云贵边一带。此外，富川的龙须草席是著名的手工业特产，曾于巴拿马赛会获奖，但产品甚少。

抗战时期，广西手工业在特殊的环境下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些传统产品获得了新生，这对满足战时大后方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扶植，这个时期的手工业大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许多手工行业规模极小，土法技术，产量很低，经济意义还很有限。如广西盛产牛皮，省内制革业也比较发达，但大都沿用土法炮制，产品粗劣，产量低，供不应求，每年仍需大量进口皮革。广大手工业者还受困于苛捐杂税和封建盘剥，步履艰难。由于上述原因，抗战后期许多手工业逐渐衰落。在桂林，阻碍手工业发展的封建剥削仍相当严重，纺织手工业者“受纱庄、布庄之剥削，不能直接购得广西纱，亦不能直接售于消费者（零售在外）”，加上捐税沉重，因亏本而纷纷停业，到1944年上半年全市织户剩下143家。[②]

---

①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70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② 《广西统计季报》，第1~4期合刊，40页，1946。

五、战时农林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需民食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广西是抗战大后方，担负着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战的重要任务。为了支援抗战，广西省政府提出农业的中心任务是"为增加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之生产，以求充裕民食，增厚抗战力量"，① 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农林建设的措施。

首先是加强农林行政机构。1938年2月，省政府建设厅第一科② 扩大改为农业管理处，隶属省政府。农业管理处内分秘书室和农务、林务、兽医、垦殖、水利、农村经济6组。同时，按各地农业状况将全省划分为6个农业督导区，分设督导人员，负区内各县农业督导之责。1939年6月，农业管理处增设督导室，并将农村经济组划出设立合作事业管理处。1940年，省政府机构调整精简，农业管理处改隶建设厅，农业督导区并入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3年9月，农业管理处改组，内设秘书、推广、会计3室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科。

对农业技术机构也作了调整和加强，除省继续办理设在柳州沙塘的农事试验场之外，1939年4月在6个农业督导区各成立一所联合农场。第一区农场设在临桂大圩，辖全县、资源、兴安、灵川、临桂、龙胜、义宁、永福、阳朔、荔浦、修仁、蒙山、灌阳、恭城、钟山、贺县、信都、怀集、昭平等20个县；第二区农场设在桂平城西岭村，辖象县、武宣、来宾、迁江、桂平、平南、藤县、苍梧、贵县、兴业、玉林、陆川、博白、北流、容县、岑溪等16个县；第三区农场设在宜山县城南凉亭阁，辖三江、融县、百寿、

① 黄旭初：《一年来之广西建设》，载《广西省政府公报》，第971期，11页，1941。

② 1936年2月省农林局裁撤，农林业务划归建设厅第一科主管。

中渡、榴江、雒容、柳城、柳江、宜北、天河、思恩、罗城、天峨、东兰、南丹、河池、宜山、忻城等18个县；第四区农场设在邕宁县西乡塘，辖都安、隆山、那马、武鸣、上林、宾阳、隆安、同正、扶南、绥渌、上思、邕宁、永淳、横县等14个县；第五区农场设在田东县，辖乐业、凤山、凌云、万冈、平治、西隆、西林、田西、百色、田阳、田东、果德等12个县；第六区农场设在龙州，辖天保、敬德、镇边、靖西、向都、镇结、龙茗、万承、养利、雷平、上金、龙津、凭祥、宁明、明江、思乐、崇善、左县等18个县。以上6所区农场是各区农业试验的中心机关，也是省农事试验场的工作分站。林业技术机构主要有雒容、庆远、槎路、茅桥、军山、龙州6个省营林场。1938年，槎路、茅桥、军山3个林场合并为南宁林场。1942年，庆远、雒容林场划归广西企业公司。1943年龙州林场拨交农林部。同年成立百寿山林管理局，六万垦殖区改为六万林场。原有各县林场改为县苗圃林场，专办育苗造林工作。1944年后桂林、平乐、柳城等16个县苗圃林场又改为县农林场。

增加粮食生产是农业建设的中心环节。广西粮食作物主要有水陆稻、玉蜀黍、大小麦、荞麦、高粱、红薯等。广西当局增加粮食生产的主要措施是推广优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增加肥料、提倡冬种、改良农具、兴修水利等。水稻是广西主要粮食作物，各地均宜种植。抗战前广西已引进、繁殖、推广一些优良稻种，取得一些成效。抗战开始后，广西当局又派员对全省水稻品种进行普遍的调查和鉴定，进一步推广优良品种。从1938年起，由省、区农场先后育成和引进优良稻种数十种，分给各县试种推广，各地农民竞相换种和繁殖留种。同时，大力提倡和指导农民使用堆肥、骨粉，种植绿肥等，到1941年全省大部分县已推广使用堆肥。广西土地严重缺磷，1941年省政府与农林部合作，在柳州建立骨粉厂，生产骨粉，增加磷肥。各县都普遍种植绿肥草，尤其是种红花草和肥田草。防治病虫害和改良农具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条件，广西当局也相当重视，省政府研制生产梳虫器3万架分发各县试用推广，并加紧研究防治病虫害办法。但这方面工作的效果不佳，每年都有大

面积的农作物病虫害，有的地方相当严重，损失甚巨。改良农具在抗战前也作了一些试验，抗战时期继续引进先进的农具仿造推广，除改良犁、耙、锄、铲等普通农具外，还引进仿造打稻机、玉米脱粒机等，分发各县试用推广。

增加冬季作物种植是增加粮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自1938年起省政府每年都制定冬种计划和办法，并派员分赴各县督导。冬种作物主要有小麦、荞麦、豌豆、泥豆、蚕豆、油菜、芋菜和绿肥草等，尤其是小麦、荞麦、豌豆、蚕豆4种作物，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1940年省政府规定冬季作物栽培面积至少须占各县耕地总面积的20%～30%。对一些冬种作物，如小麦、油菜等由政府给予贷款，凡农户愿种小麦1亩者由省政府贷予麦种5公斤（或法币5角），并由省或金融机关贷予肥料款1元。[①] 由于政府当局的提倡和鼓励，抗战时期全省冬季作物种植面积逐年扩大。1939年全省冬种面积为136.82万亩，1941年增至733.08万亩。[②]

水利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条件，抗战前广西已开始农田水利建设，但成效甚微。抗战开始后，广西当局把农田水利建设列为发展农业的重要工作。1939年春，省政府制定了农田水利建设计划。这项工作得到经济部农本局的支援和帮助，拨贷经费200万元，选派人员与广西省政府联合成立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后来，经济部又派遣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队、珠江水利局来桂协助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这样，从1938年广西农田水利各项工程按计划先后开工建设。农田水利工程，最主要的是利用小河小溪筑坝引水，灌溉下游田地；其次是筑塘贮水，即利用天然山谷，于谷口筑塘基，以贮高处流下之水，供谷外田地灌溉之用。自1938年至1945年，全省完成大型水利工程5处，即荔浦的合江坝灌区、田阳的那坡灌区、宜山的洛寿渠灌区、恭城的势江灌区、荔浦的蒲芦河灌区，灌溉面积10.83万亩。正在施工建设的大型工程

① 陈雄：《广西农业建设现状》，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419页，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② 《桂政纪实》，经济建设编，22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有：柳州的凤山河灌区、柳城的沙浦河灌区、思乐的海渊灌区、灵川的甘棠江灌区、永福的金鸡河灌区、雒容的石榴河灌区等，灌溉面积约50.8万亩。[①]各县自1932年至1941年也修建了469个小型水利工程，灌溉面积32.24万亩。[②]

以上各项建设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抗战以来广西年年征兵征工，大量壮丁被征调，有的县大半壮丁被征走，加上由于畏避兵役而逃亡，城市工价高于农村而转入城市从业等，造成农村壮丁减少，劳动力严重缺乏。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沦陷区人民避战逃亡，大量土地荒芜，更是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因此，抗战时期广西农业生产逐年呈衰落之势。从下面全省几种主要农作物产量年度统计可以说明之。

1937～1945年广西几种主要农作物产量统计表

单位：担

	水稻	陆稻	大小麦	荞麦	高粱	木薯	黄麻	籽棉
1937	55061623	1518418	652221	469918	78803	978206	40014	67988
1938	50824232	1437244	713636	522521	64607	938086	39571	72725
1939	57390445	1148496	555964	591513	66043	1478090	39555	87719
1940	46036251	883938	613556	526770	52855	1024229	36593	83227
1941	47348981	782116			47011	1383408	92121	186498
1942	40246931	1624870	133482	1214484	60914	1816846	37294	202455
1943	48655787	1591770			52379	2309784	37501	117476
1944	30790853		142260	522654				
1945	25000062		216819	156796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年鉴》第三回，286～343页统计数整理。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448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② 《桂政纪实》，经济建设编，64页，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林业建设方面，首先是整理省有林，对各省营林场的经营任务作了调整。雒容林场以经营油桐、油菜为主，南宁、庆远林场主要经营用材及薪炭材的杉、松林，龙州林场主要经营用材杉林。另设桂林药用植物场，采集和栽培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各省营林场历年造林情况见下表。

1937～1942 年省营各林场造林成绩统计表

	雒容林场		庆远林场		南宁林场		龙州林场	
	亩数	株数	亩数	株数	亩数	株数	亩数	株数
1937	370	398052	110	119500	1200	300340	4574	1041390
1938	1532	473256	1800	741625	900	249630	1256	286380
1939	1291	402486	1826	742827	3840	941790	1175	250585
1940	880	262084	1500	320854				
1941	801	192140	1113	225341	500	114500	330	79291
1942					530	1040000	205	65080
合计	4874	1728018	6349	2150147	6970	2646260	7540	1722726

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三回,507 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广西当局在办理省营林场的同时，继续推行30年代初以来实施的各县乡镇村街造公有林的做法，提倡私有林，发动民团、学校师生开办县、乡镇、村街林场、苗圃，在河流沿岸和公路两旁造林。各县历年造林情况见下表：

1937～1945 年各县造林成绩统计表

年　份	亩　数	株　数
1937	356293.71	32154513
1938	8865918	5512850
1939	196343.8	29326190
1940	19072.5	682641

年　份	亩　数	株　数
1941	118243.2	7946545
1942	138763.65	9272669
1944	44918.6	5966016
1945	33923	3416168
合　计	9773476.4	94277592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年鉴》第三回，514～517页统计数整理。

自30年代初以来，广西推广种桐收益颇为可观，1937年桐油输出28.9万担，占全省出口贸易总值四分之一，居于首位。因此，抗战时期广西当局继续推广种桐，造经济林。1939年5月，省政府与金融机关订颁广西各县植桐贷款通则，由农民自动组织合作社，申请贷款。1941年，省政府颁发整理县乡镇植桐实施办法，指定全县、资源等32个县先行实施，扩大种桐面积150万亩，增加桐油生产。到1945年，全省种桐面积约132万亩。广州失陷后，广西桐油出口受到影响，但1940年桐油输出仍保持在25.8万担。①

在林业建设中，广西当局继续实行放垦荒地，鼓励私人垦殖。1938～1939年，省政府派员调查各县大段荒地，制定放垦计划。抗战时期全省放垦荒地情况是：1937年123684亩，1938年16696亩，1939年61401亩，1940年118264亩，1941年202077亩，5年共放垦荒地522122亩。② 承领荒地垦殖大多数是华侨、富商、达官贵人，也有部分移民。经营垦荒者，柳江流域多由公司经营，承垦大段荒地。左右江流域多由个人经营，承垦荒地200～300亩，少的只有几十亩。垦荒经营以油桐、油茶及杂粮为主，少数种植稻、麦、水果和松、杉林木等。

畜牧业是广西农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抗战前广西当局已注意发展

①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105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年。

② 《桂政纪实》，经济建设编，19页。

畜牧业，引进推广优良品种，设立家畜保育所，防治牲畜瘟疫。抗战时期广西当局继续发展畜牧业。1938年经济部农本局拨款40万元，作为繁殖耕牛贷款，指定恭城、灌阳、上林、武鸣、田东、田西、万冈、东兰8县为贷款县份。省政府每年都拨款购买耕牛，1940年、1941年分别贷款购买耕牛2265头、3000头，猪、鸡、鸭等也继续从外省购买优良品种繁殖推广。1941年成立广西兽疫防治工作总站，管理全省畜牧兽医业务。抗战前期，广西畜牧业逐年发展。30年代全省耕牛有230万头，1942年发展到244.69万头。马、羊发展更为明显，30年代全省山羊约10万只，马4万余匹；1942年有山羊57.73万只，马12.73万匹。①

1939年和1944年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日军所到之处，牲畜是其屠杀抢掠的主要对象之一，尤其是对牛、马肆意滥杀。1944～1945年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据不完全统计，被宰杀的耕牛48万头，马6万多匹；至于猪、鸡、鸭等就更无法计算了。日军大量屠杀牲口，对广西农业生产破坏极大，战后许多地方农民恢复生产困难重重，首先是缺乏耕牛。

六、战时交通建设

抗战爆发后，沿海各省被封锁，出海交通断绝，广西成为战时军需民用的重要交通枢纽。为了保证军运畅通，广西当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公路和铁路的建设。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饬令广西省政府整修从全县到镇南关（今友谊关）的公路。广西省政府奉令后，征调民工加紧施工，在一年内完成整修任务，改善了路面，加固了桥涵，使大型载重汽车能通过，保证了军运。与此同时，

① 《广西年鉴》第二回，311页；《广西年鉴》第三回，535页。

省政府抽调民工修筑新的省道，饬令各县修筑县道。从1938年至1940年，先后动工修筑新的省道是：贺连路，由广西贺县至广东连县，桂段长约62公里；平岳路，由田东经天保至靖西边境的岳圩，为通越南的国际要道，全长171公里；百渡路逻八段，由逻里至八渡，长76公里，为通滇要道；河田路，由南丹大厂至田阳的田州，全长272公里；榴（江）永（福）路，此路为桂柳交通捷径；天龙路，自龙州经雷平、上金、养利、龙茗、镇结、向都至天保的坡村，全长260公里；桂穗路，自桂林经龙胜入湖南，长170公里。到1940年新修筑省道共1085公里。[1]

抗战前，广西县道已开始修筑，但由于各县财政困难，所修道路工程简陋，有的不能通车，有的通车后失修毁坏，县与县之间也没有衔接。抗战开始后，交通运输繁忙，为适应形势需要，各县征调大量民工整修原有各路，开筑新路，接通邻县，形成全省县道交通网，增强了战时运输能力。到1940年全省县道先后通车约1600多公里。[2] 1939年冬至1940年春桂南会战期间，为防止敌人利用，广西省政府命令各县征集民工先后将南宁、龙州、梧州、浔州、玉林、平乐等区接近战区的公路彻底破坏掉，桂南收复后才渐次恢复。

修筑铁路是抗战期间广西规模最大的交通建设。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交通部拨款兴建湘桂铁路和黔桂铁路。因广西多年来征调民工修筑公路颇有成绩，交通部决定湘桂、黔桂两路采用征调民工建筑，开修筑铁路史上“征工制”的先例。

湘桂、黔桂两路工程由交通部组织湘桂铁路工程局、黔桂铁路工程局负责设计，征用土地、征调民工建筑路基、征采枕木等工作分别由广西、湖南、贵州三省负责，分头进行。湘桂路，由衡阳至镇南关，干线1043公里，另有三条支线，即由冷水滩至零陵22公里，凤凰至大湾18公里，黎塘至贵县57

---

① 黄旭初：《抗战以来的广西》，89～90页，桂林，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1943。

② 黄旭初：《抗战以来的广西》，89～90页。

公里。除湖南境内208公里由湘省负责外，全路四段由广西征工建筑。全（县）桂（林）段，长167公里；桂（林）柳（州）段，长178公里；柳（州）南（宁）段，长260公里；南（宁）镇（南关）段，长230公里。广西省政府先后分别成立了四个段路工管理处，沿线附近各县政府成立征工处，征调民工建筑路基。全桂段，1937年10月开工建筑，1938年10月通车。桂柳段，1938年9月开工建筑，1939年12月通车。柳南段，1938年8月开工建筑，桂南战事发生后被迫停工，民工遣散，只完成土方80%。桂南会战结束后复工建筑，1941年9月柳州至来宾段通车，1943年3月全段竣工通车。南镇段，1938年4月开工建筑，1939年11月完成土方95%，后因战事发生，已筑路基被毁坏。

黔桂路，由柳州至贵阳，全长608公里，分黔段和桂段，同时建筑。桂段由柳州至贵州省边境泗亭，长302公里，由广西征工建筑。1939年8月，广西省政府成立黔桂铁路桂段路工管理处，沿线各县也先后成立征工处，同年9月开工建筑。1943年2月，柳州至贵州泗亭路基工程完成通车，5月通车至独山，1945年8月通车至都匀。

修筑湘桂、黔桂铁路，是抗战时期我国铁路建设的两项重大工程。发动民众协筑这两条铁路，是抗战期间广西最重要的抗战动员之一，广西人民为建设铁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牺牲。全省征调民工，以铁路沿线附近各县壮丁多少为比例，按路程远近征调50%～80%。全桂和桂柳两段，征调26个县民工25万人，征购各种枕木40余万根，采集道碴20万立方。柳南段征调29个县民工15万人，南镇段征调30个县民工20万人。[1] 湘桂、黔桂铁路，全省先后共征调80多个县民工100多万人参加建筑。每个民工需工作45天，完成路基40～50立方土方，而民工劳动所得每立方土方仅折米1公斤。在艰苦的劳动中，成千上万的人受伤或患病，甚至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柳南、南镇两段员工（民工占大多数）工伤病人44447人，死亡1482人；黔桂路桂段

---

[1] 黄旭初：《抗战以来的广西》，91页，桂林，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1943。

员工伤病人38339人，死亡1454人。[1] 湘桂、黔桂铁路的建成，对西南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交通和经济发展，支持全国抗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广西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 叶鸣平：《抗战期间广西征工协筑湘桂铁路纪述》，载《新桂系纪实》（中），31、39、40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第十七章　抗战时期的广西文化

抗战开始后，广西各地抗日救亡宣传迅速活跃起来。1938年后，沦陷区大批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者汇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大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撤退到广西，促进了广西教育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都有较大的增加，成人教育相当活跃。体育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各城市和部分县城各种体育竞赛活动很活跃，医疗机构增多，卫生保健工作进一步普及。

一、抗战初期广西救亡宣传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城乡沸腾，机关、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救亡。

首先是创办各种报纸杂志，大力宣传抗日。七七事变后，除原有各报纸继续出版外，各地先后创办了一批报纸。主要的有南宁《新闻报》、梧州《中山日报》、《贵县日报》、《玉林日报》、《龙州日报》、《怀集日报》、《博白日

报》、北流《建国日报》、宜山《庆远民众三日刊》、桂平《曙光日报》、平乐《突击三日刊》、陆川《动员日报》等等。杂志也纷纷出现，桂林有第五路军总政训处出版的《全面战》周刊、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出版的《克敌》半周刊、广西学生自治联合会出版的《歼敌》周刊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出版的《文化救国》、《火炬》、《生路》等。南宁有《新长城》、《呼声》、《大地》等；梧州有《抗战生活》、《燎原》、《呼声》等；苍梧有《救亡》；桂平有《曙光》；容县有《号角旬刊》；陆川有《呼声》和《咆哮》；贵县有《广西学生军》等等。这些报纸杂志，以宣传抗战为中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报道前线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和省内外各界抗战动员消息等，鼓舞了人民群众，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宣传最活跃的是歌咏、戏剧、漫画、讲演等活动。在桂林，国防艺术社与广西音乐会联合组织抗战歌咏团，“以激发士气振奋民心，俾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①] 机关、学校的职员、教师、学生以及音乐工作者纷纷加入，开展抗日歌咏活动。1938年1月8日，抗战歌咏团在体育场举行“火炬公唱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一万多人，每6人执火炬一把，以扩音机领唱，铜号伴奏，熊熊火炬配合万众歌声，然后举行游行，游行行列达数里，“整个桂林都给埋在火炬之光与救亡之歌声之中了!”[②] 在南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设立歌咏组，在中共党员的领导下将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编成若干小组，到街头巡回教唱抗战歌曲。1938年5月举行火炬巡行歌咏大会，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慷慨高歌“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③] 同年8月，南宁音乐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南宁乐群声歌协会，把抗战歌咏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在玉林，成立五九歌咏团，团下分大队、中队、分队、班，区民团指挥官任团长；各县设一大队，县长任大队长；

①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第5辑，87页，广西文化厅《广西通志·文化志》编辑室，1988。

② 一凡：《抗战中广西的动态》，72页，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③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第5辑，112页。

各乡村设中队、分队、班，乡村长任队长。歌咏团先集中由各学校音乐教师训练教唱，然后分别深入乡村教群众唱歌。许多县、乡都先后成立各种类似歌咏团的组织，抗战歌咏活动热火朝天，即使是在偏僻的边远山村也能听到抗战歌声，“杀敌歌、当兵歌等等，差不多每个壮丁，尤其小孩，甚至村妇都已经常从嘴里哼出，代替了以前的风情小调”。[①]

抗战前，戏剧活动大多在城市。七七事变后，学校、机关纷纷组织剧团、宣传队下乡演出，使抗战戏剧活动遍及城乡各地。国防艺术社一部分随部队北上抗日，另一部分留在省内活动。他们除在桂林演出外，还到义宁、永福、两江等地农村活动，先后演出《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电线杆子》等剧，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防艺术社的带动下，各学校、机关相继成立剧团、剧组，如桂初中剧团、东江分局剧团、桂国中剧团、省抗敌后援会话剧组、七七剧团、前锋剧社，大力开展抗战戏剧活动。抗战前南宁戏剧活动一度比较活跃，省会迁桂林后逐渐冷落，抗战爆发后各学校机关纷纷成立戏剧团队，演出抗日戏剧。1938年6月，南宁23个剧团举行抗日话剧联合公演，一连演十几晚，剧目有《警号》、《帮助我们的游击队》、《沦亡以后》、《总动员》、《杀敌卫国》、《到前线去》等，抗日气氛十分热烈。桂南形势紧张时，中共南宁地下党动员南宁文艺工作者参加战时工作团，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县开展抗日宣传，推动了桂南各县的抗日戏剧活动。梧州救国话剧社是抗战前由中共梧州地下党组建的，七七事变后为动员群众排演了一批新剧目，如《卢沟桥之战》、《东北之家》、《黑地狱》、《保卫中华》等。在救国话剧社的影响下，各学校、机关先后成立一批剧团，如梧州八一三剧团、梧州孩子剧团、梧州高中学生会巡回剧团等。他们分赴苍梧、岑溪、容县、北流、玉林、贵县、桂平、平南等县农村巡回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1938年11月，广西当局成立第三届学生军，编成三个团分几路奔赴桂东

① 枕画辑：《广西各角落的救亡运动》，23页，民团周刊，1938。

南、桂中南和桂南等地，分布全省55个县和广东省9个县，进行抗日宣传，所到之处开展歌咏、戏剧、漫画、壁报等活动，把抗日文化运动推向全省各地。在学生军的影响下，边远的地区如百色、乐业等县也成立了救亡剧团、宣传队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爆发后广西兴起的救亡宣传运动，是一场抗日文化运动，它发挥了宣传人民、动员人民的有力的战斗作用，推动了广西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抗战初期两年间，广西出兵几十万，征工100余万，进行五次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各界群众捐献鞋子9.3万双、棉衣2.2万件、毛巾和袜子数万条(双)、现金136万元，[①] 形成全省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群众抗日救亡高潮。

二、桂林“文化城”盛况

1938年10月后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

广州、武汉失陷后，沦陷区一批一批文化人先后汇集桂林。到过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他们当中有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有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学者、教授。各种文化团体也相继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创办。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汇集一个城市，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当年报纸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都占全国第一。”[②] 这批文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抗日文化新军，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新闻出版兴旺发达，是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

① 梁上燕：《广西建设》，68页，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2。

② 王坪：《文化城的文化状况》，载《广西日报》，1943年9月8日。

1938年10月以前，在桂林出版的日报只有《广西日报》一家。10月以后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桂林晚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民众报》、《自由晚报》、《辛报》、《小春秋》、《星期导报》等10余家。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时新闻社、中央社桂林分社、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桂林分处、华侨战地记者服务团等。在这些报纸和新闻机构中，《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影响最大，在新闻界中起了进步的主导作用。

《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在汉口创刊，在广州设有分馆。武汉、广州沦陷后，总馆迁重庆，分馆迁桂林。1938年12月7日起，重庆总馆按日将《新华日报》原纸型寄桂林分馆翻印发行。1940年4月因国民党当局无理阻挠，被迫停止翻印，但读者仍可从桂林分馆订阅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在桂林发行，对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国民党当局加紧邮政检查，多方刁难，运到桂林的《新华日报》残缺不全，有时积压多天才发还，可是“报纸一到即被读者抢购一空”。[①]《新华日报》成为追求进步，探寻救国真理的人们的精神食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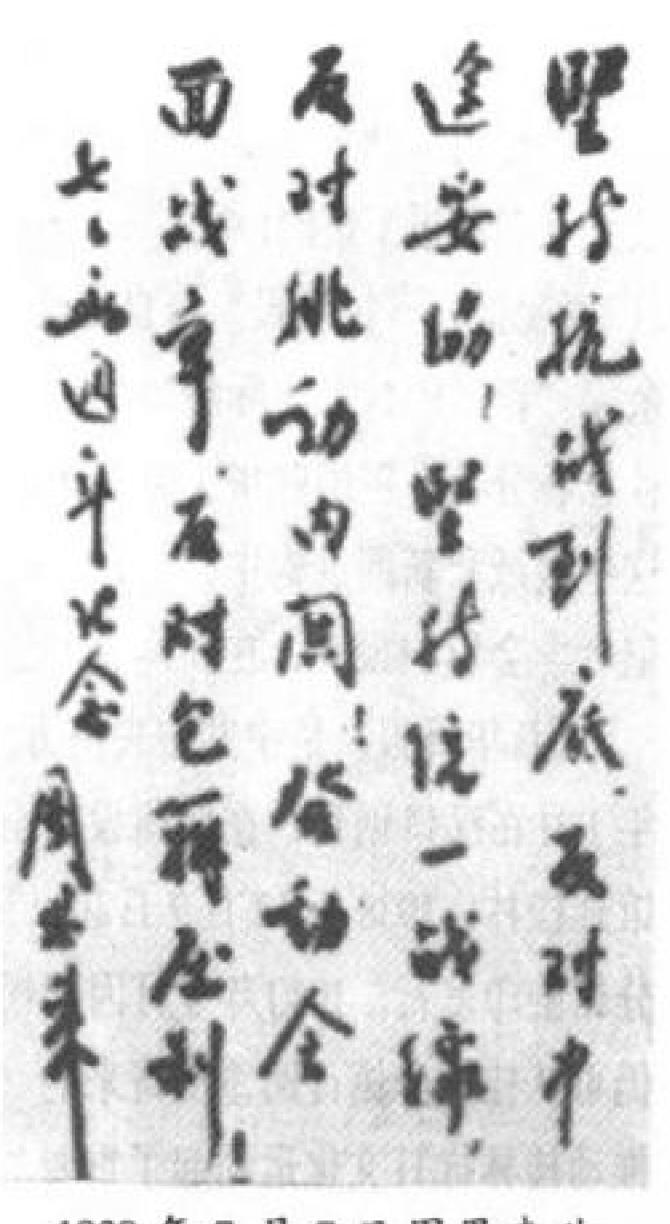
《救亡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报纸，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迁往广州，广州沦陷后迁



《救亡日报》旧址——桂林市太平路12号

① 卢杰：《真理的声音封锁不住》，载《广西日报》，1980年12月24日。

往桂林，1939年1月10日复刊。《救亡日报》复刊时，周恩来指示办报方针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救亡日报》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各党各派各界群众团结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救亡日报》虽是四开型小报，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清新活泼、尖锐有力，有国内外新闻、社论、短评，有各地抗战救亡通讯及有关抗战救亡、争取政治民主的言论和国际时事述评，有综合性文艺副刊等，实际内容远超过当时桂林各大报，因此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开始发行时仅2000份，后增加到1万余份，远销湘、赣、粤、川以至香港、南洋一带，成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学习时事政治必读的报纸，当时许多读者就是通过《救亡日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接受进步思想的。



1939年7月7日周恩来为桂林《救亡日报》题词

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1938年10月在长沙创办，同年11月在桂林设立总社，社长先后是范长江、陈同生、孟秋江，总编辑黄药眠。在香港设有分社，在重庆、金华设办事处。国新社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领导下，由记者以合作社形式开办起来的新闻通讯社。国新社的创办是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垄断，向国内报纸和海外华侨发布通讯和特稿，致力于团结

① 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记〈救亡日报〉在桂林》，载《新华文摘》1981（9），40页。

抗战的宣传工作。国新社社员大多数是散处各战场的战地记者，所发新闻大多是战地通讯，真实可信，生动感人，最受国内外报纸欢迎。当时采用国新社稿件的报纸，除《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外，还有150多家国统区报纸和海外报纸。①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1938年3月在周恩来领导下由范长江等在汉口发起组织的，武汉沦陷后迁长沙，长沙大火后迁桂林。1939年春青记总会迁往重庆，在桂林设青记南方办事处，同年3月成立桂林分会，由陈同生主持。青记和国新社一样，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新闻团体，国新社的社员基本上也是青记会员，互相配合，并肩战斗。青记共有1200多个会员，散布在全国150多家报社，成为当时团结抗日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青记派记者深入前线战地，甚至敌占区，采访、撰写战地通讯报道，同时还举办各种讲座、交谊会等，并利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报的副刊，开辟《新闻记者》栏，团结桂林各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推动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抗战前，桂林几乎没有正规的出版社，书店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1938年10月后书店、出版社宛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一部分是由上海、汉口、广州迁来的，一部分是一些文化人到桂林后创办的。当时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一带，书店鳞次栉比，门庭若市，被称为“文化街”。据统计，抗战期间在桂林先后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达209家。② 在这些书店、出版社中，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南方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科学书店、开明书店、白虹书店、立体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广西妇女社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受党的影响，有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以进步文化人士为骨干的，在繁荣兴旺的出版发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在出版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动员抗战、团结、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图书杂志种类繁多，琳

① 胡愈之、高天：《对革命新闻事业机关“国新社”的回忆》，载《新闻研究资料》，1980（2），50页。

②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概况》，428～43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琅满目，专著仅文艺方面就达1000余种，杂志近200种。① 其中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刊物有《建设研究》、《中国农村》、《新道理》、《青年生活》、《文化杂志》、《经济新闻》、《抗战文化》、《抗战时代》、《科学知识》、《世界知识》、《国民公论》、《全面抗战》、《少年之友》、《新工人》、《理论与现实》等等。此外，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的《论目前形势和任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重庆出版的《群众》，延安出版的《解放》和《中国青年》等杂志，也在桂林翻印发行。



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部分文艺刊物

戏剧活动丰富多彩，是桂林“文化城”的又一大特色。1938年冬后，许多戏剧家和戏剧工作者先后汇集桂林。全国一些有影响的戏剧团体，如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所属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旅港剧人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中国救亡剧团等，都先后到过桂林活动。一批当地的戏剧团体也相继成立，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立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新中国剧社、海燕剧艺社等。许多大、中学校组织了业余剧团。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在桂林演出的戏剧团体仅话剧团队就有七八十个之多。当时演出活动十分频繁，内容多姿多彩，有话剧、歌剧、舞剧、桂剧、平剧、粤剧和舞蹈等。每月都可以看到新的戏剧，尤其是话剧，每月都有一个以至几个新剧目上演。1942年上半年演出话剧30

①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概况》，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个，平均每月有5个，人们称之为“话剧年”。[①] 戏剧成为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武器。

在繁荣的戏剧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戏剧团队的大型联合公演。1939年1月，为纪念“一·二八”抗战七周年，抗宣一队、演剧九队、国防艺术社、抗敌后援会话剧组、青年铁血抗敌剧社等举行联合公演，演出《打鬼子去》、《民族公敌》、《死里求生》、《正义》、《重逢》、《亲兄弟》、《血祭》等。连续几天的演出活动十分热烈，“台上感召了台下，台下响应了台上，观众和演员在剧的进展中已融成一体了！”“歌、剧，使人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个人，无数个人的心已在激动的情绪中结成一颗巨心了！”[②] 同年10月，桂林所有的话剧团队联合公演夏衍名作《一年间》。导演团成员有田汉、施谊、马彦祥、夏衍、焦菊隐、马君武、欧阳予倩等著名戏剧家，参加演出者300多人，阵容强大。公演活动由国语蓝组和红组、粤语组、桂语组轮流上演，各界群众争相观看。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历时3个月，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粤、桂、湘、赣四省29个戏剧团队和单位，895人，加上大会工作人员近千人。演出节目有话剧23个、平剧29个、桂剧8个、歌剧1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170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剧展期间，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剧运文献、戏剧论著、戏剧团队史和戏剧珍本等，还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这次剧展，参加剧团之众，演出剧目之多，声势和影响之大，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在罗马时代曾举行外，还是仅见。”[③] 西南剧展把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桂林的抗日戏剧团队，除了在城市演出外，还深入农村、前线慰问演出。

---

① 田汉致郭沫若的信，载《戏剧春秋》，第2卷第1期，30页，1944。

② 《救亡日报》，1939年2月2日。

③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9日。

抗宣一队、剧宣五队和七队、新安旅行团、国防艺术社等，都先后奔赴江南敌后、桂南前线、湘桂铁路沿线演出。中国救亡剧团和厦门儿童剧团于1939年先后到南洋一带演出，把中国人民的抗战斗争和抗日文化传播到海外。

文学艺术繁花竞秀也是桂林抗日文化事业云蒸霞蔚的重要表现。1938年10月后大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云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也先后迁到桂林。这些文艺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文艺抗日救亡活动，促进桂林抗日文化的发展。1939年后桂林涌现大量的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野草》、《自由中国》、《黎明》、《前线》、《笔部队》、《文艺生活》、《文艺杂志》、《文学创作》、《当代文艺》、《战时艺术》、《戏剧春秋》、《中国诗坛》、《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木艺》、《音乐与美术》、《新音乐》等五六十种。一些综合性刊物、报纸也辟有文艺专栏、专版，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一个国统区小城市，出版发行这么多抗日文艺刊物，在国内是罕见的，这是当时桂林文艺运动繁荣的表现。

桂林文艺工作者响应文协总会“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前线，接受锻炼。他们多次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记者战地采访团、抗敌文艺工作团等，奔赴前线。文艺工作者在斗争实践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前线战斗生活、工农斗争生活和揭露日、伪、汉奸罪行的文艺作品，有通讯、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漫画、木刻等。仅长篇小说方面就有谷斯范的《新水浒》、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二部）、艾芜的《故乡》和《山野》、司马文森的《雨季》和《人的希望》、周钢鸣的《浮沉》、沙汀的《奈何天》等。其中《新水浒》是我国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被认为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珍贵的财富”，《山野》是“艾芜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①] 美术工作者为激发群众抗战斗志，经常举办各种美术展览。比较大型的美术展览

① 魏华龄：《桂林文化城概况》，1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如1939年10月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1940年5月的战时美术展览、同年10月的木刻十年纪念展、1941年9月的广西全省美术展览等。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经常在桂林举办街头漫画展，还到阳朔、平乐、梧州、平南、桂平、贵县、南宁、柳州等地巡回展出。徐悲鸿、李桦、张安治、关山月、马万里、张一尊、阳太阳、丰子恺等画家都多次举办过个人画展。文艺工作者还举办各种文艺训练班、函授班、讲习班、讲座等，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

1938年冬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六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桂林成为一座闻名的文化城。桂林抗日文化运动不仅对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时期，桂林之所以发展成为闻名的文化城，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广州、武汉沦陷后，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而且是西南军事指挥中心。桂林靠近湘、粤前线，交通便利，成为联结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内同香港、海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抗战形势和桂林的地理位置，使桂林在抗战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吸引着沦陷区的各方面的文化人士。

但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最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武汉失陷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决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民坚持抗战。桂林“八办”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南的领导核心，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将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和进步文化人撤退转移到桂林，如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电影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在武汉、长沙成立的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这些党直接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和宣传机构，转移到桂林后成为抗日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同时，党在桂林的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等单位以及青年、妇女的群众团体中建立党的组织，

加强党的领导。党还领导或推动成立了一批文化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文化供应社、新中国剧社等，团结各种进步文化人，组织抗日文化骨干队伍。这样，在桂林形成了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和进步文化团体为主体的、有广大文化工作者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中心桂林领导开展抗日文化运动，是由于党成功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抗战爆发后，新桂系与蒋介石矛盾缓和，但没有消除，新桂系为了自身的利益，暗地里同蒋介石抗衡。中国共产党利用蒋桂矛盾，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桂系团结抗战。周恩来在武汉时亲自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支持他们的抗日主张。武汉失陷后，周恩来向白崇禧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战方针，鼓励他坚持抗战，争取他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周恩来三次亲临桂林，开展对新桂系的统战工作。1938年12月，周恩来途经桂林时，和郭沫若一道会见了白崇禧，请他支持《救亡日报》复刊，白表示欢迎并资助了开办经费。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以合法身份和新桂系上层人物交朋友，宣传党的抗战主张，说明共产党在广西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党还通过在文化机关、团体的党组织和党员，广泛向新桂系干部和文化人士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新桂系本质上是反共反人民的，但由于他们同蒋介石有矛盾，为了不被蒋介石吞并，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借助进步力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晓以大义，新桂系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日进步势力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对抗日民主活动一般是支持或者是默许的。这样就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造成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压制进步力量，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出现低潮。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新桂系“这一

---

① 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载《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21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次虽然转到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 党仍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对新桂系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继续团结他们抗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后，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来到桂林，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同时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等负责的党的文化工作小组，继续领导抗日文化运动。这时党的统战工作重点转到以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等人为主要对象。李济深当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他虽无军事实权，但在国民党尤其在桂系中有较高的威望，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支持进步文化活动。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加强对他的统战工作，邀请他出席集会、演出、座谈，担任西南剧展会名誉会长等职。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桂系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反共活动中没有完全跟蒋介石走，仍留有余地，对重要的进步文化人士和地下党干部采取“送客出门”的办法，让其脱险。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等在帮助营救进步文化人和地下党员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撤出的一批文化人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下，先后返回桂林。李济深运用他的力量保护这些文化人士的安全，掩护他们开展进步文化活动。这样，经过共产党的艰苦工作和努力，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呈现蓬勃景象。1944年以“西南剧展”为标志，抗日文化运动出现新的高潮。

紧接着“西南剧展”之后，桂林文化界发动声势浩大的“保卫大西南”运动。1944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长沙，衡阳告急，桂林震动。在此紧急关头，中共桂林党组织通过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提出开展“保卫大西南”宣传活动，动员人民起来抗战，保卫大西南。这个建议得到李济深和全市文化界人士的赞同，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6月14~20日，桂林文化界掀起轰轰烈烈的保卫大西南动员宣传周，各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7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李济深发表抗日演讲

团体、学校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演街头剧，抗战的标语、漫画、壁报满城张贴。李济深先后在全市动员抗战宣传周大会发表演说，在广播电台播讲，和“长老团”龙积之、封祝祁、陈树勋、柳亚子、李任仁等联名发表谈话，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粉碎敌人的进攻与任何企图”。[①] 6月18日，桂林各界人民举行万人“国旗大游行”。游行队伍抬着“保卫大西南”的大幅标语和漫画，由几十人牵执着一面大国旗在前面开路，李济深等“长老团”站在前头的宣传车上。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市中心和其他街道行进。在游行中，“长老团”沿途用扩音器向市民宣传动员，捐款支援抗战。游行队伍高呼口号，齐唱抗战歌曲。“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为了爱国抗战，拿出良心来吧!”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在游行队伍的鼓舞下，市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将钱、手饰和贵重物品投入国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衣着烂衫的乞丐捐出讨来的破烂钞票，失业的青年捐出手中仅有的钱，擦皮鞋的小孩、报童、三轮车夫捐出一天辛劳挣来的钱，漓江船上的妓女也献出用血泪换来的金戒指。当天游行持续了五个多钟头，募捐到100万元。“国旗大游行”持续了三天。保卫大西南宣传动员周，唤起了人民赤诚的爱国之心，鼓舞了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意志。募捐到的钱物，一部分送湘桂慰劳抗日将士，一部分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

宣传周结束后，衡阳激战，桂林形势紧张。桂林文化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组织文化抗敌工作队，由田汉、陈残云率领，

①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6月28日。

奔赴兴安、全县前线，进行战地宣传、慰劳工作。

抗战时期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是抗战形势造成的，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结果。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育事业的新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成为抗战大后方，不少外省学校迁移广西，大批教育界、文化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教师、科技工作者疏散到广西，省内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类学校增多，呈现兴旺繁荣景象。

30年代初开始的广西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在抗战时期继续发展。抗战开始后，广西当局为适应新形势，使基础教育不因战争而中断，组织战时教育设计委员会，进行全省战时教育的研究和设计。1937年10月，省政府公布《战时各县教育设施要项及考核标准》，1938年12月又公布《战时广西各县基础教育实施办法》等战时教育法规。规定战区各县如因军事影响，学校不能利用原有校舍照常上课时，应采取综合编队方式，利用露天、野外或岩洞等进行机动性教学。在师资培养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教育经费也有所增加。这些措施使广西在抗战中基础教育得到继续发展，1940年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届时结束，当年全省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和国民基础学校共21571所，基本上实现了每村街设一所国民基础学校，每乡镇设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计划目标。与1932年相比，净增学校6744所，平均每年增加1000所以上。在校学生158.7万人，与1933年相比，在校学生增加24%。①

①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92（4），5页。

1940年5月，广西省政府根据教育部《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拟订《广西省普及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大纲》。同年9月，修正并颁布《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五年计划大纲仍然继承前六年的指导原则和做法，继续推行国民基础教育。由于战争的影响尤其是1944年全省沦陷，五年计划的实施受到干扰和破坏，但它对广西普及教育仍有促进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3年全省国民学校有18302所，在校学生181万多人。①

抗战初期，广西省政府对中学教育进行调整，全省划分为11个民团区，每区设一所省立中学（高中或初中），同时鼓励发展私立中学。广西当局为培养基层建设干部，十分重视国民中学教育。国民中学创办后，减少理化课内容，不设英语课，增设地方自治课，加强农业及劳作课程，使大多数毕业生升学困难，引起社会舆论不满，要求停办国民中学，改为普通中学。广西省政府顶住压力，于1937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修正国民中学办学大纲，对国民中学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以及学生待遇等方面进行改革，继续发展国民中学。由于广西当局采取措施加强中学教育，抗战时期广西的中学教育有所发展。1941年全省中学共129所，其中省立高中2所，省立完全中学9所，省立女子中学3所，省立初中8所；县立完全中学4所，县立初中18所；私立完全中学8所，私立初中26所；省立、县立、联立国民中学51所，1944年广西沦陷前发展到76所。②

抗战时期是广西中等师范教育发展较快的时期，全省有名的中等师范学校如桂林师范、百色师范、龙州师范、南武师范、柳庆师范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抗战前广西的中等师范教育很落后，师范学校寥寥无几，仅有的几所县立师范后来改办国民中学。1938年8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方案》，全省分为7个师范区，分期设置省立师范学校。到1940年，平桂、百色、天保、龙州、柳庆、南宁、浔梧师范区先后各设一

①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92（4），4页。

②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92（6），5页、130页。

所省立师范学校。此外，还有省立特种师资训练所和北京香山慈幼院迁桂后开办的幼稚师范学校。到1944年，省立师范学校增加到9所，即桂岭、桂林、平乐、柳庆、浔梧郁、南武、龙州、百色、天保师范学校。省立简易师范学校有东兰、养利2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有田东、博白、贵县、宾阳、荔浦、怀集6所，还有当时属于广东省的合浦、钦县、灵山3所县立师范学校。

抗战期间，广西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较快的发展。抗战前广西只有几所不正规的中等职业学校，而且规模很小。抗战开始后，省内公私企业发展很快，需要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办职业学校所需的师资也易于解决，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便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教育部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杨卫玉等来广西指导职业教育。广西省政府制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措施，提出“以本省社会生活的需要为职业教育的原则，重点开办高级或初级农、工职业学校，以适应战时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开办各种职业短期训练班，以适应战时各方面的要求”。[①] 同年，省政府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以作示范。随后，各种职业学校先后开办起来。到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广西前，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到24所。其中主要有：工业方面有省立桂林职业学校、省立桂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立桂林初级工业实用职业学校；农业方面有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南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商业方面有省立桂林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医药方面有省立桂林、梧州、南宁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等。桂平、贵县、博白等县也分别设立了县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还有一些私立职业学校。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工厂企业也开办了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所和补习学校。

广西的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1939年8月，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马君武重任校长。在此前后，广西大学理工学院增设电机工程系并由梧州迁到桂林，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系，文法学院改为法商学院，

---

①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92 (5)，3页。

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银行四个系；修建了图书馆、物理馆、化学馆、机械馆、材料实验室、电机室、矿冶室等，购置了一批图书、仪器；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如刘仙洲、张铁生、沙千里、陈望道、千家驹、李达、张志让、李四光等来校任教。一时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活跃，青年学生纷纷报考或转学该校，广西大学成为西南著名的高等学府。

这个时期广西还建立了几所新的高等院校。1941年11月，广西省政府重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曾作忠任校长，设教育、史地、理化三科。1942年4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改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原有三科改为系，不久添设国文、英语两系，同时创办附中。1943年8月，桂林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广西大学的中文、数理化、史地三个师范专修科拨归该院。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如林砺儒、张映南、林仲达、陈竺同、谢厚藩、张世禄、陈翰生、宋云彬、欧阳予倩、靳为霖、谭丕模等被聘请到该院任教授，学术风气和民主空气十分浓厚，桂林师院成为大后方著名的高等师范院校之一。1944年雷沛鸿发起筹建西江学院，次年2月正式成立于百色。学院分本科、专科和预科，本科有中国文学系和数学系，专科有农业专修科和土木工程专修科。1942年和1943年，在桂林还先后成立了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和私立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

抗战期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浙江大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高等学校曾先后迁来广西，并在广西招生复课，对广西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广西当局不仅重视普通教育，也比较积极推进成人教育，使抗战期间广西成人教育一度相当活跃。

抗战前广西当局就已经在全省推行成人教育，在国民基础学校开办成人班，招收失学成人入学。抗战开始后，成人教育活动继续开展。1938年广西省政府认为成人教育进展缓慢，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决定1939年为“成人教育年”，集中全省人力财力在一年内彻底扫除文盲，以完成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计划。1939年2月，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方案》，规定各

级基础学校、公私立中等学校、各文化实业团体设置成人班，凡年满18~45岁的失学成人男女均须就地分期入成人班学习。“成人教育年”分四期实施，每期2个月，每日上课2小时。成人班课程以“政治训练、文字训练、生活训练三者并重的原则”，① 分“抗战讲话”、“国语”、“时事报告”、“抗战歌曲”、“集会活动”五科。省政府为推行“成人教育年”，成立省成人教育年推行委员会，各县也成立县成人教育年推行委员会，征调教师、公务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一万余人担任成人班教师，拨款和争取中央补助140余万元作“成人教育年”经费。

“成人教育年”是抗战期间广西教育施政的一次重大活动。广西当局号召全省各方面通力合作，动员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采取有力措施，使“成人教育年”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统计，在“成人教育年”中，全省共开办成人班61354班，入学失学成人2157912人，入学人数占应入学人数79%。② 1939年冬桂南会战爆发，战区和接近战区各县后期成人班活动受到影响，先后停课或停办，未能完成教育计划。其他各县，有的由于师资和经费困难，成人班走过场，没有完成教学计划。尽管如此，“成人教育年”的开展，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在全省造成了浓厚的教育风气，形成读书学习的风尚，“尤以青年妇女，求知欲最为亢进，流风所播，即散处穷山僻野之苗瑶同胞，亦莫不受教育之熏陶”。③这对于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抗战爱国热情是有积极意义的。宾阳县第三期成人班发动捐献布鞋、军帽运动，赠送前线抗日官兵仅布鞋一项达1.5万双。④ 其他各县成人班捐钱捐物，参加战时服务，空前热烈。

抗战期间，广西的干部教育也有新的发展。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桂系当局为适应新形势，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1939年2

① 苏希洵：《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总报告》，载《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第1卷第3期，31页。

②③ 苏希洵：《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总报告》。

④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88（3、4），53页。

月在桂林开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这是一所培养乡村基层干部的学校，招考20～30岁有初中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调训在职乡村长。经李任仁的推荐，广西省政府聘请著名教育家、曾任广西师专校长的杨东莼为地干校教育长。杨东莼应聘时与黄旭初订立了“君子协定”：学校的教育方针和用人行政，一律由教育长决定。[①] 杨东莼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聘请张海鳌、周钢鸣、张景宁、汤有雁、秦柳方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到地干校任职任教，并在校内建立了两个中共党支部。[②] 这样，地干校校长虽然是黄旭初，但实际上这所学校是中共地下党掌握的。

地干校开办后，杨东莼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参照解放区干部训练的经验，把桂系当局的办学宗旨与党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一方面照顾桂系的要求，另一方面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把地干校办成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地干校实行军事化的集体教学，把学生编成大队、中队、小组，集体学习和讨论，理论联系实际，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杨东莼还先后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范长江、张铁生、姜君辰、胡愈之、千家驹、方振武等进步学者、爱国人士到学校作报告，使师生受到很大鼓舞。地干校开办两年，培养了1400多名学生，调训了4000多名在职乡村干部，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各地基层工作。由于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了进步的思想教育，在工作中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形势造成了有利于广西教育发展的环境，广西当局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使广西的教育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各方面人才，满足了战时的需要，促进了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抗战时期广西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桂西边远山区仍然比较落后，有的县还没有中学。大多数县的小学入学率还比较低，

---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4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② 地干校两个党支部，一个是外省党员支部，直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党组织领导；另一个是地方党员支部，归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

1942年省教育厅一份报告统计显示，一些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仅占30%。师资水平普遍较低，1940年全省小学教职员高小毕业占36.43%，无学历凭证7.66%。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小学，几乎都是高小毕业或肄业者充任教师。1941年全省小学教师有86%不合格，[①] 可见教育质量还比较低。

1939年和1944年，日军两次侵略广西，全省教育遭受严重破坏。这两次侵略战争使城乡无数学校的校舍和设备严重毁坏，在校学生数大幅度下降。1944年上半年日军入侵前全省共有国民学校18324所，学生1565927人，沦陷后国民学校下降到6270所，学生减少到539026人。[②] 中等学校多设在县以上城市，这些地方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因此中等以上学校损失十分惨重。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医学院等高等院校都集中在省会桂林，沦陷前桂林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沦陷时日军曾用燃烧弹烧毁房屋，沦陷后是日军坚守的重要据点，高等院校的校舍、设备、图书几乎损失殆尽。广西大学60%的校舍毁坏，教学设备大都散失，校本部图书馆10万余册图书在疏散中几乎全部损失。省立实验国民中学校舍、设备损失巨大，战后无法恢复。中等职业学校除百色助产护士学校外，全省20多所学校都受到严重破坏，桂林、柳州的职校校舍全部被夷为平地。日军侵略战争使广西教育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

四、战火中的体育卫生事业

抗战时期，沦陷区不少体育团体和著名运动员、体育工作者来到广西，促进了广西体育的发展，各城市和一些县城体育活动相当活跃，增添了战时

① 广西教育委员会史志办公室：《广西教育史志》，1992（4），18页。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10月2日。

文化生活的色彩。

省会桂林是全省体育活动的中心，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比赛很频繁。赛事最多的是篮、排、足三球，比赛形式多为各种杯赛、友谊赛和爱国支前义赛等，如“乐群杯”、“八一三杯”、“童子杯”、“任潮杯”、“乐群杯献机义赛”、“纪念空军节义赛”、“劳军义赛”等等，体现了广西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篮球是比较普遍的群众体育运动，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篮球劲旅“联勤”、“国体”和南开“五虎将”等先后到过桂林，推动了桂林篮球运动的发展，乐群社体育部和市体育场几乎天天有篮球赛。1941年至1943年，大型的篮球比赛就有500多场。[①] 在此期间，大型的排球比赛也有100多场，足球比赛130多场。[②] 1942年，桂林体育界和新闻界为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先后举办了3场大型足球义赛，各界群众踊跃前往观看捐资，抗日气氛十分热烈。

除了篮、排、足球外，乒乓球、手球、网球、垒球和游泳、航空模型、射击、棋类等各种体育运动项目，由于外省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带来了新的运动技术，推动了这些体育运动的发展，运动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如乒乓球，外省体育爱好者带来了搓球、削球、扣杀等新技术，促进乒乓球运动迅速发展，桂林、梧州、南宁等城镇的银行、邮政、铁路、学校乒乓球比赛十分活跃。游泳、跳水在梧州最活跃，当时广州、香港、澳门跳水名将避居梧州，在其影响下跳水成为一项时髦的运动。航空模型是40年代初兴起的体育运动项目，1941年桂林举行过多次滑翔机模型表演和比赛，5月10日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广西滑翔分会联合举办模型滑翔机竞赛大会，有135架模型机参赛。12月，桂林体育界举行义赛义演，筹献“体育号”滑翔机，以培养飞行员参加抗日。

在群众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全省体育事业的发展，1941年广西省政府成立体育委员会（后改为国民体育委员会），统管全省体育

① 《广西通志·体育志》，17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广西通志·体育志》，172页。

运动。1943年省政府通令各行政区及县设立区、县国民体育委员会。在《广西建设计划大纲》中，规定开展体育运动的宗旨是“适应国防需要，发展国民体育运动，以养成国民强健体格，及使用战斗机械习惯”。广西省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开展民众体育的法规，如《广西省各乡镇举办民众体育竞赛办法》、《各县市举行运动会办法》、《民众体育训练计划大纲》等。这些措施对全省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40年代初，各地先后举办运动会，1941年有29个县举行县运动会，并在庆远、桂林、天保、南宁、桂平、雷平举行专区、市级运动会6次。是年10月，在南宁举行的省行政第九区运动会，参赛运动员有学校师生、机关职员、工厂工人、部队官兵等1000多人，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射击、游泳、越野跑等。1941年，广西省政府筹办省运动会，后因战争和其他原因未能举行。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场地有所增加，40年代初许多县先后修建了运动场。1943年全省公共体育场共有81处。

抗战时期，广西体育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体育界爱国人士利用开展体育活动宣传抗战，把体育作为动员人民团结抗日的战斗武器，推动了广西抗日救亡和体育运动的发展。然而，这个时期的体育活动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乡村很少有体育活动。抗战前比较普遍的民间体育活动如武术比较活跃，抗战开始后逐步消沉。体育运动水平还很低，直到解放前夕，广西只有游泳、田径两个项目在全国运动会中得过名次。体育设施也很简陋，体育场地多为篮球场，综合性的体育场很少。

抗战时期广西卫生事业比抗战前有所发展。1940年，广西省政府进一步健全省一级卫生行政机构，将全省划分为12个卫生区，其范围与行政区相同，各区设省立医院和卫生事务所，成立1~2个医疗防疫队。县级医疗机构也有所增加，1940年全省有县立医院7所，县立医务所74所，各县乡镇医务所781所。后来县立医院和医务所改组为县卫生院。省、县卫生医疗机构的发展，加强了全省卫生网。

抗战期间，沦陷区大批难民涌入广西，省内流动人口大量增多，广西当

局采取措施加强卫生防疫，除由省、县立医院、卫生事务所负责防治外，在桂林、梧州、柳州、宜山、南宁、龙州、百色等地成立防疫委员会，办理车船旅客的防疫工作。每年夏秋两季在全县、梧州、鹿寨、柳州、南宁、龙州、玉林等处设立卫生检疫所，并成立医疗防疫队巡回防治。每年春秋两季，由省卫生试验所制造痘苗，分发各医院和医务所，给群众种预防传染病的疫苗。1942年在宾阳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所。

为适应卫生事业的发展，广西当局增设医药卫生院校，培养医务人才。1939年将广西军医学校改为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1940年又改为广西省立医学院，并设附属医院。同时成立广西省立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1941年设立百色省立医院附属助产护士学校。1942年至1943年，先后将桂林、梧州、南宁省立医院附属助产护士学校改为省立桂林、梧州、南宁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同时成立省立医药研究所，抗战胜利前夕改为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这些院校为广西培养了一批中、高级医务、医药人才。

抗战时期广西卫生事业有一些发展，但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乡镇医务所不仅数量少而且很简陋，只有中医，广大乡村仍然缺医少药。每年伤寒、痢疾、脑炎、天花、霍乱等传染病流行相当严重。疟疾是全省最普遍的传染病，每年死亡人数在1万以上。①

① 虞乔僧：《广西的保健事业》，载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145页，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第十八章　战后广西的社会危机和新桂系“重建广西”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广西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战后，惨遭浩劫的广西，连年灾荒，瘟疫流行，人民贫病交加，到处一派破败的惨状。饱受战争痛苦的广西人民迫切需要休生养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战后初期，新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提出“重建广西”的口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城乡经济，开展善后救济，安定社会，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新桂系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追随蒋介石参与发动全面内战，“重建广西”的措施未能真正彻底实施，广西在抗战中被严重损伤的元气，始终未能恢复。

一、战争对广西的严重破坏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日本在八年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民族灾难。广西

虽处西南一隅，但也未能免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两次入侵广西，盘踞两年之久。日军入侵广西期间，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疯狂地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广西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

1945年8月底，广西省政府组织抗战损失调查小组，分赴各沦陷地区实地调查在抗战中的损失。经过调查统计，抗战期间，全省101个县市局，被日军占领和蹂躏的达80个县市局，1101个乡镇，9214个村街，679794户，①占广西全省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加上当时属于广东的钦县、合浦、防城、灵山4县，受害面积就更大了。

日军所到之处，野蛮屠杀无辜百姓。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时杀害平民11147人，杀伤2161人。日军占领宾阳一个星期，就杀害人民群众1940人，杀伤408人，平均每人杀死杀伤人数约300人左右。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杀害平民多达215108人，杀伤431662人，加上病亡者，广西死亡人数则达49万多人。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全省伤亡的情况如下表：

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全省伤亡情况统计总表②

项目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患病人数	失踪人数
	计	被敌杀害	染病死亡	计	重伤	轻伤		
总计	497364	215197	282256	431662	88074	343588	1281891	54470
男	322095	138689	183406	300610	61357	239253	847316	43407
女	88381	39448	48933	61555	12086	49469	215621	4227
幼儿	63761	27183	36578	44763	9578	35185	159344	5850
未明	23127	9877	13339	24734	5053	19681	59610	986

注：1. 伤亡人口系1944年至1945年沦陷之80县市局数字。

2. 因空袭被害者，包括在伤亡人数内。

①②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20、25～28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上述统计还不包括广西军队阵亡人数，如加上军队阵亡人数，那么广西死亡人数则达100万之多。当时广西人口仅约1400万，因战争减少十四分之一，确是个惊人数字。就县市而言，损失最重的是桂东的苍梧县（含梧州），被日军杀害32937人，染病死亡30142人，受伤151692人，患病96060人，失踪5350人；其次是桂北的全县（今全州），被日军杀害20400人，染病死亡22400人，受伤60084人，病62580人，失踪792人；再次是平南县和桂林市，分别被日军杀害10270人和9932人。此外，被日军杀害5000人以上的还有临桂、兴安、荔浦、柳江、宜山、河池、宾阳等县。①

日军侵占广西期间，有计划地对广西的城市和乡村进行疯狂破坏。其手段之一是飞机轰炸。抗战八年中，广西遭到日机的无数次轰炸。日机轰炸的目标，首先是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城市、交通枢纽及军事设施。广西省会桂林，先后遭日机30多批，400多架次轰炸，伤亡人数900多人，房屋被毁4000多栋，市内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等变成瓦砾场。广西繁华的商埠梧州，抗战期间被日机轰炸400多次，有时一天之内，遭受日机几十架次的轮番轰炸，房屋大批被毁，居民无家可归。② 地处桂中的工商业重镇柳州和南宁，也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城市建筑和民房损失惨重。

日军为了逞其淫威，还派出飞机轰炸广西各地的县城、圩镇和农村，甚至连西林偏远的穷乡僻壤也未能幸免。日机轰炸的对象，不限于军事设施和工业基地，文教机构、居民住宅和普通村庄都是日机轰炸的目标。据桂南邕宁、武鸣、宾阳等19个县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遭日机轰炸死亡人数1225人，受伤628人。边城龙州，抗战期间竟遭日机轰炸174次，伤亡群众1200多人，被毁民房1600间。抗战八年中，日机先后出动1666架次

---

① 根据《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计算而得。

② 广西区党史研究室、广西军区政治部合编：《广西抗战纪实》，28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轰炸广西，给广西人民造成巨大灾难。[1]

日军毁灭广西城市和乡村的手段之二是大肆焚毁房屋。日军第一次侵入广西时，仅在邕宁一县，就烧毁了民房15000间。从1940年2月2日至9日，日军占领宾阳一个星期，就烧毁房屋3780间。龙州沦陷期间，房屋被毁过半。绥渌县城在日军的铁蹄践踏后，几乎全城被毁。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焚毁房屋更厉害。日军为彻底毁坏房屋，在军队中专门设立了烧杀队，套红色臂章，每到一处，肆意烧杀。烧杀队经过之后，继以检查队，检查烧杀破坏是否彻底，否则将受到处分。[2] 在此期间，全省被毁房屋29万多间，价值国币869亿多元，其中桂林市遭受损失最为惨重。据桂林市政府统计，1944年，全市房屋总数为5.25万余间，经过日机滥炸、国民党军队用火扫清守城射界、城垣保卫战，特别是日军撤退时有计划地纵火焚烧，桂林光复时剩下的房屋，城外332间，城内155间，共487间，还都不是完好的，只是有墙壁瓦盖而已，剩下的屋宇不到原来的1%，被毁坏99%，被破坏的程度居全国之冠。[3] 柳州的损失也很惨重，全市2万多间房屋，绝大部分被日军在撤出前几天焚毁，仅剩下600多间未来得及焚掉的房屋，被毁房屋达97%，仅次于桂林。此外，梧州、全县、柳城、龙州、桂平、平南、宜山、河池、荔浦、武鸣等地房屋也被焚烧过半。

日军为了维持战争的消耗，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即通过战争的手段，在中国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抢劫掠夺，用以供应长期战争的物资需要。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已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七年，经过七年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日本国内本来就很贫乏的物质资源已基本消耗殆尽，中国沦陷区的物质资源也绝大部分被掠夺耗毕，已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质。所以当时入侵广西的日军，全无粮秣供给，士兵除了身上穿的一套破军装，

① 广西区党史研究室、广西军区政治部合编：《广西抗战纪实》，28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桂林沦陷杂记》，载《桂林文史资料》，第5辑，128页。

③ 于瑞云：《甲申浩劫纪实》，载《桂林文史资料》，第5辑，119页。

手中拿的一杆三八式步枪外，别无余物，只能靠向广西人民实行疯狂的抢掠来维持日常需要。因此，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残酷地进行抢劫掳掠，见粮抢粮，见物抢物，凡牛、羊、鸡、鸭等可供食用之物，尽行搜取。

物质资源是保障战争进行的基本条件。日军侵华期间，为了消耗中国的国力，削弱中国人民抗战的物质条件，对中国的物质资源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当时，入侵广西的日军往往将吃不完、带不走的粮食物品大肆糟蹋毁坏，甚至投毒于其中，使之不能继续食用。更为狠毒的是，日军为了破坏广西的农业生产，在各地对耕牛和马匹进行大量屠杀。第一次入侵广西时，日军仅在邕宁一县就屠杀了1.3万头耕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日军在全省屠杀的耕牛多达48万多头，占全省原来耕牛总数的三分之一，屠杀的马匹多达6.3万匹。损失最大的要数全县（今全州），日军盘踞11个月，屠杀耕牛5.25万头，马9544匹，平均每天屠杀的耕牛、马匹达180多头（匹）；其次是柳江，被屠杀的耕牛也多达4.37万头，马3438匹。另外，临桂、宜山、邕宁、宾阳、灵川、迁江、南丹、桂平等县被屠杀的耕牛都在1万头以上。[①] 有些村庄耕牛全部被屠杀，一头也没留下。驻扎武鸣的日军，每天要伪乡长派人送去牛脑50副、鸡肝300副、猪脚200只，当地群众的牲口家禽损失惨重。日军这样大规模地屠杀耕牛和马匹，严重地破坏了广西的农业生产。

广西向来贫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抗战前略有发展的民用工业、交通业和文教卫生事业，惨遭日军洗劫。战前，广西有电厂、水厂、火柴厂、电池厂、糖厂、制药厂、染织厂等230多家公、私经营的小型工厂，绝大部分分布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广西第二次沦陷时，全被日军洗劫毁坏。全省691个小型矿场，也遭破坏。交通事业方面，抗战期间，广西境内共修筑了湘桂、黔桂两条铁路，共长748公里。日军占领广西后，先是拆移黔桂铁路的路轨、枕木用来修复湘桂铁路，保持该路通车。日军从广西败走时，对湘桂铁路进行大肆毁坏，广西光复后，省内没有一段铁路是完好的。

---

①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30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广西战前和战时修筑的4247公里公路，被破坏的里程达3724公里，占全省公路总里程的87%。运输工具遭受的破坏也相当严重。日军第二次侵桂前，全省共有公私汽车1025辆。1944年9月，日军侵入广西时，所有公私汽车都被调用，投入抢运人员和物资，向黔桂公路及黔桂西路疏散，因日军追赶甚快，向贵州撤退的车辆物资几乎损失殆尽，撤到百色的汽车仅有8辆，损失汽车共546辆，损失率达80%。广西光复后，全省残存的汽车不过70辆，公路交通完全瘫痪。水路方面，各种机动船舶损失111艘，民船（仅经航政机关登记搞运输的，水上住户船只不在内）损失11345艘，占原有航运船只的70%以上。① 此外，电讯器材损失达60%。战前全省各医院有病床1370张，被破坏1065张。②

日军进行疯狂破坏的结果，使得广西人民的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据战后广西省政府的调查统计，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时，全省公私财产损失总数折合国币价值450亿多元（按1945年10月的币值计算）。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所造成的全省公私财产的损失多达8277亿多元。当时全省沦陷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承担损失20多万元。③

以上所列各项数字，均是直接损失，战争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未列入内。其实，间接损失更为惊人。例如，日军占领广西后，大量征集民工为他们搞运输、修工事、当劳工，甚至当兵，有的地方一个乡多达1000人。这些被征用的群众，多数被杀害，即使能够返回家乡的，有的劳累过度，丧失劳动能力，许多人被日军砍去右臂，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受到严重损失。④ 日军入侵时，战区人民响应政府号召，疏散到安全山区，有的地方疏

---

① 广西省政府：《1945年5月～12月交通施政报告》，载《广西建设》创刊号（1946年2月）。

② 黄荣华：《广西善后救济工作的过去与将来》，载《新生活》月刊第13卷第1期，1947。

③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30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④ 参见《广西抗战纪实》，29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散时间长达八九个月之久，使大量的土地荒芜。有的地方虽然群众没有撤走，但由于日军大肆抢劫粮食、种子、耕牛，破坏生产工具，也无力恢复生产。据统计，当时广西全部沦陷的县份荒废的土地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0%，部分沦陷的县份荒废的土地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60%。稻谷产量，1945年全省为2500万担，只有1937年5658万担的44%，下降率为56%。大小麦，1945年全省为21万担，仅为1937年65万担的33%，下降率为67%。[①] 玉米也大量减产，下降约占总产量的57%。各种杂粮的损失，也大约占到总产量的65%。以上这些间接的损失，加上八年抗战所动员的人力、物力，全省间接损失至少在1万亿元国币以上。

日军两次入侵广西，严重地破坏了广西的社会经济，给广西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全省农村凋敝，城市荒芜，元气被断丧殆尽，战后长期无法恢复。广西光复后，流亡在各处的难民回归家园，但田园荒废，财物丧失，十室九空，生活无着，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连年灾荒，瘟疫流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受日军蹂躏而破败不堪的广西，又受到连年灾害，疾病流行，人民生活痛苦如雪上加霜。

1945年下半年，广西各地发生了水、旱、风、虫灾，使晚稻收成减去大半，加上这一年早稻的耕作由于日军的入侵而延误了时间，全年收成不及正常年份的三成。1946年，全省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灾荒，“灾情之重，灾区之广，震惊了全国”。据广西省政府社会处和善后总署广西分署的报告，这年广西受灾的面积，几及全省三分之二的县份，灾民达340万，其中尤以湘桂、

① 《一年来的广西》，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元旦增刊。

黔桂铁路沿线及大河一带的县份灾情最重。① 全省农业收成不及半数。1947年春季和夏季，全省又先后普遍遭遇旱灾和水灾，受灾达62个县，灾民310万，约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② 桂北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灾区居民的处境，惨不忍睹。全县（今全州）收复后1946年有29万人口，缺粮134万担，饥民达84680人，染病83600人，死亡8684人（仅6月份就饿死1643人）。③ 兴安县人口15.7万，饥民达9.7万人，该县“沿公路一带，乡村人口死亡率甚高，平均每村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以饥死病死者占多数”。“阳朔、荔浦、修仁、平乐一带，灾情虽不及兴、全两地有着可怕之死亡率，然亦有早在一月之前或者在三周之前，已开始有食野生物度日者。”平乐县“今年清明节后，吃草根树皮的人，一天多过一天，截至目前止，山上的蕨根、土茯苓等可充饥的东西都绝迹了。人们遭到的灾难已达极点（按四月间调查，绝粮人数为九万一千五百四十人）”，④ 而该县当时总人口为17.6万人。此外，柳城、贺县、临桂、永福、龙胜、义宁、柳江、中渡、榴江、象县、武宣、陆川、平南、融县等受灾严重的县份，饥民也都是数以万计。灾民为了维持残生，有的卖去了女人陪嫁的衣物，有的卖去了蚊帐、棉被和冬衣，有的卖去了祖传下来靠着活命的田地，有的甚至卖去了敌人追来尚不肯抛弃的骨肉至亲的儿女。有的一切都卖完了，只得出卖自己的劳力，有的连劳力也没有了，只能靠树皮、草根、野菜充饥。当时，在贺县的山口、九嶷山、金子山、官山、里松界、五岭山、大桂山等山岭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饥民在寻找和挖掘蕨根、蕉根、黄狗头、土茯苓、艾叶、山麻之类的草根野菜，聊充饥肠。后来，连草根野菜也吃光了，饥民们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眼睁睁地等着病死、饿死。当时广西省会桂林“饥荒严重，饿殍载道，街头及近郊已有尸骸无主收埋……至贫苦民众婴孩无力抚养，而遗弃道旁者，亦屡见不鲜，情殊可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下册，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6月13日。
③④ 《广西大事记》，1946年4月，广西省政府，1946。

悯"。[①] 许多人不堪饥饿折磨上吊自杀。兴安县有一家两夫妇两个儿子，丈夫上山挖野菜去了，儿子饥饿哭得非常凄惨，妈妈看到儿子喊叫的惨状，忍耐不住而吊颈死了。丈夫回来看见妻子吊死，感到无法活下去，把两个儿子弄死后，自己也吊死了。[②]

伴随着战祸和灾荒而来的是传染性疾病的流行。

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时，许多地方发生了"瘟疾"，西医叫"虎烈拉"，就是霍乱症。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染病者往往在两三个钟头内死亡。据日方记载，这种病是日军第十一军从湖南带到广西的。由于日军大肆烧杀，遍地是人和动物的尸体，腐烂发臭，病菌传播，饮水污染迅速蔓延及全省，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瘟疾高峰期间，村镇闭户，居民逃光，路无行人，一幅"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凉景象。此外，还有天花、恶性疟疾大蔓延，极易传染，重者死亡，轻者毁容虚脱。总计日军入侵期间，广西全省染病死亡人数多达28万。[③]

抗战结束后，由于广西连年遭受重大灾害，灾民饿殍载道、饥不择食，凡是能食用的或能充饥的东西都被吃掉了。这些东西有些是全无营养甚至是含有毒性、污染严重、极不卫生的，灾民吃了这些东西，极易染上疾病。从1946年春夏起，赤痢、疟疾、天花、瘟疫（霍乱）等传染病席卷灾区各县。据广西省政府卫生处的报告，广西流行天花的有60县市，流行霍乱的有22县市，至于赤痢和疟疾，几乎在所有的收复区流行。人民在灾荒和疾病交迫下，更加贫困化。在典其所有之余，便是吃树草根，任由疾病支配，面黄肌瘦，大量死亡。在广大的灾区，呈现一幅阴暗悲惨的图画。[④] 受日军践踏最厉害的全县，在饥荒和疾病的双重袭击下，1946年6月至8月患病者达9.63万人，死亡1939人。到1947年，情况更加严重，仅据7月份统计，全省有

① 《广西大事记》，1946年4月，广西省政府，1946。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3月25日。

③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7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④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9月24日。

401830人患疾病，57120人患赤痢，患其他疾病者119250人。[①] 患急性传染疾病的人死亡率很高，兴全公路一带的村子，平均每村死亡人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县永和乡冷水铺村，全村原有220多人，只剩下80多人。万仁乡花井村，原有60余人，死去了36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资源县县城居民因患传染病死亡150余人。最惨重的为延东乡，全乡死亡500人，有的村几乎无一幸存。[②] 当年的一位记者在桂北灾区调查后写道："我们所到过的桂北乡村，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一个病人，每一家都有一个作为死亡标识的新灵位。幸而还活着的，除少部分壮年人还有点精神外，老的、少的、幼的大多数气息奄奄，使人有置身地狱之感。"[③]

连年灾、病交加，灾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维持残生，被迫向地主、豪绅借债、借粮度日。许多为富不仁的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大放高利贷。最残酷的是全县和阳朔，夏季借谷一担，秋收时要还5担。狡黠的债主，索性逼令借债者在借据上将本息一并写成借额，比如借谷一担，须还5担的，在借据上写借谷5担。[④]贺县、昭平、柳江等县在上半年灾荒时，借谷子一担，到新谷登场时，要还3担至4担，农民从田里把谷子割回来，还了债就所剩无几。有的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秋收后打的谷子还不够用来还债。有的地方，有粮食的地主豪绅有意屯粮不借，迫使农民在5~6月间以极低的价格，忍痛出卖田间的青苗。当时在贺县和平乐等地，5~6月间卖青苗，每担谷一般只能卖7000元到9000元，而当时的谷价却在每担3万元以上。经过战祸以后，农村的耕牛被日军大量屠杀，农村耕牛极度缺乏，因此，牛租也相当高，租牛两造，租谷要200斤至300斤，以当年谷价计算，谷值几乎等于牛值。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是十分爱惜的，但是，一些小自耕农受灾之后，为了目前的生活，在乞求借贷不成的时候，就不得不

---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7月15日。

② 蓝志流主编：《广西通志·民政志》，9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③④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9月19日。

顺应富户“谋买食田”的心理，把土地低价出卖了。一年可收三四担谷子的田地，富户只需花一担谷子就可以买到手，有时甚至50斤也买到。这样，自耕农纷纷破产，土地更加集中了。全县咸水街一个小地方，农民出卖土地就达300亩。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

走投无路的灾民，有的便铤而走险，拦路打劫，盗抢财物。据1946年5月27日《广西日报》（桂林版）报道：河池县属的五圩、三旺、大丈、英洛几乡饥荒严重，大批难民在马路两旁以木棍、大刀抢劫路过的运粮担子或输粮汽车，群起抢粮。金城江灾民数百人，抢去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的白米9000余斤，警局及政府当局禁止无效。灾民说：“抢米固然要死，但没有米吃也要死。”更甚者，竟发生骇人听闻的掘墓盗尸案。据1946年6月5日《广西日报》（桂林版）载：“蒙山有灾民挖掘新坟，盗取衣物，变卖充饥，已有三个被捕送乡公所办理。据供一月内连掘九处，因死后肉体肿胀，掘者取不出，遂将死者的手斩断，死而受刑，稀哉少矣！”战后广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三、物价飞涨，社会经济恶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名义下，积极准备反共内战。政治上反动，导致财政经济上倒行逆施。为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储备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从1945年到1948年8月21日改用金圆券以前，国民党政府开动印刷机，大印钞票，纸币发行成了天文数字。据统计，1947年7月的纸币累计发行额比1945年6月增加了3743641.81亿元，前者比后者增加了900多倍。[1] 国民党政府企图靠增发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保持收支平衡。截止1948年8月21

① 《历史档案》，1982（1），67页。

日，法币累计发行额已增加到6636946亿元（不包括东北流通券31918亿元），增发指数高达4770537，法币贬值400万倍。[①] 然而，通货膨胀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危机，当年6月，它的财政收入仅及支出的5%。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它的拿手好戏和惟一法宝还是大量印刷钞票，但市场上的钞票堆集过多，促成物价疯狂上涨，又反过来使财政愈加陷于困境。

物价高涨是通货膨胀的恶果。当时纸币的大量发行，导致了市场物价的猛涨。1945年6月，国货趸售指数为210531；1946年6月，增为375275；1947年6月物价指数为2483000，短短两年，物价上涨了几十倍。国民党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的物价飞涨，很快影响到了广西，全省各地经济情况迅速恶化。以桂林为例，1945年1月、2月，物价指数为184221（以1937年上半年1~6月平均物价为基数100），1946年6月物价指数为501926，1947年6月为2247340。进入1948年后，物价更是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1948年1月，物价指数为8611326，6月则涨为67243463。[②] 据1946年11月2日《南宁商报》的商情报道，从9月1日到11月1日短短两个月内，条金每两由27.5万元升为30.5万元，袁大头银元每枚由1350元升为2240元，白米每担由1.7万元至1.8万元升为2.6万元至2.8万元，谷每担由1.3万元升为1.8万元，麦子每担由3.9万元升为4.2万元，花生油每担由8万元升为11.5万元，生盐每担由1.48万元升为1.73万元，上升幅度从10%至50%不等。

随着通货膨胀速度的增快，国民党政府不断发行大额钞票，小额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人们普遍厌恶，弃如敝屣，视如粪土，特别是面值较小，使用已旧的纸币，被排斥于市场流通之外。出现这种情况，受害最深的自然是劳动人民，他们陷入了生活的绝境。1946年3月26日，桂林市东江一市民，为了小票不能使用的问题，向市政府呈送《救救小民》的请愿书：

“小民等因为纸币少、生意小的缘故，每天买卖苦力，做做零贩，得来的

①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728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广西省统计摘要》，第2号，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收益，然后才能养活了这条残弱的生命。然而，也就因为纸币少、生意小的缘故，所收人的纸币，都是一十、二十地集拢起来的，收这一十、二十集拢起来的钞票，去购买生活上所需要的柴、米、油、盐……都被一些所谓大商人拒绝了，说是难点数，费时间，不予使用。这里如此，那里也如此，弄得小民等拿着纸币买不到吃。而且，大商人如此，小商人也恐慌起来，如是同样地将小民等拒绝，造成市面上个个如此，人人这样，小民等实在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盼望，盼望政府给以有效的合理解决，救救小民的生命。”

物价飞涨是国民党政府反共内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恶果，区区一市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这一市民的请愿书，如泥牛人海，无声无息。于是，事隔两天，亦即1946年3月28日，桂林市全体小商贩数百人又给当时的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是一班最苦的小商贩，每天所卖的东西，是糖果、油堆、花生、酸菜及一切说不出口的小生意，所得来的钞票，是五元、十元的。近日市面不知为了何事，拿我们每天得来的钞票，去买点养残生的米或者荞麦面、苞谷等，一连走了十多家，竟买不到一点能够养肠子的东西，真是要饿死了……再三伏望市长老先生，提点严重的方针，向桂林的银行界交涉交涉，救救我们的数百小商贩，真是功德无量，并请市长老先生，要即刻将这件案子，从速办理，千万不要拖延，否则我们饿死了。”①

尽管市民、商贩一再呼吁，仍摆脱不了越来越悲惨的遭遇，只有坐以待毙。

依靠薪金维持全家生活的公务人员，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也陷人了困境。一般来说，农民还可以采取高进高出的办法，通过提高农副产品出售价格，弥补工业品涨价的损失，而公务人员的薪金数额基本固定，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结果自然是焦头烂额，奄奄一息，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惶惶不可

①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下)，297～29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终日。

四、新桂系“重建广西”的措施

抗战结束后，经过战争浩劫的广西，又遭受连年大灾荒，全省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人民生活痛苦，社会混乱，充满危机。新桂系为了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其在广西的统治，提出“再造新广西”的方针，制定“广西复兴与建设”的措施。

开展善后救济

面对战后广西残破不堪，荒芜凋敝，社会混乱的状况，新桂系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人民度过灾荒，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新桂系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开展善后救济。

1945年9月，广西省政府由百色迁回桂林。12月15日，黄旭初在广西省临时参议会作施政报告时提出：当前全省施政的主要点：“一为善后救济，二为恢复秩序重新建设。”[①] 根据这个方针，新桂系救灾办法是：

向中央请求急赈。广西省政府多次电请国民政府救济广西灾民。1945年12月，广西省政府连续向国民党中央请求拨付救济款粮。1946年2月14日，广西省政府又电呈国民党中央拨款米救济，并请免在本省配购军粮。3月8日，省临时参议会以本省粮荒严重，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迅拨大宗粮食以救灾黎。4月5日，省救灾运动委员会分电行政院、联合国救济总署及李宗仁、白崇禧等，呼吁增拨广西省救济款物，并在柳州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主管全省善后救济业务，负责分配中央政府拨给广

① 黄旭初在广西省临时参议会上的报告，载《桂政导报》第1期，1945。

西的赈款和救济物资。各县市成立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协同办理救济分署所配发的救济款物。1946年3月19日，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黄旭初在重庆招待新闻界，说明广西省灾情严重，粮荒日深，全省面临饥馑，呈请中枢及善后救济总署迅拯灾民，并要求停止在广西购买军粮。① 据广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到1946年9月止，经善后救济总署分发的赈款24.9亿元（法币，下同），贷款12.9亿元，粮食7535长吨（每长吨合2033.94市斤），旧衣服28.25万件，营养品三批。②

发起募捐。鼓励动员有钱有粮的地方绅士卖粮或捐钱捐粮。1946年3月28日，广西省救灾运动委员会成立，黄旭初任主任委员，各县、市成立分会。救灾运动委员会分别向海外华侨、旅外同乡和本省人士开展劝募、义演、义卖等救灾活动，并组织乡镇、村街进行统筹自救，发动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救济事业。据统计，省和县市救灾运动委员会募集的捐款2.16亿元，粮食35万多斤。③

组织生产自救。1946年，全县（今全州）耕牛赈开始实施登记，县政府举办小型农用水利，以工代赈，每人每工可赊400元。10月，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由急赈转向工赈，举办农田水利、公路、手工业、社会福利等事业。

此外，广西省政府清查各村所有粮食和仓库粮食数目，统筹救济。在各县成立救济院，收容灾民及贫苦之老弱妇孺、孤儿、伤残等，对外省的过境难民进行收容和疏运。

战后，广西省政府把救济灾荒作为主要工作来进行，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向灾区赈济了一批款物，调剂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物资用于救灾，这对帮助一部分灾民解决最迫切的困难，缓和灾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广西所得到的赈济款十分有限，而待赈济的人口又相当多，因此灾民得到赈济款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3月27日。

②③ 《社政报导》，第1卷第1期，1946。

物就非常之少了。据统计，全省共计粮食受赈283万多人，现款受赈70万人，耕作受赈3万多人，营养品受赈131万多人，衣着受赈8万多人。[①] 根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发动赈济款物的总数和受赈人数平均计算，粮食受赈者每人得粮5斤半，现款受赈者每人得法币3866元，按当时法币的价值，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元。[②] 整个广西，在战后较长的时间内，灾情和灾民的生活艰难处境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

恢复和整顿各级行政

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广西80县市局沦陷，新桂系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几近瘫痪，社会混乱。抗战一结束，新桂系就着手恢复和整顿各级行政机构。

1945年9月15日，由百色迁回桂林的广西省政府恢复办公。省政府将全省101个县市局划分为8个行政区，第一区治八步，第二区治柳江，第三区治苍梧，第四区治南宁，第五区治百色，第六区治天保，第七区治龙州，第八区治兴安。选派干部充任各行政区专员，加强对县以下机构的控制。

在县级以上行政机构的调整中，新桂系主要是排挤近年来伸进广西各个部门中的CC势力，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新桂系自1929年反蒋失败后，坚持反蒋，屡蹶屡起。抗战爆发后，在“共赴国难，一致抗日”的口号下，新桂系虽不再搞反蒋活动，但对于蒋的势力仍严加防范。重点是防范蓝衣社，而对蒋的CC势力伸入广西没有多加注意。当时CC采取“派进来”和“拉过去”两种方式，在广西发展了一些势力，但由于新桂系在广西党政文教仍保持相对独立，CC的渗入较为困难。1938年，南京武汉失陷后，不少“中央”机构内迁广西，同时又在广西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蒋介石在重庆举办的

① 黄荣华：《广西善后救济工作的过去与将来》，载《新生活》月刊，第13卷第1期，1947。

② 莫济杰、陈福霖：《新桂系史》（第3卷），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中央训练团”，也不时调训新桂系的官员，CC便乘机向广西渗透。特别是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后，新桂系闻风而逃，广西大片土地沦陷，新桂系声誉扫地，内部产生了严重的离心倾向，不少人欲思“跳槽”，CC便乘机大肆活动，对新桂系的干将进行拉拢。新桂系的一批高级干部，包括黄旭初的亲信黄昆山（省参议会秘书长）、陈寿民（省政府秘书长）、严海峰（省政府田粮处长）等人，投靠了CC。CC还控制了一批省参议员，一些CC分子或亲CC的人当上了县长。到抗战结束时，CC已经在广西形成了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新桂系与CC之间一直进行明争暗斗。1946年6月，省参议会议长选举产生纠纷，则是新桂系与CC斗争的公开化，也是CC在广西实力的大暴露。通过这场斗争，新桂系感到自己受到CC威胁的严重性，加紧了排挤和铲除CC势力的步伐。

省参议会议长纠纷平息后，新桂系随之对CC采取了反击。首先是清除心腹之患，改组省政府，把被CC拉过去的人清除出去，并且论功行赏，提拔一些在议长选举纠纷中和CC斗争得力的人；撤掉了陈寿民的秘书长和严海峰的田粮处长职务，分别由黄中廑和李一尘担任，黄昆山担任的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职务，随着参议会的正式成立也自然撤销了，一些CC分子担任的县长职务也被撤销了。接着，新桂系改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1947年3月召开国民党广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为了在这次会上彻底战胜CC势力，完全操纵大会的选举，新桂系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布置，派出得力干将，奔赴各县，布置各县出席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使各县的代表都是清一色的新桂系。在这次大会上，新桂系所内定的执委监委全部如期选出，而原来担任执委监委的CC派黄昆山、陈寿民、阳叔葆、唐仁民、谢祖莘等人全部落选。

新桂系还对各地自卫队、保安队进行整顿和改编。1945年9月1日，在百色成立广西省保安司令部，接替绥靖公署，加强地方“保卫力量”。保安司令部统辖4个保安团，10个保安大队，2个特务中队，2个通信中队。1946年1月，广西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接连通令各地“清乡”，规定各县成立清乡委员会，清点户口，实行“五户联保”，并制定民枪管制办法，所有民枪均由管制委员会登记管制；严令各专区、县、乡、村清剿“盗匪奸伪”，以加强新

桂系的统治。接着，组织各县市保安警察队。经过这一番整顿改编，新桂系的地方武装得以大大加强，地方秩序也逐步得到恢复和稳定，对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但新桂系加强地方武装，是为稳固新桂系的统治服务的。内战爆发后，新桂系跟随蒋介石进行内战，各地方武装成为镇压和“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反革命武装。

复兴经济的举措

抗战胜利后，新桂系在开展“善后救济和恢复秩序”的同时，也开始筹划复兴广西的经济问题，并将此作为重建广西的重点措施。1946年1月，广西省政府召开政府委员会第788次会议，通过了《广西省复兴建设办法要领》。《要领》认为“今当抗战胜利完成之日，应为和平建设开始之时”，提出了“在建设上讲生养，从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纲领，宣称“一方面致力于能解除官僚及封建压迫与剥削之为害，使人民能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一方面须努力促成和平合理之新社会秩序建立，使人民的福利得到保障，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①1946年5月5日，黄旭初在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我们觉得本省经过这次惨重破坏之后，要求复兴已非单纯消极的休养所能济事，必须本于积极精神从事建设，所以提出了‘在建设上讲生养，从进步中求安定’的口号。同时我们讲建设必须求进步，为求进步必须安定。当前本省复兴与建设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去求进步与安定，着重于完成地方自治以进入民主宪政与增加农业生产与工业建设，以求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实现，而一切建设当以民生为中心，更当致力于经济建设，使一向贫瘠的本省变成富足的境域。”②

广西局势逐步稳定之后，新桂系便开始实施各项建设。

1946年6月，新桂系在桂林成立广西建设协进会，选出黄旭初、梁念劬、

---

① 《广西省复兴建设办法要领》，“附录”，5页，广西省政府，1946。

② 《辅导通讯》，第1卷第3、4期，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6。

李任仁等31人为理监事和候补理监事，推举黄旭初为理事长，聘请李宗仁、白崇禧为名誉理事长。在这之前，广西省政府从百色迁回桂林时，新桂系曾积极谋划恢复广西建设研究会，重新挂出了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招牌。[1] 但由于1944年该会成员陈劭先、李任仁等疏散昭平等地后，利用该会掩护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他们还试图利用该会进行活动，这为新桂系黄旭初所不容许，故而另成立广西建设协进会，以此向公众标榜新桂系要致力于广西的经济复兴。

1946年10月，新桂系召开有各行政区专员和县长参加的广西省地方行政会议，着重讨论广西建设问题。会前，黄旭初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征询他们对广西建设的意见。李宗仁、黄绍竑专门就此回电，白崇禧还亲飞桂林，与黄旭初等人具体商讨广西建设问题。他们就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制定方案，认为首先应注意发展农业，“广西地广人稀，最适合于农业的发展，故经济建设宜以农业为中心，而以工业交通为辅助”，[2] “必须农业经济繁荣，然后工商经济方有发展的基础”。[3] 农业建设则要注重兴办农田水利和农作物的改良，增加粮食产量。根据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意见，广西省行政会议作出了广西建设的决议。

根据这些计划，广西省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广西经济采取了如下措施：

发展农业生产。由于战祸和连年遭受灾害，广西粮食缺口很大，无法保证人们的基本需求，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先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新桂系当局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一是增加粮食生产。1946年春，广西省政府颁布《栽培粮食作物紧急措施办法》，针对1946年春的干旱，提出了紧急处置的办法。又对1946年度的粮食生产作出了四项规定：（1）水稻方面，推广良种面积20万亩，增产12

---

① 万仲文：《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片断回忆》，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96页。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10月21日。

③ 《辅导通讯》，第1卷第14期，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6。

万担，并在田阳、那坡水利区增种双季稻2000亩；防治稻虫害，制造梳除稻苞虫器1000个，饬各县修理及添置和制造捕鼠器1000个，分发推广仿制；增加肥料，规定冬季绿肥栽培，要达到各县各农业区耕地面积10%至15%，夏季绿肥暂在各场继续繁殖种子，以供来年推广。在未普遍施用堆肥区继续提倡制用堆肥200万担，又在大河及西部推广骨粉2.5万担；在未知利用人粪尿区域提倡利用人粪尿150万担。(2) 陆稻方面，本年在中部及西部各县继续推广陆稻栽种面积8万亩，增产8万至12万担。(3) 杂粮方面，玉米增种10万亩，增产10万担；甘薯增种6万亩，增产30万担；木薯增种2万亩，增产12万担。(4) 冬作方面，各县增植冬季作物200万亩，冬耕面积最低标准要达到县耕地面积40%。

以上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统计，1946年全省稻谷产量，仅临桂等65个县填报数就已达3229万多担，而1945年由于受战乱灾害影响，全省稻谷产量仅为2500万担。[①]

二是发放荒地。广西是一个山多、地瘠的省份，耕地十分缺乏，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而广西的人口，却从1840年以后，呈高速增长的趋势，至1944年，达1572万人，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倍以上。[②]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1940年，广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2.2亩，比全国人均耕地少0.8亩。[③] 而且大部分耕地是红土壤，土质贫瘠，产量很低，正常年份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每亩仅为251斤，比全国平均每亩产330斤低24%，若和国内水稻高产区比较，则更不能同日而语。[④] 民国以来，广西曾建立一些垦殖公司，并鼓励农民垦荒，使耕地面积有所增加。抗战胜利后，广西省政府也把垦荒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几次会议讲话中，都强调垦荒的重要意义。1946年，广西省

① 《广西民政》，第3卷第4期，32页，广西省民政厅，1946。

②③ 李炳东、弋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史稿》，184、194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④ 陈正祥：《广西地理》，62页，正中书局，1946。

政府颁布的《广西复兴建设办法要领》规定“公有及私有荒地一律限期开垦”，并规定了开垦荒地的方式、经营办法，鼓励私人开垦，同时在地租税方面给予减免，“自垦竣之日起免纳地租五年，五年后所纳地租亦以不超过该土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百分之十五为限”。[①] 对私有荒地，限期开垦，逾期即予以征收；公有荒地，则经常放垦。省政府令各县将放垦荒地作为本县中心工作之一。在省政府的督令下，各县相继开垦了一些荒地。截至1946年冬，全省放垦达180万余亩。[②] 但新垦的荒地大都土质较差，粮食产量很低，一些地方由于毁林垦荒，破坏了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原有的耕地受到损害。因此，尽管新垦了不少荒地，但全省的粮食产量增加仍十分有限。

另外，广西省政府还督促各地兴办农田水利。1932年至1945年间，广西曾修筑了一些大型和小型水利工程，但抗战期间不少工程遭到破坏。战后，省政府除请求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拨发以工代赈工款1.16亿元，修理遭受破坏的灌区外，并向中国农民银行贷款以续修未完工程。但所获款额过少，兼以物价增涨不已，不敷极巨，因此，很多工程最后仍未能完成。到解放时为止，广西有水灌溉的农田面积仅为708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③] 全省各地旱灾涝灾不断出现，反映了当时水利抗旱抗涝力量的薄弱状况。

发展交通事业。抗战前后新桂系曾积极发展交通事业，迄1943年底止，全省共计筑成通车省道4247公里，县道8792公里，乡道17352公里，但县乡道能通车仅1600公里。[④] 抗战初期，广州沦陷时，接近战区的公路奉命破坏。1939年11月，日军侵入桂南时，省政当局先后下令破坏桂东南地区的公

---

① 《广西省复兴建设办法要领之实施办法》，54页，载《广西建设重要文献》，54页，广西省训练团，1947。

② 《广西民政》，1947年第3卷6期，9页。

③ 李炳东、弋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史稿》，136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④ 《广西经济建设手册》，13页，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路。1944年9月，日军再次侵入广西，省境大部分地区公路自行破坏殆尽。1945年5月，日军从广西撤退，国民党军队尾随追击，广西抢修了一部分公路。抗战胜利之初，为了适应大量国民党军队过境，赶赴东南各省受降和控制战略要地的需要，广西加紧修复公路，至1945年底止，草草修复主要干线公路共2608公里。①

1946年5月，省公路管理局拟订了《广西公路建设五年计划》。但战后的广西，灾荒遍地，经济萧条，无财力按计划实施。公路建设只在同年9月至次年11月间，由省政府商请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拨助赈粮赈物，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复、整修和新建了部分公路。至1947年11月底，工赈业务结束时，全省利用赈粮、赈物整修和修复的公路共计31条，全长2981公里。② 这两年中，也有一些未获得赈粮的县，由县政府筹集经费，发动民众修复了少量县道。194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广西公路局以及各县政府已无力顾及公路修复工作了。

在抢修和整复公路的同时，省政府还积极调筹车辆，组织复兴运输和善后救济运输。当时，省政府电请战时运输管理局调拨汽车200辆，后得到20辆，又先后从公路总局和军政部得到汽车82辆。省政府还请求将在外省行驶的广西商车（国桂字牌照车）遣回本省。1945年底，广西省内共有公私汽车171辆。③ 这些车辆，承担了当时十分繁重的复员运输任务。1946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公路运输处广西分处在柳州成立，有汽车130余辆，主要承担救济物资和还乡难民运输。至1947年1月，该处与交通部合并，改为交通部总公路运输处广西分处，共有汽车328辆，已损坏或缺件70辆，可用的250辆。1947年底，该处汽车除拨给省保安司令部50辆，拨给第三运输处柳州分

---

① 《广西公路史》（第一册），199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② 根据《广西公路史》（第一册），204页、205页表6—1—2和第206页表6—1—3统计而得。

③ 梁有斌、谢永泉：《广西公路运输史》，16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处20辆以外，其余车辆全部撤离广西。①

为了尽量发挥运输工具的运输能力，适应形势的需要，战后广西省政府曾一度对商营汽车试行开放政策，准予商车自由营运，自由竞争。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尽快完成复员运输任务，加快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积极作用，顺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

在铁路交通方面，广西原有湘桂、黔桂两条铁路，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重要桥涵全部破坏，战后两条线路收归国营，并称湘桂黔铁路。为了适应各项运输的需要，湘桂黔铁路工程局对两条铁路进行修复。湘桂线，1946年8月柳州至来宾段通车，1947年1月桂林至柳州通车，11月衡阳至桂林段通车。黔桂线，1945年9月清泰坡至南丹段通车，1947年2月柳州至怀远段通车，3月怀远至金城江段通车，1949年初全线通车。②

在航运业方面，原来广西陆路交通不够发达，很多货物主要靠水路运输。抗战时期，水路航运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市民纷纷回城，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大城市（尤其是梧州）的工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其时，国民党政府忙于接收，粤汉铁路、湘桂铁路以及许多公路还来不及修复，水路运输再次成为惟一快捷的交通渠道。

船舶是水路航运的主要运输工具，战后广西船舶严重缺乏。1946年4月12日，广西省政府以广西航业联营社在抗战期间损失船舶八成以上的名义，向粤桂闽区伪产业处理局拨租该局接收的机动木船10艘。同月，广西航业联营社解散，航商恢复自由营业。6月1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与广西省政府在梧州组设绞捞船只贷款委员会，贷款给航商以捞修战争期间沉没的机动船只。各航商先后绞起、修理的汽轮36艘，电船5艘，拖渡2艘，均投入运营。广西全省的机动船舶（多属梧州港籍），据1947年3月统计，共有96艘，载重5802.68吨。1946年末，全省各江木帆船共有8662艘，总载

① 梁有斌、谢永泉：《广西公路运输史》，1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② 《广西通志·铁路志》，15、2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重量102343吨。[1] 各线营运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济桂”物质，主要是依靠航运运送广西各地的。

当时广西省政府还直接经营航运业，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1946年春，广西银行在梧州集资装造了一座大型航业筏。该筏主要湾泊各线客货轮、花尾渡，用作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并兼作货栈，堆放、检验来往物资，以收取泊筏租、仓租等，经营期间获利可观，也为航商、货主、旅客提供了方便，深受欢迎。二是筹组广西航业公司，参与航运业的竞争。1947年7月，香港广西银行在菲律宾购入两艘美国登陆艇，在香港改装成客轮，取名“桂山”号和“桂海”号，后又陆续购入一些船只，组设广西航业公司。“桂山”、“桂海”这两艘钢质客轮坚固快捷，客位较为雅洁宽敞，在西江航线上颇具竞争力。

战后，广西的交通业在总体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资金匮乏，特别是新桂系很快参与发动内战，很多原来制定的交通建设计划未能完成，广西交通业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

发展工矿业。广西工业向来落后，30年代以前，除邕梧两地略有几家使用机械的小规模工厂外，很少新式工业，仅有的少数小工厂，也由于资本缺少，产量不丰，难以与价廉物美的外货竞争。30年代初，新桂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在全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经济方面，除农业、交通业得到发展外，工矿业也有一些发展，先后建成了一些使用动力的新式工厂，如硫酸厂、酒精厂、印刷厂、制革厂、染织厂、陶瓷厂、机械厂等，民营工厂在政府提倡之下，亦有发展。由于政府积极提倡开采矿业，并制定种种优惠办法，招致华侨来桂投资，1937年、1938年两年间，全省矿业处于全盛时期，大小公司达数百家之多。

抗战爆发后，沿海各省一些工厂迁移来桂，造成广西工业发展的空前盛况。1944年，日军侵入广西，所有工厂，或损失殆尽，或迁移滇黔等省。抗

---

① 马依、舒瑞萍：《广西航运史》，172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战胜利后，大部分工厂迁回原籍复业，广西工业不及战时十分之一。

至于矿业，因抗战时中央对全国矿产实行统制，1939年冬，资源委员会在广西成立锡、钨、锑矿等管理处，财政部亦于1941年在广西设立硝磺处，统一收购，给价远低于成本价，致使各矿业公司纷纷倒闭，加上受战争影响，国际通道被敌封锁，广西矿业更加衰落。1944年日军犯桂，各矿业公司又遭惨重损失。

抗战胜利后，广西省政府在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强调发展工矿业。1946年8月29日，白崇禧飞抵桂林，9月1日在省会各界欢迎会上，以“再造新广西，建设新中国”为题发表了讲演，对如何建设广西提出意见，要求“努力发展工业，无论公营工业或民营工业，都应当使其繁荣生长”。①黄绍竑也致书黄旭初，提出“以农业为中心，以工业交通为辅助”的经济建设方针。广西省政府根据当时广西工业状况，制定了工业发展计划。由于战后广西政局较为稳定，矿产水力也算丰富，为战后工业的恢复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战后工业有所复兴。据统计，1947年6月，全省工厂总计88家。由于广西省政府采取鼓励政策，广西矿业也有所恢复。1947年，全省煤产量82174吨，仅次于1942～1944年的产量而成为第4个产量最高的年份；纯锡的产量为658吨，比1944年318吨高出一倍；其他矿产量，均较1945年有较大的提高。② 但矿产资源的开发缺乏计划性，不少矿藏被滥采乱挖，使矿产资源严重浪费。

战后一段时期，由于广西省政府的重视和扶植，广西工矿业得到一定的复兴。但广西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条件都很差，战争中受破坏十分惨重，加之劫后地方经济枯竭，广西工矿业的恢复和发展十分有限。至1949年，全省工业产值仅为1.6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11.4亿元的14%，比全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低16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手工业产值1.45亿元，占工业产

---

① 《辅导通讯》，第1卷第14期，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6。

② 《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261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值的90.63%，近代工业产值仅1500万元，占9.37%，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值（含手工业产值）仅8.7元。[①] 煤炭主要是合山、西湾两处小煤矿，其他如锰矿、锑矿规模都很小，而且生产技术十分落后。这些，严重制约了广西经济的发展。

战后新桂系为了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曾一度积极致力于广西经济的复兴，制定规划和措施，有的取得一定成效，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这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尽管新桂系"重建广西"的目的不是真正改善人民生活，为人民谋利益，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复兴社会经济的措施和成效，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可惜的是，内战爆发后，新桂系集团积极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把"重建广西"纳入了内战的轨道，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失败，新桂系建设广西的计划纷纷搁浅，除铁路交通基本上按计划恢复以外，其他经济建设的计划均未能完全实施。

① 李炳东：《广西当代经济史》，5~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第十九章　新桂系积极参与反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新桂系“重建广西”的目的是恢复和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因此同时又积极追随蒋介石，为反共内战出谋划策。全面内战爆发后，新桂系全力转入打内战，在广西实行“三征”暴政，强化反动武装，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进步势力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桂系的所为，违背了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动，把灾难深重的广西人民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暴露了其反动本质。随着内战的发展，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日益危机，蒋桂矛盾又激化起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爆发了蒋桂的激烈争斗。蒋桂争斗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危机。

一、追随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一面调兵遣将，紧锣密鼓地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战后，新桂系与蒋介石之间，尽管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但在反共内战的问题上，利益是

一致的。早在日本投降前一年，李宗仁就为蒋介石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出谋划策。1944年春天，蒋介石到汉中视察，李宗仁向他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俄国，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①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李宗仁主张：日本一旦投降，国民党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国民党接收部队到达。同时，他认为北方沦陷的时间较长，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因此，他建议国民党军队采取"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向收复区开进。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等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② 尽快占领东北。这样，就可以避免日军一投降，中央政府急于令其集中缴械，而出现的日军集中后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交通线迅速被原在敌后的共产党游击队所掌握的局面。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对蒋介石忧心重重，害怕蒋独掌大权，将他们这些异己排斥。因此，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法，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表示"八年抗战坐镇前方，身心交惫，请畀以名义出国考察，藉资休养"。③ 李宗仁当即得到蒋介石的安慰和挽留，1945年8月底，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马上答应了。北平行营直辖第十一、十二两个战区，包括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五个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市。这正是中共山东、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所在地。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北平

① 《李宗仁回忆录》，59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李宗仁回忆录》，596页，1988。

③ 尹冰彦：《抗战胜利后的李宗仁及北平行辕》，载《新桂系纪实》（下），3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行营主任，一方面固然是“调虎离山”之计，以达到他离间桂系与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分散桂系联合反对他的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授权他抢夺该辖区内中共解放区的抗战胜利果实，消灭该辖区内的中共武装力量。尽管北平行营被蒋介石所安插的势力架空没有实权，李宗仁也自知蒋介石对他“绝不会信任”，但他在任北平行营主任期间，还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当时，李宗仁对在华北负实际军事指挥责任的孙连仲所部对共产党畏之如虎，不堪与中共作战的情形深表忧虑。1946年春，他曾与白崇禧商量，请求白崇禧相机向蒋介石建议，由他指挥一两个军，来改变华北的不利局面。[①]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对中共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了截断中共军队关内外的交通，蒋介石决定先攻占张家口。这时，李宗仁“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向北平北上，夹击贺龙主力。经过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十月十一日占领张垣”。[②]这说明，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三年，虽然他自以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但在反共内战事业上他是为蒋介石效了力的。

新桂系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更是积极鼓吹和追随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1945年8月，白崇禧得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蒋介石，建议延期接受日军投降，主张“先剿共后整军”，“先剿共后行宪”，要“乘战胜余威，先将中共剿平”。[③] 他认为，国军现在局促在西南一隅，而河汉江淮地区则在共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调动国军接收华北自非易事。为挽救此种不利形势，惟一的做法就是推迟日军投降的期限，使国民党赢得充裕的时间，调军北上，俟收复工作完成后，再行受降。[④] 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白崇禧伙同何应钦以及CC派反动分子极力煽动反苏反共，破坏停战，借口东北问

①② 《李宗仁回忆录》，60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③ 《白崇禧回忆录》，340、34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④ 程思远：《政坛回忆》，16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题挑起新的内战。1946年6月1日，白崇禧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长。白亲自到东北，指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四平，占领长春、吉林等地，充当内战反共的急先锋。这年8月下旬，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以"慰问灾区"为名回到广西，多次向省政府、省参议会的高级官员说明"中央以武力解决中共的决心"，鼓吹蒋介石的"统一军令，统一政令"那一套，强调"全国之统一，不容恶势力破坏，本省之统一，亦不容恶势力破坏。全国要服从蒋主席领导，在本省又要服从黄主席领导"。[①] 白崇禧所说的"恶势力"，就是诬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所谓"服从蒋主席的领导"，就是要坚持独裁、内战、反共的方针。内战爆发后，白崇禧多次回到广西"动员戡乱"。他颠倒是非，把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说成是"为巩固国家统一，解除人民痛苦"；而对中共解放区军民进行的自卫战争，则诬蔑成"破坏停战命令，加紧扩大叛乱"。他要广西全省上下"以加强自卫，确保治安为中心工作"，集中使用人力物力，"根本肃清匪患，达成戡乱动员之使命"；他要"全省士绅，殷实富户，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踊跃购买枪支，供给民团使用"；他要"全省青年，在政府指导之下，重新接受军事训练，踊跃参加民团组织，以应付任何事变"；他强调，"对于征兵、征粮，务应依期完成，以加强剿匪力量"。[②]

为新桂系坚守后方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也撕下"和平、民主、进步"的面纱，积极响应蒋介石的内战号召。黄旭初回到广西，就在省政府、参议会的会议上，竭力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说"世界本太平，只因苏联不断要扩大安全范围，殊不知范围越大愈不安全，问题于是闹得严重了。苏联不惜侵犯人主权，英美也不得不谋应付了。中国本无事，而问题却如此之多，原因都在于中共之有求无厌，得陇望蜀，这个要求还不待政府实践，第二个要求又来了，第三个要求又准备了，于是纷争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9月2日。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10月10日。

不已，内战很难避免”。他还说：“国共纠纷冲突，所谓纠纷实即中共对政府的种种不法行为。所谓冲突，实即中共军队对于国军的种种攻击。”① 黄旭初颠倒黑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为追随和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制造舆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几十万大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新桂系加紧了追随的步伐，7月5日，广西省参议会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请中央明令讨伐共党电》。电文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抗战胜利，薄海腾欢，还政整军，行将实现。讵料中国共产党包藏祸心，拥兵作乱，焚杀劫掠，涂炭生灵，破坏交通，妨碍统一，绝民族复苏之机，贻国家无穷之患。钧座意存德化，委曲含容，屡次协商，以示宽大。如中共仍执迷不悟，肆意横行，请即乾纲速断，明令讨伐，以戡内乱而奠国基，国家幸甚。”② 同一天，广西省参议会还发出《致各省参议会请一致呼吁实现军队国有促成和平统一》的电文，将上述致蒋介石电转发给各省参议会，提请各省参议会“一致向中央呼吁”。③

10月10日，黄旭初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反共演说。他说：“我们认为国家的统一必须巩固，断不容一个国家之内，有两种法令，有两个政府，所以对于一切恶劣反动势力，必须排除消灭之。”④ 接着，他到师范学院附中演说时更露骨地宣称：“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是赤化，一是防止赤化，绝无他途可循。”他还对一位民主人士说：“内战一定要打下去，否则乃难以应付中共。虽然打起来有困难，但非打不可。”⑤ 黄旭初还在一次行政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当前的大患为共匪，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为戡乱剿共。共匪不除，大家决无安宁的日子”，“这时期我们和共匪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战

---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10月27日。
②③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7月6日。
④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10月11日。
⑤ 《广西情况报告》，1946年12月11日。

争时期，任何人无中立或袖手旁观的可能"。①

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完全不顾战后广西人民的痛苦和渴望和平的要求，彻底违背了人民的意愿。

二、实行"三征"暴政

新桂系积极追随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兵源、粮饷和军费。因此，在广西实行残酷的"三征"，强行征兵、征粮、征税，加紧对人民的掠夺，把各族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八年抗战期间，广西先是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双"，后来则是"有丁抽丁"，抽集了百万壮丁参军，成为当时全国按人口比例抽壮丁最多的一个省。此外，还征工1450余万人次。经过几年的征调，广西各县的壮丁基本上已经征光。为了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扩大内战的兵源，新桂系从1946年10月10日起，又恢复了征兵制度，并制定了"兵役改进方案"，办理征兵；同时加强户籍管理，奖励检举匿报户口。全省设立了两个师管区，桂西师管区设于南宁，司令为李晓茫；桂东师管区设于桂林，司令为吕国铨，负责办理征兵事宜。1946年全省征兵1.8万人，1947年征兵2.3万人，1948年上半年则达4万多人。除此之外，省保安团、县自卫队也要征大批壮丁。② 当时人民普遍不愿应征去充当内战的炮灰，新桂系就实行强征，征不到就捉，捉不到就一个村一个村地用警察和保安队包围起来，把全村男女老幼都抓起来，勒令他们交出被征的人来。征兵的同时又有"征集费"，规定每兵6万元，新兵安家费5万元，这些费用全部摊派到老百姓头上。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10月27日。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7月27日。

新桂系强行征兵，大批农村青壮年被征往内战战场，许多人为逃避抓丁，被迫逃往他乡，丢下田地无人耕种，致使广大农村出现劳力不足、田园荒芜、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

抗战胜利后，广西经过日军破坏，已经满目疮痍，又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全省粮食奇缺。当年全省70%的农民不够3个月的粮食，有4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迫切要求得到一个和平环境，恢复生产，改善生活。但是，新桂系却为了内战的需要，不顾人民死活，从1946年10月1日起，恢复田赋征实征借制度，全省征实200万担，征购100万担，征借60万担，并规定逾期缴纳者要加征"滞纳费"。[①] 1946年11月7日，广西省政府又发布命令，1941年以来所欠交的田赋仍旧照征，追缴1944年和1945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的田粮赋税，[②] 这就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天灾人祸，交相煎迫，人民难以维持生存。1947年夏季，农村出现了严重粮荒，许多地方的农民靠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吞服黄泥充饥，饥民遍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柳江县广原乡一群饥民发出了悲痛的呼吁：

"抗战八年来，我们老百姓尽了力量，受尽了痛苦，为的是要打败敌人，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人民的自由、平等与幸福。

"敌人投降了，我们满以为这一来可以过和平安定的日子了，谁又料到去年的水旱灾、虫灾，竟把我们一年来所流的血汗白费了，收获得来的粮食，除了交租还债外，还不够三个月的口粮。两个多月前，我们便开始吃野菜、草根和芭蕉根了……在整个农村里，这饥荒的问题，是愈来愈凶了，像一条毒蛇，啮着每个人的心。"[③]

当时广西农村的惨状，又何止柳江县这一个乡。随着内战的扩大，新桂系反动统治的加强和征兵、征粮的加剧，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

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庞大的内战军费而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一方面滥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7月2日。

② 《广西大事记》，1946年版。

③ 《广西日报》（柳州版），1946年5月8日。

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方面增加税捐，对人民巧取豪夺。在广西，新桂系的苛捐杂税本来就名目繁多，到了内战爆发，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又不断地设立名目，增加税捐。其中不少是直接用于反共内战的税捐，如防共联保费、地方自卫捐、警察服装费、壮丁收验捐、军粮交费等等。当时在南宁，各种税目多达40余种。税率也很重，如杀一头猪，税率等于这头猪的五分之一价钱。1947年9月15日，广西省政府决定整顿村街仓，抽收仓谷标准采取累进办法：1000斤以上收1%，25万斤以上收10%，抗缴者则强制执行。11月15日，省府又制定紧急保安费征借办法，规定每年谷租在500担以上未达1000担者，征借5%；1000担至2000担者征借10%；2000担至3000担者征借15%～20%。在城镇有金属屋铺地或砖建、水泥房出租者，征一个月租金。在柳州、桂林、梧州、南宁、百色、郁林、贵县等市县经营工商业资金在2亿元以上者，由商会负责征借。其征借金额为：梧州80亿，柳州60亿，南宁40亿，桂林20亿。各县市任职公务员，均征借一个月薪金，所征借款“戡平匪乱”后由政府偿还。同时，恢复粮食征借。按1946年规定征四借一，全省负担征借50万石。此项配额按各县粮赋增加征借。1948年9月省府又决定，大宗入口货物从价征收外货内销证费，其中洋杂征5%，卷烟征10%。此外，还决定征收房屋自卫特捐。为了征税，桂系还不惜用开办烟馆、赌场、妓院的办法，从中抽取捐税。由于纸币不断贬值，一切捐税均以实物计征。农村地主与富户乘机出租放债，高利盘剥农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后，农民劳碌一年所获的果实，所剩无几，有的农民不负债过年就已算幸运了。1948年12月，中央治安考察团第三组在考察广西省的报告书中说：

“每户谷一百斤（约地一亩）折合国币一角，即收谷六斤弱，衡之值百抽十之例，并不为重。唯民众负荷，事实上绝不止于粮赋。征兵壮丁安家费之收集，自卫捐税之分摊，征工派差之担负，其他捐税及地方支出之征收，综合计之，民众负担之重，实已超过其负荷能力。若再以公务人员数量加以估计，其数目之大，尤可显见民众其负担之重，甚为惊人。桂省现行政组织，

经省库支给公费之公务人员，共计约六千余人。再加十个保安团队，总数当在两万以上。至于县库支给公费之公务人员，自县政府以及所属机关及乡镇支薪之职员，大县为四五千人，小县亦有千余人。兹若以三千五百人计算，全省一百县市应为三十五万人，加省级支薪人员，总数约为四十万上下。依照中国户口惯例，每户以五人计，此四十万人之眷属，应共为二百万人上下。以桂省财力之差，他且不论，即此一项负担，人民业已精疲力竭，呻吟喘息于饥饿线矣。况社会游闲剥削之徒，尚未计于此数之内乎。"①

新桂系实施的"三征"暴政给广大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和痛苦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支持反共内战，新桂系除了推行残暴的"三征"政策，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还想方设法榨取劳动人民血汗。

滥发纸币。国民党政府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之一就是滥发纸币。新桂系统治广西期间，也发行过多种货币，仅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内，就变换了几种钞票，如桂钞、法币、关金票、金圆券等等，票额由一角，飞升到万元、10万元，每更换和发行一次货币，就是对人民的一次残酷掠夺。广西银行则趁机攫取高额利润。当时广西市面上币制相当混乱，仅银元就有袁洋、孙洋、船洋、法洋、澳洋、龙洋等，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不一，各地钱庄从兑换中套获高利，货币过多和币制混乱，引起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银行的广西银行，不是负起责任，稳定当地市场利率，相反，也采取浮动利率的方法放款，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将利率负担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市场涨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吏贪污。由于政治腐败，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成风，新桂系集团中的官员也不例外。梧州是广西出口门户，又是广西的大商埠，桂系官僚集中梧州大肆搜刮。《华商报》载文指出："桂系大小喽罗官僚资本在这儿的膨胀，主要是黄旭初、李一尘、李品仙、韦云淞。其中要算李品仙和黄旭初最发展，

---

① 《中央治安考察团第三组考察广西省报告书》，广西区档案馆藏。

最发展也就最矛盾，两者狗咬狗，打得头破血流。”他们都各有打手，大搞私谷出口，炒卖港币，中饱私囊。白崇禧的小舅子马某一骗便是几十万港币，逃走之后没有一个债主敢组债权团去追债。韦云淞主持“禁烟督办署”更是尽力搜刮。① 解放前几个月，桂系当局派武力押运属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在梧州的钨锡矿去香港成交，共值港钞800余万元，也全部落入了桂系巨头的腰包。②该专区专员冯璜自述，他到梧州上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梧州是全省的商业中心、经济枢纽，说不定可以混水摸鱼，搞得几文为下台以后享受。③ 桂系高级官员均如此明掠暗夺，至于一般官员的腐败行为，就举不胜举了。

随意罚款。为了尽力搜刮民财，拼凑经费，新桂系当局还采取了罚款的手段，百姓动辄遭到罚款。拖欠征粮罚款，欠交税款罚款，违背命令罚款，甚至还利用戒严查户口，乱捉人，以没有登记户口为名罚款。其实，大多数罚款都是进了官员的私囊，罚款成为当时新桂系官员掠夺民财的一种手段。

扣发工资。国民党政府要支付庞大的内战军费，对公教人员的薪金则往往扣发或延付。1949年3月，中央银行桂林分行一次就延迟不兑付广西大学3500万元的款项，致使全校师生断炊。④ 4月，国立南宁师院停发学生伙食，600多名学生为了活命，组织“拍卖委员会”，分组拍卖同学们仅有的行李、衣物、书籍。湘桂铁路员工也因路局欠薪数月，生活费用无着，衣物卖光吃尽，“万多名员工生活都陷入绝境，苦得不能再苦了，有的数口之家，每口午饭晚粥，有的已断炊”。⑤

新桂系残酷的“三征”暴政和变本加利地盘剥，把广西人民逼得走投无路，人民除了起来反抗再无别的出路了。

---

①② 《华商报》，1949年8月1日、24日。

③ 冯璜：《解放前夕我在广西第三专区的活动纪实》，见《新桂系纪实》（下），283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④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3月31日。

⑤ 《民声晚报》，1949年8月30日。

三、强化武装，加强暴力统治

新桂系为了支持长期内战，巩固其后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在广西的统治。

首先是强化反革命武装力量。全面内战刚一爆发，1946年7月，广西省政府就将省保安司令部统辖的4个保安团、10个保安队扩编为4个保安总队和1个保安独立大队。为了镇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随后又成立了3个联防区：怀集、信都、广宁、开建为第一联防区；博白、陆川、南宁、永淳、灵山为第二联防区；绥渌、上思、思乐、防城、钦县为第三联防区。

在加强省保安队力量的同时，还组织县市保安警察队，恢复县市民团组织。1946年5月29日，广西省政府委员会第811次会议通过颁行广西各县市地方治安武力整理办法，规定地方治安武力除原有警察及国民兵外，其余自卫队、保安队、警备队等，改编为保安警察队，隶属县市警察局；尚未设有保安警察队的县市，应依规定设立；保安警察名额视地方需要和财力而定，但每县市至少应设3个班，至多可达15个班，每班设警长1人，警士15人。① 1947年8月下旬，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为贯彻执行“动员戡乱”，下令各县市恢复民团组织，成立县市民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副司令专任。大县设2~3个中队，小县设2个分队至1个中队。每1个中队有3个分队，每个分队设3个班，每班团兵16人。抽调20~45岁壮丁充当团兵，以3个月为期，服务期满后复员，换调另一批壮丁补充服务。② 各县市的警察团队及一切地方武装，统归民团司令部指挥。民团司令部的任务，是配合省政府的

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下），51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9月8日。

保安队，共同负责“戡乱”，共同“围剿”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

新桂系加强统治的另一重要措施是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势力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内战爆发后，新桂系即把中共广西党组织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黄旭初专门就此向各专区专员发出指示，要他们对中共广西地下党采取下列方针：(1) 有武装的以武装消灭，广西绝不准有解放区；(2) 以组织（指特务）破坏中共组织活动，对有组织活动的人员，有计划地予以逮捕；(3) 对一般无组织活动的人员，采取监视办法，不随便捉人，尤其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人。1946年春夏间，广西省政府先后撤销了广西日报社社长石兆棠和广西日报柳州分社社长罗培元的职务，并调派军警将广西日报社的30多名职工驱逐出报社。同年9月，广西省保安司令部发出“防止奸党地下活动以遏乱萌”的电令，严令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密查和迅速处置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严密考察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的思想言行。同月，桂林市警察局会同省保安司令部，大肆搜查桂林市各书店，没收《民主》、《唯民》、《正报》、《文萃》等大批进步报刊。11月3日，黄旭初主持召开“冬防”会议，决定彻底清查户口，实行联保制度；调整乡镇村街组织，加强基层统治；进行登记民枪，控制民间武器；加强特务活动，监视和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中共地下党力量较强或革命势力较大的地区、机关、厂矿、学校，派遣特务或宪兵进驻监视，随时准备逮捕、迫害。1947年1月，新桂系迫令《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停刊。2月，查封梧州八桂书店，逮捕该书店经理。在新桂系当局的高压下，周匡人、罗培元、欧阳予倩、陈此生、石兆棠、莫乃群等大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被迫撤离广西。从7月初开始，桂系当局下令在桂林、南宁、贺县、钟山等20多个市县实行大搜捕，共逮捕爱国师生、职工100多人，解雇一批教师和职工，开除一批学生。接着，桂系当局又发出通令，责令所有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登记自新。据1947年12月7日桂林版《广西日报》讯：“市府顷已奉到命令，对各地共产党员之自新，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为申请登记期间。在此登记期间，所有省内之共产党员及其工作人员，应亲至各该管辖之专员公署或县市政府，申请登记。”1948年11月，

黄旭初签发《广西省政府代电注意防范匪策动城市善后准备工作》，企图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城市革命斗争。在桂系当局的打击下，一些地下党员、民盟广西支部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相继遭到迫害，大部分被迫转移到外地。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广西大中学校师生也以各种形式响应和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革命斗争。新桂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控制和镇压，阻止学潮的蔓延。

1947年6月，广西学潮刚刚兴起，黄旭初就亲自召集省府全体职员及桂林市各校校长、市长、警察局长谈话，指责学潮迭起，威胁社会治安，并诬蔑学潮的蔓延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策动，是为了扰乱社会秩序和颠覆政府，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严加防范。此后，广西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和各县政府先后发布布告、电令，"禁止聚众滋事"，密切注意学生行动，防止学潮。1947年9月15日，黄旭初亲自签发了《广西省政府抄发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强调"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其后，又专门制定《广西省学运工作实施办法》，规定在省会设立全省学运总组，学校集中的地区设县市学运分组，各中等以上学校设学运小组，层层控制，上下沟通，定期交换情报，"如发觉各校员工中有不良分子，遗害群众，应严密考查缜密处理"。[①] 同时，桂系当局还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在广西发行，查禁了29种书籍，以此加强对学生思想和社会舆论的控制。

新桂系当局控制学潮的各种文件和政令下发后，特务大肆活动，跟踪学生行动，罗列黑名单，发现学生"越轨"行为，就根据黑名单到学校武力搜捕。1947年8月8日晨，新桂系当局首先从广西大学开始逮捕进步学生，先后波及20余县，被捕人士计有学生、工人及其他进步人士，有数可查的共有100人。他们罗织"受奸党煽动"、"阴谋暴动"、"扰乱社会秩序"、"颠覆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捕无辜，"宁可枉杀九十九，不可放过一个"。[②]

①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55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华商报》，1947年8月26日；《群众》，1947年，第27期。

新桂系大力强化反革命武装，实行暴力统治，镇压中国共产党、民主势力及人民民主运动，使其同广大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四、省参议会选举纷争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新桂系积极追随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蒋保持一致。但是，蒋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广西的日益渗透，新桂系与之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旨在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排挤出广西，加强和稳固新桂系对广西的统治。1946年6月，围绕着省参议会议长选举，新桂系与CC系进行了一场公开的激烈争斗。

广西省参议会正式成立之前，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是李任仁。李是广西政界的元老之一，又是白崇禧小学时代的老师，一向为白崇禧所敬重，李宗仁对他也很推崇，因而自1939年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以来一直任议长。但由于李任仁比较开明，在抗战期间，与居留桂林的进步人士来往频繁，并支持他们的进步活动，为新桂系所不满。因此，新桂系策划在省参议会正式成立之时，不再由李任仁任议长，而是由原来在新桂系起家时在经济上曾给予资助的玉林大地主陈锡珖担任议长。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势力CC系采取多种方式，渗入广西，到抗战结束时，已在广西形成了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当时CC控制了一批省参议员，并企图以省参议会为据点，进而夺取新桂系的广西地盘。CC的做法是先控制省参议会，然后由省参议会要求改组广西省政府，撤换新桂系的干将民政厅长陈良佐、教育厅长黄朴心、省府委员黄中廑等，以剪除黄旭初的羽翼，孤立黄旭初，最后再把黄旭初调去做有名无实的内政部长，代之以CC或亲CC的人。CC的企图被新桂系觉察后，并得知陈锡珖已被CC拉拢过去，新桂系便

改变了初衷，转而支持李任仁担任议长。当时新桂系认为李任仁有桂北各县的选票做基础，而桂南、桂西、桂东的参议员中大部分不是CC的人，只要把黄旭初的意图贯彻下去，他们一定会遵办。而且，通过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新桂系还可以拉拢一些参议员，控制一些选票，这样，新桂系便认为一定会稳操胜券。

CC系为了达到操纵议长选举，控制省参议会的目的，大肆展开了活动。他们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如南宁、柳州，设立招待站，对经过南宁的龙州、百色一带的参议员和经过柳州的桂西北一带的参议员招待一番，食宿玩喝，应有尽有，尽情地进行拉拢，以控制更多的选票；另一方面，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攻击李任仁"左"倾赤化背叛国民党，四处宣传白崇禧不让李任仁担任省参议会议长而让陈锡珖当议长的意见，并煽动封建地方主义，攻击李任仁等桂北人有偏见，只重视桂北，偏枯桂南，自省会迁桂林后，一切机构均集中于桂林，高等学府如广西大学、医学院也要搬去桂林，桂南一所高等学校都没有，桂南子弟升学困难，造成桂南愚昧落后，号召三南人士团结起来对付桂北，力争三南的利益。实质上，CC并不是为三南人民争什么利益，而是借此煽动参议员反对新桂系支持的李任仁，为陈锡珖竞选议长创造条件。因此，在参议会还未正式召开前，新桂系与CC之间的斗争就激烈起来。

1946年6月10日，广西省参议会正式成立。成立典礼完成以后，选举正副议长，当天出席参议会的议员共84人，选举结果，李任仁与陈锡珖各得40票，1票涂改无效，另外3票上的"锡"字写得笔画有误，有2票将"锡"字写成了"锡"（音"阳"）字，1票的"锡"字少了一撇，变成了"锡"字。会议对这3票是否有效发生争执，反对3票有效的一方，认为投票选举之前分发的"投票须知"上明文规定，选票"须字画清真，不可潦草或涂改"，因此坚持3票无效。支持3票有效的一方，认为选票上写的姓名，只要不误会到另一个人，就应有效，不要计较多一笔，少一笔，并搬出内政部复广西省政府就县参议员选举请解释的电文："县参议员选举票姓名笔画有减写而为世俗所习用，不致误为他字者应认为有效"作为法令依据。由于双方争执不下，

会议决定将选票呈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核定，并于11日将4张有疑义的选票拍照存底后，航空邮寄南京内政部。内政部虽然为CC所把持，但由于广西省参议会在投票选举议长之前作过选票上字画有误则选票无效的声明，内政部不便贸然偏袒陈锡珖，因而对广西省参议会的呈文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作批复。一个多月后，内政部虽然作出袒护陈锡珖的答复，但并未肯定陈锡珖当选，而且复电不是直接发给省参议会，而是发给广西省政府代转，这样，争执仍然悬而未决。

在等待内政部复电期间，双方曾派出代表，进行协商，但由于分歧太大，各方又都怀有内政部复电会有利于自己的心理，协商没有结果。

这次议长选举的结果，使新桂系大吃一惊，假如不是4票写错了字，陈锡珖已经当选无疑。这说明CC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虽然最终胜负未决，但已显示出新桂系已陷于劣势和被动。新桂系决定立即采取措施，设法把被CC拉过去的票拉一些回来，操纵半数以上的选票，然后进行议长的重选。在拉票未有结果前，利用省政府是第一次会议召集者的地位和蒋继伊任临时主席的职权（当时蒋是拥李任仁的），以这4票是否有效须请示内政部为借口，尽量拖延重新投票选举的时间。

新桂系的拉票活动，被CC察觉，他们便严密控制参议员的行动，不让亲近CC的参议员给新桂系拉过去。他们自恃胜利在望：一、内政部为CC把持，复电肯定会对CC有利；二、如果重选，上次写错的人不会一错再错，只要票数还是CC多，关键是控制住参议员。因此，CC方面规定自己一派的参议员每日必须集中，行动互相监视，不能单独行动。同时，还用恐吓办法，对参议员进行威胁，使得CC方面的参议员不敢与新桂系接触。

新桂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基本上扭转了被动和劣势局面，操纵了重新选举议长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7月25日，参议员蒋继伊等提出了重选议长案，CC发觉自己的选票已被新桂系拉过去一部分，便坚决反对重新选举，并拒不出席会议，使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通过这一提案，双方相持不下。

CC发觉形势已对自己不利，就决定采用蛮干办法。8月1日，陈锡珖发出通电就职，宣称他已“依法当选为广西省参议会议长”。蒋继伊等49名参议员立即通电否认，指责陈锡珖通电就职“显不合法”，“并请省府彻查，以正视听”。黄旭初亦特致电陈锡珖，指出陈“尚未取得合法地位，未便予以承认……务希停止就职，勿遽行使职权，以免发生纠纷”。陈锡珖则以广西参议会议长的名义电复黄旭初，声称他“依法自应当选为议长，此种合法取得之地位，并无须再由行政机关核准之明文，更不能以参议员一部分人之否认而生动摇”。表示他“不便久延就职，致误时机”。①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新桂系深感此次事件非会内能解决，亦非广西省内能够解决，一定要动员整个新桂系的力量，特别要白崇禧出面干预支持才能解决。于是，8月上旬，韦赞唐被秘密派遣飞往北平和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汇报。白崇禧同意出面干预，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只好赋予白崇禧解决纠纷的全权，回广西“妥为调处”，并明确表示：“陈锡珖之选举票字画既有错误，依法自宜重选，以息争端。”② 白崇禧即在南京向内政部长张厉生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旨。张厉生在写给白崇禧的信中表示：“主席意旨，自应凛遵”，希望白崇禧回广西“苦心调处”，“劝李陈两位先生各自放弃竞选，另举其他合适人物”。③8月29日，白崇禧飞抵桂林。30日下午，白崇禧在桂林依仁路举行茶会，向全体参议员转达蒋介石的意旨和张厉生的意见。这时新桂系方面已提出李任仁放弃议长竞选，改推蒋继伊出任议长。不坚持支持李任仁，也算是对CC的一个让步。CC方面也感到自己部分参议员的动摇不稳，白崇禧的愤怒，整个桂系力量联合反攻，自己处于劣势，就乘白崇禧回桂林调解的机会让步退却，也表示不再坚持陈锡珖当选议长，同意蒋继伊出任议长。但副议长一职须由桂南方面的参议员出任，新桂系同意这一要求。9月1

① 陈学澧：《广西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述要》，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93页。

②③ 白崇禧在招待广西省参议员茶会上的致词，载《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9月1日。

日，省参议会重新进行选举，出席者69人，蒋继伊以44票当选为议长，西林县参议员岑永杰以39票当选为副议长，历时84天的议长选举纠纷到此方告平息。

省参议会选举纷争，虽然最终以新桂系的胜利而告终，但新桂系深感CC的威胁，因此后来新桂系进一步加强了反击，大大地削弱了CC在广西的势力，重新牢牢控制了广西政权。

五、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上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① 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加紧准备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的目的是为他的统治披上一件“合法”、“民主”的外衣，稳定军心，以稳固他的独裁统治。“行宪国大”的任务主要是选举总统、副总统。但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却引起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演变为一场蒋桂大角逐。

1947年5、6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发起夏季攻势，转入局部反攻，共歼敌8万多人，收复包括安东、赤峰在内的42座城市，使长春、吉林的国民党军陷入孤立。这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断定东北的战局已不可收拾，华北将受到威胁。而他属下的将领大半是“天子门生”，“既不能令，又不能命”，万一被共产党的军队合围于孤城之内，将何以自处？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千思万虑，他“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① 正当李宗仁为这两种矛盾的心理所困扰之时，国民党准备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于是，他便萌发了竞选副总统的念头，以摆脱有职无权的行辕主任之职。李宗仁电邀在上海的程思远飞往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与程共进晚餐，餐后长谈两个小时，要程为他在明春举行的“行宪国大”竞选副总统作准备，并托程带三封亲笔信回南京，一封给蒋介石，表明他要竞选副总统，要求准予竞选；一封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忠信，请他在蒋介石面前善为疏通，并将蒋的意见及时告知；还有一封是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信封用火漆密封，李宗仁嘱程思远面交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转送。

其实，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得到美国的策动和支持的。

国共冲突期间，美国政府一直是偏袒蒋介石的，美国希望南京政府进行全面改革，以防止自身力量的分散，对美援发挥更好的效用。但蒋介石一意孤行，专制独裁，南京政府日益腐败。在蒋介石挑起内战进入到第二年的时候，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陷入了严重危机。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利益，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实地调查。魏德迈一行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前途暗淡。8月24日，魏德迈离华前夕，在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全文措词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充满着极端蔑视和侮辱之意。魏德迈指责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谓“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② 魏德迈的声明，表明美国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已经失去信心，流露出换马之意。

魏德迈返美之后，司徒雷登不断督促蒋介石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以维

---

① 《李宗仁回忆录》，6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上卷，114页，香港，求实出版社。

护国民党的统治，保证美援的有效运用。但蒋介石的态度和行为，令司徒雷登深感失望。9月8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华北局势的特别报告中强调指出："象征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有目之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① 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表明，司徒雷登已向美国当局举荐李宗仁，美国的注意力已开始从蒋介石转到李宗仁了。美国有意扶持李宗仁，以便迫使蒋介石更加俯首听命，必要时还可以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这也说明，李宗仁决定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杜鲁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

当时新桂系的首要人物白崇禧、黄旭初等并不了解这一内情，故当得知李宗仁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后，都表示反对。白崇禧还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北平，劝阻李宗仁打消竞选副总统的念头，劝他竞选监察院长。但李宗仁已下定决心参加竞选，白崇禧、黄旭初、黄绍竑等只好尽全力助选。

1948年元旦一过，李宗仁便开始了他为竞选副总统而进行的一系列准备活动。他在北平组成了助选团，并于1月8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副总统，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随后，李宗仁又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请求支持，希望借此取得文化界人士的支持。李宗仁还委托北平市长何思源到南京策动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设法支持。并派夫人郭德洁和北平行辕的几位处长、参议分头到南京、上海、太原、东北、四川等地开展活动，争取多方面的支持。

3月12日，李宗仁在北平发表首次竞选演说，明确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并且表明他竞选副总统绝无丝毫个人权利思想存在其间，纯系基于提倡民主风气与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希望借此引起一般贤能之士打破其传统之高傲心理，参与实际政治。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李宗仁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国大代表联谊会、孙中山纪念会和广西大学旅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30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京校友茶话会上多次发表演说，反复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和竞选动机，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从他多次演说所阐述的政治主张来看，其基本点是：在军事上主张“剿共戡乱”，但单凭军事不足以取胜，必须配合以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主张肃清贪污，选贤任能；在经济上主张清算豪门资本，稳定金融，改善民生；在外交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提出了“革新运动”这一能鼓舞人的响亮口号。李宗仁提出这些主张和口号，目的在于争取人心，多拉选票。

李宗仁这一着棋比起其他竞争对手来说要高明一些。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还有5名候选人，他们是国民党的孙科、于右任、程潜，民主社会党的徐傅霖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莫德惠。后两位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竞争力，只不过是为“民主宪政”作陪衬而已，副总统的竞选实际上是在国民党籍的三名候选人中进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总统享有至高的权力，副总统却没有属于他本身的职权，在正常情况下，副总统是一个备而不用，无所事事的闲职。副总统只能以总统的政见为政见，如果发表与总统不一致的意见，是根本无法实行的。因此，孙科、于右任、程潜三位候选人发表的政治主张，只是重复了三民主义的教义，表示当选后积极努力实践而已，没有非常明确的个人政治见解。李宗仁则不同，他在竞选中始终摆出开明、民主的姿态，针对国民党政府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贪污腐败、经济上彻底崩溃、外交上江河日下，国统区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士强烈要求革新政治和经济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政治、经济的“革新运动”这样一个具有诱惑性、刺激性的口号，博得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当时各地都有人电函李宗仁或发表声明，支持李宗仁竞选。华北各省各派及国大代表张伯苓、张作相、梅贻琦、袁致礼、李雪华、冯钦哉、周炳林、傅作义、楚启春、何思源、刘瑶章等199人，发起组织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赞助委员会，呼吁全国各界人士共同支援，助李竞选成功。一时间，李宗仁声势夺人，颇具必胜之势。

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开始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为了显示其“民主”的姿态，他曾向李宗仁表示：“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

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1] 但他并不希望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于是暗中动员和支持并没有打算竞选副总统的孙科参加竞选。他以为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有广东派和CC系的支持，加上有他撑腰，必定可以战胜竞选对手。随着国民大会的日益逼近，各竞选者所造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其中李宗仁又略占优势，如果顺其自然，李宗仁极有可能最后竞选成功，登上副总统宝座。至此，蒋介石认识到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对他的威胁。因为长期以来，蒋桂之间一直明争暗斗，矛盾尖锐，蒋介石对桂系心怀戒备，耿耿于怀，当时新桂系在长江以南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美国中途换马的意图，蒋介石也早有耳闻，在军事节节失利的形势下，新桂系有可能伺机取而代之。因此，蒋介石便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蒋介石的第一个步骤，是决定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企图以此将李宗仁排斥于竞选之外，并打算于3月28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候选人提名问题。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着急，因为新桂系中没有一位是中常委，如果中央常委会开会讨论此事，他们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李宗仁通过黄绍竑，一面串通于右任、程潜反对党内提名，一面找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扬言：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由中央提名，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原定于3月28日召开的中常委临时会议只好延期。4月3日晚上，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官邸召见李宗仁，提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应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科，希望李宗仁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宗仁听了很生气，说：“半年以前，我已向总裁请示，如果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从，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地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欲罢不能了。”[2] 李宗仁坚决反对党内提名，表示决不退出竞选，并且决定，如果坚

---

① 《李宗仁回忆录》，62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持党内提名，他就“在国民党外搞独立竞选”。①

同一天，李宗仁通过黄绍竑的联系，和于右任、程潜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并且得到与CC派有矛盾的复兴系、三青团地方干部的广泛支持，蒋介石被迫放弃党内提名的意见，表示副总统“可由本党同志自由竞选”。② 4月4日，国大代表张伯苓等100余人联署提出李宗仁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

4月16日，国民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为蒋介石、居正。19日，国民大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票当选。同一天，国民大会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这样，新桂系终于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李宗仁正式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蒋介石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的企图失败之后，便采取新的策略，指令陈立夫全力支持孙科竞选，击败李宗仁。陈立夫利用CC系所控制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其他军政机关，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声称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影响，对国大代表进行威胁利诱。同时，指令CC报纸和新闻机构对李宗仁进行造谣和中伤，企图以此影响国大代表对李宗仁的投票意向。

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整个过程波涛汹涌，险象环生。是日开票结果，李宗仁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没有人得到代表总额过半的票数，依照规定，决定次日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重新投票。

23日下午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一是支持孙科的广东代表数十人由薛岳、张发奎带领，捣毁了支持李宗仁并刊登孙科私生活丑闻的《救国日报》；二是蒋介石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蒋介石的意图是用程潜来分散李宗仁的票而使孙科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85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② 《中央日报》，1948年4月5日。

当选。

24日，第二次投票结果，李宗仁1163票、孙科945票、程潜616票，仍无人达到法定数额，大会决定于25日举行第三次复选。

可是竞选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由于两次选举，都是李宗仁占优势，孙科始终排列第二，为了击败李宗仁，蒋介石打算亲自出马为孙科助选。24日下午，蒋介石召见程潜，要程潜放弃竞选并将他的选票改投孙科，并许诺补偿他的全部费用，起用他的助选人员。程潜严词拒绝，当晚程潜发表声明退出竞选，以示对蒋抗议。

李宗仁与程潜在竞选中原订有"攻守同盟"的口头协定，程潜既放弃竞选，李宗仁势难单独进行。而在这个时候，南京大街上出现了大量攻击李宗仁的传单，支持李宗仁的国大代表也纷纷受到特务的威胁，形势对李宗仁非常不利。为了改变不利的局面，24日晚，李宗仁召集桂系重要人物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打乱蒋介石的阵脚，以取得奇效。25日，李宗仁在报上发表声明，揭露这次国大选举副总统存在某种压力，使各代表不能本其自由意志投票，因而决定退出选举。新桂系这一招，使李宗仁赢得更多反蒋派的同情和支持，李宗仁、程潜的支持者也纷纷罢选。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宣布放弃竞选。国民大会被迫休会。

3名候选人放弃竞选，使国民大会陷于瘫痪状态，刚刚当选总统的蒋介石十分尴尬。25日下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派人劝请各候选人取消退出竞选，俟在会外协商取得结果后再召开国民大会。26日，国民大会主席团分访各候选人进行调停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而李宗仁退出竞选的态度尤为坚决。26日晚上，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表示副总统选举绝对以自由竞争为原则，敦劝李宗仁一本初意，继续竞选，并说他将全力予以支持。在白崇禧的敦促下，李宗仁卒允重新参加竞选，于是国民大会得以重开。

28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的第三次投票，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得

1040票，程潜得515票。各人所得票数仍不足法定的多数，依法应由大会在得票较多的李宗仁、孙科两位候选人之间决选，即使一票之差，也可决定胜负。这是孙、李之间的最后决战，也是蒋桂斗争的紧要关头。因此，当天晚上，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发号施令，通宵达旦。尽管如此，蒋介石仍难以挽回孙科的颓势。蒋介石被迫促劝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已使李宗仁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对蒋介石和CC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方面来了，程潜的选票在决选中将有相当一部分转向李宗仁。

29日上午，国民大会进行第四次选举。结果，李宗仁得票1438票，孙科得票1295票，李宗仁最后以微弱的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

李宗仁最后击败对手，当选为副总统，除了有美国的幕后支持及李宗仁善于用"革新"的政治主张作竞选宣传等原因外，新桂系的实力后盾及新桂系的倾力支持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新桂系自20年代在广西崛起，经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20多年的苦心经营，已颇具实力。战后桂系首要人物坐镇北平，掌管国防部，控制安徽和广西，政治影响遍布全国，成为最有实力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派别。当国民党江河日下，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新桂系瞅准机会，利用国民大会竞选总统、副总统的有利时机，开始了问鼎中央政权的勇敢尝试。因此，在事关新桂系命运和前途的副总统竞选中，新桂系为李宗仁助选倾注了全力。

李宗仁的竞选活动由黄绍竑主持。黄绍竑原为新桂系三大首领之一，1930年冬离开桂系，曾任浙江、湖北省主席，国民党内政部长，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国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在国民党的圈子里混得很熟。他通过各种关系，对东北、广东、山西、绥远、浙江、陕西、山东等省的代表进行游说，为李宗仁拉选票，还亲自登门拜会青年党领袖曾琦、李璜、左舜生和民社党的徐傅霖，以及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请他们帮李宗仁的忙。在副总统选举过程中，黄绍竑运筹帷幄，为李宗仁制定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赢得了不少代表的支持，在选举进行到关键的时候，

他甚至半夜到各大饭店去敲代表们的房门，要求他们投李宗仁的票。[①] 为了击败孙科，黄绍竑还为李宗仁制定了同盟策略，出面与国民党的另外两位候选人于右任、程潜订立攻守同盟，相约无论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都要以所拥有的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这一着后来对李宗仁竞选获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新桂系的第二号首领白崇禧当时任国防部长，他在北伐和抗战期间南征北战，在国民党中央为官多年，与各方面交往甚广；他又是中国回教协会会长，与回教徒众多的宁夏、青海、新疆三省的关系密切；他除暗中亲自活动外，还派他的夫人马佩璋以回教徒身份对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的夫人进行内线活动，[③] 为李宗仁拉了相当一部分选票。

新桂系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品仙时任安徽省主席，他调动全省人力财力支持李宗仁竞选，为李宗仁竞选筹集了相当一部分经费，并在舆论上为李宗仁竞选大造声势。3月16日，安徽省参议会、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省商联会、省教育会、省妇女会、省中医公会7个团体发起通电，拥护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新桂系控制的安徽省，成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后盾之一。

主持广西政务的新桂系第三号首领黄旭初，更是积极调动全省各方面力量，倾力支持李宗仁竞选。首先，从财力上予以支持。李宗仁在竞选中大约花费200万银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广西省政府筹措的，[④] 仅动用广西省银行的内账资金，数目就相当可观。当时，从广西银行梧州分行汇去南京的港币就达50万元，用于馈赠国大代表的礼品，如象牙图章、瑞士高级手表等，都是用广西银行的钱支付的。[⑤] 其次，利用新闻工具为李宗仁竞选大造

---

① 《黄绍竑回忆录》，62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18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③ 《黄绍竑回忆录》，617页。

④ 《桂林市文史资料》，第25辑，47页。

⑤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下），152、18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舆论。从3月初开始，广西省教育界、农会、商会、妇女会、各大学校友会、同学会，纷纷发表通电，拥护李宗仁竞选副总统。3月12日，广西省参议会致电各省参议会转各省国大代表，请支持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总统、副总统，同时分别向蒋介石、李宗仁发出致敬电。新桂系控制的《广西日报》，更是不遗余力地为李宗仁竞选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日报》从1948年3月4日至4月24日，共刊登歌颂李宗仁的社论和文章20余篇，刊登省内外各团体的拥护通电30余次。①

1948年3月4日和10日，《广西日报》分别全文转载了对李宗仁备加称赞的香港《星岛日报》文章《李宗仁其人其事》和上海《大美晚报》文章《关于李德邻将军竞选副总统》，大力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进行舆论宣传。

3月18日，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广西日报》发表《拥护李主任竞选副总统》的社论，历数李宗仁的功勋，对其政治主张和人格修养作了高度评价，称他“目光远大，政治见解深刻、正确”，“为人宽厚纯朴，遇事开诚相见”，宣称“目前我们中国正需要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人物，才可以说是理想的副总统人选”。“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我们向全国同胞呼吁，拥戴李主任竞选副总统。”

从3月下旬至4月初，《广西日报》以《从李主任的政治主张看他的竞选》为题，连续发表4篇社论，对李宗仁在竞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作了简要阐述和高度评价，并以“本报资料室”名义，连续发表6篇歌颂李宗仁的系列文章，介绍了李宗仁从统一广西到出任北平行辕主任的历史功勋。

在国民大会即将选举副总统前夕，4月21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慎选副总统》的社论，从勋绩、政见、人格、作风等方面，称赞李宗仁是“最理想、最标准的”副总统候选人。社论直接呼吁国大代表“投李宗仁主任最神圣的一票!”4月21日和22日，《广西日报》连载署名达人的文章《民主将军李宗仁》，文章称李宗仁“是造福中国的一颗灿烂光辉的将星”，

① 根据《广西日报》(桂林版)统计所得。

“是国民革命阵营中功勋最高的大将”，他有“慈祥伟大的胸怀”、“大众化的生活、和蔼的风度”，“是一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与政治家”。文章称颂李宗仁可谓是用尽了最美好的词句。

4月23日，国民大会投票选举副总统的当天，《广西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燕士采写的文章《英雄的塑像——李宗仁上将印象记》，称颂李宗仁“沉毅、严正、忠直、和蔼而慈祥”，“雍容大度、平易近人、德才兼具、勋绩彪炳”，“深受民众爱戴”，把他称作“羊叔子与郭令公的总和”。24日，国民大会第二次选举，《广西日报》又发表社论，直截了当地用《全体国大代表：请重投李宗仁一票》作标题，认为李宗仁“以他对国家对革命的彪炳勋绩而言……以其开明的思想及政治主张而言……再就他个人人格和修养而言，他应是最标准的副总统人选”。社论抓住第一次选举李宗仁得票最多的事实，说明李宗仁“是民望所归”、“最孚人望”、“最为老百姓所拥戴”，要求全体代表“重视民意归属、重视大势趋向”，“重投李宗仁一票”。

4月29日，李宗仁最后当选副总统。30日，《广西日报》以《狂欢的一日》为题，报道广西各界庆祝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热烈场面，刊登广西各方面人士致李宗仁的贺电。此后连续几日，《广西日报》均刊登各地庆祝李宗仁当选的情况和贺电。

由新桂系骨干分子组成的设在南京的李宗仁竞选委员会，为李宗仁竞选进行了大量有声有色的宣传鼓噪。他们把各国驻华使节的赞誉，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的推崇，平、津、沪和香港报纸的好评，以及报刊发表的有利于李宗仁的民意测验的动向印成传单，连同《广西日报》赞颂李宗仁的文章资料，向社会广为散发，并在南京各家大报上刊登李宗仁政治主张的大幅广告。竞选委员会成为李宗仁竞选的宣传队。

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稳固国民党的政权。但前后进行了34天的“行宪国大”，却演变成蒋桂之间一场大角逐。大会耗费了惊人的巨额资金，只选出了一个“总统”和一个“副总统”，进一步激化了蒋、桂矛盾。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因副总统的竞选问

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内对外，都受到很大的影响。”①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胜利，提高了新桂系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同时也给蒋介石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里，因此蒋介石随即采取种种措施对新桂系进行报复。蒋介石首先集中火力攻击新桂系文武大头目之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目的是搞臭新桂系。他指使墨客在报纸上大肆攻击李品仙贪污舞弊、盗掘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并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决议，迫使李品仙称病躲到上海。其次，蒋介石为了防止李、白合谋危害自己，于6月1日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以何应钦充任，将白崇禧调任华中“剿总”司令。后来蒋介石为防止新桂系拥兵自重，又将华中区分设“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以分散白的兵权。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阴谋手段十分愤慨，坚辞不干，并赌气跑到上海。蒋介石利用黄绍竑专程到上海劝说白崇禧，白、黄经过权衡利弊，做了等待时机再作较量的考虑后，6月16日白崇禧飞往汉口就职。李宗仁则在南京就任虚设的副总统，受到蒋介石的百般刁难和冷落，并险遭蒋介石特务暗杀。蒋桂之间矛盾迅速恶化。

新桂系对蒋介石的种种报复措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白崇禧新任华中“剿总”司令后，大力扩充兵力，巩固辖区；在淮海战役期间拒绝蒋介石调华中“剿总”副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部前往徐州增援的命令，加速了蒋介石主力被消灭；同时，暗中策划倒蒋活动，为1948年末1949年初逼蒋下台做准备。

---

① 葛建寅：《中国国民党史》，433页，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

第二十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西农村武装起义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形势的鼓舞下，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桂中南等地区相继发动武装起义。时属中共粤桂边工委领导的钦廉四属和博白、陆川等县的游击队大力策应，积极出击，发展新区。各地武装起义以反“三征”为口号，攻占和摧毁了国民党一批乡村基层政权和据点，消灭了国民党军和保安团队的一部分有生力量，给国民党桂系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各地起义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失败，但这次起义大大激发了各族群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志，他们将起义武装转移分散，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广西农村武装起义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形势，使中共组织和广大群众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为1949年广西游击战争的发展，配合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广西奠定了基础。

一、中共广西横县会议

抗战胜利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逐步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直接联系。

1945年10月，钱兴与庄炎林到达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了“七九事件”以来广西党的活动情况，要求南方局审查广西党组织，恢复正常领导关系。南方局肯定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几年来的工作，恢复了与广西党组织的关系，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双十协定》虽然已经公布，但这只是纸上的东西，国民党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尽一切努力制止内战，尤其要防止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9月，钱兴又通过在广西活动的广东系统党组织介绍，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取得了联系，正式恢复了与上级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受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直接领导。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向钱兴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和隐蔽精干等重要指示。

当时，广西境内的中共组织，除以钱兴为书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外，还有属粤桂边特委常委魏南金领导的桂林、柳州、贺县、平乐党组织；属中共广东南路特委领导的钦廉四属和桂东南（部分）党组织。他们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因此，从日本投降后，中共在广西各个系统的组织都按照争取和、准备打、立足于打的方针，广泛开展革命斗争，并把工作重心放在积极积蓄力量，准备以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基点上。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指出：“现在南方各省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调走，征兵征粮普遍施行，正是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好机会。”南方各省的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凡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方针，积极创造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各种条件。[①] 广西各系统的中共组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广泛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并着手建立秘密武装，选择

---

① 《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1946年11月6日），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25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有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70.8万人，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全面进攻的能力，改向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共中央于3月8日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认为目前蒋管区后方兵力空虚，财政经济日益破产，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要求蒋管区的各地党组织“胆大心细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要“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以免过分刺激敌人，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①

为了切实贯彻上级指示，1947年4月7日至14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圩乡六秀村主持召开了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即横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钱兴，路璠（融县）、覃桂荣（桂西南）、杨烈（桂中南）、黄嘉（桂北）、张祖贵（玉林五属）、吴赞之（桂东）共7人。

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烈士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钱兴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作了“一切为着准备武装起义”的政治报告。

会议初步总结了中共广西省工委六年来的工作，分析了全国和广西的形势，认为“今后时局开展的规律：一切决定于战场，武装斗争已成为主要斗争

① 《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8日），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255～25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中共广西省工委横县会议旧址

方式”，提出了“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摧毁反动政权，建立新解放区”的总方针、总任务；同时对全省的武装起义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在有重要战略意义地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并确定以左右江为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地区。在部队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目标上，会议决定：部队分为脱产的基干队（以连为单位）和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地方自卫军、民兵等三种形式；“目前各地武装斗争，仍以不公开暴露党的面目为原则”，以“抗征会”、“抗粮会”、“救饥会”的名义出现；“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反动地方政权，是为了摧毁支持内战的地方政权，其次是打击农村中最顽强的反动地主……以削弱农村中反革命力量”。① 会议还制定了反“三征”、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加强对城乡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等具体政策。

横县会议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即将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时刻，切实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及时地由地下斗争转到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对于推动广西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西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① 钱兴：《广西×报告》，1947 年 5 月 5 日，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318～322 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二、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

横县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会议决定，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筹划武装起义。1947年夏至冬，在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前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先后在桂东、桂北、左江、右江、桂中、桂中南等地区，发动和领导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

桂东起义

桂东地区英家和古城起义是全省武装起义的先声。中共桂东特派员吴赞之与中共英家特支、中共古城支部领导了这次起义。

1947年5月上旬，吴赞之到钟山英家和富川古城传达了横县会议精神，并根据桂东的形势，决定以古城为重点，英家相配合，发动武装起义。经讨论，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准备工作。5月28日，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古城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被特务分子窃看，并向国民党富川县政府告了密。古城支部采取了应变措施，把党员和武工人员撤到附近山上。根据这一情况，中共英家特支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钟山英家起义举行誓师大会的泉公庙旧址

6月5日，英家起义爆发。吴赞之等指挥起义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攻占乡公所

夺取武器，一路攻入粮仓开仓济贫。王家纪、孙忆冬带领的队伍里应外合，俘虏了乡长，解除了乡公所自卫队的武装。姚大年带领的队伍也顺利打开英家粮仓，组织来的英家、清塘、燕塘乡附近的农民，不到天亮就把3000多担粮食一搬而光。起义队伍共缴获长枪9枝，短枪4枝，子弹260多发，电话机一部和其他物资。天亮后，人们看到街上到处张贴着标语："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征兵、征粮、征税!""打倒伪县长谢中天!""担回我们自己的粮!""共产党万岁!"起义的消息便一下子传开了。

国民党钟山县政府接到英家起义的报告后，于6日下午派40多名县警进驻英家附近白沙井。7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急令八步专署增派保安队和县乡自卫队数百武装到英家抢占制高点，构筑工事，镇压起义。同日，吴赞之派孙忆冬、姚大年去富川领导古城起义，以牵制敌人，配合英家的斗争。为避开国民党的围攻，14日，吴赞之带领40多人枪，转移到花山山区。17日，夜袭公安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9枝。

6月25日，古城起义爆发，以牵制"围剿"英家起义的敌人。起义队伍进攻古城乡公所，因敌有备，未能攻下，遂撤出战斗。26日晚，起义队伍袭击了反动分子毛颂年的炮楼，缴获100多发子弹，还收缴了几户反动地主的5枝枪。事后，起义队伍进入富川、钟山交界地，准备与英家起义队伍会合，但未能如愿。7月1日，八步专署保安队和富川等县自卫队前来"围剿"古城起义队伍。7月5日，毛文彦、姚大年、黄希文等8人被捕并惨遭杀害，起义受到了挫折。

国民党桂系当局企图一网打尽英家、古城起义人员，不断从平乐、昭平、恭城、贺县等地调兵来围攻花山。他们先后逮捕起义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共500多人，成立了富贺钟联防委员会和贺信怀联防委员会，负责桂东的剿共事宜。他们重金悬赏缉拿起义领导成员，出动军警清剿山区游击队和查捕地下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吴赞之等决定分散转移，外地人员从花山出同安转桂北，本地的队员分散回家隐蔽，桂东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

由粤桂湘边区工委领导的桂东地区武装斗争仍在进行。8月15日，怀集

县（1951年划归广东）党组织配合怀集南区进步人士掌握的武装举行怀南起义，当夜攻占怀南（诗洞）区公所，俘虏敌人20多名，缴枪14枝，并开仓分粮。几天后，起义队伍转入怀集、广宁边境山区活动。

桂北起义

在桂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也积极筹划和组织发动农村武装起义。6月中旬，中共桂北特派员肖雷、副特派员曾金全开始与中共桂林市工委负责人阳雄飞等商议在桂北举行武装起义。下旬，在灵川甘棠渡关家村召开桂北地下党干部紧急会议，肖雷在会上传达了中共香港分局和广西省工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介绍了桂东起义情况，建议在桂北举行起义以策应桂东。会议经讨论决定：(1) 以中共党员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游击队员为骨干，组织进步学生和基本群众，于7月25日分别在灵川的灵田、甘棠、南藩，全县的石塘、两河，灌阳的新圩、巨望、陈家背、小江源等地同时起义；(2) 起义后，队伍集中到灌阳南部，再向东和桂东起义部队会合，在湘桂边境建立游击根据地；(3) 建立由肖雷任组长，阳雄飞、曾金全、全昭毅、邓崇济为成员的起义领导小组，领导机构设在灵川；(4) 提出“破仓分粮”、“反内战、反三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政治口号。

7月下旬至9月，中共桂北地下党先后在灵川、全县、灌阳、龙胜四县的9个点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首先在灵川灵田乡爆发。灵田位于桂林市东北面约30公里，这个乡反动武装相对较强，配备有步枪十多枝，一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两枝驳壳枪，一枝冲锋枪，只能智取，不能硬攻。7月23日凌晨，全昭毅带领起义队伍，在内应张诚的接应下，迅速冲进乡公所，俘敌20余人，缴获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驳壳枪共20多枝，战斗在1个小时内结束。当天正好是灵田圩日，起义队伍在街头和小学的操场上演讲，向赶集的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内形势，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三征”，并向群众发放粮食4000余斤。黄昏，灵川、兴安两县保安队赶来夹击起义队伍。因敌强我弱，起义队伍与敌接触后，迅速撤出战斗，渡过漓江，进入灵川西

部的潞江河山区，与阳雄飞领导的甘棠、南藩起义队伍会合，成立了桂北第一支游击队，在灵川县境内艰苦地坚持斗争。

桂北起义规模较大的是全灌起义。7月24日，全县的石塘、灌阳的小江源两处起义取得胜利，夺取了枪支，武装了队伍。原准备同日起义的灌阳县城、新圩、陈家背三个点的队伍，因敌人已有防范，未能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集结开往全县大龙村熊巴坪，与全县起义队伍会合，成立全灌人民自救团，推举杨庆祝为团长，卢蒙坚为政委，邓崇济为副团长。

全灌起义得到全灌各族人民的热烈响应，青壮年纷纷参加起义队伍，到7月底部队发展到近800人。起义部队决定把全灌人民自救团改名为全灌农民解放支队，由邓崇济任支队长，卢蒙坚任政委，杨庆祝任副支队长，下辖巨望、东山、石塘、灌阳四个中队，准备将部队开赴灌阳南部集中，以待会合灵川起义部队。

8月1日，全灌农民解放支队分成两路，沿灌江东西两岸向南进发。东路包括巨望、东山两个中队约400人，由邓崇济率领，曾攻克昭文、巨望、碧营等乡公所，在文市击溃灌阳县保安队；西路包括石塘、灌阳两个中队约300余人，由卢蒙坚、杨庆祝率领，于8月2日第二次攻克石塘乡公所。桂系当局派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恩元坐镇全县指挥，保安副司令秦廷柱率两个大队及全、灌两县保安队共1000余人，在灌阳两岸疯狂“围剿”全灌农民解放支队。到8月中旬，两路部队均被打散，牺牲32人，起义战士被捕杀害的26人，家属及群众被捕的近100人。起义主要骨干先后转移到灵川，加入灵川起义队伍坚持斗争，全灌起义受到严重挫折。

此后不久，由中共党员雷剑领导的龙胜小江村起义也被镇压。

9月初，桂柳区工委组织委员李福海指示灵川游击队要加强学习，总结经验，稳定队伍，发动群众，进行小股活动，逐步开展规模较大的斗争；同时指示成立游击队党支部，书记阳雄飞，委员全昭毅、卢蒙坚。这些指示对于桂北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下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左江起义

横县会议上，省工委决定从桂北地区调派黄嘉去左江地区主持工作，担任中共左江工委书记。这期间，中共香港分局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进行了调整，先后成立中共粤桂边、粤桂湘边工委和桂柳区工委（又称桂林工委），同时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原广西省工委管辖的左右江及桂中南党组织划归粤桂边工委，桂东南党组织划归粤桂边地委，桂林、柳州地区党组织划归桂柳区工委，桂东地区党组织划归粤桂湘边工委，原省工委书记钱兴调任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

7月中旬，黄嘉和中共桂西南区特派员覃桂荣同赴中越边境，将左江和右江党组织关系交给中共粤桂边工委书记周楠，并汇报、请示工作。周楠向他们传达了中共香港分局关于“放手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指示左右江地区迅速举行武装起义，指定黄嘉任边工委左江特派员，覃桂荣任右江特派员。

7月下旬，黄嘉在越南高平召开左江工委会议，传达粤桂边工委的指示，检查各地准备起义的工作情况，研究起义的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起义的条件和时机业已成熟，决定于农历中元节前后，分别在龙州、思明、靖镇三县选择适当地点，举行起义，要求各地务必周密计划，保证起义胜利。会后，左江工委成员分别到龙州、思明、靖镇具体领导起义。

8月19日，左江武装起义在离龙州县城10公里的大青山林场首先打响。是日拂晓，黄嘉、梁游率龙州大队突袭省属大青山林场警察队，活捉了场长和林警队长以下12名官警，缴获驳壳枪2枝，步枪12枝，子弹千余发，还搜缴了场长收藏的银元。而后召开林场职工大会，宣布左江人民解放军的宗旨，警告林场官警，要他们改邪归正，并将缴获的银元分发给职工，释放被俘的官警，然后迅速转移。

8月25日晚，林中等人组织明江县爱店地下武装秘密夺取了爱店自卫队的武器，获轻机枪两挺，步枪7枝和子弹千余发，秘密转移至边境板乐据点。

9月7日，靖（西）镇（边）工委领导当地农会武装伏击镇边县平孟乡警察队，俘虏了两个警兵，缴获两枝步枪。在桂越边境集训的靖镇武装基干队闻讯后也赶来支援，将敌人围困于峡谷。敌乘雨夜天黑突围溜回平孟，起义队伍8日追击到平孟，攻占了平孟乡公所。

左江地区三地起义后，成立了三支游击队伍：龙州县游击大队，120人枪，大队长王平，政委潘大琪；思明游击大队，40余人枪，大队长施芝华，政委黄友生；靖镇游击大队，120人枪，大队长廖华，政委邓心洋。这三支队伍的人员80%是壮族子弟。8月底至10月，他们曾三次击退国民党龙州、靖西两专区保安团和民团常备队的“围剿”，新生的左江游击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10月13日，龙州专区保安副司令阳丽天督率保安团、民团共千余人围攻游击据点布局。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失利，左江游击队被迫掩护据点里2000余群众撤入越南。敌人攻陷布局后，焚烧了河渡、板吉、板诺、新城等11个村屯，枪杀了数名守村群众。这是左江游击队起义后遭受的首次挫折。中共左江工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跳出外线，分散到凭祥、上金、雷平一带发展游击战争。

桂西起义

桂西右江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因而武装起义的规模较其他地区大。

中共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参加横县会议后，即向右江党领导小组组长区镇传达了会议精神。根据会议精神，右江党组织立即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成立东（兰）万（冈）凤（山）起义委员会，主任黄宝山。8月，成立桂西人民解放军东（兰）万（冈）支队，支队长徐学贤，下辖爱国、民主、团结、胜利四个大队和一个直属中队，全支队1200人枪。同时起草了《桂西人民起义宣言》、《桂西人民革命行动纲领》、《革命群众十大纪律》等文件。

右江党组织划归粤桂边工委领导后，粤桂边工委书记周楠向覃桂荣传达

了中共香港分局“放开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要求左右江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边工委派余明炎、庄梅寿、李东明、洪田等一批干部到右江工作，并决定成立中共右江地委，由区镇任书记，余明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耿任宣传部长，赵世同任军事部长，覃桂荣任边工委右江特派员。

8月31日，中共右江地委在万冈县西山弄甲屯召开会议，由覃桂荣传达粤桂边工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右江地委。会议讨论了粤桂边工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认为万冈一带是老区，工作基础比较好，地形也有利，又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可以不经过小搞阶段，直接大搞，决定在10月间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

9月上旬，由于军事行动暴露，地委决定提前起义。半个月内，万冈、凤山、果德、那马、武鸣、隆安等6县约3000名地下武装，在覃桂荣、区镇、余明炎等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桂西起义。9月5日晚，区镇和覃桂荣分头率领部队包围进攻万冈县城。6日攻占万冈县城，成立万冈县临时民主政府。9月15日，凤山县工委代理书记韦芳等率200多起义队伍攻占凤山县城，成立凤山县临时民主政府。9月18日，余明炎等率三个大队武装共1000余人进攻果德县城，未克。为配合果德起义，9月17日，那武特支书记徐彭年等组织那马、武鸣、果德、隆安四县边界的群众武装共约300人进攻设于武鸣四坡的国民党武鸣、那马、果德三县联防办事处，敌依碉堡顽抗，进攻未能奏效。在围攻果德县城的同时，黄泽浓、韦兆勋等率部分队伍攻占感圩、新圩、德旺等乡公所，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粮食。9月23日，黄耿、黄宝山、周健所率起义部队在占领了万冈所略、福邦、百羌三个乡公所后，又占领了凤山相桥乡公所。李玉成所率队伍也攻占了万冈凤桥乡公所和田东县民和乡公所。

桂西起义后，桂系当局十分震惊，调动省保安三个团及桂西各县县警、民团前来“围剿”，大肆烧杀抢掠。由于敌强我弱，各地起义队伍相继失利，万冈、凤山两县城被敌重占。徐学贤、韦芳、庄梅寿等20多名指战员牺牲，覃桂荣被俘。

这次桂西起义，一度占领了万冈、凤山两座县城和20个乡公所，毙伤俘敌近百名，敌军起义40多名，缴获轻机枪2挺，步手枪300多枝，破仓分粮约100万斤。起义的规模是当时广西各地武装起义中最大的一次，给新桂系统治以沉重打击。起义后，新桂系当局惊呼，万冈“政府的公枪，丧失殆尽”，“整个基层组织，业已破坏，以是一切税收任务，均陷于停顿状态，人心亦复极度不安”，为“空前不幸”及“惨痛之一幕”。①

桂西起义虽然在新桂系重兵“围剿”下失败了，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屈服于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义队伍大部分人员返回原籍后仍积极设法和党组织联系，继续开展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仍充满信心，“没有一个人流泪和叹息，大家咬牙切齿咒骂敌人，决心斗争到底”。他们“以各种方法掩护、营救地下党员和起义人员，使他们得以脱险”。② 从起义失利到1948年初，中共右江地委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重建队伍，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桂中起义

桂中的贵县、武宣、桂平一带，在1947年初反“三征”的斗争中，就建立了以廖联原为领导的人民武装自卫队。横县会议后，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成立了武装起义领导小组，廖联原任组长，韦志龙任副组长。他们先后在达开、中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贫雇农会、反“三征”小组和人民武装自卫队骨干会议，统一了认识，决定于9月29日（农历中秋节）在达开乡举行武装起义，定名为“中秋起义”。

起义前夕，贵县民团副司令梁遇率数百人进驻龙山，妄图镇压武装起义。9月29日上午，起义队伍趁敌立足未稳，按计划向位于奇石圩的达开乡公所

---

① 蒋晃：《万冈戡乱纪实》，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下），541～54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② 区镇：《右江游击战争的回顾》，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下），21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发起攻击，拉开了中秋起义的序幕。由于敌人不断增援，起义部队未能占领达开乡公所，但控制着六合、六泥和六红等主要据点，对敌形成半包围态势，战斗十分激烈。入夜，韦志龙率部分队伍绕到敌后，于次日攻占了中里乡公所，俘敌保安队3人，缴获步枪5枝、子弹500发、粮食10万余斤，切断了奇石圩与贵县县城的联系，孤立被包围之敌。

10月1日，武宣县工委书记韦敬礼率领数十人枪赶来参战。10月2日下午，起义队伍500多人在中里中心小学集会，廖联原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开纵队，廖联原任司令员兼政委，韦志龙任副司令员，并宣布了部队序列及领导人名单。强调指出部队的行动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广大乡村，建立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接着，起义部队与敌人进行了一系列战斗。10月2日晚，纵队派出五个支队包围龙山圩之敌。3日凌晨，攻占了龙山乡公所。同日梁遇部100多人由奇石圩窜出，纠集地主武装300余人，突袭中里圩达开纵队前线指挥所，纵队急调三个支队配合中里圩的部队对敌内外夹攻，激战3个多小时，毙伤敌50多人。残敌退回县城，一支队副支队长廖联本被俘壮烈牺牲。4、5日，击溃偷袭起义部队后方通挽乡的武宣县民团副司令覃国光部。6日，消灭侵扰伏柳村之敌，俘敌自卫队长等1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枝。接着攻占了武宣县南河区桐岭、通挽、马步、禄新四个乡。

10月5日，新桂系省保安团三个营，会同玉林区保安副司令彭伯鸿所率民团1000多人，向龙山、中里、达开乡反扑。纵队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游击区中心，派出精干支队寻歼小股敌人，部分部队则在河鄱、河净、车田等村打防御战。河鄱村防御战坚持了40多天，打死打伤敌人80多名，牵制敌人两个营兵力，减轻了其他地区的压力。

10月中旬以后，新桂系当局不断增援，"围剿"起义部队，达开纵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围剿"斗争。在中秋起义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达开纵队所属部队先后进行了达开、中里、龙山、通挽、河鄱、河净、车田、桐岭、

禄新、马步、古卜等多次战斗，共毙伤敌16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余枝，先后攻占了贵县、武宣、桂平、来宾四县所属的10多个乡镇。在贵县中秋起义影响下，原中共贺县特支书记韦天强在武宣东乡领导起义，曾攻占东乡、勒马，进击三里，受挫后余部加入达开纵队。

其后，新桂系纠集了数县的保安团队，反复对起义部队进行“清剿”，廖联原等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桂中南起义

桂中南地区包括横县、永淳、宾阳、上林、迁江以及贵县、武宣、来宾等县的部分地区。横县会议时确定横县为全省开展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之一，并决定成立中共贵县中心县委，由杨烈任书记，统一领导横县、贵县、永淳、武宣、宾阳五县党组织。

5月上旬，杨烈在横县上西区陶圩乡福龙村召开贵县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工委横县会议精神，决定加紧发动群众，扩大农民武装，做好起义准备，秋收前在横县、上林、贵（县）武（宣）边三个点举行起义。

横县县委以郁江两岸的上下西区、上北区及上南区为重点，通过开展反“三征”和求生斗争，发展农民武装队伍。到中元节，已组织农民武装共1000多人枪。9月4日起，杨烈、陈清源领导的农民武装在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团的策应下，在横县举行起义。4至8日，先后攻占上西区的莲塘、龙平、永安，下西区的陶圩、镇西、福龙，上北区的青桐，惩办了上南区独灵、彭岭等地的反动分子。几天之内，横县起义队伍便攻下了12个乡公所，100多个村公所，俘获横县县政府政务指导员苏民困，歼灭县警察1个班、民团一批，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1日，在陶圩宣布成立横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代司令员陈清源，政委杨烈，政治部主任刘一桢，下辖四个大队12个中队，拥有轻重机枪30多挺，人枪800多。

紧接横县起义的是上林起义。上林的革命武装，原是由倾向革命的韦盛经等人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的活动被国民党上林县当局察觉，杨烈及时指

派张声震代表贵县中心县委到上林古蓬进行领导。8月，张声震建立了中共上林党支部，掌握了古蓬、思吉近2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8月26日，上林县县长梅仲威带领反动武装封锁古蓬、思吉周围要隘，妄图迫使革命武装投降。上林党支部决定举行“打梅起义”。9月16日，在俭表至周安公路上伏击梅仲威反动武装，毙敌5名，俘敌15名，缴获步、手枪8枝。17日，起义队伍整编为上林自卫军八二支队，支队长韦盛经，政委张声震，共160多人枪。同时成立“古思人民办事处”，韦盛经兼主任。

贵（县）武（宣）边的地下武装在韦敬礼领导下也行动起来。10月1日，他们由武宣通挽到贵县中里参加了廖联原领导的桂中起义。国民党武宣保安大队乘机进犯通挽，并派一个班进驻伏柳村韦敬礼家。10月3日，韦敬礼率部全歼驻伏柳之敌，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枝、手枪1枝、弹药一批。4日，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一纵队，韦敬礼任司令员兼政委。其后，起义队伍乘胜攻入武宣县的桐岭、马步、禄新，进而攻入贵县的山东、山北、龙山等乡公所，使贵武边游击区联成一片。

横县、上林、贵武边的桂中南起义，共攻占国民党的两个区公所、19个乡公所，毙敌40余名，俘敌10多名，缴获枪支100多枝。国民党桂系当局大为震惊，以“应变无方，防剿不力”为由将武宣县县长宋厚礽、横县县长廖哲撤职，指派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第四区（南宁）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新俊、省保安第六总队长钟福标分别率部到武宣、贵县、横县、上林“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上林起义坚持了一个多月，贵武边起义坚持了63天，便先后被镇压。横县起义队伍在第十八团的策应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部队基本力量得到保存。10月，按照粤桂边工委的指示，横县北部的人民武装整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团，团长杨烈，政委陈清源，政治处主任刘一桢。横南的武装编为一个独立营，划归第十八团领导。

国民党桂系当局不断增兵到各起义地区进行“围剿”，第十九团与敌苦战两个多月，活动的区域日益缩小，给养困难，为避开敌人的打击和减轻群众的负担，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第十九团将主力撤退到广东高雷地区休整，

留下少量武装组成突击队在横县坚持斗争。同时建立中共宾阳特支，由张声震任书记、林夏任副书记，联系指导上林、宾阳、永淳、武宣、贵县（部分）等地的党员干部开展斗争。上林、贵县、武宣边界的起义部队也转入山区分散活动。

钦廉地区起义

钦廉地区当时归广东省管辖，在原广西省工委系统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期间，钦廉地区的游击武装也积极举行起义策应。

1947年5月14日，中共钦防特派员谢王岗等领导防城县三波、光坡、企沙的地下武装和革命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成立防城农民翻身独立大队。起义部队摧毁了3个乡镇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收缴了反动地主的武器，袭击了防城县据点狗岭，歼敌1个排，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10余枝。到6月上旬，钦防部队发展到1400多人，扩编为钦防农民翻身总队。6月中旬，接连攻克东兴、龙门、华石、江平、黄竹等据点。9月，防城、钦县游击队分别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第二十一团。10月24日，第二十一团和中共上思组织举行了上思起义，攻占了百成乡公所，俘乡警10多名，缴步枪10多枝。随后接连出击，一个月内摧毁上思县的9个乡公所，沿途开仓济贫，扩大队伍，开辟了十万大山北麓根据地。

在合浦、灵山，武装起义也在发展。1947年5月下旬，合浦游击队整编为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6月至9月，该团转战于合浦的西、中、南部及廉江东部地区，拔除了一批反动据点，在合浦双埇口成立了六万山区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合灵南区军政府，其辖区包括合浦北部、灵山南部、钦县东部的14个乡。军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减租减息”、“征粮征税”、“惩治反革命”等条例和规定，开展了建立农会、民兵、税站，筹粮筹款，镇压反动地主、恶霸，维持社会治安等工作，积极加强合灵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与此同时，灵山游击队于7月间整编为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团。8月下旬，该团进军横县南部地区，策应桂中南武装起义。他们与横南独立营配合，

与敌作战近4个月，扩展了横南游击区。

三、农村武装起义的影响

一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及钦廉地区党组织领导发动的农村武装起义，在反动统治力量相对强大的广西，持续了半年之久（从1947年6月至12月），遍布了广西24个县，这对于广西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桂系当局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上，起义部队摧毁、瓦解了国民党的一批基层政权。各地武装共攻占县城两座，区公所3个，乡公所80多个以及一批反动据点，歼灭了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缴获了各种枪械近600枝，弹药一批，破仓分粮约200余万斤，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气焰，动摇了桂系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在军事上，搞乱了敌人的后方。新桂系头目白崇禧为此“忧心如焚，寝食不安”。[①] 为保住后院，新桂系被迫将其已整补完毕，即将重返内战前线的正规军第一七四旅留驻广西，参加“剿匪”。这就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和呼应了相邻各省的游击战争。在经济上，使广西反动当局经济日益“艰窘”。起义一般都是在反征粮、征税、征兵的基础上发动的。起义后，不少地方的征粮、征税工作陷入停顿、半停顿状态，使桂系的兵源、粮源、财源日益枯竭。据1947年12月《广西省参议会二次会议中财政厅施政报告》透露，1947年广西“自身收入仅占岁出百分之十六左右”。桂系难以完成其内战前线的军需补给计划，处于捉襟见肘之境地。

广西革命力量在起义中得到了增强。

中共党的组织得到了健全和发展。1942年“七九事件”后，桂系当局曾

① 白崇禧：《给广西父老的一封信》，载《广西日报》，1947年10月10日。

狂妄扬言“中共广西地下党在15年内难以恢复元气”。广西农村武装起义后，他们不得不惊呼“共匪暴动”已成为“当前的心腹之患”。当时，中共在广西全省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分属于中共粤桂边工委、粤桂边地委、桂柳区工委和粤桂湘边工委领导，但党的组织仍在不断发展。起义前后，除桂东地区外，其他各地区都建立了县级党组织。如截至1947年11月，隶属滇桂黔工委（由粤桂边工委改名）的中共右江地委就辖有5个县委和8个县工委；中共左江地工委辖有3个县委、4个县工委、7个县特支及3个主力团党委。各县基本上都设立了县级党组织。

革命武装和各地游击区在起义中得以建立。起义以前，广西党组织没有直接掌握脱离生产的武装队伍。起义以后，全省建立了约6000人的脱离生产的革命武装，并形成了桂东、桂北、左江、桂西、桂中南、桂中、六万大山、十万大山、都宜忻、柳北等10多块游击区。经过1948年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各游击区基本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到1948年底，全省游击武装已发展到约1万人，游击区域扩大到50多个县。

群众基础逐步扩大。起义中铲除了一批欺压人民的“地头蛇”，并大搞破仓分粮，使当地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利益，大大激发了各族群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志。他们通过参加农会、抗征会、妇女会、民兵、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坚持反“三征”斗争，保卫自己的利益。在敌人“围剿”游击队时，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粮食、送情报、医治伤员，千方百计掩护、营救游击队指战员，使他们脱险。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广西武装斗争能够坚持发展的重要原因。

起义还考验和锻炼了革命队伍，为后来广西游击战争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在起义过程中，起义队伍经受了进攻与防御、前进与退却、胜利与失败的种种考验。有少数人在困难挫折面前思想动摇，甚至脱离队伍，但绝大多数指战员立场坚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继续坚持斗争。特别是各级党组织和部队的指挥员，在起义中都程度不同的学到了一些军事技术和指挥才能，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以后各游击区游击战争发展的骨干力量。

广西的农村武装起义紧密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形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离不开各地人民游击武装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指出，游击战争在配合正规战争中，“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①] 它“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②]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以及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在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如果没有最广大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毛泽东这些论述仍然适用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人民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推动蒋管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日益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影响蒋军士气更加下降，增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的可能性”。[③] 广西1947年农村武装起义直接威胁着桂系后方的安全，广西各地游击队的存在，使桂系不能“无后顾之忧”，它直接、间接地牵制、削弱了国民党在华中、华南内战前线用以防御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力量，也为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准备了条件。

这次广西农村武装起义也有可记取的教训。全省20多处武装起义，绝大部分都是先胜后败，受到了严重挫折。这除了敌强我弱的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地区的党组织由于没能正确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存在着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的复杂性、艰苦性以及人民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规律认识不足，过早地打出纵队、支队、县民主政府等旗帜，不切实际地攻打国民党县区政府等大目标，以致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招致敌人的大规模打击。有的地区在事前没有作成功与失利、进攻与退却的两手打算，当敌人进行反扑时，措手不及，没有及时采取分散的方针，片面强调保护群众利益，组织“山头、村落保卫战”，更加重了损失。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时，起义队伍大部分是未经战斗锻炼的农民武装，纪律性和战斗力都不强，且有一部分队伍是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没有经过教育和改造，在形势不利时，有的便脱离革命，甚至掉转枪口危害革命。加上有的地区领导成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在起义过程中，侦察、警戒、通讯联络工作做得较差，以致敌情不明，指挥失当，使起义陷入被动。所有这些，都为广西以后的武装斗争少走弯路和更加顺利地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二十一章　广西城市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逐步恢复了在城市的组织和活动。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按照长期打算，巩固阵地，保存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发展党的组织，争取群众，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和发展组织，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各市中共组织同民主党派一道，互相配合，互相支持，领导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斗争，掀起广西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新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内战，在城市加强白色恐怖，迫害和逮捕进步分子，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各市中共组织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将爱国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为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做准备。

一、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城市工作的恢复

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和1943年南宁“一·一五”事件后，中共在广

西桂、柳、邕、梧四市[1]工作的大部分党员转移到农村活动，只有少数人留在城市坚持工作。1944年秋冬，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桂、柳、邕、梧相继沦陷，中共党员全部撤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及抗日救亡工作，党在城市工作基本上暂时停顿。

抗战一结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就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采取积极的措施，恢复党在城市的工作。

1945年9月上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和政治交通员庄炎林由昭平县黄姚启程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请示工作，途中先后到了桂东南、桂东北、桂中、桂林、柳州、柳北等地，听取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钱兴根据抗战胜利后广西的局势，指示他们在继续搞好农村工作的同时，派遣一部分党员返回城市，恢复党的组织，领导城市各阶层人民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1月至翌年初，钱兴先后到桂林、柳州、融县，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争取和平民主、准备应付内战的指示，并恢复和重建了各地的党组织。为推动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11月，钱兴在桂林重建了中共桂林市工委，任命庄炎林为书记，阳雄飞为组织委员，吴腾芳为宣传委员。市工委负责领导桂林市、桂林师范学校及灵川县的党组织。在此前后，曾在柳州、南宁工作过的一部分党员也返回城市活动。

当时，除广西省工委外，在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属广东系统的粤桂边特委和南路特委领导的一些组织，也在城市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8月下旬，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粤桂边特委书记黄松坚就根据广东区委关于准备开展粤桂边区武装斗争的指示，派特委常委魏南金到广西，任务是与1942年南委事件后从广东撤退到桂林、柳州及桂东地区的党员进行联系，恢复他们的党组织关系，发展党员，并设法找到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魏南金1944年春至1945年夏曾转移到广西活动，对广西的情况较为熟

---

[1] 柳州、南宁、梧州解放前实际上已称市，但其行政机构仍属县。

悉。到广西后，他迅速接收了黄松坚交给的党员关系，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1945年10月建立了由广东党组织领导的中共桂林市支部，书记覃展，副书记吴师光。1946年4月建立中共柳州市特支，书记陈光，组织委员侯信，宣传委员梁华新。此外，还建立了八步特支和平乐支部。到1946年8月，魏南金撤回广东时，这一系统在桂林、柳州两市的党员已发展到45名，在18个单位（主要是学校）建立了工作据点。

在梧州，1946年4月，原中共苍梧县委书记从广东回到梧州，在大中路开办八桂书店，销售进步书刊。不久，中共广东南路特委原派回广西工作的徐为楷等人，先后到达梧州，他们以八桂书店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

城市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在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抗战一结束，毛泽东就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呼吁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①] 同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因此，“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城市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

首先，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向各界群众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柳州的中共党员罗培元、张琛，在桂林的中共党员周匡人、张锡昌都与民盟、民促等民主党派紧密合作，办报宣传和平民主的主张，魏南金与他们保持单线联系，以加强对统战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同时，建立了一批印刷、发行机构。继梧州八桂书店之后，中共桂林支部派人开办秀峰书店，中共柳州地下党派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人开办新星书店和联华印刷厂，大批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和杂志。有的还翻印发行毛泽东的《论新阶段》、《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著作。

其次，团结教育进步学生，开展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凡有中共党员活动的大、中、小学，普遍建立了学生自治会、校友会、读书会、时事研究会等。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促进了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民主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广西桂、柳、邕、梧四市的10多所大中学校分别举行座谈会，出版墙报，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罪行，声援昆明进步师生的斗争。广西大学还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发出声援电，并发动师生捐款支援。1946年1月底，为反对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强令广西大学从柳州迁回桂林，广西大学师生发起“返梧运动”，千余名学生罢课，2月27日进入柳州示威游行，并在国民党柳州专署门前静坐。2月底至3月初，该校师生千余人陆续迁往梧州。原西大校址梧州高中校园，到处张贴“西大迁梧”、“争和平民主反内战独裁”的标语。梧州各中等学校也由此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西大“返梧运动”历时半年，在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答应修复桂林原校舍，改善师生生活条件，不处分学生，将原校长解职等条件后，西大师生才回桂林复学。同年6月，柳庆师范学校爆发了反对学校当局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斗争，得到柳州其他中学的声援，经过半个月，学校当局被迫收回成命。

1946年3月29日，国民党平乐县党部、县政府、三青团企图借纪念“三·二九青年节”之机进行反共宣传，为发动内战造舆论，压制民主运动。中共平乐支部在魏南金领导下，发动平乐中学师生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学生代表在纪念会上作了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发言，会后500多名师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又出版油印快报和壁报公布游行真相，揭露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这一斗争震动很大，国民党广西省当局开始监视魏南金。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也注意到这一斗争，钱兴认为平乐有中共其他系统的组织活动。6月上旬，他通过周匡人的介绍，到平乐与魏南金会面，经魏南金介绍，钱兴又与黄松坚取得了联系，从而沟通了在广西活动的中共两个

不同系统组织的联系，有利于党在广西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这也是以后两系统在广西组织合并的开端。

再次，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1945年夏秋，广西三分之二的县份遭受水旱虫风等灾害，全年稻谷产量比1937年下降一半，大小麦产量仅为1937年的33.2%。① 到1946年春青黄不接之时，全省饥民达400万。桂林市粮价比1945年7月上涨10倍，饥民占40%。② 而桂系当局为准备内战，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搜刮粮食，群众怨声载道。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反饥饿、求生存的斗争。4月4日至15日，中共全县县城党支部以全县中等学校联合校友会的名义，组织饥民开展阻米外运斗争，拦夺外运的粮食数万斤。5月7日，柳江县300多饥民集体向国民党柳江县政府请愿，由中共党员罗培元负责的《广西日报》柳州版为他们发表呼吁书，强烈要求桂系当局大量裁军，取消苛捐杂税，严惩囤积居奇的粮商、富户，发放粮款，赈济饥民。6月13日，全灌地下党组织发动数百群众和学生在灌阳县城南门码头阻止奸商偷运大米出境，夺下粮食数万斤。这些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③ 要求在农村中，要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并区别对待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进一步巩固各解放区，使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

---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286、292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②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子。因此，紧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推动反美反蒋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开展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了党在城市工作的重点。

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前方把枪口对着共产党，而且在后方亦加紧摧残革命势力。桂系当局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迫害革命势力的措施。6月7日，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召开保安会议，制定《各区散匪堵剿办法》、《水陆交通保护方案》。同时，颁布《地方治安武力整理法》。8月19日，省保安司令部又发出“防止奸党地下活动以遏乱萌”电令，严令所有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密查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并迅速处置；加强对所属人员特别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控制和监视。

在桂系当局的迫害下，一些中共党员被迫撤离广西。魏南金因受到桂系当局监视而于8月撤回广东。广西党的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中共广东区委农工委书记黄松坚命陈枫、李福海为中共桂柳区正副特派员，接替魏南金的工作。陈、李先后于9月9日、10月5日到达桂林。他们根据当时广西形势及党的指示，确定“了解情况，巩固阵地，保存与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他们着重抓了几个工作：(1) 迅速接收魏南金在桂柳和桂东地区建立的党组织，进行党员审查和组织调整。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陈枫、李福海决定各地党组织实行特派员制，对部分领导成员作了调整，调平乐党支部书记黄绍亮到桂林，协助李福海在桂林市开展学运，覃展专门负责陈劭先等民主人士的联系工作；吴师光调任柳州市特派员；陈光、侯信、梁华新调到桂东、柳北地区工作。(2) 加强政治指导。根据《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世界知识》、《时代》、《群众》等党报或进步报刊，分析国际国内时局的发展，确定广西的工作方针，并迅速传达给下级。这种政治领导的加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 严格组织生活。确定定期的组织生活，按期联系、布置和检查工作，并制定秘密工作条例，严格区分公开与秘密、红与灰的关系，开展工作比过去更为慎重、严密，以保证力量的积蓄和应付长期斗争的局面。(4) 认真进行社会调查，比较系统地了解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以便正确决定自己的政策。(5) 积极

做好统战工作。在大中学校，注意团结教职工及广大的学生群众；争取地方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重点做好民盟和国民党民主派陈劭先的工作，通过他去联合地方力量和了解新桂系内部情况。准备在站稳脚跟后，再根据形势开展公开的群众斗争。

1946年9月上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赴香港向中共中央派回华南工作的方方汇报工作。方方向钱兴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和隐蔽精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10月，钱兴返回广西，向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上级指示，明确提出积极准备开辟夹击蒋军的第二战场，决定从城市抽调一部分党员到农村工作，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同时指出，广西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应从长期打算，重新配置灰色的得力干部，用各种方式和方法掩护下来，藉以开展城市工作，建立城市党和群众工作基础。还要加强城市民主运动，密切联系各民主党派和开明民主人士，以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

为了更好地发展党在广西城市的工作，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动摇和削弱国民党的后方统治，1947年5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撤销广西省工委，钱兴将广西桂林、柳州、柳北的原广西省工委系统的党组织转交给陈枫；将在桂柳区活动的广东、广西两系统的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桂柳区工委，隶属中共香港分局领导。7月，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桂林正式成立，书记陈枫，组织委员李福海，宣传委员路璠。桂柳区工委负责领导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的城市工作以及桂北、柳北等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在工作分工上，陈枫负责全面兼管柳、邕两市，李福海负责桂林市



中共桂柳区工委旧址——桂林永昌染房（原桂林市东江自由路158号）

及桂北，路璠负责柳北和都宜忻、象县。工委领导机关设在柳州。

桂柳区工委成立后，根据广西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方针。总任务是："发动武装斗争、群众斗争，巩固与发展党与群众组织。"总方针是："长期打算，巩固组织，大胆放手动员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① 在城市工作方面，强调要提高对城市工作的认识，充分估计城市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要与害怕城市工作及不愿意长期坚持城市工作的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制定了"长期打算，保存力量，改变作风，深入下层，组织群众，点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决定城市工作具体任务主要是重新配备干部，打入各种机构，为城市长期工作打下基础；发动城市各种经济的、爱国民主的斗争，积极配合农村武装斗争；为农村输送干部和交换情报等等，并指出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过于暴露自己等。

中共桂柳区工委的建立，是抗战结束后中共党组织在广西城市工作恢复和发展的结果，表明党在城市工作力量的不断加强。从此，广西城市工作得到了较前更迅速的发展，在桂系的后院，爱国民主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较好地起到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二、民主党派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普遍期待能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人心。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使得国统区内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

① 《七月决议提要》，1947年7月28日，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6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涨，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各阶层人民包括中间阶层逐渐从事实中看到：国民党不要和平不要民主，只能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几代中国人所要求的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中国的愿望。因此，广大人民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在逐步认清国民党真实面目基础上展开的斗争，一开始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和互相配合的。

抗战胜利后，疏散到各地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返回城市，建立组织，开展活动。1945年10月中旬，在李济深的推动下，陈劭先、陈此生、李任仁等在桂林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主张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翌年4月，民促在广州成立，广西的一批民主人士参加了该组织，陈此生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1945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广西支部在桂林成立。徐寅初任主任委员，张锡昌（中共党员）任秘书长，周匡人（中共党员）负责组织工作，张毕来、靳为霖负责宣传工作，欧阳予倩、林砺儒负责文教工作，李镇为支部委员。1946年4月以后，又增补曹伯韩、杨荣国、吴克清等为支委。他们积极发展组织，把那些在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文化界进步人士、高等院校的进步师生吸收入盟，并吸收一些中共党员担任盟内领导职务，成为盟组织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到1946年底，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院、桂林师范学校等院校和南宁、柳州等地建立了民盟组织。

民盟、民促等民主党派在广西的组织建立后，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密切配合，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的大中学校和文化团体中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大力宣传和平民主，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1945年10月，《广西日报》昭平版迁至桂林，改为桂林版，由民主人士石兆棠任社长，民盟盟员莫乃群任总编辑。《柳州日报》改为《广西日报》柳州版，罗培元（中共党员）任分社社长，张琛（中共党员）、吴克清（民盟盟员）先后任总编辑。改版的《广西日报》桂林、柳州版都坚持进步立场，

以国共《双十协定》为依据，宣传和平民主，支持各地的爱国学生运动和人民群众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1946年1月，在中共党员张锡昌、周匡人等支持帮助下，民盟广西支部创办了机关报《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发行人先后为周匡人、徐寅初。该报旗帜鲜明地宣传民盟和中共的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在广西各界进步人士中有很大影响。此外，由民盟盟员参加和主编的进步报刊还有：桂林师院学治会出版的《学生生活》、广西大学学治会出版的《学生新闻》以及《桂林工商报》、文艺杂志《收获》、《只有战斗》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还联合各界民主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反对美蒋反动行径的活动。



中国民主同盟广西支部出版的《民主星期刊》桂林版

1946年2月24日，在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的推动下，成立了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欧阳予倩、陈劭先、林砺儒、石兆棠、张锡昌、徐寅初等11人为理事。该会以演进步戏剧，举行时事座谈会、纪念会等方式，宣传和平民主，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言行和美帝国主义扶蒋打内战的政策。4月28日，针对美国用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东北和给予国民党贷款、供给武器的行径，桂林文化界联谊会公开致书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帮助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兵和停止向国民党军供给武器；在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组成之前不要对华贷款。否则，这将是“我们人民所不能饶恕的罪过”，是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助长独裁政治之跋扈而加深人民的痛苦”。①

① 《桂林文化界致书马歇尔吁请停止帮助运兵东北》，载《新华日报》，1946年5月31日。

1946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蔑视政协协议，并接连制造重庆“较场口事件”和南京“下关惨案”。民盟广西支部配合全国行动，开展了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民主星期刊》登载了中共、民盟及各方面进步人士的评论、抗议。盟省支部还以桂林文化界联谊会的名义举行有200人参加的时事座谈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阴谋。

同年5月4日，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文艺界协会桂林分会、美术工作者协会、妇女界联谊会、桂林师院学治会联合举行有500多人参加的“五四”纪念会，由林砺儒主持会议。会议号召各界人民发扬“五四”革命传统，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欧阳予倩、靳为霖在会上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救济物资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纪念“五四”晚会上，师院学治会演出了由欧阳予倩导演的反内战的进步话剧《凯旋》，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五四”纪念活动遭到国民党《中央日报》桂林版和桂系特务的诬蔑和攻击，桂林师院《民主生活》被强令停刊，林砺儒、欧阳予倩、靳为霖、吴克清等先后被迫离桂。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的镇压。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民盟广西支部在中共广西地下组织支持下，发动桂林师院、广西大学师生举行多种形式的集会、座谈、悼念活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闻的罪行。柳州、南宁、梧州、陆川、平南、昭平、罗城、忻城等地中学的师生纷纷举行集会，出版壁报，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抗议。《民主星期刊》发表了《正告国民政府》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决不能阻拦民主的怒潮，只有加速法西斯本身的毁灭!”

在广西，桂系当局也逐步加紧对民盟等民主人士的迫害。1946年春夏间，先后撤销石兆棠的广西日报社社长、罗培元的广西日报柳州分社社长职务，并以武装军警强行将广西日报桂林版的30多名职工驱逐出报社。9月，国民党桂林市警察局会同省保安司令部、省党部搜查桂林市各书店，没收了《民主》、《唯民》、《正报》、《文萃》、《自由世界》等10多种进步报刊。1947年1

月，国民党内政部迫令《民主星期刊》(桂林版) 停刊。这表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共产党，而且对着一切要求和平民主的善良人士。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它在中国人民中日益孤立，在中共的领导下，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

三、“六二”、“六四”大游行

以1946年12月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广西的青年学生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与全国的学生运动相呼应，进行了一次次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六二”、“六四”大游行是这些斗争的高潮。

国民党政府为了换取美国对内战的支持，一方面大量出卖中国权益；另一方面对驻华美军采取纵容的态度，使得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人民被害死伤者在3300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因此，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就成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由北平开始的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发动桂、柳、邕、梧四地的爱国学生于12月下旬至翌年1月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热潮。1947年1月，广西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告全省同学书、告全

国同胞书、致驻华美军最高司令严重抗议书、致世界学联书等五种文告，开展了“美军滚出中国宣传周”活动。在致驻华美军最高司令严重抗议书中严正指出：美军兽行“绝不仅是被奸污者个人身体受到伤害，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尊严受到了污辱！”要求严惩肇事凶手，美军最高司令必须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必须赔偿被害者身体、名誉及所引起的一切损失，立即撤出美国驻华军队。[①] 柳州学联印制了反美传单，向省内外广为散发。与此同时，桂、柳、邕、梧及昭平、陆川、北流、博白、罗城、忻城等地的大、中学生，亦纷纷举行集会，出版壁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强烈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的侵华政策，反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各界知名人士也对美军在中国的暴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这场斗争表明中华民族不可侮，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它帮助人们认识了美国干涉中国的活动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美反蒋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随着全面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对广大人民的掠夺更为普遍。通货膨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广大工人、市民乃至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农村经济急剧衰退，广大农村中饥民遍地，饿殍载道。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因此，1947年5月，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抗议美军暴行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5月中旬，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生先后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出动军警镇压学生游行队伍，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向全国学生发出号召，在6月2日举行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罢课示威游行，

①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13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以抗议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

中共广西桂柳区工委决定在桂、柳、邕三地发动这场斗争，以桂林为重点，并分别作了具体布置，要求在学生中充分进行思想发动，建立领导罢课的组织机构，加强各校之间的联络，制定行动方案，准备好传单、标语、口号；强调在发动广大学生开展运动时，要注意斗争策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从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生活与教学条件人手，争取广大学生投人斗争，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党组织实行三线配备，防止暴露。

5月23日，广西大学成立了罢课委员会，随即派人到各校串联。5月26日，广西大学罢课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广西大学全体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和《为抗议“五二〇”血案告全国同胞书》，并开始罢课。5月29日，广西省立医学院宣布罢课三天。各校都在酝酿组织游行。

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为了镇压这次学生运动，于6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省保安副司令、桂林市长、省府机要秘书（特务头子）等。会上决定了对付6月2日学生游行的办法，要求教育厅督促各校校长劝阻和分化学生，警察、保安部队武装待命等等，并以密码电告柳州、南宁、梧州等专署。桂林反动当局极力破坏示威游行的举行，一方面通过特务学生、三青团员散布恐怖气氛，扬言广西当局要严厉镇压游行队伍，威胁中间层的同学不要参加游行；另一方面则通过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学生提出过“左”的做法、口号，以吓住中间层的同学。面对敌人的干扰破坏，桂柳区工委顶住了逆流，李福海给西大党员分析了形势，认为广西当局可能不敢公开镇压。因为：一、整个蒋管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声势浩大，广西不是孤立的；二、桂系正在和蒋介石争权，不愿意广西的事态扩大，以免后方不稳；三、火先是从蒋介石皇城脚下烧起来的，即使广西着了火，蒋介石也不能找广西的麻烦。但是桂系是阴险毒辣的，我们的工作必须从最坏处着想，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李福海还对游行队伍的组织、纠察队的部署、应变的方法等，都作了具体交代。



广西大学学生“六二”游行

6月2日，桂林、柳州、南宁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成为全国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桂林，广西大学、广西艺专千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在游行中，学生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USA滚回去》等革命歌曲，高呼“坚决反对内战！”“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读书！”等口号，沿途还进行街头活报剧的演出和演讲活动。“队伍吸引了从各方面汇合来的人流，震撼了每个老百姓的心弦。”①桂柳工委负责人李福海自始至终在围观人群中观察动态，直到游行胜利结束才悄然离去。广西反动当局虽然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监视，但不敢公开阻挠破坏。在柳州，柳州中学在国民党柳州当局严密防范的情况下，700多名学生在球场集会宣布罢课，并分头出动，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南宁，南宁师范学院的学生发出了通电，举行罢课和派宣传队上街宣传。此外，陆川、博白、平南、昭平、贺县、钟山、武鸣、隆山等地的许多学校的进步学生，也起而响应。

在“六二”游行的影响下，6月4日，桂林中学、逸仙中学、桂林女师和桂林护士学校等校的近千名学生又举行了“六四”罢课和游行。他们以“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横额为先导，沿途散发宣言，高呼“反内战”、“反饥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武装镇压学生”等口号，最后转到公共体育场集会，各校代表发言，一致肯定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并揭露和抗议国

① 《冲开了沉寂——“六二”在桂林》，载《正报》第44期，1947年6月28日。

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六二"、"六四"游行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城市发动的一次以学生为主的公开的群众斗争，是广西民主爱国运动高涨的表现。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农村领导的武装斗争互相呼应，破坏了桂系后方的统治秩序，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动摇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政治基础。

四、"七月事件"

1947年7月，蒋介石政府挑动全面内战已有一年，在这一年里，"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它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①] 当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

7月4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一方面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另一方面，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其后，又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新桂系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积极行动。在农村，调集大批军队"围剿"各地起义武装；在城市，加强特务统治，禁止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罢课。从7月初起，接连在桂林、南宁、贺县、钟山等20多个县、市对爱国师生、进步人士实行大逮捕，制造了"七月事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事件从桂林开始。7月6日至8日这三天，新桂系调动大批军警、特务，逮捕了方亢、丘林、云健鹏、黄荣芳、文彬、江晶俊、李竞生、吴钦、方允中、廖茂金、陈铭钰、潘广燧等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爱国师生，还逮捕了职工10多人。接着省内各地也进行了搜捕。在南宁，逮捕了南宁师院教授、民盟广西支部委员杨荣国、张毕来等人；八步临江中学捕去校长、教员及学生8人，中心小学、灵峰中学被捕教师10余名；钟山中学及报社被捕教员及职员5人；桂西的靖西中学也有2名教员被捕。到7月底，全省共捕去爱国师生、职工100多人，其中中共党员3人，民盟盟员10多人。同时，解雇了一批教师、职工，开除了一批学生。其后，又发出通令，责令所有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登记自新。

面对新桂系的凶焰，桂、柳、邕、梧四市的中共党员坚定沉着，没有一个人登记自新。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与民盟紧密合作，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中共桂柳区工委指示桂柳各地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通过民主人士陈劭先等出面向桂系上层人物疏通，积极营救被捕人员，并将一批已暴露的党员和进步学生撤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8月24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对7月间10余名盟员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被捕之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将广西被捕的盟员立即释放。而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10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民盟广西支部的盟员转入地下，与中共一起继续坚持斗争。

为保存组织，长期坚持城市工作，中共桂柳区工委在组织上作了一些部署和规定。10月，中共桂柳区工委领导机关迁往柳州，决定成立桂林市临时工委，书记陈光，副书记黄绍亮。10月中旬，陈枫在桂林主持召开桂柳区各地党组织负责干部会议，鉴于城市白色恐怖严重，提出暂时“原则上不发动政治斗争，在斗争中注意作风及政策的掌握，与群众同进退，防止暴露，以积蓄力量，迎接新高潮到来”，并决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12月18日，桂柳区工委又发出《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通知》，要求每个党员“在今后的会议、工作、接头、通讯、处理文件、生活习惯、日常学习、居

住、言论等，都必须注意隐蔽，注意作风，不得暴露党的面目”。“如已被捕，除力图脱逃外，应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英勇就义，绝不出卖组织和群众利益”。同时，要加强内线工作与反特斗争，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这些组织措施的贯彻执行，使四市党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948年春，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利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伪装“开明民主”的时机，指示广西大学学治会成立营救被捕同学委员会，由中共党员梁仲彬任主任委员。4月上旬，营救委员会派代表与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交涉，遭到无理拒绝。营救委员会决定继续开展斗争，努力争取学校当局、教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他们派代表先后走访何杰、郑建宣、张先辰等教授和李任仁、陈良佐、唐现之等社会知名人士，取得他们的支持，还联合南宁师院的学生，采取罢课抗议、谈判、请愿等方式，开展对“七月事件”被捕师生的营救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社会各界要求释放被捕师生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广西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于己不利，被迫于1948年4月、5月间先后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和南宁师范学院的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其他在“七月事件”中被捕尚未获释的人员仍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直到1949年初，李宗仁作为国民党代总统向中共求和时，才把其余人员释放出狱。

“七月事件”锻炼和教育了群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极端的孤立。在这场斗争中，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更加成熟起来。他们坚持把政治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保证了斗争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五、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七月事件”虽然使爱国民主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全国整个形势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的。1947年秋冬，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中取得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将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为跟上革命发展的步伐，中共桂柳区工委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深入开展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为迎接革命新高潮准备条件。

中共党的组织是城市工作的核心领导力量。桂柳区工委认真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在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基础上，积极发展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为城市工作的深入打下扎实的基础。1948年2月中旬至3月初，陈枫、路璠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主持召开中共桂柳区工委工作会议。桂、柳、邕三市和柳北、象县、都宜忻地区党组织的11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同时又是一次党员干部训练班。到会者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对如何开展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作了具体研究。会议作出了《加紧努力，迎接新形势》的决议，起草了《城市工作》的专门文件。文件系统阐述了城市工作的地位作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城市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搞好城市党组织建设，开展学生、工人和贫民工作，内线和情报工作的具体方法、要求。强调要在工厂建立工作据点，发展党员要以工人、城市贫民为主。这一文件对提高城市干部党员的思想、工作和政策水平，保证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年5月，陈枫在桂柳区各级党组织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指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一系列指示和外地城市工作的经验，结合广西的具体情况，系统地讲述了党的领导、形势与策略、建党思想与建党工作、建军观点与建军工作、城市观点与城市工作等五个问题，指出当前党在城市基本上是防御，总的方针是“力求生存，发展力量，巩固阵地，团结自卫，相机前进”。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

桂柳区工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慎重而又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1948年底，四市的工作据点增加了16个，共有党员208名，其中桂林市60名，柳州市78名，南宁市66名，梧州市4名。党的外围组织爱青会在各市一般以比党员人数多1~2倍的速度发展。爱青会入会的条件较高，组织比较严密，基本上按照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开展活动，成为党领导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各大中学校里也建立了秘密学习小组、读书会、时事研究会等进步学生群众组织。

民盟也逐步恢复在桂、邕、梧三市的活动。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国民党当局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公开声明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① 从此，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夏，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香港主持成立民盟广西支部领导小组，其成员为周匡人、宋云彬、杨荣国、叶生发、梁成业。恢复了在桂、邕、梧三市的活动，与中共广西地下党密切配合开展斗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9月至翌年1月，人民解放军接连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为了加强对广西城市和农村工作的领导，12月下旬，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撤销桂柳区工委，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任命陈枫为省城工委书记，负责领导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的

①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册），296~32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城市斗争；李殷丹为省农工委书记，负责领导桂北、桂东、桂中、柳北、都宜忻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

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省城工委领导机关设在柳州。同月，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在桂林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工作干部会议，桂、柳、邕三市及广西大学、南宁师范学院党组织的负责干部12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形势和桂系当局的动向，总结了一年来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以大胆放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各阶层的群众组织及党的组织，深入调查研究，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里应外合工作为今后半年的中心任务。在斗争策略上，强调在平时注意积蓄力量，防止盲冲硬打，过早损失，在有利时机要坚决领导群众，放开双手，大胆前进，团结与争取一切可能团结与争取的社会力量，扩大城市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会议还强调要加强宣传工作、策反工作和城市调查研究工作等。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城市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同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宣布“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桂系为挽救行将覆灭的国民党政权，极力扩军备战，一再增加征兵、征粮、征税的数额，广西1949年年度的征兵额由上年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征税率比上年增加70%。并大量削减行政、教育经费，克扣公教人员的工资，加上物价飞涨，城市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一般公教人员的月薪仅能维持一人10天的最低生活，遑论养家糊口。大批商店、企业倒闭，工人、教师失业，学生失学。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愈益强烈。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再次掀起了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这次城市斗争高潮比以往更深入。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人们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争生存”的旗帜下展开斗争。

1949年2月，南宁师院学生开展了反黄斗争。事情经过是这样：国民党

广西省政府为加强对南宁师院的控制，瓦解南宁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于1949年1月任命黄华表为该院院长。黄华表上台后，严令学生“不得搞运动”，“不得干涉学院行政”，并封存图书馆的进步书刊，借故处分进步学生，解聘进步教授，甚至停发学生公费。2月15日，中共南宁师院党组织采取“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的策略，由学生自治会和教授会出面，组织数百名学生包围黄华表的办公室，进行集体请愿，要他收回一系列反动成命。黄华表当面表示接受，事后又勾结地方反动势力进行反扑，解聘支持学运的进步教授，收买流氓打伤学生多名，并电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下令解散师院。师院学生展开了多方面的坚决斗争。他们出海报、发传单、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黄华表镇压学生、摧残教育的罪行；借欢送被迫离校的教授之机，组织数百名学生到市区示威游行；举行“活命大拍卖”、“活命公演”，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还推举学生代表到桂林，向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及省参议会请愿，强烈要求撤换黄华表。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黄华表被迫于5月7日“辞职”。

3、4月间，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及桂林、柳州两市中共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争生存”、“反迫害”的大规模罢工、罢课斗争。3月28日，柳铁桂林机务段的1000多名职工开展索薪罢工斗争，停开12次特别快车，并声言要停开军运列车，迫使铁路当局补发所欠工资。3月30日，广西大学800多名师生员工高呼着“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前往市区游行请愿，包围中央银行桂林分行，索取欠款。学生用油漆将其招牌上“中央银行”改为“种殃银行”，并在其大门两侧写上“打倒豪门资本”、“反剥削”、“争生存”等标语。经过谈判，迫使该行当即付还大部分欠款。3月下旬至4月初，柳铁工人再次举行索薪罢工，先后四次包围铁路局机关，迫使柳铁当局补发拖欠的工资。在此前后，柳庆师范的学生开展了拒缴学杂费和反对停发公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4月1日，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镇压示威游行的学生，制造了“四一”血案。消息传来，广西大学发表了《抗议“四一”血案宣言》，并联合广西艺专及桂林市部分中学的学生共1000多人于17日在西大礼堂举行追悼会，

声讨反动政府的暴行，反对假民主。4月18日，桂林中学1000多名师生为该校一名饿死的教师“抬棺游行”，在广西社会引起震动。

5月19日，受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龙城中学五名中共党员教师安全撤离后，该校学生开展了“寻师运动”。中共柳州市党组织对此事作了研究，认为国民党特务要抓人是确切的，五位教师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撤离的，学生“寻师”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因此领导龙城中学学生组成了寻师委员会，在《广西日报》刊登寻师启事，并高呼着“还我老师”的口号上街游行，要求柳州专署、柳江县政府、警察局追查老师的下落，使柳州军政当局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这就以巧妙的斗争方式，向社会各界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统治。

学生、教师、工人的罢课、罢教、罢工等斗争互相结合，互相推动，形成了1949年上半年广西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它促使人们进一步醒悟，站到人民革命的立场上来，国民党反动派陷于彻底的孤立。

第二十二章　新桂系拒和顽抗与反共"总体战"措施

1948年冬至1949年初，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被歼灭，国民党败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为挽救国民党的失败，实施其"换马"政策。在美国的支持下，新桂系开展倒蒋活动，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出面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统治。李宗仁代总统后，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掣肘，最终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破灭。新桂系败退广西后，实施反共"总体战"，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继续顽抗。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新桂系集团发生分裂，黄绍竑脱离反动营垒投向人民，李宗仁出亡美国。

一、拒和顽抗，坚持反共内战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徐蚌国民党军主力失败已定，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美国对蒋介石的统治失去了信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

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大元帅（指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① 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在美国的支持下，乘蒋介石处境困难，开展逼蒋下台活动。12月24日和30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电蒋，要求停止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白崇禧主张和谈的目的，在他与李任仁的谈话中表露得非常清楚。白在给蒋发电前，将李任仁接到武汉，对李说："这一仗老蒋的老本丢得差不多，再搞不下去了，我们要老蒋下野，德公（李宗仁）上台，和共产党谈和，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如果仍旧在位，各处都不服，和也难，战也难，所以非蒋让位不可。蒋让位之后就会六军用命，可望南北分治"。② 可见，白崇禧和谈的目的，一是逼蒋下野，让位于李宗仁；二是争取喘息机会，以便调整兵力，守住江南；三是通过和谈，使桂系取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李宗仁、甘介侯也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③ 与此同时，经过新桂系的活动，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考虑引退了。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他提出"和议要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等谈判条件，并假意地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327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②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载《新桂系纪实》（下），155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③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125页，台湾，黎明出版社，1977。

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①

蒋介石发表文告是别有所图，一是要等待中共方面和美、英、法、苏四国的反应；二是观察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尤其是新桂系的态度；三是等待淮海战局变化，期望徐州撤退部队能顺利突围；四是拖延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对今后有所布置。

白崇禧认为蒋发表文告是缓兵之计，故继续采取一切可能运用的办法促蒋下野，以利李宗仁上台主持和谈。1949年1月2日以后，河南、湖北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要求停战议和，休养生息。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故意拖延下野时间。1月9日，蒋派张群、黄绍竑到汉口向白崇禧转达他的两点意见：“（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针对蒋介石的“求和”文告，1949年1月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军55万精锐部队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已解放。蒋介石请求美、苏、英、法四国斡旋国共和谈，遭到拒绝。至此，蒋介石认为大势已去，不得不于1



李宗仁代理总统时与国府人员合影

① 蒋介石：《新年文告》，1949年1月1日，载《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25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月21日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任代总统后积极施展“和平”攻势，作出种种“和平”姿态。1月22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文告，表示“决本和平建国的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宣称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李宗仁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组成第三种力量，既可以牵制共产党，又可以压制蒋介石。但李宗仁的电邀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同日，李宗仁还指示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和谈代表，等候与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谈判；派邵力子、甘介侯到上海访晤宋庆龄、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请他们襄助和谈。李宗仁、白崇禧还派黄启汉来往于汉口—北平—南京，穿梭于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之间，试探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求和的态度。

1月23日，新华社广播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也不能免。中国共产党对桂系的求和攻势采取了既宽容、争取，又坚持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态度。

1月24日，李宗仁为了进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饬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大“和平措施”：（一）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抵制“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①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尽快决定谈判地点，进行谈判，并说：“政府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②

蒋介石引退后，仍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党、政、军、特各部门，对和谈进

①②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4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行操纵破坏。蒋对和谈定了一个基调：(一)“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二)“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地位”；(三) 关于军队改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这个和谈基调实质上是一个“划江而治”的所谓“平等的和平”方案，与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相去甚远。

1月29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向国民党军队发出密令：“应下最大之决心，与之（指中共）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战争。”2月9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书面谈话，称：“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① 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认为“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的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②

李宗仁上任后，承认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想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维持桂系江南半壁河山的目的。但蒋介石引退后，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政方面的许多权力，并指责李宗仁“以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③ 使李宗仁处于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境地。

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李宗仁企图逼迫蒋介石出国。他和白崇禧授意报界制造舆论，追蒋出洋。3月12日，南京《救国日报》以《蒋介石不出国则救国无望》为题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在幕后控制，请求美国出面阻止蒋介石“干涉政府和军队”，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财移交给李宗仁。张治中对李宗仁的处境很同情，曾主动多次出面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劝蒋介石出国，以便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和平政策”。但司徒认为这是中国内政，非外人所宜干预，他反劝张以其个人与蒋的关系担任此角色。于是，张治中和吴忠信一起于3月3日飞奉化转溪口见蒋，伺机劝说蒋出国，遭到蒋的拒绝。李宗仁还亲自写信给蒋介石，表示蒋介石不停止干预，他将“决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12、1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154页，台湾，黎明出版社，1997。

心引退，以谢国人”。①

李、白逼蒋出洋的企图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迫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在幕后的操纵。经过李宗仁的一番努力，3月24日，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30日增加刘斐），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去北平和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代表，组成代表团和国民党进行谈判。

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由于李宗仁等坚持先签订停战协定，再商谈和平条件，使原定4月5日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

4月13日，国共和谈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南京政府代表团对协定草案提出40条修改意见。15日，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最后修正案，并提出以4月20日为签字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以前表示态度，逾期不签字，表示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将立即渡江。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回南京请示。

李宗仁对修正案不敢做主，遂同意何应钦的建议，把协定呈送溪口蒋介石过目。蒋介石看过后，气急败坏地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同时，李宗仁召集桂系将领开会商讨，会上，黄绍竑主张在协定上签字，但白崇禧则坚决反对，他埋怨代表团没有坚持基本立场，认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接受和议，等于无条件投降。”② 19日，李宗仁又将和议协定交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会议讨论后决议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日期，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进行商谈，采取再拖下去的办法。20日，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张治中等人，要他们向中共提出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完全破裂。

---

①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177页，台湾，黎明出版社，1997。

②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7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4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

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黄绍竑已于4月16日回南京）在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劝说下，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行列。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张群、吴忠信到杭州会谈。蒋介石反对李宗仁的“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的意见和坚决辞职的打算，并一再说明，由李宗仁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工作，表示支持李宗仁继续领导下去。此时，李宗仁心境虽有说不出的辛酸，但也无可奈何地不得不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会上，蒋介石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任副主席，今后国民党的重大决策，先提非常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会议还作出以下决定：（一）在政治上，宣告和谈破裂，政府今后惟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二）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会议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于23日从南京迁广州办公。

会后，蒋介石拨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由于中央银行现洋不够，其中一部分以1．5万两黄金折价，派专机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部队和蒋军残余100多万军队，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甘愿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飞机逃离南京，蒋介石原令飞机把李宗仁送到广州，李在飞机启航后下令驾驶员改飞桂林。南京当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新桂系“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

李宗仁拒赴广州而回桂林，或许表明他不愿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同时由于桂林是桂系的老巢，蒋介石的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李宗仁有充分施展自己权力的环境，加上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国民党自恃的长江天险，使“划江而治”的计划破产的事实，应该促使桂系首领从保全广西

的角度出发，冷静思考，面对现实，从而考虑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或同意局部和平。李宗仁一回到桂林，以李任仁为首的民主派就酝酿向李献言，希望他继续与中共谈判，避免战争，争取广西和平。李宗仁初回桂林时表现还好，曾向李任仁等表示绝对不去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因此，李任仁等想用集体力量推动他接受和平。李任仁与陈雄商量，打算召集新桂系的高级干部来商谈，给他上个意见书，让他知道桂系的干部也倾向和平，促使他下决心签订和平协定。当时黄旭初也同意这个意见。

4月下旬的一天，新桂系在广西省政府大楼会议厅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广西省政府各厅厅长，省政府委员以及在桂的部分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桂系高级将领李品仙、莫树杰、姚槐等。会议一开始，李任仁就力言和平的重要。但李品仙则发言极力主战，叫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李任仁立即进行反驳，指出"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党打了这多年内战，民怨沸腾，人心尽失，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尚且一败涂地，现强弱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思瓦全而不可得"。[①] 经过李任仁陈述利害关系及当时解放大军压境的形势，与会者多数同意李任仁的主和意见，并决定以个人签名方式上书李宗仁。后来由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廑起草，经李任仁、陈雄、张任民几个人修改，成为《希望和平的意见书》交给李宗仁。[②]意见书陈述了与中国共产党重开和谈的要义："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③] 在这个意见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

①②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载《新桂系纪实》（下），158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③ 《李宗仁回忆录》，648、68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黄旭初外，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外，也全部签名。

李任仁将意见书交给李宗仁时，并一再劝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蒋先生在大陆垮台，尚有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① 处于和战两难的李宗仁看了意见书和听了李任仁的劝言后，曾经为之所动。一天，李宗仁还亲自冒雨来到李任仁家，表示想重开和谈，要李任仁为其去北平跑一趟，并说：“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李任仁表示，只要代总统决心已下，他愿为重开和谈而奔走。李任仁还同53位省参议员对广西省政府提出的“整饬吏治、政治公开、严明军纪”等八条意见，表达了他们“久乱思治，长困望苏”的心情，多方策动广西当局放下武器，力促和平解放广西。由于民主派的努力，当时桂林曾一度出现了和平的小气候。

4月底，主张反共到底并掌握重兵的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回到桂林，一天晚上，白崇禧和黄旭初邀请桂系重要官员到文明路李宗仁公馆开会。到会的人，除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外，还有省政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负责人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数十人。会上，李品仙抢先发言，极力诬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说中共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声称绝对不能和共产党谈和。李任仁随即进行反驳，说延安有中国历史的研究会，也演京戏，写旧体诗，怎能说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中共的领导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共还请他们担任边区政府的领导，怎能说不要老人？延安有夫妇、子女、家庭，怎能说拆散家庭？这一夜的会议，主要变成李任仁和李品仙针锋相对的争论。李宗仁、黄旭初则一言不发。最后白崇禧表示：“和战取决于德公。”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这次会议之后，主战论又重新抬头。后来，白崇

① 《李宗仁回忆录》，648、68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禧宣布“以后谁再言和者，给我抓起来”，[①] 以高压手段把主和空气压了下去，一些动摇的人又纷纷改变态度，从高谈和平变为叫嚣战争。

5月2日，居正、阎锡山从广州飞抵桂林，敦促李宗仁前往广州。5月8日，李宗仁放弃了“绝对不去广州”的诺言，飞往广州，主持苟延残喘、行将崩溃的广州“国民政府”，并发表书面谈话：“声明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②] 5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完全放弃了和谈，转而走上顽抗到底自我毁灭的道路。白崇禧则赶回武汉，主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和华中的战争。但负隅顽抗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步伐，5、6月间，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6月17日，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退到衡阳，与据守广东的余汉谋集团联合，企图确保湘粤桂三省，进行顽抗。7月，人民解放军向湖南发起强大攻势。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长沙和平解放。9~10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桂系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4个师共4.7万人，给白崇禧以沉重打击，白及其所部狼狈退人广西，企图依靠广西作最后顽抗。

还在5月下旬上海解放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就接见了桂系要员、广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黄启汉，黄表示愿意再去找白崇禧，向他作最后的劝告，争取他接受和平解放广西。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黄启汉去试一试。10月3日，黄启汉在北京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中共方面对黄此行表示赞赏，并对黄表示，中共中央的意思，只要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一、不反对土改；二、军队接受和平改编；三、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李、白本人，愿留在广西或到北京来，或到国外走走，都可以商量，只要是向人民靠拢，是尽可能尊重他个人志愿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载《新桂系纪实》（下），160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② 《李宗仁回忆录》，69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已经成立，从此中华民族结束了100多年来的内忧外患，振兴有望。每一个炎黄子孙，稍有点民族感的，都会感到欢欣鼓舞。白健生并非不明事理的人，为了广西人民，他也应当接受和平改编，走傅作义的道路，仍不失为当代的一位名将，受到人民欢迎；但若执迷不悟，继续顽抗，跟蒋介石失败到底，必将身败名裂。何去何从，他还有最后选择的机会，但时间不多了，望他好自为之。这番话，语重心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和宽宏大量。①

10月下旬，黄启汉带着中共的重托，回到桂林，劝说白崇禧接受和平。黄启汉见到了白崇禧，转达了中共对广西及桂系首领的宽大政策，给白崇禧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但白崇禧心情沉重，顾虑重重，犹豫不决。黄启汉向他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利害，然而白崇禧这时考虑的却是广西部队的逃路问题。白在即将逃离广西前，11月19日午夜，又把黄启汉接到书房单独谈话。此时白崇禧垂头丧气，满脸愁容。黄启汉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劝说白接受和平改编，但白仍执迷不悟，拒绝和平改编，并在广西布置实施所谓“总体战”，顽抗到底。

二、反共“总体战”措施

桂林绥靖公署种种反动措施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白崇禧就做好败退广西老巢的准备。为巩固广西后方，白崇禧向国民党中央建议，成立桂林绥靖公署，直属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

① 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载《学术论坛》1990（5）。

5月1日，桂林绥靖公署正式成立，由白崇禧的副长官李品仙兼任主任，黄旭初、莫树杰、甘丽初、周祖晃任副主任，孙国铨为参谋长。桂林绥靖公署设有一处（办理人事任免、兵员补充）、二处（办理情报、谍报）、三处（办理作战、训练）、四处（办理交通通信）、经理处等11个处。另外尚有警卫营一个营，通讯营一个营。当时归桂林绥靖公署指挥的军队、团队、行政专区有第五十六军所辖的3个师，即第一二九师、第三二九师、第三三〇师，军长马拔萃；6个保安团，3个游击支队（收编当地土匪、招募流氓地痞而成）；12个行政专区，后增至15个行政专区。

桂林绥靖公署成立时，李宗仁亲自到场监誓并训话，强调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将省保安司令部归并绥靖公署，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巩固地方治安。李品仙讲了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肃清“匪患”，兵员补充，国民兵训练。桂林绥靖公署成立后，大力推行一系列反共内战的反动措施。

强行征兵，增设团队，扩充反动武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大批国民党军队被歼或投诚，国民党军队数量越来越少，部队缺员越来越大。为了增加兵源，整补部队，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一再电令广西当局速运新兵赴前方补充缺额。桂林绥靖公署通知军管区（因军管区不是其指挥的单位，故采用通知的方式），责令桂东、桂西两个师管区如期如数征集，不得有误。1949年，广西全省征兵额由上年的2万余人增至13万人，并于3月新成立了第五十六军。

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半个湖南，即将发动衡宝战役，向桂系在省外的最后一道防线发动进攻。省内各地游击队为配合大军南下，频频出击，进攻各地交通要道、据点。各专区、县的自卫队，不足应付，桂林绥靖公署决定增设团队，每一专区成立一个保安团，每县成立1～2个常备大队（大县成立二个大队，小县成立一个大队），乡（镇）成立一个常备中队，长期集中在专署、县府、乡（镇）公所所在地训练，归各专员、县长、乡（镇）长直接指挥，担任各该专区、县、乡（镇）境内“搜剿”任务。每县增设富有军事学识的副县长一人，专门负责监督国民兵训练及指挥“搜剿”事宜，该副

县长由桂林绥靖公署直接委派。各团队的经费支出，在烟、赌捐项下解决，兵员则采取征集与招募并用的办法，武器来源一是征用民枪，二是购买。当时桂林绥靖公署将在省外的几个军的多余武器作价卖给各县，步枪一支白银50元，轻机枪一挺100元。

全面"搜剿"各地人民武装。为了剿灭分布在省内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9年6月，桂林绥靖公署实行分区"围剿"。其部署是：以第五十六军军部驻柳州，军直属队一部驻大塘，第三二九师、第三三〇师、第一二九师分别驻全州、百色和玉林。6个保安团分别驻宾阳贵县间、南宁、宜山、龙州、临桂、兴安。第一游击支队驻柳城、洛满一带，第三游击支队驻雒容、鹿寨一带，第五游击支队驻苍梧、藤县一带。

6月下旬，李品仙指挥国民党第五十六军直属队、第三二九师、省保安六团、保安五团两个营和各县乡自卫队共计1万余人枪，对中共领导的桂北游击队进行割块"围剿"。[①] 8~9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企图"肃清"桂北游击队，为白崇禧集团南逃扫清道路。6月，桂林绥靖公署在宜山建立"剿匪"指挥所，以莫树杰为主任，统一指挥宜山、柳州两专区的"剿匪"行动。指挥所指挥桂绥直属警卫营、通讯队、省保安第二团、保安补二团（又称独二团）、新编保十团、第五十六军直属营和六八六团，以及宜山、忻城、都安、河池四县自卫总队等4000多人，于7月15日开始向都、宜、忻游击区发动大规模"围剿"。[②] 7月下旬至10月上旬，国民党第二区（柳州）专署保安副司令王凯、第十五区（署址设融县长安）专员蒋晃等先后纠集省保安部队一个营、第五十六军第六八六团、交通警察部队一部及融县、罗城、百寿三县地方武装，接连对柳北游击区发动四次"围剿"。桂林绥靖公署下令，各专区（县）境内如发现有"小股"游击队活动，各该专员（县长）

① 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桂北武装起义五十周年纪念册》，32页，1997。

②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23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要直接派出团队，前往“围剿”。

组建谍报网，搜捕中共地下人员。为了侦查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况，1949年8月上旬，桂林绥靖公署在桂林成立谍报人员训练班，培养特务人员。该班人数50人，一部分由绥靖公署指定有关县府遴员保送，另一部分由绥靖公署公开招考，采用暗号发榜。李品仙兼任班主任，训练科目有侦察学、通信学、爆破学等，10月上旬结束。在此之前，桂林绥靖公署先后在柳州、梧州、南宁配置谍报组，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侦察、逮捕、暗杀。为加强各县间的通信联络，由桂林绥靖公署统筹向重庆中央电器厂订购无线电报话两用机，每县一部，由各县交款领取。

颁布反动法令，严密控制人民群众的行动自由。桂林绥靖公署一成立，就于1949年5月29日和6月19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禁令八条》和《桂林绥靖公署保密防谍实施计划》。《维持治安禁令八条》规定：“不得造谣惑众扰乱治安；不得煽动罢工罢学以及聚众游行集会暴动；不得为匪宣传……”“倘有违反上开禁令者，一经查获不分首从，一律依法从严惩处，言出法随，决不姑宽。”①《保密防谍实施计划》则详细规定了方针、指导要领、组织系统、工作实施等项，目的是切断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联系，控制人民群众的言行自由。桂林绥靖公署还下令禁止人民群众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并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共宣传。

为了严密控制人民群众的行动，防止人民群众以民枪接济游击队，桂林绥靖公署一成立就下令全省限期举行民枪登记，责令各县转饬各乡（镇）负责办理，从7月间开始，限三个月内完成。所有民间枪支一律送乡镇公所办理登记“验讫”，统一造册汇报绥靖公署备查。以后查验时，枪主交不出原枪，则追查该枪去处，凡接济或携枪参加游击队者，一律从严惩罚。如有隐瞒不报登记者，一经查出，或被人告发属实，则以私自接济游击队论，予以治罪。

---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5月30日。

公开烟赌，加征苛捐杂税，筹集扩军备战经费。随着各专区团队的增设，经费的开支陡然增加，为了解决浩大开支，李品仙提出“广西开放烟赌，筹集团队经费”的建议，在桂林绥靖公署会议上通过。这样，绥靖公署一改广西当局过去力主禁烟、禁赌的做法，于9月间决定开放烟赌，牟取暴利。在开赌方面，桂、柳、邕、梧由绥靖公署直接派员承包，各专区、县乡（镇），则由专员、县长、乡（镇）长在各该所在地直接派员包赌，抽收赌捐，作为扩编团队经费。开放烟禁方面，其实早在1948年广西已成立“自卫特捐委员会”，以韦云淞主其事，统一包运专卖鸦片，后在大、中城市开设烟馆，抽收烟捐。赌捐烟捐名义上缴绥靖公署作为扩编团队经费，实际上大部分被各级官员侵吞。

除实行公开烟、赌抽收捐款外，绥靖公署还大肆增收苛捐杂税。7月，在南宁、横县、贵县、桂平等地，设立食盐附加稽征处，凡由沿海入境的食盐，除照规定缴纳正税外，另每担附加征收现洋2元。又在梧州设立竹、木、柴、炭捐税稽征处，凡由内地出境的竹、木、柴、炭，一律收捐，苛捐杂税大部分都落人了官僚们的私囊。

组织“军政督导团”，督促各项反动措施的实施。为了督促各县推行军、政各项反动措施，1949年8月，李品仙在桂林绥靖公署联合会报会上提出组织军政督导团，分赴各专区、县（市）督促实施。当时成立六个军政督导团，每个督导团负责两个专区，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莫树杰、甘丽初、周祖晃，省府委员曾其新、林中奇、罗福康分任各督导团团长，团员由绥靖公署会同省府商定抽调人员组成。督导内容是：(1) 肃清境内游击队；(2) 增设团队，集中训练；(3) 清查户口，实行“五家联保”；(4) 推行“限田减租”；(5) 征兵、征粮；(6) 组织国民兵训练；(7) 民枪登记；(8) 邻县联防；(9) 检阅驻军、团队。此外，还授权督导团就近处理一切“悬案特案”，包括处理“人犯”在内。

8月中旬，李品仙亲自率副参谋长刘维楷，民众组训处处长倪仲涛，参议秦廷柱、咨议谭裕等，到灵川、兴安、全县等地视察督导，巡视防御设施，

审议作战计划，作“搜剿”桂北游击队的“指示”。李品仙提出“围剿”游击队的办法：发动民众，团团围困，联防守卡，实行搜山，采用“梳篦战术”；悬赏购缉，将游击队家属的家产充公，变卖作奖金；清查户口，实行五家联保，互相监督各家子弟，不得去参加游击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扩充自卫队，加强力量，等等。李品仙大肆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拆散家庭，六亲不认，破坏社会安宁和建设，叫嚷“国民党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要求各地官兵不惜任何牺牲，与共产党作殊死战，如作战不力，将受严厉处分。

桂林绥靖公署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强化了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统治，使广西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

白崇禧的反共“总体战”

1949年10月上旬，白崇禧部在湖南衡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击溃，狼狈逃回广西。此时，新桂系主力被歼，广西境内人民群众反对新桂系统治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游击武装，遍布全省90多个县，形成了11个游击区，战斗力大大加强。在作战方面已能进一步集中主力，积极进攻桂系地方反动武装，摧毁农村基层反动政权，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西。各地武装斗争和城市学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爱国民主运动密切配合，新桂系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维持新桂系的反动统治，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顽抗，白崇禧一回到桂林，就慌忙召集省内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军政人员紧急会议，布置实施反共“总体战”。

所谓“总体战”，是1948年初白崇禧主持国防部时提出的“剿共”新方略。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且将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白崇禧从“剿共”军事失败中，开始认识到解放军在战略指导上比国民党要高出一筹。他承认，解放军“以军事、政治、经济三体之总体战，同时对我作战，使我处处糜烂，处处纷乱”，认为“现在的中共，是有组织的、政治性的和国际性的”，“我们

剿共绝不能单靠军事力量，必须军事、政治、经济紧密配合，以军事保护政治，以政治培养经济，以经济充实军事”，“要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密切配合，凝结成一战斗体”，“实施总体战，才能打击中共”。① 同年4月，国防部发布实施“总体战”方案。

“总体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执行党、政、军一元化。强调国民党对号召动员群众“戡乱建国”的领导作用和军政合作对争取胜利的重要意义；强调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规定绥靖司令官在绥靖区范围内，有适应作战需要，综合处理党、政、军一切问题全责，绥靖区司令官有撤换县长之权。

第二，作战计划由国防部预为划分固守和机动部队。其目的和要求是：确定固守之要点，把防守任务所需的部队固定下来，该部队应预为从事长时间独立进行防御战斗的各方面设施，并屯足粮食和弹药；不得在战斗发生后的短期内，要求空投粮弹。该防守部队经国防部核定后，其他方面不得擅自调换、抽调或撤离固守之要点。在交通要地配置的机动部队，不担任该地防守任务；经常保持携带定量足够的粮、弹、器材和所需要的全部运输工具，有随时应命开始机动作战的全盘准备，期能迅秘行动，捕捉战机，投入战斗。

第三，实行坚壁清野和对人力物力的控制及运用。规定绥靖区司令应在辖区内，除划定特需固守的要地外，均实行坚壁清野。清野的要求是：人要走光，物要搬光，房屋要毁光。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总体战”方案十分赞赏，1948年3月中旬，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华中绥靖会议，决定在华中及其他各区推行。6月，白崇禧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便在华中地区大力推行“总体战”，企图以此阻挡人民解放军向华中地区的进军，但很快被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所粉碎。白崇禧

① 白崇禧：《实施“总体战”之基本认识》，载《华中区总体战实施办法》，7页。

败退广西后，仍不甘心失败，为在广西孤注一掷，命令在全省实行“总体战”，幻想“总体战”能使新桂系苟延残喘，等待“美援”的到来。



白崇禧企图依靠美援继续内战。图为白崇禧与美国参议员诺兰在南宁

组织军政区。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准备发动广西战役，围歼白崇禧残余。白崇禧为负隅顽抗，10月中旬决定将广西划为六个军政区：桂东军政区，司令官甘丽初，司令部设在八步；桂南军政区，司令官罗活，司令部设在玉林；桂西军政区，司令官莫树杰，司令部设在南丹；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司令部设在桂林；桂中军政区，司令官王景宋，司令部设在柳州；桂黔边军政区，司令官张光玮，司令部设在百色。每个军政区成立反共救国军一个军，依上述顺序分别为新编第十、十一、十五、十三、十四、六军，司令官兼任军长，专员兼任师长，县长兼任团长，军政区用推行“一甲一兵一枪”的办法，拼凑编组成军，配合“国军”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必要时开展游击战，企图作最后顽抗。

进行反共宣传。为了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防止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新桂系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冯璜在梧州任专员时，专门组织了反共宣传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反共宣传委员会在街头绘制反共连环画，涂写大型反共标语和布质横额；电影放映前，加上一幕“反共”标语和漫画，捏造解放区实行“共产公妻拆散家庭”、“男女婚姻不自由，老少夫妻交换调配”等等。强令全市公教人员举行“反共”宣誓，事先印好誓词，迫使每人签名。同时还组织“反共”宣传队，强迫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参加，派到乡下去宣传。全省各地，特别是桂林、柳州、南宁等大城市都开展了反共宣誓、游行和其他反共宣传，各县成立人民反共宣传委员会，后改为反共保民动员

委员会。

新桂系在全省各地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共宣传，其用意在于煽动人们的反共情绪，形成对共产党的丑恶印象，以争取人心，支持其反共内战。

实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新桂系在扩编团队之后，仍感兵力不足，于是在全省实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以扩充兵源。其内容主要是：(1)每甲抽壮丁（从18岁到45岁）一名去当兵，无适龄壮丁，准由该甲买人顶替；(2)每甲自备机造步枪一支，子弹百发，被服用具全套，携带入营。如该甲无枪支子弹，由各户凑款购买，但有枪的户，必须先借用。各甲壮丁携带入营的枪支，如因作战损失，由政府赔偿。如系壮丁携械潜逃，除责成该甲续抽壮丁补充外，并应补带武器服装；(3)壮丁的口粮、副食品、饷银、服装等由各该甲负担，暂定每月口粮30斤，副食费3元，饷银6元，一次凑足3个月；(4)集中在县府、乡（镇）公所所在地训练，期限暂定为一年。广西有2.4万个村（街），每村（街）以10甲计，可征集24万人枪。[①]“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对人民又是一次掠夺。广西民间历来枪多，估计不下20万支，但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官僚及土匪手中，他们把枪支看做护家发财的工具，绝不会借出公用。因此，在“一甲一兵一枪”运动中，地主官僚不但毫毛无损，还可以从中渔利，高价卖枪。至于壮丁，更抽不到他们，沉重的负担最终落在贫苦百姓身上。

重弹“减租限田”老调。新桂系败退广西后，全省广大农民反“三征”斗争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日益发展壮大，不断袭击敌人，摧毁反动政权，严重威胁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面对这种形势，新桂系意识到单靠他们残余的反动武装已阻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现在救亡图存，最有效的还是争取民心，换句话，就是要争取农民”，[②]而“争取农民”的惟一有效措施是推行“减租限田”。[③]因此，新桂系再次唱起“减租限田”高调，

---

① 《新桂系纪实》（下），270、295、296页。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9日。

③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13日。

将其作为推行“总体战”，挽救军事失败的一项反动措施。

早在30年代初，新桂系就曾颁布《广西耕地租用暂行条例》，实行“二五减租”，但没有认真实行。1946年，新桂系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新土地法，拟订了《广西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规定私有土地面积最高额为宅地10亩为限，耕地以足供一家10口人的生活为限。同时，将《广西耕地租用暂行条例》修正为《广西耕地租用实施办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地价8%。但新桂系又没有真正实施，仅仅发指令而已。许多乡村地主和佃户仅在形式上按照法定租率换了租约，“仅仅止于口喊而未见诸实行，以致农村地租仍旧没有超越封建地租的形态，佃农依然喘息在高额地租的榨取中”。①

1948年7月，广西省政府鉴于“减租限田”迟迟未能推行，恐失去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连日召集重要官员会议，重新检讨本省的土地政策。8月，省政府以“不依限办理限田准备工作，蔑视功令，有亏职责”为由，给昭平、贺县等30个县的县长以记过处分。② 看起来，新桂系这次已下了雷厉风行推行“减租限田”的决心。实际上，这时新桂系正全力投入反共内战，“减租限田”只不过是新桂系用以欺骗民众的一个空洞口号。

1949年10月，新桂系退守广西后，推行“减租限田”的声势比以往更大，这次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而且从省、县抽调近千名官员组成“督导团”下乡“督导”“减租限田”。白崇禧还发出严厉的训令：“凡专员县长执行减租限田政策不力者予以撤职查办。”广西省政府根据白的训令，制定了“五项处分办法”，以保证“减租限田”按期完成。③

根据新桂系“减租限田”法令规定，所谓“减租”就是每亩按照实际正产物收获量以37.5%计算，如得谷子100斤，佃农应以37.5斤交给地主作地租，剩下的62.5斤归佃农所有。这叫做“三七五减租”。所谓“限田”就是一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6年9月27日。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8年8月8日。
③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27日。

户只准有"上等田"50亩，或"中等田"75亩，或"下等田"100亩，超过的部分必须卖给原耕佃农或雇农。[①] 新桂系把这个"减租限田"称之为"土地改革"，说什么通过"减租限田"，就可以实现"社会均产"、"贫富平均"、"人人有田耕，人人有饭吃"。[②]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桂系不可能真正实行什么"土地改革"，"减租限田"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减租限田"法令规定以户为单位，不规定每户人数的多少，地主便纷纷化名立户，得以多占土地。所谓"上等田"、"中等田"、"下等田"，当时又无具体统一标准，也使得地主在土地类别上做文章，把肥田好田都充作"下等田"，规避"限田"。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超额土地可供佃农购买了。又按"限田"法令规定，"出卖耕地之地价，由承买人与出卖人自行洽商"。[③] 按照这一规定，即使有地可买，因地主抬高地价，佃农无力承买。后来新桂系重新规定，"地价为法定租额之七倍计算，平均分为十四年偿付"，"所有耕地应纳赋税，自出卖日起并由承买人负担"。[④] 这个规定，似乎地价不算高，但偿还期14年中利息不断增高，而且还要负担赋税，一贫如洗的佃农根本无法支付。黄旭初也承认："由于地价过高，虽有地主愿出卖土地，佃农却买不起。"[⑤] 由此可见，"限田"并没有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垄断。

即使如此温和的"改革"，仍然遭到地主阶级的抵制，大地主大官僚们不肯丝毫的"减限"。白崇禧的堂哥白佐廷说："我家中人口多，现有的田地还嫌少，那里还能让出卖给别人？"[⑥] 当时任桂林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品仙对负责他家乡"减租限田"的梧州专员冯璜说："我家里人口多，所有的田地亦是有

①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15、26、27日。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12日。
③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9月7日。
④ 《本省推行限田减租概况》，桂林市档案馆存。
⑤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10月26日。
⑥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23页。

限，照限田规定，仅仅超出8亩多田。"[1] 中小地主更是纷纷隐瞒田产，混入"农会"，把持领导权，控制"减租限田"。由于"乡村政治多受地主支配，乡村长亦是地主"，"地主每假藉权势，利用地方行政力量威胁佃农，使其屈服"。[2] 因此，"减租限田"在农村根本行不通。有的地主表面上"减租"，但只是换一契约，实际上仍收旧租，佃农也无可奈何。新桂系崩溃前夕在广西推行的所谓"减租限田"运动，完全是为挽救其军事失败而对农民的欺骗。

实行机关员工联保。为了加强各机关"防谍保密"工作，达到摧毁共产党地下组织，残酷镇压人民革命活动的目的，新桂系对机关员工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9月，黄旭初亲自签发了《广西省各级行政机关员工联保办法》，规定"本省各级行政机关员工应各个别分组联保，以三人至五人为一组"，"凡同组具结人员须互相监察，如发现联保人中有通济匪类及其他反动行为等情事各负检举之责。倘有伙同隐匿秘不揭报者，即予依法究办"。[3] 严密控制机关员工的行为。

坚壁清野。为了迟滞解放军进军广西的行动和增加解放军前进中的困难，新桂系在湘、桂边境各县实行空室清野计划，主要是将距湖南50公里内通湘省的公路、大道两侧12.5公里范围中的人口、粮食、牲畜等转移，将碾米用具如舂、磨之类彻底毁坏或埋藏，使湘桂边境路线纵深50公里，横25公里的地区，变成一无所有的真空地带，使解放军进入时给养遭受困难。

新桂系实施的反共"总体战"，是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而作的最后的顽抗，尽管其措施全面，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各个方面，而且雷厉风行地推行，组织"总体战督导团"分赴全省各地督促执行。但由于新桂系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丧失民心，所谓反共"总体战"挽救不了其失败的命运。

---

①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89页。

②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10月26日。

③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56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三、黄绍竑通电起义

在新桂系集团中，虽然白崇禧顽固派高喊“总体战”，继续反共内战，但许多人已认清形势，认识到内战无法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于是纷纷酝酿和平运动，寻找出路。

原新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抗战胜利后主张消除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和平民主建国。1948年，蒋介石拟调他到处于“戡乱”前线的安徽省任省政府主席，利用他直接与人民解放军对抗。黄洞悉其奸，坚辞不就，只当一个“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① 的立法委员。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即将结束，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白崇禧在华中发出“和平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同时嘱黄绍竑赴香港，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会晤，请李出面斡旋，进行国共和谈。黄绍竑欣然受命，黄抵港后，始知李已赴东北解放区，遂通过在港的民革成员，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员潘汉年取得联系，秘密开展和平运动。

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白崇禧企图利用国共和谈实现“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白声称：“如果迫我太甚（指解放军过长江），仍然还是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黄绍竑对此嗤之以鼻：“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② 认为：“在强弱悬殊的形势下，要搞一个分治局面是办不到的。且中共既然做得好，则吾人尚复何求。”③ “我们以和平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

① 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载《新桂系纪实》（下），125页。

② 《黄绍竑回忆录》，63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52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①

4月，黄绍竑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之一，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谈判期间，黄分别与林伯渠、叶剑英恳切交谈，并和刘斐一起在香山慈幼院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会晤。黄绍竑曾填了《好事近》词两首，其中一首曰：“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表达了他祈望和谈成功的迫切心情。4月16日，黄绍竑受代表团委托与屈武一道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复命。他煞费苦心，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但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新桂系主战派占上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黄绍竑见李、白“竖子不可教”，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于4月20日晚乘飞机经广州赴香港。

在黄绍竑到港之前，国民党政府立法院一部分主和派委员已在香港相聚，开展和平活动。黄绍竑抵港后，即以立法委员和和谈代表的身份，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频繁地与在港澳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接触，做动员说服工作。6月8日，黄在自己寓所举行在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委员、高级将领集会，报告北平和谈情形以及李宗仁拒绝和平协定的经过。和谈代表之一的刘斐也到了香港，应邀参加了集会，在会上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以及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答复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会上分别就继续促进国内和平问题和脱离蒋介石政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贺耀祖等11人签名致书李宗仁，呼吁和平，但未被李宗仁接受，反而被开除了党籍。

经过黄绍竑等人的努力，争取了数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举义。1949年8月13日，由黄绍竑领衔，联袂贺耀祖、龙云、罗翼群、刘斐、刘建绪、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国民党人士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起义通电。通电历数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指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

① 《黄绍竑回忆录》，63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走向于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认为“这一切反动政权之所以招致了今日这种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与军事惨败，实为其必然的结果”。通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先生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延续的发展与彻底的实施”，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新民主主义的产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针对中国社会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统治下，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这一客观形势，“倡导新民主主义，一面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一面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并且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进步的路上去。这正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所以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通电最后号召一切“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①

通电发表后第三天，8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以《国民党加强新生力量》为题的社论，对“四十四位国民党员这种跟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决绝，向人民靠拢的坚决而明显的行动，表示最高的敬意”。

黄绍竑等人的通电发表后，立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军政人员纷纷脱离蒋介石反动政权，拥护黄绍竑等人的政治主张。8月25日，邓召荫等11人发表了《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讲话，决定参加这一立即与蒋介石党权政权决裂的政治运动。随后，还有王普涵等

① 全文载1949年8月15日《香港华商报》；《黄绍竑回忆录》，652～65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13人也表示拥护黄绍竑等的政治主张。①

黄绍竑等发表通电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严重思想混乱和政治分裂，蒋介石又怕又恨，发出通缉令，要将黄绍竑等缉捕法办。黄绍竑等毫不畏惧，于9月11日又联名发表《告国民党海陆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他们效法程潜、陈明仁将军，弃暗投明，率部起义。

其后，黄绍竑、刘斐、李任仁等，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原香港分局）的秘密安排下，乘一艘挂葡萄牙国旗的轮船驶往青岛，再沿胶济路到济南转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绍竑兴奋不已，在船上作《玉楼春·别香港》抒怀，全文是："笙歌未许扁朱户，淡绿添红灯下树。清秋将半未生凉，犹隔斜阳山外雨。井笛声弄断香江路，帆影白鸥漂泊处。海天明月倍关情，夜半照人烟里去。"黄绍竑一面是写当晚海上的景色，一面是写他衷心感谢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关怀。②

四、李宗仁出亡美国

1949年5月8日，李宗仁在桂系主战派的左右下，放弃了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听从了白崇禧的摆布，从桂林飞往广州主持业已崩溃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顽固派怂恿下，领导国民党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顽抗。

南京解放后，蒋介石的计划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如果李宗仁留在桂林，那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李宗仁赴粤，其实是中了蒋介石预设的圈套。至此，李宗仁已无所作为。

① 《黄绍竑回忆录》，65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② 江虹：《黄绍竑香港领衔举义》，载《广西党史》1997（3），46页；《黄绍竑回忆录》，644～64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李宗仁飞广州之时，江南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分路向南挺进，直接威逼白崇禧的华中部队。为了在绝境中挣扎，李宗仁到穗后，即同何应钦、白崇禧商量，重新调整部署，组织所谓“西南保卫战”，并派甘介侯赴美求援，但甘一去不复返。由于蒋介石幕后拆台，李宗仁为进行“西南保卫战”所需的财政经费全无着落，广州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军事上陷入了绝境。

5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宋希濂在蒋介石指使下，拒听指挥，放弃要塞，使湖南门户洞开。何应钦在指挥不动下属，华中战局彻底失败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向李宗仁坚请辞职。李乃向国民党中央提请以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获常委会同意，但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的时候，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李宗仁受到沉重的打击。李屈服于CC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获立法院通过。李宗仁的领导权大大削弱了。

阎锡山上台后，局势更加严重，到处告急。阎锡山为解决经济难题而发行银圆券，未能制止恶性通胀，被民众拒用，经济更加不可收拾。7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赣南发动攻势，击溃国民党守军沈发藻兵团，分两路逼进粤境，国民党军广东防线危在旦夕。

7月14日，蒋介石忽然率领大批随员从台湾飞抵广州。蒋以国民党总裁身份，连续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又集于蒋介石一身。接着，他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到四川调动军队，发号施令。

李宗仁对蒋介石曾声称五年内不干预政事，可是现在又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做法十分不满。蒋介石从幕后走向前台后，对李宗仁多方掣肘，李无事可办，遂决定出巡一趟，藉以了解辖内军事、民政的情形。7月26日，李宗仁自广州飞往衡阳，与白崇禧晤谈后，又飞福州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并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几度长谈。李宗仁的一系列活动，遭到蒋介石的猜忌。8月中旬，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撤去朱绍良福建省主席职务，遗缺由汤恩

伯接替，并让汤把朱绍良劫往台湾。闽事的发生，李宗仁竟毫无所知。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此时华中不保，闽粤岌岌可危，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黄绍竑、龙云、罗翼群、刘斐、李任仁等44人签名的起义通电。形势表明国民党失败已不可挽回。但此时李宗仁还死守“不成功便成仁”，不做“降将军”的封建信条，未能根据已经明朗的形势作出正确的选择，仍苦费心机作防守部署。他召集两广军政首领陈济棠、余汉谋、白崇禧举行会议，提出两广合力固守广东，粤方一致表示支持。会议当即作出两条决定：一是改任广州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赋予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二是把原为院辖市的广州改为广东省直接管辖，以利于集中军权，适应军事需要。

蒋介石对李宗仁在广州的布置了若指掌，表面上也支持李防守广州的计划。8月23日，蒋再次来到广州，部署“广州保卫战”。其实他另有打算，于是于24日从广州飞重庆，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原来蒋是想固守川滇，控制西南，作长久挣扎之计。

8月24日，白崇禧从衡阳赶来广州，目的是会晤蒋介石，但蒋当天已飞往重庆。白事先在军事上准备了甲、乙两案，甲案是他所率领的部队全部人粤，保卫广州；乙案是所部退回广西。他本人主张甲案，李宗仁也同意。为做到这一点，白崇禧提出他非兼国防部长不可，否则不能下令调动军队。后来甲案不为蒋介石接纳。即日，美国驻广州大使停止办公，使馆人员正在撤往香港。广州美使馆的撤退，表明李宗仁政府在广州的日子不会太长。但李仍作最后的努力，促使白崇禧到粤协防。为达此目的，李宗仁提议阎锡山自动辞去国防部长之职，并荐白崇禧接任，但阎锡山表示，他兼长国防系出自蒋意，如须辞去，也要经蒋认可，李宗仁无可奈何。

蒋介石连续不断地私自违法，破坏保卫西南和两广，引起了粤系将领的普遍愤懑。张发奎曾两次建议武力扣留蒋介石，但李宗仁认为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保持“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避免“为天下

笑”,[①] 反对这一行动。

其实李宗仁十分愤恨蒋介石的胡作非为，特别是他对白崇禧的拉拢，尤令李宗仁发指。于是，李宗仁在蒋介石9月中旬再次来穗之际，约蒋来到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狠狠地教训了蒋介石一通，稍舒心中的积愤。这番谈话，表明蒋、李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

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动衡宝战役，歼灭桂系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4个师，白崇禧大惊失色，桂系其他部队闻风丧胆，“湘粤联防”的幻梦最终破灭。在发起衡宝战役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攻占了韶关，直指广州。10月14日晚广州解放。在广州解放前夕的10月12日，李宗仁乘飞机离开广州，当晚停宿桂林，次日续飞重庆。

国民党“政府”自广州迁往重庆以后，蒋介石复职之说甚嚣尘上，蒋曾专门召集会议，研讨“复行视事”事宜。多数人认为，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已为举国所共认，蒋要复职，首先需李宗仁“知难而退”，于是蒋介石的说客不断地奔走李宗仁门下活动。同时，蒋还策动宣传工具为其复职制造舆论。李宗仁对蒋介石玩弄权术、目无法统的做法十分忿恨，因而坚决不肯“劝进”。

为了摆脱蒋介石势力的掣肘，李宗仁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11月3日，飞抵昆明，并在昆明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夜。卢汉对李宗仁近月来受蒋介石的折磨十分同情，郑重地向李提出，用他与李宗仁二人的名义发电报给蒋介石，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蒋一到昆明，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②] 但李宗仁怀疑卢汉会将他与蒋一起扣留献给中共邀功，因而极力进行劝阻。

李宗仁在昆明数日，受到很大启发，知大势已定，但他既没有勇气改弦易辙，又不甘心再做蒋介石的附庸，因而决定不再返重庆，也不去台湾。11

① 《李宗仁回忆录》，70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李宗仁回忆录》，718页。

月11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回桂林。12日上午，李在桂林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徐启明会谈和战进退问题，没有结论。晚上继续开会，黄旭初也从南宁赶回参加，会上提出两个办法：积极的办法是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线；消极的办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13日继续开会，李宗仁表示，西南残局已无希望，他坚决赴美就医，留下的和战问题由白崇禧决定。14日下午，李宗仁偕李品仙、黄旭初、程思远等人飞南宁。当天下午，蒋介石率随员从台北飞抵重庆，即电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同时电白崇禧，请他“力促”李宗仁“命驾”。但李宗仁此时去意已定，拒绝了蒋的电邀。11月20日，李宗仁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临行时，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将赴美医治胃病。12月5日，李宗仁从香港飞美国旧金山，7日飞纽约，入住长老会医院。

李宗仁的出走，使蒋介石复职更有借口，但为了避开“非法夺取李代总统职权”的责难，蒋介石曾派人挽留李宗仁，同时劝李“请总裁复行总统职务”，但均被李宗仁拒绝。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继续进行复职活动，但仍遭到李宗仁的反对。蒋看到李宗仁不肯就范，就采取断然措施，强行复位。1950年2月14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居住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性电文，要他在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就被认为放弃“代总统”职权。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文告，宣布复职，并致电李宗仁，告之以复职事，希望李以“副总统”身份作为“总统”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① 李宗仁则在蒋介石复职的当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谴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行为”。

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表决通过了“监察院”提出的《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罢免了李宗仁。

---

① 《李宗仁回忆录》，7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李宗仁寓居美国的头几年，手上既无权力，又无实力，屡遭台湾当局的排斥和打击，陷人最落泊、最难堪的境地。在这失意之际，他开始从自己一生走过的弯路中总结经验教训，抛却个人恩怨，顾念国家的前途，比较冷静而客观地观察时局，在政治立场上开始了重大的转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武装侵占台湾，随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联合国提出“台湾中立化”的方针。9月20日，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福摩萨问题”案，要联大讨论所谓“台湾未来地位问题”，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声明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李宗仁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声明，非常兴奋，认为这个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随后，李宗仁发表了他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主张国共双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反对美国干涉。李宗仁的这一建议，反映了他对过去的悔悟和对祖国的忠诚，这是他走上爱国道路的起点。

李宗仁政治立场的转变，受到祖国和人民的关注。周恩来总理通过李宗仁的亲信程思远，向李宗仁发出了回国的邀请。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经过曲折的努力，于1965年7月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第二十三章　新桂系统治的覆灭　广西解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向江南进军，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掀起“迎军南下，解放广西”的热潮。各地游击队在1947年起义失败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重新发展起来，并从内线转向外线作战，向盘踞城镇、交通要隘、据点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摧毁乡村反动政权，解放广大农村，配合南下大军作战。桂、柳、邕、梧的中共组织在新桂系的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机智、勇敢、巧妙地开展政治宣传、统战策反工作，打击顽固反动分子，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大多数的群众，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反对国民党军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在各地游击队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援下进行广西战役，运用大迂回、大包围、大追歼的战略战术，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新桂系在广西20多年的统治彻底覆灭，广西解放。

一、广西各地掀起游击战争高潮，配合解放军南下作战

游击队的恢复和发展

1947年广西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新桂系为扑灭革命火种，继续调派大批武装对起义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有的地区半个月一“小扫荡”，3个月联县一“大扫荡”，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滥杀无辜。同时，组织县、区联防，五户联保，清乡点甲和封锁道路，控制交通，搜捕游击队员，并迫害其家属。在游击区周围修筑碉堡、哨卡，并村围闸，制造“无人区”、“隔绝带”，妄图把游击队困死。新桂系的白色恐怖，使各地游击队遭受很大损失，许多游击队员被捕杀害，有的动摇消极了。游击队处境十分困难。

在严重困难面前，各地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和牺牲，继续坚持战斗。起义受挫后，各地武装队伍转入山区，分散活动，保存力量，坚持游击战争，或化整为零，依靠群众，坚持斗争。

桂东起义失利后，起义队伍小部分在当地隐蔽，坚持地下斗争，大部分人员向粤桂湘边西江游击区转移。1948年4月，游击队潜回桂东贺县、富川、平乐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建立桂东游击区。

桂中中秋起义受挫后，起义队伍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分散活动，以武工队的形式在贵县、武宣、来宾、象县边界坚持斗争。各武工队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打击反动乡村政权，建立游击区。

桂中南起义队伍在新桂系重兵“围剿”之下，第十九团主力撤向十万大山，其余队伍以武工队的形式在横县、上林、武宣、永淳、贵县边界由“大搞”变为“小搞”，坚持战斗。他们提出“挖塘养鱼”的方针，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分子，消灭小股敌人，巩固老区，开辟新区。1948年底，第十九团主

力从十万大山回师横县，整个桂中南的局势从根本上转变过来，武装队伍发展到800人。

左江地区起义部队在国民党桂系与越法反动武装共同“围剿”下失败后，分散改编为武工队，采取跳跃与波浪式发展的斗争方式，插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左江游击根据地逐步恢复，并向右江方向开辟新区。

桂西起义遭到新桂系重兵“围剿”失败后，中共桂西党组织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形式，建立以党员和群众骨干为主体的小型武工队和游击小组，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同盟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开展反“三征”和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山区根据地。到1948年底，游击战争扩展到万冈、凤山、果德、田东、那马、武鸣、平治、天峨、乐业、凌云、向都、河池、都安、隆山等县和隆安、田阳、百色部分地区，建立了7个大队级武装，脱产武装2000余人。

桂北是新桂系统治中心，桂北起义后新桂系对起义部队进行长达几个月的“围剿”。起义部队同敌人进行顽强的反“围剿”斗争，虽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损失严重。中共桂北党组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将游击队从灵川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全县、灌阳地区，保存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948年8月，游击队除少部分队伍留在灵川老区坚持斗争外，主力北上转移。部队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9月到达全县东山，与在这里活动的游击武装会合。之后，部队进行整编，以梅花式的布局在兴、全、灌各地发动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打击敌特和反动分子，开辟了小江源、朝南游击区，桂北游击战争出现新的局面。

中共融县工委于1948年在融县、罗城、柳城、三江、中渡等县发动群众，建立农会，从武工队搞起，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是年在融县建立柳北第一支武工队，代号“江猛”队。武工队领导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袭击乡村公所，打击反动分子。武工队在群众斗争中壮大发展起来。

都安、宜山、忻城、柳江等县在中共都宜忻地工委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武工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加马、夷江等游击根据地。

桂东南的博白、陆川、北流、容县、玉林、兴业等县，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力发展武工队和其他武装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发展两面政权，掩护革命活动，开辟游击根据地。各县武工队逐步组建主力部队，博白的武装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十二团，陆川的武装组建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十四团。

当时属于广东省的防城、钦县、灵山等县1947年后武装斗争也日益发展，和属于广西省的上思、思乐、明江、宁明、崇善、绥渌、扶南、同正、邕宁等县游击武装互相配合，开展反“三征”斗争，建立了十万大山游击区。随后，游击武装组建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共3000余人。

总之，1947年广西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根据“依靠人民、山地，根据战争任务，以有战略意义、地形复杂、有群众条件之地区为重点，在其周围普遍发展，互相配合，以重点经营来支持普遍发展，以普遍发展来掩护重点经营，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走向集结，建立主力、根据地，到割据式的边区”① 的战略总方针，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各游击区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部队逐步发展，活动区域逐步扩大。到1948年底，全省游击队发展到约1万人，游击区域扩大到50多个县。

全省游击战争高潮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根据全国的革命形势，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认真分析和总结了全省武装斗争的形势和经验，对广西革命斗争作了新的部署。3月，中共广西省农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

---

① 陈枫：《今后怎样进行武斗》，1948年9月，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352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武斗的几个问题》、《关于开辟与发展新区的问题》等指示，强调当前武装斗争的方针是“从普遍发展与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放手小搞，到处活动，到处生根，打下大搞的基础”。①

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向长江以南进军。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作出迎接大军南下的工作部署，要求各地游击队在大军到达以前，将农村完全解放，并将各游击区完全打成一片，建立县、区、乡各级政权。在大军即将南下解放广西的形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游击队纷纷由内线转入外线，向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掀起广西游击战争的高潮。

十万大山的粤桂边区第三支队，从1949年春季开始发动攻势作战，多次歼灭省保安部队一个整连、整营的有生力量，打破了粤桂和越法的联合“围剿”。3月，第三支队第二十团主力和第二十一团一部袭击与东兴毗邻的法国殖民军据点越南海宁省会芒街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攻占该市，毙俘法伪军191名，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并救出中越两国革命者和群众100多人。此次战斗的胜利，改变了十万大山区敌我态势。6月28日，十万大山游击队在邕江支队的协同下，在邕宁县南晓乡平心村反“围剿”战斗中，击毙邕宁县副县长兼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超同。7~9月，第三支队与粤桂边纵队第六支队、第四支队主力，发起打通高雷到六万山区、十万山区走廊的战役，攻克合浦、钦县、防城等县10多个敌据点，歼灭大批粤桂保安团队武装，使粤桂边各游击区连成一片。

桂东南的博白、陆川、北流、容县、玉林、兴业等县游击队，从1949年5月起迅速组建主力部队，发展区、乡游击队和武工队。各游击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主动出击，从小规模游击战发展到大规模游击战争，频频袭击乡村公所、据点和保安团队。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公开宣布成立，桂东南各县游击武装组建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黄明

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36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德。陆川独立第四营改为第一支队第二团，博白第三独立营改为第一支队第三团。第一支队成立后，集中兵力进攻敌人。10月下旬，国民党军俞英奇残余1000余人由广东高州经山底、盘龙撤入陆川。20日晚，第一支队第二团在敌军必经的石峡一带设伏，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慌忙逃窜，缴获大批军用品。21日，第一支队第三团与第一团包围驻石岭的国民党廉江县军官大队，迫使其大队长陈瑞麟以下200余人缴械投降，缴获大批武器。

活动在广东省合浦、灵山和钦县东部和广西省兴业和玉林、博白西部以及横县、永淳、贵县南部的六万山游击区武装部队上半年大力扩军，4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符志行，政委陈华，参谋长陆新，政治部主任谭俊。该支队成立后，集中兵力，逐个拔除各地敌据点，扫除六万山区的障碍。10月，该支队在武利江黎屋坡伏击广东省保安一师三团第三营和海南特区暂编连，歼敌14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至此，六万山各游击区基本上连成一片。随后，成立了合浦县人民政府和灵山县人民政府。

桂中南游击区，下半年转入“大搞”，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第十九团主力从十万山区回师横县后，反“扫荡”斗争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巩固了游击根据地。8月，桂中南地工委部署大力扩军，抽调各县游击队骨干加强主力第十九团。9月，第十九团伏击“扫荡”游击区的横县“扫荡”队和民团，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接着，第十九团北上永淳、宾阳，重创永淳、宾阳的县区自卫队，攻占一批乡公所。10月19日，第十九团和各县武装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杨烈，副司令员韦盛经，副政委陈清源，参谋长韦质彬，政治部主任刘一桢。成立了横县人民政府。

左江游击区，各县在健全和扩大地方武装、武工队和民兵的同时，组建主力部队。4月，以左江主力大队为基础，从龙州、凭祥、上金、雷平等县抽调部分武装成立左江地区主力第三团。7月，又从以上各县和养利、靖雷等县区抽调武装人员成立第七十四团。9月，将右江上游区指挥部组建第七十五团。以上各团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左江指挥部。从6~9月，左江部队主动出击，广泛开展进攻敌据点的战斗，摧毁乡村反动政权，

将左右江游击区连成一片。先后建立了龙津、凭祥、上金、雷平、养利、龙茗、龙湖、天保、镇边、敬德10个县民主政府。到解放大军到达该地区前夕，又建立了万承、隆安、向都、镇结、同正、左县6个县民主政府以及全地区大部分乡村政府。10月，左江指挥部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司令员陆华（莫一凡），政委黄河（黄嘉），参谋长王平，政治部主任梁游。

老革命根据地的桂西，1949年3月中共右江地委发出“发扬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加紧发展，加紧准备，为迎接大军南下而奋斗”的号召，提出“从小搞过渡到大搞”，“大胆放手而有计划的壮大自己的武装队伍”，“有计划的袭击敌人较大的据点与圩镇，有计划的歼灭敌人县警特编队之一部或全部”的作战方针。[①] 上半年，各县党组织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向城镇、交通线挺进，掀起武装斗争的新高潮。在红水河上游区，各县游击队扩编为四个大队。各大队集中使用兵力，向敌出击，先后解放了乐业的同乐、新化、武称，天峨的罗宜、城治，凤山的金牙，东兰的泗孟、兰木、文伐等乡。右江下游区，平治县游击队从3月至5月解放了全县14个乡中的12个乡，收缴反动地主恶霸的武器，破仓分粮。果德县游击队奇袭敌五县联防据点坡造圩及龙马乡公所，击毙那马县自卫队总队副总队长古典昭、果德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覃树皎，击伤果德县县长李祖唐。向都县独立大队和民兵先后攻占东平、江城、三洞、永隆四个乡公所。东部地区，隆山县游击队解放了加福、乐善、里当、龙湾四个乡，建立了隆夷解放区。河池县游击队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解放了7个乡，县长廖英蛟被迫“引咎辞职”。都安县游击队攻占都兴区署，俘区长以下60多人，解放了13个乡。都安、平治、果德、万冈、那马、河池等县游击区连成一片。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右江支队）成立，指挥员赵世同，政委周中平（区

① 《区镇同志给各县同志的信》，1949年3月11日，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上），47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镇），副政委余明炎，参谋长姚冕光，政治部主任黄耿。各县武装整编为3个主力团、3个县独立团、10个县独立大队。9月以后，桂西各部队集中兵力，夺取敌交通沿线的城镇、据点，策应大军南下。至11月，各部队接连解放了平治县、乐业县城和隆山县重镇古零、都安县七百岸和红水河东岸，逮捕叛徒黄桂南（抗战初期曾任中共桂西特委书记），收缴该部170余人的武器。在这期间，桂西先后建立天峨、都安、河池、凌云、平治、果德、那马、隆山、武鸣、万冈等10个县临时人民政府，凤山、东兰、乐业三县革命委员会，共13个县级政权。

1949年4月，中共桂中地工委和桂中区人民解放总队宣告成立，统一领导桂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廖联原任总队司令员兼政委，韦志龙任副司令员，韦纯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之后，桂中地区积极发展武装，大搞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做好迎接大军解放桂中的准备工作。桂平、象县、贵县、武宣、平南等县游击队积极出击作战，袭击乡村公所、据点，打击敌特，破坏交通，截击敌车船队，伏击敌保安团队，扩大游击区。7月，在贵县、武宣、来宾三县边界活动的游击队频频出击，将龙山游击区与武宣县南河区及来宾县南泗、石牙游击区连成一片。8月，来宾南河大队和民兵数百人在来宾至武宣河段的凌锅滩，伏击国民党军从柳州至广州的来往兵船，使水上交通线受到很大的威胁。9月，象县游击队和民兵1000余人将前来“围剿”根据地的吴克宽部300余人围在百丈圩，双方对峙五天六夜之久。10月，桂平北区游击队和武宣北河游击队，把紫荆山的通道打开，建成联结武宣、桂平、平南三县的黔江东岸游击走廊。至此，武宣、桂平、平南三县游击区连成一片。桂中人民解放总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

1949年4月以后，柳北各县游击队大力扩大武装，发展各种群众组织，成立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从7月开始，人民保卫团频频出击，接连摧毁融县的永乐、高街、玉高、潭头和柳城县的龙头5个国民党乡村政权。融县西区的和睦、南区的大良和北区的浪保3个乡公所陷入瘫痪。人民保卫团在已控制的乡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妇女会、民兵队等。因游击队

四处出击，柳北地区的水陆交通常被切断。柳长公路中段的古摩桥3次被游击队破坏。为此，柳城县长张德乾以“玩忽功令”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撤职查办；融县县长黎华也因“剿匪不力、致匪坐大”被撤职扣留。[①] 8～9月，国民党柳州第十五专署、保安司令部纠集各县保安团、自卫队等武装4次对柳北游击队进行“围剿”，均被击退。8月，桂黔边人民保卫团扩建为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副政委谢之雄，政治部主任林润葱。10月，柳北总队作出“扩大外线作战，加强主动出击”的决定，总队主力向西线敌主要据点罗城龙岸出击，10月20日解放龙岸。各县武装也频频出击，进攻敌据点、交通线和乡村公所。各地群众纷纷参军参战，迎接解放。

桂西北地区的都安东部和宜山、忻城、柳江、罗城、天河以及河池东部等县区游击队，1949年上半年在反“围剿”斗争中迅速发展，成立“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第五团成立后在柳宜公路沿线积极活动，不断打击敌人。5月9日，打败忻城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唐安、常备大队长陈玉英率领100多人的进攻，陈玉英被击毙。15日，第五团集中兵力攻打忻城县城，17日攻占该县城。6月19日，第五团第二次攻打忻城县城，30日再次攻占该县城。第五团两次攻占忻城县城，县长周次抱狼狈弃城逃跑，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撤职查办。10月，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改编为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路璠，副司令员覃宝龙、周廷扬，副政委吴师光，参谋长王定，政治部主任覃展。

桂北游击队转移全灌地区之后，1949年初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南面的恭城、临桂、阳朔、平乐发展。所属各部频频出击，进攻敌据点、交通要道和乡村政权。3月，狮子铺武工队袭击了离桂林市仅10余公里的灵川甘棠渡火车站，全歼守敌一个班。5月，龙胜县、义宁县在地下党领导下爆发了起义，攻占一批乡村公所。6月，桂北游击队广泛开展湘桂铁路两侧的武装斗争，分兵南进，开辟阳朔、永福游击区，形成包围桂林市的态势。7月23日，桂

① 《广西日报》，1949年9月16日。

北人民翻身队[1]改编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吴腾芳，副总队长全昭毅，副政委阳雄飞，参谋长傅一屏，政治部主任陈亮。总队下辖两个支队12个大队，共约2000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后，各部队互相配合，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各部队主动出击敌人，破坏交通，拔除乡村据点。全县的朝南、大坪、咸水、内建乡，灌阳的巨望、崇月乡，兴安的华江、西安、漓源乡，灵川的北障、南潘乡，临桂的渡头乡，义宁的中江、中庸圩及永福的矮岭等乡政权，先后被游击队攻占和解放。8月19日，游击队火烧灵川的三街、甘棠渡铁路桥，切断交通半个月之久。灵川县长吴仁光被撤职查办，龙胜县长蒋祖荫、义宁县长李治君也分别被撤职和免职。10月10日，桂北总队发布《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命令》和《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最后通牒》，命令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所属部队主动向敌人发动攻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桂北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解放桂北人民”。向桂北一切国民党地方政府、地方军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其放下武器，接受“局部和平解决方案”，“倘敢顽强抵抗则坚决予以全部歼灭”。[2]同日，该总队第十五大队长阳至元，率部在资源三千界活捉兴、资、全三县联防办事处少将主任王彝，全歼所部100余人和湖南省建设厅人员一部。17日，第六大队长邓崇济率队在全县两河乡八百岭伏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政训处，歼敌一部，击伤少将军官一名。18日，总队副总队长全昭毅率队在灵川五里排伏击白崇禧车队，击毁汽车2辆，俘其官兵20多人，白崇禧幸免逃回桂林。

桂东游击区1949年后迅速发展，各县游击队不断扩大。4月，桂东人民解放总队宣告成立，司令员兼政委黄传林，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吴赞之。桂东解放总队成立后，将分散在各地的武工队、群众武装整编为中队、大队，开

---

① 1947年11月，桂北游击队命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1948年2月又改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

② 《桂北文献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338～339，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1988。

展公开的武装斗争，进攻和摧毁国民党乡村政权，控制了桂东广大农村，并向湘南的江华、道县和粤北的连山县发展。

自1949年初，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后，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西各地游击队大部分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并在作战中不断壮大发展游击队武装，袭击和进攻国民党省保安团队、县特编队和自卫队，以至分散孤立的正规军，攻占据点、城镇、交通要隘，掀起游击战争的高潮。在解放军入桂前夕，全省（包括当时属广东管辖的钦廉地区）已拥有12个支队（总队），共4万余人的游击队，先后建立了十万大山、六万大山、桂东南、桂东、桂北、左江、右江、桂中南、桂中、柳北、都宜忻等11个大游击区，武装斗争遍及97个县境，解放了大批区乡级政权，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为解放军入桂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桂、柳、邕、梧护城迎军斗争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之后，广西解放前夕，广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配合大军南下作战的同时，各大城市也掀起了迎接解放的斗争高潮。

1949年1月，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成立了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部署城市革命斗争，提出做好迎接解放军解放广西各城市的任务。解放军进军江南后，7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在柳州郊区社湾村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桂、柳、邕三市党组织的9位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陈枫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进一步部署城市工作任务。会议决定抓紧调查、整理各市的军、政、财、文等材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路、护校，保护城市的斗争。9月，人民解放军进抵湘桂边，广西解放已

为期不远。是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在柳州鹧鸪江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桂、柳、邕三市城工委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和广西解放战争的形势，认为广西解放"当不会超过今年冬季"。会议指出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作垂死的挣扎，因此广西白色恐怖将更加严重，革命斗争更加艰巨。会议还分析了广西城市解放可能用战争、"真空"与和平三种方式。战争的方式，即白崇禧率残部退回广西，顽抗到底，解放军不得不用武力消灭之；和平的方式，即白崇禧兵力大部被歼，白离开广西，黄旭初为首接受局部和平；"真空"方式，即敌军已撤退，而南下大军一时尚未到达的"真空状态"。会议认为虽然三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但"从死硬派头子白崇禧的历史来看，即使其一部或大部兵力被我消灭，可能仍不肯离开广西，而将最后残余力量作孤注一掷，并且即使白崇禧不得已离开广西，但仍可能逼迫黄旭初与他同时逃走，而就广西目前原有的地方实力人物来看，又无其他可以集中广西各派势力而统一领导的人物。因此，不仅以黄为首的局部和平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以其他人物为首的局部和平的可能性亦不大"。① 战争方式和"真空状态"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强调各市党组织要从最坏的情况着想，发动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做好护厂、护校、护路的工作，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抢劫，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城市。

为了做好各城市的护城迎解放工作，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首先是加强城市党的领导。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桂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光，副书记黄绍亮。同年7月，成立柳州、南宁两市城工委，梁山为柳州城工委书记，梁健为南宁城工委书记。8月，成立梧州城工委，罗杰林为书记。9月，中共十万大山地委派阮洪川到南宁工作，10月成立中共南宁市工委，阮洪川任书记，撤销中共南宁特支。各市城工委成立后，认真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和工作水平，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到解放前夕，四市中共党员

---

① 《城市干部临时会议记录》，1949年9月25~30日，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123~12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共418名,团员259名。其中桂林党员130名,团员35名;柳州党员140名,团员29名;南宁党员110名,团员124名;梧州党员38名,团员71名。各市党组织注意从工人、城市贫民中发展党员,工人、贫民党员有所增加。中共组织的扩大和巩固,为城市的解放斗争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力量。

各市党组织在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爱国青年会的同时，还积极建立和发展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建立了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工人解放联合会、工农民主解放联合会、学生解放联合会、妇女解放联合会、工商界解放联合会、公务人员解放联合会、湘桂黔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湘桂黔铁路技术人员解放联合会、文教工作者解放联合会、艺术工作者解放联合会、邮电交通公共事业员工解放联合会等。柳州建立了湘桂黔铁路工人解放联合会、工农解放联合会、妇女解放联合会、学生联谊会、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公务人员解放联合会、文化教育工作者解放联合会、工商界解放联合会等。南宁建立了南宁人民解放联合会、工农解放联合会、民主人士联谊会等。梧州建立了爱国民主人士联谊会、学生联合会等。这些组织成为中共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开展城市解放斗争的桥梁，在护城迎军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949年下半年起，桂、柳、邕、梧四市在中共广西省城工委的统一部署和各市城工委的领导下，转入以护城迎解放为中心的革命斗争。

国民党桂系为保住广西老巢，在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暴力统治，实行更加严厉的白色恐怖。如成立四市警备司令部，实行戒严，加强新闻、书刊、邮电管制，严禁罢工、罢课、“非法集会”，疯狂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10月后，白崇禧下令实施反共“总体战”。中共组织在城市的活动更加困难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各市党组织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领导人民开展护厂、护校、护路，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

积极开展城市调查研究

为了使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管城市，使所有机关、企业、学校的财

产都能交回人民手中，1949年1月，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就部署各城市开展调查研究，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以供解放军接管城市参考。省城工委制定了《城市调查研究大纲》，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内容、要求和方法。各市在一段时间内都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一些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桂系当局的军政特要害部门获取重要机密资料。桂林城工委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及各区分部、省参议会、省高等法院、市政府、警备司令部、省会警察局、绥靖公署、电信局、邮局、商会、国税局、田粮处、银行、广西大学、桂林中学、德智中学、汉民中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女师、艺专、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逸仙中学、桂岭师范、松坡中学、省立桂林工业职业学校、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图书馆、广西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工商日报社、广播电台、士敏土厂、水电厂、气象台等50多个单位和街道的调查。10月又重点展开对国民党军驻地和商店、仓库存粮的调查。通过调查，掌握了新桂系党政军特和科教文卫、财政金融及财产房屋等多方面数十份有价值的材料。一些调查材料质量之高，连当时的省会警察局长谢凤年和特务头子梁定远在看了从中共叛徒处搜出的调查材料之后“都不得不为之感叹”。①

南宁工委和城工委派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全市军政警部门和企业、学校、团体作了全面的调查。10月底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从桂林迁到南宁后，城工委又组织力量对其各机关单位深入调查。有几位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内政部警察总队窃出64份军用地图。到解放前夕，南宁党组织搜集了60多种敌特机关资料和军政情报，并将资料综合、分类，整理装订成册，重要的军政人员还写了鉴定表。城工委和市工委每天将搜集到的资料和情报及时派人送给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司令部。

梧州地下党员利用公开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进行调查，

① 黄绍亮：《寒凝榕城，搏击迎春——中共桂林城工委一九四九年的斗争》，载《桂林解放前后》，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党员刘德谦利用自己在中国银行梧州分行任职员的合法身份，对该行的来往账目、库存现金等了解得清清楚楚。城工委派民盟盟员黄韬（黄半文）利用其与苍梧县长谢中天的关系，到梧州任县政府机要秘书（后任社会科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和新旧任县长办理交接之机，将苍梧县政府有重要价值的档案卷宗给城工委委员梁成业查阅摘抄。梁成业用几天时间就了解到不少梧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将重要的人事档案、特工人员名单及其活动情况、县自卫团及其装备情况、物资财产（包括库存粮食、白银、黄金、外币等）的资料抄录走。因此，临解放前梧州城工委基本上调查清楚了梧州国民党军政机关、银行、学校、团体和主要工商企业的情况，并整理成册。

柳州城工委在解放军入城以前通过对全市各方面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机关、学校、企业和团体的情况，尤其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工活动情报。军统特务小头目冯某是党员丘行的一位舅舅，冯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末日将临，有向人民投诚、立功赎罪之意。丘行受党组织的委派对冯进行争取。经过半个多月的政治攻势，丘行说服了冯和另一个军统特务小头目，交出80多名特务名单和15枝枪。

四市党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调查了200个单位大批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财政金融部门和重要企事业单位的人事、财产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各市临解放前的护城斗争和解放初的接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发动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

为了宣传解放军的政策，粉碎国民党的反共谣言，稳定人心，打击反动分子，分化和瓦解敌人，动员城市各阶层群众积极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各城市党的组织在解放前夕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1949年5月14日夜，在中共广西省城工委的统一部署下，桂林、柳州、南宁同时散发毛泽东、朱德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称《约法八章》）、《告各界人民书》、《警告特务书》等传单。在桂林，城

工委几乎动员了全部党团员、爱青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到市内街头、巷口和公共场所散发、递送和张贴。有的选定大商号重点递送，有的投入邮箱，有的装在信封邮寄给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的汽车库门口上也被贴了一张传单，他本人也接到从邮局寄来的一张。这次行动由于计划周密，行动机警，除桂林一名党员被捕杀害外，其他人员没有受到损失。这次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全国解放战争的新形势，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受到了鼓舞，识破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进一步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增强了同敌人斗争，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桂林有些过去轻信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大张旗鼓地抛售存货，打算疏散的商人，纷纷将削价拍卖的牌子收了起来，稳定了情绪，准备迎接解放。这次宣传攻势，对反动分子是个沉重的打击，传单发出后，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十分恐慌。柳州中统特务钟可庄、徐来的家属痛哭流涕，劝其洗手不干。有的特务惶惶不可终日，设法向中共地下组织表明清白，行动上有所收敛。

7~9月，国民党当局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相继举行反共宣誓大会和示威游行。为发动群众抵制和打击反动派的反共气焰，四市城工委先后发动宣传攻势，组织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告学校师生书》和给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的《警告信》，使反动派的阴谋遭到失败。柳州城工委得到国民党定于8月1日召开万人反共宣誓大会，会后还搞反共游行的情报，于7月28日晚发动全市党团员、爱青会员和“解联”会员500多人，一齐出动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伟大胜利，号召各界群众抵制和拒绝参加反共游行。结果，国民党反共游行遭到失败，被迫参加开会的群众在游行开始后相继走散，“只剩下反动分子、军警约二百人左右的游行队伍，在街头号叫哀鸣。群众嘲曰：‘城隍庙里唱戏鬼看！’”反动分子恼羞成怒，枪杀一名逃兵，伪称是“散发传单的匪特”，[1] 以吓唬群众。桂林国民

① 陈枫、胡习恒等：《中共柳州地下党发展简史》，1950年9月，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215~21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党举行反共游行之前，城工委大量散发揭露反共游行阴谋的传单，并用邮寄办法投送警告特务的传单，把32个特务名字开列在传单上。传单发出后，传遍全市，使作恶累累的特务分子十分恐惧，纷纷“找人申诉他们的‘冤屈’”。由于有力的宣传攻势，使这次反共游行“开得很不争(景)气”。[①] 在南宁，由于中共组织宣传抵制，使参加国民党反共宣誓大会的人数不到预定的五分之一。

10月，人民解放军陈兵湘桂边境，即将向广西进军。在大军压境，广西很快解放的形势下，桂、柳、邕、梧掀起了迎军宣传高潮。桂林是解放大军南下进军广西的重要通道，受到即将解放鼓舞的党团员、爱青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行动起来，开展空前规模的迎军宣传。他们印刷了大量的《约法八章》、《告市民书》、《告各机关主管及属员书》等传单，散发宣传。由于在邮局发展了爱青会和职工解放联合会的组织，宣传人员巧妙地利用存放在省邮局的上林等县备用的邮戳来寄送传单，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以为是外地寄来的，放松了检查，使每封装着宣传品的信件都顺利送达收件人的手中。这样，桂林的迎军宣传品绝大部分是利用国民党的通信渠道发出去的。

10月底，国民党省政府从桂林迁到南宁，南宁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正当解放军南下解放南宁的前夕，中共南宁工委于11月25～30日几天里，两次发动大规模的迎军宣传，散发20多种传单。第一次散发《约法八章》、《告国民党官兵书》、《粤桂边纵队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告南宁人民书》等4000余份。第二次散发《再告南宁人民书》、《城市政策》、《工商政策》、《南宁人民解放促进会告南宁同胞书》等6000余份。散布传单的方法很多，有的夹进公文，或放入商品中寄出；有的趁黑夜到街头张贴，或从高层建筑向街道散发；还用小孩玩的弹弓夹上传单射入有关人员家中。南宁党组织还以“中共十万山区邕扶绥灵特派员兼南宁市工委书记阮洪川”的名义，给各界人士发送统战信，给特务、军警头目投送警告信

① 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地下党工作总结》，1950年1月，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19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00多封。信中警告反动分子赶快停止作恶，立功赎罪；号召各军政机关首长保存物资档案，等待接管；号召学校师生安心上课，集体护校，反对解散。两次散发传单的次日晨，南宁的商店、机关、团体、学校、住户、街道、汽车和一切公共场所，到处布满了传单。各界群众纷纷传阅和议论传单的内容，传说“昨夜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入城”，人们兴奋异常。反动派则引起极大的慌乱，“大开特务会议，说十万山区至少已有四五十多（个）共产党进城啦，共产党的技术高明，完全不被人察觉啦，这些传单都是由钦州来的啦，乱猜一顿，并决定加紧邮电检查，入黑后派巡查队，检查户口等对付办法”。①

梧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梧州当局散布许多谣言，特务横行街市，弄得人心惶惶。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解放军的政策，稳定人心，中共梧州城工委组织全市党团员、爱国民主人士联谊会会员进行广泛散发和张贴《约法八章》等传单。针对梧州几个反动头目和特务分子，重点投递信件，信件内容有宣传品和一封油印的警告信，点名警告梧州专员冯璜、警察局长卢英龙、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等，不要顽固到底，不得破坏城市，指出只有起义投诚才是惟一的出路。宣传人员将宣传材料装在最小的信封里，外面套上几层中信封、大信封，在统一时间分别送到苍梧县政府、梧州专署、警备司令部、警察局、法院和其他机关团体、大商行去。等到收信人拆完最后一层看到内容时，宣传人员早已溜走。

柳州也大力开展迎军宣传，大量散发告人民书、告职工书和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号召人民起来护城迎接解放，提出职工如何在解放过程中组织起来保卫工厂、铁路和一切财产，警告国民党军政机关和人员不得破坏城市，毁坏资产，企业负责人要保护物资、设备和档案，准备清册，等候接管。

解放前夕，桂、柳、邕、梧四市中共组织领导开展迎军宣传，形成了强

① 《中国共产党粤桂边十万山区南宁市党委南宁解放前工作报告》，1949年12月29日，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17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有力的政治攻势，揭露和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动摇和瓦解了反动派的军心，大大鼓舞了人民，稳定了各阶层群众。这是迎接解放军解放城市的政治思想准备、人心准备。四市绝大部分人民群众和工商业者以及部分国民党机关、团体的中下层人员都抵制反动当局的疏散、撤退命令，留在城市迎接解放。

大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桂、柳、邕、梧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民党军政机关集中所在地。因此，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分化国民党军政内部，争取中下层人员，是城市解放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市中共组织利用解放大军压境，国民党内部混乱、动摇的有利形势，大胆机智地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南宁、梧州的统战、策反工作最有成效。中共南宁工委、城工委互相配合，研究和制定了统战、策反工作的方针、策略和方法。首先是成立南宁人民解放促进会，把那些愿意投靠人民、为解放南宁做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吸收进来，通过这个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分子。市工委委员陈权、苏仁山等不顾被敌特列入黑名单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四出奔走，对国民党军警进行策反工作。马宗骥是一名退伍少将，曾任桂军第七军师长，抗战胜利后被裁退伍，退伍后在南宁经商。马对国民党腐败不满，常溢于言表。陈权认为马宗骥是一个比较容易争取的对象，他和南宁军警政界的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通过他可以去争取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11月中旬，陈权成功地争取了马宗骥，并介绍他加入南宁人民解放促进会。接着，陈权又争取了原国民党第十军官总队中校参谋卜圣阶，卜也加入了南宁人民解放促进会。马、卜被争取过来后，陈权安排他俩去动员南宁警察局长唐超寰起义。唐因过去抓过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有思想顾虑，怕得不到宽大处理。陈权向唐认真分析了形势，晓以大义，阐明中共的政策。经陈权的开导工作，唐超寰答应率警察局武装起义，投靠人民。唐超寰不但掌握南宁数百警察，而且与当时在南宁的

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有联系，他的起义对解放南宁有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苏仁山、罗平、黄廷机等也成功争取了南宁护商大队大队长、警探长和青洪帮首领杨震伟（又名杨亚瑞）。杨震伟表示带领全大队起义，协助维护南宁治安。杨被争取过来后，中共南宁工委书记阮洪川搬到杨家住，利用杨家做掩护，在杨家设立护城指挥所。争取了唐超寰、杨震伟后，南宁地方武装600余人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手中，策反工作就更主动了。11月下旬，南宁工委利用政治宣传争取了原国民党军统越桂边站上校站长陈卓峰，通过陈卓峰又争取了南宁中国银行经理钱浮桴和原国民党军统广西站少将站长、华侨中学校长王清。通过马宗骥、卜圣阶争取了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工兵团团长何绍祖起义。这时，经过苏仁山、黄廷机的活动，争取了驻华强路南武师范学校的国民党军第二二九师山炮连全体官兵起义。当时驻郊区亭子一带的国民党内政部警察总队2000余人，总队长李有节顽固不化，将前去策反的罗灿纲枪杀。总之，到南宁解放前夕，经过地下党的努力，先后吸收了40多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参加南宁解放促进会，该会在统战、策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梧州城工委把统战、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警察局、封建帮会和地方势力中的开明人士。梧州洪帮首领、工商企业家黄天泽是地下党员黄振麟的父亲，拥有200多人，其中100多人配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市城工委利用黄振麟与黄天泽的父女关系，争取了黄天泽，并安排城工委负责人住在黄家。地下党在黄家收听新华社电讯，印发和收藏党的机密文件、材料、宣传品等。地下党又通过黄天泽去争取原苍梧县长陈汝棋等，组织梧州市民主人士联谊会，通过该会对粤桂航业公司护航队、洪帮义勇警察队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接受地下党的领导。市城工委还通过团员罗致英利用兄弟关系，做警察局大中分局长罗杰的工作，罗率队投向人民，接受地下党的指挥。这样，临解放时，市城工委掌握了洪帮武装、梧州义勇警察队、粤桂航业公司护航队、商业大队和警察局大中分局五支武装，共400多人枪。

中共柳州城工委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经委会干事组上校组长

陈如平，参加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陈如平利用职务之便经常给地下党提供国民党军政情报和经费、物资支援。柳州铁路局地下党员争取了该局副局长王之翰及一批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通过他们的工作，平息了反动分子煽动该局职工逃跑的风波。城工委还争取了国民党交通警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胡久守率部约300人投诚。

桂林是四个城市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国民党特务疯狂逮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10月5日，中共桂林城工委书记陈光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陈光（1918~1949），原名陈益昌，曾化名为陈子扬、陈子明等。广东梅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南口区委书记。1943年来广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在长安中学、四维中学任教。1944年9月在融县被捕入狱，桂柳沦陷前获释。后转到柳州日报社工作。1946年4月，任中共柳州特支书记。1947年春调任桂东区特派员。同年8月，任桂林特派员，9月任桂林临工委书记。1949年1月，任桂林城工委书记。陈光被捕后，在狱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受严刑拷打20多次，但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秘密，表现出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国民党特务的一切企图都落了空。陈光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但国民党特务于11月11日晚上将陈光秘密杀害。陈光为桂林和广西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光被捕后，桂林的环境更加险恶了。中共桂林城工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城工委通过党员张达争取了其父亲、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咨议张显龙组织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团结和争取爱国民主人士配合地下党开展护城迎解放的斗争。张显龙先后发展了唐现之、满谦子、朱荫龙、张健甫、汤松年、汤有雁、蒙贤澄、潘山、邓燕林等一批社会人士入会。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曾当过警务处长的浙赣铁路桂林办事处主任毕金铭，加入工程技术人员解放联合会。后来毕金铭对保护铁路、协助接管，起了积极作用。市城工委还通过张显龙、邓燕林等去争取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后来周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受周祖晃节制的桂林市长兼省会警察局长韦瑞霖率保安团和刑侦大队投向人民。

桂、柳、邕、梧四市中共组织开展有成效的统战、策反工作，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争取了一部分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和3000余军警起义、投诚，为广西四大城市的顺利解放和接管起了重要作用。

护厂护校护路斗争

1949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进军后，白崇禧集团为逃脱覆灭的命运，纷纷撤退南逃。撤退前国民党军进行“空室清野”，破坏城市的设施。各市中共城工委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各界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保护城市。

国民党军即将逃离桂林之前，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出大批工兵，妄图炸毁水电、电讯、铁路运输等重要设施。在市城工委的领导下，各界群众同敌人进行各种机智、顽强、灵活、巧妙的斗争。铁路工人们在铁路工人解放联合会的指挥下，将物资器材隐蔽起来，火车司机以弃岗、拖延开车时间或中途停车逃离的办法，阻止滞留桂林的军需物资被运走。经过工人们的斗争，全县到苏桥21台机车，只破坏了9台，保全了400节车厢以及大批军械和弹药物资。苏桥车辆制造厂工人组织巡逻队日夜巡逻，保护器材。工人黄刚将敌人挂在改造动力机上两旁的6包炸药，在爆炸前奋不顾身地拉下3包，使机器损失减轻。苏桥大溪河上的桥梁被炸，60余位工人下水抢修，迅速架好便桥，使解放军顺利进军。

11月21日晚，国民党工兵50多人带着8大包炸药，准备破坏桂林电厂。工人们在领班林子吉、黄久鸿的领导下，一面与工兵谈判，拖延时间；一面安排其他工人将能搬动的器材搬走，藏匿于山洞中。第二日，解放军迅速人城，敌人慌忙逃跑，电厂得以保护。同日晚，国民党工兵10多人也带着几包炸药准备破坏水厂。水厂工人们利用夜晚天黑同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最后将敌人骗走。第二日解放军进城，水厂免遭破坏。

广西大学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护校委员会和防护团，安装了防护电网，并争取了校警武装护校。教授、学生、职员都动员了起来，昼夜在校

区值班巡逻，检查出入人员。汉民中学也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护校团。其他院校凡有党团组织和爱青会组织的，都组织师生员工进行护校，做好了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准备。

当时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已与市城工委取得了联系，周得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工兵破坏桂林重要设施时，曾出面制止，使桂林的一些重要设施破坏较小。

由于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护城斗争，使桂林得到较好的保护，社会稳定。11月22日，解放军入城时，“市内秩序尚好”，除电讯局的发电机被破坏外，“其余皆未破坏”。①

国民党军在柳州撤退前，“下了一个狠毒的命令，要以四十吨TNT烈性炸药，毁灭柳州”。② 国民党军企图破坏的目标，除市内的一些重要公共设施外，主要是湘桂黔铁路车站、柳州电力公司和国防部第三十兵工厂等。中共柳州城工委一面向全市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一面号召和发动群众实行武装自卫，提出“防止白匪破坏”、“不让白匪破坏”、“动员一切力量，粉碎白匪破坏”③等口号。

11月24日晚，国民党军派出大批工兵和6辆大卡车载满炸药企图炸毁柳州车站。全站职工得到消息，立即动员起来，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军交涉，制止其破坏；一面拿起武器，准备同敌人战斗。国民党军乘交涉之机，将南站的水塔和水泵爆炸。全站职工立刻愤怒起来，拿起30多枝步枪、20多颗手榴弹和木棍、铁铲等武器，成群结队前往南站同敌人战斗。由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迫使敌人仓皇逃走，车站得以保护。

当国民党工兵和两辆十轮大卡车满载炸药准备破坏柳州电力公司时，工人们在市城工委委员韦竟新的指挥下，事先在公司四周架起高高的铁丝网，

---

① 江燮元、张秀川等：《我军入桂林情形》，1949年11月13日，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22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②③ 常工：《与白匪破坏作斗争——记中共柳州工委领导各厂职工英勇护厂经过》，载《广西日报》，1949年12月26日。

组织20多枝步枪的武装护厂队，保护厂区。当敌工兵来到厂区时，工人们将敌人阻于门外，并架起枪严阵以待。经交涉，为稳住敌人，工人们将敌两个头目请到厂部办公室，与其周旋。工人们一面借口发电机有故障，停机检修，一面同敌人软磨硬缠进行斗争。敌人顽固坚持要爆炸掉发电机，工人们提出可以在厂房外出线架下爆炸，以让其“上峰”听到爆炸声。这时，已隐约听到远处传来枪炮声，敌兵神色慌张，护厂队抓住时机大喊：解放军快到了，你们再不走就逃不了啦！同时又将几两金子塞给敌头目。敌兵急于逃命，在机房外面出线架下点燃几包炸药。“轰”的一声，只炸了几个宽深几十厘米的小坑，电厂机器设备完好无损。敌兵随即仓皇逃走，电厂保住了。第三十兵工厂300多名职工从兵器库拿出枪支，同敌人斗争，将敌吓跑了，保护了工厂的安全。柳州的其他工厂、学校、团体，也由于地下党组织群众武装同敌人作斗争而得到保护。

南宁、梧州由于两市党组织的统战、策反工作比较成功，争取了大部分留守的国民党军警，护城工作比较顺利。南宁大部分国民党军警武装按市工委的部署，相继宣布起义、投诚，转而配合地下党保护城市。在解放军入城之前，警察局长唐超寰接受市工委的指挥，派武装保护电讯局、水电厂及重要仓库，并命令警卫人员，如有人破坏立即就地处决。由于争取了中国银行经理钱浮桴，通过他的工作，中国、中央、农民、交通、广西五家银行驻南宁分行都留下了。这些银行原准备把库存的金银运走，中国、中央两行已把贵重的资财装满七八辆大卡车，准备向钦县、北海方向逃跑。解放军入城后，这几家银行把全部资财、账本封存，移交解放军。除了邕江浮桥和机场油库被国民党军焚毁外，其他如电讯、水电、仓库等重要设施未受到破坏。12月4日晚上，解放军开进南宁时，“市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城市主要设施完好无损”。[1]

---

① 阮洪川：《护城迎军在南宁》，载《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39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1月下旬，国民党梧州专员冯璜召开会议，作出执行白崇禧“破坏焚毁公共建筑和水电厂”命令的行动方案。在敌人行动之前，梧州城工委组织全体党团员及广大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护城斗争，指挥已掌握的五支地方武装在各个十字街口设卡修工事，架起机枪，派巡逻队在各街道武装巡逻，严阵以待。各工厂发动工人武装护厂。由于南下解放军迅猛进军的威慑，在市城工委领导的护城武装的严密戒备下，反动当局的毁城阴谋终未得逞。11月25日晚，“当解放军入城时，市民夹道欢迎，掌声雷动，鞭炮不绝。城内一切公共建筑在解放军迅速挺进及员工英勇保护下，未遭匪军破坏”。“发电厂、自来水厂、海关、电报局、电话局及医院等设备均完好。”①

桂、柳、邕、梧人民的护城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的破坏阴谋，配合了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城市，使广西四大城市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这对解放后城市乃至全省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人民解放军进军广西，白崇禧集团覆没

解放军围歼白崇禧集团的战略部署

1949年10月，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在衡（阳）宝（庆）战役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其主力第七军、第四十八军4个师4万余人被歼灭。衡宝战役的惨败，白崇禧的所谓“湘粤联防”被粉碎，狼狈退入广西。败退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5个兵团共12个军30个师的番号约15万人。即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辖第十四、第七十一、第九十七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辖

① 《长江日报》，1949年11月28日。

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①] 第十兵团，司令官徐启明，辖第四十六、第五十六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辖第五十八、第一二五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刘嘉树，辖第一〇〇、第一〇三军。加上逃窜到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4万余人，总兵力近20万人。白崇禧企图依靠其经营20余年的广西老巢，勾结云南、贵州国民党军残余，组织所谓"西南联防"，负隅顽抗，等待美援，同时也做撤退海南岛和南逃越南的准备。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一兵团3个军及第十兵团的第四十六军沿湘桂铁路全县至桂林一线，第十兵团的第五十六军于龙胜境内布防，为第一防御体系；以第十一兵团2个军位于荔浦、龙虎关地区，第三兵团3个军位于恭城、阳朔、信都（今属贺州）地区，组成以桂林为中心的第二防御体系，企图在解放军进攻时节节抵抗，破坏交通，迟滞解放军前进。另以第十七兵团布置于湘桂黔边，企图阻止解放军由桂西北进攻，并保障其通往云贵的道路；由余汉谋残部据守粤桂边，确保向海南岛的退路。

为了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大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从战争全局出发，作了周密部署，制定了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作战方针。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就指出："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②] 后来，毛泽东在几次给第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的指示中又强调了上述作战方针。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第四、第二野战军部署广西战役。

---

① 白崇禧部败退广西后，经过整补，重建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339～340页，北京，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

参战部队共9个军30个师约40万人。10月下旬，第四野战军主力移师湘桂边境，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陈兵广东西部。11月4日，第四野战军作出战役部署：以四野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第三十九两个军共8个师约10万余人组成西路迂回部队，首先袭歼湘黔边靖县、通道之白部第十七兵团，尔后沿黔桂边向西南进攻，占领思恩（今属广西环江县）、河池，关闭白部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以二野第四兵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及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4个军共12个师约18万人为南路，进至信宜、博白地区，防敌往雷州半岛逃窜海南岛，与西路军构成对白部的钳形包围；以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3个军共10个师约14.4万人为中路，集结于湘桂边境，抑留白部于桂林地区，待西、南两路形成钳形合击态势后，适时沿湘桂铁路及其以东地区突进，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

广西战役和全省解放

11月6日、7日，解放军西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从湖南洞口、武冈向靖县、通道发起进攻，揭开广西战役的序幕。国民党军第一〇三军沿黔桂边西逃，解放军乘胜追击，连克永从、从江，解放黎平、榕江，于15日追敌第十七兵团人桂。解放军南路二野第四兵团以第十三军先行，11月10日由广东罗定向廉江开进，兵团主力由广东阳江向信宜开进，22日到达指定地点，从南面对白崇禧集团形成包围。中路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一军于11月14日移驻安东、新宁、全县一线，准备向桂林进攻。



解放军准备进军广西

白崇禧见解放军

西、南两路进军神速，贵阳又被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于11月15日解放，觉察到向云贵逃跑的道路被切断，并作出解放军南路兵力比较薄弱的错误判断，企图利用解放军正面进攻尚未开始、西南两路相距甚远的时机，于11月中旬急令第三、第十一兵团由桂林、荔浦地区南下向博白、玉林、岑溪地区集结，在余汉谋残部配合下，发动“南线攻势”，夹击南路解放军第四兵团，以夺路向海南岛逃窜。同时，令第十兵团沿湘桂铁路南撤，并破坏沿线交通，以迟滞解放军中路前进。又令第一兵团由桂林以北地区西调南丹，阻止解放军西路迂回部队南下。西线被解放军追击的第十七兵团抢占百色，策应南线作战。解放军发觉白崇禧的企图，并鉴于白部西逃云贵的可能性已减少，于是相应调整作战部署。原在广东曲江、广州、新会一带剿匪的四野第四十三军奉命迅速西调至罗定西南地区，以加强南线作战力量。西路迂回部队亦奉命改变行动，第三十八军在11月15日进入广西后分两路向黔桂公路的思恩、河池急进。右路第一五一师先后解放宜北、思恩后，26日向西奔袭，占河池，切断敌西进的道路。左路向果德方向挺进，直插南宁以西地区。第三十九军与第三十八军同日进人广西后，16日奉命停止西进，兵分两路折向柳州、宾阳，直插广西心腹地区。左路第一一五师于18日攻占古宜，22日、23日占融县、太平圩，24日强渡沙浦河，击溃敌第十四军第十师，25日进占柳州，歼敌第四十八军一部2000余人，缴获汽车250辆及大批物资。第一一七、第一五二师随第一一五师跟进，第一一七师占柳城。右路第一一六师于11月23日占罗城后，沿三岔直插柳州以南。



桂北游击队为南下解放军带路

沿湘桂铁路进攻的解放军中路第四十一军，18日开始向桂林进攻。第一

二三师沿兴安、灵川直取桂林，沿途在光华铺击溃敌第四十六军第一七四师，20日、21日占兴安、小溶江，22日晨占灵川，当日下午解放广西省会桂林。第一二二师沿湘桂铁路西侧向大溶江、桂林方向迂回，22日抵桂林五岭圩。第一二一师沿湘桂铁路东侧通过全县，23日进至桂林东南大圩。之后，全军分路尾追向梧州方向逃逸之敌第四十六军,25日占阳朔。第四十五军11月17日从湖南洪桥出发，尾随第四十一军前进，经灵川、桂林、阳朔于27日进抵荔浦。第四十军由湖南零陵、道县出发，分两路插入桂东。第一一九师取道永明入桂，11月19日占富川，21日占钟山，25日解放梧州。第一一八师取道江华入桂，22日占贺县，26日抵梧州。第一二〇师随后跟进，同日到达梧州。至此，解放军已粉碎白崇禧“南线攻势”，歼敌主力于粤桂边的钳形包围已经形成。



解放军解放广西省会桂林



人民解放军进入梧州时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白崇禧投入“南线攻势”的5个军，于11月中旬在岑溪、容县、北流、玉林、博白以南地区展开，下旬开始向解放军南路部队分路进击。第十一兵团以第五十八军向信宜西北之桥头铺、金垌圩地区进攻，以第一二五师由岑溪向东佯动。第三兵团以第七军向信宜、茂名中间地区前进，第四十八军向合江圩进攻，第一二六军向廉江进攻。

根据白崇禧各部的攻势，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部署迎敌作战。以第十三军据廉江钳制敌第三兵团和余汉谋部；以第十四、第十五、第四十三军首先歼灭向信宜方向前进之敌第十一兵团，然后再歼敌第三兵团和余汉谋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对此部署力持异议，11月22日在致四野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如按此部署，廉江防线有被突破，敌主力有被脱逃之危。建议以第四十三、第十五两军合歼敌第十一兵团力量足够，而以第十三、第十四军钳制敌第三兵团及余汉谋部以确保廉江，待北面两军歼敌第十一兵团后，再协力歼敌第三兵团。11月24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陈赓："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内，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①] 第四野战军前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陈赓的建议，调整南路作战部署：第十三军仍在廉江及其东北之中垌圩、合江圩一线；第四十三军从池洞圩、分界圩、石头圩一带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圩、白石圩、怀乡圩；第十四军秘密移至信宜以西之仁厚坡、丹竹坑、大发岭占领阵地，待敌向茂名前进时，以一部占领宝圩，断敌后路，主力由北向南攻击；第十五军待敌前进时，以一部进占壶洞圩，截断敌第七军同第四十八军的联系，主力在南塘圩地区协同第十四军歼敌第七军于南塘附近。

11月27日上午9时，白部第七军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向解放军大发岭、公骑岭等阵地连续猛攻，双方激战5小时，白部遗尸数百具，解放军击落敌机一架，俘敌营长以下400余人，将敌阻于阵地前沿。解放军为在粤桂边大量歼灭白部主力，迅速组织反击。以第十三军和第十四军一部在正面抗击，吸引并消耗敌人；以第十四军大部、第十五军全部共5个师，于27日下午向宝圩出击，首先围歼敌第七军两个师。敌第七军恐被歼，迅速溃退，向清湾圩、

① 《毛泽东关于在粤桂边歼灭白崇禧主力的部署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1月24日，载《广西战役》，13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陆靖圩方向逃遁。同日，白部第四十八军进至合江圩以北长岭，遭解放军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重大杀伤。第一二六军进至太平圩附近，被解放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七、第三十九师迎头痛击，向确圩败退。当晚白部第四十八军第一二六师全线后撤。白部第五十八军第二二六师在东镇圩、白石圩、怀乡圩一带被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击溃，向容县败走。

在解放军强大的反击下，仅一天时间，白崇禧“南线攻势”即告破产。白急令第三、第十一兵团向合浦撤退。解放军乘胜追击，第四十三军28日攻占容县、北流，30日占玉林，沿途歼灭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五十八军大部，击毙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俘敌4300余人。30日，第四十三军一部攻入博白，将敌第三兵团部全部歼灭，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接着，解放军第十五、第十四、第十三军分头向博白、陆川继续追击逃敌，将敌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军包围于博白东南地区，经过激战，除敌第一二六军一部西窜外，其余大部被歼。

当解放军全力围歼白部第三、第十一兵团时，逃亡在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乘隙于11月29日占廉江。当日，解放军第十三军（欠第三十九师）奉命回师歼灭该敌。12月1日收复廉江，全歼守敌，俘粤桂边“剿匪”指挥部中将司令兼第三二一师师长喻英奇以下6000余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九师由确圩经背沙直出龙谭西追逃敌，分别在龙谭圩、松山圩、公馆圩歼敌第六十三军中将副军长郭永镳以下1．4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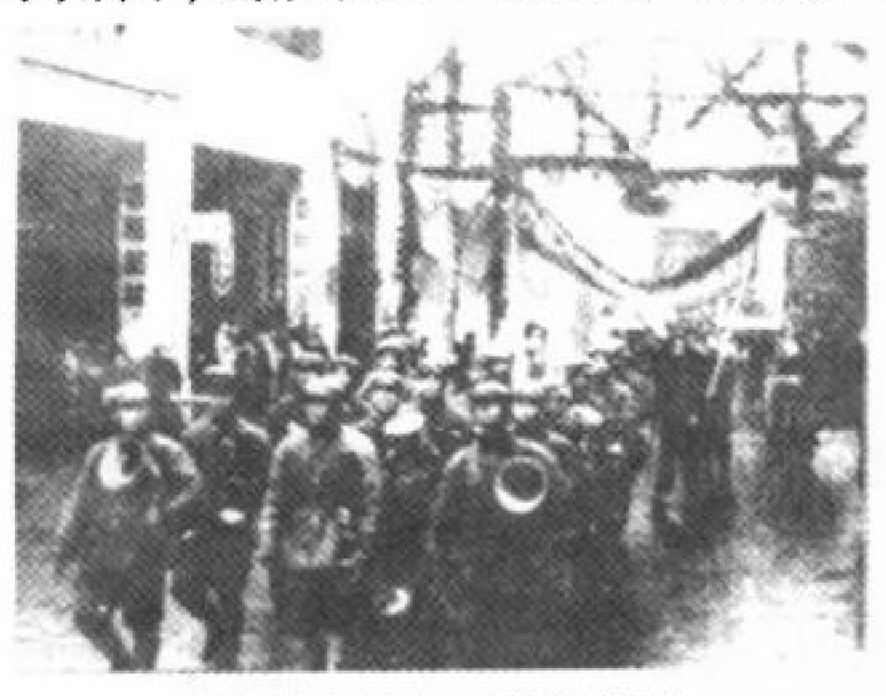
至此，解放军粤桂边第一次围歼战胜利结束。此次作战，打破了白崇禧集团企图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的梦想，使其精锐丧失，部署打乱，陷人总崩溃的境地。

在粤桂边第一次大围歼战的同时，解放军中、西两路大军进展迅速，节节胜利，解放了广西中、西部广大地区。中路第四十一军先后解放了荔浦、蒙山等；第四十五军解放了修仁、鹿寨、雒容、象县、武宣等。西路第三十八军解放了河池、东兰、万冈、百色等；第三十九军解放了忻城、上林、宾阳等。之后，中、西路奋勇向南推进，追击逃敌。

从11月27日至12月1日，白崇禧集团在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围歼和追击下，大量被歼，溃不成军，残部被解放军压缩在粤桂边钦县、龙州一带的狭窄地区。

白崇禧在粤桂边遭到重大打击后，整个部署一片混乱。为了收拾残局，白崇禧急令第一兵团集结于南宁及其以东地区，准备凭借邕江阻止解放军中、西路大军南下，掩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向钦县撤退；命令第十兵团赶赴钦县，掩护各部向南、向西逃跑；命令第三、第十一兵团残部向钦县集结，企图渡海逃窜。

解放军为打破敌人的企图，将白崇禧残部聚歼于粤桂边境的海岸上，各路大军齐头向钦县疾进。南路大军从廉江、博白、玉林等地昼夜不停地奔袭钦县、北海，拦截逃敌。中路军分路兼程南下，猛烈追击。在“绝不让敌人跑掉”、“追上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解放军不顾一切疲劳，日夜兼程，以每日超过50公里，有的超过75公里的速度扑向钦县。沿途歼灭大量敌人，解放了大批城镇。第四十五军在贵县俘敌桂中军政区中将司令王景宋以下1500余人，解放了贵县、横县、灵山、来宾；第四十一军在灵山以北，激战10多小时，将敌第一二五军全歼，俘敌军长陈开荣以下8000余人。第三十八军解放田东、百色、都安；第三十九军解放宾阳后向南宁挺进。12月2日，白崇禧见败局已定，急忙从南宁乘飞机逃往海南岛。4日晚，第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进占南宁，缴获汽车400余辆，炮艇3艘。尔后该部分路向邕钦路追击，途中截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汽车130余辆，船只53艘，歼灭大批敌人。至12月5日，解放军各路将钦县、小董一带之敌团团包围。



南宁各界人士庆祝解放

12月6日下午17时，解放军各部向钦县发起总攻。22时结束战斗，计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队1.2万余人。其中包括4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2个工兵团、1个汽车团的全部和大部，缴获汽车160余辆，火炮42门。

12月7日，解放军围歼小董被困之敌。敌军混乱不堪，纷纷缴械，计歼敌第十一兵团残部，第四十六、第一二五军残部和国防部突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以及交通警察第三纵队等1万余人，缴获汽车100余辆及大批物资。

从12月2日至7日，解放军以钦县为中心的粤桂边第二次围歼战，共歼敌4万余人，白崇禧集团最高指挥机构彻底覆灭。

白崇禧集团大部被歼后，在钦县一带侥幸漏网的第一兵团和第十兵团等残部拼命向中越边境的思乐、宁明地区逃窜，企图逃往越南。

为彻底消灭残敌，解放军接着展开追歼逃敌和清剿溃敌的作战。从12月8日起，第十三、第三十九、第四十三军分别由南宁以南钦防一带向东兴、上思、思乐、龙州、明江地区追击，其余各军主力均就地搜剿溃散之敌。到12月中旬，先后歼灭了敌第一、第三、第十兵团等残余及地方保安团队1.6万余人，解放了桂南边境各县。12月11日，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冒着滂沱大雨，勇猛追击，攻占祖国南大门镇南关（今友谊关），在雄关城楼上插上五星红旗。至此，白崇禧集团除第一、第十七兵团残余约2万人逃入越南外，均被歼灭。



解放军攻占镇南关（今友谊关）

在广西战役中，广西和广东南路地区各族人民和游击武装，在中国共产党桂粤两省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与解放军紧密配合，并肩战斗，为消灭白崇禧集团，解放广西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役发起后，11月15日中共广西省委[1]在解放军进入广西前夕发表《告广西人民书》，号召各地游击队和全省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支援解放军作战，彻底消灭残敌，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全省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迎军南下，解放广西”的热潮。各路游击队主力在全省范围内向盘踞交通要道、城镇、据点的敌人主动出击，为大军南下打开通路。解放军进入本地区作战时，各路游击队积极配合，与解放军并肩作战。如粤桂边纵队所属各支队在解放军于粤桂边围歼白崇禧主力时，根据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的统一部署，积极参与拦截、阻击、追歼逃敌。11月下旬，第三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邕钦公路两侧，拦截南逃之敌。同时调集钦县、防城两县3500余人组成两个民工团，将钦县以北30多公里的公路、桥梁全部破坏，把钦州江、平银江、黄屋屯江以及沿海地区的船只疏散隐藏，使邕钦公路交通陷入瘫痪，从南宁乘汽车南逃的敌军被困在邕钦路上动弹不得。12月3日，从南宁沿邕钦公路南逃之敌，抵达板边龙眼一带时遭到第三支队第二十、二十一团的英勇阻击。5日，第二十一团配合解放军第十三军于平银聚歼西逃之余汉谋残部，俘敌2000余人。7日，第三支队主力配合解放军各部围歼小董一带敌第十、第十一兵团残部。滇桂黔边纵队根据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部的部署，在桂西河池、南丹、东兰一带勇猛拦截敌第十七兵团南逃，使该敌损失严重。

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事前由于离野战军集结地较远，又无无线电台，因而未能和野战军取得联系。但在野战大军到达本地区时，都主动积极与野战军联系，协同解放军阻击、追歼逃敌，肃清残敌。11月下旬，桂中支队获悉野战军解放柳州后，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廖联原即率主力自武宣渡过黔江，北上象县、修仁迎接大军，同大军并肩作战。桂北解放总队副政委阳雄飞得知野战军进军广西的消息后，即到湖南东安，与四野第四十一军首长取得联系，

[1]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广西省委，张云逸任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任副书记。

协商配合作战事宜。桂北总队除抽调部分部队为野战军担任向导外，主要负责解放湘桂铁路以西的资源、龙胜、义宁等县，使野战军不必分兵，全力沿湘桂线南进。左江、右江、柳北、都宜忻等区主要交通线外的县份，野战军未到达，当地游击队就主动发起进攻，消灭残敌，解放县城。11月下旬，解放军从柳州向南宁追歼作战，敌军节节败退时，武鸣县腾翔民兵大队发现邕武路上有散敌溃逃，即在高峰坳至米花坪一带要隘设伏。该大队采取拦前、断后、中间突袭的战术，缴敌军车36辆，军用物资一大批，俘敌官兵、家属300多人。这些军车在追歼白崇禧残部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解放大军进入广西开始至全省解放，各地游击队共参与大小战斗数百次，单独歼敌1万人，解放县城30座。

除了游击队积极参战之外，广西各地群众以各种形式参战支前。从城市到农村，纷纷成立支前委员会、后援会、兵站、粮站、医疗站、运输队、民工团（队）、救护队、慰劳队等，积极为解放军筹粮草、运送物资、当向导、抬担架、救治伤员、修路架桥、打扫战场、看管仓库和俘虏，提供各种战勤服务。如解放军第一二二师途经资源中峰乡时，游击队就组织了1200多人参加支前工作，筹集大米2.5万多公斤，蔬菜1.5万多公斤，木柴1000多担，沿途村庄设立茶水供应点20多处，还派出民工架桥修路。据全县、兴安、灌阳、资源、临桂五县不完全统计，为解放军筹得粮食750多万公斤，稻草255多万公斤，木柴160多万公斤，木材7000多根。桂西地区各县都成立了供应运输团，积极参战支前。桂中地区筹措军粮600万公斤，柴草2500万公斤，食盐1万多公斤。桂中南地区建立了从迁江经宾阳到南宁，从武宣、贵县经横县到灵山和永淳的两条兵站线。十万山区游击队从小董到钦县、合浦的公路沿线筹集军粮100多万公斤，柴草200多万公斤，同时动员了4500多民工、民兵支前。解放军所到之处，都有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敬茶送粮，热烈慰问人民子弟兵。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中共城工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和保护公共设施的斗争，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城市。

另外，各地中共组织和游击队以及进步团体，还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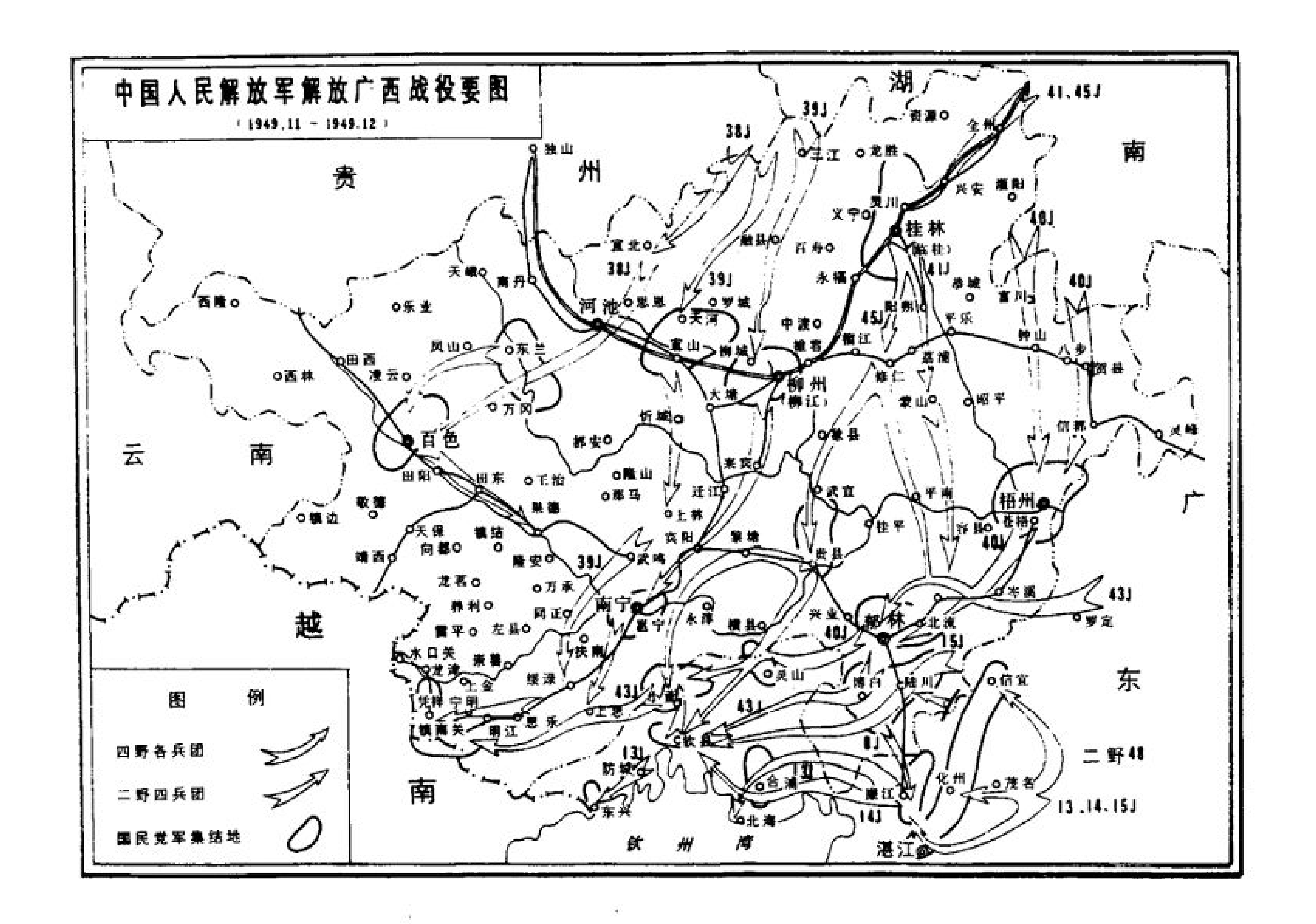
势，协助解放军策动和争取国民党军和党政人员起义、投诚。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12月13日，国民党靖西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赖慧鹏率驻靖西军政人员3000余人在靖西县城宣布起义。同日，国民党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周祖晃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将其所辖部队8000余人交给解放军改编。12月27日，国民党黔桂边军政区中将司令张光玮在西隆县城通电起义，其部2000余人进行改编。1950年1月23日，国民党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莫树杰在南丹县率部2000余人投诚。连同其他小股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共约2万余人。

从1949年11月6日至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行的广西战役，历时35天。解放军在广西各地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优势的兵力，运用大迂回、大包围、大追歼的战略战术，全歼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队及3个兵团部、11个军部、25个整师；大部歼灭2个兵团部和10个师。加上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共计172990人。其中毙伤7754人，俘虏156960人，投诚6276人，起义2000人。此役，国民党军和解放军兵力损耗比例为42:1。解放城市80座，其中广西63座，广东8座，湖南6座，贵州3座。缴获各种大炮1258门，各种枪支53600余枝(挺)，各种炮弹5.6万余发，汽车1170辆。除敌第一、第十七兵团残部及其他零散残敌2万余人逃入越南法占区外，[①] 白崇禧集团全部覆灭。

白崇禧集团的覆灭，标志着新桂系在广西24年的统治彻底崩溃，广西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取得胜利。

---

① 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刘嘉树第十七兵团残部6700余人于1950年2月1日回窜广西边防要地水口关地区。解放军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奉命经两日战斗，将该敌歼灭，俘兵团司令刘嘉树以下5900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西战役要图
(1949.11－1949.12)
贵
州
湖
南
云
南
越
南
广
东
桂林
柳州
河池
百色
南宁
梧州
郁林
湛江
钦州湾
41.45J
38J
39J
40J
41J
45J
43J
13J
14J
15J
二野4B
13.14.15J
图例
四野各兵团
二野四兵团
国民党军集结地

四、广西省人民政府的成立

1949年12月广西解放后，全省开展接管城镇，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首先在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建立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接管城市，逐步接管乡村，摧毁国民党各级统治机构，建立人民政府，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务。

同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并提交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南宁。

3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提交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任命何伟、吴法宪、李天佑、李沛文、李楚离、周祖晃、周钢鸣、邱会作、张一气、张先辰、莫文骅、莫乃群、陈此生、陈岸、陈雄、彭明治、贺希明、汤有雁、黄永胜、黄松坚、黄荣、杨东莼、雷沛鸿、农康、廖联原、刘德懋、卢绍武、谢扶民、谢鹤筹、钟伟、覃应机等31人为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广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机构设置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公安厅、交通厅、文教厅、农林厅、工商厅、土地改革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劳动局、参事室和新闻出版处、卫生处等。

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还设立了南宁专员公署、武鸣专员公署、龙州专员公署、百色专员公署、宜山专员公署、柳州专员公署、桂林专员公署、平乐专员公署、梧州专员公署、玉林专员公署作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

1950年3月建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同时，建立99个县人民政府。随后，各县结合各项运动逐步建立乡村基层人民政权

组织。

在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西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1949年12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三副司令员彭明治，第一副政委莫文骅，第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参谋长曾国华。广西军区隶属第四野战军领导（1949年12月26日改属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广西军区成立后，相继成立龙州、玉林、梧州、武鸣、百色、南宁、平乐、柳州、宜山、桂林等10个军分区。1950年1月12日，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发出整建地方武装的指示。随后，广西各游击队分别编入各军分区独立团、各县大队、区中队，一部分指战员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

广西省人民政府以及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广西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第二十四章　民国时期的广西人口、民族和宗教

民国建立后，尤其是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全省人口呈较快增长之势。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全省人口分布不均衡，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人口较稠密，西部、西北部较稀少。广西人口虽然增长较快，但死亡率也比较高，人均寿命水平较低，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人口。人口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文盲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很大。人口职业绝大多数是农业，工商业很少。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民族。少数民族多集中于桂西、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地区，汉族多集中于桂东南、桂东地区。广西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杂居的传统，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团结和睦。广西少数民族具有反压迫剥削，争取民族平等自由的传统。民国时期，由于新桂系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不断爆发“变乱”，形成少数民族与新桂系统治的严重对立。中国共产党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得到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各族群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广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佛教和道教自东汉开始传入广西，唐宋时期兴旺发达。到了明清佛、道

教受到限制逐渐衰落，民国时期被禁止而更加衰微。但佛、道教已民俗化和巫教化，因而在民间影响广大。伊斯兰教自宋代开始传入广西，逐步发展，但只有定居广西的回族才信仰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是鸦片战争后才传入广西，一直受到广西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但由于有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天主教和基督教发展比较快，对广西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较大。广西各民族除信仰道教、佛教，少数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外，还保留许多民间宗教信仰。

一、人口

广西是我国古人类最早发源地之一，远古时代广西就有古人类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西人口逐步增加，到民国时期呈较快的增加之势。

民国时期，广西人口逐步有比较系统的统计。1925年新桂系执政后，重视对全省人口的调查、统计和管理，将其列入省行政要务。1927年，广西省政府民政厅进行全省人口调查，对全省总人口、各县户口数、人口分布、人口密度、性别比等进行了统计。1931年，广西省政府重新成立后，在民政厅第一科设户政股，主管户政。县政府民政科设一名专司户政的科员，乡镇公所设一名户籍干事，村街公所具体负责户口登记工作。1932～1934年，全省各县在编组乡（镇）、村（街）、甲，建立乡村基层政权的工作中，首先是进行全面的户口调查登记。这是广西在全省范围内第一次大规模的户口全面调查登记，加强了对全省乡村户政管理，为各项事业的整顿和建设做了准备。在这次户口调查登记中，省政府颁布《广西省户籍人事登记暂行办法》，下发簿表格式达28种，令各县遵照办理。这个办法规定，户籍籍别以县为单位，居住船上船民的户籍属常泊县份。户籍编造一般是一家为一户，商店、工厂、公署、学校、会所、社团、庙、寺、祠堂、教堂等分别编为户。户籍人事登

记有迁入、迁出、收养、抚养、监护、结婚、离婚、失踪、死亡、继承等11项。调查登记簿由以上11项内容编订，分正副本，正本在户口调查登记后由乡镇长保存，副本由村街长保管。户口调查表分普通户、公共处所户、外国人居留户3种。户口统计报告表分普通户5种、公共处所户4种、外国人居留户4种、户口变动统计表4种。户口调查编制工作由下而上进行，每甲调查完毕，汇编成全村（街）户口册，继而汇编全乡（镇）、全县、全省户口册，报告省政府。从户口调查登记的内容和要求，可见新桂系当局对此项工作相当重视。白崇禧说："户口调查是办理一切事业的基础，户口调查不好，一切事业都无从着手。"①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亲自督促各县乡各级官员要认真做好户口的调查登记工作。1936~1937年广西省政府加强各地人口变动的登记管理，先后颁布《广西省稽查指导各县户籍人事登记办法》和《广西省稽查居民迁出入办法》。这些办法规定：凡居民迁出其村街者，应于迁出前以书面或口头由甲长报告村街公所，由乡镇公所或警察分局（所）发给迁出证后方得迁出，自行迁出者按情节轻重处以10日以下拘留或10元以下罚金；本省籍内迁入者于迁入时须向迁入的村街甲长交迁出证，由村街长转交乡镇公所或警察分局（所），呈县政府或警察局查核，无迁出证以私逃论，除不准迁入外，按情节轻重处以10日以下拘留或10元以下罚金；外省迁入者，必须有迁入地的村街甲长或其他公务员2人或铺户1家作保，方准居住，并由村街甲长询明其原省县籍及原乡镇公所或警察分局（所）所发证明；对允许迁入的居民，由村街乡镇公所及警察分局即时在人事登记簿上作迁入登记。新桂系当局为加强户籍登记管理，对各级户政人员进行训练。1945年省政府于省训练团内设户政组，调训各县、市、局的户政人员。抗战结束后，各县、市、局对沦陷期间出生、死亡人口及未登记的变动人口补行登记。1948年进一步严格户口登记检查工作，村街公所设户籍登记簿本，各户设户口表，人员外出必须携带户籍登记誊本，以便随时检查。

---

① 《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34页，创进月刊社，1936。

人口变动是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的。民国建立后，广西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的发展。20～30年代，新桂系推进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这期间广西的农业、工矿业、文化教育都有所发展，医疗卫生也比过去有了改善。因此，1912～1949年，除少数年份外全省人口增长比较快。1912年全省175.89万户、916.06万人，1948年增加到296万户、1467.27万人，分别增加59%、62%，平均每年增加3.3万户、15.3万人。① 其中，1912～1926年人口增加幅度较大，由916.6万人增至1063.3万人，年均增人口10.48万人。1926～1931年，人口增加趋于缓和，由1063.3万人增至1077.8万人，年均增人口只有2.9万人。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连年战乱，社会动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增长自然受到影响。1932～1944年，人口急剧增加，由1181.9万人增至1497.07万人，年均增人口26.26万人。② 这是因为1932年至抗战前夕广西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文化逐步发展，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抗战期间，1939～1940年虽有日军入侵桂南，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一定损失，但时间只有一年，地域只有10多个县。当时广西是抗战大后方，社会比较稳定，战区大量难民涌入广西，促进了广西人口较快增加。1944～1945年，日军全面入侵广西，全省80个县市沦陷，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人口由1497.07万人降至1454.58万人。抗战结束后，人口增长回升，1948年增至1467.27万人，比1945年增加12.69万人，年均增人口4.23万人。③

广西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山多平原少，岩溶广布。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四周多山，中部南部多平原。西部、西北部属云贵高原边缘，地势高峻，桂中、桂南、桂东南多为平原或丘陵山地。西部、西北部自然条件比较差、耕地少、交通闭塞，东南部、中部、南部丘陵和平原地带土层较厚，光照条件好，宜农林牧。这种地理环境使广西人口分布和密度极不均衡，桂东南人口分布最多，其次是桂东北，桂西北最少。据1932年的调查，20～40万人的

① 《广西通志·人口志》，2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广西通志·人口志》，2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广西通志·人口志》，2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县有贺县、陆川、柳州、武鸣、宾阳、靖西、怀集（今属广东）、容县、宜山、横县、桂林、玉林、北流、全县、贵县、博白、苍梧、藤县、平南、邕宁、桂平等21个县，主要集中在桂东、桂东南和桂南，桂西、桂西北极少。10万人以下的县有义宁（今属灵川）、中渡（今属鹿寨）、宜北（今属环江）、雒容（今属鹿寨）、果德（今属平果）、绥渌（今属扶绥）、西林、田西（今属田林）、天峨、乐业、万承（今属大新）、养利（今属大新）、同正（今属扶绥）、左县（今属崇左）、崇善（今属崇左）、上金（今属龙州）、凭祥、明江（今属宁明）、宁明、思乐（今属宁明）、龙胜、罗城、百寿（今属永福）、永福、恭城、富川、榴江（今属鹿寨）、修仁（今属荔浦）、蒙山、信都（今属贺县）、天河（今属罗城）、思恩（今属环江）、南丹、河池、忻城、迁江（今属来宾）、隆山（今属马山）、那马、隆安、扶南（今属扶绥）、上思、西隆（今属隆林）、凌云、凤山、东兰、百色、万冈（今属巴马）、平治（今属平果）、敬德（今属德保）、向都（今属天等）、镇边（今属那坡）、雷平（今属大新）、龙茗（今属天等）、龙州等54个县，大都集中在桂西、桂西北、桂西南、桂北地区，桂东、桂东南极少。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0人以上的县有钟山、怀集、邕宁、全县、桂林、苍梧、藤县、岑溪、平南、容县、桂平、兴业、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宾阳、横县等18个县，绝大部分集中在桂东南地区。每平方公里40人以下的县有宜北、西林、田西、凌云、天峨、乐业、万冈、思乐、龙胜、信都、罗城、南丹、河池、西隆、凤山、百色、百寿、昭平、融县、思恩、忻城、迁江、都安、隆山、果德、绥渌、上思、田东、平治、镇边、养利、同正、上金等33个县，大都集中在桂西、桂西北和桂西南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玉林县，每平方公里184人，其次为陆川、岑溪，每平方公里分别为142人和145人。人口密度最低的是西林县，每平方公里5人，次为凌云县，每平方公里10人。①

民国时期，由于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逐步发展，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

① 《广西年鉴》（第二回），137～139页，南宁，广西统计局，1935。

加。抗战前人口最多的是南宁，1933年7.73万人，其次是梧州和桂林，均为5万人。人口1万～4万人的有柳州、龙津、全县、平乐、荔浦、桂平、贵县、宜山、百色等县城。人口5000～1万的有兴安、灌阳、平南、容县、武宣、玉林、北流、宾阳、横县、永淳（今属宾阳）、凌云、田东、天保（今属德保）、靖西、藤县等15个县城。1933年全省城市人口共60.3万人，占当年全省人口5%左右。抗战期间，广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当时省会桂林在广州、武汉等沦陷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战区一批工厂先后迁入，大批文化人云集，成为西南重要工业区和闻名的文化城，人口急剧增加，1943年增至30.6万人。其次是南宁和柳州，1937年南宁人口增至10.89万人，1939年日军入侵，人口锐减，1941年仅5.7万人。柳州人口在1937年至1945年由4.42万人增至9.47万人。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境内少数民族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大多数集中在桂西、桂西北、桂西南、桂中各县。民国时期开始有少数民族人口的记载，但是由于新桂系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把少数民族视为“蛮”族，使许多少数民族人口不敢申报自己的族籍。新桂系当局在人口统计中，认为壮族大半已与汉族同化，仅把所谓未与汉族同化的部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称为“特种民族”，即“僮、瑶、苗、侗、伶、倮儸”6个少数民族。据统计，1934年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为322411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2.47%。1938年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为322631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2.28%。1942年少数民族人口有所增加，为370711人，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2.49%。1946年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639642人，占当年全省总人口的4.38%。[①] 从这些数字来看，即使新桂系把广大壮族当做汉族而不计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体上还是呈增长之势的。根据人口学者的研究统计，民国时期广西壮族人口是：1927年468.6万人，1937年672.2万人，1949年

① 《广西通志·人口志》，3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837.5万人，1927~1949年，壮族人口增加了386.9万人，增长78.72%。[①]

民国时期广西人口增加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流行早婚。男女一般在15~16岁就结婚，甚至更早些，一些地方还有童养媳旧习俗。由于早婚，妇女生育年龄比较小。据统计，1937年全省婴孩母年龄11~15岁2361人，16~20岁28062人。但是，广西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伤寒、赤痢、肺痨、疟疾、天花、血吸虫等流行病得不到控制，严重威胁人民的健康，加上天灾、战乱，人口死亡率比较高，有的年份死亡率还高于出生率。如1938年和1942年，全省总人口分别是1413.05万人和1485.96万人，出生人数和出生率分别是22.88万人、16.19‰和24.73万人、16.64‰，而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分别是23.47万人、16.61‰和25.23万人、16.98‰。[②] 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明显，以三江、东兰、上思、崇善、天保、镇边、田阳、田东、天峨、田林10个少数民族聚居县为例，1937~1942年6年间出生人数为8.09万人，死亡人数为7.67万人。1938年、1939年两年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出生人数分别为12940人和4403人，死亡人数分别为13090人和5390人。[③] 由于死亡率比较高，民国时期广西人口平均寿命水平比较低，1937~1938年全省人口平均寿命只有47.8岁。人口增加比较快，而寿命水平低，使广西人口年龄构成基本属于年轻型人口。据统计，1932年义宁、百寿、永福、蒙山、岑溪、三江、融县、柳州、迁江、都安、隆山、武鸣、横县、邕宁、扶南、绥渌、西林、凤山、镇边、养利、同正、上金、宁明、龙胜、钟山、榴江、宜北、永淳、崇善、灵川、怀集等31个县，总人口296.99万人，其中0~5岁44.37万人，占总人口的14.94%;6~12岁45.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37%;13~19岁49.96万人，占总人口的16.82%;20~40岁93.64万人，占总人口的31.53%;41岁以上的63.35

① 肖永孜：《壮族人口》，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② 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57、58、5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③ 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59页。

万人，占总人口的21.33%。[①]

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的文化程度比较低。1912年，全省人口每千人中只有6.2个在校小学生，1926年每千人中在校小学生增加到24人。1931年后广西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全省人口文化程度有所提高。1933年全省人口每千人中在校小学生51.2人，在校中等学校学生1.3人，在校高等学校学生每万人中有0.4人。1943年是广西教育发展的高峰年，全省人口每万人中在校高等学校学生为2.2人，每千人中在校中等学校学生为4.6人，在校初等学校学生为121.1人。1944年日军全面入侵广西，各级各类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失。是年全省人口每千人中在校小学生降至45.2人，在校中学生降至1.8人。[②] 抗战结束后教育恢复，在校学生有所回升，但始终不及1943年以前。

民国时期，广西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观念盛行，使全省人口性别比例失调。1933年全省总人口1286.18万人，其中男性为700.6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4.48%，女性为585.5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5.52%，性别比为120。性别比较高的县份大都集中在桂北、桂东南、桂南地区，大部分县性别比都在120以上，最高的是博白县，性别比为154。桂西各县性别比较低，如田东、养利、隆安、凌云、同正、宁明等县，性别比均在100以下。抗战后全省性别比有所下降，1945年全省总人口1454.58万人，其中男性为760.1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2.26%，女性为694.3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7.74%，性别比为109。性别比高的仍然是桂北和桂东南地区，大部分县在109以上，最高的是灌阳县146，次为博白县143。桂西、桂西南性别比仍比较低，最低是果德县92，次为左县93。[③] 这些情况表明，民国时期广西汉族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比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盛行些。

由于民国时期广西工商业和文化还比较落后，广西人口除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市外全省人口职业构成主要是从事农业。据广西全边边防督办

① 《广西通志·人口志》，2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广西通志·人口志》，2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广西通志·人口志》，2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署1933～1934年对绥渌、上思、镇边、靖西、雷平、龙茗、镇结、万承、养利、同正、左县、崇善、上金、龙州、凭祥、明江、宁明、思乐等18个县人口职业的调查，在总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62.98%，从事工业生产的占2.03%，从事商业的占3.06%，从事文化教育（含学生）的占3.1%，从事军界的占0.48%，从事政界的占0.10%，从事医务卫生的占0.04%。在18个县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最多的是绥渌、左县、万承3个县，所占比例均在该县总人口的80%以上。[①] 其他地区人口职业构成同18个县的情况大致差不多，从事农业生产比重最大。

二、民族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民族分布呈互相交错杂居的状况。汉族主要集中在桂东、桂东南各县，少数民族大多数集中在桂西、桂西南、桂西北、桂中各县。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由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等部落发展而来，后有“乌浒”、“俚”、“僚”、“僮”等他称，自称有“布僮”、“布僚”、“布曼”、“布板”、“布越”、“布雅伊”、“布沙”、“布土”、“布陇”、“布泰”等20多种。解放后经过民族识别，并遵照本民族意愿统称为“僮”，1965年改称为“壮”。壮族人口分布很广，主要集中在桂西、桂西南、桂西北和桂中地区，还有一部分散居在其他地区各县，壮族分布地区约占全省98个县中的81个县。壮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

① 《广西通志·人口志》，3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壮族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历史上壮人曾仿汉字创造了一种方块壮字，称“土俗字”，但未广泛通行。解放后创制了拉丁字母的壮文，并逐步推行。


壮族妇女

汉族是广西人口最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桂东、桂东南地区，一部分散居在其他地区。汉族自秦代起陆续迁入广西。广西汉人的来源，有随军南征驻戍留下的，有躲避战乱迁徙而来的，有历代统治当局组织的屯田、移民或流放充边落籍的，有因经商谋生而流人的。广西汉族称谓较多，有以原居住地而称的，如“北人”、“中原人”等；有以祖籍而称的，如“粤人”、“湖广人”、“福建人”、“江西人”等；有按土客所属而称的，如“客”、“客人”等；有以使用语言而称的，如“官人”（指讲“官话”的人）、“白语人”、“平话人”等数十、百种。广西汉人基本上操汉语，汉语方言主要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话、平话、湘语、闽语等6种。广西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往很多，关系融洽，出现了一部分汉族受少数民族同化的现象。


瑶族瑶王

瑶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一，自隋唐开始由湖南和广东迁人广西，到明代广西成为瑶族主要居住区。瑶族主要分布于桂东北、桂西北地区，全省98个县中61个县有瑶族居住，其中以桂平、武宣、象县（今象州）、修仁

(今属荔浦)、蒙山、平南之间为最多，义宁（今属灵川）、兴安、全县（今全州)、灌阳、贺县、宜山、南丹、东兰、都安、平治（今属平果)、田东、万冈（今属巴马)、凌云等县次之。大分散、小集中是瑶族分布的特点。瑶族大多数居住山区，东部有大瑶山，西部有都阳山，南部有十万大山，故有“粤西无山不有瑶”之说。瑶族是广西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族的一个民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瑶族自称有“优勉”、“金门”、“布努”、“拉珈”等。因居住分散，经济生活、居住条件、服饰等不同，他称有“盘瑶”、“过山瑶”、“山子瑶”、“八排瑶”、“坳瑶”、“茶山瑶”、“白裤瑶”等几十种，解放后统称为瑶族。



苗族姑娘

苗族是我国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唐宋以后陆续由湖南、贵州迁入广西。苗族分布于龙胜、三江、融县（今属融安、融水)、西林、凌云、东兰、恩隆(今属田东)、上思、都安、南丹、罗城、宜北（今属环江)、上林、思乐（今属宁明)、明江（今属宁明)、镇边（今属那坡)、田阳、西隆（今属隆林）等18个县。广西苗族自称“木”、“蒙”、“达吉”等，他称有偏苗、白苗、红苗、花苗、清水苗、栽羌苗、草苗等。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部分苗族有自己的文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族因居住分散，造成各地语言差异较大，形成了几种方言和土语。苗族大多数群众能说汉语。

侗族是我国南方古越人的一个支系。侗族多居住于溪峒，因此在古籍中将侗族称为“峒”、“峒人”、“峒民”，到清代演变为“侗”，民国时期称为“洞人”、“洞家”、“洞民”。侗族自称为“金”、“更”、“干”等。解放后统称为侗族。侗族主要分布于龙胜、三江、义宁、罗城、融县等，分布特点是大聚居、小分散。侗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侗语


侗族青年

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广西侗族属于南部方言区。解放后创制了拉丁字母的侗文。

仫佬族是广西土著民族之一，源于中国古代百越族群。秦汉时称为“骆越”、“西瓯”部族，元代被称为“木娄苗”、“木娄”，明以后称为“伶”、“姆佬”、“木佬”。解放后定称为仫佬族。仫佬族主要聚居在罗城县，一部分散居于宜山、融县、柳城、忻城、都安、柳江、河池等县。仫佬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仫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仫佬族语中吸收了不少汉、壮语词汇，大多数仫佬人会讲汉语和壮语，通用汉文。

毛南族也是广西土著民族之一，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族群。在古籍中称为“茅滩”、“茅难”、“冒南”、“毛南”等。解放后定名为毛难族，1987年改称毛南族。毛南族主要居住在宜北（今属环江）、思恩（今属环江）、河池、南丹、宜山等县。毛南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无文字。毛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毛南人多半会壮、汉语，并使用汉字。毛南族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诸方面同水族、侗族、仫佬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语言很接近。毛南族人口较少，1949年以前只有1.5万人左右。

京族是中国南方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自称或被当地汉、壮人称为“安南”，解放后称越族，1958年定名为京族。广西京族自明代由越南涂山迁入广西，定居于防城县及附近的钦县（今钦州）、东兴等地。京族讲京族语，多数人兼讲粤语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很早就使用汉字。

回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族，自宋代陆续迁来广西，主要散居于桂林、柳州、南宁和灵川、永福、鹿寨等地。回族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在城市自成街区，在农村自成村落。广西回族人口很少，1949年以前只有1万人左右。回族人民同汉族长期交往，已学会讲汉语，使用汉文。

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在回民聚居区都建有清真寺。回民吃牛羊肉，忌吃猪肉。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但居住在广西的彝族很少，人口只有几千人。彝族是中国古代西北羌民族中的一部分，广西彝族是明代从云南迁入广西的，主要居住在西隆（今属隆林）、那坡等县。历史上彝族被称为黑彝、白彝、红彝、倮族、倮倮等，解放后统称为彝族。彝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广西彝族讲彝语，多数会讲汉语。民国时期彝族文化很落后，懂得彝文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文盲。

水族是岭南的土著居民，其先民属古代百越族群的一部分。广西水族人口很少，解放前只有几千人。水族自称为"虽"(sui)，清代称为"水家"，解放后定族名为水族。广西水族主要聚居在南丹、宜山、融县、河池等县。水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族群众也会讲汉、壮等语言，使用汉文。

仡佬族历史悠久，其先民是古代的僚人。仡佬人自称"图里"、"牙克"，古籍中有"仡佬"、"葛佬"、"仡僚"等称谓，解放后统称为仡佬族。仡佬族是清代从贵州迁入广西的，主要聚居在西隆、西林县，多与壮、汉、苗族杂居。广西仡佬族是广西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到1990年为2500余人。仡佬族有自己的语言，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仡佬人还会讲汉、壮语等，没有自己的文字，很早就会用汉文。

广西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各民族由于文化渊源不同，有各自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民族特点，呈现多姿多彩、丰富绚丽的民族文化。但广西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杂居的传统，自古就有"高山瑶，矮山苗，壮侗住山槽"的杂居格局，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民族互相同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有深刻影响，同时汉族受少数民族同化的现象也很突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会讲汉语，使用汉文，汉族不少人也会讲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的人还会讲几种语言。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隔阂、纠纷，甚至冲突，但大部分时间是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开发和建设广西，不断促进广西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民国时期新桂系的民族政策仍是这一政策的延续。新桂系视少数民族为“蛮”族，把瑶、苗、侗等族统称为“特种部族”（简称“特族”）。认为壮族大多数已被“汉人同化”，不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还存在的“僮族”，是没有被同化的少数壮人。由于少数民族受到歧视，许多壮族不敢申报自己是壮族。新桂系认为大多数壮族已经“汉化”，所以在人口统计中不把广大地区的壮族列为少数民族，壮族分布仅剩下义宁、龙胜、钟山、忻城、宜山、罗城等县，人口不足2万人。这些尚未“汉化”的壮族和瑶、苗、侗族等一样被列为“特种部族”。据新桂系当局的统计，1934年全省“特族”总人口只有32.26万人。[①] 新桂系首脑在演讲中和政府公文中，提到少数民族时常常使用“獞”、“猺”、“猓玀”、“狪”、“狝”、“犵狫”等称呼。这些侮辱性的称呼意指少数民族“顽愚不化”。新桂系对未“汉化”的“特族”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1931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各市县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禁止和取缔少数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如将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圩、抢花炮等列为“陋俗”，后来连穿耳、送红蛋、外婆送鸡米之类也被指为“陋习”、“伤风化”。1936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乡村禁约》，明令“凡麇集歌圩”者处以5元以下罚金或5日以下拘留。[②] 同年12月又颁布《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针对少数民族的风俗规定：“男女衣冠履带及一切服饰，须购用国货，男女蓄发不得过颈，女子留发过颈者，须结束，不得披散，并不得奇装异服，违者处以1元以上15元以下之罚款。”[③] 新桂系当局甚至强迫少数民族改着汉族服装、剪发，强迫少数民族姑娘与汉族通婚。

新桂系强迫少数民族“同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推行“特种部族教育”（简称“特教”）。

早在清末，广西统治当局就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学校，“开化”少数民

① 《广西年鉴》，第三回，上册，195页，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② 《广西省政府公报》，123期，广西省政府，1936。

③ 亢真化、梁上燕：《改良风俗的实施》，32页，民国周刊社，1938。

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令饬两广学务处在百色创办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中学堂建成,名为泗色中学堂,招收泗城府(辖今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天峨等县)以及百色厅(辖今百色、田东、巴马等市县)所属各县学生。光绪三十四年,镇安府(辖今靖西、德保、田阳、平果、那坡、天等等县)以该府独立办学不易,请准以盐税岁入拨充泗色中学堂经费,增收镇安府学生入学。于是泗色中学堂改名为泗镇中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平乐府在修仁县创办开化小学,招收金秀、白沙、六拉、昔地等瑶村子弟人学。光绪三十四年,桂林开办土司学堂,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等兼政法三级。学生由辖有土属的府、厅、州从土官子弟中选送。清宣统元年(1909年),平南县署在罗香、逻运、平林、六竹四个瑶村各办义学一所。宣统三年,4所义学并为两间"化瑶小学"。此外,龙胜、都安等县也在一些瑶壮山村开办小学堂、简易小学和私塾。广西当局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是通过办学"同化"少数民族,但这些学校为少数民族培养了一些有文化的人,有的是本地区第一代有文化的人。后来由于经费困难或被挪作他用,这些学校开办后不久就停办。

新桂系的"特教"是清末广西当局"开化"少数民族的继续。1931年,新桂系当局派遣国民党党政研究所毕业生到平南所属大瑶山南部瑶族聚居的罗香和桂平所属的大瑶山西南部聚居的横冲,开办"化瑶小学"。1932年4月,广西省政府制定《广西苗、瑶民户编制通则》中规定,凡苗瑶乡村要设立特种学校。1933年2月,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特种教育实施方案》。次年1月,成立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特种教育。开展特种教育,首先要培养师资,为此,1935年1月在南宁成立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向全省少数民族地区招生。该所的宗旨是:"根据三民主义的教育原则,养成特种部族之师资,俾统一其政治思想,发扬其固有美德,促进其生产技术,改善其生活,而达到民族之统一。"①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讲得更清楚,他说开办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选取特族子弟入学,期以开化学子为先锋,推

① 刘介:《广西特种教育》,41页,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进整个特族社会之改进，达到同化合作之目的”。[①] 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开办初期，学制不作硬性规定，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实际规定修业年限，1~3年不等。课程有国语、算术、教育、自然、社会、卫生、心理建设、体育、劳作、艺术、医药常识等科，各科讲义由教师编制。学生入学后，膳宿、制服、帐被、课本、文具等由学校供给。1937年7月，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迁到桂林。1942年3月，教育部以该所办学有成绩批准升格改名为桂岭师范学校。桂岭师范学校一直办到1949年，毕业生500余人，大部分是苗、瑶、侗、彝、壮等少数民族。1951年该校改名为广西民族师范学校。

30~40年代，新桂系当局除开办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桂岭师范外，还在一些县的中学、师范、国民中学等附设苗瑶特别班、边地师范班，培养少数民族小学师资。新桂系开办特种部族教育，是根据其“同化”方针办理的，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歧视的教育思想，但新桂系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桂系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不断爆发“变乱”。新桂系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则采取武力镇压政策，形成了少数民族同新桂系统治严重对立的局面。

壮族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民族。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从1921年开始在东兰领导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建立农民武装和革命政权，进攻东兰县城，沉重地打击了新桂系的统治。韦拔群被毛泽东赞誉为“读了半本马列主义，红了半个中国”。[②] 1929~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壮、汉、瑶等各族人民纷纷参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掀起壮族地区革命斗争的新高潮。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以壮族战士为主的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抗击新桂系军队的“围剿”。抗战时期，壮族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战

① 引自刘介《广西特种教育》，2页，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② 《中国少数民族》，5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争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壮族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组织游击武装，打击新桂系的反动统治。1947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桂东北、桂北、左江、右江、桂中、桂中南、桂南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壮族群众纷纷参加战斗。以壮族为主体的右江起义，攻占了万冈、凤山两县县城和20多个乡公所，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949年，壮族人民更加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向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大军到达壮族地区时，壮族群众积极筹集粮草，运送弹药、伤员，充当向导，提供情报，协助解放军接管城镇，维持治安，主动配合解放军堵截、围歼、追击国民党军。壮族人民为消灭国民党军残余，解放广西做出了积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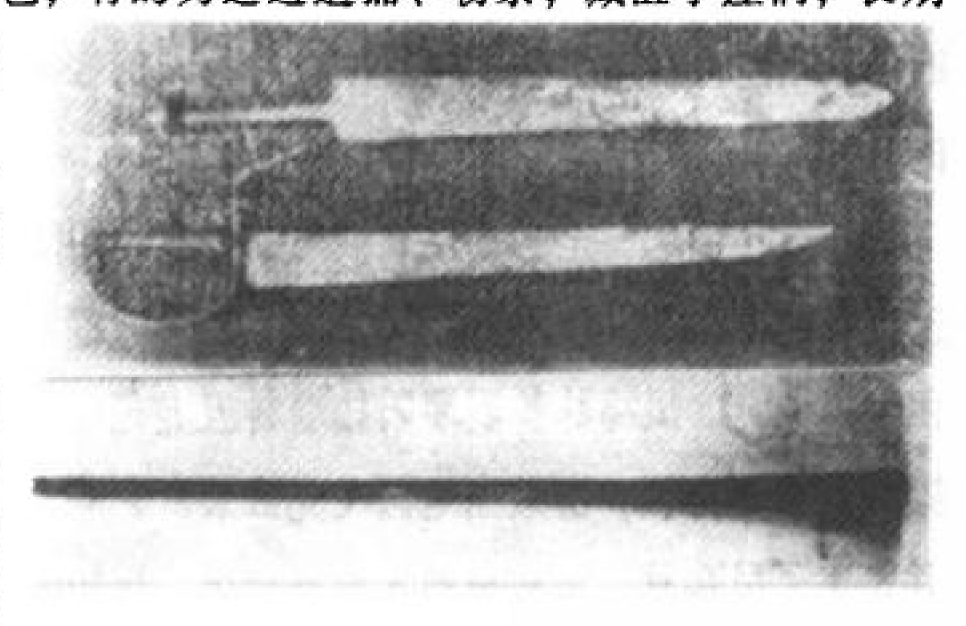
瑶族富于强烈的抗争精神。瑶族是我国历史上迁徙较多的民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严重歧视，被驱赶到崇山峻岭，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生活十分贫困。新桂系统治时期，瑶族被强制“同化”，受压迫很深重。为求生存，瑶族人民多次被迫武装起义，反抗新桂系的残酷统治。

1933年2月，桂北兴安、全县、灌阳、龙胜等县瑶族人民无法忍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在凤有林、凤福林、凤福山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1932年春起，全县瑶民领袖凤福林等利用“降神”、“打醮”等宗教形式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准备起义。同年9月，灌阳瑶民因税捐和水源问题与民团发生冲突。凤福林等到灌阳盐塘村五龙庙“点兵祭旗”，率队攻打罗家坪。第一仗旗开得胜，击败当地国民党武装。新桂系当局以谈判停火为名，诱捕并杀害了凤福林。凤福林被害消息传出，瑶民义愤填膺。次年2月21日，全县、灌阳、兴安、龙胜等县瑶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瑶民提出“讨还血债”、“杀财主佬，杀官兵”、“到平原地方去，耕好田、住好房”[1] 等口号。几天之内，广大瑶民纷纷拿起大刀、矛、鸟枪等武器参加战斗，队伍发展到

[1] 《广西瑶民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17、24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

数万人。起义军分别进逼、围攻灌阳、全县、龙胜县城，桂林震动。灵川、义宁、永福、榴江、荔浦、蒙山、阳朔、修仁、平乐、百寿等县的瑶民也行动起来，准备参加起义，“赤愤负刀，欲趋灌阳”。后因全、兴、灌起义很快失败，才“不及暴发”。[①] 桂北瑶民起义还波及湖南，道县、江华、永明等县瑶民“蠢蠢欲动，大有湖南广西两省瑶民同时叛乱之势”。[②] 瑶民起义震惊了国民党统治，新桂系急调正规军第七军第十九师和桂北各县民团进行“围剿”。各县起义军以简陋的武器据险顽强抵抗，同国民党军、民团武装进行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起义军寡不敌众，加上指挥不统一，最后被各个击破。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武装在瑶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大肆烧、杀、抢、掠。据解放后1954年的调查统计，兴安、全县、灌阳3县40多个乡村被烧毁房屋619座，被杀害群众439人，其中瑶族373人，汉族66人。[③] 这次瑶民起义失败所遭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国民党军不仅烧房杀人捕人，就是鸡、豕、牛、犬也在格杀之列，连锅也被砸碎。起义失败后，许多瑶民无衣无食，被迫离乡背井，去打短工、行乞，有的为逃避追捕、勒索，藏匿于崖洞，长期过着野人的生活。镇北老村竟有一半人流离他乡寻食。起义失败后瑶民生活濒于死亡的边缘。



桂北瑶民起义使用的武器

桂北瑶族人民虽然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但他们没有屈服。1934年秋，兴安、全县、灌阳瑶民在中国

① 谢祖莘：《绥靖兴全灌龙瑶变始末》，25页，广西省政府民政厅，民国时期。

② 《七军年刊》，5页，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司令部，1935。

③ 《广西瑶民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2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工农红军长征的影响下，又酝酿起义。兴安瑶民起义军逼进县城，新桂系调集第七军第十九师再次前往“围剿”。国民党军疯狂捕杀起义领导人和群众，起义最后失败。

1940～1943年，金秀大瑶山掀起反对新桂系武装“开化”的斗争。1930年后新桂系逐步将其统治势力伸进大瑶山。1933年桂平县政府任命“瑶王”李荣保为十八山区区长（后改为木山乡乡长）。随后，新桂系对大瑶山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将大瑶山分别划归桂平、象县、平南、蒙山、荔浦、修仁、武宣七个县管辖，编组乡村，委任乡村长，建立乡村甲行政组织。大瑶山瑶族人民对新桂系强行“开化”强烈不满，开展反“开化”斗争，“瑶还瑶，朝还朝”，维持老石牌制度。① 由于瑶族人民的反对，新桂系“开化”大瑶山受阻。1940年初，新桂系利用抗战局势紧张，在大瑶山中心金秀设立金秀警备区署，委派潘耀武为署长，将桂平、象县、平南、蒙山、荔浦、修仁、武宣各县管辖的瑶区划归金秀警备区署管辖。同年8月，潘耀武率军警300余人在平乐民团区副指挥官蒋铁民和蒙山县副县长张天才所率数百民团武装的配合下，强行攻占了金秀。潘耀武进攻大瑶山，所到之处焚烧村寨房屋，拘捕瑶民，抢掠猪、牛、鸡、鸭，瑶民家中财物被洗劫一空。潘耀武在金秀一年，强迫瑶民改变风俗习惯，禁止瑶民穿民族服装，欺侮瑶民，强奸妇女，勒索钱财。潘耀武为非作歹，民愤沸腾，一年后潘便离职他往。1942年广西省政府将金秀警备区署改为金秀设治局，委任刘延年为设治局局长。刘到职后强化对大瑶山的统治，强征瑶民当夫役建新局址，修路、运粮等。尤其是强行推行民族“同化”，刘延年亲自率军警拿剪刀在村头巷尾乃至冲进瑶民家

① 石牌制度是大瑶山地区为保护瑶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秩序，防御外侮和匪盗，调解民族内部纠纷建立的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个村子为小石牌，几个村子为大石牌，整个大瑶山为总石牌。每个石牌有石牌头人，由当地群众选举产生。由石牌头人召开石牌会议，制定法规，称石牌律，石牌律的条文写在木板或刻在石牌上，由石牌头人负责执行，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处分。

里，强迫瑶族妇女剪发改装，抢走民族装饰品，指使部属强行与瑶族姑娘通婚。刘延年的倒行逆施，引起瑶民极大愤慨，瑶民曾多次向广西省政府请求查办刘，均无结果。1943年3月31日，不堪忍受欺压的瑶族人民在全金标领导下爆发武装起义。是日拂晓，全金标率领武装队伍围攻金秀设治局，一举缴获设治局步枪40枝，击毙军警4人，包围设治局局长刘延年。龟缩在一座炮楼里的刘延年一面向广西省政府和邻县发报求援，一面向起义军施展停战谈判。次日，修仁、平南、荔浦、象县、榴江等县民团陆续赶到，刘延年即撕去伪装，对起义瑶民展开血腥镇压。各县民团到达后，闯进各村寨，搜捕起义领导人和群众，焚烧房屋，抢掠财物，宰杀牲畜。起义领导人全金标和瑶民14人被枪杀，300多人被关押。许多参加起义群众的房屋被烧毁，金秀、六拉、昔地、白沙4个村子被烧毁的房屋就有40户。起义瑶民被掳掠的财物，计有耕牛135头，猪198头，鸡1500只，禾把4.06万把，衣服2977套，被褥810床，布832尺，花带1220条，油150公斤，盐3250公斤，鸟肉鲊0.725万公斤，大米2500公斤，稻谷1.215万公斤，东毫4400元，熟银13公斤，铜钱2500公斤，板枪、鸟枪、粉枪、土步枪300多枝。①

瑶民起义被镇压后，金秀村瑶民推举36名代表赶到蒙山请人写状文，向广西省政府控告刘延年的罪行。新桂系为缓和瑶民的反抗，被迫将刘延年调离金秀。解放后1955年，根据瑶族人民的申诉和强烈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延年死刑。

苗族人民反压迫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为维护民族的生存，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在历史上苗族人民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抗斗争和武装暴动。反动统治者诬蔑“苗人发苗疯，三年一小发，十年一大发”。② 苗族大都居住山区，生活很穷困。新桂系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征粮、征夫，使苗山人民苦

---

① 陈胡雄：《刘延年镇压瑶民的罪行》，载《广西文史资料》，第28辑，197页，南宁，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

② 贾文彬、韦明山、贾文质：《融水寨劳苗民暴动始末》，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38页，1988。

不堪言，有的被迫逃往异地，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沦为乞丐四出讨食。为了生存，30～40年代苗族人民多次爆发以抗征为主要内容的斗争。

1934年融县政府强征16～50岁的苗民壮丁去当兵，55岁以上的去当运输队，60岁以上的做打草鞋等劳役。国民党政府的“三征”遭到苗族人民的抵制。首先是苗族聚居的四安乡雨蒲村寨捞屯苗民起而抗争，他们召开“埋岩”[①] 会议，决定抵制国民党的征兵。融县政府派几十名军警到寨捞屯进行威胁，并抓走贾文隆、贾桥补等人。贾文隆等人被抓，在苗民群众中激起更大愤慨，准备武装抗争。融县政府慑于苗民反抗，不得不暂缓征兵。

1937年，国民党政府强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征兵措施，采取“两丁抽一，三丁抽二”的办法，凡18岁的男壮丁都要抽签，抽中者都得去当兵。是年秋，融县政府再次派军警到四安乡强行征兵。寨捞屯贾老喜联络培秀、洋滥、水桑、知统、高土、茶塘、岩板、乌涌、乌翁、乌吉、吉曼等村寨，举行埋岩大会，饮血誓盟，武装反抗国民党强行征兵。融县政府得知寨捞屯苗民酝酿暴动，调集民团特编队前往镇压。寨捞屯苗民利用元宝山悬崖陡壁的险要地势，准备木石，设卡防守。当民团100多人进攻时，守卡苗民从山上往下滚木擂石，山下团丁乱作一团，死伤多人，被迫撤退。民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驻融县第五团管区司令部调遣四个中队和一个机炮连正规军300多人开赴寨捞屯“围剿”。贾老喜见进剿军来势凶猛，指挥苗民疏散隐蔽。进剿军入村抓不到人，又抢不到东西，恼羞成怒，放火烧村，一连烧了寨捞、岩板、乌翁三个村寨，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事后，融县政府以抚恤死伤团丁为由，勒令寨捞屯苗民赔偿120多元银元。由于苗民的抗征斗争，融县政府被迫在寨捞地区停止“三征”。

1938年，地处黔桂边境的罗城县杆洞乡苗民也爆发了抗征起义。苗民潘正德率领起义队伍把率军警到杆洞乡强行征兵的罗城县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

---

① “埋岩”，亦称“竖岩”，是苗族议定和执行习惯法的群众性组织，由寨老主持。“埋岩”对维护苗族社会秩序和保护苗民生命财产具有重要的作用。

唐继熙及其部属一个排人枪打败。柳州保安司令部派团长覃锄平率1000余人前往“围剿”。潘正德指挥起义武装同官兵对峙10多天。后因潘正德不幸牺牲，起义苗民被击溃。

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11月，桂林、柳州失陷后，国民党军纷纷西逃，第九十三军退人融县苗区背江一带。国民党军在苗区大肆掳掠，见猪杀猪，见狗打狗，见羊擒羊，见牛牵牛，甚至拦路抢劫，干起强盗行径来。驻扎元宝、小桑、青山一带的国民党军，三五成群四出抢掠，偷挖苗民腌的酸肉酸菜，还把屎尿拉进酸坛，随意殴打苗民，调戏苗族妇女等。苗族群众对国民党军胡作非为恨之入骨。在高王寨苗族寨老贾建忠的领导下，苗族联合侗族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

暴动由荣地侗族抗征开始。一天，安荣乡乡长钟子华率乡警到荣地催逼粮款，扬言不交粮款就铲平荣地。贫穷如洗的侗民连一点杂粮、一把烟叶也被迫上缴。事后几天，安荣乡副乡长李康耀又带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一个排开到荣地逼迫侗民缴交粮款。官兵挨家挨户抄家，一无所获之后，扬言要统统端走侗家的锅头。官兵的为非作歹激起侗民的愤怒，铜锣一响，侗族男女老幼一齐出动，扛粉枪，舞大刀，抡棍棒，把官兵团团围住，喊杀连天。官兵的步枪、手榴弹全部被缴下来。侗民夺回被抢走的物品后，才把全部武器交还官兵，官兵狼狈撤走。国民党军吃亏后，决意报复，调集700余武装，准备征讨荣地侗民。侗民一面疏散人畜，转移到密林深处，一面日夜开炉制刀枪，并派人向周围苗寨求援。本来已酝酿暴动的苗民，接到侗民的求援，立即起来响应，拉开了融县中部苗侗暴动的序幕。

荣地集结苗侗暴动队700多人，周围8个苗寨也聚集3000余人。暴动队埋岩饮血酒，举刀枪盟誓。他们抢据山头坳口，砍树拦路，埋竹钉、设陷阱。荣地整天牛角声嘟嘟不断，枪炮声轰轰不停。国民党军得知苗民要“发苗疯”，怕闯下大祸，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掘壕据守，静观事态发展。苗侗暴动弄得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10多天后拉起队伍向贵州方向撤走了。

国民党军撤走后，暴动并没有止息，苗族群众要求融县政府答应不征兵、

征粮、征税。融县政府以谈判为名拖延，暴动队立即行动，将小桑、培秀、洋濫、高基、荣塘、白竹等村公所占领，村长吓得纷纷逃离，通往安太乡的60多里的电话线也被暴动队剪断，融县中部苗族聚居区完全掌握在暴动队手里。之后，苗民继续同融县政府当局进行斗争，断断续续到1946年秋，融县政府当局屡屡被动，一筹莫展。融县政府因不能平息苗民暴动，广西省政府以“人地不宜”、“处置失当”等为由，三次撤换该县县长。历时三个年头的苗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融县中部苗族地区的国民党统治，表现了苗族人民反压迫、反暴政、求生存、争自由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关心少数民族的解放，得到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邓小平、张云逸等在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照顾、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风俗习惯，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壮、瑶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七军中多数是壮族子弟，还建立了瑶族独立营，不少少数民族青年还担任了各级指挥员，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各县苏维埃政府都有少数民族干部。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湘江后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总政治部就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指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基本主张是反对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给少数民族以彻底的民族自决权，争取弱小民族对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和拥护。红军所到之处，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贴刷“少数民族和汉族劳苦民众是弟兄!”“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等权利!”“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何键对苗人（瑶人）的一切苛捐杂税和差役”等标语。① 红军通过越城岭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打土豪，买东西用银元和铜板，买粮只买杂粮，不买大米。红军秋毫无犯的实际行动，很快打消了少数民族群众由

① 《红军长征过广西》，47～4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于国民党的宣传而产生的疑虑，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人，是为穷苦人民翻身解放的子弟兵，纷纷从山上回来接待和帮助红军，做向导作掩护，送粮送菜，救护伤病员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桂北龙胜、资源、兴安、全县留下许多当年少数民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帮助红军的动人事迹。红三军团有四位伤病员伤势严重，走不动了，龙胜县瑶族农民余少林兄弟三人把他们扶到家中，藏在谷仓里，精心医治。国民党军来搜捕时，他们又把四位红军伤员转移到一个山洞里，每天送饭送医。一个多月后，四位红军伤员痊愈，余少林全家为他们准备好干粮，换上瑶民服装，并护送他们赶回部队。红军主力已离开龙胜县境进入湖南省，有一支红军后卫收容部队在潘寨被国民党军追击进入天云山密林里。当时，瑶族农民沈再德、沈再富兄弟俩正在山中采香菇，见到这种危急情况，沈再德留在山上引开国民党军，沈再富带领红军往后边穿过密林，到悬崖下一个秘密岩洞躲藏。国民党军追到沈再德面前问红军的去向，沈再德把国民党军指向相反的方向追去。这支32人的红军脱险后，沈家兄弟回家备了干粮，送到山洞，带领红军抄小路赶往湖南，追上主力部队。有两名战士因伤势太重，不能行走，沈家兄弟就把他们藏在家里治疗，后来这两位战士在瑶寨落了户。

12月10日，红军中央纵队到达龙胜县西北山区的龙坪，这是一个聚居着400多户侗族居民的村镇。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和军委直属队及中央干部团宿营于龙坪寨。半夜，龙坪突然起火，寨内火光冲天。红军全力救火，周恩来亲自在现场指挥。他登上“杨氏鼓楼”，指挥红军扑灭从寨中扑过来的大火，阻断大火向冲边寨蔓延。经过红军奋力抢救，全村近200户木房免遭火灾，减少了群众的损失。这场大火是国民党特务为破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放的。红军扑灭大火后，查处了两名纵火罪犯，帮助受灾群众恢复家园，还拿出近千元光洋救济灾民。解放后，龙坪侗族人民为纪念红军的恩情，把杨氏鼓楼改名为“红军楼”，表达他们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

红军长征过广西，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解放战争

中，桂北各县少数民族积极参加游击队，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侗族地区首先建立了农会和人民政权。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纷纷参加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解放军解放本地区。柳北的融县、罗城等县苗、瑶人民踊跃参加反“三征”斗争，柳北人民解放总队一些中队、分队是由苗、瑶族战士组成的。在广西各族人民的积极配合和支援下，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歼灭了广西境内国民党残余势力，各族人民获得翻身解放。

三、宗教

广西各民族都有各自传统的宗教信仰。东汉末年佛教和道教传人广西后，到唐宋时期兴旺起来，得到广泛的传播。明清时期，在民间巫教的包围和影响下，佛、道教向民俗化和巫教化演变，逐渐衰落。民国时期，佛、道教受到限制甚至禁止，已经奄奄一息了。由于佛、道教已融人民间宗教，所以在民间仍有较深的影响。伊斯兰教自宋代传人广西，但信仰伊斯兰教的只有定居广西的回族，人数很少。天主教和基督教自鸦片战争后传入广西，但一直受到官绅和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传播缓慢。因有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天主教和基督教还是逐步扩张，民国前半期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广西各民族大多数人依然崇尚各自传统的宗教信仰，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还是少数。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的传播，对广西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天主教和基督教

在鸦片战争以前，已有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的传教士到广西活动。但由于广西当局的抵制和民众的反对，传教士未能成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在中国取得传教的权利，天主

教、基督教开始在广西传播。最先进入广西传教的是天主教传教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分别由贵州、广东向广西的西部、东部和南部传教，并逐步向各地传播。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仍遭到广西民众的反对，传教士施用小恩小惠，如送钱赠药、帮困治病之类手段，逐步说服和吸引一些贫穷的群众入教，建立教堂。到191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西的活动已扩展至33个州、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受到重创，传教会活动大受影响，不得不放弃其在广西的垄断地位，1920年将广西部分地区让给美国纽约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接管，作为传教范围。巴黎外方传教会重点在桂中、桂南地区发展，桂西的西林、西隆、凌云等地的天主教务划入贵州范围，由贵州安龙教区管辖。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分别以梧州、桂林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由于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的介入，广西境内天主教堂越来越多。从1913年至1950年，37年里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分别在桂西、桂中、桂南、桂东南、桂东北30多个县共兴建了67座天主教堂，连同1913年以前建立的教堂，1950年全省天主教堂总数116座（其中罗城龙安、柳城古木2座因无人管理而废弃），分布在48个县、市。神职人员，到1949年止，来过广西传教的外国籍神甫前后共179名，其中法国籍神甫110名，美国籍神甫63名。广西解放前夕，仍在广西的外国籍神甫99人。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进入广西后，天主教徒迅速增加。1921年广西教区的教徒5100余人，玛利诺外方传教会进入广西后大力发展教徒，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利用战乱、民众流离失所，在各地发放救济物资，设立避难所、施粥所、收容所等，吸引难民、感化群众，梧州教区发展教徒1.37万人，桂林监牧区吸引教徒8400多人。到1949年广西全省天主教徒共3.5万人（未计西林、西隆、凌云三县）。① 广西的天主教徒大多数是农民，女教徒占多数。城镇教徒主要是家庭妇女、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贫民。

基督教传入广西是多宗派性的。从清咸丰五年（1855年）起，基督教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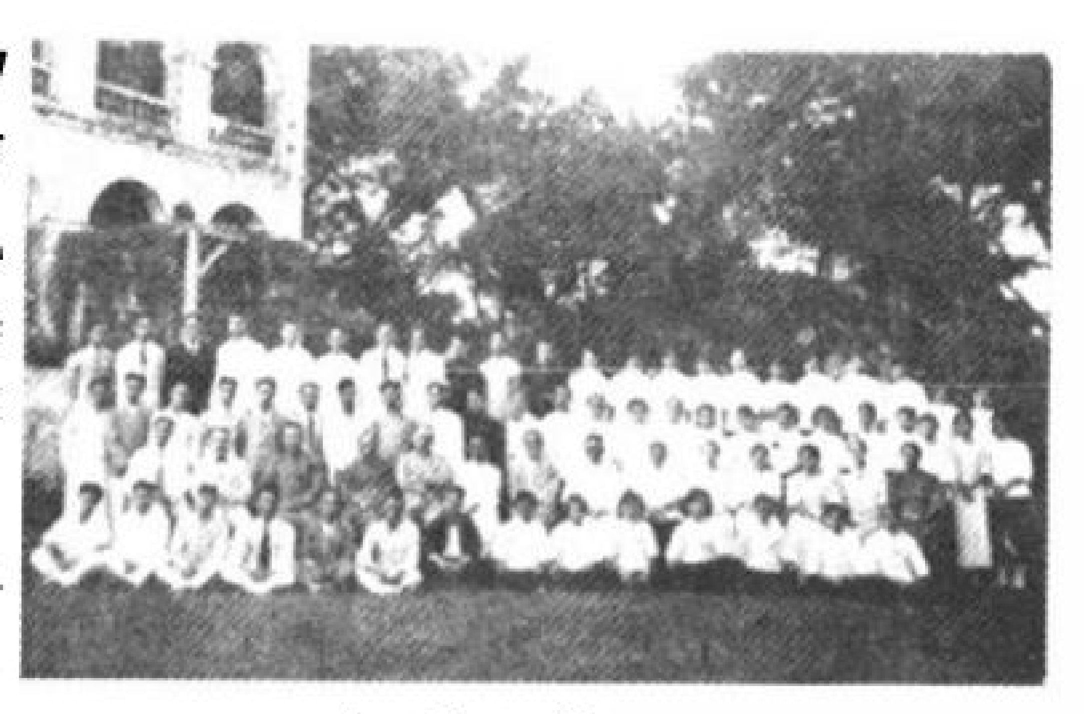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28、47、50、5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9个宗派、17个独立教会的形式先后传人广西，到1949年在67个县市传播。他们是英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南美浸信会、美国宣道会、德国信义会、以马内利医药传道会、美国新约教会、美国安息日会、信爱会、美国五旬节圣洁会、英国内地会、美国水上布道会、自立会、美国神台会、基督徒聚会处、美国鲁东信义会、泰东龙珠路教会等。其中传播范围最广的是美国宣道会，传教活动43个县市，其次是南美浸信会26个县市，美国安息日会22个县，英国圣公会18个县市。传播范围最小的是以马内利医药传道会、信爱会、美国神台会和泰东龙珠路教会等4个教会，传教活动只限于1个县或市。基督教会最多的是南宁，有8个独立教会，其次是桂林，有6个独立教会。这些教会有13个教会由外国教会控制，3个教会由中国教徒创办，1个教会由外籍传教士自创。[①] 广西的基督教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各自为政，单独活动，在一个地方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教会并存。

广西的各基督教会分别先后成立领导机构，领导各派的教务。圣公会在北海、桂林、南宁三处成立了三个领导机构，分管桂南、桂北、桂中、桂东的传教事务，是组织机构最多的一个教会。浸信会和宣道会各设二个领导机构，其他教会只成立一个组织机构。这些教会领导机构大都是民国时期成立的。如安息日会华南联会广西区会，1916年在南宁成立；桂南浸信会，1918年在梧州成立，1932年改为桂南浸信联会；西南浸信联会，1918年在桂林成立；广西宣道会协会，1927年在梧州成立。这些教会领导机构成立后，有组织地领导各派各教会开展传教活动。基督教各派先后派来广西传教的外国籍牧师，据不完全统计共137名。其中最多的是宣道会39名，其次是浸信会36名，圣公会26名，安息日会12名。传道员（协助牧师从事宣传基督教义的人），1947年为24名。各教会在广西四处建立教堂、布道所和聚会点，这些堂点主要分布在桂东、桂南、桂中、桂北等交通较便利的地方，桂西基督教活动较少。到1949年，各教会在广西67个县市共建立教堂280处，最多是宣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8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道会82处，浸信会67处，圣公会47处。信徒，即包括已接受洗礼的正式教徒和信仰基督教但尚未受洗的慕道者，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3383名，1934年3951名，1942年2929名，1947年5570名。[①] 基督教徒多为农民，其次是小商和手工业者。



梧州部分基督教徒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传教有多种形式。首先是舆论宣传，通过口头宣传、散发宣传品、售卖书刊等，大力宣传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及入教有何好处等。如天主教传教士宣传说："入教了的人死了能上天堂，不入教的人死了下地狱。"有的还宣传说："入了教可以不纳税，犯罪不怕处罚，甚至杀人之罪也得教堂保护。"[②] 基督教传教士特别大力宣传忍让、保守和甘心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宣传只有"上帝"才能把众生救出苦海，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忍耐、顺从，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传教士的这些宣传是企图使人们安于被压迫被侵略的地位，模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敌我界限，麻痹和瓦解人们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许多教会创办了报章杂志、书局书店等。如宣道会1913年创办《圣经报》，1918年创办《宣道报》；桂南浸信联会1919年以后先后创办《真光旬报》、《和会季刊》、《福华报》、《晨光报》、《由道月刊》等；桂南浸信联会和西南浸信联会1935年合办《桂声季刊》；1947年宣道会创办面向青少年的宗教杂志《少年良友》；南宁天主教会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南宁玫瑰印书局；基督教宣道会于清宣统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105、118、121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广西田林县天主教调查报告》，2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组，1963。

三年（1911年）在梧州创办宣道书局；浸信会于1912年分别在梧州、桂林创办真光书楼，1949年在梧州开办真光图书馆。

开办医疗卫生事业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进入广西之初，就开始施医赠药，以掩护其传教活动。后来，逐步开设医院、诊所等。天主教教会开办的主要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海教区开办法国医院，1947年改为广慈医院；1912年法国神甫周怀仁在南宁开办麻风收容所；1938年法国传教士李玛诺在绥渌亭凉开办麻风院；1930年在南宁开办天主堂诊所；1933年在贵县开办博爱堂诊所；1935年开办平南诊所；1943年在宾阳开办天主堂医务所；1946年在武鸣开办碌麻屯天主堂医疗所和韦朗村天主堂医疗所等。基督教教会开办的主要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圣公会开办北海普仁医院；光绪二十五年循道会开办梧州西医院；光绪三十三年以马内利医药传道会在南宁开办以马内利诊所，1924年改名为道济医院，1930年又更名为道救医院；宣统三年（1911年）圣公会在桂林开办道生医院；光绪二十八年浸信会在梧州开办思达公医院；1914年安息日会在南宁开办小乐园医院；1916年浸信会在桂林开办浸信会医院；1948年附属于圣公会南宁道救医院的道爱医院在钦县开办小董道爱医院等。教会开办的医院，面向大众，为平民阶层服务，赢得民众的好感，容易吸引更多的人入教。解放前广西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民众贫穷无钱看病，缺医少药十分普遍，生了病只好听天由命。许多人迷信鬼神，生了病就去求神拜佛，请巫师驱鬼祛邪。传教士开办医疗卫生机构，免费施医送药，或低收费，自然会引起各阶层人们的好感。这种办法不仅为其传教扫清了障碍，而且吸引许多人因此而入教。有的病人就是入医院受感化后受洗入教的。

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了体现其“仁爱”的宗教思想，以达到扩大教会影响的效果，还创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育婴堂、孤儿院、养老院等。1920年天主教会在北海广慈医院内设立育婴堂，1921年法国籍神甫在贵县开办善德养老院，1937年在北海广慈医院开设养老院，1946年粤南信义会在合浦开办孤儿院，1948年梧州基督教联合会开办梧光孤儿院，1925年信爱会在贵县开办

熙心瞽目院。育婴堂、孤儿院收养弃婴、孤儿，养老院收养无依无靠的老人，瞽目院收容失明的儿童。



南宁育婴堂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传播后，为了培养教会的接班人，扩大教会的影响，争取人心，还积极开办各类学校，发展教会教育。所办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培植神职人员为目的的修道院、神学院（班）等。天主教会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到1949年，在广西各地先后开办了上思修院、贵县修院、拉丁书院、圣家会女修院、圣德修院、中华圣母无原罪修会女修院、培德修院、耶稣圣心仁爱会女修院、圣母宣传会女修院、圣家修院、圣若瑟小修院、贵县备修院等。其中大部分是1920年以后开办的，主要分布于桂南和桂东南地区。基督教会从光绪二十五年到1949年，在广西各地先后开办了建道圣经学院、证道初级圣经学院、建道女院、圣道妇女学校、培贤圣经妇孺学校、圣经学校、信义圣经学校、永乐圣经学校、圣约翰神道书院、泰东神学院、西南圣经学院等，主要分布在桂林和梧州，少数在桂南。另一类是各种中小学、职业学校、幼稚园等普通学校。这些学校除开设普通中小学的文化课外，也开设圣经课。有的学校主要是招收教徒的子弟，有的学校则面向社会招生，收费标准一般低于其他同类学校。天主教会自光绪二年到1949年，在广西各地先后共开办过34所普通学校，其中26所是小学，大部分是1920年以后开办的。基督教各派自光绪十二年到1949年，在广西各地先后共开办过76所普通学校，其中中小学65所（大部分是小学），护士职业学校2所，幼稚园8所。[①] 这些教会学校许多办学时间不长，有的随办随停。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59、12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教会创办的医院和学校，在办理过程中向广西传入了西方近代医疗科学知识、教育科学知识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引进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西方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这些在客观上促进了广西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广西的西医院是在教会医院开办的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广西的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也是教会先开办的。

但是，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外国传教士来广西传教，是为了侵略，传播宗教是为西方列强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是把广西变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说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不远千里而来，“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①]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1907年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们在中国办学的宗旨、目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青中国人，哪个国家就得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是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②] 马克思对宗教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他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 列宁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传教士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④] 在广西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正是这样，他们作为侵略的先锋来到广西，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以教师、医生、学者的身份到处刺探、搜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广西提供资料。如宣道会传教士遍游广西，搜集各县地图，并标明人口、面积、交通、出产等，寄回美国。教会势

---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247页，成都，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6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④ 《列宁选集》（第1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力在广西境内犹如独立实体，不受广西政府的制约，甚至凌驾于其之上。传教士及教徒为所欲为，肆意破坏中国的传统风俗，依仗权势干涉广西内政，庇护流氓地痞，欺压普通百姓，侵占土地，剥削民众，奸污妇女等等。传教士的罪恶行径，激起广西人民的愤怒，不断爆发了反洋教的斗争。近代史上广西教案频频发生，甚至不少地方官绅也参加到人民反洋教斗争的行列。

20年代，中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洋教成为人民反帝斗争的对象，不少教堂被毁，教会被迫停办，外国传教士被驱逐。1925年，灌阳县民众在“非教”风潮中，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街头演讲反对基督教，将圣公会礼拜堂改作学校。桂南浸信会区的礼拜堂几乎全部被摧毁。贵县教会和旧州、都兴、容县、蒙江独田的教会均于1927年被迫停办。入教的中国信徒也并不是都愿意听凭外国教士的摆布，在革命高潮中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揭露外国传教士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反对外国教会操纵中国教会，呼吁广西教会实行自办。桂南浸信会的爱国人士率先自发组织基督教促进会，将梧州浸信会的外国传教士全部逐出梧州。广西宣道会、循道会、圣公会等也参加了反帝运动，要求独立自办教会。1926年桂林宣道会执委李园善、杨订三等，受到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宣布脱离受美国控制的桂林宣道会，组织桂林基督教自主会。这是广西第一个由中国教徒自发成立的宗教组织，是基督教界反帝爱国斗争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学生也起来开展反帝斗争。1926年，北海圣公会华文男校和贞德女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女传教士董恩典的压制。两校的中国籍师生愤而罢课抗议，并驱逐了董恩典。在广西人民反帝斗争的冲击下，20年代中期后，广西的外国教会势力从发展的顶峰走向衰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的许多教会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如梧州教区圣家修院的中国教员和高年级修生，参加当地抗日军事训练，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广西教会人士同情革命，以各种形式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如梧州天主教会圣心小学校长刘统盛支持中共地下党员以教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圣心小学成为当时中共广西地下党

活动的据点之一。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从宋代开始传入广西。伊斯兰教传入广西，不是通过传教人刻意带进和四处游说的传教活动，而是随着穆斯林民族的到来而进入，由穆斯林民族定居所形成的。民国时期，还常有穆斯林从云南、广东、湖南等地来广西经商做工，有的并定居落籍。抗战时期，一些穆斯林从沦陷区逃难到广西并定居下来。在广西，回族人数历来就是穆斯林的人数，1933年全省穆斯林有8913人，1939年有9399人，大部分居住在桂林、柳州、南宁，少数分布于临桂、灵川、永福、平乐、百色、鹿寨、靖西7个县。伊斯兰教是一种民族宗教，所以在广西只有回族聚居的地方才有清真寺。广西最早的清真寺是元代在桂林建立，此后在回族聚居的地方陆续建有清真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的流动及战乱的影响，历史上的一些清真寺或被毁或废弃，到1949年广西还存有清真寺26座。其中桂林10座，临桂5座，灵川1座，平乐1座，永福3座，柳州1座，鹿寨2座，南宁1座，百色1座，靖西1座。这些清真寺大部分为清代以前所建，民国时期只建了6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穆斯林的礼拜、婚娶丧葬、调解纠纷、商议大事，都在清真寺进行，习惯上以一个清真寺为一个教坊。



抗战时期，被日军毁坏的桂林清真古寺大殿

广西的伊斯兰教一向有统一的组织机构。1914年成立广西回教俱进会，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一个分部，会址在桂林西外清真古寺。1936年国民党当

局强令各地回教俱进会停止活动，广西回教俱进会因此解体。1938年在桂林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广西分会。1941年，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中国没有不同的民族，只有不同的宗教，因此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改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广西的回民救国组织随之更名。抗战胜利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再次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1940年，中国伊斯兰青年会桂林分会成立，它的任务是组织青年宣传宗教和参加抗日，发行分会会刊，出版《国民与宪政》月刊，宣传抗日救亡。

伊斯兰教信仰“安拉”（阿拉伯文音译，意为真主），认为它是惟一的神，创造并主宰宇宙万物。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阿拉伯文音译，意为顺服安拉旨意的人）。伊斯兰教除规定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要按教规行动外，对其出生、成人、婚姻、丧葬等也有一定的宗教规矩和习俗。穆斯林坚持同教人通婚，若要与教外人结婚，对方须入伊斯兰教为穆斯林，方能成婚，其子女也是承袭家庭的宗教信仰。

在伊斯兰教中，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和管理清真寺的人分别称阿訇和乡老。阿訇为清真寺的宗教领导人，其职责是组织和主持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向穆斯林群众宣传阐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经典和优良传统，引导穆斯林修身近主。阿訇中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经学素质高的为教长。教长和阿訇都是聘请制，由乡老聘请。乡老是清真寺的管事人员，对平日里热心宗教事业的人也尊称乡老，又泛指那些经常入寺礼拜的穆斯林。因此，乡老有值年乡老和普通乡老的区别，清真寺的管理人员为值年乡老。

伊斯兰教比较重视文化教育，许多清真寺都设有经堂小学，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教育。民国以来，穆斯林儿童进普通学校就读日渐增多。1932～1949年，在桂林等地先后开办21所伊斯兰小学。1947年在桂林创办广西回文专修学院，后来又创办桂林回文专科学校。1937年，以培养清真寺教长、伊斯兰小学校长和教会会长等人才的成达师范学校从北平迁来桂林复课，一直到1944年桂林沦陷才迁往重庆。为介绍和宣传伊斯兰教，1934年在南宁创办《广西回教》月刊，1939年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广西分会在桂林创办《正义》月

刊，宣传抗日。成达师范在桂林期间办有《月华》旬刊和《成师校刊》。

在抗日战争中，广西穆斯林团结一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各地穆斯林纷纷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桂林成达师范组织宣传队到城郊开展抗日宣传，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号召人民抗日救国。1938年，桂林成达师范教员马天英参加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近东访问团，并任副团长，到近东9个国家进行一年多的访问，向这些国家宣传中国抗战。次年，马天英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南洋访问团团长，率团到东南亚各国访问，作抗日宣传近一年，并获华侨支持祖国抗日捐赠98万元。桂林回族马毓鑫，抗战前毕业于广西航空学校飞行班，七七事变后任空军第三大队三十二中队分队长，多次在南宁、武汉、南雄等地参加空战，和战友一道奋力杀敌，击落日机6架，击伤多架。在南雄空战中，马毓鑫英勇牺牲，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抗战胜利后，广西的穆斯林以各种形式参加革命斗争，有的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或游击队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佛　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为公元前6~5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广西，唐宋为鼎盛时期。明清受到限制，逐渐衰落，在民间巫教的包围下走向民俗化、巫教化，被作为神来膜拜。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广西佛教更趋衰微。经过太平天国革命，许多佛寺被作为邪教而捣毁。维新变法兴办新学，改寺庙为学堂，收寺产，毁偶像，僧尼被逐。民国时期，尤其是新桂系执政后佛教活动受到禁止。1926年广西省政府通令各县“捣毁偶像，以祛迷信”。后来广西发展教育，省政府明令将寺庙产业提作教育经费。在改革风俗运动中，将拜佛列为应革除的陋俗。在整顿乡政中，允许将寺庙改建乡村公所。经过一再限制打击，已衰落的广西佛教就更加奄奄一息了。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历代的传播和演变，已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虽然广西当局屡屡禁令，但佛教在民间影响仍然很

深，观音堂的香火没有断绝，外省僧侣仍不断来桂弘法。抗战时期，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的文化城，随着众多文化人的云集，外地不少高僧来桂，并收了一些皈依子弟，兴起新佛教运动。1938年成立中国佛教会广西省分会，苍梧、贵县、玉林、邕宁、柳城、荔浦、桂平、蒙山、柳江、三江等10多个县建立了佛教支会。同年，在桂林出版《狮子吼》月刊，提出"以学术化、生产化为原则，极力革除寄生虫式的生活与安宁于无知无识的堕性"，"扬弃佛教理论之属于过去者，提炼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精髓，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体物界重筑幸福之路"。[①] 1942年11月，著名的虚云大师（南华寺住持）由粤赴渝路过桂林，在月牙山行皈依礼，皈依者有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影星胡蝶等1000余人。1943年，著名太虚大师也来桂林讲《弥勒上生经》，中国佛教会广西省分会理事长道安受聘任广西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印度理则学》、《维识学》。桂林佛教极盛一时，1942年桂林市佛教徒达1472人。1944年日军入侵桂林，僧尼四散，佛教又陡然冷落。自此，广西佛教无大起色。到1949年，全省佛教徒（含出家的和在家的）共1718人。最多的是玉林，有660人；其次为桂林，有382人；再次是梧州，有170人。[②]

广西的佛教也有不同的宗派法系，曾流行过"律宗"、"天台宗"、"净土宗"及"禅宗"等，其中流传最广、时间最久的是净土宗和禅宗。禅宗又有云门宗、临济宗和曹洞宗。近代以来佛教衰微，宗派法系已不大明显了。广西佛教历来少有成立统一的的组织机构，多以寺院庵堂为单位独立活动。1934年，桂林的光宜和尚发起在祝圣寺成立佛教居士林，但不久解散。1936年万少石、蔡稼森、刘锦桥等居士在桂林发起组织广西省佛教会，1938年改为中国佛教会广西分会，这是广西佛教界第一次成立统一的组织。1944年桂林沦陷，佛教分会停止活动。

佛法理论高深广博，其教义基本内容是"四圣谛"，即"苦谛"、"因谛"、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19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广西通志·宗教志》，22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灭谛”、“道谛”。佛教认为世间一切都是苦，人生的本质也是苦。要摆脱痛苦，只有依据“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才能超脱人世间的痛苦烦恼，达到无上觉悟，达到佛的境界。在修持中要以“慈悲为本，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有众生的解脱才有个人的解脱”。① 广西的佛教徒都尊释迦牟尼为本师，而自称为佛陀弟子，有出家的，有在家的。佛教徒四众，出家二众，男称比丘，俗叫僧人或和尚，女称比丘尼，俗叫尼姑，统称沙门；在家二众，男称优婆塞，女称优婆夷，统称居士。民国时期，广西佛教知名人士有妙真、陈铭枢、宽能等。

佛教活动的场所有佛寺（含庵堂）、佛塔、石窟等。广西最早的佛寺建于晋朝，唐宋时广西佛教兴盛，修建寺院较多，明代和前清也不少，明代重要的有106座，清道光前有76座。近代以来新建的少，毁坏的多。民国时期许多寺院被改作学校、公所等。至今还保存的著名寺院有：桂林延龄寺、全州湘山寺、桂林释迦寺、桂林栖霞寺、柳州灵泉寺、南宁乌龙寺、合浦东山寺、贵港南山寺、天等万福寺、桂林能仁寺、南宁水月庵、梧州西竺园、柳州西来寺、桂平龙华寺、桂平洗石庵等。广西最早建的佛塔是隋代在桂林缘化寺建的舍利塔。广西历代共建各种塔140多座，留存至今的80多座。今存主要佛塔有：桂林木龙洞唐代石塔、桂林万寿巷舍利塔、全州湘山妙明塔和尚墓塔、全州盘石脚元代石塔、崇左明代土司石雕墓塔、桂林象山普贤塔、桂林穿山寿佛塔、环江葫芦石塔、贺县悬崖上的舍利塔、富川城南观音塔等。广西的佛寺、佛塔一般结合风光，大多依山傍水，与山水浑成一体，增色河山。建筑结构与广西民族建筑风格结合起来，精巧玲珑，富于地方特色，是广西民族绚丽文化的瑰宝。广西岩溶、溶洞很多，不少佛寺建于溶洞内，寺中有洞，洞中有寺，至今留存不少石窟造像。石窟造像以桂林为最多，西山、骝马山、伏波山还珠洞、叠彩山风洞等，至今尚存160多龛，佛像600尊，灯龛30多处，造像题记10多处，大多为唐代开凿的。较有名的还有贵港南山寺石

---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19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佛洞造像、宜山白龙洞菩萨造像、河池罗汉岩罗汉造像、大新穷斗山佛仙造像等。广西石窟也是广西古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

广西历史上的佛教寺院都有自己的田产房产，大多数僧侣从事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有的寺院僧侣全靠自己耕种维持生活，农忙时还给人打日工。较大寺院的田产多是出租的，僧侣靠剥削过寄生虫生活。1937年中国佛教协会广西省分会在桂林开办功德林素食馆，种蔬菜自给。1947年梧州西竺园佛堂集资开办菩提素食苑，经营甚佳。1949年桂平西山洗石庵的尼众在宽能法师带领下，开辟茶园，垦荒种植茶树。梧州西竺园还于1935年开办文化补习班，招收附近贫民儿童，一年后正式采用小学课本，补习班改为补习学校。1944年梧州沦陷，学校停办，1948年后恢复，有学生300余人。

广西的佛教有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抗战时期许多佛教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捐款捐物，救济难童，为阵亡将士超度。广西佛教分会创办《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日，刊载全国各地佛教青年参加抗日活动的消息。梧州西竺园佛堂释妙真积极开展救济难童工作。桂平西山龙华寺的巨赞大师和觉光大师组织全县佛教徒参加抗日活动，经常向教徒宣传抗日，发动信徒捐款抗日，一年一度举行“悼念阵亡将士”、“救难息灾”水陆法会，“内护菩提，外护疆土，祈求抗日胜利和世界和平”。①

道教及其他民间宗教信仰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中国古代的尊天祀祖思想，东汉传入广西，唐宋时期得到迅速传播。后来，道教向桂西、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明清时道教受到限制，失去政治支持，于是道教向世俗化发展，与民间迷信、神祀融合。民国时期，道教被列为迷信，受到广西当局严厉禁止。1926年，广西省政府通令各县捣毁偶像，改宫观为学校，变庙产为公产，道具被没收，道士被迫改行。1931年，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23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生寿及陋俗规则》，1936年颁布《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和《广西乡村禁约》，严禁道士、巫师从事道事活动，规定丧家不准用地师、僧尼、道巫斋醮做亡，凡游神、醮会、求神、送鬼等迷信活动均应革除。新桂系禁止道教的一系列措施，使已经粗俗化、世俗化的道教更加衰落，到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全省道士不足100人。①

道教尊奉老子为教主、神明。道教教义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源，"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有了"道"，才生成宇宙，宇宙产生元气，元气构成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由此化生万物。所以"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一切一切的始祖，"得之者明，失之者迷"。道教的清规戒律有"戒律"、"清规"、"斋法"、"禁忌"等，是约束道士的思想言行，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的条规。② 道教的主要经典有《道德经》。道教原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它向世俗化发展，融人民间巫教神祇之后就失去了原来意义上的宗教思想，成为一种神秘的迷信思想。

广西的道教派别主要分全真、正一两大派。全真派自称是道教正统，道士不结婚，素食，蓄发束髻，师徒相传，除拜神念经外，以"修真养气"相标榜。正一派娶妻生子，父子相承，以庙为家。民国时期广西的道士派别已不很明显，还剩下两类：一为修行道士，脱离尘嚣，人山修炼，或在宫观修炼；一为普通道士，不事修炼，平时不着道装，遇建醮或修斋时始穿道士冠服，登坛念经诵咒。③ 道士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道宫和道观，合称宫观。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历史上先后建有宫观176座，主要分布在桂东南、桂东、桂东北。明清后道教受限制，民国时期被禁止，大多数宫观被毁或改作他用，到广西解放前夕道观几乎无存。

道教的形成和传播，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息息相

---

① 《广西通志·宗教志》，253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广西通志·宗教志》，25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广西年鉴》（第二回），757页，南宁，广西统计局，1935。

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明清后道教虽受到限制，但并未失去民间信仰的基础，相反在民间得到蔓延和发展。广西古代先民迷信鬼神，遇有疾病多不求医服药，反而延巫求神保佑，祛病消灾。道教世俗化并走向民间之后，与广西民间信鬼好巫的习俗相结合，促进了道教的传播。民国时期，虽然广西当局禁止道教活动，但并没有能阻止已粗俗化的道教在民间的流传和影响，城乡道教活动演变为设斋打醮、操办丧事、超度亡灵、作会诵经、免劫除灾等，甚至有的少数民族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中，也利用道教形式。道教尊奉的城隍、土地和灶神，成为民间祭祀的主要对象。

广西各民族除信奉道教，少数信奉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之外，还有不少各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

师教是壮族民间最主要的宗教之一。师教，壮人称师公，亦称为师。师教吸收了道教的某些教义，但主要成分是原始巫教。师教有经书，称为师经，因用壮族土俗字书写而成，故亦称为壮经。壮人在丧葬、集庆、消灾等活动中多请师公做法。师公做法时，头戴红巾，头顶插雉尾，脸戴面具，身着红衣裤，腿裹纸带，脚蹬草鞋，手执法棍、刀、剑、戒方等。师公在鼓、锣、钹、海、波列等乐器伴奏下，念说唱跳，所唱的叫“师公调”，有浓厚的壮族民族风韵。法术有“上刀山”、“过火炭”、“下油锅”、“跳高屋”等。

汉族宗族观念较强，特别崇拜祖宗，几乎每村都有公共的祠堂，有供奉神灵的社、庙、坛、台、堂等。宗教场所可分为三个层次：寺、庵等属地区一级，多有专业宗教职业者（道人、和尚、尼姑）管理；庙、坛、祠多设在乡、村，有专人管理；坛、祠、台、堂等属家族或家庭一级，设在家内神龛上，又称家庙，家神的供奉尤为盛行。

瑶族青年男子凡年届十五六岁，要经过一种名叫“度戒”的宗教仪式。只有经“度戒”的青年，方有权利结婚成家，参加社会活动，死后灵魂升后成仙，享受香火供奉。“度戒”仪式在不同地区、不同支系做法不尽相同，有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举行，有的按宗族举行，有的戒男不戒女，有的男女均受戒。瑶族还有图腾崇拜、“密洛陀”崇拜、“做功德”等宗教形式。

苗族的一种主要宗教仪式叫“安龙”，是祈求龙神庇佑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活动。每个苗族村寨都筑有一个高约3米、直径1.5米的圆柱形土坛，坛心置一陶制水缸，盛水放养鳝鱼（龙的化身），坛上用一块平石板封盖，苗民称之为“龙坛”。“安龙”一般是在春分前、中秋后举行。

侗族崇拜“萨堂”（意为大祖母或始祖母），认为“她”能保境安民，使六畜兴旺。每个侗寨都设有“萨堂”神坛，一般用石头或砖头围起圆形圈子，高约1丈，周围7~8丈，中间植一株万年青或桂树。平时常人不得进出，是个神秘的地方。逢节庆或发生灾害，侗民齐集神坛，祭祀“萨堂”，请“她”消灾降福，保佑人畜平安。

毛南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名目很多，其中主要的是动、植物崇拜。植物崇拜，每个村子都供奉一棵大树，称为“坛木”，说是护村树，具有很大的神威，谁也不能伤害它。每个村还有一株状似茅草的长升草，被奉为神草，说它可以镇魔驱邪。谁家有人生了病，或发生灾害，要备办酒肉祭“坛木”，膜拜神草。动物崇拜，毛南人把牛、猪等牲畜及鸡、鸟禽兽之类看做灵物。刚买回来的猪仔，要经过“烙棋”（燃火烤熏猪笼、猪栏）的洗礼。屠宰猪、牛等牲畜，主人要端起盛有食肴的器具呼唤该牲畜，谓之“叫魂”。公鸡报晓时，被认为能通晓神明而当做灵物卜吉凶。母鸡啼叫则视为不吉利，灾祸降临。乌鸦在村边叫，被说是预报死神来到。

彝族有“摩公”和“萨南”，是村寨中的中心人物。“摩公”即巫公，世袭，传子或孙，也可以传给兄弟。“摩公”会喃呅念咒、念经祷告，寨子里的重大节庆、祭祀、红白喜事，都得由他来念经、喃呅祷告。彝人相信“摩公”有巫术，会请神治病，能逢凶化吉，谁家有人生病或有了灾祸，都得请“摩公”喃呅，消灾除病。“萨南”即土地公，他和“摩公”的区别是“摩公”管“天”，土地公管“地”，凡与土地有关的祭祀祷告活动都由他主持。他负责“保护”农作物的种植，主持节日活动有关土地、农作物内容的仪式，打开“公房”上的公门——“社神门”。每年开春，播种庄稼都由他先种，其他人才能跟着播种。

附　录

一、大事记

1919年（民国八年）

5月

是月　梧州学生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27日，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成立。

是月　梧州发生“白鹤岗事件”。中国士兵在白鹤岗打死英国领事馆放出来咬人的狗。英国政府借机一面无理抗议，一面派军舰到梧州进行恫吓。广西督军谭浩明亲自向英国领事馆道歉，登报认错，赔偿英人1万元，并将肇事的伍长1名枪决，12名士兵永远监禁。

6月

是月　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相继成立学生救国团体，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斗争。

是月　广西省长陈炳焜辞职，军政府以李静诚继任。

是月　南丹土州改为南丹县。

7月

20日　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在梧州成立。随后创办《救国晨报》。

是月　梧州总商会设立国货陈列所，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是年　广西省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在南宁北較场举行。

1920年（民国九年）

8月

11日　莫荣新以广东督军的名义指挥三路大军进攻漳州粤军。

12日　陈炯明在漳州誓师，率粤军回粤驱逐桂军。桂粤战争爆发。

10月

26日，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率部退出广州。行前通电宣布广东取消自主。

11月

是月，据粤桂军全部失败，退回广西。

12月

29日　北京政府任命陆荣廷为粤桂边防军务督办，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陆荣廷在粤桂边布防，准备对粤用兵。

1921年（民国十年）

5月

9日　陆荣廷派陈炳焜在梧州成立护军使署，为对粤战争之总指挥机关。

6月

13日　陆荣廷下令布防粤桂边桂军分三路攻粤。

18日　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

20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兵分三路进兵广西。叶举指挥中路正面进攻梧州，许崇智指挥右翼出四会、广宁策应梧州，黄大伟指挥左翼进袭高雷桂军。黔军、滇军、赣军等部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合击桂军。

23日　桂军巡防队副司令刘震寰在梧州倒戈附粤。

26日　粤军占领梧州。粤军沿浔江长驱直入。

7月

10日　桂军左翼总司令沈鸿英在贺县宣布“自治”，请陆荣廷下野，所部改为“救桂军”，沈自称总司令。随后，秦步衢、黄业兴、韦荣昌等将领先后叛陆附粤。

19日　陆荣廷在南宁通电下野，偕谭浩明、李静诚等退往龙州。

28日 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

29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全权办理广西军事善后事宜。

是月 桂军第一路军统领李宗仁率本部及另外数营共约2000余人避入六万大山。随后李率部接受粤军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任司令，驻玉林五属。

8月

4日 粤军攻占南宁。桂军大部退往桂西各县潜伏。

11日 马君武在南宁就任广西省省长。

9月

30日 粤军占领龙州。陆荣廷、谭浩明等逃往越南。

是月 孙中山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

10月

1日 陆荣廷偕马济、李静诚、谭浩明等从越南乘法国轮船去上海，住法租界杜美路。

17日 孙中山乘“宝璧”号军舰到梧州。

21日 孙中山乘“宝璧”号军舰抵南宁，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是月 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委李宗仁为玉林警备司令；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属黄绍竑、白崇禧、夏威分任营长。

12月

4日 孙中山抵达桂林，受到各界隆重热烈欢迎。孙在原靖江王府内设北伐大本营，准备入湘北伐。

23日 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1922年（民国十一年）

2月

3日 孙中山发布动员令，令北伐各军分途出师北伐。

27日 北伐军在桂林举行誓师典礼。

3月

11日 孙中山发表《北伐宣言》。

27日 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发出电告，从4月1日起将省内各种军队除陆军第一师外，其余一律改编为警备军，全省共分八路。

4月

8日 由于陈炯明勾结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反对，孙中山经湘北伐受阻，北伐军大本营迁粤，孙中山返粤。

12日 陈炯明令叶举、熊略等驻桂粤军回粤，图谋叛变孙中山。

是月 粤军主力撤回粤后，陆、谭残部纷纷自立“自治军”。李宗仁在玉林自封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司令。

5月

中旬 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等各路“自治军”围攻南宁。广西省省长马君武撤离南宁。

22日 “自治军”占领南宁。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在梧州电广州政府辞省长职，由省长公署政务厅长杨愿公暂代。

27日 “自治军”各路首领在南宁开会，会议推林俊廷为“自治军”总司令。

是月 马晓军率田南警备第五路增援南宁，未入城退向灵山。抵灵山后马离队，所部由黄绍竑率领转回容县归附李宗仁。

9月

是月 陆荣廷经越南回龙州。北京政府委陆为广西边防督办，12日陆通电就职。后陆策动部属推举其为广西善后督办，由龙州移驻南宁。

10月

6日 流窜赣南的沈鸿英通电后，当日班师回桂。

1923年（民国十二年）

2月

是月 李宗仁“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黄绍竑为谋向外发展，派

参谋陈雄前往广州，会同在穗治脚伤的白崇禧活动，设法与孙中山联络，争取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

3月

是月　黄绍竑假投沈鸿英，沈委黄为旅长，黄率所部及李宗仁部两营开赴戎圩驻防。

是月　林俊廷以广西“自治军”总司令名义兼广西省省长。

5月

是月　白崇禧与陈雄经廖仲恺和朱培德的介绍赴石龙车站晋谒孙中山，报告黄绍竑部准备起义参加讨伐沈鸿英。孙中山对黄部起义讨沈表示赞许和支持。随后白、陈潜回梧州向黄绍竑报告，筹划起义。

是月　黄绍竑派白崇禧赴玉林，向李宗仁报告与孙中山联络的情况，商讨联粤攻沈事宜。

6月

是月　黄绍竑在戎圩将由粤败退回桂的沈军黄炳勋旅包围缴械，公开举起“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旗号。

7月

18日　黄绍竑部配合西江讨贼军李济深第一师、郑润琦第三师等部占领梧州。

19日　孙中山特派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

中旬　李济深委派邓演达团长兼任梧州军警督察处处长。

27日　在李济深的支持下，黄绍竑和邓演达于当晚在梧州计擒沈军旅长冯葆初，缴了冯部的械。黄绍竑在梧州组建“讨贼军”总指挥部，黄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所部编为3个团，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

8月

16日　孙中山正式任命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

是月　粤军主力回粤参加东征，李济深将梧州军政大权交给黄绍竑。

9月

是月 黄绍竑去广州晋谒孙中山，报告讨贼经过。

是月 李宗仁部改为“定桂军”，李任总指挥，派人到梧州与黄绍竑共商联合作战。

10月

是月 黄绍竑“讨贼军”先后攻占平南、江口，“定桂军”占领贵县、桂平。

是月 北京政府委陆荣廷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

11月

14日 陆荣廷在南宁通电就任广西全省善后督办，并委陆福祥为南宁善后处处长。

1924年（民国十三年）

3月

是月 陆荣廷率部进驻桂林，陆令构筑城防工事，准备固守。

4月

12日 沈鸿英部包围桂林，沈、陆两军展开激烈争夺战。

5月

23日 李宗仁发出促陆荣廷下野的“漾电”。次日，黄绍竑发出“梗电”，请陆下野。

6月

中旬 李宗仁、黄绍竑乘陆、沈两军在桂林激战之机，分兵两路会攻南宁。

25日 李宗仁部占领南宁。

7月

7日 李宗仁、黄绍竑两部在南宁组建“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推李宗仁为联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16日，李、黄、白在南宁旧督军署正式就职。

12日 李宗仁、黄绍竑推原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出任广西省省长。16日，张在南宁就职。

22日 定桂讨贼联军分兵三路进攻陆荣廷残部，右路由李宗仁、白崇禧率领，向柳州、桂林进攻；中路由俞作柏指挥，向武鸣、那马、都安一带进攻；左路由胡宗铎指挥，溯左江西上，直捣龙州。黄绍竑留南宁策应各路大军。

8月

11日 李宗仁、白崇禧右路军占领柳州。

24日 陆荣廷率队撤出桂林，向全县退却，当晚沈鸿英部进驻桂林。

9月

21日 陆荣廷在湖南永州通电下野。10月14日陆偕谭浩明抵长沙，后转赴上海。

10月

22日 李宗仁、黄绍竑与沈鸿英代表在桂平开“广西善后会议”，历时20天。

11月

24日 孙中山特任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署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督办署参谋长。改定桂军为广西陆军第一军，李宗仁兼任军长；改讨贼军为广西陆军第二军，黄绍竑兼任军长。

12月

1日 李宗仁、黄绍竑在南宁就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会办。

同日 沈鸿英在柳州宣布就任广西建国桂军总司令。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月

3日 建国桂军总司令沈鸿英抵平乐，分兵三路进攻梧州、桂平。李宗

仁、黄绍竑电请李济深派兵增援。

2月

2~5日 李宗仁部和粤军陈济棠部在武宣、象州、蒙山、贺县、荔浦等地击败沈军。

7日 李宗仁、黄绍竑部占领柳州。

18日 李宗仁、黄绍竑部占领全县。

25日 唐继尧派滇军龙云部乘虚袭取南宁。

3月

1日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驻粤建国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率部赴桂，协同李宗仁、黄绍竑阻击唐军东下。

2日 李济深、黄绍竑在梧州发布讨唐布告。

27日 沈军乘虚袭取桂林。是日李宗仁部反攻，将沈军逐出桂林。

是月 范石生部与黄绍竑部由贵县经宾阳会攻南宁。

4月

2日 沈军残部再次攻占桂林。

6日 前广西督军谭浩明在上海寓所被其仆人枪杀。

12日 李宗仁率部收复桂林。

5月

9日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等联名通电声讨唐继尧。李宗仁率部由桂林增援南宁。

12日 唐继尧委刘震寰为广西省军务督办兼省长。

16日 李宗仁、黄绍竑率部与滇军卢汉部激战于昆仑关。滇军失败，退守南宁。

6月

4~8日 黄绍竑、白崇禧率部在柳州沙埔与滇军唐继虞部激战。滇军失败，退回滇境。

7月

7日 滇军龙云部乘夜撤出南宁，经右江退回滇境。

8日 李宗仁率部进入南宁。李、黄、白统一广西。

8月

6日 广州国民政府令李宗仁、黄绍竑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办理全省军、民、财政。

13日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成立。

是月 李济深来邕与李宗仁、黄绍竑等商两广统一、出兵广东南路和建立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等问题。

9月

月初 龙启炎、周济建立共青团梧州支部，龙启炎任支部书记。

15日 广西成立民政公署，黄绍竑兼任民政长。公署内设内务、财政、建设、教育四厅。

同日 韦拔群、陈伯民在东兰武篆开办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28日 李宗仁、黄绍竑电告全省各军事机关，决定将全省军队分别改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

是月 南宁《民国日报》在邕创办，黄绍竑兼任社长，陈勉恕任编辑主任

10月

月初 梧州工会联合会成立。

3日 广西省妇女联合会在梧州成立。

秋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到梧州，指导广西建党工作。

12日 汪精卫、谭延闿到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等会晤，讨论两广统一问题。

是月下旬 中共梧州支部建立，支部书记龙启炎。

31日 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为南路总指挥，分兵四路讨伐邓本殷。广西派俞作柏部为第四路参加南路作战。

是月 国民党中央指派李宗仁、黄绍竑为广西省党部特派员，负责筹建省党部。

12月

14日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筹备处在南宁开办第一期广西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覃哲民，学员120多人。

15日 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在梧州开学。

是月 中共梧州地委成立，书记谭寿林。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月

1~15日 国民党广西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建立有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广西省党部。

7日 韦拔群领导东兰农民协会举行起义，攻破东兰县城。

是月 广西造币厂在梧州成立，铸造嘉禾双毫银毫。

是月 广西民政公署出版《革命之花》。

2月

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推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

19日 国民政府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会议，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等出席。

春 中共南宁支部建立，陈勉恕任支部书记。

春 中共玉林支部建立，朱锡昂任支部书记。

3月

15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两广统一案》，决定：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导、监督。

24日 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同日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南宁举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部长陈协五兼任所长，学员119人。

4月

1日　广西军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全军编9个旅，每旅辖两个团，另有两个独立团，一个入伍生团，炮、工兵各一营。

4日　李宗仁偕张任民应邀到广州会晤蒋介石，商讨北伐问题。

13日　李宗仁聘苏联人马迈耶夫、吉罗莫夫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顾问。

是月底　第七军钟祖培旅入湘援唐（生智）。

5月

1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在南宁开学，校长俞作柏。

12日　第七军钟祖培旅尹承纲团开抵衡阳，并在金兰寺、涟水北岸击退叶开鑫部。

30日　梧州、南宁、桂林工农商学妇各团体先后举行“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

是月　广西实业研究院在梧州成立，在柳州建立农林试验场。

夏　中共南宁支部改为中共南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陈勉恕。

6月

1日　广西民政公署改组为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省务会议主席。

13日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陈协五率调查团到东兰武篆区调查“兰农惨案”。

23日　英军舰三艘无理封锁梧州港口。后经各界群众抗议被迫离梧。

7月

6日　李宗仁率第七军夏威、胡宗铎、李明瑞3个旅赴湘参加北伐。

是月　中共柳州支部成立，支部书记陈岳秀。

8月

2日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命黄日葵为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

是月　广西课吏馆成立，黄绍竑兼任馆长，训练县长、科长。

9月

10日 韦拔群率1000余农军分四路攻打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弃城逃走。

秋 中共桂林县支部成立，支部书记李征风。

10月

20日 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推动下，省农民部在容县成立省农民部苍梧道办事处。次年1月在龙州成立镇南道办事处，2月在恩隆县成立田南道办事处。

11月

5日 东兰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成立县农民协会，推选韦拔群为主任。

是月 广西省政府发出处理东兰惨案通电，承认东兰农运合法，东兰县前知事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龚寿仪交第七军查办。

是月 共青团南宁地委成立，书记严敏。

12月

19日 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派军警包围中共梧州地委机关、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梧州民国日报社等，逮捕梧州地委书记兼梧州民国日报社主任谭寿林、梧州工会代表联合会委员长钟山、内河轮船工会委员长胡奕卿、市党部执委兼民船工会负责人蔡美利等5人。

1927年（民国十六年）

2月

是月 国民政府明令委广西省政府委员9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粟威、朱朝森、俞作柏、伍廷飏、雷沛鸿、黄蓢。黄绍竑兼军事厅长，粟威兼民政厅长，朱朝森兼司法厅长，雷沛鸿兼教育厅长，黄蓢兼财政厅长，俞作柏兼工农厅长，伍廷飏兼建设厅长。

3月

15日 国民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邕召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被排斥。

29日　中共南宁地委组织南宁各界群众举行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集会。会后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遭到黄华表指使的反动分子冲击、殴辱。

是月　广西课吏馆改为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黄绍竑兼所长。

是月　广西学生联合会在邕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4月

2日　李济深、黄绍竑应蒋介石电邀到上海，参加有李宗仁、白崇禧等与会的“清党”密谋。

12日　新桂系在南宁国民党省党部、广西农讲所、《革命之花》编辑部、南宁军校、南宁市党部、市总工会、省一中、省三师等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数十人。

17日　梧州驻军和苍梧县军警在海员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苍梧书社等处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25人。

5月

1日　田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陆巩彰在平马被驻军旅长刘日福逮捕，后押到百色杀害。

是月　桂林成立“清党委员会”。

是月　中共广西地委在梧州组建，廖梦樵任书记。

6月

3日　镇南道农民运动办事处主任陈霁、指导员易挽澜在龙州被捕，9月被杀害。

21日　广西省政府发出训令，全省各县局正杂税捐，自本年7月1日起一律改征大洋。

7月

14日　广西“清党委员会”成立，黄绍竑、黄华表、伍廷飏、黄旭初、蒙民伟、陈锡珖为委员。

是月中旬　右江各县农军领导人在恩隆县七里区召开会议，成立“广西

临时军政委员会”，决定以武装反抗新桂系的屠杀政策。

8月

31日　新桂系在南宁进行大逮捕，中共南宁地委书记罗少彦等数十人被捕。

9月

1日　广西省“清党委员会”在南宁屠杀被捕革命人士，被害者有雷沛涛、雷天壮等13人。

7日　中共广西地委机关、梧州市总工会被军警破坏，地委书记廖梦樵等100余人被捕。

13日　新桂系在柳州大逮捕，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30多人被捕。

中旬　新桂系第七军留桂部队改编为第十五军，黄绍竑兼军长。

10月

5日　新桂系在梧州枪杀学生胡宝凤等13人。19日又杀害19人。

月底　中共广西地委在桂平重建，邓拔奇任书记。

12月

12日　广西省政府悬赏通缉韦拔群、陈伯民、余少杰、黄治峰、黄家直等24名农运、工运领导人。

1928年（民国十七年）

1月

1～17日　全省第二次运动大会在梧州举行。

是月　中共广西地委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组为广西特委，邓拔奇任书记。

2月

16日　广西省政府通知各县县长，取消减租法令，因为“地主如不得相应权利，即不能负担赋税，关于地主之权利，应保护之，以免影响税收”。

3月

15日　广西省政府通电各县，解散各级农民自卫军。

是月　广西大学在梧州举行奠基典礼。

4月

24日　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黄绍竑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5月

4日　广西省政府通电全国，要求中央向日本政府郑重交涉日军从山东撤兵。

16日　国民政府特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6月

1日　中共广西特委在贵县召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代书记恽代英到会指导工作。会议改选特委领导机构，朱锡昂任书记。

9月

2日　中共广西特委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组为广西临时省委，直属中央。

10月

10日　广西大学在梧州正式开学，马君武任校长。

11日　因设在梧州的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机关被破坏，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广西临委迅速恢复临委机关，并决定派文沛任临委书记。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月

是月　国民党广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邕举行。

是月　中共广西临时省委改组为中共广西省委，文沛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南宁津头村。

3月

26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新桂系，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

27日　蒋桂战争爆发。

4月

23日　中共广西省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委，文沛任书记。

5月

4日　国民政府下令解除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职。

5日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组织“护党救国军”，李任总司令，通电反蒋。黄绍竑、白崇禧率军攻粤，桂粤战争爆发。

6月

12日　国民政府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

24日　黄绍竑、白崇禧从龙州出走越南。

7月

15日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俞作柏就任省政府主席。

是月　邓小平（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南宁。在此前后，中共还派贺昌、张云逸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分别在省政府和军队中任职。

8月

中旬　广西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决定建立广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雷经天、韦拔群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会后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

9月

10~14日　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宁津头村召开。大会选出新的广西特委，何誓达任书记。

27日　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师长李明瑞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并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正副总司令。

10月

1日　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出兵攻粤。

5日　国民政府明令免去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职，以吕焕炎继任。

13日　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离南宁向龙州进发，俞作柏、李明瑞因反蒋失败随同前往。抵龙州后俞作柏经越南去香港。

15日　邓小平、张云逸等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一部，将南宁军械库全部武器、弹药和物资装船，撤往右江地区，准备举行起义。

11月

6日　黄绍竑秘密由香港回桂，是日抵容县。

是月　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回桂，在南宁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张发奎在同安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

12月

11日　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举行百色起义，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兼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

12日　在平马镇隆重举行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万人大会。

1930年（民国十九年）

2月

1日　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

19日　龙州举行万人群众反帝斗争大会。

21日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通电请蒋介石下野，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3月

20日　新桂系派兵三路进攻龙州，红八军失利，龙州失陷。

4月

1日　李宗仁在桂平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将桂、张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

5月

1日　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

22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商定，桂、张军分三路入湘，黄绍竑率

后续部队跟进。

是月　滇军龙云派三个师乘虚入桂，进攻南宁。

6月

15日　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在广州新亚酒店被其卫兵刺死。

7月

4日　桂、张军在湖南失败，退回广西全县。

7日　桂、张军退回桂林。

8月

9日　滇军总攻南宁。

21日　黄绍竑在桂林发出“马电”，辞去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并电蒋介石呼吁“息兵和谈”。

9月

1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在柳州建立秘密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

26日　粤军、滇军会攻南宁。

30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到达红七军前委所在地恩隆县平马镇。

10月

2日　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平马镇召开前委会，决定执行中央命令，红七军集结河池整编为三个师。

13日　白崇禧、黄旭初率部里应外合夹击围困南宁的滇军。滇军失败经右江退回云南。

中旬　新桂系开始建立民团制度，设广西民团总指挥部。

11月

8日　红七军在河池整编为三个师，主力奉命攻打桂林、柳州等中心城市，韦拔群留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

是月　新桂系乘追击滇军之机，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犯，根据地各县相继被占。

12月

2日　黄绍竑离邕取道龙州去香港。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

2日　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全县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上旬　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在恩隆县乙圩组建，师长韦拔群，副师长黄松坚，政委陈洪涛。

2月

14日　国民政府特派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伍廷飏为会办。

29日　百色区民团指挥官岑建英勾结黔军在凌云县海亭集体枪杀红军和群众390多人，制造了“海亭大惨案”。

3月

中旬　廖磊率第七军一部和民团“围剿”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占领东兰县城。

是月　广西省政治委员会在邕成立，黄旭初任主席，设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工商等处。

是月　新桂系在邕成立“中国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白崇禧兼所长。

4月

20日　广西省政治委员会公布《广西全省清乡条例》，全省划分为12个清乡区。

22日　陈济棠派马晓军、吴锡琪到邕，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粤方释嫌修好意向。

是月　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在邕成立。

5月

6日　驻桂粤军撤回粤境。

11日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联名通电反蒋。

是月　白崇禧、张发奎、李宗仁等先后赴粤，与陈济棠等商讨联合组府反蒋。

6月

18日　中共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

7月

1日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成立，黄旭初任主席，设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

8月

是月　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称红军独立第三师，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委。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为主席。

9月

是月　广西大学复课，马君武回任校长，开始招收本科生。

是月　广西各界救国会在南宁成立。

10月

3日　南宁各机关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

月初　中共郁江特委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呼吁团结抗日。

11月

中旬　新桂系派兵7000余人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2月

7日　李宗仁、白崇禧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愿意率第四集团军援黑（马占山）抗日。

是月　中共郁江特委受到严重破坏而解体，特委委员陈岸在玉林地区坚

持斗争。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月

3日　张发奎第四军离邕，取道邕柳公路北上，援黑抗日。

3月

30日　国民政府特任李宗仁为南宁绥靖公署主任。

是月　新桂系秘密政治组织“革命同志会”改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会长。

4月

是月　广西绥靖公署在南宁成立，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主任。

5月

20～24日　南宁市举行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

6月

上旬　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在果德县岜独屯成立，黄松坚任书记。

是月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举行县长资格考试。

7月

是月，中共黔桂边委、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在凌云县林友屯成立，黄举平任书记兼主席。

8月

1日　广西银行在南宁成立，黄钟岳任银行总管理处经理。

下旬　廖磊率四个团和民团近万人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9月

是月　广西大学增设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

10月

12日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桂林良丰举行开学典礼，杨东莼任校长。

19日　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在东兰县武篆区那烈乡东里

屯附近的赏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

12月

4日　南宁举行第一次农民运动大会。

9日　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政委陈洪涛因叛徒出卖在恩隆县燕洞乡那其村被捕，22日在百色就义。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1月

是月　国民党广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2月

21日　全县、灌阳、兴安、龙胜等县瑶民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新桂系的黑暗统治。

3月

7日　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在南宁成立。

是月　省商会联合会在南宁成立。

是月　新桂系调集军队和民团“围剿”桂北瑶民起义。

4月

是月　广西广播电台在南宁落成。

是月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特种教育实施方案》。

5月

是月　广西省政府召开全省行政会议，通过改进全省教育方案。

是月　新桂系派王赞斌第四十四师赴赣参加“剿共”。

9月

13日　广西省政府决定开展国民基础教育，颁布《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等四项教育法案。

10月

10日　全省第三次运动大会在南宁举行。

11月

1日　从是日起全省实行度量衡新制。

12月

12日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在南宁津头村成立，雷沛鸿任院长。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1月

27日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在南京谒蒋介石，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服从中央。

是月　广西实行第一届征兵。

3月

27日　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并颁布《广西建设纲领》，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方案。

5月

是月　广西行政研究院在南宁成立。

6月

是月　广西省政府颁布乡村政治组织实行“三位一体制”法令，乡村长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后备队队长。

7月

1日　广西省立博物馆在南宁成立。

是月　广西省立医学院在南宁成立。

9月

2～10日　肖克、王震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通过广西进入湖南。

是月　广西省政府规定，每当春秋，上丁日祀孔子，上戊日祀关岳。

10月

是月　广西省政府公告，规定桂钞1元6角折法币1元。

11月

1日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召开秘密会议，改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白分任正副会长。

下旬至12月中旬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广西。

是月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民团条例》。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3月

5日 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南宁访李宗仁、白崇禧。

4月

2日 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一级陆军上将。

3日 国民政府任白崇禧为二级陆军上将。

是月 广西美术馆在南宁成立。

是月 日本土肥原再次到南宁活动，白崇禧让土肥原去武鸣参观民团后备队训练。

是月 各区民团干部训练大队改为民团干部学校。

7月

8日 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叶琪在南宁坠马身亡。当局举行隆重公祭。

8月

10日 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修正的《广西建设纲领》。

12日 中国工程师学会、化学学会、地理学会、科学社、动物学会、植物学会等6个学术团体年会在南宁举行。

9月

是月 融县、中渡、百寿三县爆发民变，反对新桂系民团训练，反对征兵和苛捐杂税。

11月

2日 著名画家徐悲鸿来邕举行画展。

15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本省管理货币办法》，以广西银行、省金库发行的钞券为“法币”，严禁继续使用硬币生金银。

12月

18日　南宁8000余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

21日　桂林8000余学生和市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

是月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村街民大会规则》。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1月

2日　全省第一届国术运动大会在南宁举行。

2月

24日　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是月　第一次全省团务行政会议在南宁举行。

4月

是月　广西县政公务员政治训练班在南宁成立。

是月　邕、柳、桂、梧等地发生地震。

5月

23日　广西文化救国会在南宁成立。

是月　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在南宁西乡塘成立。

6月

1日　两广事变爆发。是日，白崇禧在广西省政府礼堂扩大纪念周会上作《抗日救国》演讲。

3日　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南宁成立。

4日　南宁各界群众4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通过拥护抗日反蒋通电。会后游行示威。

27日　广西抗日救国军学生军（史称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在南宁成立。

29日　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在广州、南宁就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副司令职。

7月

5日　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成立国防剧社，万籁天任社长。

24日　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职，任李为军委会常委，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白拒绝国民政府的任免，准备组织军政府。

是月下旬　云广英受中共中央派遣以红军代表名义从陕北到南宁会见李宗仁，力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蒋桂冲突。

8月

1日　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举行抗日宣誓典礼，决心反蒋。

8日　李济深抵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商反蒋。

23日　刘斐代表李宗仁、白崇禧赴广州与蒋介石谈判。

31日　蒋介石派王宠惠到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和谈。

9月

2日　居正、程潜、朱培德携蒋介石亲笔信到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和谈。

6日　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免去广西绥靖主任黄绍竑职，仍任浙江省主席。

14日　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

17日　李宗仁赴广州会见蒋介石。

10月

1日　广西绥靖公署、第四集团军总部由邕迁桂林。

5日　广西省政府迁桂林。

11月

7日　中共郁江地区代表大会在贵县三里罗村召开。因代表已超出郁江地区范围，大会改称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

陈岸任书记。省工委机关设于南宁。

15日 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桂林举行。

27日 广西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反对逮捕“七君子”。

12月

16日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政治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1月

20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各县厉行植桐办法，提倡大力种桐。

26日 广西农民银行在桂林成立，黄维任行长，龙家骧任副行长。

2月

2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李宗仁、白崇禧为第五路军正副总司令，李品仙为参谋长。

4月

1日 《广西日报》在桂林创刊，韦永成任社长。

20日 广西省学生联合会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

5月

是月 国民政府财政部广西国款收支处成立，专负广西国款收支管理事宜。

6月

月初 受中共中央派遣，张云逸到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会见。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举行正式会谈。随后又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与四川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会谈。下旬，签订红、桂、川三方联合抗日纲领草案。

30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抵桂林，与广西当局商谈广西银行的桂钞与中央银行的法币比值问题。

7月

13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耕地租用暂行条例》。

16日　李宗仁发表《对日抗战重要谈话》，主张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

20日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坚决拥护抗战。

24日　广西省政府严令查禁蓄婢及童养媳。

8月

4日　白崇禧应蒋介石邀请，从桂林飞往南京，与蒋“共商抗日大计”。

17日　国民政府财政部下达《维持广西金融六项办法》。

20日　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广西部队编为第一预备军，李宗仁任司令官。不久，改为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任总司令，辖三个军，即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八军。

28日　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30日　第五路军总部在桂林、南宁、柳州等地逮捕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王公度及谢苍生、区渭文、韦干等人。同时趁机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陶保桓，党员蒋汝志、崔真吾及一些进步人士。9月14日，以托派罪名将王公度等4人枪决，并将陶保桓、崔真吾杀害。

是月　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9月

是月　省会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

中旬至11月上旬　中共桂西特委书记黄桂南与百色民团区指挥官黄韬等进行“谈判”。

是月　第十一集团军各军先后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徐州、海州。

10月

1日　湘桂铁路全（县）桂（林）段兴工建筑。

9日　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

10日　李宗仁由桂林飞往南京转赴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2日　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大队（习惯称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参加学生军的广西大中学生共280人。

11月

9日 省教育厅设置播音台，播送抗战消息。

是月 国民政府财政部再次下达《整理桂钞办法》。

是月 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广西办事处成立。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1月

8~9日 日机数十架多次空袭南宁。

10日 日机多次空袭南宁、柳州。

是月 广西省动员委员会成立。

2月

13日 李宗仁在六安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是月 日机多次空袭梧州。

3月

26日 兵役法广西施行条例颁布，7月1日起实行。

是月 新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黄松坚任书记。

4月

1日 湘桂铁路南（宁）镇（南关）段动工兴筑。

6日 广西各界群众纷纷庆祝台儿庄大捷。

是月 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

5月

中旬 新桂系当局在南宁逮捕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松坚等6人，广西省工委和南宁市委遭受严重破坏。

是月 战时儿童保育会广西分会成立。

6月

28日 新桂系当局公开逮捕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徐泽长、李凤彰、韦成篇等人，8月3日将其杀害。

是月 日机多次空袭桂林、梧州。

7月

1日 由广西省政府和中国银行合资经营的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是月 省会桂林举行抗日献金大会。

是月 省会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暑期救亡工作团。

8月

16日 湘桂铁路桂（林）柳（州）段兴工建筑。

23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广西大学改为国立，马君武为校长。

26日 日机轰炸梧州，广西大学校舍损失严重。

是月 广西学生军大队从安徽派代表团8人返桂作汇报宣传。

31日 广西省县临时参议会章程公布实施。

9月

12日 广西省防疫委员会成立。

17日 日机30架轰炸梧州、柳州，梧州死伤民众300余人，广西大学校舍被炸毁。

18日 中央社桂林分社成立。

29日 湘桂铁路全桂段建成通车。

10月

26日 广西省政府战时民众教育工作团成立。

11月

16日 日机21架轰炸柳州，投弹100余枚。

中旬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

21日 国际新闻社在桂林建立总社。

30日 日机51架轰炸桂林，民众伤亡数百人。

是月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立，招收大中学生4000余人，组建三个团，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任司令。

12月

2日 日机轰炸桂林，死伤1000余人。柳、邕、龙、色、浔、贺等县市

亦连日遭日机空袭。

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成立，白崇禧任主任。

同日 周恩来由衡阳到桂林，8日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在会上作关于抗战形势报告。

同日 郭沫若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桂林。

7日 蒋介石视察西江。次日在桂林主持军事会议。

11日 《新华日报》桂林版出刊。

19日 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成立。

29日 日机轰炸桂林，全城大火，毁民房1500余栋，难民万余人无家可归。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1月

1日 白崇禧在桂林发表《元旦告军民书》。

同日 桂林广播电台试验播音。

10日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

11日 日机18架轰炸桂林，伤亡50余人。

下旬 叶剑英由重庆到桂林，应广西学生军第二团邀请，向该团作了《现阶段的游击战争和正规战》演讲。

2月

4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方案》。

6日 广西省政府在桂林举行成人教育年开学典礼。

16日 周恩来由重庆到桂林，应白崇禧邀请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军训工作之重要》演讲。

是月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成立，中共党员杨东莼应广西当局邀请出任教育长。

3月

是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选派一批党员打入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

部工作。

4月

1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令撤销第五路军总部，改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李宗仁、白崇禧为正、副主任。

5日 国民政府公布李任仁为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陈树勋为副议长。

15日 国民党广西省执行委员会改组，黄旭初为主任委员，万民一为书记长。

月底 周恩来从皖南回重庆途经桂林，出席桂林各界人士举行的欢迎宴会。

是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宣布陈岸任广西省工委书记。

是月 广西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改为省立医学院。

5月

21日 叶剑英应黄旭初邀请，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作《当前战局之特点》演讲。

同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桂林举行。

6月

7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

13日 日机空袭南宁。

7月

1日 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郭德洁任主任。

8日 日机27架空袭柳州。

上旬 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南方局指示撤销，成立桂林、梧州、南宁3个特支，分别由陈岸、黄彰、黄书光任书记。

15日 日机18架空袭柳州。

22日 日机轰炸柳州。

26日 日机空袭梧州。

31日 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在桂林开幕。

8月

6日 广西学生军司令部政治部编辑的《广西学生军》创刊。

14日 日机39架分袭信都、宁明、桂平、柳州、南宁。

9月

是月 黔桂铁路桂段开工建筑。

是月 日机先后频繁空袭柳州、南宁、贵县、桂平、玉林、兴业、宾阳、迁江、龙州、宜山等县市。

10月

1日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成立。

2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

22日 桂林文化供应社成立。

11月

1日 广西战时儿童教养院在桂林成立。

15日 日军从钦州湾龙门、企沙登陆，16日占防城，17日占钦县。

21日 日机30余架轮番轰炸南宁。日军沿邕钦路进攻南宁。

22日 日机轰炸南宁中国守军阵地。

24日 日军攻占南宁。

26日 白崇禧到迁江指挥作战。

28日 日军占领高峰隘。

30日 黄旭初发表《告广西全省民众书》。

12月

4日 日军占领昆仑关。

6日 广西省政府制定《战时县政办法》，规定各区县长不得退出县境办公。

18日 桂南国民党军根据桂林行营的部署开始反攻。第五军主攻昆仑关，然后各部配合围歼邕江南北岸地区之敌，收复南宁。

31日 中国军队经过半个月浴血奋战，攻克昆仑关。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1月

1日 桂林县改为桂林市。

10日 日军近卫旅团、第十八师团由广州增援桂南，在钦州湾登陆。

20日 日援军在南宁云集，组建第二十二军，准备反攻。

是月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从广东韶关移驻柳州。

2月

2日 日军攻占宾阳。

3日 昆仑关再失守。

22日 蒋介石自重庆飞抵桂林，当晚到柳州，主持桂南会战检讨会。

4月

4~5日 日机47架空袭田东，死伤400余人。

18日 广西全省划分为12个行政督察区及保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20日 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

是月 广西军管区成立，李宗仁任司令，吕竟存任副司令。

5月

28日 广西宪政协进会成立。

是月 广西学生军在隆安县下颜圩整编，三个团合并为一个团。

6月

1日 广西省各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成立。

同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为主任。李于9月4日由重庆飞桂就职。

6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桂林召开。

7月

1日 广西赈济会儿童教养院成立。

同日　桂林警备司令部成立。

2日　日军从南宁向西进犯，龙州、镇南关失守。

8月

1日　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桂林逝世，雷沛鸿继任校长。

22日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由重庆经柳州到桂林，桂林各界在火车站热烈欢迎。次日，广西省政府举行欢迎陈嘉庚先生大会。

28日　广西当局在柳州设立军民合作站，并于忻城、宾阳、贵县、武鸣、田东设立支站，在50多个县设立分站。

是月　中共广东省委派苏曼回广西筹建广西省工委。

9月

8日　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在桂林成立，黄旭初兼主任。

是月　广西省政府修正公布《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

10月

9日　李济深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

28日　龙州收复。

30日　南宁收复。

11月

12日　南宁各界5000余人举行收复桂南庆祝大会。

14日　钦县收复。

17日　钦防一带日军由龙门港乘船撤退。

22日　陈嘉庚由福建到达桂林。

12月

8日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桂林成立。

是月　中共南方工委派钱兴回广西重建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

1941年（民国三十年）

1月

1日　《广西教育研究》在桂林创刊。

20日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撤销。

是月起，桂林的生活书店、《救亡日报》等进步文化机关先后被查封和被迫停刊。

3月

3日　日军在北海登陆。

8日　中国军队与北海日军激战，当晚克复北海。

19日　广西通志馆在桂林成立。

4月

14日　《广西省政府安定本省金融暂行办法》颁布。

30日　国民党小董驻军枪决汉奸36人。

5月

30日　日机18架空袭桂林。

是月　黄旭初继李宗仁任广西军管区司令。

6月

7日　广西当局宣布解散广西学生军团。

月底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等到桂林，建立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李亚群任书记。

7月

11日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向全省发布命令，禁止公私团体及民众私自收听敌伪广播。

8月

1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建设计划大纲》。

4日　日机21架空袭桂林。

20日　日机32架空袭柳州。

9月

是月　广西军管区裁撤12个团管区，改为6个师管区。

是月　广西企业公司成立。

10月

10日　桂林市举行第一届运动会。

15日　广西省1941年度地方行政会议在桂林举行。

11月

4日　中国滑翔总会广西分会在桂林成立。

13日　日机41架空袭柳州、桂林、平乐等地。

是月　广西省政府重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曾作忠任校长。

12月

15日　日机11架轰炸南宁。

20日　桂林各界10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拥护国策反侵略运动大会，会后示威游行。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3月

是月　广西省政府规定每年3月29日至4月4日为“师范教育运动周”。

4月

1日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改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曾作忠。

同日　广西省政府将12个行政督察区缩减为7个行政督察区。

6月

12日　日机18架入侵桂林，美空军飞虎队起飞迎击，击落日机8架。

7月

7日　桂林各界5万余人举行抗战5周年纪念大会。

9日　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因叛徒出卖在桂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是为“七九事件”。苏、罗、张3人于12日牺牲。

11日　中共广西省工委印发《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国民党

特务和广西当局的反共罪行。

8月

12日　广西省政府决定改组县政府组织，定为二室五科。

夏末以来，全省洪水严重，受灾达49个县。

9月

是月　广西省政府将金秀警备区署改为金秀设治局，归第三区专员公署管辖。

10月

上旬　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等转移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组成新的省工委机关。

11月

11日　日机35架分4批空袭桂林。

是月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各县县政府组织规程》。

12月

1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桂林举行。

31日　日机27架轰炸梧州，市区大火，死伤300余人。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1月

13日　国民党广西当局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等县进行大逮捕，30多名中共党员和20多名群众被捕，制造了“一·一三事件”。

15日　国民党广西当局派大批军警包围《曙光报》社、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部、邕宁妇女分部等10多个单位，逮捕中共党员51人。同时，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逮捕中共党员28人，群众20多人。制造了“一·一五事件”。

2月

23日　日军在广州湾登陆，广西省政府令玉林、博白、岑溪、北流、兴

业、苍梧等县立即疏散。

是月　黔桂铁路广西境内全线通车。

3月

20日　广西省政府明令查禁大刀会、大道会、同善社等组织的活动。

31日　大瑶山瑶民举行起义，瑶民首领全金标率众攻打金秀。广西当局派兵镇压，起义失败。

4月

5日　日机10余架入侵南宁，盟军驻南宁空军飞机5架起飞迎击，击落日机2架。驻柳州盟军飞机也起飞迎击，击伤日机多架，美机一架与日机拼撞互毁，美飞行员牺牲。

8月

是月　省立桂林师范学院改为国立。

9月

2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剿办盗匪办法》。

11月

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撤销。

13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防治天花、霍乱、疟疾等办法。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2月

3日　蒋介石巡视桂林，5日至南宁。

15日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桂林开幕，5月19日结束。参加戏剧展览的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福建等省30多个戏剧团队，共895人，演出175场，观众10多万人。

6月

12日　桂林市60多家盐号联名请求国民政府改善盐运，取消限制。

14日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在桂林动员抗战宣传周大会上发

表演讲，号召开展“保卫大西南”运动。

18日 桂林举行规模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领头参加游行。

同日 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成立，李济深任会长。

26日 桂林开始疏散。

7月

3日 广西省政府第一批工作人员撤往宜山。

4日 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成立，参加工作队的有作家、教师、学生、社会知识青年、机关职员等共70多人。工作队成立后开赴桂北前线劳军和抗日宣传。

8月

是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作出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

9月

8日 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攻。是日，桂林防守司令部发出第2号疏散令。

11日 日军陷黄沙河。

12日 桂林防守司令部发出限期3日强迫疏散令，桂林市居民纷纷撤离。

13日 日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进攻全县，国民党守军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弃城逃跑。

20日 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在桂林被处决。

21日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占领梧州。

28日 日军第一〇四师团占领平南丹竹机场。

10月

11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占领桂平。

27日 日军攻占兴安、灵川后，以三个师团进攻桂林。

11月

1日　《广西日报》（昭平版）在昭平县创刊。

3日　日军第十一军第三、第十三师团进攻柳州。

10日　桂林沦陷。

同日　柳州沦陷。

21日　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金城江。

24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攻占南宁。

28日　凭祥、南丹失陷。

12月

2日　龙州沦陷。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2月

20日　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成立。

22日　公立西江学院在百色成立，院长雷沛鸿。

26日至3月3日　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领导的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抗日武装举行起义。

4月

1日　第二方面军在百色由第四战区改组成立，张发奎为司令官。

27日　第二方面军攻克都安后向南宁进攻。

5月

21日　第二十九军克复河池后，沿黔桂路向宜山进攻。

26日　第六十四军收复南宁，日军分向龙州和柳州逃窜。

6月

7日　龙州收复。

29日　柳州收复。

7月

5日　镇南关收复。

23日 日军再占凭祥。

25日 第一五六师再克凭祥、镇南关。

27日 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七集团军收复桂林。

8月

5日 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迁驻柳州。同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宁。

16日 梧州收复。

17日 全县收复。

9月

1日 广西省保安司令部在百色成立，黄旭初兼任司令，张任民任副司令。

3日 南宁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

15日 广西省政府由百色迁回桂林。

10月

1日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在桂林恢复办公。

是月 第十军官总队在南宁成立，罗奇任总队长，收集编余及闲散无职军官5000~6000人。

11月

15日 《广西日报》在桂林复刊。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

1日 中国民主同盟广西支部机关报《民主星期》（桂林版）创刊。

30日 广西大学发起“返梧运动”，1000余学生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强令西大从柳州临时校址迁往桂林。

是月 广西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通令全省各地“清乡”。

2月

24日 桂林文化界联谊会成立。

28日　广西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

是月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国民中学调整办法》。

3月

11日　《广西建设》月刊创刊。

28日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以本省粮荒严重，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迅拨大宗粮食救济。

29日　桂林各界在七星岩公葬桂林抗战牺牲将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及空军和八百壮士。

4月

5日　广西救灾运动委员会分电行政院、联合国救济总署、李宗仁、白崇禧等，呼吁增拨广西省救济款物。

28日　桂林文化界联谊会致书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帮助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兵和供给国民党军队武器。

5月

7日　柳江县300多饥民集体向县政府请愿，并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发表呼吁书，要求政府当局裁军，取消苛捐杂税，发放粮款，赈济饥民。

26日　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第三期业务费4亿元全数拨充房屋救济，救济范围为全省卫生慈善机关房屋及修复小学校舍。

6月

10日　广西省参议会在桂林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幕典礼。

14日，广西建设协进会在桂林成立，黄旭初、李任仁为理、监事。

7月

25日　广西省中等教育会议在桂林举行。

是月　全县灾情严重，饿死数千人。

8月

19日　广西省保安司令部发出《防止奸党地下活动以遏乱萌》电令，严令所有机关、学校、团体，密查中共的活动，加强对其监视。

29日　白崇禧由南京飞桂林，调解省参议会议长选举纠纷。

9月

1日　历时三个月的广西省参议会会议闭幕，蒋继伊当选为广西省参议会议长，岑永杰当选为副议长。

26日　桂林市警察局会同省保安司令部、国民党省党部等搜查全市各书店，没收《民主》、《唯民》、《正报》、《文萃》、《自由世界》等10多种进步刊物。

10月

1日　梧州海员工会罢工，全市船只停驶。

21日　广西省1946年度地方行政会议在桂林召开。

11月

是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先后到桂东、桂北、柳州、来宾、横县等地，向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给南方各省工作的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12月

14日　广西省参议会开会决定请议长蒋继伊赴京向中央请求免征借本年度广西公粮和增加广西的救济款物。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月

8日　广西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出告全省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致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部抗议书等文告，抗议美军暴行，并开展“美军滚出中国宣传周”活动。

是月　桂、柳、邕、梧及一些县城大、中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响应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斗争，反对美国的侵华政策。

2月

6日　广西省政府决定因本省财政支绌，撤销金秀治局，所属各乡分归原拨各县管治。

是月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南宁，改名为南宁师范学院。该院进步师生组织护院委员会，反对迁校和改名。

3月

1日　广西省农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桂林召开。

3日　国民党广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桂林召开，黄旭初作施政报告。罗广福当选为省党部书记长。

4月

7~14日　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圩乡六秀村主持召开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会议，作出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的部署。

17日　广西省地方自治研究会在桂林召开会议，讨论宪政、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建设等问题。

5月

26日　广西大学全体学生发出告全国同胞书、致“五二〇”受伤同学的慰问信和反饥饿、反内战宣言，宣布罢课3天。

29日　广西医学院宣布罢课3天。

30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发表谈话，省保安司令部发布告，严禁煽动学潮，聚众闹事，否则将“依法严惩”。

6月

2日　广西大学、广西艺专1000余学生在桂林市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4日　桂林中学、逸仙中学、桂林女师和桂林护士学校等近1000名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南宁、柳州的大、中学校学生也举行罢课和游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制造“五二〇”血案。

5日　钟山县英家乡群众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25日，富川古城也爆发武装起义。

7月

8~9日　中共桂柳区工委成立，陈枫任书记。

上旬　新桂系当局在桂林、南宁、贺县、钟山等20多个县市逮捕爱国师生和群众100多人，是为“七月事件”。

23日　中共灵川特支在灵川县灵田乡发动武装起义。

24日　中共全灌特支领导全县、灌阳两县7个乡（村）起义。

是月　全省水、旱、虫灾害共62个县，受灾人口300万人，灾区到处疾病流行。

8月

19日　左江人民解放军龙州县大队在大青山发动起义。

25日　明江县爱店地下武装发动起义。

27日　广西省教育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在桂林举行。

9月

13日　广西省政府通令全省各县恢复民团制度。

上旬至中旬　万冈、凤山、果德、那马、武鸣、隆安等6县3000余群众武装举行“桂西起义”。

29日　贵县、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群众武装举行“中秋起义”。

30日　广西省总工会在桂林成立。

10月

10日　白崇禧发表《告广西父老书》，动员“戡乱”。

22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紧急保安费征借办法》。

是月　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青年会”。

11月

6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省限制私有耕地面积最高额实施办法》。

是月　宾阳县长秦镇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十人，制造“宾阳血案”。

是月　私立西江学院改为省立。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1月

1日　广西省各保安总队改称保安团队。

13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广西健全基层组织办法》。

是月　广西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派第七区专署保安副司令阳丽天、广西全边对汎督办吴助之赴越，与侵越法军谅山司令部签订会剿桂越边中越人民武装的密约。

2月

15日　由伍廷飏、张任民等人发起筹建的广西省农村建设协进会在柳州成立。

25日　桂林一些团体向全国发出《告国人书》，拥戴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民国总统、副总统。

下旬　新桂系令回桂整补刚完毕的正规军第一七四旅主力分赴左江十万大山区，“围剿”游击队。

3月

12日　广西参议会通电拥护蒋介石、李宗仁竞选总统、副总统。

4月

14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桂访问。

5月

6日　广西大学学生为争取全面公费，宣布罢课3天。

30日　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广西分会在桂林成立。

6月

4日　陈此生、吕集义、莫乃群、周钢鸣等参加签署《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

9月

17日　广西省政府颁布《广西省各级学校举行减租限田宣传周》。

30日　广西省政府公布《广西省戡乱时期乡镇村街长副防匪保境奖惩办法》。

11月

是月　中共桂北地工委成立，阳雄飞任书记。地工委决定准备普遍开展

武装斗争。

12月

是月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撤销桂柳区工委，分别成立中共广西省城市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陈枫任省城工委书记，李殷丹任省农工委书记。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1月

15日　广西当局宣布自是日起全省实行戒严，每日零时至6时实行交通管制。

是月　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在桂林主持召开全省城市工作干部会议。会议要求以做好迎接解放军解放广西的工作作为今后半年的中心任务。

2月

15日　南宁师范学院数百名学生包围院长黄华表的办公室，要求他收回停发学生伙食费及侵犯学生民主权利的成命。黄华表被迫于5月7日辞职。

23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梧州为对外开放口岸，对外直接通商。

3月

11日　广西省政府政务督导团分赴第一、二、八、十等区各县督导政务。

28日　柳州铁路局桂林机务段1000余职工开展索薪罢工斗争，迫使路局补发拖欠的部分工资。

30日　广西大学800多名师生高呼“我们要吃饭”的口号，上街游行，包围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该行发还部分欠款。

4月

9日　广西大学学生发表《抗议“四一”血案宣言》。17日，在该校礼堂举行追悼“四一”烈士大会。

18日　桂林中学1000余名师生为该校饿死的教师秦强举行“抬棺游行”。

23日　李宗仁由南京飞抵桂林。

下旬　李任仁等部分省府委员、厅长及部分中央立法委员共数十人联名签署《希望和平的意见书》，要求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实现广西的局部和平。

5月

1日　桂林绥靖公署成立，李品仙任主任，黄旭初、莫树杰任副主任。

8日　李宗仁飞广州。

28日　在香港的广西籍人士周钢鸣、莫乃群、石兆棠、秦似、黄梦醒、赵乐群、李省群等71人，公开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广西当局企图顽抗的阴谋，号召广西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局部和平。

30日　民革成员、原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在其家乡宾阳县新梁村被国民党军杀害。

6月

15日　桂林绥靖公署公布附缴自卫特捐暂行办法。

2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成立，司令员兼政委梁广。

7月

14日　桂林绥靖公署成立6个军政督导团，分赴全省各军政区“督剿”，强化保安、民政、财政等措施。

23日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成立，总队长兼政委吴腾芳。

24日　中共广西省城工委召开会议，决定放手发动工人、学生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的斗争。会议决定成立柳州市城工委和南宁市城工委。8月又成立梧州市城工委。

8月

19日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烧毁灵川、甘棠渡两座铁桥，迫使湘桂铁路交通中断半个月。

9月

5日　广西银行由桂林迁南宁。

14日　广西省政府下令解散柳州龙城中学。在此前后还下令解散桂林师

范学校，全省撤换30余名中学校长。

22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广西省委，张云逸任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任副书记。

10月

5日　中共桂林市城工委书记陈光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1月11日被秘密杀害。

10日　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向桂北敌人发出《最后通牒》，同时发布总攻击令，命令所属各部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

26日　广西省政府由桂林迁南宁。

11月

6~7日　人民解放军分西、南、中三路分别从湘粤向广西进军，揭开广西战役序幕。

15日　中共广西省委发表《告广西人民书》，号召各地游击队和全省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解放广西。

22日　桂林解放。

25日　柳州、梧州解放。

29日　玉林解放。

12月

2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

3日　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从南宁乘飞机逃海口。

4日　南宁解放。

5日　百色解放。

7日　解放军在钦县小董围歼国民党军第十、第十一兵团各一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部队1万多人。

9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为基础，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委。

11日　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广西战役结束，全省解放。

中旬至1950年1月　在白崇禧正规部队全部被歼的形势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策反工作，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周祖晃、第六区专署专员赖慧鹏、黔桂边区中将司令官张光玮、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官莫树杰等先后率部投诚、起义或改编。至此，桂系集团残存的地方部队大部瓦解。

1950年

1月

12日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发出整建地方武装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广西各游击队分别编入各军分区独立团、各县大队、区中队。

2月

8日　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

二、主要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2.《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3.《李德邻先生言论集》，广西建设研究会，1941。

4. 李宗仁等：《广西之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

5.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桂林全面战周刊社，1938。

6.《李德邻先生论广西建设与复兴中国》，南宁建设书店，1938。

7. 陈明章编：《黄季宽先生言论集》，桂林真实书店，1942。

8.《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创进月刊社，1936。

9. 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10.《白副总司令最近演讲集》，1932。

11.《黄旭初先生讲演集》，南宁民国日报社，1935。

12. 亢真化编：《黄旭初先生之广西建设论》，南宁建设书店，1938。

13.《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14.《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15.《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

16.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7.《广西与中国革命》，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6。

18.《广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报告书》，广西省政府，1933。

19.《新广西》，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5。

20. 许壁编：《广西建设集评》，西南印书局，1935。

21. 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1936。

22.《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中国社会教育社广西考察团，1937。
23. 千家驹等：《广西省经济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4.《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广西师专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
25. 亢真化：《广西的三位一体制》，民团周刊社，1938。
26.《广西财政纪要新编》，广西省政府财政厅，1938。
27.《抗战中广西的动态》，上海抗战编辑社，1938。
28. 雷沛鸿：《六年来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民团周刊社，1939。
29. 陈晖：《广西交通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
30.《广西年鉴》第一回，广西统计局，1933。
31.《广西年鉴》第二回，广西统计局，1935。
32.《广西年鉴》第三回，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33. 黄旭初：《抗战的结果与政治演变》，民团周刊社，1938。
34. 徐晓明：《广西之寓将于学政策》，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1939。
35. 邱昌渭：《广西县政》，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36.《桂政纪实》，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1943。
37. 许高阳：《十年来之广西民团》，桂林西南导报社，1940。
38.《桂南从沦陷到收复》，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政治部，1941。
39. 黄旭初：《抗战以来的广西》，胜利出版社广西分社，1943。
40.《广西经济建设统计提要》，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3。
41.《广西经济建设手册》，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室，1947。
42.《广西省统计提要》，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8。
43. 梁上燕：《广西建设》，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2。
44.《广西学生军纪实》，广西学生军纪实编辑委员会，1940。
45.《广西大事记要》（1912～1930），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
46.《民国二十年来广西大事记》，广西省政府，1939。
47.《广西日报》，1937年创刊。
48.《南宁民国日报》，1928年创刊。

49.《正路》(月刊)，广西民团干部学校1935年创刊。

50.《创进》(月刊)，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1934年创刊。

51.《民团周刊》，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政训处1937年创刊。

52.《桂林日报》，1934年创刊。

53.《救亡日报》，1937年创刊。

54. 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55.《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西档案馆，1982。

56.《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

57.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58. 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59.《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0.《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76。

61.《民国日报》(上海)。

62.《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63.《申报》(上海)。

64.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65. 李炳东、弋德华：《广西农业经济史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66.《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67.《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68.《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69.《新桂系纪实》，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

70.《广西文史资料选辑》，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61年创刊。

71.《广西文献》(台北)，1978年创刊。

72.《新桂系史料旧刊》，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73.《桂政导报》，广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45。

74.《桂林市年鉴》，桂林市文献委员会，1949。

75.《广西建设重要文献》，广西训练团，1947。

76.《广西省中等教育述要》，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9。

77.《广西军政会议报告书》，广西省政府，1931。

78.《广西民团条例章则汇编》，广西省政府、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1934。

79. 李绍雄：《广西教育史料》，广西史地社，1946。

80.《广西各县概况》，广西省民政厅，1933。

81. 谢祖莘：《广西地方自治概要》，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82.《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83.《党在广西学生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84.《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广西省政府统计室，1946。

85.《晚清和民国时期广西统计史料摘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86.《桂系大事记》，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

87. 黄茂田：《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史教程》（1919～1949），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88.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89.《桂北文献资料选编》，中共桂林地委党史办公室，1988。

90.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91. 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92. 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93. 王序平、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94.《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95. 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96. 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97.《广西通志·铁路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98. 李炳东：《广西当代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1991。

99. 梁有斌、谢永泉主编：《广西公路运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0. 张若龄、陈虔礼：《广西公路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101. 马依、舒瑞萍主编：《广西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102.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湾黎明出版社，1977。

10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04.《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城市工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05.《广西抗战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06.《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广西武装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107.《广西解放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08.《广西战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109.《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10.《广西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11.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112.《桂林文史资料》，政协桂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2年创刊。

113.《南宁文史资料》，政协南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创刊。

114. 沈奕巨：《广西抗日战争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15. 姚舜安：《广西民族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116.《广西通志·人口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117.《广西通志·宗教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18.《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后　记

《广西通史》第三卷主要是叙述1919～1949年的广西历史。本卷根据钟文典教授拟定的《广西通史》编写指导思想、原则、结构，由谭肇毅、伍文浩、何龙群、唐仁郭等同志撰写。

本卷是我们在多年来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和吸收史学界研究成果写成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广西师大历史系开设《广西地方史》课程，谭肇毅、伍文浩等同志负责讲授1919～1949年的历史，称“广西现代史”。与此同时，为配合教学，在钟文典教授主持下，几位老师共同编写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这样，广西地方史的研究逐步扩展和深入。90年代初，钟文典教授又提出在教学的基础上写一部《广西通史》，得到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样，《广西通史》的编写工作便开展起来。1919～1949年的广西历史，按其社会性质属广西近代史的内容，为编写分工的方便和篇幅平衡，鸦片战争至1919年编为第二卷，1919～1949年编为第三卷。

按照通史的要求编写1919～1949的广西历史，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认为本卷应该全面反映1919～1949年广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运动、演变和发展。我们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的原则，全面反映这个时期广西的历史面貌，总结历史的经验。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挖掘和使用第一手资料，并经过思考提出我们对各种问题

的看法。但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有限，加上这个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许多问题的研究刚开始，因此书稿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期待从事广西地方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给予批评和指教。

本卷编写分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之一至五、第七章之一至五为伍文浩；第四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为何龙群；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六章之六、第七章之六、七和大事记为谭肇毅；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为唐仁郭；第十一章为曹光哲；曹裕文提供第六章之七（文化）初稿。全书最后由谭肇毅统一修改定稿。

地图、照片由谭肇毅选辑，廖国一给予了帮助。

编　者

1998年6月